

20世纪俄罗斯

档案文件

新经济政策
是怎样被断送的

(三)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

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五卷本）

- 第一卷 1928年4月6—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二卷 1928年7月4—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四卷 1929年4月16—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第五卷 1929年11月10—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第三卷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Как ломали нэп.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ов ЦК ВКП(б) 1928—1929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терик»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Фонд Александра Н. Яковлева), 2000.

© Данилов В. П., Закомолкина И. М., Леванович В. С., Хлевнюк О.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введен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崔继新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马杰 责任校对:张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三)/[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曲延明

任建华等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主编)

ISBN 978-7-01-006259-4

I. 新… II. ①雅… ②曲… III. 经济政策-研究-俄罗斯 IV. F1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606 号

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三)

XIN JINGJI ZHENGCE SHI ZENYANG BEI DUANSONG DE

[俄]A. H. 雅科夫列夫 主编 曲延明 任建华等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5.5

字数:763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6259-4 定价:9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ISBN 978-7-01-006259-4



9 787010 062594 >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В. П. 丹尼洛夫 О. В. 赫列夫纽克 А. Ю. 瓦特林 (以上为主编)

М. С. 阿斯塔霍娃 Г. В. 戈尔斯卡娅 И. М. 扎科莫尔基娜

Е. Е. 基里洛娃 Л. П. 科舍廖娃 В. С. 列瓦诺维奇

Л. Н. 马拉申科 Н. В. 穆拉维约娃 Л. А. 罗戈娃娅

Н. А. 西多罗夫

曲延明 任建华 邢艳琦 刘燕明 门三姗

韩英 侯静娜 彭晓宇 付哲译

赵国顺 李京洲 校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葵	黄书元	鲁桓	戴秉国
魏华	臧乐安				

卷 首 语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20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69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年9月30日

序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在联共(布)中央1928年七月全会(此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表在上一卷中)上公开暴露出来,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局内的斗争具有“稳扎稳打”的性质,其表现主要与当时的事件有关。对立双方唯恐被人视作分裂制造者,言行极为谨慎,此外,因适逢夏季休假期而出现的通常的季节性平静,也起了作用。

1928年7月10日通过的关于停止执行“非常措施”和纠正其造成的“缺点和错误”的决定,本应能够防止今后采取“任何非常措施”¹,从而保证不仅在国家和农村的关系上,而且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各项原则。但是,上述决定的实施一拖再拖,从一开始就具有空话宣言的性质,并且局限在与所谓的“过火和歪曲行为”作斗争的范围之内。斯大林领导班子对于刚刚通过的中央全会(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实际上采取了暗中抵制的立场。

七月全会以后有关取消“非常措施”的中央政权机关文件,反映了上层支持和反对恢复新经济政策的人之间的明争暗斗。7月16日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下发了第23/c号秘密通知,通知中从“先前发布的有关粮食收购的命令”出发,责成检察院采取“坚决措施,立即从粮食收购运动的实践中消除有害的(?)过火行为”,如对农户的盘查、“非法的搜查和逮捕”、义务上缴“余粮”的余粮收集制、关闭集市等行为;通知命令搜集“有关地方政权机关采取类似措施的一切事件的”信息,并且“通过提出异议……争取立即取消这种措施”,若出现对异议的不满,要向上级检察机关、“直至共和国检察长”报告,甚至要追究“进行这种歪曲者”的刑事责任。

责成检察院和法院随后“立即按照上诉程序和监督程序审查所有与《刑法

典》第 107 条有关的未审案件,终止涉及中农和贫农的一切案件”,同时要遵循曾在“非常措施”条件下为筹备中央四月全会而通过的,但在全会之后立即被遗忘的 1928 年 3 月 28 日通知……

在司法人民委员部的通知中,“为即将到来的粮食收购运动做准备……”用的是不同字体,更加严厉地要求将其作为“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任务之一”。命令“……立即召开检察院、法院和侦查机关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并吸收有关机构(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者注)的代表参加,仔细研究你们地区以往粮食收购运动的结果,为使整个司法侦查机构对以后的运动做好准备而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确保在司法机关的工作中出现必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内容被笼统地概括为:防止“地方政权机关可能重新采取非常行政措施”、不允许“重新出现对中农和贫农有害的(?)过火行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随后应该立即十分具体和明确地要求“使侦查机构和司法机构对于迅速审理有关收购和买卖粮食的商人的案件做好准备,因为这些人一旦重新企图……破坏粮食收购,就应该受到《刑法典》第 107 条的追究”。同时命令“坚决打击苏维埃机关纪律涣散的作风和不尽职的行为,坚决打击有害的竞争行为……坚决打击破坏……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的行为等”。最后,强调指出了“这些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和意义……”“迅速地、一丝不苟地、站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解决这些任务,是对司法机关的强大有力和政治坚定性的考验”²。

对司法人民委员部 1928 年 7 月 16 日秘密通知进行详尽说明,首先是因为这份通知是中央七月全会后下发到地方的第一份具有实际意义的有关粮食收购问题的指导性文件。H. B. 克雷连柯(时任副司法人民委员)签署的这一文件显然是在斯大林的指使下拟就的。

实际上,这不是关于取消“非常措施”和纠正其后果的通知,而是关于保持和继续实行紧急措施的通知,但把执行者改成了惩罚机构——检察院、法院等。中央全会的决定在一段时间内使斯大林领导班子无法大肆利用党的组织系统推行强制性的粮食收购政策,无法大规模地采取非常措施。

苏联人民委员会于 7 月 19 日即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部第 23/c 号通知下发三天之后通过的《关于收购新收谷物的决定》,是对斯大林的变相指示的回应。A. И. 李可夫领导的政府作出决定:“1. 禁止采取任何形式的非常措施,要求所有政权机关做到:(1)立即停止使用强制没收农民粮食的一切(!)手段,包括不再‘追究迟迟不向市场出卖粮食者的法律责任……’即不再适用《刑法典》第 107 条;(2)立即停止一切禁止集市贸易和农村内部流转的措施……2. 根据

地方条件将粮食收购价格每普特提高 10—20 戈比。”

当然,这仍低于市场价格,但能为恢复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奠定基础。政府要求商业人民委员部“保证向农民及时合理地供应工业品……”(第 3 条),并且要求所有政权机关“对手工酿酒进行更坚决的打击”(第 4 条)³。

总的来看,《刑法典》第 107 条,特别是因这一条被逮捕和被判决有罪者的命运,是统治集团中久拖未决的最大分歧。如我们所看到的,司法人民委员部 7 月 16 日的通知只是要求通过审查“一切尚未审结的案件”和终止中农和贫农受到追究的案件来纠正适用该条刑法所造成的后果。在今后时期则要求司法侦查机构“在重新出现破坏粮食收购的企图……时”作好“迅速”适用《刑法典》第 107 条的准备。苏联人民委员会 7 月 19 日的决定实际上禁止适用第 107 条。

问题直到 8 月 2 日才得到解决,当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释放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而被判有罪的贫农和中农以及今后在进行粮食收购时不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新通知(8 月 7 日第 26/c 号)是高层冲突双方妥协的最终结果,这一通知不是在司法机关的整个系统内分发(像 7 月 16 日的通知那样),而是在省、州和边疆区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的有限范围内分发。终于发布了命令:“立即释放因没有上交余粮而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通过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被判决有罪的中农和贫农。应当注意的是,此项措施不适用于怙恶不悛的囤积居奇者和粮食投机商;富农和私商”。同时要求“立即终止所有根据《刑法典》第 107 条而追究没有上交余粮的中农和贫农责任的未审结案件”。

在新的粮食收购运动中,“根据政府 1928 年 7 月 19 日的决定,作为对我们 1928 年 7 月 16 日第 23/c 号通知的补充”,提出如下要求:

“(1)以适当的方式坚决制止一切可能的重新取消集市和农村内部流转、设置阻截队、强迫把粮食送往集市的农民把粮食出售给国家或者合作社机构等的做法;

“(2)绝不能容许以强制方式收缴农民的粮食,比如:盘查农户、搜查、余粮收集制;非法的和不合诉讼程序的逮捕;按照诉讼程序或者非诉讼程序追究没有把余粮上缴或者没有把余粮投放市场的农民的刑事责任。

“(3)与此同时,必须按照司法人民委员部 1928 年 7 月 16 日第 23/c 号通知第 3 条的指示,全面加强对手工酿酒的打击”⁴。

反对“非常措施”的人似乎取得了胜利,似乎实现了禁止对农户适用第 107 条的目的。但司法人民委员部 7 月 16 日的通知只是被加以补充,而不是被取

消,并且不久之后的粮食收购正是按照该通知的要求进行的。9月11日《消息报》登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其中提到对农民“强制没收粮食”的事实。9月15日司法人民委员部下发了新的通知:《打击粮食收购中的破坏行为》(第127号),以此“重申我们1928年7月16日的通知”。8月7日的通知实际被彻底忘在脑后⁵。

1928年7—8月间,斯大林领导班子之所以同意暂时取消“非常措施”,只是在等待恢复紧急措施的时机而已,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消除“非常措施”的后果和改变已对个体经营的前景失去希望并且把生产压缩到自家生产生活的需要水平的农民的情绪。斯大林在同他的支持者的来往书信中公开表示不接受在政治局内的斗争压力下被迫同意的那些措施。米高扬8月23日致斯大林的信(见补充材料1)和下面援引的斯大林9月17日和26日致米高扬的信表明,新的紧急粮食收购运动只是被推迟,想必由于中央新一次全会临近,于是决定从签订了播种合同、但由于收成不好而无力履行义务的农户来开始新的紧急粮食收购运动。责成根据《刑法典》第131条追究这些农户的责任,这一条刑法规定:“不履行同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签订的合同义务……如果审理案件时……发现不履行义务是恶意的,则判处不少于6个月的监禁并处没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⁶这条法律在惩罚力度方面对第107条是极其重要的补充,并在实践中得到严格执行。在进行1929年的粮食收购时,司法人民委员部责成检察院和法院“特别重视此类案件,保证以最快速度侦查和审结这些案件”,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⁷。

斯大林在9月17日致信米高扬:“你的便条收到了。看来,粮食问题将提上日程。应当承认,布哈林会失去通过再次提高粮食价格而‘加紧向富农进攻’的机会。你可以对他说,我完全理解甚至同情他的处境。”⁸斯大林在9月26日发展了这个想法:“许多人曾认为取消非常措施和提高粮食价格是消除困难的基础。这是布尔什维克中无聊的自由派的无聊的指望。”⁹

斯大林竭力拖延事件的进程,他行动谨慎,不出头露面,不时有意退到一边。他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召开)上没有讲话¹⁰,尽管他被认为是政治局内的头号中国问题专家。他在7月17日开幕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一言不发。结果联共(布)代表团委员会在布哈林关于国际局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提纲被作为基础并被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后,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重新组织了对提纲的讨论。¹¹

7月25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最繁忙的时候,联共(布)代表团听

取了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根据布哈林简要的笔记来看,他为其战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资本主义演进中需要重新看待和评价的崭新阶段的观点作了辩护。“我们现在意识到,主要问题还在于我们应该期待资本主义曲线出现下降。如果我们要说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等等完全缠绕在一起的话,那么主要问题在于整个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相互缠绕并且不能将其与内部矛盾拆分开。”¹²这些思想产生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一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新的方式提出了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在经济演进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得到斯大林支持的 B. B. 洛米纳泽是布哈林的主要论敌。洛米纳泽坚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日益临近,为此应使各国共产党做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布哈林在同他的论战中提到了几乎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毁灭的盲动主义的危害:“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把中国的党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在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改变了方向……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而言,其中并不存在盲动主义,但有许多同志说他们因无法完成的起义命令而感到痛苦……人们拿起棍子去举行起义。”¹³

由洛米纳泽提出并经联共(布)代表团同意的大部分意见,意味着“从左的方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批评。斯大林也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在7月25日的会议上讲了话。¹⁴结果向外国代表提出了新的提纲方案,壮大起来的“走廊代表大会”立即知晓了该方案出台的情况。这是在公开败坏布哈林的声誉,于是共产国际中,首先是德国共产党中,反对布哈林的人开始公开地说布哈林的末日来了,说布哈林是“去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的流放地)的候选人”。问题被提交政治局,但斯大林在向前迈出两步之后喜欢再向后退一步。7月30日代表大会各代表团代表会议收到一份由政治局委员签署的声明,内容是对散布有关联共(布)领导人之间分歧的流言表示抗议。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使斯大林感到十分满意。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加入了关于“右倾”是威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点,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 B. M. 莫洛托夫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夏天《真理报》编辑部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布哈林分子 A. H. 斯列普科夫和 B. H. 阿斯特罗夫被清除出去。

斯大林于8月初去休假,他仔细计算了他现有的用于转向坚决进攻的后备力量,他通过往来书信指挥其在莫斯科的追随者的行动。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写信时特别直言不讳,莫洛托夫身居联共(布)中央书记的要职,有能力控制所有的机构杠杆。在这段时期,无论斯大林还是“右派”,都不仅在团结各自的支

持者,而且在争取那些尚未明确立场、由于各种原因动摇不定的党的工作人员。这些任务在斯大林不在时由莫洛托夫完成。斯大林从南方写给莫洛托夫的最初一封信——1928年8月5日的信中,要求“时刻警惕”,防止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右派”的影响。“在我们周围存在这种家伙——对党不利。不能错过把这些‘活动家’从领导岗位上‘搞掉’的机会。”¹⁵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道密切注意政治局委员的动向,在他们之间挑起矛盾。例如,斯大林在1928年8月23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让托姆斯基(或者旁的什么人)使古比雪夫或米高扬‘丢脸’。你能否把托姆斯基攻击古比雪夫的信寄来?”¹⁶斯大林收到需要的托姆斯基的信之后,在8月31日给古比雪夫的信中写道:“你的情况怎样?听说托姆斯基有意和你为难。他是个恶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实的。我觉得他是不对的。你的关于合理化的报告我已经读过。报告是恰当的。托姆斯基对你还有什么要求?”¹⁷斯大林在这段日子里给米高扬的信写得相当勤。斯大林在8月28日的长信中安抚米高扬:“我认为,我国的粮食紧缺还将持续两三个星期。之后会好些。大概这是向好的方面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将积存下粮食,年底我们就能有储备了。关键是这两三个星期要挺住,很困难,但要挺住(……)总之,要坚持,别气馁,胜利肯定属于我们。”¹⁸斯大林的战友从未从他那里收到过像1928年那样“亲切的”信函。

就重要性而言,在斯大林休假期间要办的事情当中,为进攻支持李可夫—布哈林集团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作好准备是头等大事。斯大林1928年9月10日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关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一个‘错误’;决议中关于当前资本主义的‘改造时期’的那句话,本是联共(布)代表团从布哈林的最初提纲中删掉的(经布哈林同意),如今却在莫斯科积极分子的决议中出现。干嘛要这样做?难道这是执行代表大会和联共代表团的决议吗?”斯大林策划了一个在“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掩饰下反对首都党组织的阴谋,为此,他提出把关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提交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目的是在会上揭露“某些积极分子的某些错误”。虽然同莫斯科的领导人的斗争是按另一个脚本开始的,斯大林的信仍然表明他打算立即铲除莫斯科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喜欢采取看起来不是进攻而是防守的行动方式,故意作出对莫斯科市委书记H. A. 乌格拉诺夫的客观公正的姿态。斯大林1928年9月26日写信给米高扬说:“等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再谈乌格拉诺夫的事情。遗憾的是,他是一个在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不可救药的糊涂人。可惜,非常可惜。”¹⁹

撤换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是莫洛托夫筹划和实施的。莫洛托夫在9月14日,也就是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结束一天之后,写信给斯大林说:“乌格拉诺夫是主要问题。对他的所作所为多一天也不能忍受了。”²⁰莫洛托夫的信表明,他决定利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文件作为向莫斯科的领导人发起攻击的借口,在这些文件中强调的是困难,只字未提“右倾”。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在《真理报》上登载了谴责莫斯科全体会议文件的文章。

尽管布哈林仍然是《真理报》的责任编辑,但是来到《真理报》的斯大林的“政治委员们”——M. A. 萨韦利耶夫、Г. И. 克鲁敏和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将报纸重点转向了斥责“右倾”。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谁是“右倾分子”,但对于越来越多的党的工作人员来说所指何人是清楚的。布哈林1928年9月底动身休假时,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在同右倾作斗争》一文中的观点,该文为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架设了桥梁:“在关于联共的问题中只字不提与中农结盟,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右倾(对群众的需要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一些机构环节的官僚主义蜕化趋势即失去对群众最基本需要的辨别能力并且把政策简单化为单纯的行政命令等)。关于阶级斗争激化的问题表述得极端含糊(同谁进行阶级斗争?同中农或者不是中农?)。”²¹布哈林在论敌的压力下作了让步,承认存在“右倾”,他试图对“右倾”给予自己的、反官僚主义的解释,但没有能够制止由莫洛托夫亲自督战的宣传运动。

与此同时进行了下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控制数字的准备工作,这些数字必须得到定于1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例行全体会议的批准。经济政策的前景,特别是在紧急粮食收购的极其有害的尝试之后,要求最严肃地考虑现实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在斯大林领导班子的正在形成的关系体系中,讨论官方政策的缺陷和其负面结果是不可能的。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一文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上的发表,是H. И. 布哈林把所有这些问题提交讨论的尝试。这篇文章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一系列出版物上发表,为当代读者所熟知,因此我们只需简要介绍一下其内容和意义。《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对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激烈争论的公开反映。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札记的发表是在报刊上对斯大林政策的最后一次公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文章说的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和缺点,所以大家都清楚批评是针对谁的(请注意,对斯大林政策的批评是与对托洛茨基派“超工业化”的批评交汇在一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的声明《七月

全会和右倾危险》的回答²²)。

对1928年秋由于“非常措施”而在国内形成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新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基础即城乡间经济关系遭到破坏、向国家供应工农业产品方面出现的商品奇缺现象以及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蜕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忽视客观能力(“薄弱环节”)的唯意志论造成了不正常的局面,这种情况有引起最严重的失败、包括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居民面临灾难和饥饿的危险。布哈林指出,在农业中,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上形成了反常的局面,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开始,商品粮甚至在总产量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增长:1925—1926年度粮食产量增长32.4%,商品粮增长30.8%,1926—1927年度则分别增长3.85%和10.2%,1927—1928年度在总产量减少1.9%的情况下商品粮增长了6.8%。布哈林补充说明,关于粮食产量在1927—1928年度下降的数据不完整,——“……实际上减产的幅度还要大”²³。布哈林断言,在公认农民没有“无形储备”的情况下,产量下降必然导致“实物化趋势的增强”。

正如该文所指出的那样,粮食收购危机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客观原因(生产下降、农民的农业劳动收入增加等),而且是由于“不正确的价格政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严重脱节”,这对农民的生产利益产生了显著影响。布哈林认为北高加索地区是不正确的价格政策的“极端明显的例子”,那里在丰收的1925—1926年度收购部门每普特小麦支付1卢布15戈比,可在歉收的1926—1927年度和1927—1928年度每普特支付1卢布2戈比。结果农民在1925—1926年度1俄亩地(1.09公顷)的小麦卖了72卢布,1926—1927年度卖了32卢布,而在1927—1928年度只卖了24卢布。布哈林写道:“即便假设这些数据不十分准确,但它们毕竟相当清晰地说明了一种明显的趋势。”²⁴我们重提该文作者对所援引数据的准确性所作的保留说明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数据实际是斯大林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批评的唯一论据。

正如布哈林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和建设中的唯意志论计划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工业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任务的“不协调”在基本建设中造成了工厂需要用“明天”制成的砖和金属构件来搞“今天”的建设的局面²⁵。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布哈林根本没有提出回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新经济政策上去。《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阐述了通过工业化改造国民经济的构想,即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各主要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和依托农业的全面增长。正是在多种成分经济的条件下才能够建成新的经济关系体

系,这一体系“要求把个人的、群体的、大众的、社会的和国家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诚然,这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变得更文明并且学会更好地管理”,如果我们不容许“官僚主义的蜕化”……²⁶)

10月8日,政治局在布哈林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文章的一系列论点存有争议,《真理报》不应该未经中央委员会许可就予以发表²⁷。这个决定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没有点名布哈林的名但对他的文章大张挞伐的文字,成为斯大林的追随者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对布哈林展开严厉批评运动的信号。这些表面上没有得到批准、“根据来自下面的倡议”进行的严厉批评,是诋毁“右派”和逐渐准备对他们发起更加猛烈进攻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不曾准备亲自回答布哈林的文章。在前不久解密(虽然仍没有完全解密)的斯大林个人档案中发现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对布哈林同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的批评意见》的手稿……同布哈林的文章一样,斯大林的回答的第一部分也是概括地提出主题,然后应该是若干个进行更具体分析的部分(在布哈林的文章中是第2和第3部分)。从保存下来的手稿和打字副本可以推断,第一部分是斯大林在《……札记》刊出后立即写就的,而且没费力气,因为第一部分的内容无非是进行政治指责。在第一部分正文后面的罗马数字Ⅱ证明他是打算继续写下去的²⁸。尽管斯大林声称“……政治局不可能对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不闻不问”²⁹,但他最终也没有作出对经济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回答,这是斯大林所力不能及的。尽管如此,文章写就的部分仍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斯大林典型的论战方式,而且证明了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和此次全会上党的领导层内的情况。

斯大林在回答的开头声称,《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在党内引起了困惑,因为该文先是表现了“对党的现行方针的不满”,其次,表达了“通过公开争论‘纠正’这一方针的想法”。斯大林认为,在布哈林的这两大“错误”当中,“尤为危险的是在我们中间进行公开争论”³⁰。也许布哈林的确曾试图发起公开争论*,这种争论在布尔什维主义前不久的历史中还很普遍,它能够在没有私人“争斗”和迫害的情况下,制定“总路线”。但在左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之后,党的领导层

* E. 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是这样看的,他寄来了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关于〈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札记》,该文自然没有得到发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71号目录,108号案卷,第4—17张)。

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改变。党内的争论,尤其是公开争论,从这时起永远停止了。

斯大林称“《真理报》刊登布哈林同志的文章是一大错误”,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地方负责人员由于不了解布哈林同志的文章的发表背景而会陷入混乱状态。除现有的困难之外,政治局对这篇文章保持缄默又产生了新的困难”³¹。遗憾的是,我们也不清楚《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文章的“发表背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高层领导人就新的经济年度的远景进行了又一次交锋。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内容与写于七月全会前夕并在“七人小组”会面时引起明显冲突的决议草案《经济建设和党的任务》的内容颇为相似。在《经济建设……》的标题上方出现“札记”两字不是偶然的(见本文件集第2卷补充材料12)。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不仅是刊登一篇文章的事情,而且是对“紧急措施”的负面后果的分析的继续和扩展,是对斯大林领导班子的有意挑战。

斯大林的《对……批评意见》一文写就的部分不仅充满愤怒之情,而且肆意歪曲,把莫须有的东西硬加在他所分析的文章中。《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遭到批评是因为“折衷主义”和“不认真对待数字”。例如,说布哈林文章的“折衷主义”表现在支持“把重心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工业化方针,表现在“作者过分绝望地描述了我国的财政状况……并且给基本建设和基本建设投资附加了许多限制(坚决加强轻工业,初步消除……建筑业的赤字,消灭国家预算的紧张状态等等),从而自然得出结论:降低工业现在的发展速度,关闭第聂伯河列宁水电站,停止斯维里工程,终止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不开始汽车厂的建设……”³²布哈林要求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办法来支持农民经济、促进农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这被说成是主张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而加强农村的个体积累,而这种积累不可能不意味着富农收入最大限度地增加”³³。

“布哈林同志不认真对待数字”的证明是利用“不完全准确的数据”,如上所说,布哈林的文章对“数据不完全准确”预先作了说明,而且这与数据的初步性也有关系,因为经济年度还没有完全结束。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驳者没有一次引用过“准确的数据”。但是,斯大林的愤怒不是由数字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在这些数字基础上对生活现实的评价引起的。比如,关于布哈林对1927—1928年度粮食生产的进展(在总产量减少1.9%的情况下商品粮增长6.8%)的评价,他的回答是:“或者是1927—1928年度总产量的下降不符合事实,或者是这一数字是正确的,但那样一来表示商品粮产量增长的数字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这两个数

字都是正确的,但那样一来商品率在1927—1928年度只有依靠上一年度的商品粮余额才能增长(也就是说农村有商品粮储备)”³⁴。我们知道,斯大林无以回答。他不得不再次重复农村有巨大的“无形储备”这一已被戳穿的谎言。《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就这一点公开讲道:“……所有那些关于9亿普特粮食的夸夸其谈像耀眼的气泡一样化作了泡影,永远破灭了。再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³⁵。人所共知的对“商品率”提高的解释是为《刑法典》第107条服务的。

《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引起的冲突还与一件国际性的丑闻有关。9月底从柏林传来消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免去恩斯特·台尔曼的党主席职务。这一不寻常举动的导火索据说是因为台尔曼试图掩盖德国共产党汉堡党组织的贪污事实,而台尔曼的最亲密的战友们就在那里工作。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惊惶失措,皮亚特尼茨基不肯独立采取行动,于是给布哈林和斯大林拍去了电报³⁶。布哈林表面上谴责了在报纸上公布党的领导人去职的消息,但建议不要拒绝承认德国中央委员会。他觉得情况还没有重要到要中断休假飞往莫斯科的程度。对斯大林来说,台尔曼被解职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坏消息,他把台尔曼视作其忠诚战友、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的倾向”的不知疲倦的战士。正是台尔曼及其背后的Г.奈曼领导了反对布哈林的“走廊代表大会”。斯大林跟布哈林不同,他从高加索返回后就采取了坚决行动:先是政治局,然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了台尔曼的职务,并将所发生的事情定性为“右倾分子和调和分子”对德国共产党合法领导人的进攻³⁷。

1928年秋天反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共(布)内部的事态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试图在支部会议上展开对《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严厉批评。布哈林得知这一消息后,诉诸中央监察委员会³⁸。布哈林在休假后没有出现在莫霍瓦亚街的大楼里,他实际没有抗争就让出了相当重要的桥头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然而在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仍有不少“右倾”的拥护者,因此斯大林没敢把共产国际的问题提交给中央十一月全会。在全会举行过程中发言者没有提到台尔曼被免职事件,但有不少人仍不点名地提到不赞同德国共产党现领导人的“调和分子”的阴谋,这表明共产国际内部布哈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力量平衡不稳定。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内部战线”上的行动则坚决得多。1928年10月16日举行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联席会议,为撤销莫斯科的领导人的职务打下了基础³⁹。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0月18—19日召开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非常联席会议。为了向与会者

目 录

序 1928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 B. П. 丹尼洛夫 O. B. 赫列夫纽克 A. Ю. 瓦特林(1)	(1)
1928 年11月16—2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记报告 ... (1)	(1)
第一次会议	(3)
第二次会议	(27)
第三次会议	(65)
第四次会议	(101)
第五次会议	(147)
第六次会议	(188)
第七次会议	(222)
第八次会议	(264)
第九次会议	(302)
第十次会议	(339)
第十一次会议	(373)
第十二次会议	(418)
第十三次会议	(463)
第十四次会议	(495)
第十五次会议	(543)
第十六次会议	(578)
附 件	(585)
1. 1928 年 11 月 16—24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记录 ...	(585)

2. 关于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591)
3. 关于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施米特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602)
4. 联共(布)中央全会就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即完成振兴农业任务的报告的决定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一致通过	(605)
5. 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610)
6. 给全会主席的声明	(616)
补充材料	(620)
1. А. И. 米高扬致 И. В. 斯大林	(620)
2. 关于1928—1929年度国防开支预算情况的说明	(623)
3. В. Н. 利图诺夫斯基给 К. Е. 伏罗希洛夫的信的节录	(626)
4. 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问题报告的决议草案	(628)
5. И. В. 斯大林对 А. И. 李可夫 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意见	(634)
6. И. В. 斯大林对 А. И. 李可夫 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	(636)
注 释	(639)
人物简介	(673)

绝 密

**1928年11月16—2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速 记 报 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
國
名
稱

第一次会议

11月16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大家对手里的全会日程有什么建议吗?

梅德韦杰夫:同志们,从一次全会[到另一次全会]通常大约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可能会召开代表会议,既有各边疆区党代表会议,也有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以我认为在此次全会上讨论关于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和议事日程的问题是有必要的。

喊声:对!

主席:有人想就这一提议发言吗?没有。进行表决。谁同意将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及其议事日程的问题列入全会的议事日程?谁反对?有弃权的吗?没有。通过。还有提议吗?没有。

关于会议的时间安排。早些时候的规定是,全会会议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和从下午6点到晚上10点举行;报告人有40分钟,发言人10分钟。(全场大笑)

有人喊:哪儿有这样的报告人?

主席:有谁想就时间安排的问题发言吗?

喊声:通过!

主席:谁同意通过?谁反对?有弃权的吗?没有。通过。还有没有别的建议呢?没有。

(李可夫同志作关于1928—1929年度¹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的报告)

关于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

李可夫²:同志们,在此次全会上将有三个报告人³就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发言。这可以减轻我的报告的任务,因为我要把一些题目留

给后面的报告人,并且我可以不再谈那些对于说明国家的经济状况和1928—1929年度经济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没有实质意义的内容。我需要预先说明的是,这次与以前作的报告不同,我未能对自己的报告进行比较充分的准备,因此请大家对报告的质量多加谅解。

全会将讨论与制定控制数字有关的问题,将确定已经在政治局⁴和各苏维埃机关中讨论过的经济计划的合理性。同时必须认识到这一计划是以往的整个经济工作的有机继续,这一计划的完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以后几年的形势。既不能脱离从前有过的东西来研究这一计划,也不能不考虑到它对今后几年可能产生的一定影响。

在我们最近几年所经历的经济发展时期,什么是最有代表性的呢?过去几年的特点是,首先,我们实现了我国生产力,特别是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我们不止一次地以经验表明,整个苏联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实际增长能力常常超出控制数字,超出我们的全会所作的计划推测。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低估了我们所拥有的并在实际中被发现的潜力。另一方面,如果拿我国经济的历史来说,假定从1923年开始,那么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经济和工业迅速发展(有时超出计划)的情况下,我们在个别的经济高涨阶段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停顿和中断。这些特殊困难在1923年出现过(被称为“销售危机”)⁵,在1925—1926年度也出现过,当时我们认为这些特殊困难与导致商品不足的加剧(危险的加剧)和粮食市场的停顿的所谓“秋季的失误”⁶有关。我们在去年也经受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它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目前仍然可以感受到严重的困难。尽管出现所有这些困难,我们在1923年和随后的几年还是成功地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进展,保障了工业比重在联盟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提高。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工业化领域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其标志是,工业计划不仅全部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比如,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原定注册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是14.3%,而实际增长幅度为21.6%,这就是说,我们实际做的工作比预计多得多。1928—1929年度计划整个工业的总产值增长15.6%。这样的百分比,大大超过我们第一次为所谓的改造时期制定五年计划时所通过的标准。对比一下工农业产值的变动情况和它们的比重,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工业化的进程意味着工业的比重的提高,意味着工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的影响的提高。

这方面我们看到什么样的比例呢?

1925—1926年度整个工业的产值为124.48亿卢布,农业总产值为173.70

亿卢布。1928—1929年度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例的变化是：工业总产值为190.40亿卢布，农业总产值为186.24亿卢布，即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而在这一年之前比例是倒过来的。当然，这一对比还不能证明我国已经是发达的工业国，因为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譬如在德国（更不必说英国了），上述比例当然比我国高得多。但无可争议的是，从1925—1926年度起我们完成的工作意味着在加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但能说明问题的不仅是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这一比例。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增长得更快，这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计划（其细节刚刚最终确定），1928—1929年度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增长19.5%，消费品的生产增长15.6%，并且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电力生产将出现最大幅度的增长。内燃机的产量增长40.3%，涡轮机增长137.5%，农业机械增长29.6%，过磷酸钙肥料增长67.3%，硫酸增长45%。建筑材料的生产将有相当大的增长：砖增长37%，水泥增长17.6%，等等。

机器制造业的迅猛增长最明显地反映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过去的一年，我国内燃机的产量达到战前的403%，农业机械的产量达到战前的201%。在1928—1929年度，根据我们的计划，内燃机的产量应为战前的566%，农业机械的产量为战前的280%以上。可见，在普遍取得成就的情况下，增长最迅速的是这些从工业化角度看来是最典型和最关键的工业部门。诚然，其中一些工业部门是从过低的水平上开始增长的，但是这些数字表明，我国经济在摆脱关键性工业部门对外国的依赖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在进一步发展工业化的事业中，当前的主要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于冶金工业的原料——生铁成了这方面的最大制约因素。在上述各项超过战前标准的情况下，生铁产量在1927—1928年度只及战前的79%，也就是说，在机械化和整个经济改造的基础方面最主要的原料——生铁出现了极大的缺口。所以政治局和苏维埃机关认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提高生铁的生产。因此除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我们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内也在探索提高生铁产量的其他办法。

这个问题在现阶段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所有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如果说在制约轻工业发展的原料方面（就此我还将在下面讲到），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商品生产者、依赖于农民，那么在生铁方面恰恰没有这种依赖，这方面的制约因素（在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是设备，是提高矿石开采量和生铁产量的技术生产能力。我们的一些轻工业企业已经在七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实行三班作业，

但在国内极端缺乏金属和金属制品的情况下,我们至今未能在金属加工厂和机器生产厂实行三班制,而且常常两班制也实行不了。一位同志不久前讲述了他参观列宁格勒的工厂后的印象。一家工厂安装了一套非常贵重的、真正代表着国外最新技术的、在我们苏联绝无仅有的设备。对于这台设备一天“运转”多长时间的问题,他得到的回答是:7—8小时。苏联的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这样的设备,它的运转是完善和有利的,却每天只运转一个班次。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制约因素是生铁。

控制数字的一大症结在于,在工业和运输业就业的工人数量在失业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是大体稳定的。如果生铁没有欠缺的话,我们就能够通过冶金厂增加工作班次来扩大生产一线的工人大军,加强工业化,减轻商品奇缺的情况。如果没有把建造新工厂所需要的大笔开支用于住宅建设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了。即使是在列宁格勒或者其他地区的机器制造厂和金属加工厂,如果把居住在这些工厂周围的闲散劳动力利用起来,也是可以增加班次的。当然,也许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改建什么、不得不扩大住宅建设,但是这做起来比建造新工厂容易得多,花费也少得多。如果实行的不是一班制,而是两班制,“周转资本”就会最大程度地加快。我们由于生铁不足而不能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我所说的增长速度下,生铁的生产落后了,并且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当然,可以采取,而且也需要采取收集和利用废金属、金属边角料等的应急措施,但显而易见,这个办法仍无法解决提高黑色金属产量的问题。

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的时候,需要屏弃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机关中流传的一种偏见:似乎从国外进口黑色金属——生铁“是可耻的”,应该只进口现成的机器。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好的机器,那么在生铁不足的情况下进口生铁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不仅从扩大生产一线的工人大军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有利的:如果花100万卢布在国外购买黑色金属,并把黑色金属加工成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内的生产。

生铁问题现在是主要问题。所以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研究1928—1929年度工业发展前景的时候,我们主要力求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我们在控制数字方面刚刚着手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从很低的水平开始发展的化学工业。所以化学工业的增长率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不能根据这样的增长率夸耀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成果。如果某人有一个戈比,后来又得到一个戈比,那么“资本”的增长就是100%,但是这一“资本”的所有者仍然是从前那样的穷人。化学工业确有一定增长,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根本没有站稳

脚跟,这是完全不容置疑的。我们在基础化学工业的发展中只是迈出了头几步:今年我们向基础化学工业投入了1.1亿卢布,而去年的投入为0.32亿卢布。

在重工业,尤其是冶金工业方面,需要克服那种把发展这些工业部门的任务与消除商品奇缺现象的任务对立起来的偏见。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对于在重新装备我国经济和我经济合理化基础之上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对于消除商品奇缺现象也起着极大的作用。在金属方面,这一点在所谓的“联结”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上是完全清楚的:这里我们可以在最有利和最需要的方向为消除商品奇缺现象助一臂之力。我们以这些工业部门的发展来保障农业技术革命的实现(人造肥料、机械、建筑材料等等)。

我们今年在组织人造纤维生产方面进行了首次尝试,这一工业部门当前在国外的发展十分迅猛。不过在国外,这一发展遇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带来的特殊困难。在新技术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遇到了障碍:资本主义工业向旧技术投入了巨额资本。资本家不愿冒巨额资本贬值的风险,他们往往拖延组织在新技术基础上的生产,阻碍技术进步。这里无需列举垄断资本主义腐朽的具体事例,因为势力强大的资本家集团走上了人为延缓技术进步的(通过压制发明和隐瞒发明),目的是保证他们避免巨额资本的损失。我们不存在对发展的这种阻碍。我们生活在商品奇缺愈演愈烈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化学工业领域,我国也不存在固定资本贬值的危险。我国的社会制度在技术革命领域拥有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潜力。

众所周知,除生铁之外,建筑材料是我国经济中的另一个“薄弱环节”。控制数字规定必须在建筑材料的生产上取得大的进展。通过对建筑材料缺口总数(例如,窗户玻璃的缺口为28%,砖的缺口要小一些)的粗略计算不能不承认,缺口怎么说也是相当大的。由于建筑材料方面存在如此大的缺口,因此无法降低建筑费用:我们的计划和现有的建筑材料之间的差距造成的结果自然是,我们的建设计划在某个方面根本没有实现,在某个方面则大大延期,因此建设费用的降低困难重重。

今年我们预计用于发展建材工业的开支是1.05亿卢布(不包括森林工业),使砖和水泥的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目前砖和水泥的生产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27—1928年度砖是战前水平的83.3%,水泥是96.7%。

要完成上述重工业发展计划,就得着手建设一批像西伯利亚的捷里别斯工厂⁷和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那样的特大型新工厂,投产的黑色冶金企业就得加紧运转。

至于轻工业的前景,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取得的进步相当小:棉织品的产量总共要增加 7.6%,毛织品增加 9.1%,麻织品减少 1.8%。限制轻工业的发展,当然不是因为轻工业是“轻的”,对它不应该特别重视,也不是因为存在妨碍它发展的某些指令。如果有超出我们的计划来发展轻工业的某种可能性的话,我们认为我们肯定会这样做。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做,那是因为缺少原料(棉花、羊毛、亚麻、皮革、橡胶)。如果我国不发展这些原料的生产,也就是说不坚决振兴我国农业,不彻底改善进出口情况即不增加我国的出口额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在这方面向前取得较大的进展,虽然从国内局势和市场状况来看,从我们与农业的结合来看,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改善日用工业品市场状况极为必要,因此,如果外国资本家提出给我们贷款(一年期或更长)用以进口日用制成品,我们就应该接受这种贷款并进口需要的商品。当然,这与发展我国工业相比,是最坏的办法,但是我们应该从我们现有的能力出发。当然,首先应该分析是否能在我国资源的基础上加强轻工业的发展,但同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拒绝进口现成的商品,只要贷款条件符合我们的支付能力就行。这就是在工业发展方面对主要工业部门作出的最重要的大致推测。

那些决定着整个经济计划成败的基本建设工程的情况怎么样呢?最近三年工业基本建设工程的开支总额如下:1925—1926 年度——8.11 亿卢布;1926—1927 年度——10.9 亿卢布;1927—1928 年度是 13.18 亿卢布。这三年总共大约为 32.2 亿卢布。其中重工业的资本开支在 1925—1926 年度为 5 亿卢布挂零,去年为 9.39 亿卢布,轻工业在 1925—1926 年度为 2.93 亿卢布,去年为 3.78 亿卢布。

工业与预算的结算情况有什么变化呢?根据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提供给我的资料,工业的借贷平衡顺差(包括军事工业、电气化和奖励工业出口)在 1925—1926 年度为 7.73 亿卢布;1926—1927 年度为 3.14 亿卢布;1927—1928 年度为 4.773 亿卢布;1928—1929 年度约为 8.19 亿卢布。对于 1928—1929 年度来说,这一数字在最后敲定后可能会有些变化,但幅度不大。

我们计划 1928—1929 年度的资本开支数额为 16.59 亿卢布,与去年相比增加 3.4 亿卢布。这一总数中,11.73 亿卢布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总共只有 3.65 亿卢布。显然,工业中的资本开支的绝对数额,这些投资的增长,以及向重工业倾斜的重新分配资金的力度,都是相当大的。现在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我不得不多次报告,并且在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专门指出的问题,这就是质量问题⁸,就是为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最大效益而最终利

用这些资金的问题。问题的关键现在就在这里。如果工业的资本开支接近50亿卢布,那么党和国家可以并且应该向我国工业提出比从前更加严格的要求。这样的开支(在50亿卢布范围内)应该带来的不仅是商品质量的提高,而且是成本的下降和工业内部积累的增加。

如大家所知道的,今年首次做到使成本下降大约5%,但这仍大大落后于我们的指令,而且与投资额和我们的建设规模未必相符。至于明年,我们打算接受的工业成本降低的最低数字决不能少于7%。如果这个指标没有完成,那么国家明年的整个经济发展计划就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大约是1亿卢布或者这个数上下。降低7%就大约是7亿卢布,这7%中每一个百分点未完成都会在整个经济计划中捅出一个大窟窿。我们正在使国家工业化,在向工业投入大笔资金,并通过降低成本、提高加工质量、更好更合理地组织生产等使这些投资迅速见效。然而在质量指标方面,我们至今依然极大地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美洲和欧洲的先进工业国家。只要看一下美国在合理化领域取得的成果中的下述几个例子,就会清楚我国落后的可怕程度:在美国,1914年由100个人完成的工作,1925年在化学工业由65名工人完成,金属加工业——59名工人,运输业——30名工人;美国1925年的劳动生产率与1919年相比增长了5%,个别部门增长得更高(汽车工业增长172%,橡胶业增长211%,炼油业增长83%等)。

在质量指标方面我们至今仍异常落后,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转折。政治局认为这完全能够做到,因而确定成本降低7%。这个数字是在与一些国民经济部门领导人进行激烈争论之后确定的,这些领导人认为这个数字不现实,要求予以缩减。政治局在详细讨论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国民经济部门领导人应把成本降低7%作为最低的百分比,他们必须实现这个指标。

我们的技术干部的状况与合理化、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等问题有最直接的关系。为了保证实现7%的预定目标,必须巩固技术干部的地位,即在掌握西欧的经验和坚决克服至今仍可见到的敌视非党专家的态度。提高产品质量、合理化和技术改造等问题,是在生产领域采用科学的问题。没有科学的人,采用科学是不可能的。上次中央全会通过了组织高等技术教育和培养新的专业干部的决定⁹。现在正在采取措施,以便造就大量来自工人阶级并在政治上与工人阶级同根同源、亲密无间的专业干部。但是在我们取得这方面所需要的一切成果之前,应该要求旧专家们工作,并且真正地使用他们。

就所谓速度问题说几句。我们提出的速度是不是足够的呢？我们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经济中蕴藏的潜力，把工业化事业推向前进。相对于大量未得到满足的需要来说，这些潜力是不够的。在讨论速度问题时，不应认为速度不断增长或者甚至年复一年保持同一个速度是整个过渡时期的某种“规律”。如果把对工业的投资速度作为衡量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尺度，那么年复一年保持同一个速度意味着什么呢？假定我们第一年投入10亿卢布并在下一年增加20%，即投入12亿卢布，那么所有以后各年均应比增长后的总数增加20%，也就是说，这是用简单方式解一道复杂的百分数算术题。保持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纯粹是算术，仅此而已。今年我们把资本开支增加了大约26%。这意味着，如果根据复杂的百分比规则“制定计划”，那么在3—4年之内资本开支应该增加一倍，然后在增加一倍的基础上再提高26%。这是不大可信的，并且在经济上还没有进行过任何论证。总之，不能认为对工业的投资将一直按照几何级数增加下去，直到全面的共产主义制度为止。也可以设想投资曲线的下降。在工业取得主导地位并能保障对整个经济的改造之前，应该避免投资曲线的下降。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否定所谓的“驼峰”说，也就是在现有的五年计划中投资速度的下降；通常在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应该年复一年地增加¹⁰。可以否定五年计划中的“驼峰”说。但是，假定工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的位置已经能够保证对农业进行符合大生产原则的改造，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在这段时期对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放慢。无论如何不可以制造速度偶像。现在我们应该保证“供给”工业足够的资金，使工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决定性地位，从而使我们在经济的合理化和改造事业中不再有捉襟见肘之感：机器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没有，专家没有，能够实施这项改造的干部没有。为此必须尽最大可能向工业投资，这绝不意味着过渡时期存在某种不可违背的“规律”，即在10—20年的时间内工业投资应该每年增加30%（伊里奇说过，我们将用几十年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¹¹）。在过去的岁月和近几年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快。但是这个速度不可能用简单的算术来确定。农业问题、我们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克服现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与工业问题紧密相连。

我想从粮食方面谈谈农业。今年我们的谷类作物总产量比去年多出大约7140万普特。黑麦和小麦今年与去年相比歉收2.12亿普特。这个现象的某些原因大家是知道的：一部分秋播地受灾，春播地在许多方面也不顺利。这种情形也决定着我们的粮食收购计划。我们制定的计划为6亿普特，而去年实际收购

了6.27亿普特,也就是说收购计划少于去年。这是集中收购的计划。集中收购和非集中收购今年共计大约7亿普特多一点,而去年为6.8亿普特。粮食收购迄今为止开展得怎么样呢?到11月1日,我们收购了2.36亿普特(通过集中收购机关),而去年为2.24亿普特。

应该指出,党大体上成功地实现了从收集粮食的“非常”手段向正常的市场收购方式的转变。我说的是大体上。有个别歉收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不太好,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实行了非常措施,非常措施不存在,而是这些地方粮食收购搞得不够好。党关于提高价格的决定,在顺利实行上述转变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¹²。粮食市场的情况现在怎样呢?可以说,用“加权平均”指标来评价粮食市场状况是错误的。我们有像西伯利亚那样的丰收地区,在那里我们的价格和私人市场之间的几乎没有差别,或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粮食市场产生压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许多像乌克兰、北高加索那样的地区,在那里我们的收购价格和集市价格间的差额达到1普特1.5—2卢布(去年为25—30戈比)。歉收地区的存在对整个粮食收购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这一影响使得乌克兰草原地区的农民9月份从克里米亚运走了大约300万普特粮食。

歉收地区这批农民的压力当然对丰收地区也有很大影响。顺便说一句,这一压力还表现在,如果以莫斯科以及中部黑土区和乌克兰的某些地区为例,总体上哪里粮食便宜些:是城市还是农村?那么大概城市便宜些。局势的困难就在于此,进行粮食收购运动的困难就在于此。

粮食运动以后将如何发展——现在难以预料。在11月的最近5天我们看到粮食收购在下降。并且现在还很难确定,这一下降是否只是道路泥泞时期临近的结果还是经济方面的某些原因开始起作用,例如,农业税在很大程度上已缴纳,粮食已根据预购合同交付,农民弄到了钱,商品不足等等。粮食收购进程自此以后是否将十分缓慢?不能否认这一危险。根据政治局的决定¹³建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讨论必须立即采取的措施,以制止粮食收购的下降。

确保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是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主要任务之一。即使完成了整个计划,粮食供应计划也将比去年更加紧张。这一点在西伯利亚当然感受不到,也许,这一点在中亚也不会感受到。

[捷连斯基:会的。]

李可夫:但是在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和在乌克兰相当大的部分地区将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向粮食不能自给的地区和主要工业区提供的粮食大致与

去年持平,但是人口在这段时间增长了2.3%,而这些地区谷物的产量少于去年。仅此一点已经表明局势的严重。困难还在于,例如在列宁格勒,排队购买面包的不仅有城市居民,而且有从农村来的人……

丘巴尔:这不仅是在列宁格勒。

李可夫:还有一些地区也可以见到这种现象。

我们规定今年的周转储备大约为3200万普特,但是在这3200万普特当中,小麦总共只有1000万普特,而黑麦根本没有,而且去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进口。如果明年秋天的情况好一些的话,我们就能比较自由地插手,就能够进行调配,但如果情况不好的话,局势就会十分严重。

这迫使我们采取新的措施来保障供应计划的落实,新措施是,首先我们提高谷物的出面粉量,取消所谓的高级面粉,生产低级面粉。这会使我们得到大约1600万普特的节余。第二个措施是,我们对于谷物加工费¹⁴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尽管在上次全会上谈论过谷物加工费¹⁵,但至今不知何故仍悬而未决。当商业人民委员部与地方代表一起讨论收购问题时发现,有的地区统计了谷物加工费,有的地区没有统计。现在谷物加工费是否作了统计,我个人无法查明。由于这方面的情况毫不明确,所以我们建议实行超出粮食收购计划的谷物加工费。这必将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储备。

柯秀尔:一定会增加。

李可夫:这应该实施。

柯秀尔:对。

李可夫:这我们能实行,因为谷物加工费毕竟没有完全用到最需要的方面。同时,在我们现有的供应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利用谷物加工费来保证完成整个供应计划,我们就是犯罪。

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么今年的粮食供应计划如下(单位:百万普特)。

农业年度的季度	1928—1929 年度	1927—1928 年度
1 季度(7—9 月)	73.5	108.2
2 季度(10—12 月)	142.0	139.3
3 季度(1—3 月)	150.0	198.7
4 季度(4—6 月)	114.5	104.5

因此,今年我们决心避免去年出现过的季度供应的剧烈波动。我们有一个

更加均匀的供应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我们度过一年并能满足我国经济和居民的基本需要。但这有一个条件,即收购将全部完成,我们能够利用谷物加工费并采用我说过的磨面粉法。那样我们可以度过一年,并且过得未必比去年差。如能消除我们在去年出现的波动,即从第3季度的19800万普特滑落到7300万普特(7—8月),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去年在市场上出现过的恐慌情绪,当时粮食在一个月里用得大手大脚,在另一个月里又按照大大缩减的定额供应。

谷类饲料平衡的形势也是如此。谷类饲料的形势不能说有危机,但也不能认为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显然,这个供应计划将由于缺少面粉出售、烤面包质量下降、可能排队等等而使工人阶级躁动不安。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些消极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今后不能使粮食形势好转,如果今后两年粮食产量的增长继续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那么这就孕育着爆发更加严重的危机的危险。请不要忘记,城市人口每年都几乎增长4%,而全国则增长2.3%,因此需要越来越多的粮食。如果我们在谷物业方面不能取得应有的转变,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工业化推向前进。因为工厂不只是厂房和机器:机器需要原料,工人需要食物。而我们在这两方面——食物和原料方面,都依靠农业。因此与农业发展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具有巨大意义。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在1928—1929年度的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超过农业。为使工业超过农业更多,应使农业发展得比现在更快。在农业缓慢发展的基础上,即前进步伐过小,有些地方几乎是停止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顺利地进行工业化。所以,前几次的全会上和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本次全会上农业问题都是主要的。

谷类作物总产值最近4年的增长情况如何呢?其增长如下(按照1926—1927年度的不变价格):1925—1926年度——37.49亿卢布;1926—1927年度——40.19亿卢布;1927—1928年度——37.44亿卢布;1928—1929年度——37.8亿卢布,也就是说,除一年以外,谷类作物的产值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谷物业领域的状况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粮食总产量今年和去年均比1913年的产量低10亿普特。诚然,1913年是总产量提高的丰收年。如果按照5年平均产量计算1913年的粮食总产量,那么今年和去年的产量实际比1913年的产量低5亿多。谷物总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而商品率则差得更多。

谷物的播种面积如何呢?1926年播种面积增长了7.1%;1927年1.9%(在人口增长2.3%的情况下),1928年由于一系列原因(秋播作物受灾等)降低了

2.6%。按人均计算播种面积、总产量,情况还要更差。与1913年相比,我们的人均谷物播种面积的变动如下(以1913年为100计):1926年——86.7;1927年——86.7;1928年——82.7。人均小麦和黑麦的播种面积仅相当于1913年的74.4%。国内人均粮食总产量1925—1926年度为518公斤(32.4普特),1926—1927年度为532公斤(33.3普特),今年仅为490公斤(30.6普特)。战前5年的人均产量为597公斤(38普特)。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产量方面的情况如下:每俄亩粮食收获量1924年为40普特,1925年(丰收年)——56.2普特;1926年——55普特;1927年——50.8普特;1928年——52.9普特。这5年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51.2普特;1909—1913年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54.9普特。所以在单位面积产量方面我们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播种面积没有达到1913年的面积,谷物播种面积平均少10%,所有作物则平均少3.4%。在许多产粮区,譬如下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比战前相差更多——只达到战前的70%—80%。可见,我们农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危险的缓慢)是因为我们在谷物方面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粮食的消费量,特别是在农村,增长非常迅猛,这还不足为奇:十月革命前广大农民群众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十月革命后他们第一次获得了改善自己的饮食的机会。

牲畜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变化略有不同。在役马方面我们获得的指数是:1926—1927年度增长6.6%,1927—1928年度增长6.6%,1928—1929年度预计增长大约5%。役马数量仍然低于战前(低13.9%)。牛比战前多大约10.6%,牛的增长情况如下:1926—1927年度增长5.7%,1927—1928年度增长4.8%,1928—1929年度预计增长1.1%,幅度不大。

经济作物出现大的进展: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战前高出58.5%。当然,在这方面如棉花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其他经济作物,尤其是亚麻,播种面积尽管在最近两年有所增长,但也没有达到战前的播种面积以及1925年的播种面积。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应当指出经济作物的产量仍然极低,明显落后于根本不高的战前的“定额”。

对比所列举的农业状况指数,不能不看到在农业生产领域我们现在所经受的困难和负面现象。关于描述这一状况的术语可以争论。但是问题自然不在于术语。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些困难对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非常大的危险,并且正在转化成对工业化的限制。所以,克服这些困难是党的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有没有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呢?我感觉,有这样的能力。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数字,我们应该把播种面积提高7%,把产量提高3%。

完成这项指令比完成降低工业成本的指令更难而不是更容易,而且这项指令同样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完成。

除了农业发展的极端落后,我们还面对另一种进程,这些进程表明农业振兴的巨大潜力,表明我们具有促进其振兴的巨大潜力。

举下述事实为例,像早秋耕地的扩大(1926年秋耕地占整个播种面积的29%,1927年已经占到32%);多区轮作取代三区轮作(1926年取代3 644 000公顷,1927年——9 429 000公顷);良种作物的增加(大约200万公顷);农业机器和农具(克服农业落后的推动力)的销售增加(1926—1927年度我们在农村销售了1.258亿卢布的农业机器,1927—1928年度1.486亿卢布,在眼下的1928—1929年度我们预计销售2亿卢布)。在我国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中,有大约28 000台拖拉机,并且各种合作社中的拖拉机也在25 500台以上。

我们的土地规划的巨大促进作用,应当而且必将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振兴上。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对农民的生产工具的保障程度在提高,对农村的机器供应在扩大,农民的畜力在增强,那么就on应该承认存在在农业领域实现所需要的转折的一切前提条件。今年我们还将在肥料、施石灰改良土壤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此外,壮大了的合作社已经成为我们在农业生产合理化事业中可以依靠的农村组织。可见,党具有在农业领域实现这一完全必要的转折的能力。

为了解决与农艺、农业技术和农业改造有关的所有这些问题,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呢?如果问我,应该沿着什么道路引导农业走向振兴:是走扩大播种面积还是提高产量的道路,——我的回答是,这二者我们都需要。

有人喊:明摆着的事。

李可夫:如果问我,这些道路中哪条是主要的,我主张走提高产量和农业合理化的道路。扩大播种面积的粗放式发展对少数的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等)是可能的。对于拥有大批过剩人口的其他许多农业地区来说,这种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多了。向新的地区移民,在近几年不可能成为摆脱困境的办法,因为移民代价高昂(差不多每个农户要2 000卢布),并且进行大规模移民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但即使是在进行粗放式扩大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将这种扩大和农业合理化结合起来。

兴建新的国营农场,建设新的集体农庄,我们正在进行在农村组建大型公有经济的伟大实践。在质量方面这些措施是决定性的。而且在这方面无论如何不

能把在社会内容方面相互排斥的公有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混为一谈。我们的路线就是,坚定不移地加强和培育这些公有化的萌芽,加强和培育这些在扩大农业生产的事业中、在组建农村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事业中的新开端。但是应该认识到,联合成集体农庄的农民只有在他们卖掉粮食后能给自己买到靴子的情况下,才会发展集体农庄,也就是说,我们的路线的贯彻取决于城市和农村间的市场联系问题。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将对市场的工业品供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也就是使农民明白,他卖掉粮食后能给自己买到生产工具和个人消费品。商品供应不应该降低水平,以致使农民已经开始对于卖掉粮食后他们能给自己买到什么东西失去信心。

应该最大限度地加快、扶持和发展农业的公有形式的增长。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的这一经济成分在最近几年还不可能在对国家的粮食和原料供应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个体类型的经济在最近几年依然是粮食和原料的生产基础。

我们通过农艺服务,通过土地规划,通过贷款,通过供应机器和良种,通过提供防害虫的服务等,来帮助占农民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当然,主要和特别是帮助贫农,但是无论国家的帮助有多大,与农民自身的资源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将春播运动中我们提供的种子(大约 3 000 万普特种子)与农民一年中为了播种而向地里投入的 8 亿普特种子比较一下,把我们的集中收购量——6 亿普特与农民经济本身的消耗和剩余量——超过 40 亿普特比较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农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是农民自己的资料。

国家只能推动振兴的过程,给其指出明确的方向并加以组织。国家的帮助在促进合作社发展的事业中具有更大的意义,在组建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形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事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提高个体贫农—中农生产者的生产的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把个体商品生产者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与国家的监督、与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结合起来。农业发展薄弱的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中农的主动性、他们的经营兴趣、他们的扩大播种地的渴望没有得到应有的调动和激发。应当提高中农的经营兴趣,应当根据我们在农业技术领域的改造工作、根据我们的农艺和我们在土地规划领域所采取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多数——中农和贫农对经济增长、扩大播种地和提高产量的关心程度。这方面的情况令人满意吗?无须隐瞒,我们去年采取的非常措施和今年征收的统一农业税,不仅打击了富农的经营兴趣,也打击了中农的经营兴趣。我试图找到说明这种状况的数字,结果

只找到一份材料,即所谓的中央统计局春季调查表。一些同志对这份调查表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我不是统计专家,无法说这份调查表准确到什么程度。但即使这份调查表的数据有很大局限,即使其涵盖的农户数量不足,我认为,这份调查表仍然反映了总的趋势。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结论,贫农在抓紧扩大播种地,在播种面积总额趋于稳定或者甚至有所减少的地区也是如此。中农的下层群体同样如此。但是在一些地区从有两匹马的群体起,或者在另一些地区从有三匹马的群体起,不是在稳定播种面积,就是在缩小播种面积。可见,调查表中的数据证明了贫农户、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户在发展这样一个良好的、可喜的事实。我们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贫农扩大播种面积,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

除了这个良好的事实,调查表也证明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中农不再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规模扩大自己的经济。所以,我们在振兴农业方面的所有措施取得成功的主要前提之一,不仅在于要尽可能小地刺伤中农,没有十分重大的理由则根本不刺伤,而且在于提高中农对于发展经济的经营兴趣,为此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农村政策具有极大稳定性,因为我国农业的中心人物——中农只有在其对今天和明天充满信心情况下才会发展自己的经济。如果我们大家年复一年地大幅度修改有关中农的法律,中农的这种信心就将消失。这方面过火行为的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众所周知,最近在农业税的征收中出现相当多的这种事例,结果,我们收入的不是列入1928—1929年度预算的4亿卢布,而是大概至少(甚至更多)4.3亿卢布。农业税征收中的主要过火行为表现在所谓的个别税¹⁶方面。只要列举一下征收个别税的特征,就可以知道,现在征收农业税的工作是何等的恣意妄为,对革命法纪的破坏是何等严重。我面前有一份商业人民委员部关于今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报告。划入“另类”,也就是划入富农阶层上层所依据的特征如下:生产珍贵农作物,仔畜成群,有新房子,制作并向同村人出售收音机,有良种畜,地耕得好,过去使用过雇工,有自己的农具,今年没有但一生中某个时候做过买卖,等等。我们应该规定增加作物、拥有收音机、地种得好、盖新房子还不是富农经济的特征,并在我们整个工作中贯彻执行。怎么能够以个别税的方式惩治没有剥削劳动力、没有出租、没有放贷等而把地种得好的农民呢?如果农民买了一台缝纫机,上帝保佑,这纯粹是一件好事。所以,按照这种特征大笔一挥把农民从中农“调入”富农的人是反对党的政策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大家应该理解这一点)需要农村耕作的提高,需要地种得好!这种过火行为的事例相当多。但是我们姑且认为这些过火行为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即使三个村子有一个农民因地种得好而被任意归为富农,那

么别的农民怎么再会把地种得好呢?所有人都害怕被划为富农。如果你在200户中对一个没有雇用劳动力、没有出租和剥削而改善了土地耕作的农民当富农征税,这就将意味着反对先进的耕作。我不知道农民买不买留声机,但如果他们因拥有一台缝纫机而被归为富农,那么大概鬼才知道他们会因留声机而被归为什么!

[乌加洛夫:要看有什么唱片!]

李可夫:时下在我们的实践中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在加强反对农村的奴役性资本主义关系的斗争、最大限度地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时,我们应该使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富农经济的特征根本不在于“使用”一台缝纫机,不在于农民添置盘子和金属勺,而在于对人、对雇佣劳动力等的剥削,在于富农经济和其他农民的关系。在实践中,哪怕是在征收农业税的实践中,至今也没有这种认识。这就是农民在畜力增加、农业机器的供应增长、农艺帮助加强的情况下慢腾腾地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错误在现有条件下是极其危险的。

下面我再简要地谈一谈1928—1929年度经济计划的其他问题,首先是我们在执行我们的进出口计划时由于粮食停止出口而遇到的严重困难。

从我国的外汇状况可以得出结论,现在迫切需要执行出口计划(尽可能地超出),必须遵守进口计划执行方面的硬性纪律。因此,迫切需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内黄金和白金的开采量。

我国的出口在其发展的最初几年出现过相当大的增长,但最近三年一直处在几乎同一个水平上。同时,应该注意到我国极其特殊的出口构成,这一构成在1927—1928年度和1928—1929年度与美国的出口构成极为相似。相似之处是工业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差不多与美国相同(1927—1928年度为52%,1928—1929年度大约为56%)。这样的出口构成当然主要是由于农产品停止出口,或者确切地说这是由于粮食停止出口而造成的。为了平衡进出口计划,我们不得不加紧输出,例如输出布匹,尽管布匹还远不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我们输出的糖比战前输出的多,虽然糖在国内尚不足。我们输出的还有国内市场极为需要的葵花子油和牛油。

这一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汇收支计划的紧张状态造成的。当然,我们输出的不仅是自身需要的东西。我们使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达到很高的数字,使皮货和许多在国内市场上绰绰有余的其他商品的出口得到提高。我们只能以出现紧缺状态的代价使进出口计划得以平衡。

在缓解金融封锁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迹象呢?有。封锁的加强使我们面临失去大约8 000万卢布贷款的危險,但与此同时,我们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有了发展。不久前,在美国签订了一份不错的合同,¹⁷为我们多多少少改善贷款前景开辟了可能性。

有人喊[米高扬]:是和通用电气公司吗?

李可夫:是和通用电气公司,该公司在确定利用我们所获的贷款(占我们订货值的70%)的情况下,不再因国有化和剥夺该公司所有者的权利而对我们提出索赔。

还有另外一些好的迹象。但是也有继续加强封锁的企图,尽管只是表现为一些银行拒绝给我国的木材业务贷款。组织前所有者国际协会¹⁸,一些德国银行加入该协会以及德国政府违反拉巴帕条约¹⁹并作出它不能也没有能力做什么事的含糊回答,这样的现象也应该属于继续加强封锁的企图。

预算和货币流通的情况怎样呢?我不知道在此次会上对控制数字的讨论将怎样展开。我担心在每次全会上讨论预算时发生的事情重演:部门、共和国、地区、省和个别机关的代表退出讨论,抱怨他们受欺负。

[乌加洛夫:工会除外。]

李可夫:我应该说,今年我们比前几年“欺负”得更厉害,并且这样做是经过预先周密筹划的。这一“欺负”本身完全是由我所报告的庞大经济计划所决定的,该计划规定对工业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铁的生产、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等。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是这项计划,那么就会有“无谓的牺牲”,就会有人在中央全会上、在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发牢骚;或者是皆大欢喜,那么就不会有这个计划,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可以因为什么骂我们的话,那么大概是因为我们在通过紧张的经济计划时舍弃的“无谓的牺牲”太少,也许应该带来更多的“无谓的牺牲”。你们看一看那些说明我国货币流通状况的数字就会清楚这一点。

请看有关纸币发行的数据:1925—1926年度纸币发行为2.176亿卢布,1926—1927年度为3.37亿卢布,1927—1928年度为3.43亿卢布。光是将去年货币量20.8%的增长与进入国内市场的商品总量11.8%的增长加以对比,就能说明我国货币流通的紧张状态。即使假定货币周转在一年中只有15次,那么就不难理解,假定我们在年初发行总额为1亿的十卢布新币,就可以使这些货币的周转额达到15亿卢布。因此多发行的1亿甚或5 000万卢布就可能造成巨大的困难。所以不能否认货币流通方面的危險和在信贷体系中建立最严格的制度

和纪律的必要性。

光是工业计划——控制数字体系中的主要计划的执行,就会给整个财政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工业的流动资金和加快折旧等方面,计划的实施困难重重。把资金从轻工业转到重工业也是如此,将比去年更加困难,譬如,当时我们从纺织工业转移了7500万卢布,却得通过国家银行给纺织工业增加7500万卢布的贷款。

几乎增加12亿卢布的国家预算,也将比去年紧张得多。公债在1928—1929年度预算中占有特殊地位²⁰。确定发行总额9亿卢布的公债,8亿卢布按这个项目记入预算的收入部分,因为大概将有约1亿卢布的债券被抵押和抛售。我们可以说在公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人阶级中间找到的公债购买者一个抵得上几十个以前的购买者。这是我们所进行的建设、所付出的开支和所进行的巨大的经济工作的结果。工人阶级感到自己同经济建设息息相关,从而成为公债债券可靠的持有人。耐普曼购买公债是为了投机——购买、出售、抵押;工人购买公债则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政权实施经济计划。

发行总额达8亿—9亿卢布公债的现实可能性,是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这表明:工人阶级的稳定及其积极性的提高,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是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但即使收入预算增加10亿多卢布(公债计划为9亿卢布),保持收入和开支的平衡仍然极其困难。我们不得不冒着伏特加酒竞争不过家酿酒的危险,将每瓶伏特加酒的价格提高10戈比。

[乌加洛夫:它以前也竞争不过。]

李可夫:大概乌加洛夫比我知道得多。(笑声)]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伏特加酒的状况如下:在城市里和在城市附近,伏特加酒完全挤走了家酿酒,在个别农村家酿酒还在“维持”,其危害是耗费了大量粮食。如果我们能像拉林²¹所说的那样使人们戒酒,那么就不再需要伏特加酒,我们也将停止伏特加酒的生产。但是如果要做喝什么好的选择——家酿酒还是伏特加酒,那么应该选择伏特加酒,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对粮食的消耗。消费税的提高没能使我们保持预算平衡,我们不得不再次削减部门开支,直到削减军事部门的预算²²。

我们没能使文化建设的需要以及农业的需要得到完全而充分的保障。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多地利用积累,而这些积累来自农民经济本身,来自中农对自己经济的主动性和关心程度,来自通过合作社和其他方式把这些积累

更多地吸收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事业,尤其是加工农业原料的工业部门的建设事业中。

在行将到来的一年,市场的紧张状况将不亚于去年。在消费市场上面包、油和蔬菜的情况也有可能恶化;在对农村的工业品供应方面也许将好一些;其他方面大概将保持稳定。但市场的这种状况不允许在今年解决建立储备的问题,因为建立储备意味着市场现在放弃利用一定数量的棉花、羊毛、货币、有色金属等。所以,对本年度而言,建立现实的储备实际是不可能的,尽管局势的困难似乎恰恰要求必须建立储备。要是我们今年能够为明年建立储备准备条件,也就是首先缓解市场的紧张状况,从而拉近供应和需求之间的距离,那就好了。否则就不能指望今年能提出建立储备的问题。但不能借口我们不需要储备而回避这一问题,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撤销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譬如下面的情况就是这种借口:“储备”首先是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储备,这种储备肯定将遭遇到另一种“储备”,带负号的储备,也就是因循守旧、消极怠惰、纪律涣散的巨大储备(见1928年11月4日《真理报》刊载的列昂季耶夫的文章²³)。这一喋喋不休的空谈,除了混乱之外没有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储备,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对经济计划的总评价是什么呢?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草案²⁴作出了这一评价。紧张的计划是不是力所能及的呢?是力所能及的。我们能够实现所计划的前进目标。但这要求我们对工农业方面的全部工作的质量加以极大的提高。应当对整个经济机构,对党、苏维埃和工会,特别是对与农村有关的所有机构提出比前几年高得多的要求。

此外,我就阶级关系和政治危险的问题再说上几句。从我上面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阶级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今年像前几年一样,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巨大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我们在农村朝着组建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方向迈出了头几大步。关于富农的增长,我应该说,我没能拿到在我看来比较可信的数字。在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的《1928—1929年度农业和林业的控制数字》中,有一处提到了我感兴趣的问题。该出版物第33页上说:“拥有相当大的生产资料保障并且经常雇用劳动力(超过50天)的最上层富农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1%。此外,从事农业并且同时拥有企业类型的工业企业的农户占有农户的1.3%,而拥有这种类型的企业但不从事农业的农户为0.8%。因此,富农农户群体在苏联平均占农户总数的4.2%,在俄罗斯联邦占3.8%”。我担心这个数字有些估计过低。(全场喧嚷)

喊声：估计过高。

李可夫：也许这个数字实际上要大一些。但不管怎样，即使实际数字大一些，这个数字也丝毫不能说明国内面临由于农村富农阶层的增长而造成的现实威胁。

但与此同时，富农的积极性无疑提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尖锐了。

私人资本，首先是私人商业资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计，在1927—1928年度私营商业周转额的绝对数字仍将是稳定的，即使其比重从17%降到15%。实际上私营经济成分从17%降到了9.3%。

我没有来得及研究与阶级关系问题有联系的其他问题，但是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有了巨大提高，私人经济成分的比重则大大下降。但同时不能忘记，去年是在国内广大居民阶层遭遇相当大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今年也将如此。粮食供应不足，在失业人数增长的情况下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的增长都不足，商品匮乏，个体农民经济的增长不够——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在小资产阶级阶层中间引起某种动摇。经济领域的困难将在并正在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得到政治反映。这些困难及其政治反映不可能不影响到党内的状况。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我们这个工业相对薄弱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困难，也就是农业的极端落后所造成的困难，会不时出现。这些困难不可能具有愈来愈多的特点，而且无论如何不是苏维埃经济和过渡时期的本质所决定的。

在改造的最初阶段，不把资金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尤其是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我们就无法应对。但在进行这种转移时可以而且必须不对主要人物——中农造成过大的伤害。不向在多年建设期间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好的国民经济效益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工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谢米列琴斯基铁路²⁵等的企业长期投入资金，我们就不可能发展工业。农业目前的状况所造成的困难如果不能被迅速消除，今后就可能变得非常严重。这些困难不可能不影响到居民的政治情绪，不可能不影响到与农民有联系的某些工人阶级阶层。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使我们党内表现出某些摇摆。

现在被称作右倾的东西，与在经济困难条件下敌视我们的阶级群体的政治情绪在小资产阶级和个别工人阶级阶层的动摇中得到某种共鸣有关。现在我们正在工业化领域迈出十月革命11年以来最大的步伐。但这是在国内的面包、油和其他食品的供应比两三年前更差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极端复杂的经

济政治形势在个别党员的头脑中产生了错误的看法,引起了不稳定和动摇的因素,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你们念几段一位前托洛茨基分子的信,最为不幸的是,此人离开了托洛茨基,但留在了党内。这是沙图诺夫斯基写给托洛茨基的一封信²⁶。

他对托洛茨基说:“您不想看到,向上的运动速度不同于向下运动时的速度,只要使用现成的东西并且达到一定的限度,奇迹是可以创造的,伟大的改革需要现成的材料,并在新的东西开始有机增长的地方达到尽头。”

接下来他对目前局势作出下述评价:

“结合遭到破坏,军队是庄稼汉的,国家是庄稼汉的,集体化成了获得贷款的幌子,工业化还得要一百年。”

他建议托洛茨基:

“您和它(党)的大多数——最官僚、最权势、最庸俗的大多数,腐化变形的大多数——都错了,既然这个大多数确已腐化变形了,那么您无论如何不会活得比它更长久,而且用任何人也代替不了它。对您来说没有另外的新党,对国家来说也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

沙图诺夫斯基写这封信是在责备我们,在他看来我们开工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他认为一切不幸都来自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沙图诺夫斯基在党内不是孤立的,有许多沙图诺夫斯基。这种思想随着困难的生长不可避免地将加强。局势本身就具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实行所提出的计划和克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与在这些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作斗争,沙图诺夫斯基的信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体现。这项计划的实行比我们至今做过的一切都紧张得多,在困难重重、有可能要求从削减社会主义建设规模的角度来修改这项计划的形势下,实行如此紧张的计划必须克服现在称作“右倾”的那种思想。这一倾向从对这项计划不满的个别表现中吸取营养。

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的决定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外的政治潮流。在提请你们审议的决议中说道,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与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对于与来自右的方面的危险、与右倾的斗争来说,目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现在不是党员。我们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开除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²⁷,而在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中可能还有支持右倾的人,还会把他们推举为我们的候选人,例如推举为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候选人。

雅罗斯拉夫斯基:从那里推举候选人是不是更好呢?

李可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问我,从那里推举候选人是不是更好。如此说

来,需要这样提出问题:右倾是不是党内的一种倾向,或者说,右倾应不应该被从党内清除掉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党内的倾向。也许,这一断语与至今在实践中发生的情况有些不一致,是吗?如果实践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按照这一方向纠正实践。所以,如果报纸上用特大号字登出“在我们的队伍中不应该有调和派分子存在”,那么这样的话不应该从组织结论的角度加以理解。如果说右倾是党内的潮流,与之必须进行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话,那么调和主义不是党外的潮流,而是党内的潮流。

斯克雷普尼克:意识形态上的调和主义。

李可夫:无论如何,用从党内清除、开除来解释这些用粗黑体字印刷的报纸标题(《在我们的队伍中不应该有调和派分子存在》)是完全不对的。斯大林同志也指出过这一点,说在中央委员会里存在和可能存在形形色色的调和主义和右倾²⁸。

戈洛谢金: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呢?

李可夫:根据党的决定,托洛茨基主义被认为是与我党党员身份不相容的反党潮流。

有人喊:这不是倾向,是反革命。

李可夫:说托洛茨基主义只存在于党的范围之外,这对不对呢?从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角度来看这是对的。

有人喊:已经被捕了。

李可夫:有人提醒我“已经被捕了”。我担心你们有些把危险估计过低。第一,并非所有公开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已被捕;其次,党内至今还有同情托洛茨基主义并赞同这种思想的人。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列宁格勒,在一个组织里,它即使不是最好的组织,至少是最好的组织之一,整个支部是由托洛茨基的委员会领导的²⁹。

不久前我们当中一个人的私人秘书,党员,实际是托洛茨基组织成员,他能使“自己的”组织了解我们的全部秘密文件。应该说,在重新被我们吸收入党的托洛茨基分子中,有的人正试图在我党内部为托洛茨基分子工作。请注意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虽然它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因而也就是右的倾向,但是它却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提出使其更容易与某些工人团体结合的“左”的口号和要求。否认这一点将是错误的。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试图使其意识形态具有的“左”的色彩,它使托洛茨基主义更容易与一些工人团体结合,使托洛茨基分子更容易在我党的基层组织中活动。认为托洛茨基主义除了被我们投入

监狱的那些人之外没有给其拉来新的支持者,就是低估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当然,托洛茨基分子在基辅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当地苏维埃大楼前的抗议行动³⁰规模不大。

谢苗诺夫:30个人。

李可夫:我不知道参与者的确切人数,但不多。然而无论如何,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公开的行动。托洛茨基主义今天仍是一个有能力进行活动的组织,即使不是全国范围的活动,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领导在一些城市的个别行动。因此,说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

有人喊:任何人也没有这样说过。

李可夫:应该承认,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困难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成长及其意识形态在党的队伍中的影响的增强提供了某种土壤。例如,托洛茨基分子曾把失业作为攻击我们的主要论据之一。今年失业人数在增加。托洛茨基分子将利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继续攻击我们。经济困难使反革命情绪得到加强,使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这不可能不被托洛茨基分子所利用。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党内的状况。

我向你们报告了一个极为紧张的计划(我们想通过这项计划保证经济在下一年的振兴),一个极为强硬的计划,它使动摇和摇摆的可能性现在比前几年有所增大。由此产生了正是在当前时刻消除一切右倾危险的迫切性。但是在与各种倾向进行坚决斗争时,不应扼杀自我批评。我今天向你们报告的问题是,如果西欧资本家向我们提供贷款,我们就会向国内输入成品。我相信,要是有谁在党的基层组织这么说的话,他就会被指责为右倾。

有人喊:有人会说是托洛茨基主义,是商品干涉。

李可夫:我会试着向他们证明这些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是愚蠢的。如果有可能,如果有比较有利、期限较长的贷款,我们就将输入现成的日用必需品,在这点上没有任何倾向。

如果我们制定的五年计划具有从国外进口成品而不发展我国工业的特点,那就会产生倾向。如果把输入成品作为原则,并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制定政纲,那么这无疑将是右倾。

与最初的方案相比,今年我们在人民委员会把对工业的预算拨款增加了大约1.5亿卢布。也许,应该把拨款增加得再多些或再少些。与我们所说的数字——大约20亿卢布——相比,2000万—3000万卢布的问题属于实际业务计

算问题,而不是原则性政治分歧问题。把有关这2 000万—3 000万卢布的分歧说成什么倾向,是愚蠢的,可至今还在这么做。我举这两个例子(关于今年的成品输入和关于资金分配上的个别实际分歧),是要说明“扣帽子”的做法现在还有。在这些实际问题上没有任何右倾、左倾和调和主义。全党在讨论异常复杂的经济局势的时候,必须保证在首先同右倾坚决斗争并且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毫不放松的斗争的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全部经济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详细的、深入的讨论。只有工人阶级和全党弄清楚在我国生产力发展道路上出现的困难、困难出现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方法,我们才能消除这些困难。即使有时不能给工人足够的面包,但只要他们明白这种现象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怎么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党正在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们就会完完全全地支持我们。但为此必须使民主和自我批评得到保障,因为它们可以保证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应有的讨论。

主席(李可夫):根据议程应该听取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时间同我的报告一样,也是40分钟。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提议把这件令人高兴的事推迟到明天。我同意。同意这项提议的人请举手。过半数。

现在我宣布散会。

第二次会议

11月17日上午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下一个就国民经济控制数字作报告的人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

现在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发言,他要求报告的时间为1个半到2个小时。

有人喊:这样说不准确,应为1.5到2小时。

柯秀尔:如果说话不准确,他算什么工程师,他以后算什么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主席:有没有不同意见?通过。

扎东斯基:如果40分钟等于3个小时,那么2个小时等于多少呢?(笑声)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是在我国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出现对于我们来说不可避免的严重紧张状况的一年中完成的。我想,你们很容易体会到我们在把如此紧张的国民经济计划提交你们评判、提交终级评判时所感到的巨大责任感。我们略感放松的是,这一次在我们的控制数字工作中,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与一个工作人员比以前多得多的集体进行了密切协作。第一个汇总报告是一个大致的报告,随后立即在苏维埃和党内对其进行了讨论,因此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不仅是计划制定集体的工作成果,而且已经是一份详细的草案,你们有了作出自己最终判断的极好基础,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放松。

我们的草案在报刊上得到了极其广泛的讨论,因此我想,我没有必要对这一草案进行详尽的介绍。我建议同志们看一下格林科同志在《真理报》上作的极其清楚透彻的分析³¹,看看他在《计划经济》月刊³²第9期上发表的那篇详尽阐述我们所有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文章,我认为,你们已经了解我们计划的基本特点;而且昨天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还特别要你们注意到这项计划主要、紧迫

的方面,指出了特别紧张、重要的方面,能否顺利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决定着今年的形势和建设工作的今后前景。

但是,认真研究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大量困难,令我们不由回想起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³³的各项指示,我们发现给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程无疑会带来危险的相当多的因素具有老难题的特点。我援引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决议的第一条。这一条是怎样说的呢?这一条说:“在调整城市和农村的相互关系方面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的困难和问题。在制订五年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从解决与我国经济方面各种基本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的任务出发。这些现象就是:工业和农业间的不平衡,虽然工业比农业增长得快些,但这种不平衡还远未消除;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间的不平衡(即市场上的‘剪刀差’);工业原料即农产品(棉花、皮革、羊毛等)的需求和供应间的不平衡;最后,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经济上能实际利用的劳动力数量间的不平衡(即所谓‘农业人口过剩’)。”³⁴

我们的时代在飞速发展,经济形势变化迅速,我们提出有目的的改变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我国经济作为我们的经济工作重点。在改造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在这一改造的开始阶段,一些旧的比例失调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并产生新的比例失调。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力量在国内外经济战线上的比例。无论怎样评价我们的经济活动成就,都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总的说来是增长中的困难。在我们的控制数字中所援引的大量数据全都表明,整个经济曲线的特点总的说来正表明了经济的急剧增长。请大家想一想!我国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00亿卢布。但是请问,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我国的贷款、我国的实际租让成就有什么样的增长呢?随着我们越来越明确地在全世界面前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我们从而也就以经济建设工作的这一伟大范例来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在此不由得想起列宁同志的话,他向我们指出,我们同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能带有暂时喘息³⁵的特点。大家知道,这些力量正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我国对外金融联系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处于明显紧缩的阶段。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建设像我们周围国家那样类型的经济机制,在这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么就能很容易地找到答案。请问,根据资本主义的标准我们这个经济总量达300亿的国家能够保证得到多少贷款呢?我想这样的国家可以在相当优惠的条件下得到数额达15亿卢布的稳定的、长期的、可靠的国外贷款。只要看一下经济实力小得多的国家现在得到多少国外贷款,就会知道这一数字是多么微不

足道。不仅如此,如果有人问我什么能够特别保证我国经济在我们同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现有的关系下能平稳而坚定地前进,我的回答就是这种对我国的国外贷款将不低于15亿卢布的信心。这种利用如此数额贷款的信心、可能性能够立即解决我们与外部市场的关系中的许多困难。大家知道,这一点还不具备,我们正在艰难地争取总共大约7亿卢布的贷款。大家知道,现在相当多的外国[金融]集团正竭力压缩这一贷款。这是第一点。可见,我国经济改造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日益明显增长的比例失调,即我国经济的增长自身和它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之间的比例失调,这种关系完全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力。这种关系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正日益增强和巩固的政治结果。这是第一个比例失调,它表现在外汇问题加剧上,关于这一点李可夫同志用数字向你们作过详细讲述。

下面我们谈谈另一个方面。我们正日益进入工业合理化阶段。工业合理化意味着什么呢?它当然意味着经济工作的重心从简单体力劳动转向钢铁奴隶、机器。合理化自身提供了使用越来越少的活劳动的可能性,但同时你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利用人力的需要极其巨大,利用我国现有人力的需要迫切要求我们实行在我国整个经济活动中尽力吸收、安置越来越多的活劳动的政策。合理化自身在缩小利用这种劳动的范围,而在社会方面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因素,它为所有劳动者描绘了越来越远离失业的前景。这就是在改造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改造的需要、直接的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困难的第二个方面。

其次,改造由于其活动的性质而具有首先提高质量指标的特点,然而我们所面对的对产品数量的需求却常常使我们忽视质量。大家十分清楚,从提高产品的质量系数的角度来说要求我们在选择现有工厂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好的基层单位、最好的工厂上,这种选择与数量上的需要、与无论如何必须提高产量的需要发生冲突。我们为了克服商品短缺不得不常常把陈旧过时的工厂投入生产,而这样的工厂由于自身的负比重而恰恰逆转:增加我们的经营支出,降低我们的质量系数(有时相当严重)。在这方面还可以举出不少比例失调加剧、我国经济危机加深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不再多说,我只想指出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应当彻底改变,应该完全不同于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的旧时遗产,当外国人看到我们利用我们的时间的状况时往往目瞪口呆。首先,他们感到吃惊,怎么会这样,因为在西方时间以分钟计,可我们却以小时或天计。

柯秀尔:像我们的发言时限那样。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的,就像我们的发言时限那样。实际上,摆脱旧时的

遗产并不那么容易。但是现在我们清楚地感到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在各种工作的速度方面适应新的环境。我不止一次想起,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改造的特殊问题,指出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再次给我们提出许多问题并要求改变时,我在同志们的脸上看到了某种困惑,顺便说一句,我也想到了“改造”自己的头脑。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现在,经济学家为了胜任目前的经济给他提出的那些需要,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应该成为经济学家,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成为技术人员、经济学家、心理学家……

柯秀尔:也成为政治家。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也成为深刻的政治家。形势变得日趋复杂,向我们中的每个人提出的要求也在急剧增加。必须在我们快节奏的工作当中适应不断增加的这些要求。这并非易事。也许,应该考虑让我们的负责同志不仅得到体力上的休息,而且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为了认清我国的复杂形势,必须查阅大量的资料,到地方上去,大家知道情况实际是什么样的。加米涅夫同志就稍微休息了一下(笑声),写了一篇不错的札记,谈应该如何“实事求是地、以新的方式”³⁶工作。但这篇文章并非十全十美,因为他在这篇文章的一个方针上似乎出了错。他写道:应该明白,在国民经济计划中需要把经济分析、经济规划和技术规划、技术改造规划结合起来。这似乎是说,可以单独编制经济规划,单独编制技术改造规划,然后再以某种办式把它们结合起来。而我们很久以来就坚持认为,应该进行统一的经济技术分析,不仅通过经济技术分析,而且通过社会联系分析,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国民经济计划,哪怕就拿一个年度来说,也是最有利的、最好的事(最佳点):可以为联盟集体劳动的分配和安置进行集体创造,对经济、技术和社会政治联系进行仔细分析。

同志们,在批评和分析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归根结底就是对活生生的人的指靠。我们作为计划工作者,现在不像其他人那样迷恋我们汇总出来的数字、数字排列、平衡表。我们知道这些数字具有什么样的相对意义,知道我们的方法多么不完善。我们没有忘记在我们这个充满急进和变化的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应该透过数字、平衡表看到生活的本来面貌。应该看到活生生的人,应该看到决定并造成力量按阶级分置的东西。由此大家可以看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但与此同时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虽然常常责备统计,但却拼命抓住它不放,因为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需要对纷繁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统计总结。

同志们,我想,无论我们向你们报告的控制数字有多么不完善,但是无疑我们在这些数字当中向前迈了一大步。无论计划经济的潜力如何有限,我们毕竟每年在这方面都在向前推进。

我想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我国计划经济的传送装置实际上到底有多大。

国民收入 1927—1928 年度为 258.72 亿卢布。

1928—1929 年度为 284.48 亿卢布。

	1927—1928 年度	1928—1929 年度
预算体系	53.720	63.840
信贷体系	10.286	9.010
中央社会保险局	10.410	12.180
生产单位	18.467	25.430
其他(在合作社中的股份等)	3.142	5.250
总计	96.025	115.710

以整数计算,从 90 亿增至 110 亿,也就是增长了 20 亿。

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注意的地方。这里以国民收入和居民收入为例。国家计划委员会所进行的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我不谈这项工作的细节,而只是说明我们通过两个方法来核实数字:现实的方法即计算我国产值的增长和主观的方法即通过一定方式确定居民收入。

这些数字排列说明什么呢?比如国民收入,预计从 1927—1928 年度的 258.72 亿卢布增至 1928—1929 年度的 284.48 亿卢布,也就是增长 26 亿卢布。可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国民收入的这一增长当中有多大部分是通过财政杠杆、计划来调节的,就会发现通过预算、中央社会保险局机构、工业的财政机构、合作社,一句话,也就是通过所有财政传送装置,我们调节了 20 亿卢布。我们按照一定的计划、按照结构有组织地在整个财政体系内分配的货币收入为:从增长的 26 亿卢布中我们调节了 20 亿,也就是 70%。这表明,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大家知道货币语言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语言)方面,我们以我们的计划拿走了收入增长的 70%。而这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方面,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也许在我们现在比从前更多地利用这一强大的杠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计划中体现出慎而又慎的精神。而改造工作自身要求很大的勇气,也就是说,现

在一个好的计划特别需要把两种不同的、截然相反的素质结合起来。既要充满信心地前进,又要特别精打细算。

可以说,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我们将自然而然地遇到对我们工作结果的日益增加的要求。第11个建设年,第12个依靠活生生的人的经济建设年,最终会得到越来越强大的“为之奋斗过的”东西。我们的承诺应该得到一年比一年多的兑现。在这方面是什么力量在特别推动着我们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下面的图表所展示的我国人口数量和成分的变化情况。

苏联总人口变动情况

1851年1月1日至1928年1月1日(单位:千人)

年份	总人口	净增长		年份	总人口	净增长	
		绝对人口	百分比			绝对人口	百分比
1851	50 563.5	828.9	1.63	1891	94 377.9	1 617.8	1.72
1852	51 392.4	663.7	1.29	1892	95 995.7	815.1	1.85
1853	52 056.1	739.4	1.42	1893	96 810.8	1 569.7	1.63
1854	52 795.5	802.8	1.52	1894	98 380.5	1 895.9	1.93
1855	53 598.3	770.5	1.43	1895	100 276.4	1 789.5	1.79
1856	54 368.8	729.2	1.34	1896	102 065.9	1 839.8	1.81
1857	55 098.0	736.4	1.33	1897	103 905.7	1 854.0	1.79
1858	55 834.4	717.5	1.29	1898	105 759.7	1 566.2	1.49
1859	56 551.9	729.2	1.29	1899	107 326.9	1 795.2	1.68
1860	57 281.1	740.8	1.29	1900	109 121.1	1 855.0	1.70
1861	58 021.9	755.2	1.30	1901	110 976.1	1 758.7	1.58
1862	58 777.1	766.9	1.31	1902	112 734.8	2 014.3	1.79
1863	59 544.0	736.4	1.24	1903	114 749.1	2 027.0	1.77
1864	60 280.4	747.1	1.24	1904	116 776.1	2 112.0	1.81
1865	61 027.5	729.2	1.20	1905	118 888.1	1 829.4	1.54
1866	61 756.7	765.1	1.24	1906	120 717.5	2 419.8	1.81
1867	62 521.8	798.3	1.28	1907	123 137.3	2 153.3	1.75
1868	63 320.1	832.4	1.31	1908	125 290.6	1 667.2	1.33

续表

1869	64 152.5	844.1	1.32	1909	126 957.8	1 116.3	1.88 ³⁷
1870	64 996.6	856.7	1.32	1910	128 074.1	1 718.2	1.34
1871	65 853.3	954.9	1.46	1911	129 792.3	2 433.3	1.87
1872	66 808.2	710.8	1.07	1912	132 225.6	2 362.8	1.79
1873	67 519.0	1 167.4	1.73	1913	134 588.4	2 334.1	1.73
1874	68 686.4	1 212.1	1.76	1914	136 922.5	1 867.8	1.36
1875	68 898.5	1 191.1	1.71	1915	138 790.3	-1 064.4	-0.77
1876	71 089.6	1 129.5	1.60	1916	137 725.9	-723.1	-0.53
1877	72 219.1	1 119.8	1.56	1917	137 002.8	648.5	0.47
1878	73 338.9	781.3	1.07	1918	137 651.3	-2 669.2	-1.94
1879	74 120.2	4 471.7	6.03	1919	134 982.1	-2 180.4	-1.62
1880	78 591.9	1 414.6	1.81	1920	132 801.7	-1 339.0	-1.01
1881	80 006.5	1 228.9	1.54	1921	131 462.7	+959.2	0.73
1882	81 235.4	477.1	0.59	1922	132 421.9	676.9	0.51
1883	81 712.5	1 444.0	2.18	1923	133 098.8	1 922.2	1.44
1884	83 489.9	1 464.9	1.76	1924	135 021.0	5 598.0	4.15
1885	84 954.8	1 444.0	1.71	1925	140 619.0	3 177.0	2.26
1886	86 398.8	1 573.8	1.83	1926	143 796.0	3 217.6	2.24
1887	87 972.6	1 564.8	1.79	1927	147 013.6	3 522.8	2.40
1888	89 537.4	1 743.2	1.95	1928	150 536.4	—	—
1889	91 280.6	1 541.0	1.69				
1890	92 821.6	1 556.3	1.68				

注：苏联总人口在1879年的巨大增长是俄罗斯和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和突厥斯坦的战争的结果，这两场战争以突厥斯坦³⁸和巴统省³⁹并入前俄罗斯帝国而结束。总人口的净增长在1924年急剧提高是布哈拉共和国和花拉子模共和国⁴⁰加入苏联的结果。

[加里宁：时间太短，应该举100年为例。]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做这个表格不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些数字，而是为了让大家从这一大堆数字材料中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

叶努基泽:为什么从1851年开始呢?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也可以从1852年开始,这并不重要,请大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我们看到的是纵行中以百分比表示的增长,而旁边的是绝对增长。如果我们删去特殊的1879年……

有人喊[乌加洛夫]:这里有问题,有错误。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879年是战争年,这里不是错误而是准确的数据。有两年没有代表性:1879年和1924年,因为是通过战争扩大我国领土的。大家将看到,我们的人口增长数量从70万—80万逐渐变为上百万,后又达到150万,而大家现在看到我们已经达到年增长350万人。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因为这意味着每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一个像芬兰或者丹麦这样的国家并入了我国。这一过程当然具有双重意义。我们在这方面,在经济困难时期当然感受到由于人口如此增长而使需求自然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前面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巨大数字所体现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因素呢?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一增长的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正好是未来五年的特点,即在这一增长中主要是成年工人的相当大的增长。这是由从前的、战时的情况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来,在人口的这一巨大增长中蕴涵着我国经济活力巨大增长的根源,我们伟大国家的力量将得到巩固和增强。

如果说可以不考虑细节、不考虑我们控制数字的个别总计数字,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回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很大程度上正确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正在艰难地发展。我们在以什么样的速度前进呢?这一速度是否符合当然不能在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内全部完成的主要目标任务呢?回答可以给出,只要细看一看前景计划的总体情况,只要我们能够从这一计划的角度说这一年实现的速度将满足在应有的前景条件下所讨论的整体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五年计划,但是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毕竟做了许多事情,也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取得了进展。我们现在所确定的速度从前景规划的角度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呢?大家知道,我们拟定的五年计划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起始方案,另一个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方案,所谓的理想方案。我只想谈谈工业品,因为它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在我们讲到工业化的速度的时候,我们的打算是,在这一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将使我国经济比起始方案大约增长一倍,或者一倍多一些即增长一倍半。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投入80亿—120亿卢布用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如果前景计划是正确的,那么每年就会增加20%左右的产

品,并且我们应该每年在基本建设方面投入16亿—18亿卢布。由此看来,你们面前的控制数字的规划符合五年计划的规划。

我们不会用这些数字给自己制造偶像,而且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根本不应该用任何希望制造偶像。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年采取任何一种经济行动,只要我们清楚这一行动的意义,清楚这一行动符合我们一切经济决断的最高准则。最高准则简单明确: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福祉就是最高法律。其他一切均服从于它。在坚定捍卫最高利益时勇敢而坚决地转动经济舵盘,恰恰是列宁同志教导我们的战略的内容。请大家回忆一下国家计划委员会刚刚开始工作的1921年。我当时谈起与电气化有关的任务,立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得到了指示,说现在,在1921年,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与破坏和危机作斗争的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要求我们从远景工作转向具体而迫切的建设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工作在与当时的混乱作斗争、努力克服暂时困难的战线上。

因此,要是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经济政策发生某种转折,可以进行暂时的退却,以便有利于能够保障无产阶级共和国社会整体的稳固、基本稳固的经济行动,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命运天平上的一个决定性砝码。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为大家描述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受的那些严峻困难,他讲得非常全面,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去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结果是这样的,即如果困难增加,我们今年将面临特别困难的发展,那么数量就不能转变成质量。由此可以得出贯穿于我们控制数字整个方针的结论:我们应该继续沿着我们前些年的工作所确定的航向前进,现在不需要转动我们经济政策的舵盘。在党和苏维埃的所有力量都被调动起来的时候,在敏锐地捕捉到控制数字工作中明显暴露出来的我们建设的所有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将克服这些因素,使舵盘保持在我们至今所坚持的方向上。

同志们,除了控制数字字里行间包含的实际指示、意见,我们也在努力用数字和事实而不是用干巴巴的辞藻向你们强调和指出在外汇方面、粮食方面、原料方面、市场平衡方面和价格波动方面困难的程度。不能指责控制数字文件对这些实际困难有所掩饰。

下面就最近的市场行情给我们的启示简单谈几句。今年的市场行情应当成为特别敏感的经济指标,因为经济机体的紧张状态就像李可夫同志出色描述的那样非常突出。

我们只有10月份的汇总材料。总之,这些材料说明我们还没有摆脱一系列

困难:我们还没有摆脱粮食困难,没有摆脱工业困难、价格困难,但是无疑也有一些积极因素。10月份的货运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每昼夜38000车皮,比9月份的周转量多8.7%,比去年10月份多11.6%。这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谷类货物的运输急剧增长,比去年9、10月份分别增长38.5%和28.8%。我们看到给粮食消费地区的谷类和其他粮食的运输在增长,其中“其他粮食”的运输10月份比9月份多78.6%。

可见,10月份不仅使粮食收购有所增长,而且也把工业品推销给了消费者,因此有理由认为城市中的粮食紧张状态今后将会得到缓解。

丰收地区的地理分布情况使西伯利亚的长距离运输将起巨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西伯利亚的运输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我们在10月份顺利地从东部运出了大量粮食,这无疑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

埃赫:所以应该加强西伯利亚的运输。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并非每一年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今年我们开局不错。

在粮食价格变动方面,集市价格和粮食收购价格之间依旧存在差距。我不列举数字,但是数字表明黑麦价格的差距最大,小麦稍微小一些,而且我们正在成功地缩小这一差距。

我不打算说明货币流通的特点,只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别令人担忧的方面。在工业品市场上商品匮乏加剧,这与粮食收购的发展和农民得到货币资金是完全自然地吻合的。眼下正在签订一些商品的合同,把订货预付款用于其他商品。但是,如果工业能够得到应有的调动,我们就有权期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积极的转折。在评价对主要的粮食收购站的工业品供应情况时,我们能否说我们已经实行了相应的工业调动计划了呢?现在还没有这一计划,但我们今后应该每年制定这样的工业调动计划,而这方面还有不少潜力。我们应该把这作为我们的迫切任务来完成。各个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区粮食状况和工业品运输方面的紧张状况明显得到缓解,另一些地区则不太明显。

关于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采煤业战线的不好消息仍在不断传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没有完成计划,欠产达6%—7%。石油开采超额6%。南方冶金托拉斯的产量提高了6%,生铁和钢比计划超出3%—4%。乌拉尔采矿业托拉斯在计划任务的范围内生产。纺织工业除了毛纺织业都在非常紧张地生产,亚麻工业由于原料供应不足而尚未转入全周工作制。这些市场信息告诉我们,还必须长期在这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但是我希望去年的工作没有白做。去年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的东西今年至少不会再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我已经指出

过,我们在控制数字中突出强调了一切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的经济战线现在日趋紧张。]

我已经指出过,正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预见的那样,农业是困难产生的主要根源。作为对已公布的材料补充,我想请大家关注分析这一问题的一次尝试。

我们试图通过表格把苏联农业的作业与工业在动力方面进行对比。在这方面计算出了数年来我们用于农业领域的人力和机械化作业上的开支。我们拖拉机不多。这里统计出了拖拉机的数量。但是在机械化作业中役畜是主要的。

接着我们计算人的活劳动的一个单位有多少机械辅助劳动。我们把这称为装备程度系数、劳动能力系数、动力系数。我们同时计算了工业上的这些系数。然后把劳动装备程度同每年所消耗的一个人力单位的实际产值(用卢布或戈比计算)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工业的装备在1922—1923年度每个劳动力单位有23个机械能单位,1924—1925年度为23.3个,1925—1926年度为26.1个,1926—1927年度为28.3个,但同期农业中的增长数值仅为工业的1/10。具体情况是:农业中机械能的装备程度1922—1923年度为1.98,1923—1924年度为2.63,下一年度相同,1927—1928年度为3.18。同时,一个人工日均摊到的工业总产值为9—18卢布,而农业总产值为103—172戈比。大家看到,农业和工业的动力装备年复一年是如何变化的,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工业中一个人力单位有20多个机械能单位、20个钢铁机械奴隶,可在农业中大家看到的是1/10的装备。农业年复一年地增长,但增长率落后10倍。

丘巴尔:工业中只有动力设备进行划分吗?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的,只有动力设备。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断言每个美国人拥有30个机器奴隶。我们可以说我国工业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强劲发展,但是农业没有跟上来。在美国农业劳动的装备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工人14蒸汽马力。大家看到我们多么落后,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特征就说农业衰落;农业动力因素毕竟在年复一年地增长。衰落总是带来质量特征的下降。总的说来,我们农业的质量特征表现出向上的进程,但是在动力方面表明农业十倍地落后于工业。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滞后[落后的速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些动力剪刀差。

为了再一次提及我国农业的状况这一主题,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控制数字中关于农业的一个表格,顺便说一句,李可夫同志曾经对其作过详细的分析。这一表格说明了苏联国民经济的变动过程(控制数字报告第98

页),表格还说明了播种面积的增加、总产值的变化、役畜和畜产品的变化等。李可夫同志对这个表格进行了完全正确的说明,数字表明了农业的[极端]落后。如果农业的这一变动再持续几年,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

但是,如果说到对国民经济的改造,我们总是应当补充说,随着改造的实际展开,从过去,也就是根据过去的速度用外推法得来的变动指标的作用越来越小。无疑,如果未来仍是这个速度,情况将极端困难。但是改造的特点就在于,在改造的条件下我们恰恰是在这方面去打破旧的速度和方针。如果你们想从我们的控制数字所作的这些对比中得出充分的结论,今后你们就应该立即进行特别的考量。

我想以一份文件来向大家说明这一点,这份文件恰好作了这种考量,它就是人民委员会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就此通过的关于扩大我国谷物业资源可能性的文件⁴¹,[其中分析了这一引人注目的主要问题]。这个报告似乎是9月下旬提交的,我们在报告中试图把与这方面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东西从五年计划的文件中挑出来。人民委员会基本通过了,并多次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改。

这里的方针是什么呢?这里首先指出,斗争应该在两个战线展开,应该做到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和播种面积尽可能地扩大。对10年时间的指望是什么呢?农业产量增加一倍。为了把这一文件作为基础需要讨论所有的可能性,并且人民委员会认为我们在10年中使农业产量增加一倍是可能的。

在这里什么措施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呢?建议遵循如下指示:首先,100%精选谷物和种子。必要数量的选种机和谷物清选机。保障50%的谷物播种地用上精选的种子,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00%用上精选的种子。应该保障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100%播种精选的谷类作物。保障所有经济作物施上无机肥料,700万公顷的其他作物施上无机肥料。加紧进行施石灰改良酸性土壤和利用磷钙土粉。在东部地区最大限度地扩大播种面积。五年计划结束时播种总面积应该增加大约20%。到五年计划末期力争日常使用的拖拉机数量达到15万台。国营农场每年应该提供大约250万吨粮食。集体农庄同期应该利用2000万公顷左右的播种地。其次拟定了有关农业合作社、全面合理的农艺帮助、发展农艺教育、提高农户自主性的措施。

我不打算详细阐述这一决定,但想指出这一规划的设想已得到全面讨论并且被认为是完全现实的。设想向我们表明,对农业整个变动情况的评价正是结合改造的方方面面作出的。文件证明,我国农业变动情况中过去令人担忧的东

西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为使我们对播种面积动态表中看起来对我们特别不利的因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战前的播种面积变动情况。我顺便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农业的时候局限于平均数字是非常错误的。必须考虑对个别地区应该个别对待。在乌克兰,单位面积产量和集约化问题处于首位,而在东部地区我们应该考虑到美国粗放经济的模式和速度,即播种面积的扩大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有人喊[丘巴尔]:那里还应该多生人口。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美国经济体系中人口的问题,应该注意到美国的动力系数。

那么,我国战前各地区播种面积是怎样变动的呢?粮食消费地区的播种面积30年间保持了稳定。如果假设1881年的播种面积为100%,那么1913年仅为101%。粮食生产地区的播种面积30年间增加了25%。全部播种面积在5年间即从1906年到1913年发生了变化,从100%变为110%。我们看到,播种面积的这一变动因素在过去变化不大。(见附表)

展望未来,我们无疑应该扩大我们的视野,重温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未来时期改造的进展将注定什么呢?我们在沿着两条路线前进:机械化的路线和化学化的路线。我请同志们读一下刊登在今年《计划经济》第8期上的两篇文章,我们在文章中有意对这两个基本的、重要的方面作了对比。戈尔杰耶夫同志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与机械化》一文以美国为例说明了机械化在农业中的作用。而斯图杰诺夫的文章谈的是在我国使用人工肥料的前景问题。这两篇文章的结论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革命胜利后西伯利亚的农业发展,关于广种薄收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在我国旧的农奴制关系被彻底打碎后将以美国式速度发展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仔细分析美国的实际速度,我们发现我们离我国东部地区美国化的可能性并不十分遥远。实际上,如果说到机械化就必须谈到农业机械制造业。例如根据戈尔杰耶夫同志的资料,美国在1920年有246 000台拖拉机。我们预计在这个五年计划末就将超过150 000台。这样的数字无论如何已经不再说明我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相比时存在巨大的剪刀差。下面谈一下农业机器的生产。本世纪初美国生产了价值2.02亿卢布的机器。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今年提出生产大约2亿卢布的机器的任务。到1925年美国的产量达到3.38亿卢布。我们当然也将在生产2亿卢布农业机器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上述比较说明,我们还要跨越的已经不是很远

苏联注册工业的工作成果(附表1)

年度	机械动力		年(约3200小时)工作成果 单位:百万HP小时	劳动力		能量消耗总数 单位:百万HP小时 (5+8度)	能量化系数 (5+8度)	总数 单位:百万切尔夫涅茨卢布	总产量			
	总数 单位:千HP	其中的功效数 单位:千HP		平均在册工人数 单位:千	他们的工作成果				用于1个 人工日 (7度)	用于1HP 小时消耗 全部能量		
					单位:百 万HP小 时						单位:百 万HP小 时	
绝对数												
1922—1923	2.777	1.524	55.0	4.880	1.304	338.2	211	5.091	23.2	3.377	9.99	0.66
1923—1924	3.145	1.778	56.5	5.680	1.527	405.5	253	5.933	22.4	4.520	11.15	0.76
1924—1925	3.030	2.114	69.7	6.760	1.730	476.5	290	7.050	23.3	6.628	13.90	0.94
1925—1926	3.221	2.882	89.0	9.232	2.233	589.6	354	9.586	26.1	9.957	16.90	1.04
1926—1927	3.600	(3.240)	(90.0)	10.370	2.348	617.8	366	10.016	28.3	11.349	18.36	1.03
相对数												
1922—19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3—1924	113	116	103	116	117	120	120	117	97	134	112	115
1924—1925	109	139	127	139	133	141	138	138	100	196	140	142
1925—1926	116	189	162	189	171	174	168	188	113	295	170	157
1926—1927	130	213	164	213	180	183	174	197	122	336	184	156

苏联农业的工作成果(不包括育林和狩猎)(附表2)

年度	有劳动能力的居民 单位:百万人		劳动力的花费		役畜		拖拉机牵引		能量消耗		能量系数 (7+9) (4+7度) (+9度)	总产量 单位:百万切尔沃涅茨卢布	用于戈比计算			
	单位:百万人	工日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单位:百万人
绝对数																
1922—1923	54.0	9.170	8.140	(17.5)	2.220	16.100	23.3	23.3	24.263	1.98	9.500	103.7	39.2			
1923—1924	54.6	9.260	8.220	23.4	2.970	21.600	56.6	56.6	29.877	2.63	13.000	140.6	43.5			
1924—1925	56.7	9.620	8.540	24.6	3.120	22.600	203.5	203.5	31.344	2.67	16.099	167.4	51.4			
1925—1926	57.5	9.760	8.660	25.4	3.230	23.500	418.0	418.0	32.578	2.75	15.758	163.2	48.4			
1926—1927	58.5	9.940	8.810	28.1	3.570	25.470	602.4	602.4	34.882	2.96	16.242	163.4	46.7			
1927—1928	59.6	10.120	8.900	29.9	3.800	27.600	754.0	754.0	37.254	3.18	17.437	172.4	46.8			
相对数																
1922—192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3—1924	101	101	101	134	134	134	243	243	123	133	137	136	111			
1924—1925	105	105	105	140	141	141	873	873	129	135	169	161	131			
1925—1926	106	107	106	145	145	145	1,794	1,794	134	139	166	157	123			
1926—1927	108	108	108	161	161	161	2,590	2,590	144	149	171	158	119			
1927—1928	110	110	110	171	171	171	3,236	3,236	154	161	184	166	119			

的距离,无疑已经具备了做到这一点的能力。

有人喊:1928年前有这种能力吗?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援引的是1920年和1925年的资料。此刻不由地想起列宁同志的话,他认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⁴²。心理的改变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同时,相应的物质基础即相应的工业化速度能够保障我们迅速实现这一改变。美国农业和我国农业在这些数字方面的对比没有什么令人困窘的东西。

化学化能力的对比则更加惊人。我不打算详细谈论斯图杰诺夫同志的文章。该文提到五年计划并且描述了农业化学化规划。这一规划的结果是什么呢?作者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提出在单位面积产量方面赶上美国这一小小的目标的。美国的平均收获量与我国相比如何呢?高1.5倍。这不是把我们与有着集约化农业的法国、德国、丹麦等国拉开的那一差距。作者在肥料方面所作的计算表明,用于化学化的开支能够非常迅速地收回。最低限度规划在这方面作了什么规定呢?最低限度规划预计5年中生产:可溶磷酸盐200万吨,硫酸铵80万吨,钾盐120万吨,磷钙土粉120万吨,石灰880万吨,总共为1400万吨,而1927—1928年度各种无机肥料产量仅为28.43万吨。美国1913年每公顷播种面积用肥0.75公担。我国1913年为0.02公担。美国在13年中年均1公顷播种面积用肥增长0.004公担。我们在我们的规划中拟定了能够迅速赶上美国的增长速度。根据这个规划,所有无机肥料的价值为2.13亿卢布,而1927—1928年度仅为900万卢布。大家可以看到改造带来的进展多么巨大!收支平衡情况怎么样呢?显然,到1933年秋天农业可以获得3.84亿卢布的利润,即可以按210%的高比例收回资本。产值的增长总额超过5亿卢布。

我国科研所的一系列研究工作证实,我们具有许多新的有利条件。我们起初以为我们必须通过非常复杂的办法才能把索利卡姆斯克盐转变成对我们有用的肥料。实际上现在进行的实验表明,索利卡姆斯克盐直接使用就具有巨大的有效作用。

施石灰改良酸性土壤的问题。今年不妨格外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产生最快的效益。这个问题对于灰化土壤、中部和北部以及重新估计产粮区和粮食消费地区之间的差价具有意义。美国这方面的经验说明什么,我们可以

怎样切实着手施石灰改良土壤的工作呢？困难是什么呢？高昂的价格：每公担3—3.10卢布。在国外价格无比低廉：丹麦和比利时是30戈比一公担，美国是12戈比。美国的农场主是怎样做的呢？（幸好在我国灰化土壤地区也有石灰石分布）在美国利用普通的“福特”牌拖拉机和专用移动式研磨机；带有这种设备的拖拉机开到石灰石产地，就地研磨；农场主把石灰装进口袋直接运到地里。[这是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真正有效的手段，我们可以在近几年用这种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价格差异的谜底就在这里。

丘巴尔：关于施石灰改良土壤的辩论结束了吗？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辩论以令人满意的结果结束。

我作这些必要的补充是为了使你们不要从我们告诫你们的东西中得出特别悲观的印象。

柯秀尔：为什么是告诫呢？（笑声）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是从你们的角度告诫的，以便你们能够利用这些对未来的思考彻底修改对农业前景的评价。

但是，详细分析我们现在在农业方面具有的潜力，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到底是否应该因为严峻的局势而稍微挤一挤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给农业补充点什么，以便更迅速地创造必要的转折呢？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有助于拟定这方面的路线的具体、明确的建议。如果把我们的预算和我们的财政工作人员在预算中确定的紧张状态与紧张状态的根源加以对比，情况自然就清楚了。我国的国民经济拨款需要是主要根源。当然，工业和电气化在这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看一下国民经济拨款方面的预算是如何增长的，你们将得到一系列极可借鉴的数字。预算对国民经济的拨款的增长情况为：1925—1926年度为18.2%，1926—1927年度为23.5%，1927—1928年度为28.7%，1928—1929年度为33.8%。

丘巴尔：并且今年包括了去年的部分开支。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们利用了财政计划的所有资料。

丘巴尔：请扣除记入今年的去年开支，然后核实一下增长率是否还是这样呢？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丘巴尔同志，所有这些都经过了核实，你们可以相信确实如此。

丘巴尔：乌克兰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说的不是一个乌克兰，而是整个预算的情况。阿列克

谢·伊万诺维奇已经列举了国家预算在工业和电气化方面的结算余额,而且,如果除掉军事工业的话,我们今年的结算余额应为6.5亿卢布。但是我们对经济的投资特别多地用于什么方面了呢?当然主要是对基本建设的拨款——16.5亿卢布,而去年为10.37亿卢布。但是这些拨款是如何分配的呢?能不能在这方面进行重新配置呢?拨款的去向如下:冶金工业超过4.5亿卢布;燃料工业3.8亿卢布,去年为3.4亿卢布;建筑业大约1亿卢布,去年为0.52亿卢布;化学工业1.02亿卢布,去年为0.56亿卢布;等等。在这些申请拨款的部门中能不能挤一挤某个部门呢?关于冶金工业你们已经听说了,对控制数字的修改导致增加了对这一部门的拨款。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严重缺乏生铁。[我请大家再特别关注一个方面——燃料平衡表,它向我们描述了一种极端困难的状况。]顺便说一句,我们在一张专门表格上援引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资料中关于商品短缺的说明(见表格)。[清单表明,短缺的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赖以进行的那些类别的商品。]

大家看到,1928—1929年度对钢铁的满足程度甚至低于1927—1928年度。接着大家看到建筑业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虽然这种短缺程度稍微弱一些。再往下大家会看到玻璃这样的商品出现了不太大的增长,从75%增长到82%。尽管我们在化学工业上竭尽全力,但在化学肥料工业方面我们仍然力不从心。1928年春天对过磷酸钙的需求比供应超出1倍,秋天已经超出2倍。明年春天短缺现象也许将更加严重。

燃料平衡表应该特别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指的是生铁、生铁的短缺。但是大家知道重工业不仅是生铁,而且首先是燃料和钢铁。我担心,我们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会更多地谈到燃料的短缺而不是钢铁的短缺。

施瓦茨:现在就可以讲。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原因如下。从这张表格你们可以了解到燃料开采是如何按照我们的燃料平衡表进行的以及储备情况。[最近3年燃料供应总的情况是紧张的,根源在于国家为满足迅速增长的燃料需求而最大限度地(有时是全部地)集中所有生产资源。过去的1927—1928年度表现出了危险的征兆:燃料需求的增长达到10.3%,而开采量的增长却只有4.3%。]

大家看到,到1930—1931年度我们可以增加7570万吨标准燃料。但同时燃料的需求也将增加7500万吨。换句话说,因种种存在弊端的安排而预计在1930—1931年度出现的缺口并没有被排除。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取得某些新的决定性进展,我们就将面临应急燃料储备的缺乏,我们应该赋予我国的燃料

储备像粮食储备那样的军事意义和全国经济动力的意义。

大家看到,在表格中储备的增长发生了变化,储备量微不足道,我们远未达到技术上和经济上在这方面所必需的标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大规模建设工程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925—1926年度正确拟定的,它要求我们大规模地建设矿井,总数达28个,但我们将建设规模逐渐压缩到20个,后来又压缩到17个,下面的表格说明了这一点。

商品名称	实物产品增长率(%)		需求满足率(%)	
	1927—1928年度	1928—1929年度	1927—1928年度	1928—1929年度
各种生铁(实物)	12.2	16.7	95.4	75.1
毛坯和铸块	—	9.4	96.4	69.0
建筑材料				
砖	27.7	37.0	86.0	91.3
水泥	21.7	13.0	96.4	94.3
锯材	7.5	27.3	82.9	90.4
玻璃	9.3	11.6	75.4	82.7
无机肥料				
过磷酸钙	66.8	174.3	—	50.0

燃料平衡的主要数据

	1926—1927年度 (报告)	1927—1928年度 (初步报告)	1928—1929年度 的控制数字 (作为任务)	1930—1931年度 (预测)
(a)燃料开采(单位:百万吨标准燃料)	55.6	58.0	65.2	(75.7)
比上一年增长%	+24.3%	+4.3%	+12.4%	(2年内+20%)
(b)燃料需求(单位:百万吨)(包括出口)	49.9	56.5	62.4	(75.0)
比上一年增长%	+11.2%	+10.3%	+10.5	(2年内+22%)

续表

储备情况(单位: 百万吨)				
1. 1年的积累	+5.7	+1.5%	+2.8	(0.7)
2. 储备的绝对数值(到年底)	22.7	24.2	27.0	(30.5)
1年的增长%%		+6.5%	+11.5%	(2年内+19%)
3. 该年初1个月的充分储备	4.1	4.8	4.7	(4.5)
4. 储备的标准必需值(绝对值百万吨)	25.0	27.0	30.0	32.0

我们现在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补充煤的不足,我们无力进行这种基本建设,只能寄希望于现有的矿井,寄希望于这些矿井产能的扩大。这一情况将导致:(1)未来产量的扩大在一定时间内极为有限;(2)产品成本不可避免地提高。我强调这一状况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提并加快解决采煤业基本建设问题。因此,大家看到从燃料角度来说我们考虑的大概并不是压缩既定的基本建设规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扩大。发展电气化是我们节约燃料的主要希望。我们在储备没有出现应有的增长的情况下,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摆脱这种局面呢?看来可以用当地的各种燃料大量代替顿涅茨燃料,利用水力资源,改变我们的动力平衡的类型。可以实施这项工作的首先是电气化。这方面我们有什么资料呢?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指望取得一定的成就吗?对我们来说这一成就在缓解燃料短缺方面是不是决定性的呢?同志们,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在有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⁴³的工作方面向前推进了很远。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建设的总功率为150万千瓦时的30个地区电站中,现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电站的功率相当于总功率的92%。我们知道,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将不仅在确定的最短期限内完成,而且有可能超额30%完成,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能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经济中的生产中断的重要原因。几年前我们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我下面引用魏茨同志文章中的资料⁴⁴,他将我国的公用电站设施与西欧作了对比。这方面的数据如下:如果说,我们在1925年拥有的电力设施为1个单

位,那么与这一规模相比,美国拥有38个单位,即多37倍;德国9.5个,法国7.5个,英国6.3个;意大利多3倍,甚至瑞典也是我们的1.2倍。正好今年我们的工作出现了某种转折,即一些工程将要竣工,一些新电站将并网发电,各地区的电力供应有望扩大25%—30%。电气化计划实现之后我们的电力供应将有1/3转为依靠水力即水电能源,通过烧泥煤再获得1/3,剩余的1/3将取决于采煤计划和利用燃料平衡表。现在我们在沃尔霍夫水电站每年节约1500万普特顿涅茨燃料,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每年将节约1亿普特顿涅茨燃料。这些数字说明电气化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燃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积极帮助。工业中燃料消耗的增长毕竟十分强劲,所以采煤的作用在最近几年依然是决定性的。由此可见,在我们的燃料平衡表中挤压电气化将是多么危险。我要着重指出,我们今年正在电力供应方面超过瑞典和瑞士,1927年发电量将超过50亿千瓦时,也就是比1913年多64%,在电站功率增加60%即在集中发电的情况下,我们无疑将更合理地使用电站。

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大型新矿井

	1925—1926 年度计划开始 掘进	1926—1927 年度掘进的	1927—1928 年度掘进的	1928—1929 年度 根据计划进行掘 进和装备的	1929—1930 年度
A. 矿井数					
煤井	17	14	11	12	—
无烟煤	11	6	6	5	—
总共	28 个	20	17	17	—
包括 1917 年 前开始掘进的	10 个	5	5	5	—
B. 这些矿井 的开采量					
1. 计划开采量	—	10 万吨	100 万吨	270 万吨	(550 万吨)
2. 实际开采量			10 万吨	50 万吨	150 万吨
C. 基本建设费用:在基本建设费用总数中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3年用去大约2.91亿卢布,实际使用比最初的计划少;大型矿井少用0.344亿卢布,中型矿井用去0.09亿卢布;与此同时,顿涅茨煤田的旧矿井多用了0.565亿卢布。					

在这方面任何退却都是不可能的。有关机构对控制数字通过的电气化任务

的核实证明了这一点。工作规划没有缩小,而是从1.75亿卢布增加到1.84亿卢布。总之,无论在燃料方面还是电气化方面,无论在化学工业方面、建筑材料方面还是生产资料的整个生产方面——以上占基本建设的2/3——我们都不能退却。

在已经开工的建设中资金协调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欠账,不让相当大一部分工程暂时停下来,就无法改变这一情况。用于建设的总额达16.5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资金是怎样分配的呢?今年我们在已经开工的新建项目上支出4亿卢布,现有企业改造支出2亿卢布,简单维持工业能力、劳动保护、住房建设和保障原料基地支出6亿卢布。这样一来,结果是16.5亿卢布被这些极难重新配置的项目占去12亿卢布。工程竣工情况是,1927—1928年度在早些时候开工的工程中有11亿卢布的工程完工和投入使用,1928—1929年度在开工的工程中将有15亿卢布的工程完工和投入使用,也就是说两年中将有26亿卢布的工程作为竣工并投产的企业加入新的经济运转。如果考虑到这个情况,大家就会看到从这个计划后退有破坏整个经济远景规划的危险。

似乎结果是只能进行部分修改,并且进行这些修改的趋势如大家在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再强调老的原则,说工程战线应该压缩到已确定的最低限度,以便在最短期内结束这些或那些已开工的建设项目。仅此而已。

让我们看看,在研究控制数字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建议呢?我们在开始阶段将得到一系列新的申请,比我们的预算资金超出大约7亿卢布。最终结果变化不大。国家计划委员会打算从国家预算中给工业建设拨款7亿卢布。在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后,我们把这一数字提高到7.5亿卢布。现在通过的是8.03亿卢布,并且,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肩负着把成本降低8%的突击任务,那么就会明白现在通过对整个工业的拨款数额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财政资金总数所提出的拨款计划正好一致。由于决定成本降低7%,所以工业资金减少了1亿卢布,因此为了保持预算平衡必须让一些部门让路。结果运输业减少4200万卢布;农业压缩2400万卢布;住宅建设压缩500万卢布等。

大家可以想象这一做法是多么痛苦。

预算的变化更为重要。这方面靠地方预算和各共和国预算以及压缩部门业务款项建立了1亿卢布的准备金。由于我们今年应该为各种经济行动做好准备,所以在国家预算中建立准备金形式的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请允许我着重谈一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讲过的两个重要的突击任务。我们能够胜任这两项主要任务吗,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什么呢?

我谈一谈工业的任务:我们建议今年把产品成本降低7%,这是不是向工业提出过分的要求呢?同志们,我认为这是最低限度的。今年的进展与去年相比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如果大家想一想去年工业实现降低成本5%的情况。因为去年就已提出在工人人数提高4.5%⁴⁵、工资提高7%、劳动生产率提高17.5%的条件下可以把成本降低6%。实际上去年的情况是,工人人数增长了7%,工资增长了10%,劳动生产率不是增长17%而是增长了14.5%。在指标比以前的预测更为不利、存在巨大“剪刀差”的条件下,我们仍然降低了平均5.1%的成本。今年计划工人增加2.8%,工资增长7%,劳动生产率提高17.5%。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令人感到从5.1%提高到7%跨度并不大。其实请大家想一想,1927—1928年度完工的基本建设工程达11.1亿卢布,1928—1929年度又将有15亿卢布的企业和工厂投产,仅此一个因素就会使工业活动发生变化。对出厂批发价格变化的研究使我们越来越相信,迄今为止我们始终低估了我们所拥有的工业改造、工业合理化的潜力。如果我们今年在电力供应方面能用新沃尔霍夫水电站来保障莫斯科的用电,4万千瓦沙图拉涡轮机投产发电,这就是新沃尔霍夫水电站,如果我们把新增的20万千瓦投入全国这个大锅炉,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立即可以取得重大的积极进展。这将使我们消除电力供应间断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负面作用是每个经济工作者都知道的。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工业合理化的实际进程,我们就会在这里看到一个极端分散的战线。我请大家关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苏联工业合理化的一本十分有趣的书⁴⁶……

有人喊:书的篇幅很大。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书中直观地描述了合理化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是逐渐展开的,从改善工厂的工艺流程、个别车间到改善整个企业。一个部门中的企业逐渐被成批专门化;进行部门的集中,向我国工业的合作化;向建立工业联合企业体系迈出了小小的头几步,这些联合企业优越于单个的工厂并且随着每一年的推进其巨大作用和意义也将表现出来。我们一年中在个别情况下取得大于7%的进展。例如在我们刚刚开始推行合理化的化学工业方面,我们去年使产品成本降低了10%。在我们实行连续流水作业的缝纫工业中实行了专门化,进展则更大。但是出于谨慎,同志们,我们在财政计划上将成本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折合7500万卢布。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了相当多的

准备金。任务是最低限度的,这里不能有任何退却,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赶超西方的话。为了评估西方的合理化速度,我列举德国两年内的一些数字作为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讲话的补充。1925—1927年在黑色金属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钢方面提高38%,德国在褐煤方面在两年中取得了增长127%的飞跃。必须记住这一点,这样才能理解国家计划委员会要求的合理性,才能把取决于生产合理化的生产成本降低的根本性进展当作决定整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最重要任务。有意思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这本关于合理化的书中承认,能否实现企业生产既定的发展速度、增加产品数量完全取决于质量指标系数的变化。而在这句话之前书中还令人信服地援引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中的一段话:降低成本是工业合理化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业任务都应该服从于降低成本的任务⁴⁷。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正确地指出,播种面积扩大7%和产量提高3%的任务可以说是比降低成本7%的任务更困难的任务。同志们,这项任务的实际完成情况如何呢?它是那么困难吗,具体数字说明什么呢?我请求大家格外关注这些计算,虽然它们是纯粹的数字,但是却具有十分巨大的实际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1928—1929年度播种面积总共减少了250万公顷。大家都知道这是秋播作物受损的结果,秋播作物减少了620万公顷,使春播作物增加了370万公顷。乌克兰恰恰在重新播种秋播作物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当你们展望有关播种面积提高7%的工作时,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秋播作物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俄罗斯联邦的秋播地大体得到恢复,而乌克兰则大约将少种50万公顷。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意味着已经完成了把播种面积实际扩大570万公顷的工作。扩大7%大致相当于把播种面积扩大700万俄亩。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把播种面积扩大130万公顷就能完成任务。但是在这样计算时不要忘记我们1927—1928年度的春播面积占用了秋播面积。现在我们必须春播作物的面积上恢复秋播作物的面积。如果我们预计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将能够把春播面积扩大100万公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东部地区的春播面积扩大大约500万公顷⁴⁸。诚然,我们在东部地区获得了丰收,但我们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农业恢复得还不够,因此还有土地后备资源。但是播种面积扩大7%的任务要求把东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伏尔加河地区)的播种面积增加10%—11%。这一目标当然不容易实现,但同时我们认为它既是可能的又是必然的。

哪些因素有助于它的实现呢?首先,同志们,我们在东部不存在畜力不足的

问题。我们在产品畜牧业落后的情况下在畜力数量方面比1926年增加了9%多一点。我们的播种面积差不多接近1926年的水平。因此在这方面还有潜力。

此外,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已经报告的那样,投放市场的农具数量相当多,价值3.5亿卢布。其中有播种机、收割机和脱粒机等产粮区正特别需要的机器种类。

同时我们通过提高粮食价格为这项工作创造了一定的刺激因素。这是寄希望于应有的刺激手段的一个十分积极的方面。至于播种的种子问题,恰恰是在这些地区,即东部地区,我们因为丰收而具有最大的潜力。

乌克兰在这方面特别突出。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摆脱困难完全是由于从外部获得了帮助,众所周知对乌克兰政府的这些帮助作了非常明确的计划⁴⁹。

丘巴尔:已有规定。

有人喊:但没有落实。

有人喊[斯克雷普尼克]:去年例外。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充分考虑到了。

我们是否具备某些能够说明增加产量的既定方案可以实现的一些指标呢?增加3%就是把战前的速度提高一倍。但是增加3%对于我早先所说明的远景规划来说只是最低限度。但不要忘记,在评价近几年我国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时应该明确指出,这不仅是“气候的”因素,而且已经表明这里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所指出的一系列积极因素。

同志们,可见我们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这项任务在得到农民应有的共鸣的条件下是能够实现的。假设我国明年不是平均收成年,而是减产年。如果我们在好于平均收成的情况下都得给农民的储备造成一定的压力,如果我们在高于平均收成的情况下粮食状况都如此紧张,那么不难想象在减产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下一个春播运动中没有实现这项任务,我们就有失去数亿普特粮食的危险,我们就可能看到我们的主要国民经济平衡表再次遭到破坏。]

毫无疑问,如果城市的粮食供应状况再次导致对正常的市场规则的破坏,就会出现一个让我们栽跟斗的门槛。这当然会破坏对广大农民阶层提高产量的主要刺激因素。今年应该彻底消除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通过减免税收来给明年上一个保险从而将能够加强农民的经济实力的话,如果我们重新考虑各地新播种面积征税问题,甚至不排除免征新播种面积的税款,那么我认为我们将会在这里找到圆满完成这项任务的新的后备力量。

最后我想请大家注意一项非常值得借鉴的农业试验,我认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大家知道,我们非常坚决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农业的公有经济成分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赋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以及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非常巨大的作用。我不可能详细谈论这个方面,但我想请大家密切关注一个问题。不久将公布大家都知道的乌克兰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工作成果⁵⁰。作为这一工作成果的报告和结论,马尔克维奇同志的一本书⁵¹将要面世。他反对把这个国营农场的经验称为机器拖拉机队的经验。他说,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经验。

丘巴尔:“队”还是“站”,字面上没有改变什么。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不是字面上的问题。马尔克维奇直观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证明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经验正确地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怎样以最少的国民经济开支使广大的农民经济成为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大机械农业的经济。他指出,我们在评价经济类型的时候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在工业上我们十分清楚什么是大工业、什么是作坊、什么是手工业者,而在农业上他说我们常常把富农经济、国营农场和100—150俄亩的集体农庄称为大型经济,忘记只有大型机械设备才能成为我们可以叫作农业“工厂”的经济的基础。只有正确组织的跨村农业动力中心(拖拉机队在这里只是一部分)才能够带来真正受农民欢迎、把他们吸引过来和打击富农威信的效果。这种中心国营农场的规模应该定为40 000—50 000俄亩。影响范围为15—20俄里。在我们的条件下可以将这个中心建成美国肯贝尔⁵²农场类型的经济。周围农民通过舍甫琴柯国营农场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大农业体系的优势,迅速吸引靠的不是强制制度,而是实际的宣传。这个国营农场和它的跨村机器拖拉机站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

丘巴尔:你们根据控制数字将给我们提供多少台拖拉机呢?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们将给多少台,你们和我一样清楚。

丘巴尔:我知道,你们如果不想让国营农场没有拖拉机的话就一个机器拖拉机站也不要建。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我觉得,马尔克维奇和他的同事的经验表明,我们可以用最少的开支消除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剪刀差”。我有十足的把握告诉大家,正是这样将出现农业抛弃自己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动力与工业动力相连接等的形势;将出现列宁说过的情况,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才能够使国民经济产生加速发展的效果,这种效果我们现在也许还想象不到⁵³。

请允许我就此结束发言。

主席:休息10分钟,休息后由古比雪夫同志发言。

(休息后)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重新开始。现在请古比雪夫同志发言。古比雪夫同志要求讲一个半小时。

斯克雷普尼克:怎么样,按计划还是不按计划呢?

主席:谁要求就这个问题发言?没有。通过。

斯克雷普尼克:让他讲吧。

有人喊:是两个小时吗?

古比雪夫:不,一个半小时足够了。两个小时——这太优待了。

主席:请古比雪夫同志发言。

古比雪夫: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审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通过了下述决议:

“(1)基本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计划,其中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共同提出的基本建设工程规模。

(2)批准将成本至少降低7%这一不可动摇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在工业财务计划中予以考虑并时刻监督任务的执行情况。

(3)批准在预算中给工业拨付7.8亿卢布到8亿卢布的补贴。

(4)批准人民委员会关于将公债发行额增至9亿卢布并将8亿卢布列入预算的决定。

(5)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两个月之内向政治局提出关于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周密措施草案和拨款计划。

(6)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制定贷款计划和讨论下一年度经济发展的整个计划时,必须考虑卢布的购买力保持现有的水平。

(7)责成人民委员会在进一步研究控制数字时,专门研究扩大产品产量的可能性问题并在一个月之内向政治局提出报告”⁵⁴。

我认为需要完整地宣读政治局的这份决议,因为这份决议非常清晰地表明了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的整个方针。政治局认为必须严格规定下述要素:基本建设工程规模和为保障这一规模所需要做到的东西,即成本降低幅度和预算拨款总额。这些问题在我援引的政治局决议中得到了解决。我认为,政治局

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思想即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的核心。工业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基本建设工程规模,不仅今年,而且以后几年的工业发展速度都取决于基本建设工程的水平。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的现有决定,都非常明确地把工业置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首位。在我们的所有决定中,社会主义建设和它的速度首先就是取决于工业的发展和增长速度。工业愈向前发展就愈应当加强自身的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地位,它的发展决定着其他部门的发展速度。这里指的是运输、公用事业,特别是农业。只有在农业从工业获得足够数量的拖拉机、机器和肥料的时候,农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够彻底理顺,我们才能摆脱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所讲到的农业极端落后的状况。

为了给自己争取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这一主导作用,工业的发展速度无论在产品方面还是在固定资本方面都不应该降低。为了把工业置于它将决定所有其他部门发展的地位,应该接受工业的高发展速度。

我国经济中有许多我们从过去、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旧结构中继承下来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存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和整个工业的内部。所有这些不平衡只有依靠工业这个杠杆才能消除。工农业增长速度之间的不平衡、农业的落后,也只有依靠这个杠杆才能克服。出口薄弱以及粮食不再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工业没有能力为农业提供足够数量的商品。为了从农村获得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来扩大出口,必须依靠这个杠杆。总之,在我们经济战线上的这个或者那个领域的任何不平衡,无论拿哪个领域为例,都必须认识到如下一点:只有工业的高速度能够克服现有的不平衡。

工业内部也存在不平衡。我们首先在國家的需求和机器的生产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我国经济在战前的结构是:在生产工具方面我国完全依赖外国资本。这是最大的不平衡,它表明我们需要以无产阶级的果敢精神狠抓这一方面,使机器制造业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关注的中心。为了以比我们现在发展机器制造业更快的速度发展机器制造业,我们在金属加工工业的需求和生铁的数量之间还存在不平衡,这一不平衡在以前的报告中曾得到清楚的说明。这些不平衡自然也只有通过加快相应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才能消除。

因此,政治局首先坚决批准控制数字中那些决定国家工业化的高速度、朝着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一步的部分,这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政治局在其决议中基本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数字。在工业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所提出的控制数字,在作了经政治局同意的修

改之后,大体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设想相一致。

计划在作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修改之后,是什么样的呢?

我只谈谈这个计划的一些方面,首先因为给我的时间不足以对计划进行详细和完整的叙述,另一方面因为工业的生产财务计划中的许多内容在前面几位同志的讲话中已作了阐述。我现在简略地谈谈在产品产量方面给我们提出的任务。

今年的总产值应当比去年增加20.1%。我们在我们的设想中就是这样打算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的整个工业的总产值将为130亿卢布,而去年为109亿卢布。130亿的国有工业产值,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根本不让我们感到吃惊了。请大家注意,在1922年或者是1921年从这个讲坛上说出的数字是10亿产值,而且正像大家清楚记得的那样是10亿不太稳定的货币。我们现在有130亿的产值。与战前相比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说不出准确的数字,因为几乎不可能进行与战前作对比的准确计算。且不说我们有新的产业,也不说战前的准确的统计(因为是私有生产)甚至比我们的统计更加不完善,但无论如何可以说我们的产值已经比战前超出了25%—40%。

柯秀尔:就是说,已经超出了?

古比雪夫:比战前产值超出25%—40%。这在一些单个产品方面得到了准确的统计。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中有一张十分重要的表格。请允许我援引它的几个地方。

有人喊:是重要的吗?

古比雪夫:重要的、值得注意的和准确的。

在煤炭方面1928—1929年度我们将比战前提高42%,石油——37%,泥煤——500%。

有人喊:从零到500%。

古比雪夫:不完全从零开始,但这一工业部门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被真正建立起来;电力生产提高了339%;在矿石方面我们比战前少,总共只相当于战前的76%。诚然,这里应该指出,战前的矿石产量是与出口算在一起的。我们的铁矿石全部用于国内生产,如果把国内消费的矿石算在内,这一百分比将会高一些。我们在冶金工业方面为战前的93.2%,也就是说与战前相比存在生产不足。我下面将要谈到提高这一数字方面的前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我们现在为战前的556%,在水泥方面为113%,农业机器方面为261.2%,等等。我不能列举所有

的部门,只再指出两个对于农村市场具有意义的部门:我们在过磷酸钙方面与战前相比为474.5%,在棉纱方面为133.2%,在棉布方面为113.7%。

可见,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在某些部门甚至落后于战前的水平。今年我们要使第一部类,也就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工业部类的产品增长速度高于生产消费品的第二部类。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料情况恶化。由于外汇拮据我们会少进口一些原料,因此1927—1928年度的27%的轻工业增长率对我们来说今年是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能够给所有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设备加足原料的话,原定的增长率就能够大大地提高。然而由于原料限额,我们预计轻工业今年只能增长18%,如果按照与往年的可比价格来算的话。在第一部类方面我们将使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增长22%,而去年为21%。在商品产量方面增长速度大体如下:投放于大众市场的产品增长较慢[我们预计将投放于大众市场的产品增长率为为6%—7%]。

农民将在与去年相比提高产量的方面得到什么呢?当然,这里的计算是十分相对的。我想再三强调这一点。根据粗略的鉴定数据,根据以往几年的经验,城乡之间产品分配大致是:城市占45%—46%,农村分配54%多一点。我们认为今年大约54.8%将投放给农村市场,也就是从投放给大众市场的产品中提供43.49亿卢布。与以往几年相比,这一增幅大约为4亿卢布。

农民的需求,像以往多次指出的那样,在自身结构和性质方面不断发生变化。早在1925—1926年度就曾指出,与过去的1924—1925年度相比,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对轻工业品的需求有所减少。我们在各地区都看到这样的情景:在中央农业区1924—1925年度曾预计日用消费占总消费量的20%,80%是个人消费。但在下一年度日用消费品从20%增长到26%。在白俄罗斯,我们注意到日用消费比重从17.7%增长到27.7%;在伏尔加河地区从20.6%提高到26.8%,等等。

在1927—1928年度出现了同样的进程,这无疑也将发生在1928—1929年度。在农村市场上日用品和生产工具的消费不断增长。

我指出这一事实是想说明,在讲到我国商品短缺的时候,往往错误地以为短缺主要表现在个人消费品上。在城市和农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和国民经济个别部门中,均特别明显地感觉到日用消费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短缺。

现在讲一下生铁的情况。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完全正确地提出了燃料问题,尤其是煤的问题;大家知道建筑材料严重缺乏;大家知道在农村市场上各种铁制品严重缺乏:房盖铁、钉子、盘条,等等。大家知道农村现在渴望得到拖拉机

和某些农业机器。总之,农用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和所有领域中都极为短缺。

应该怎样消除这种短缺呢?相关工业部门提高产品产量自然是消除所有领域的短缺现象的唯一的办法,而且相关的工业部门要提高产品产量首先必须靠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本、靠生产合理化、靠更加合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料,第二个途径是靠提高固定资本、靠提高固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能力,从而增加额外产品。

我想通过我们现有的关于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建议说明一下我们提高和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本的可能性,在控制数字中制定这个生产计划是为了更好地供应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大家一定还记得,我所引用的那份政治局决议指出:人民委员会在最终批准工业计划时特别注意额外生产产品的可能性。政治局的这份决议是及时的和正确的。完成这项任务的最初尝试已经表明,在把我们的工业资金进行一定集中的情况下,在生产保持一定的活力和生产合理化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在某些工业部门中提高产品生产数量,提高的幅度大于我们在控制数字中所规定的数量。

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政治局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选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⁵⁵,委托其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为政治局的这个委员会准备材料。这方面的初步的汇总材料表明,差不多在所有工业部门都具有提高产量的潜力。

我首先讲一下黑色金属这个短缺最严重的工业部门,由于这个工业部门存在短缺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引发了最为严重的负面结果。原先预计我们今年将炼出378.7万吨生铁。这意味着我们今年就能够达到战前产量的9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早在批准控制数字之前,在发现生铁严重不足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系列步骤。И.柯秀尔同志去了南方冶金托拉斯这个生铁的主要供应单位,并就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给托拉斯提出了相应的任务。随后黑色金属工业总局局长洛卡茨科夫同志对南方冶金托拉斯的所有工厂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巡视。计算了乌拉尔、中央工业区、巴什基尔工厂等的潜力。结果经过这些计算我们认为我们今年能够把生铁产量至少提高27万吨。这样我们将生产大约410万吨,而不是378.7万吨。我们向相关的托拉斯提出了这项任务,而且我确信,只要相应集中精力和意志,对这个问题采取内行的态度,使所有生产过程合理化,使用(开发)一些由于生产造价高昂而没有被我们投入使用的联合机组,集中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开展收集废金属的运动,我们就将拥有这个大体上接近黑

色金属战前水平的数字。

许多同志,包括黑色金属工业总局局长洛卡茨科夫同志在内,都认为可以提出更大的任务。但是在这方面应该小心谨慎,因为在这方面犯下的错误将会在其他工业部门当中播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能打乱它们今年的计划。从夸大的和不现实的数字出发是极端危险的。所以我们确定这个数字——提高27万吨——并认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大家可以看到,甚至在国民经济的这个最薄弱的环节也还没有利用我们现有的全部潜力,固定资本还没有被加满负荷。随着生铁产量的提高,轧材量和金属加工量也将提高,这是完全自然的。

关于其他工业部门,我们认为在石油方面大概不能够增加负荷。但是无论如何在这方面还应该非常仔细地摸索,也许我们能在这方面获得比计划多一些的开采量。

在煤炭方面的情况比金属方面困难得多,但是显然在煤炭方面也能够取得一定提高。再讲讲几个生产部门的情况。如果我们在拨款方面能够筹到足够的资金并且供应工厂必需的金属,农业机器制造业能够增加大约2700万卢布。在电机工业方面产量可以比预计增长速度提高6%—7%,但是在这里我们将面对有色金属的限额,这一限额也许使我们无法实现这一增长。在森林工业方面,只要给森林工业提供相应的流动资金并且进行不大的投资,就可以大大提高木材的产量,以满足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需求。在建筑材料方面,生产建筑材料的国民经济部门大概可以大大增加所有种类建筑材料的供应。

斯克雷普尼克:钢梁呢?槽钢呢?

古比雪夫:它们与黑色金属有紧密的联系。只要黑色金属增加,它们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显然今年未必能够根除钢梁和槽钢的短缺。

总之,在建筑材料方面我想指出,在生产建筑材料的国营工业方面、手工业合作社方面,在建筑材料的私人生产方面,与我们制定的控制数字相比,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

总的来说,应当如何评价在扩大产量方面将能够做到的事情呢?我认为这不是最后的计算结果。我们将向政治局的委员会呈报这份材料,该委员会将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从事这项工作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预计,工业产量大体上能比此前所计划的增长率再提高大约3%。但是为此需要一定的条件、应该克服一系列困难、应该在工业内部和外部筹到额外资金,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如果能够获得这些资金,那么就能够在产量再提高3%左

右。这将意味着商品产量提高大约3亿卢布。我列举这些意向性的、粗略的、并非最终结果的数字,只是为了说明,提高产量的途径不仅仅限于建设新的工厂和对现有企业进行大改造。提高产品产量和消除个别商品短缺的途径也包括克服我们的各个生产部门、合理化、生产、生产合作化、工厂专门化——总之生产合理化的所有措施中存在的、不协调、混乱和薄弱的环节,通过这个途径可以比此前的预计更多地提高产量。如果真的能够增长23%,而不是20%,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根除短缺、根除商品不足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不彻底重新装备我们现有的所有旧工厂,只靠已经满负荷的固定资本,每年增长几十个百分点是不可能的。但是新工厂已经在提高由工业投放给市场的产量方面开始占据相当大的分量。我将专门讲新企业的情况,现在我只指出,光是1928—1929年度投入使用的工厂就将提供大约2亿卢布的新产品,而将在1928—1929年度投入使用的、所有新企业和在此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企业在1928—1929年度将一共给国家提供4.78亿产品即将近5亿卢布的产品。因此,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建造的、近些年投入使用的、新工厂、新企业已经能向市场提供5亿卢布的产品。

我现在谈谈基本建设工程的问题。首先是一些总指标。简要讲一下每年投资增长的情况。大家大概都非常清楚基本数字:1925—1926年度投入8.11亿卢布,1926—1927年度为10.9亿卢布,1927—1928年度为13.3亿卢布,今年预计投入16.29亿卢布。这些数字有可能与你们手头材料中记录的数字不太吻合,这是因为在研究控制数字的过程中作了改动。

大家可以看到投资在逐年增长。1926—1927年度的增长率非常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1926—1927年度实质上是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头一年。当时基本建设工程量与1925—1926年度相比增长了31%。去年与1926—1927年度相比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我们的增长率是22%。今年我们的增长率将是24.7%,如果把电影工业计算在内,增长率还会更高一些。总之,增长率与去年相比有所提高,我们没有放慢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增加的速度,我们今年甚至还使这一速度略有提高。今年基本建设工程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工业方面是这样分配的:我们把全部基建投资的76.8%拨给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23.2%拨给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第一部类,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百分比今年与去年相比有所提高,去年为71%,现在我们把它提高到76.8%,将近77%。这么做对不对呢?我们每年提高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资金的百分比,这对不对呢?1925—1926年度是66%,然后1926—1927年度是

70%，然后去年71%，现在将近77%。我认为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政策，因为大家很清楚国家的工业化首先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部门的增长，因为摆脱对外国的依赖、保障工业的主导作用以及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提供更多数量的煤、石油、金属、化学产品等。今年我们还要提高投资率，因为需要对生铁不足作出反应，需要增加对建筑材料和化学工业等的拨款。

我不想让你们因为给各个工业部门分配拨款而犯难。我只是请你们注意两三个工业部门。在煤炭工业方面，如果拿1928—1929年度计划的工程量按可比价格来说，我们将比去年提高25%。诚然，如果拿我们计划的即被降低15%的建设价格来说，这有所减少，但是如果拿工程量来说，那么我们将提高25%。

在冶金工业方面，在黑色金属方面，与去年的1.98亿卢布相比，我们今年将有2.445亿卢布，从而在工程量上又增加23%。

我们将使化学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使化学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量增加一倍多。去年为5600万，如果拿碱化学来说，今年将为1.34亿卢布。

木材方面的增加也相当大。这一增加甚至由于最近给予林业的额外拨款而与表格中的数据也有所不同。

在电机工业方面，我们比去年增加36%，在有色金属冶炼方面增加41%，等等。

在轻工业各部门这一百分比稍微低些。在纺织工业方面，如果拿最近作出的修改来说，我们将接近去年的水平。

我必须简要地讲一讲纺织工业。我想，你们不会认为我维护纺织工业是背离国家工业化的路线。

乌格拉诺夫：非常好。

[乌加洛夫：怎么能右倾呢？]

A. П. 斯米尔诺夫：你会毁掉自己的声誉。

古比雪夫：我还是认为必须维护纺织工业。

我们大大地削减了给纺织工业的拨款。我曾经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表示，自己无法为扩大纺织工业基本建设工程规模筹划资金，因为对基本建设工程量作了总的限制。我不能建议削减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或者燃料工业，但我认为给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工程规模明显不够，我们今年将不得不重提这个问题。问题在于，有两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考虑到。第一种情况是纺织工业的动力设备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动力设备无论如何也需要大

量投资。今天诺索夫同志给我看了一份发自特维尔的电报,说那里一台2000千瓦的机组停止运转,因此工厂肯定得停工。如果不向这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的话,蒸汽动力设备发生故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此外,需要注意到纺织工业与机器制造业紧密相连这一状况,在许多情况下对纺织工业基本建设工程规模的削减意味着我国纺织工业和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还没有得出准确的计算结果,但是我非常担心,由于基本建设工程资金的减少,纺织工业无法订购以前列入其计划的设备,而使我们列宁格勒的工厂、图拉的工厂、科夫罗夫的工厂、克利莫夫斯克的工厂蒙受损失。这样一来,就会损害我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从而带来巨大的危险,这大家都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得不压缩好不容易在一些工厂和一些企业组织起来的纺织机械制造业的话,这将意味着当我们明年能够大力发展纺织工业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求助于外国市场。因此,虽然我不认为能够对提交人民委员会的控制数字在这方面作出某些修改,因为我知道基本建设工程的这个限额、这个规模、这个数量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再多的话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力所不及了,从重工业各部门削减一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显然,在年中的时候,比如在第二季度,最终还要重谈纺织工业的这个问题,以便能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修正。

斯克雷普尼克:靠什么呢?

古比雪夫:纺织工业的建设完全靠自己,所以如果纺织工业有不仅足以履行预算所赋予它的义务的资金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些剩余,可以用剩余的资金来扩大基本建设工程规模。这显然将是现实的。

在这个问题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果讲必须更多地生产农业机器和增加拨款以使在建工厂更快完工的话,那么必须根据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的情况来解决额外扩大基本建设工程规模的问题。

现在我想讲讲基本建设工程的方针。今年拨出的大笔资金用于什么种类的基本建设工程了呢?应该指出,用于大修的开支份额逐年减少。1925—1926年度19%的资金用于大修,1926—1927年度——13%,1927—1928年度——9%,1928—1929年度预计为8.6%。扩建和改造也呈一条向下的曲线,虽然绝对数量逐年增加;但是新建工程呈迅速上升之势:1925—1926年度为12%,随后两个年度分别为20%和27%,1928—1929年度将达到31.8%,也就是说今年拨出的资金有大约三分之一将用于新的企业。

在这里应该消除一个经常出现的误解。在讲到用于新企业的资金的时候,许多人认为我们打算开工建设大量的新工厂。31%意味着5.32亿。当然,如果

我们今年把 5.32 亿花费在新建工厂的话,这将是错误的资金分配。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将在新建工厂上花费 1.22 亿,而剩下的数额用于继续建设的新企业、矿井、炼油厂、石油管道等。我们将提高对科研工作的投资比例(这个事实必须指出):1927—1928 年度为 1.8%,今年将达到整个投资的 4%,即我们把 6 800 万拨给科研工作。

斯克雷普尼克:这只是根据联盟的预算,没有把各加盟共和国算在内,是吗?

古比雪夫:这基本上是根据联盟的预算。此外,用于其他部门的科研工作的开支也没有算在内。这里完全没有包括教育人民委员部。这是一些工业研究所。这里包括我们用于基本建设,也就是用于在各地建造新研究所、新实验室等的费用。

丘巴尔:可这些钱中没有给我们分文用来开展基层的工作。

古比雪夫:住宅建设依然差不多停留在同一个百分比水平上,并且人民委员会最近经政治局批准的一份决定⁵⁶还将这个百分比有所削减。住宅建设显然在绝对数量上依然差不多停留在去年的数量上,但是在总规模中所占的百分比将有所下降。如果一些地方的比重需要提高,那么另一些地方的比重就得下降。如果我们停留在以前的绝对数量上,这并非表示应该向每个托拉斯和工厂必须投入去年那么多的资金。当然在各地就是这样分配的:有的地方提高,有的地方减少。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讲过基本建设工程的完工使用问题。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讲几句。大家记得,去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额为 13.3 亿。今年完工的基本建设工程为 11.74 亿,也就是说在大修、重新装备和新工厂等方面完成的基建投资为 11.74 亿的基本建设工程。这一切不是固定资本价值的增加。这只是表明前些年开工的基本建设工程的完工迅速。因此,完工的基本建设工程的这些数字相当于今年新支出的 98%。明年我们将支出 16.5 亿用于工厂建设,包括大修、重新装备、新建工程等,而 15.57 亿投入生产,相当于我们用于基本建设工程总金额的 94%。这里不应该理解为:在我们今年支出的 16.5 亿中我们在生产中使用 15.57 亿,使用的是去年建设的東西。

有人喊:主要是。

古比雪夫:当然主要是靠去年建设的東西。这一对比从下述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国民经济的平衡来说极端重要的是知道,如果你们今年向基本建设投入 16.5 亿,那么你们今年将得到同样的价值即现成的工厂、大修过的工厂、重新装备过的工厂等。既然完工的基本建设工程的百分比年复一年地提高,履

该认为这一情况是可喜的和进步的。轻工业方面的情况甚至是,今年轻工业在建的基本建设工程的量比今年将要完成的工程量小。这是因为我们在轻工业方面几乎没有上任何新工程,我们只是继续已经开工的工程。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新完工企业的情况,就会得到一组饶有趣味的数字。首先,关于新建工程。用于新建工程的支出为:1925—1926年度4500万,随后两个年度分别是8400万和7300万,今年如我所说的——1.22亿。这是用于今年刚开工的新工厂。今年开工的工厂价值为:1925—1926年度开工的总价值即最后价值为3.75亿,1926—1927年度为3.95亿,去年开工的工厂价值为1.98亿,这几年我们开工的大型新工厂不多,而我们今年开工的工厂价值为4.22亿,也就是说今年向新建工程投入1.22亿,我们打算在以后几年额外拨出3亿卢布。如果注意到前几年开工的工厂仍然没有完工,那么以后几年在新建工程方面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1928年1月1日前新建企业中有83座工厂投入使用,总价值为3.32亿。这些工厂中一部分是部分地投入使用。明年一年投入使用的新企业的总价值为5.49亿卢布,这些企业的总产值为5.64亿卢布。它们在1928—1929年度将提供1.87亿卢布的产品,因为它们将在一年内、大多数将在年底完工。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前已经投入使用或者今年投入使用的所有新企业今年将提供大约5亿额外产品。这些企业明年将提供的已经不是5亿,而是10亿卢布以上的产品,它们的总生产能力为18亿卢布。因此,在今后几年,当它们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它们还将生产更多产品。因此,即使不算1929—1930年度将开工的一系列新企业,那么已经投产的新工厂和1928—1929年度将投产的新工厂在满负荷的条件下也将给国家提供18亿卢布的新产品。

所有这些数字说明,新建工程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正在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一个在不断增长的数字,这个数字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引起党、国家和工会的所有机关的注意。我请大家注意,在1928—1929年度和以后几年,将要建成的新企业每年用一卢布投资生产的产品将超出一个卢布。很可能,如果要详细分析这些比例,这些比例也许还显得不够,但是它们至少说明这些投资是合理的。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讲到了基本建设工程总规模中直接用于提高产品产量、降低成本等的资金。请允许我从这个角度分析一下在1928—1929年度之前的这三年中进行的投资。不算电气化,总共向工业投入了32亿卢布。在这32亿卢布中,5亿卢布用于住宅建设、安全技术、卫生保健和消防工

程等。投到住宅建设、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上的资金,自然会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产生间接的影响,但是不应把这些资金看作影响工业效益的直接因素。

在多数情况下为使生产保持在已达到的水平上需要进行矿山作业、钻探作业等,这些作业花费了大约3亿卢布;日常维护方面的各种工作用去4亿卢布。这样,我们有12亿卢布用在极端重要的需求上,这12亿卢布只是对企业的效益和整个制度产生间接影响,在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方面没有直接带来巨大的效果。还有17亿卢布,其中7亿卢布用于新建工程,10亿卢布用于改造。新建工程中有3亿卢布的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改造工程中同期有7亿卢布的工程已经交付使用。这样,我们现在有了10亿卢布。这10亿卢布是一个基础,能够使工业在生产的量的增长方面、产品产量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在工业工作的质的改善方面取得目前还不够大的成绩(下面我将讲到这个问题)。

有人喊: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古比雪夫:怎么是两个小时呢?总共1小时零5分钟。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不反对休息,但休息后再给我1个小时作为奖励。(笑声)

喊声:休息!休息!休息后再给1个小时。

主席:有人建议现在开始休息,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晚上继续进行。赞成这项建议的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少数。那么休息到6点。

第三次会议

11月17日晚间

主席(加里宁):请允许我宣布全会会议开始。现在请古比雪夫同志作报告。

古比雪夫:在对基本建设作了概述之后,我想谈一谈个别的生产部门和具体的计划,谈一谈这些生产部门的产品生产和基本建设工程。

我从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农业机器的生产讲起。大家知道,我国工业在农业机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业机器制造业计划的逐年完成情况是:1925—1926年度——7 200万,1926—1927年度——9 200万,下一年1.31亿,今年的计划为1.69亿,并且1926—1927年度我们达到了战前的120%,1928—1929年度我们将达到261%。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超过控制数字中现有的数字。比如,在农业机器制造业方面有可能少许提高预定的数字。根据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数据,对农业机器的需求比计划所规定的产量超出2 900万卢布,也就是说需要把控制数字为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制定的计划提高2 900万卢布。鉴于农业机器的进口由于外汇短缺而极其有限,现在正从提高这一数字的可能性的角度、从满足农业机器制造业的需求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农业机器制造业的计划提高2 000万—2 100万是能够实现的。还剩下800万—900万卢布,无论如何必须生产出这些产品。目前正在这方面进行某种探索,我认为,在集中一定力量、对资金进行一定的重新配置的条件下,这项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在成本方面,工业中农业机器制造业也是最先进的。它不仅在其他工业部门当中几乎是创纪录的,而且在低成本的情况下产品的增长也是创纪录的。1925—1926年度我们出售农业机器是亏损的。如果价格算作100,那么卖掉的机器为114。1926—1927年度亏损小一些——107:100。1927—1928年度可以

算作“一个换一个”，稍微有点利润，1928—1929年度如果我们能够完成控制数字所规定的所有任务，如果把价格算作100，那么成本将为93。诚然，大家知道，农业机器是按照战前的牌价出售的，没有打折扣。

1929—1930年度将有可能降低农业机器的价格并且仍有可观的利润。可见，在农业机器方面进行的合理化和降低成本的工作比其他工业部门更有成效，并且极为重要的是，对农业机器的投资相对来说不大，虽然投资在逐年提高。我们在1925—1926年度有1400万卢布的基本建设工程，下一年为1300万，也就是稍有减少，然后是2000万，今年预计为2440万。我不打算列举对各个工厂的投资，只是指出在2440万这个数字中新工厂所占份额最大，尤其是罗斯托夫工厂，如果按照去年的价格计算，它获得1000万卢布的投资。下面我谈一下新工厂。

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于1926—1927年度开始建设，预计1931年竣工，总投资4500万卢布。1928年前用去1300万卢布。考虑到建设成本的降低，预计今年的开支为950万。以后的几年还剩下2200万卢布。米高扬同志反驳了我一句，说不多。这里一切问题在于消化需要更多资金的技术可能性。另外还在于害怕、担心在该厂的生产特色方面犯某种错误。

我去了政治局，建议就罗斯托夫工厂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⁵⁷，因为工厂的计划是在农民对农业机器的需求具有另一种结构的时候制定的。现在，当我们大步走上建设大型国营农场、谷物农场的道路的时候，当农民经济集体化更加迅猛地发展的时候，显然需要看一下我们是否正确地确定了这个工厂的产品，而它应该生产犁、收割机、拖拉机拖车、农用车轮，——极有可能在不彻底改变计划的情况下向更加复杂的农业机器转变。为了确定这个工厂的特色，我认为现在必须组织一个能最终确定工厂产品目录的委员会，以使产品目录符合对农业机器的需求特点。因此我认为应该十分小心地给这项工作提供资金，因为如果我们把大笔金钱仓促花在差不多三年前制订的那个计划上的话，就会犯下一个以后很难纠正的错误。所以我不反对为了更加集中的建设而给这个工厂增加一些资金的可能性，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对这种情况进行核实。

如大家所知道的，拖拉机方面的情况非常糟糕。拖拉机制造业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建立的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我们目前仅生产几百台拖拉机。去年普梯洛夫工厂制造了大约1200台拖拉机。它未必能够生产得更多。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生产数十台拖拉机，个别工厂生产的拖拉机仅为个位数，比如科洛缅斯基工厂在停止这种生产之前就是如此。无疑，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开

展这项事业。目前在斯大林格勒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普梯洛夫工厂正在扩建。我讲一讲普梯洛夫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应该在1930—1931年度,在工厂的相关部分彻底改造之后,年产10 000台拖拉机。普梯洛夫工厂1928—1929年度的生产计划为3 000台,也就是说提高了1倍多。

有人喊:只有2 400台。

古比雪夫: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计划确定为3 000台。我坚信,原先制定的2 400台拖拉机的计划将被超过。我相信,只要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将能够达到3 000台拖拉机这个数字。这在技术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里需要的只是克服因循守旧,把一大批别的工厂吸引过来并使它们相互协作。从列宁格勒人是如何着手做这件事来看,我认为1928—1929年度普梯洛夫工厂能够生产3 000台拖拉机。下一年度增长将会加快,达到5 000台,而1930—1931年度工厂应能生产10 000台拖拉机。普梯洛夫工厂的整个改造工程将耗资2 100万卢布。今年拨款740万卢布。普梯洛夫工厂的产品目录将是单一的。工厂将生产20马力的“福特”牌拖拉机。有人在谈话中提出了普梯洛夫工厂的产品目录的问题。一些同志对我讲:我们永久性地生产这种型号的拖拉机是否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工厂建成后是用来生产这种型号的拖拉机的话,产品目录的改变就将需要新的投资。一些同志表示怀疑:这种功率的拖拉机是否能满足需要,现正在建设大型国营农场,“福特”牌的作业与功率更大的拖拉机的作业相比,是不是不太经济?甚至乌克兰有一位好像叫马尔克维奇的教授还写了一篇文章。

丘巴尔:马尔克维奇不是教授,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国营农场托拉斯的一名工作人员。

古比雪夫:比如,马尔克维奇同志的意见……

茹柯夫:他是乌克兰人吗?

古比雪夫:他说,乌克兰的经验表明这种型号的拖拉机根本不经济,“国际歌”牌拖拉机比普梯洛夫的拖拉机经济,他还列举了数字——差不多是12倍。因此很有可能发生两个地区的生产竞争。

[丘巴尔:我们没有建设,我们在使用别人的东西。]

古比雪夫:应该非常认真地审查这场竞争。我个人认为,如果证明20马力的功率满足不了大型国营农场的需要,那么就应该修改普梯洛夫工厂的计划,但应注意到,集体农庄、单个的小型国营农场等将需要功率不太大的拖拉机。我认为,三年之后每年10 000台拖拉机将是一个不太大的拖拉机份额,这种型号显然也将能够找到广阔的销路。更为复杂的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问题。

这个工厂的拖拉机的功率也被设计为20马力,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完全自然的问题:趁还没有错过时间,我们是否应当及时转向呢?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实质上还没有实施其建设计划。目前已花费了340万,主要用于设计和各种准备措施,用于住宅建设等。设计的功率是否合理,还有时间考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初为斯大林格勒厂设计的功率为30马力,这也是比较早的事了,在推行积极的和具体的建设大型国营农场的路线之前。也许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犯了一个错误: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设计从30马力修改为20马力⁵⁸。我认为应该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时间是有的,在新的建设季节开始之前应该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将耗资4200万卢布,已经开支340万卢布。今年我们额外提供1400万卢布。

有人喊[米高扬]:年生产率怎么样呢?

古比雪夫:两班20000台。我们按照不变价格提供1400万,考虑到降低的建设费用——1290万。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对这个工厂大笔拨款是不适当的,光是在技术上就很难利用大量资金。

请允许我就提高农业机器制造业产量再讲几句。我说过,我们提出了把生产与以前提出的水平相比额外增加2000万卢布的任务。1400万卢布的额外产量落在乌克兰农业机器制造托拉斯肩上,奥廖尔工厂的计划也将大大增加,沃罗涅日选种机厂将把其年产量扩大到10000台。

现在谈谈其他生产部门。请允许我从工业的心脏——电能讲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经讲到发电量和新增装机容量的迅速增长。所以我不打算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只是再次指出,与1913年的19.45亿千瓦时⁵⁹相比,1928—1929年度发电量将达到66.2亿千瓦时。大家可以看到,增长是巨大的,并且这一增长主要是靠地区电站和公用电站。厂属电站也在发展,但是速度相当缓慢。发电站的装机容量与战前相比也大大提高。

我想讲讲今年的具体的电站建设计划。我没有时间详细地说明该计划,请允许我只讲一讲现在处于施工中的最重要的新电站。首先,我们已决定建设斯大林格勒地区电站。这个问题曾长期处于不决状态:有时被否定,有时被肯定;最终我们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并且经政府批准,即:斯大林格勒地区电站应该在今年开工。需要这个电站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格勒的工业每年都在发展,另一方面当地正在建设的新工厂也将需要大量的能源。劳动国防委员会允许在莫斯科附近建设一个利用莫斯科产的煤、利用莫斯科附近煤田的煤发电的电站。的确,1928—1929年度我们无法着手这座电站的建设,根据我

们的计算,没有这个必要。今年应该大力进行电站的设计和筹备,以便在1929—1930年度能够准备十足地迅速着手建设利用莫斯科附近的煤发电的大型电站。

位于顿巴斯的祖耶夫斯克电站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年不会动工建设,但建设电站的准备工作应该立即开始。

现在再谈谈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我不准备详谈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现在进行的工作的特点。我只是说明一点: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年半的工作经验使我们确信我们在技术上能够胜任这项任务,施工在技术上完全合乎要求并且达到优良标准。不仅如此,电站的建设工程期也令人满意,一些方面的工期被提前。所有到过第聂伯河水电站工地的人无不那里的建设工程规模、为十月革命11周年之际在那里竣工的宏伟建筑而惊讶不已。已经开始水坝的混凝土浇筑。美国专家曾经怀疑在新的建设季节前着手建设水坝的可能性。我们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们表明他们善于工作(并且善于迅速地工作),而且现在已经奠基。看来,第聂伯河水电站将如期竣工。

第聂伯河水电站遇到一个困难,一个我们所有的新建工程都遇到过的困难,这就是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预算将超过预先的设想。这一预算还没有被最终批准,但是与原先拟定的1.6亿卢布相比,它达到了2亿卢布。

由于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暴露出许多巨大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应该尽快得到解决,并且应该在所有上级机构和所有相关机构中进行仔细的讨论。还有关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用户的问题,关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电力输送线路的方向问题。计划把第聂伯河的电能输送到顿巴斯。

斯克雷普尼克:一个没有足够根据的计划。

古比雪夫:另一方面,有一个设想是把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用户集中在该电站周围。我不会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那样现在就赞同某一个方案。但是我认为,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在举出十分重要的和有分量的论据之后,在座的人中谁也不能现在就说第聂伯河水电站和顿巴斯联合是不适当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在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作了相当大的修改——这个方案的提出并未否定应该建设附属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用户联合企业。此外,这个方案也不是建立在顿巴斯的电力设施不应该得到发展的想法之上。既应该建成附属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联合企业,也应该建成相应的电站和提高顿巴斯的电力设施的发电能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第聂伯河水电站和顿巴斯的联合才不会具有以前有过的争议性。

丘巴尔:这是烟幕。

古比雪夫:这已经是期限问题——应该什么时候这样做,一方面不会给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用户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不会中止顿巴斯的正常的电力供应。无论如何,我们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一致决定应该扩建什捷罗夫电站,在那里安装两台功率为44 000千瓦的涡轮发电机。所以这不是烟幕,而是实际的步骤。

所以我认为,不能反对第聂伯河水电站和顿巴斯联合这样的重大问题。通过联合将会获得巨大的效益——互为后备,并且顿巴斯将恰恰在它的电力供应特别紧张的时候,具体说就是在春季,在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电能大大超过它的用户的需要的春汛时期,获得第聂伯河水电站这样的后备。

扎东斯基:会少一些。那里的水平在提高。

古比雪夫:扎东斯基同志,我不是技术人员,但这是我从技术人员那里听来的,所以我无法说你们之中谁正确。

斯克雷普尼克:而这将额外花费多少呢?

古比雪夫: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到顿巴斯的电缆将花费2 800万卢布。

斯克雷普尼克:4 000万。

古比雪夫:但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降低费用,这个数字有可能降低。我现在不想维护这个或那个。我只是提出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不能采取轻信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因固执己见和坚持原先的立场而否定它。我们将面临这个问题。政府打算在12月研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使用问题。显而易见,应该在这之前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是不从固执坚持原先的立场,而是从乌克兰的整个经济真正发展和我国南方拥有的这座大型工业联合企业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全面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太好了。

还有一个与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在第聂伯河附近建造一座实力雄厚的黑色金属冶炼厂。这个问题也极有争议,但是也有很多“赞同”的理由。这个问题应该仔细研究。黑色冶金业工作者以前对待这个问题的否定态度现在已有所改变。一些著名的冶金专家也表示“赞同”。这两个问题应该进行研究并得到解决,建设克里沃罗格工厂的开工日期问题也将由此得到解决。

丘巴尔:它和扎波罗热……

古比雪夫:我认为,克里沃罗格工厂本身将保留下来,但是如果承认开始建设另一座工厂是必要和适当的,那么建设克里沃罗格工厂的开工日期将会改变。这些问题作为我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最重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关于顿巴斯我已经说过,我们今年将着手扩建什捷罗夫电站,那里现有的电

站不算在内。祖耶夫斯克电站应该进行设计,但是没有确定今年动工。

现在谈另一个地区——中央工业区。正在建设装机容量44 000千瓦时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电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电站的建设需要加紧进行,因为这个地区能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下诺夫哥罗德电站。那里也已经开始建设。

有人喊[米高扬]:排在第三位吗?

古比雪夫:是的,排在第三位。这已经列入了1928—1929年度的计划。利亚平斯克电站。

有人喊:在哪儿?

古比雪夫:在弗拉基米尔附近。

今年在乌拉尔基泽尔电站将全面开工。这座基泽尔电站的建设一波三折。一段时间曾把它列入地方电站,因此拨款被大大削减,工程被延期。今年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基泽尔电站将建造成地区电站,并且工程应该全力以赴地进行建设,基泽尔电站的建设将是乌拉尔大型电气化工程的开始。显然,基泽尔电站应该与斯维尔德洛夫电站联合起来,这将为在乌拉尔形成电力网打下基础。

北高加索在继续建设沙赫京斯克、新罗西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蒸汽电站和吉泽利-顿河水电站,而且我们最近决定今年应该开始建设位于卡巴尔达的巴克桑河上的巴克桑河电站。吉泽利-顿河电站和巴克桑河电站将为实现矿水城地区铁路区段的电气化设想提供机会。这些地区的地方工业也将获得便宜的能源。

关于全面建设斯维里河水电站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今年根据国家预算给斯维里河水电站拨款1 000万卢布,并且,如果列宁格勒人能够再找到补充资金,那么今年给该电站投入1 200万卢布是比较适当的。我不打算谈其他或者正在施工或者今年开工的电站。我只是想说明,我们正在以增建的名义进行极其宏大的供电工程。我亲自到过在列宁格勒乌特金湾的一个小型增建工程。这个增建工程在装机容量上是现有电站的3倍左右。

有人喊:这是把上衣缝到纽扣上。

古比雪夫:是的,但这不是新电站。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沙图拉电站的装机容量也在增加。前不久44 000千瓦的机组开始送电。卡西拉电站的装机容量在扩大。显然,这些增建工程比建造新电站更经济。根据预算我们总共给电气化拨款1.84亿,而加上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和列宁格勒国营电站联合公司的投资,总数可以达到2.8亿卢布。

有人喊[米高扬]:不包括厂属电站吗?

古比雪夫:是的,不包括厂属电站。

现在谈谈生铁问题。我已经说过生铁不足和今年为提高生铁开采量而已经采取的措施。对黑色冶金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动情况如下。把南方矿业托拉斯计算在内,1926—1927年度向黑色冶金业投入9700万,不把包括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在内的各机器制造厂的黑色冶金业计算在内,1927—1928年度为1.93亿,1928—1929年度为2.35亿。我在报告的开头向你们说是2.44亿。这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建设费用的降低,而现在给出的数字是建设费用降低后的数字,而且应该说最初在控制数字中为2.22亿卢布。最近有所增加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现有工厂开工建造新的高炉和开始建造平炉。黑色冶金业的最终数字还没有得到批准。目前只确定了对个别托拉斯的拨款。

现在谈一下黑色冶金业的新工厂。我们今年的计划是,除了继续已经开工的项目外,再开工建设两座新的大型冶金厂。这首先就是捷里别斯工厂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捷里别斯工厂在西伯利亚的库兹涅茨克区。全苏名声显赫的刻赤工厂……

有人喊:不好的名声。

古比雪夫:它以建设费用高昂而闻名。看来,到1928—1929年度或者在1929—1930年度初它将提供生铁。但是这将只是一个高炉,建设将继续下去。最终的满负荷投产要到1930—1931年度。新工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和库兹涅茨克工厂,实际上在今年开始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花费的数目不大,总共大约100万卢布。这主要是用于设计和各种勘察。今年我们给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拨款500万卢布。

有人喊:整个工厂将花费多少呢?

古比雪夫:我马上就说。工程的竣工时间为1934年。这是最后完工的时间,也就是生产能力全部形成的时候,开始投产的时间为1932年。生产能力为65.6万吨生铁,工厂的造价为1.24亿卢布。

有人喊:算上铁路吗?

斯克雷普尼克:不,不算。

古比雪夫:这不包括铁路支线,因为这要按照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另行建设。

斯克雷普尼克:对啊!

古比雪夫:工厂的产量用货币表示为每年7000万卢布。目前仅用了100万。今年预计500万,在以后几年应该用掉其余的部分。关于这个工厂存在许

多争议。但是从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插话来看,他显然反对建设这个工厂。但是我认为他的反对意见的特点是清楚的。

斯克雷普尼克:是什么呢?

有人喊[米高扬]:乌克兰人的。

斯克雷普尼克:计算缺乏计划性。

古比雪夫:我知道,许多乌克兰人认为应该首先动工兴建克里沃罗格工厂,而不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反对意见:理由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不得不从2 000俄里之外的库兹涅茨克煤田运煤。

什维尔尼克:我们现在也在运。

古比雪夫:我还想指出的是,把煤从库兹涅茨克煤田运到乌拉尔并不是新闻。

有人喊:对。

有人喊[米高扬]:你们不是第一次做蠢事。

古比雪夫: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运来大约3 000万。

[丘巴尔:量转化为质。]

有人喊:4 000万。

古比雪夫:4 000万普特从库兹涅茨克煤田运到乌拉尔。(喊声,喧嚷)因此,这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尽管煤将从远方运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生铁的成本如所有专家和专家委员会所计算的那样,应该不比克里沃罗格工厂高。这是因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矿石极为丰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矿石几乎蕴藏在土壤的表面。

丘巴尔:不可比的两个工厂!克里沃罗格工厂得靠贫瘠的石英岩生产,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靠丰富的矿石。成本不可比!

古比雪夫:嗯,矿石上的差别是明摆着的,重要的是能得到便宜得多的生铁。我们再没有像这样丰富的矿石产地了。我认为,建设克里沃罗格工厂不如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因为矿石贫乏。我们经过仔细讨论决定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列入今年的计划,各级机构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极其仔细和极其详尽的讨论,就像关于库兹涅茨克的捷里别斯工厂的问题那样。我有关于国家五金工厂设计院最终结论的资料,该设计院得出了在1928—1929年度开工建设库兹涅茨克工厂是合理的和有可能的最终结论。原先对于捷里别斯的矿石的质和量的怀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消除。那些原来不太赞成今年开工建设工厂的专家现在得出结论,认为建设是合理的。已经向库兹涅茨克工厂投入了一笔资

金,总额大约为250万卢布。今年计划拨给库兹涅茨克工厂300万卢布。该厂预计于1932—1933年度竣工。其生产能力为2000万普特。

斯大林:是每年吗?

古比雪夫:每年。首批工程价值为9200万卢布。这就是今年开始建设的两个冶金业巨人。

我应该提醒中央委员会全会,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解决国民经济的一项巨大任务,所以这个问题若能得到最仔细的讨论的话,那么无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还是得出同样结论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都不会有什么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这个问题理应得到最仔细的讨论和对于这个或那个工厂的吹毛求疵式的批评,因为由于今年开工建设新工厂而将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我所列举的投资总额——一个工厂1.24亿和另一个工厂9200万——而且还有将来完全不可避免的追加投资,因为我们在库兹涅茨克煤田建起冶金厂后就将解决投资方向问题,即向那里、向西伯利亚的一系列方向投资。比如说,如果将来那里有了自己的冶金业,那么在罗斯托夫生产农业机器并把它们运到西伯利亚自然就是完全不适当的。显然,西伯利亚的农业机器制造业应该得到比现在大得多的发展。在钢轨、技术供应能力等方面对铁路干线的保障也应如此。总之,我们建设工厂,就给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我们实际上在预先解决未来的相当大的投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不可能完全计算出将来需要多少额外开支。五年计划将对此作出一定程度的规定。但是无论如何,五年计划中规定的东西,必将年复一年地根据现实情况加以修改即不断提高对西伯利亚工业的投资。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立即解决一个庞大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亚于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问题。我认为向大家通报黑色冶金业这两个工厂的情况是我的义务。

现在转到有色冶金业。有色冶金业方面的短缺特别严重,这种短缺是我们从革命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我们在有色冶金的一些产品方面简直是从零开始,而且尽管有色冶金业在数量上,或者确切地说,相对地、在百分比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绝对数上却根本满足不了对有色金属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例如,如果说铜在1926—1927年度满足了40%的需求和有60%的短缺,那么尽管我们今年大大提高了铜开采量的增长率,但是仍然有50%的产品需求无法满足。其他种类的有色金属也是一样。我不打算多谈这个问题,我只想指出,在有色冶金业的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对有色冶金业基本建设的拨款在年复一年地增加。计划在有色冶金业方面进行相当大规模的新的建设。如

果说到建设中的企业,那么应该指出的是阿特巴萨尔炼铜厂,该厂首批工程已经在十月革命11周年之际开始建设。这一工程将能提供500万吨铜*。今年不会动工兴建第二批工程。显然,需要进行详尽的筹划,以便避免以前犯过的那些错误。乌拉尔博戈莫洛夫厂在继续建设。亚美尼亚阿拉韦尔德炼铜厂今年得到了用于继续建设的拨款。阿尔泰及喀山金属工业托拉斯也在继续建设。在新企业中应该指出库兹巴斯锌厂,该厂继在去年获得100万卢布拨款之后,今年又得到500万卢布。乌拉尔的卡拉塔选矿厂和乌拉尔镍厂获得130万建设拨款。康斯坦丁诺夫斯克锌厂今年开工建设,科利丘吉诺铝厂今年开工建设,意义较小的其他一些企业也将开工建设。

机器制造业。在机器制造业方面我们超过了战前水平,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若是认为我们在机器制造业方面多少有些超前则是错误的。当讲到黑色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之间的脱节的时候,常常流露出这种想法:我们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超前了,我们无法获得需要数量的生铁。然而我们有许多机器都非常缺乏。几乎所有机器我们都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不能依靠国内生产满足这一需求,必须依靠机器的进口。例如,在锅炉方面我们靠我们国内的生产连80%的需求都未必能满足。对机床的需求难以满足,情况尤为严重。我国的机器制造业对各种机床的满足率在36%到22%之间摇摆。

例如,在石油工业设备方面,尽管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仍然不能靠国内的生产满足需求。在金属制品——小金属制品方面不能靠自身的生产满足需求,不仅因为没有金属,而且因为要么我们在技术上没有准备好,要么因为工厂的技术能力在有些情况下达不到这一点。在工具方面也是如此。在柴油机制造业方面,尽管柴油机制造业的规模巨大,但我们只能满足80%的需求。农业机器方面的情况我已经说过了。机器制造业总产值的增长十分迅速——1928—1929年度从4亿卢布增长到6.84亿卢布,一年半的时间内几乎增长了一倍。

机器制造业在生产合理化方面没有落在后面。我们在机器制造业中大大降低了成本:1926—1927年度降低4%,1927—1928年度降低5.5%,1928—1929年度计划降低8.2%。因此,机器制造业的情况是,尽管取得这些巨大成绩,但是不能满足于这些成绩,我们必须推动这一工业部门更加迅速地发展。

机器制造业的基本建设工程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老厂进行的,虽然对老厂的改造在许多情况下与建设新的、生产能力强的大工厂不相上下。我要介绍一

* 原文如此。也许说的是5000吨。——俄文编者注

家在米哈伊洛夫同志⁶⁰的托拉斯里名声不大的涡轮机厂。

米哈伊洛夫:一个小厂。

古比雪夫:一个差不多把列宁格勒机械厂的生产提高2倍的小厂。因此,这不是附属于列宁格勒机械厂的小厂,而是在机械厂附近建成的一座新工厂。我再介绍一下建在科洛缅斯基工厂和索尔莫夫工厂的柴油机厂。实际上,这是新的柴油机厂,它们在建成后能够把柴油机制造业数量不多的几家生产单位集中起来,并且为其他种类的机器制造业腾出一系列工厂。

在被称为新工程并列入新工程名单的大型工程当中,请允许我讲讲下述几个:

1. 斯维尔德洛夫大型机器制造厂。该厂在1927—1928年度获得了170万的拨款。今年预计给它300万卢布。关于这座工厂,一方面对它的产品目录,另一方面对其产品产量存在疑问。现在主管机器制造业的托洛孔采夫同志认为,给这家工厂设计的产品产量小得不成比例,应该对这座工厂的建设进行修改。但是在乌拉尔建设重型机器制造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没有引起任何疑问。

2. 卢甘斯克工厂。

波斯特舍夫: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的作用被抹杀。

古比雪夫:卢甘斯克工厂——这是对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的彻底改造。我没有想到波斯特舍夫同志会说出这样的反驳意见。我知道,对这个工厂存在不同意见,意思是说:随着这个工厂的建成,现在的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将无事可做。我觉得,建设这座工厂是乌克兰的倡议,尤其是这座工厂的工人的倡议。

斯克雷普尼克:对!

古比雪夫:存在这样的议论和对这一建设的这种批评。而波斯特舍夫同志则说我们在抹杀老的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的作用。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为更加合理地利用老的工厂而进行的这样或那样的修改可以被接受,可以也应该作出修改,但是我认为绝对不应该怀疑建造新卢甘斯克工厂——实质上的新工厂的必要性,尽管该厂累积了一些老工程,因为这是机车制造业的新工厂。

苏霍姆林:我们提出了改造哈尔科夫工厂的问题。[不能把卢甘斯克厂同哈尔科夫厂对立起来。]

古比雪夫:对卢甘斯克厂的改造无论如何应该开始。

有人喊:那哈尔科夫工厂呢?

古比雪夫: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波斯特舍夫这么激动。

索尔莫夫工厂也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至于通用机器制造业方面的新工厂,除了兹拉托乌斯特钻孔厂之外,今年没有着手进行任何新的建设。

请允许我不再讲煤的问题,因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斯克雷普尼克:造船业呢?

古比雪夫:工业部门非常多,要说明所有部门的情况需要很多时间。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有人喊:为什么关闭尼古拉耶夫工厂?

古比雪夫:我主要讲新工厂。尼古拉耶夫工厂需要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使革命前就在那里闲置的平炉投产,使所有车间实现合理化等。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关闭名为“鲁苏德”的尼古拉耶夫工厂呢?

古比雪夫:我不知道这座工厂被关闭。

有人喊:它没有生产。

古比雪夫:去年拨出资金让它恢复生产。如果有谁打算让它停工的话,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

斯克雷普尼克:对。

古比雪夫:至少那个已获批准的庞大的造船计划未必能够不用尼古拉耶夫工厂,单靠列宁格勒的工厂来完成。

现在请允许我就石油讲几句。石油的开采量迅速增长。我们的开采量比1925—1926年度增加50%,也就是说开采量比三年前增长了一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石油工业是一个在自身经济合理化方面位居前列的部门。它将生产的所有过程大大合理化。这些年来石油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大:1925—1926年度投入1.45亿,随后的1926—1927年度为1.85亿,1927—1928年度为2.13亿,今年为2.14亿卢布。可见,我们向石油工业投入很多钱。应该注意到一个有益的事实:新建工程在石油工业合理化中的作用不断提高。1925—1926年度新建工程花费1150万,1926年——7200万,今年9800万。大家都知道输油管道工程。此外,在巴统和巴库正在建设生产能力强大的炼油厂,它们的生产能力加在一起将为巴库炼油能力的50%以上,大约为格罗兹尼炼油能力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了巴库和巴统正在建设的工厂的生产能力。我不再列举石油工业的其他工程。这些工程的目录非常长。我只是告诉大家,昨天收到一份极为可喜的通知,说格罗兹尼的裂化装置效果很好。因此,尽管裂化装置的建设过去不时遭到怀疑,但是这一工程通过良好的实际应用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丘巴尔:这是什么东西呢?

古比雪夫:这是一种从石油中获取产品、主要是汽油的特殊过程。我想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压的基础之上,而普通的炼油厂则建立在其他原理之上。关于石油请允许我就讲这些。

请允许我讲讲建筑材料。在建筑材料方面,今年的基本建设工程与去年相比有相当大增加。1927—1928年度我们用于建筑材料的开支为4 900万卢布,今年为9 600万卢布,也就是说向建筑材料工业的投资增长一倍。去年向森林工业投入4 500万卢布,今年我们投入7 400万卢布,也就是说增长也是相当大的。我不再列举建筑材料和森林工业中那些将在今年建设的企业。它们大多数不是大型企业。我只是指出一点,一段时间有过争议的关于将生产纸张和木材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联合公司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我们把建设阿尔汉格尔斯克联合公司列入1928—1929年度的规划。

现在谈谈化学工业。化学工业的基本建设费用也相当可观。在过去的三年中向化学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都算在内,投入了1.93亿卢布,在1928—1929年度我们投入1.46亿,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向化学工业的投入总额只比过去三年的投入少5 000万。1925—1926年度投入4 800万,下一年为6 500万,1927—1928年度为8 200万,今年为1.46亿。这个数字是在最近研究控制数字后得出的。我们早先计划的投入略少一些,现在这个数字如大家见到的大大提高了。化学工业的有效固定资本年复一年地提高,没有一个工业部门像化学工业那样如此大规模地更新固定资本。我们认为,与1925年10月1日相比,截至1928年10月1日,化学工业的固定资本提高了50%。总产值与1925年相比也大大增加;如果把1925年算做100,1928年将为211,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化学工业产量增加一倍。如我所讲过的,在固定资本总增长差不多50%的条件下,总产值提高了111%。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基本建设投资的巨大效益:固定资本增长了0.5倍,产品产量增加了1倍多。化学工业的比重逐年大大增加。化学工业的成本随着费用也在最近几年内以相当大的幅度降低。1926—1927年度我们在化学工业方面取得非常大的进展。1927—1928年度额外把成本降低了12%。

作为化学工业一部分的化肥的情况是这样的:1925—1926年度为8万吨过磷酸钙,而今年我们将有24万吨,也就是说过磷酸钙的开采量增长两倍。其他种类的化肥也是这样。如果整个地来看化肥的话,那么我们将有34万吨,而在今年,也就是在一年中,我们将给农业多提供1倍的化肥。我们在这方面每一年

都有巨大的增长率,但是应该明确指出,这一切在数量上还完全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譬如,在美国1公顷播种面积的化肥开支是2卢布18戈比,在我国1公顷播种面积——7戈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光是这一对比就说明必须在这方面下相当大的力气,以便在这个问题上能以我们所需要的速度前进。

关于出口讲几点意见。工业产品的出口逐年增加。我们运往国外的产品的增长速度每年都在提高。例如,我们去年比1926—1927年度增长了24%,而今年将把出口提高37%。如果再算上现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正在讨论的木材出口方面的追加任务,那么这一增长率与去年的工业产品的出口相比将达到44%。工业出口的比重逐年增长。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粮食停止了出口。

需要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工业产品出口方面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已经足够了。我认为,工业产品的出口问题是明年的整个工业计划,甚至是我们的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现在我就完成我向你们报告的那个计划所需要的条件说两句。我认为像政府所提出的那样,建设指数降低15%,再加上成本降低7%,是完成计划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两个条件,我们的计划绝对完不成。如果建设指数没有降低15%,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完成预定的基本建设计划,就会延误工厂的建设工期,就会增加工程的造价,使国家明年面临艰难处境。总之,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实际上就将使我们的整个五年计划面临风险。

五年计划设想到五年末大大降低建设指数,根据我们的计算,这一数字将达到大约20亿卢布。因此,大家自己明白,在整个五年期间如数完成这项任务具有多么大的意义。而且计划今年把建设指数的价值降低得比以前更多,但是如果这一情形没有实现,就会严重破坏我们所有的设想,尤其是今年的规划。这项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为此需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完成它。

第二项任务——降低成本,一项紧张但并非不能完成的任务,一项艰难的任务,但若是这个问题不仅在工业生活中,而且在工人阶级所有组织的生活中都被作为今年经济生活最中心的任务提出来的话,这项任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无论如何需要更好地安排基本建设工程,需要把生产合理化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需要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控制数字所规定的最大限度,需要与自由散漫和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应该在工人和技术人员当中加强纪律,应该与旷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应该有一个对待技术人员的明确方针,即应该把同苏维埃政权合作

的技术人员吸引到我们的工业建设者、新生产和新企业的建设者的队伍中来。应该使工会和党的组织处处意识到降低成本问题的意义,积极执行为完成把成本降低7%的任务而作出的那些决定。为什么降低成本是完全必需的和必须做到的呢?如果不能把成本降低7%,现在制定的整个基本建设计划就将被打乱,因为我们根据预算只能得到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的一部分。从工业资金中,或者通过银行的长期贷款,或者通过把自己的积累用于自身的基本建设,我们花掉大约9亿—10亿卢布。可见,用于基本建设的大部分资金依靠工业的自身积累。这与降低成本密切相关。比如说,如果没有相应降低纺织工业、制糖工业的成本,我们就不可能收回资金来给黑色冶金业、化学工业等拨款。如果没有降低重工业的成本,例如煤、金属等的成本,这些企业就不可能利用计划所规定的自有资金。所以降低成本是完成基本建设工程计划的必要条件,是充分保障实现由政治局同意的控制数字所规定的工业化速度的必要条件。

主席(李可夫):大家想继续开会吗?

喊声:休息,休息!

主席:让我们在休息前解决一个问题:明天工作不工作呢?

喊声:从上午开始!在会议结束前作决定!一定工作!

柯秀尔:同志们,我们正在进行粮食收购,我们不能老坐在这里。

主席:谁赞同明天完全不工作?谁赞同从上午开始工作,晚上不工作?谁赞同晚上和上午都工作?通过折中决定——工作到午饭前。

我宣布休息10分钟。

(休息后)

主席:现在请库比亚克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者是温什里希特同志。

库比亚克:我利用这几分钟专门谈一下我现在领导的那个部门的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说过,在七月全会上农业曾是主要问题之一,在这次全会上也是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如他所言,也是控制数字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前两个意见是正确的,而第三个意见,关于控制数字的意见,不十分正确。在农业方面,我们无疑在绝对数字上取得了控制数字的一些增长,但是增长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农业面临的任务的增长,其次是由于短期贷款,这种贷款在工业上没有被考虑到。根据预算我们今年得到3.17亿卢布,但是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在去年已经透支了今年的2800万卢布,如果大家注意到去年的贷款资金的亏空(200万从去年转到来年),并且如果大家注

意到拨给新任务的6500万卢布,比如组建新的国营农场,那么今年的增长与去年的数字相比并不是特别大。可见,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说明农业的基本作用。在这些资金中我们现在拥有什么呢?我们的预算现在被大大缩减,以致我想在此提醒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曾允诺增加3.6亿卢布(这将被记入速记记录)。(笑声)

列扎瓦:允诺过吗?

臧声:在你的发言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库比亚克:我想让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无法收回诺言,我想利用机会把这写进速记记录,他将很难加以否认。我想指出两个方面。在政治局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和七月全会决议中讲到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扶持个体农民经济。七月全会讲到过这一点,在这个决议草案中也对这一点作过相当多的表述。但是我个人认为,单靠文件我们未必能够推动和发展个体经济成分,未必能够使之具有相当的规模。应该有通过若干具体的数字来加强扩大规模的意愿。我们总共得到7900万,用于全苏的个体经济。这里包括:耕畜、农业建筑物、除养羊业之外的整个畜牧业、养马业、牧草播种、包括针对特种作物的所有措施在内的整个种植业、泥煤业、种棉业、手工业合作社和林业合作社、对个体农民经济的资助。我们获得的7900万卢布是用于整个个体经济成分的。去年只有俄罗斯联邦得到8200万卢布用于个体经济成分。这说明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在控制数字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全苏范围内,对个体经济成分的贷款削减了5500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十分详细地说明了畜力状况。没有畜力,要完成农业现在面临的将播种面积扩大7%的任务将是十分困难的。

在机器供应方面我们的情况如何呢?首先是——拖拉机。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申请拨给15000台拖拉机,但是只给了我们3050台。差额非常大。古比雪夫同志就拖拉机制造业讲了很多,答应我们,普梯洛夫工厂马上会大显身手,今年内就将给我们提供3000台拖拉机。我十分担心,我们根据计划应该从普梯洛夫工厂获得的那些拖拉机我们未必能得到。存在一定的问题。去年普梯洛夫工厂使我们陷入了困境。鲁希莫维奇同志在不时地发笑。我应该让在场的那些对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包括拖拉机在内的机器分配方面的做法不满的中央委员知道,我们今年只能在有效果的地区、在谷类作物地区集中分配拖拉机,大多数地区将一台拖拉机也得不到。我们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之间分配拖拉机,其他地区一台也不给。

戈洛谢金:哈萨克斯坦呢?

库比亚克:菲利浦,你会得到几台拖拉机。

戈洛谢金:你们是不是叫嚷多给些粮食呢?

库比亚克:我们当然会要粮食。

有人喊:他给得太少。

库比亚克:完全正确,他给得太少。如果全会记录下来,我就请求通过削减报纸用纸的进口……

斯克雷普尼克:是不是应该少读点报纸呢?

丘巴尔:少点平行主义。(全场喧嚷,笑声)

有人喊:你在埋葬文化,库比亚克同志。

库比亚克:我认为,如果我们通过少量削减纸张的进口来订购1 000台拖拉机的话,文化革命不会受到损害。除了益处,不会有别的什么。我希望,中央全会,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代表,能够同意减少纸张的进口并因此而少许增加拖拉机的进口。

有人喊:铅笔的进口呢?

库比亚克:铅笔的进口也可以削减。机器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从全苏范围来看,我们大约只能满足70%的机器需求。甚至连这一百分比的机器也有相当大数量的贷款无法提供。我们在拨款和机器的供应计划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缺口。在俄罗斯联邦缺口为5 500万卢布,在全苏范围内——8 000万卢布。如果大家再注意到从去年转到今年的2 100万,那么缺口会更大。我们现在不得不把或多或少有组织地放弃我们从前实行的机器贷款政策作为我们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得不计划并且已经计划改变机器贷款的比率。迄今为止我们所有地区和所有部类的不贷款限额为12卢布。现在我们计划西伯利亚、乌拉尔、北高加索和远东的不贷款限额为35卢布。其他地区——中部黑土地区、下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伏尔加河流域为25卢布。实行这样的限额意味着什么呢?去年所有的犁我们都是赊销2—3年,现在应该取消赊销。在西伯利亚应该取消谷物清选机的赊销,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机器现钱出售。

有人喊:有点困难。

库比亚克:非常困难,但是不额外拨给资金,就什么也干不成,我们这方面还有缺口。如果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就会改变,但是尽管我们愿意……

丘巴尔:不能这么频繁地改变比率——我们会陷入窘境。

库比亚克:完全正确——不能这么频繁地改变,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在银行总存量中的债务为2 100万,缺口为5 500万,总计7 600万。我们应该

一定的方式调整机器的分配,不能破坏我们的政策,要坚持阶级路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第一,提高贷款限额,第二,把预支款提高30%,第三,削减贫农的机器百分比——以前完全用于贫农的占50%,现在我们不得不加以削减。我们现在不得不部分地把机器现钱出售给集体农庄。

这就是我们机器供应方面的情况。此外,总额达5500万的这一缺口应该用国民经济控制数字中的某笔资金来抵补。无疑,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依靠现钱出售和提高预付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做点什么。农村钱是有的,特别是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地区丰收之后,再加上粮食价格的提高。农民经济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在存在高需求的条件下我们无疑会以现金结算的方式来出售一定数量的机器。如果我们在个体经济成分的机器分配方面能比去年稍微自由一些,那么无法用机器贷款抵补的数额就会由富农经济补偿给我们。那样“贫穷的”富农(全场大笑)就得卖出一些东西。(笑声)当然,我们不能请求全会在关于李可夫同志的报告的决议中写下必须改变比率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全会之后我们要么在政治局、要么在组织局将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承担改变贷款比率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责任。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集体农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当然,其中有些集体农庄力量薄弱、不够稳定,经济还没有壮大起来,它们中的一部分无疑将会消失。这是正确的,但是毕竟我们现在拨给的资金是不够的。

李可夫:多少呢?

库比亚克:5100万⁶¹。诚然,我没有特别强烈地坚持,因为如果我们给集体农庄增加的话,它们要合理地利用这些钱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机器不足,无机肥料不足。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中有能够用好大的投资的企业,这就是国营农场。大家知道,我们在1924—1925年度向我们的老国营农场总共投入了100万卢布,在1925—1926年度从俄罗斯联邦的预算中给了200万,在1926—1927年度给了500万。⁶²但是要知道500万卢布对于1000多个国营农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老国营农场的商品率提高了1000万卢布,把播种面积提高了37%。我们依靠老国营农场整顿了国营农场,开展了差不多整个春季的播种运动。在此应该指出这一点,由于给播种地下种,我们使国营农场的工人没有了粮食,更不要说我们三个月没有给他们支付薪金了。现在给我们大约900万—1100万基本存款和1000万左右的长期贷款用于老的国营农场。对于农业而言,总的说来贷款没有多大好处,尤其是对于国营农场来说,因为国营农场无法支付20%的贷款年息,贷款收不回来成为国营农场的

沉重负担。

无机肥料的情况怎么样呢？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这里说过，正在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增加磷肥、施石灰改良酸性土壤等。关于施石灰改良酸性土壤我们讲了很多，制定了很多决议。米高扬订购了17台粉碎机。

米高扬：35台。

库比亚克：现在增加到35台，但需要量不少于150台。

丘巴尔：请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订购，会生产出来的。

库比亚克：如果我们能够做主的话，我们会很高兴地订购的。地方工业没有答应把粉碎机如期生产出来。1月份就应该把粉碎机交给我们，如果像工业允诺的那样，我们到2月份才能得到粉碎机，那么我们就不能进行施石灰改良土壤工作。

丘巴尔：每次都是这个环节容易出问题。应该提早订购，以便按时得到。

库比亚克：我们没有给谷物业提供任何无机肥料。我们给棉花、甜菜提供无机肥料，但是1俄磅也没有给谷物。所以，不能认为我们在春季运动前能获得用于谷物业的肥料。我们曾商量用一年期贷款从德国订购数千吨磷钙土。

有人喊[丘巴尔]：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可以满足50%的需要。

库比亚克：他指出了经济作物、棉花、甜菜的需求，但没有指出谷类作物的需求。

我讲一下我认为必须加进决议中的东西。首先，我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了我们在贷款方面的情况。这个根据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报告拟定的建议草案的内容是，我们给农民提供一切，提供资金、无机肥料，提供预购合同⁶³等。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应该在草案中加上一条，要求党组织在进行扩大播种面积的运动时，同时开展提高农民的主动精神、增加农民的贡献的运动。不应该欺骗自己。我们应该把体现农民的主动精神和农民的贡献作为播种运动的一项最严肃的任务。第二点——及时提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农业合作社从事供销业务，逐渐抛开庄稼人，转而利用铁路，使自己学会做贸易。应该给合作社提出为农业生产的合作化而改造自己的任务。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会遇到很大困难，影响个体经济成分的能力就会非常小。光是靠鼓动不足以扩大生产。应该通过合作社来施加影响。

在决议草案中有一条是关于集体农庄的。这一条指出，集体农庄、公社、集体组织正在发展，应该增加它们的数量。我认为这种表述不完全符合目前的情况。应该说，主要不是把集体农庄数量上的增长，而是把集体农庄质量上和组织

上的巩固作为我们的任务。应该组织集体农庄经济。我们要求组建集体农庄，我们为集体农庄的解散而感到惋惜，但是我们没有消除解散的原因。集体农庄没有在经济上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对集体农庄扶持得不够。在提高集体农庄的增长的同时，我们应该把组织集体农庄经济作为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向土地机关提出这个问题，也在集体农庄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光靠集体农庄庄员和土地机关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需要党组织的帮助，这里需要整个苏维埃机关的帮助。在决议中应当加上一个关于必要性的条款，即有必要进行实验，有必要使工农业相结合。在亚麻产区，在亚麻工业方面出现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关于预购合同问题讲上几句。我们的这项工作不知怎么还没有摆脱纸上谈兵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把消费粮食的工业区与产粮区结合起来。我认为，不能局限于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将通过一项由预购合同问题委员会制定的一项决议。但是应该在全会决议中记下这一点，以使全党着手这项工作，不让这个十分宝贵的重要创举付之东流。

这就是我认为对决议必须作的补充。

还有一点。应该最大程度地认真关注贷款的归还问题。我们这方面的情况极不乐观。贷款的归还逐年减少。现在北高加索有800万卢布的债务。北高加索要求400万延期，打算征收400万。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它征收不到这400万。我认为，如果我们再出现像北高加索和其他地区这种400万延期的财务漏洞的话，那么这将成为今年预计实行的那些财政措施的沉重负担。我们今年在预购合同方面的资金即短期贷款将得到增长。但是对农业的基本投资即使不比去年的资金少，那也多不了多少。如果取消给农业提出的组建新国营农场的任务，也就是说取消6500多万的卢布，那么将比去年少。我认为，这就是需要对这一决议作出某些修改的原因。我认为，在全会上交换意见之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会履行他的承诺。

主席：现在请温什里希特同志发言。

[温什里希特同志的发言没有作速记记录]⁶⁴

温什里希特：由于时间不多，我只能讲一讲国防问题。三位报告人就议事日程上的“关于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这一问题发了言，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谈及国防问题，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国防的角度来分析控制数字。

毫无疑问，苏联日益增长的工业化速度是我国的国防实力的基本保障。但是这还不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工业和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为

完成国防的要求做好准备。尽管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情况,但是国防问题在决议草案中没有得到反映。

去年的四五月间我们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府中讨论过国防状况的问题⁶⁵。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决定在提到在加强苏联武装力量方面取得的相当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一系列的较大不足,主要是后备军动员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不足。根据这些决定,在组织和财政方面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的国防的实际措施。军事部门1927—1928年度的预算比1926—1927年度增加了1.07亿卢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体系中建立了使整个国家为国防做好准备的专门机构。[就国防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动员—计划管理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部门。]此外,批准了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关于最近几年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设想。

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这些决定,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总额为9.65亿卢布的1928—1929年度预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进行审议时,这个数字被降低到8.9亿卢布。尽管财政人民委员部反对,政治局仍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这样一来,8.9亿卢布就是应列入全苏预算的那个数字。这一削减破坏了制定的计划,导致一连串不合人意的削减(备用器材的采购减少30%,仓库和兵营的建设规划被大大缩减,一系列物质生活和训练的改进措施被放弃)。在最近几周,由于财政计划紧张,人民委员会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预算减少到8.4亿卢布⁶⁶。

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是否证明这一削减是正确的呢?最近的事件是否说明直接的战争危险减少了呢?

请允许我列举一些关于针对我们的侵略活动不断加强的有代表性的资料。

在英国,多笔大额信贷业务被中止。正在进行狂热的反苏宣传,特别是在银行界。因此,如果什么地方传出消息说愿意和我国在政治接近方面开始谈判的话,则纯属寻常的竞选诡计而已,目的是从工党那里夺走选票。

法国报刊也在进行有计划的反苏宣传。众所周知,有关政治经济问题的谈判中断⁶⁷,并且没有理由期待谈判会在近期恢复。最近右翼联盟的政府掌握了权,可以预料此届政府会实行更加强硬的反苏方针。德斯波赖元帅和列龙将军到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活动;驻华沙军事代表团前团长沙尔比将军前往巴尔干、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游说,这一切的目的是把单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给它们分配任务、在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监督和领导下实现作战行动的统一。

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有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也出现一些恶化的征兆。比如,德国的银行家加入了伦敦的俄国债权人国际委员会⁶⁸。旨在反对对外贸易垄断的企业家委员会⁶⁹成立。在柏林查封了一部分我国的资产。奥萨德切伊教授关于伏尔加—顿河运河的讲座被停止。

波兰政府日益增强的敌意在各个方面都得到证实。毕苏斯基的罗马尼亚之行就是明显的证明。毕苏斯基和罗马尼亚政府进行谈判,结果罗马尼亚完全同意波兰的建议。波兰和罗马尼亚总参谋部缔结了关于协同行动反对我们的军事协定⁷⁰。根据波兰总参谋部手中的这份协定,如果爆发同我国的战争,将集中统一指挥联合军队。

我们掌握的情报证明,英国驻华沙参赞利佩尔鼓吹由乌克兰和波兰按照毕苏斯基的计划结成联邦。英国驻芬兰大使赖尼在干着同样的勾当。

据可靠消息,英国支持乌克兰的列维茨基集团⁷¹,该集团在波兰拥有军事教官。正在给乌克兰部队大力配备干部。计划把乌克兰新编军队的中心转移到罗马尼亚。英国给列维茨基集团提供财政支持。列维茨基给在布拉格的乌克兰沙波瓦尔集团提供资金,认为后者同苏联境内的乌克兰反革命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

最近一段日子芬兰报刊充斥着关于苏联局势的文章和报道。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恶意中伤对于过去的芬兰报刊来说是少见的内容,这表明这场运动是正在付诸实施的制造反苏舆论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芬兰外交部部长普罗科佩执行的是一条明显的反苏路线。芬兰企图单方面控制芬兰湾⁷²。

我们在瑞典的情况也在恶化。自从保守党政府掌权⁷³就提出建立旨在反对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联盟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正在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

右翼政府在拉脱维亚夺得了政权⁷⁴,右翼政府无疑会与英国更加密切接近。苏达科夫事件⁷⁵极其典型地说明了拉脱维亚统治阶层的反苏情绪。

简单说说西邻各国反对我们的军事政治协定。在最近两年中,1926—1927年,我们的邻国签订和批准了下述反对我们的条约和协定:

(1)波兰和法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对1925年的同盟条约和1921年条约进行了补充。

(2)1921年签订并在1923—1924年作了补充的波兰—罗马尼亚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3)罗马尼亚—意大利“友好”条约,并由关于给予罗马尼亚军事政治支持的秘密协定加以补充。

(4) 罗马尼亚—法国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此外,我们的邻国通过早先缔结的下述军事政治协定联系在一起:

(1)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所谓的小协约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签订的各项协定,这些协定保证在战争爆发时一致支持小协约国反对苏联。

(2) 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签订的各项协定,这些协定保证在同苏联爆发战争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支持罗马尼亚。

(3) 波兰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一系列协定,借助这些协定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

(4)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军事政治同盟。

一系列情报表明,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英国之间存在军事性质的秘密协定。正就缔结一系列新协定进行谈判。

如果注意到所有这些事实,特别是英法协定的事实,那么很清楚,反对苏联的战争危险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

这个过程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得到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

如果对比一下和平时期我国武装力量和邻国武装力量的状况,可以看到对比明显不利于我们。我们不仅在武装力量的人数上落后,而且在师的数量上,在坦克、重高射炮、轻机枪、轰炸机、海军航空兵的数量上落后。

战时的力量对比更加对我们不利;还应该注意到,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资源对付战争,而我们的邻国却一直能获得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源供应。有确切的资料表明,法国的施奈德—克勒佐公司的工厂⁷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⁷⁷对波兰和罗马尼亚军队的供应在增加。

波兰最近几年加紧扩大军工企业的生产,并且使民用工业为转而进行军事部门所需要的生产做好准备。每年增加的动员储备达到4 000万—5 000万金卢布。军火生产部门和民用工业的同化进程在加速。生产能力年增长达15%—20%。最近几年建成的新兵工厂和大型兵工车间超过了15个。

我国的工业远远没有为战争爆发时满足军队的需要做好准备。为了使我国工业达到所需要的生产能力,我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相当大的投资。

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不是延长,而是缩短红军和整个国家的战斗准备时间。尽管经济计划以及财政计划处于紧张状态,但必须找到能保障完完全全完成我们的军事计划的资金。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在所有的削减中对海军人民委员部预算的削减是最危险的。

然而人民委员会最近的一份决定却提出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政治局批准的8.9亿削减5 000万,也就是减为8.4亿卢布,目的是在不改变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情况下把这一计划的完成时间从12个月延长到15个月。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计划的完成时间将不是延长3个月,而是1年甚至更久。

在15个月的时间内给1928—1929年度的建设计划划拨资金——这意味着错过一个季节。这意味着,在最好的情况下兵营建设也将在1929—1930年度竣工。这意味着,已获通过的旨在加强我国的专业兵的组织措施也将被至少推迟一年。

显然,削减我们的预算将导致已经决定的工业订货减少3 000万卢布。对于工业而言,这意味着1928—1929年度的生产实际下降20%,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动员准备时间的延长。

我们在制定1928—1929年度预算的时候,显然不想破坏整个建设的计划,但我们不得不把除1 910万卢布结转欠款以外的2 400万卢布的支付款推迟到1929—1930年度。如果再把债务增加3 000万卢布,那么1928—1929年度工业在军事部门订货方面的贷款总额将达到7 300万卢布,这是完全承担不了的。

因此,预算削减5 000万卢布将导致对红军建设计划的修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红军的战斗力,这主要表现在军事装备的充分供应和动员储备的积累上。

国防拨款的削减不仅事关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预算,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影响到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专门拨款。

我们在动员储备方面的情况不尽如人意。粮食和饲料的动员储备已经被全部取消。殖民地的化工产品、农业原料和进口商品(金属)被部分地取消。

需要努力紧张工作两年,为了实现国防建设计划和我国的原料资源、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的结合必须对我国工业施加强大压力。

人民委员会现在对国防拨款的削减将导致必须重新修改即削减我们所有的计划。

我向中央委员会全会重申,必须坚持政治局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1928—1929年度预算为8.9亿卢布的决定,不仅如此,陆海军人民委员部1928—1929年度第一季度得到的贷款多于上述预算的四分之一(2.25

亿卢布),在已获批准的控制数字范围内确定的工业订货数额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会议上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的决议草案没有反映出必须提高党和整个国家对国防问题的关注。报告人对控制数字所作的分析没有反映出日益增强的战争危险。

我建议 in 决议中专门加上一段,再次重申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计划中考虑到国家做好国防准备的要求。

主席:现在请米柳亭同志发言。

米柳亭:我们面临着评价总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的农村和城市政策的任务。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作出经济评价,而且应该作出政治评价。提纲对总的经济状况作出了完全正确的评价,认为我们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增长。所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说,如果我们遇到困难,这是发展中的困难,他是对的。我不再援引你们已经在这里的各个报告中听到的和从表格中看到的资料等等。为了对我们从我们的对手那里、从托洛茨基反对派那样的一贯悲观主义者(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迄今为止的5年中一再说我们有危机)那里听到的种种说法作出明确答复,只需指出工业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2.5%、我们有一条一直上升的曲线就够了。

但是,从这一总的状况出发,我们应该特别认真地对一个领域即农业的状况作出分析,我认为在农业方面有时存在某些不正确的解释。在工业中彻底破产的递减曲线论有时在农业中找到立足点。我认为,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有时人们没有弄清农业的特点,有时利用的是三年的资料,然后却拿最后一年做例子,并且根据这一年就作出今后农业发展的长期方向的结论。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问题在于下述方面。毋庸置疑,尽管农业的普遍基本规律与工业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但是农业毕竟有自己的特点。特点之一就在于,农业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气候条件和气象条件,而这些条件国家计划委员会还管不了,无法纳入计划范围。

譬如,我们在分析农业的所有指标,所有直接指标的时候,看到农业在这三年当中年复一年地发展,年复一年地在所有基本指标方面发展。今年由于艰难的经济条件,农业的增长速度下降,不是增长降低,而是增长速度下降。在此允许我列举一些数据证明这个问题。总的播种面积,尤其是谷物播种面积是基础。播种面积包括两个方面:农民耕种的面积和农民从中收割庄稼的播种面积。显然,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农民从中收割庄稼的面积与他耕种的面积并不一致,

因此对于有关农民对待我们的政策的态度的结论来说,这一点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个体农户所有作物的播种面积是去年播种面积的100.7%,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整个播种面积为去年的101.3%。如果拿最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来说,我们将得到这样的数字:1926年——105.7%,1927年——102.5%,今年——101.3%。尽管总的播种面积有所增长,但谷物播种面积下降了几乎3%。如果拿耕作的播种面积来说,那么今年为去年的105%。在研究农民对我们的政策的反应问题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数据。如果你们选取人均数据为例,应该考虑到每年2.3%的人口增长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总的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基本持平,只有今年再次因为气象条件而在谷物方面有所降低。

同样,如果你们举商品产值即最重要的商品部分为例,——我现在举不出数字,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我只想讲一讲最重要的方面,——那么我们在商品部分也会看到农业所有部门都在增长。但是,我并不想由此作出我们没有困难、农业没有落后的结论。农业落后指的是农村的生产增长满足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城乡需求的增长给农业提出的要求。但是这里不存在农业危机的问题。如果可以提出农业危机的问题,那就应当提出改变我们政策的问题。恰恰相反,对农业的实际发展的数据的最仔细的分析表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在改造时期实行了正确的农村政策。

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这个政策。现在我谈谈一个政治问题: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在哪里,这些困难在于对农业的增长过程跟不上国民经济需求的普遍增长不满意。

我觉得,出路在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生产供应和必须加强农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

我们的困难的核心就在于此,只有在这方面才能找到解决农业面临的任务的途径,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方面。

大家知道,关于我们的农村政策的方向的问题在11年中始终没有消失。我们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⁷⁸上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也提出了右倾问题。

甚至在当时就有所表现的右倾的危险在哪里呢?危险在于,右派认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取消对农村资本主义趋势的限制。

有人喊:对。

米柳亭:这就是危险所在。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譬如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而

摆脱现在的困境,或者我们应该通过农村的合作化、通过集体化寻找出路呢?农民的发展似乎是从中农提高为富裕农民,再从富裕农民提高为富农,或者农民的发展、绝大多数农民的提高将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合作化逐渐进行的,我们的出路是否在这里呢?这就是我们政策的问题核心。我请大家重温几个定义。布哈林同志当时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全会上这样说过: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有这样的看法:‘你们干吗在那里空谈农村中的各种社会主义,你们那里将要得到发展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关系,不管这多么令人不愉快,但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这种看法正确吗?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我们可以说这是‘富农倾向’。这些同志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作用;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好像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专政。”

接下去说道:

“指靠富农或者即使‘指靠富裕农民’就是开放富农经济,仅此而已。而现在建议做的和我试图论证的则是为了利用这个‘开放’过程来给予支持和资助。给谁?给我们真正指靠的农村中的反资本主义成分(客观上反资本主义的)。如果要问在农村中我们指靠谁,那么我们应该回答:指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⁷⁹

这种提法正确吗?完全正确的提法,对目前时期和目前时刻而言都是正确的。

富农是怎么回事,富裕农民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允许我给大家读一下李可夫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给富农和富裕农民下的定义:“我认为,——李可夫同志说,——试图把富裕农民同富农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辩论——纯属经院哲学。在这方面无法划一条准确的界线,而若认为把二者对立起来就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散播有害的和危险的幻想。”⁸⁰请允许我再引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

“按照民粹派的通常观点,‘富农’和‘善于经营的农夫’不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而是彼此毫无联系和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是民粹派的偏见之一,这些偏见甚至从来都没有人想通过分析确切的经济资料来加以证明。资料所说明的恰好相反。农民雇用工人来扩大生产也好,农民买卖土地……或食品杂货也好,农民买卖大麻、干草、牲畜等等或货币(高利贷者)也好,他都是一个经济类型,他的业务从根本上说属于同一种经济关系。”⁸¹

这就是列宁同志对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侵占别人的剩余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100%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背离这个定义。

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农村政策、我们的对农村的评价应该是既评价成就,也评价我们面临的困难,同时农村的路线应该是,我们把同中农结成联盟和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社、集体化直接联系在一起。说实在的,就算是用税收、就算是用什么别的措施在某个方面限制了富农,这还不算糟糕,但是如果我们延缓了大多数农民的发展速度,或者在实行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在消除资本主义趋势方面出现错误、做得不好那就糟糕了。那样情况就不妙了。这就是应该评价我们的农村政策的地方。老实说,从这方面来看,提出的提纲在许多方面不能令我满意。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诸多重要方面的结合。

喊声:对!

米柳亭: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说: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中等富农和富裕富农的呢?(笑声)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划分过富农呢?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适宜的。我认为,应该反对限制、反对歪曲,但是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制定一条路线。我想,我们在农业税上并非一帆风顺。我认为,今后应该在农业税的结构和征收方法方面进行周密研究。我认为农业税在某种程度上非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倒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造成了农民经济的分散。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农业税的征收不应该使农民的大多数——中农的发展受到损害。但是可不能说应该限制中等富农和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真的,同志们,不能这么写。不能写!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提纲中关于农村的基本路线方面明确地表明我们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巩固和促进中农经济,巩固合作化和集体化。

集体化的情况怎么样呢?数字表明我们在这方面不顺利。今年进行了首次集体农庄普查。诚然,这还是5月份的事。普查的整理结果马上就分发给大家。到5月份比1928年1月1日增长了182%。但是,首先,不应该利用这样的百分比,即不应因为这种增长而沾沾自喜。我们总共只有32 000个集体农庄,这些农庄的土地大约200万公顷,所以说,目前的增长还不够大。诚然,我们已经在集体农庄的商品粮方面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增长,如果集体化的速度再快一些,我们就能够提出从集体农庄获得更多商品粮的实际任务。我现在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全俄农业劳动组织联合会⁸²(我也问过米高扬同志,但是他现在拿不出向集体农庄收购粮食方面的准确数字)宣布,今年集体农庄可以比去年提供的

多一倍。这是在集体农庄方面。我想,最近几年我们实际能够从集体农庄获得1亿—1.5亿普特的粮食。这是我们的最大的基础。今年集体农庄表明,经济力量薄弱的贫农农户加入了它们的行列。所以集体农庄—公社有50—60俄亩地,土地共耕社甚至平均只有25俄亩。但是不必为此感到难为情,因为农村经济力量薄弱的部分现在走进了集体农庄。

对集体农庄的供应情况如何呢?无论老的还是新的集体农庄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拖拉机供应。我想给大家列举一下向集体农庄供应拖拉机的数字。

[丘巴尔:行家说将得到供应。]

米柳亭:不错,在老公社中,有拖拉机的占79%,可在新公社中只占23%。老劳动组合有拖拉机的只占38%,新劳动组合占25%。老共耕社占42%,新共耕社只占10%。这就是实际情况。这是在俄罗斯联邦。在乌克兰则差得多,那里的共耕社中有拖拉机的只占17%,劳动组合中只占35%,65%的劳动组合都没有拖拉机。只有公社的情况稍微好些,84%的公社有拖拉机。

列扎瓦:农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呢?

米柳亭:农艺服务的情况很糟糕。这就给大家讲一下农艺服务。联营社的农艺师走访过的集体农庄的百分比为:在俄罗斯联邦,农艺师走访了75%的老公社,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61%,40%的老公社没有被农艺师走访过。在老的劳动组合中——走访了58%,在新劳动组合中——24%。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老的劳动组合中——43%,在新劳动组合中——20%。共耕社方面:在俄罗斯联邦的老共耕社中走访了54%,在新共耕社中——30%;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走访了17%,19%完全没有得到服务。

有人喊:走访了多少次呢?

米柳亭:我说不出走访次数。

[丘巴尔:不是任何一次走访都有益处。]

米柳亭:地方的地段农艺师的情况也是同样。我们去年给集体农庄提供了6000万卢布的贷款,今年——7500万。在集体农庄增加一倍的情况下,这个数目明显不够。应该注意到,集体农庄必须添置固定资本。不能认为这只是流动资金。这是用于固定资本的资金。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机械地认为我们把大量资金转拨到播种面积上是错误的。这些数据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能使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得到保障。因此,从现今的农业状况得出的政治结论就是现在实行集体化和合作化的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闭上眼睛沾沾自

喜——我们的这条路线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工业说两句,因为我的发言时间快完了。我认为讲农业问题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工业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只列举一些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长方面的数字。我们在泥煤方面的比重比1913年高。如果说1913年这一比重为2.3%,那么现在为2.9%。我们在棉花加工方面也上升了。1913年为5.7%,现在为6.6%。在生铁和钢方面我们比战前低一些:生铁的战前比重为5.6%,现在——4.1%;钢——5.9%……

苏霍姆林:大家比较一下我们的速度和它们的速度——就会得到另一种结果。

米柳亭:我们的速度更快。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速度。

下面还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在实际工资方面我们超过欧洲国家。如果把1913年算作100,那么英国的实际工资为108.2,德国——104,我国——123,我国只落后于北美合众国,那里为133。

我认为,我们在工业领域有两个中心问题。这首先是合理化计划,没有这个计划,任何一个本质问题我们都无法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会。现在工会的作用在大大增强,为了实现我们的控制数字提出的那些成果,我们必须得到工会对于党所制定的路线的支持。

主席:现在请乌克兰的柯秀尔同志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西伯利亚的埃赫同志。

柯秀尔:我认为,在这里向我们报告的控制数字以及决议,总的来说给我们现在的工作指出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为我们今年的所有工作作出了安排。中心问题在谷物问题上,关于加快冶金工业、生铁的发展,关于燃料。

洛莫夫:其中没有燃料。

柯秀尔:这个问题毕竟被提了出来。我只想就工业讲几点意见。如果说古比雪夫同志讲过燃料问题在最近几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是我们的很大危险的话,那么他根本没有提到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的17个新矿井丝毫没有解决今后几年的问题。不仅在煤的方面,而且在金属方面都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我们能够据以行动的五年计划。不能为冶金工业、煤、燃料制定1—2年的计划。我们没有坚定的方针、规划。这是控制数字的主要不足,我们应该有更长期的远景规划和更长期的计划。

我还想谈谈下面一个问题。今年4月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沙赫特事件⁸³的决议,党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向顿涅茨克煤田的工人许下诺言,保证改善一系列生活条件,提供优质饮水和住宅,等等。我不敢说我们的这项工作没有完成,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经济部门领导同志们向我们报告的那些笼统的数字表明,我们面临着我们与顿涅茨克工人的关系陷入不佳状态的风险,因为在这方面有完不成党自身所作出的保证的可能。我们共和国的预算由于国内的异常变故(歉收)、由于必须给工业补充拨款而大幅度削减资金,使我们不能从共和国的资金中拿出较大的数目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喊:那你就少给一点吧。

柯秀尔:因此我想就速度问题再讲两句。也许我没有完全明白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所讲的我们会出现不仅我们的速度不会提高,而且工业投资也会减少的局面是不对的。我觉得,如果拿50年的方针来说的话,那么问题在这种提法中就非常抽象。这未必是现实的提法。而如果拿更近一些的远景规划来说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在最近十年内还有可能提高我们的工业投资,如果不是在百分比上,就是在绝对数字上,而且能不断深入地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不断衰减的速度问题的提法就是完全错误的。

从今年计划实行的主要困难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与农业(粮食、原料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角度来看,李可夫同志报告以及决议草案的基本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可夫同志是这样分析形势的:我们能够摆脱粮食上的艰难局面,但是需要保持最大的紧张状态、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对形势的分析是高度凝缩的——他在这里有点吓唬我们。当我听到他对农业形势的分析时,我坐在这里扪心自问:我们的情况是否有这么可怕。当然,我没有毛骨悚然(笑声),但是打了个寒战。这个分析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我们拿谷物问题来说,这个问题非常大,而且现在是一项无论如何应该解决的实际任务。李可夫同志说:谷物产量停滞不前,商品产量——还要糟——落后于战前的产量。我们的谷类作物播种面积也不能说比战前高。我们只是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提高了2普特。

情况就是这样。当然,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的确,我们的情况毫无疑问是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在报告中应该哪怕稍微分析一下这些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一些说明,但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确实,在听到这样的描述之后,我们中的

任何一个人都会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犯了某些重大的错误，现在不得不为它们付出代价呢？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的整个结果、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清醒的考虑和分析，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我知道现在应该更加尖锐地提出谷物问题。但是我认为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吓唬自己。

现在让我们拿谷物产量或者农业商品率来说吧。十分明显，我国农业的发展条件现在有所不同。过去地主和富农的旧农业的商品率，——这是一回事，而在我们的苏维埃基础上，我们把土地分成了小块——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明确的任务并且加以解决，而不应该无缘无故地吓唬自己。对于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来说也是这样。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美妙。但是我认为基本问题在于，我们对小的和最小的个体农民经济的影响迄今为止仍然极其有限。我们年复一年地给自己提出这些任务，试图加以解决，但是经常在这方面盲目行动。我们很难预先想到我们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的情况向好的方向改变了。我们有更多的资本、更大的潜力来不仅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正确地顺利地加以解决。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现在对谷物问题的提法中，在谷物问题解决的全部意义十分明显地、直截了当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由于我们在这里遇到粮食不足这种类似基本限额的难题，在这样的提法中我们有可能首先而全面地研究谷物经济的问题。应该更加平静地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与5—6年前相比，我们现在对农民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无论库比亚克同志怎么诉苦说我们给农业的非常少，给个体农民经济的还要少，但是毕竟我们向农村投入的资金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资金大体上有数十亿卢布。

李可夫：10亿卢布。

柯秀尔：如果不算对国营农场的拨款，那么大约有10亿卢布。这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同时考虑到这样一系列状况：我们发展了与农业有极其密切联系的一些工业部门，这也应该算作我们的优越性。如大家所见到的，我们有一些我们应该利用的杠杆。实际上，这些杠杆的利用在我们这里至今仍是自发的。没有利用每一个戈比来朝我们需要的方向影响农民。至今还没有这样做。我认为，在对农村施加影响方面、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工作开展的路线，以及所制订的规划，具有最重要的头等意义。我们应该认真地把计划作为明确的实际任务来抓，投入一切力量加以解决。

关于农业的一般问题，我想在这里再提出一个问题，我认为，回避关于乌克兰的问题是不对的。

通过今年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乌克兰的经济,尤其是农村谷物业,在我们总的经济形势中具有多么巨大的、决定性的意义。

有人喊:这是“无谓的牺牲”。

柯秀尔:这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一个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关于填补由于乌克兰歉收而在整个联盟的经济中出现的缺口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乌克兰的事情——这是全联盟的事情。大家知道,由于乌克兰的歉收,我们损失了3.5亿[普特]的黑麦和小麦,主要生产商品小麦的一些重要地区失去了生产能力。在其他小麦产区情况更糟。在联盟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全力以赴地进行了秋季播种运动,歉收地区的播种面积因此将恢复75%,其余的工作将在春季进行。我认为,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摆脱我们的困境的。我认为我们提纲中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提出任务的部分中没有提到消除乌克兰的歉收造成的后果。

下面我想谈一谈粮食收购。说这是主要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也认为从非常措施向正常措施的过渡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仅仅这样说的话,看法是不完整的。在粮食丰收的地方,在粮食供应加强的地方,在庄稼汉自己正在运粮食的时候,很容易实现这个过渡。但是在乌克兰,那里已经第二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今年比去年还要困难。在我们从非常措施向正常措施过渡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尤其在农村工作中存在多么大的不足,[存在极大的失误],并且向正常方法的过渡进行得极不正常。我们当前在乌克兰面临极其严重的价格差问题。当然,粮食我们还有,可以订购,但是到处都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在收成比较好的地区小麦1卢布30戈比,而在自由市场上为2卢布50戈比。

李可夫:还有更贵的。

柯秀尔:是的,还有更贵的,但我说的是收成好的地区。当然,我们有粮食贩子,有投机商,等等。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的农村党员确信,不可能有什么理由能使农民按1卢布30戈比把粮食卖给我们,而不是按2卢布50戈比卖给投机商。许多人因此认为,既然非常困难,那么只能采取非常措施。我认为,这些非常措施不仅使我们的收购机关,而且使党的机关蜕化。非常措施采用了,可是没有任何针对富农鼓动的政治工作,没有任何针对对抗我们的宣传的政治工作。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农村的所有运动中把粮食收购问题作为基本的政治问题而置于核心地位,因为在这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又将在与农民结合上出现巨大困难。因此只有在我们学会从加强与中农的结合的角度解决粮食收购的这

些困难之后,才能对我们的工作给出真正的评价。而我们至今还不会这么做。

因此,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现在异常尖锐。佩特留拉叛乱分子⁸⁴在我国加紧活动,波兰人对此予以支持并提供资金,我国的富农也蠢蠢欲动。在乌克兰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结合、联合。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以对付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通过相应的方式使我们在农村的力量活跃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落后的。为了实现控制数字,我们必须加紧进行阶级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极端尖锐,这一斗争的结果、我们的发展速度能否更快,都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善于工作、能否克服困难和是否善于同富农和耐普曼作斗争。

我认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报告的末尾对阶级关系的分析,是他的报告中分析得最不详细的部分。我认为,在实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这里给我们描述的计划时的最大困难,首先在于富农和耐普曼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猛烈的阶级抵抗。我们今年在这方面将会遇到严重困难,应该比以前更加认真地关注我国的阶级斗争。

下面谈谈倾向问题。难道左倾和右倾之间以及左的危险和右的危险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左的危险在党外、右的危险在党内吗?问题不在这里,右倾的典型特点不在这里。我们说“倾向”是因为它还是某种没有定形的、不确定的东西,就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施略普尼柯夫分子⁸⁵,但是现在已经应当提醒党立即反对这样的东西,对这种现象给以原则性的反击⁸⁶,因此从这方面来讲把它与已经成为确定的、孟什维克的、本质上反革命的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完全正确的。对于托洛茨基主义我们面对的是某种已经确定的东西、计划、纲领等,而且这一切已经被从党内清除出去,而对于倾向我们目前是在和某种萌芽打交道,是在同有联合起来的危险的右倾的这些表现打交道,如果党迟迟不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它就确实有联合起来的危险。所有问题就在于此。我们没有把有右倾和调和主义毛病的那些人从党内驱逐出去,但这个情况丝毫不表明什么。也许对于个别同志将不得不作出组织结论,不排除也许不得不在什么地方撤换什么人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肯定将把有右倾毛病的这个或那个同志留在这个或那个岗位上。这一切将取决于时间、地点、性质、数量等。但是我们正确地把重点放在从思想上克服右倾上,放在使党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上,放在采取思想方面的预防措施上,就像对托洛茨基主义所做的那样。我觉得正是在这方面存在许多混乱之处。为什么会是这样——莫斯科事件⁸⁷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并非无缘无故地写了受到全党欢

迎的呼吁书⁸⁸。我觉得决议应该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⁸⁹的决议一致,更多地强调右的危险问题。而在这里这个问题没有展开。关于必须主要关注同右倾的斗争,这一点是顺便讲到的。我觉得,应当认真地向党提出这个问题并在决议中给予正确的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掩盖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掩盖托洛茨基主义在抬头,等等。完全不是那回事,但是我们学会了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如果我们做蠢事,像在基辅的托洛茨基分子游行事件上所看到的那样,那么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在组织上笨手笨脚和我们有官僚主义作风,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基辅的事件。我认为,今年在实行我们的经济计划时应该考虑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在与小农国家、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打交道的时候坚定不移地遵循同中农结合的路线,就是在执行计划时要集中最大的力量打击敌对分子——富农和耐普曼。我们越是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进,在一定时期遭遇的抵抗就会越大,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劳动。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阶级敌人会想方设法地打击我们的薄弱环节。敌人有这么干的潜力。这一点确凿无疑。

我们现在提出右倾问题,这表明我们清楚主要危险来自哪里。在困难的作用下,我们不得不进逼,我们不得不同富农分子和半富农分子发生一系列冲突。这一切在我党的一些阶层中引起逆运动。同志们打算稍稍放慢速度,考虑是否值得、是否应该进行斗争,尤其是在造成一定物质损失的时候。由于我们当中存在这样的情绪,而且越往前走,这些情绪就会越厉害,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同这种右的情绪和倾向的斗争。既然敌对分子将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那么他们对我党内某些人的压力自然会有所增强。所以这就是主要危险,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那些把我们往后拖、抱怨我们的进攻的人,都是有右倾毛病的人,他们将把党从正确的道路上拖开。

我认为,如果莫斯科的许多同志因为大家谈论右倾调和主义等而抱怨的话,他们的抱怨是完全不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正视我们面临的危险。在我们的道路上有困难,我们遇到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阶级斗争,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使我们党在担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的条件下保持最大限度的团结。不能使任何倾向有形成的可能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认为,我们可以让自己在决议中更加坚定地说出这一点。这样做只有益处,没有别的。(鼓掌)

主席:现在休息,明天上午11点开会。

第四次会议

11月18日晚间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现在开始。今天的会议议程是讨论报告,下面请埃赫同志发言。

埃赫:李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着重谈到了粮食收购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建设事业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中也一再强调了这一点)。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柯秀尔同志是对的,他昨天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放弃非常措施的过渡,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东部一些地区也可以看到。由于我们已经停止实行非常措施,在这方面改变了做法,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便表现出某种消极性。在一些地方可以看到这种消极性:说什么非常措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应当坐着,看粮食怎样收上来。要随时随地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指望不集中所有力量我们就能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是不行的。这个我们办不到。粮食收购运动在去年已成为一场大的政治运动,今年还会是这样,而且应当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进行。取消非常措施并不意味着恢复平时状态,党组织也不应对粮食收购袖手旁观。我们尤其要发动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因为现在,在停止实行非常措施后,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尽可能接近农民,而只有通过合作社才能做到这一点。与合作社的积极分子一起在农村广泛地展开工作,我们就能在目前情况下接近农民,就能让他们尽快将余粮送上来。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少,工作还没有展开。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满足于搞粮食收购而不对贫苦农民做大量的工作。去年,在那些没有对贫苦农民做工作的地方实行非常措施,我们感到老是碰钉子。今年,若不对贫苦农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开展粮食收购运动。但是,要做好贫苦农民的工作,我们就应当有一些用于贫苦农民生活用品供应的资金。在这方面我们已确定了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利用谷物加工费⁹⁰的方针。不管怎样,在莫斯科这里讨论粮食收购工作的会议上[不要说米高扬同志]谁都没有

提出异议,大家一致确认,一些地方可以将很大一部分谷物加工费用于贫苦农民生活用品的供应。我认为,现在对谷物加工费所作的改变会给一些地方造成困难⁹¹。事实上,我们的谷物加工费已经被夺走。是的,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温和地夺走的,我们根本觉察不到。

齐夫里诺维奇:没有使用非常措施。

埃赫:是的,没有使用非常措施,彬彬有礼地削去了一部分:确定了一些尚未实行谷物加工费的地区的收费数额,并且声明,你们收吧,超出部分是你们的。例如在西伯利亚,确定的谷物加工费数额是600万普特,当时我们计算过,全部谷物加工费的数额是400万—500万。

柯秀尔:您再好好算一算。

埃赫:当时对我们说,你们收600万,所有超出部分都是你们的。

柯秀尔:结果却要我们收2500万普特。

埃赫:这不行,要坚持原来的决定,一定要把谷物加工费提成留给地方,让我们设立贫苦农民生活用品供应基金。否则我们很难吸引贫苦农民参与粮食收购工作。同时,我认为中央也要考虑一下公益捐问题。我认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确定的公益捐最高比例不超过25%的方针⁹²是错误的。各地的情况不同。我认为,在那些收成好的地区,可以吸收农民多搞一些公益捐,为什么禁止这样做?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就禁止我们这样做。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给地方一些自由,允许那些有条件的地方多搞一些公益捐。

接下来,李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农业的状况,这个问题在决议中也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且应当指出,决议中讲到农业的地方用的尽是一些最高级形式的形容词,每一行都有“极其的”、“非常的”这些词。当我看了决议并听了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后,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我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落到了在报告中用这样的形容词并这样提出问题的地步?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我们的总政策错了?否则怎么会每句话都要多次使用“极其的”、“非常的”这样一些形容词来加以说明呢?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应当更慎重一些,不能这样写,因为我们不想让党内出现混乱。那些将看到这些决议的同志自然会产生疑问:我们是不是正在对路线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我认为,起草这样的决议会在党内造成我们正在对路线进行修改这样一种印象,这样做将是错误的,[这只会给我们的队伍带来混乱]。这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我认为,起草决议的委员会应当关注从决议中删除有可能被理解成对我们总路线的修改的那些地方。路线应当坚持不变,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能动摇。

关于为加强农业的发展而要采取的实际措施。我认为,要商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正在修改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总路线。毫无疑问,今年在实行个别税方面我们干了许多荒唐的事⁹³。我们在这方面无疑犯了许多错误:不向富农征税,却向中农征税。这种情况几乎在每个专区、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另一种情况:我们无法发现真正的富农。难道没有富农吗?有,同志们。我们发现不了他们,也就不能向他们征税。我认为,向最富有的富农征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而且关于征税比例的说法也不对。说是被征税者不超过3%,还强调不超过。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如果对谁都不征税,那就是最好的征税。我想还是要说明一下。不过说得有点远了。

关于整个农业税制度。我们今年实行的这种制度要优于以前的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制度也存在很多影响农业发展的错误,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有一个因素在粗放经营的农业地区尤为明显,这就是向非经济征税原则过渡。你们还记得,去年我们是按人口原则征税⁹⁴。当时我们曾过多地向人口少的农户征税。那些人口少的农户被课以重税。当我们改行非经济的⁹⁵征税原则后,又出现了另一个极端。人口多的中等农户被课以重税。这种向人口多的农户过多征税的办法刺激了农户的分散经营。在征收农业税中坚持非经济征税原则,就要具体修改一些优惠条件,适当减轻对人口多的农户的课税,因为这些农户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而刺激这些农户搞分散经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一些报告人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必须加强农业机械化。这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从现在许多地方都面临的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产量的重大任务来看。我们有望初期便可在粗放经营的农业区,在东部地区和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取得重大成果。不过为此需要向这些地区投入相应的物资。我不想说出李可夫同志所说的“无谓的牺牲”之类的话,但我不能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少足够正确的解决办法和足够坚定的方针。比方说,有这样一个实例:今年西伯利亚是丰收地区,农民无疑将请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大量农业机械,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里出现了有利于推广农业机械和扩大播种面积的良好局面时,经济会议⁹⁶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为我们制订的却是一个机械供应量少于去年的计划。

有人喊:丢人。

埃赫: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完全不符合我们在报告中听到的和我们应该实行的方针。

丘巴尔:是计划的供应量少还是拨款数额少?

埃赫: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西伯利亚有充分的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为我们制定一个供应量不少于去年而且超过去年的计划。

丘巴尔:拨款呢?

埃赫:没有拨款你们如何推广使用机械?难道你们在乌克兰推广使用机械无须拨款吗?你们要求提供相应的拨款,我们也有权要求为我们提供与计划相当的拨款。

从下面这个小例子中可以看到,我们在机械供应方面是多么落后。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拖拉机应当对加强集体农庄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拖拉机的供应正在逐年落后于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这里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去年集体农庄中一台拖拉机承担600俄亩土地,而今年一台拖拉机要承担1200俄亩土地,也就是说拖拉机的供应大大落后于集体农庄的发展速度,结果使每一台拖拉机承担的土地增加了一倍。在对待西伯利亚的问题上,农业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根据,说是我们的马很多,因此可以不提供拖拉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既然我们想迅速发展集体化(我们在西伯利亚的条件下也希望而且也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应该提供相当数量的拖拉机。

丘巴尔:难道没有拖拉机就不能搞集体化了吗?

埃赫:就预算的一些问题说两句。李可夫同志在这里警告说,会有“无谓的牺牲”。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有些地区和共和国在预算问题上又喊又叫。显然,不集中所有的力量和资金,我们的建设事业是无法进行的。显然,在这方面我们得最大限度地限制非生产性的需求,而我们在谈论预算问题时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反对的是,我们不仅受卡,而且在地方预算问题上受到无休止的搅扰。我们至今还没有搞出地方预算,难道这不是背离计划原则吗?到11月末我们还没有搞出拨款计划。我们首先反对的就是这种搅扰。

还有一个与地方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加里宁同志在场,我想提请他注意他所领导的委员会为加强和改善俄罗斯联邦中央机关的工作起草的那些决定。这几项很好的决定已被通过,我们这些俄罗斯联邦各地区的工作人员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认为,俄罗斯联邦终于像其他共和国一样开始工作了。需要的就是这个。通过的决议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决议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个决议是如何贯彻执行的呢?这个决议并没有得到执行。决议通过后,结果却出人意料:决议没有被执行,而是被存档,被束之高阁。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不能让俄罗斯联邦处于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萎靡不振的状态。政治局就加强俄罗斯联邦

工作的问题通过的决议,应当得到贯彻执行。

就古比雪夫和李可夫同志关注的问题再说两句。他们指出,是生铁限制了我国机器制造业和许多经济部门的发展。但冶金工厂的发展速度还不快,新建这些工厂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西伯利亚的捷里别斯建设工程问题在中央机关已经议了3年。大家都认为建这座工厂的提案是正确的。都认为必须首先建捷里别斯工厂。好像我还没有听说我们哪一位负责的领导者不认为必须要建捷里别斯厂。然而看一看结果如何吧。应该说,“大车至今还在原地未动”。我们的提案至今还在各高层机关传来传去,我们暂且还看不出结果。我认为,我们要像提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问题那样提出生铁厂工程问题。正像古比雪夫同志所说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建设很顺利,没有超支,工程符合技术要求,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周围已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试试看,有谁敢削减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用款或拖延工程建设!绝不会出这种事情。而在我们生铁厂工程的周围,我们看到的却是那种使官僚主义的扯皮现象得以蔓延的环境。

关于阶级关系的问题再说两句。李可夫同志谈到了调和主义、右倾和托洛茨基主义。他在这里为我们引用了沙图诺夫斯基的信。我认为,李可夫同志宣读的沙图诺夫斯基的那封信证明,党内还有一些不应该留在党内的人物。不过我们提出有关右倾和调和主义的问题,并非只是说这些人物。党内容不得沙图诺夫斯基。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认为,在抓住这个极其典型的人物之前,我们还能够找到许多其他的人物……

柯秀尔:形形色色的人物。

埃赫:正是这样,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地提出问题,但实质上他们是在把党推上错误的轨道。因此,那种认为党外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党内的右倾是一种不大危险的现象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党内的敌人比党外的敌人更危险。

臧声:对。

埃赫:所以,不能那样提问题,不能说党外的托洛茨基比党内的右倾更危险。正因为 we 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才要求党的队伍不能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我认为中央全会应当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项决议,对中央委员会给莫斯科组织的呼吁书表示赞成⁹⁷。

主席:现在请戈洛谢金同志发言。

戈洛谢金:提交讨论的决议案的大部分篇幅谈的是我国经济中最薄弱的环

节——农业。不过我应该赞成库比亚克同志的意见,即农业在控制数字中实际上并未占主要位置。现在我们来看看哈萨克斯坦这个边疆区的实际情况。我们来看最薄弱的环节——谷物业。我在当地问过库比亚克同志:“怎么样,能给我们提供拖拉机和机械吗?”他回答说:“会给你们几台拖拉机。”难道这种回答不能说明对我们的错误态度吗?请看下面这种情况:今年,哈萨克斯坦 380 万俄亩耕地产粮 7 500 万普特,与此同时,西伯利亚 700 万俄亩耕地产粮 10 800 万普特,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有 600 万俄亩耕地,其产量与哈萨克斯坦的 380 万俄亩耕地的产量一样多。这说明谷物业在我国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而它却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得到所需要的物资。难道提出耕地面积增加 8% 就够了吗?其实还存在一个新耕地实行轮作的问题。这就会大大地超过 8%,而这一情况并没有反映在实际措施和控制数字中。

决议案关于农业这部分还谈到了畜牧业。不过却是从油脂制造业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难道是这种消费原则决定我们在畜牧业领域的任务吗?难道从发展工业的角度来看畜产原料不应当发挥巨大的作用吗?然而在这里,这一点根本没提。我们再来看哈萨克斯坦,这是畜牧业领域的主要畜产区。我们有 4 100 万头牲畜。从 1925—1926 年度以来它是这样发展的。1925—1926 年度的总产值是 23 000 万—231 00 万;1926—1927 年度是 25 500 万;1927—1928 年度是 31 600 万;1928—1929 年度是 34 000 万。其中商品产值分别是 6 600 万、9 900 万、13 600 万、15 400 万。由此可见,畜牧业在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应当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也应当受到相应的关注,然而对畜牧业的投资却一点儿都没有。今年用于改良土壤的资金我们一个戈比都没有得到。在我们这里割草问题很重要。一个糟糕的冬季下来,所有的牲畜就都白养了。因为我们没有割草。需要割草,而这方面的机械供应我们得到的非常少。我认为,同志们,这不符合这个决议的规定。

说说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发展问题。首先,我认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加工里杰尔的精砂而将锌厂迁至库兹巴斯是错误的,其实只要建成乌巴电站,就可以在里杰尔或最终在埃基图兹地区用电解法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经济。

然而令人非常气愤的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哈萨克斯坦的态度。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1925—1926 年度向地方工业投资 75 万卢布;1926—1927 年度投资 100 万卢布;1927—1928 年度投资 57.5 万卢布;1928—1929 年度预计为 37.5 万卢布。难道这不令人气愤吗?如何评定这种对待一个落后的地区、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一个民族共和国的态度呢?请同志们自己去

评定吧。我认为这种态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也是令人气愤的。

柯秀尔:反正洛博夫不在。

戈洛谢金:但是中央全会在,它应当关注这个问题。

臧声:对。

戈洛谢金:提案中是37.5万,一年比一年少。[你们怎么考虑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关系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

丘巴尔:不仅靠工业,也靠粮食。]

戈洛谢金:可是哈萨克斯坦提供的原料很多,而对农业和工业的投入却非常少。

臧声:明年我们投入。

戈洛谢金:下面我想谈第二个问题。李可夫同志在说明农业的发展过程时指出,根据百分之十的统计调查,今年中农的播种面积在减少。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速记记录,不过大致是这样的。我不能为这些数字去争辩。

柯秀尔:他说的是富裕中农。

戈洛谢金:我就根据百分之十的统计调查,拿哈萨克斯坦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来说说。今年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首先,那里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4%。哪些农户增加了播种面积呢?拥有3俄亩以下耕地的贫农农户去年的播种面积是44 600俄亩,今年是48 200俄亩。拥有3—8俄亩耕地的农户去年的播种面积是221 000俄亩,今年是228 000俄亩。拥有8—16俄亩耕地的农户去年播种了206 000俄亩,今年是220 000俄亩。你们都看到了,过程就是这样的,贫农农户,特别是中农农户增加了播种面积。相反,拥有16俄亩以上耕地的农户的播种面积却在减少。役畜的情况也是这样。去年贫农农户拥有17 151头役畜,今年拥有21 661头。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农户的情况也是这样。去年拥有72 318头役畜,今年有73 304头。机械供应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过程与李可夫同志所说明的过程截然不同。我们对剩余商品在各类农户之间的分配情况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是这样的:去年富农和富裕农户占全区农户的4.5%,占有全区剩余商品的31%。今年,这类农户占有全区剩余产品的15.9%。而去年中农农户的剩余商品占有比例为76.3%,今年为82.1%。可见,主要剩余商品已从富农农户转向了中农农户。

因此,我认为,从全联盟整个情况的角度来看,我很难驳斥李可夫同志所说的情况,但根据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所作的调查来看,我认为调查的结果与李可夫同志所说的情况是矛盾的。

现在谈谈整个决议案。如果除去几处表达不清楚的地方,那么,从每一个单独的部分来看,这个决议案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综合起来看,则有些拼凑起来的感觉,尽管决议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要是有些问题提得不明确。例如,决议案中没有论述我们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遇到种种经济困难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同志们,李可夫同志谈到的这些困难,外汇、出口、进口方面的困难,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帝国主义之间尖锐对立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吗?而这一点在这里却看不到。难道我们国内的所有困难不是在联盟内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吗?情况就是这样,迄今为止党一直是这样看的,而决议案却没有提到这一点。这就是说,问题提得不明确。

如果逐一来分析,那么决议案中的第12条使我感到困惑不解。

我认为,把农户分成几部分是我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在商品保证率方面的一大缺陷,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农业税方面有阶级规则,我们在机械供应、贷款和选举法方面都采取了阶级立场。选举法对农户的分散有影响吗?有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种影响了吗?看到了。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央七月全会作出的决定提出了通过合作化和集体化将农户合并起来的办法⁹⁸。另一种办法是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合并。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我看了第12条的内容,这一条把整个事情与农业税问题联系在一起,说农业税需要修改,同志们,我认为这会起错误的理解,在党内引起很大的疑虑,人们会以为对待农村的阶级立场要发生极大的改变。

喊声:对!

戈洛谢金: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不否认。

有人喊:那您就是实用主义。

加里宁:有人说是事务主义。

戈洛谢金:好好想想吧,您才是事务主义。正因为某些人以事务主义的态度看问题,所以他们才“乱插话”。使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一条会在地方、在党内产生不良的影响。

接下来是最后部分,说的是各种倾向。这部分看起来都很正确,但同时这部分却丢掉了中央委员会在此次全会之前,在致莫斯科组织的公开信⁹⁹中、在《真理报》的一些指导性文章中¹⁰⁰、在斯大林同志向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演说¹⁰¹中的那种明确强调的提法。现在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已经明确,而这里

对这一切却轻描淡写。

喊声：对！

戈洛谢金：应该说，特别是我们，各个组织的书记，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条件下，我们已经使党致力于解决右倾问题，这是主要的。然而这里却完全忽略了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是李可夫同志的说明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要分清我们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的是党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不是党内倾向，这是在党外形成的孟什维克派别。与他们进行斗争需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如果我们说的是党内的各种倾向，那么我们指的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请问，两者有何区别？没有什么区别。

丘巴尔：两者都坏！

戈洛谢金：两者都坏。既然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说成是孟什维主义倾向，那么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又怎样呢？这种倾向也是那样的货色。我认为，这里应当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说法，提出一个更加明确的方针。党提出的那个正确的方针，也就是中央委员会最近提出的那个方针，应当在这个决议中有所反映。

[加里宁：这令人怀疑，首都总比外省要左，而这里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戈洛谢金：不，正相反，加里宁同志，没有人怀疑您是十足的左倾(笑声)。]

李可夫同志在报告和决议案中强调，这是思想斗争问题。这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只是思想斗争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某些组织结论就不需要了呢？如果你们发现报刊编辑有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

喊声：撤销职务！

戈洛谢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和出版部部长有……

喊声：解除职务！

戈洛谢金：要是某联共(布)区委员会或边疆区委员会的书记有呢？谁会同意？我认为，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边疆区委员会、区委员会，都不会同意，只与他们进行争论并让他们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领导群众。要把重点放在思想斗争上是必然的，是正确的，是应该的，但并不排除有的时候也要作出组织结论。(笑声。鼓掌)

主席：现在请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们，你们已听了李可夫同志的发言。我不准备谈他发言的第二部分[这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能感觉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口气¹⁰²]，我要谈

的是第一部分。因为在他发言的第一部分中只字未提黄金和白金开采业方面要做的大量工作。关于这个行业的情况,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都只字未提,然而关于这个行业的情况要说的非常多,因为现在该行业的处境非常困难。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并没有采金业,黄金开采还处于半手工状态,采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办法,然而这个行业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广阔的前景。我国有丰富的矿藏,有矿石和矿砂,我们可以把黄金和白金开采量提高很多,起码可大大超过战前水平。

有人喊:问题究竟在哪里?

谢列布罗夫斯基:问题在于要有资金,要向基本建设工程投资,而这方面的情况无论是李可夫同志还是古比雪夫同志都只字未提。

洛佐夫斯基:开采黄金也需要黄金。

谢列布罗夫斯基:要获得黄金,就必须投资并建立黄金和白金开采业,就要有真正的金矿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说,黄金开采量将会增加。最近随着“全苏国营采金业股份公司”¹⁰³的成立,我们刚刚着手做这项工作,第一年便有了改观,今年夏季,这种改观得到了加强。今年的黄金开采量已有一定增加。最后一个季度,第四季度,我们的黄金开采量可超过整个前三个季度,第三季度的最后一个月,9月份,一些管理局的开采量增加了4.6倍,而结雅管理局增加了10倍,也就是说,9月和10月两个月的开采量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开采量。去年共开采25701公斤。明年我们要开采4万公斤以上。我认为,我们无疑能达到这个指标,因为我们有矿藏,已探明的储藏量表明,我们肯定能开采到141000公斤黄金。在已探明的这些地方可以展开工作,开采那里的黄金。

现在我们的矿场情况怎样呢?从前的资本家只是开采了矿床的表层,他们远没有开采到深层,矿石在深层;所有的工作都是沿表层进行的,如果要开一口40—50俄丈深的矿井,他们就会放弃;他们不愿意往里投钱,只是贪婪地获取最大的利益,开采表层矿。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现在,既然我们是按照技术要求来对待这件事,我们就应当像办工业一样来办这件事情,像对待其他工业部门一样。李可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描述了我国工业的景象,一派美好的景象——几百万资金被用来搞生铁,搞有色金属,几百万资金流入重工业,工作按照技术要求进行,逐渐趋于合理,等等,——这一景象在黄金开采业至今没有出现,所以也有必要造成这样一种景象。

我去过阿拉斯加,随后又去了西伯利亚和远东边区。我发现,阿拉斯加的工作条件一点也不比西伯利亚和阿尔丹的工作条件好,而那里的黄金开采量却比

我们多,金价也比我们便宜,因为那里是机械开采,那里的黄金工作搞得有条不紊。那里有蒸汽挖矿机、扒矿机、机械挖掘机,一句话,拥有开采金矿所需要的一切设备。那里的黄金采矿场的地位并不比其他有色金属采矿场低,可能还要高一些。在我们这里,这项工作根本没有被摆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其实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采矿场需要的机械——卷扬机、压缩机、电力设备、手持式凿岩机以及其余的所有设备,苏联都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来。我们的机械制造厂正在着手做这件事,我们最近已经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通过全苏机械技术辛迪加将部分订单交给“街垒”工厂、普梯洛夫工厂、莫托维利哈工厂和科洛缅斯基工厂。接着,我们又把金刚石加工机床的订单交给了伊若拉工厂。索尔莫沃工厂还将制造基斯通钻床,等等。所有这一切,就像锅驼机、发动机和发电机一样,在这里,在我们苏联都能制造,所有的工作不存在任何困难,今后已经不必规定进口定额。我们需要美式机器的样品,要把它们运到工厂,以便工厂能够按照这些进口的美式样品改变尺寸,挑选合适的材料,画下图纸,制造出一切必要的设备。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矿场、使我们整个黄金开采业完全更新装备,全部实现机械化。

现在是否值得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如果你们没有机会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可开采出黄金的矿床。我可以告诉你们,萨哈林专区、马林斯克原始森林、北叶尼塞、南叶尼塞、米努辛斯克专区,这些最富饶的地方已探明黄金矿藏极为丰富,但开采量并不很大,这些地方工作搞得不好,没有展开。我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工程规模过小;目前为我们提供的资金规定用于黄金开采,数额为3300万卢布,但是还不够,我们的投入不能少于3850万卢布。

如果我们想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振兴黄金开采业,我们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根据我们提出的工业财务计划,我们应该将基本建设工程的投资规模扩大550万;我们精打细算,仔细审查,慎之又慎,得出的结果是,单单对白金开采业的投入就需要1500万,对黄金开采业的投入需要3850万¹⁰⁴,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展开开采工作。我们必须现在就提出叶尼塞的蒸汽挖掘机、远东和阿尔丹的电动采掘机的问题,那里拥有丰富的矿藏和冲积矿床,现在就可以动工开采。另外,经过我们勘探,发现一些新区,就在不久前,我们发现了位于维季姆地区和阿尔丹之间的托科地区,那里的蕴藏量极为丰富,1立方俄丈可采2.5磅黄金。现在是冬季,尽管天气寒冷,到处是积雪,我们还是向那里派出了工人,运去了供应品和器械,并已开始加紧工作。为了发展像托科

和科拉尔这样的新区,我们必须有资金,我们在综合工业财务计划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是:我们要进入无人居住的新区,那里地处原始森林,生活艰苦,那里的条件就像20年前杰克·伦敦所描述的克朗代克^①和育空高原的情况一样。我去过那里,那里已经是文明的地方,能够生活,甚至可以躺在床上睡觉,而在我们的原始森林中几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由于没有住处,现在我们的许多工人只得住在帐篷里,而且这是在冬天,在零下40—50度的严寒中。我们必须在那里搞住宅建设,我们认为必须把我们工业财务计划中的住宅建设资金数字增加90万左右。否则,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工程的规模扩大到380万,我们就根本无法向那里派任何人。不能让人住在帐篷里,冻死或病死,特别是在我们苏联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能允许发生这种情况。进入偏远的原始森林的只能是那些顽强、勇敢和强壮的人,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只能坚持几年。我知道许多在那里工作过的共产党员,他们回来时都患有各种疾病,染上了风湿,几乎全都得过肺炎。只要我们向那里,向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派遣一名党的工作者或工程技术人员,那他注定会在两年后成为一个近乎残废的人。现在仍然有一些同志到那里去,因为我们需要黄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必须开采它。要去那里,要去那些最寒冷的、尚未探明的地方进行勘察,夏天,那里只能徒步跋涉,冬天要乘坐鹿和狗拉的雪橇行进。但那里有大量的黄金,我们需要勘探和开采这些黄金。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也就是说,与我们以往的控制数字相比,用于基本建设工程的资金不足。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加大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基本建设工程。根据我国的五年计划,我们提出如下发展目标:1928—1929年度我们要提供40 000公斤,下一年度提供53 000公斤¹⁰⁵,最后,在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达到87 000公斤。这将超过战前水平3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应该投入的资金总的来说规模还不小。这些投资用我们在五年计划的第四年开采的黄金就可全部偿还。同志们,黄金和白金开采五年计划应当加以修改,应当侧重于加大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投资应该加大,不过开采量也会增加。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几句我们与承租商即我们的临国的关系¹⁰⁶。几年前,我们把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博代博的一个储藏量极为丰富的金矿租让给了英国人。毫无疑问这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容许的。现在要除掉这个长在我们身上的脓包非常困难。我说这个不是因为“勒拿·戈尔德费尔德

^① 加拿大西北部黄金产地。——中译者注

斯”¹⁰⁷对我们有害,但是他们没有搞任何基本建设工程,也没有进行任何勘探,不再做善于经营者应该做的工作,而是以掠夺的方式进行工作,开采从前探明的所剩不多的黄金,然而还不止这些。他们解雇了几千人,停产,将矿区毁掉。他们要做的就是以掠夺的方式每年从那里榨取近200万的利润。这是不正当的、掠夺性的利润。他们使用的只是手工采金的方式,填埋和糟蹋了30%的黄金,只开采表层而毁坏了矿床。我认为,他们现在就坐在那里,自己不工作,也不让我们工作,而且我们的工程师总要与承租方的工程师有一定接触。如果在租让企业中是一些向其学习的外国工程师倒也罢了,可那里坐着的是我们俄国的工程师马洛泽莫夫等人。他们做的那些事要予以注意。在我们进行勘探的时候,他们的代理人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勘探队旁,声称对我们发现的地方拥有同样的勘探权。由于他们到处都有关系,甚至在矿物燃料总局都有关系,所以他们为了得到这个地方,将我们的申请压下5—6天,同时提出他们同样的申请。

难道我们在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时曾允许承租商涉足吗?没有让他们涉足。

有人喊:有一个人涉足了。

谢列布罗夫斯基:我们很快将他赶走了。他就像瓶塞飞出瓶口一样匆匆离开那里。

我相信,我们能够使采金业发展起来。我们必须有严格的工作计划,我们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计划;必须为基本建设拨款,无论如何我们会争取获得拨款。只要做到这一切,那么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各级组织的帮助下,2—3年后我们将使采金业的发展超过美国,并把它建成真正的苏维埃工业。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大工业,在这里工作的将不再是手工采金者,而是真正的无产者——同我国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一样。

主席:现在请加马尔尼克同志发言。

加马尔尼克:政治局让我们讨论的关于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号召全党“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清醒地分析整个局势,既不能掩饰困难、官僚主义地粉饰现实,也不能危言惑众地夸大危险”。如果我们能按照这一号召去做,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清醒地分析提供给我们所有关于控制数字的材料,分析当前国内的整个经济和政治形势,那么我们必然会承认,在过去一年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进一步加强,农村的公有化和社会主义成分得到加强,贫农和中农经济得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上得到巩固。但与此同时,国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阶级敌人加强了对我们的反抗。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

面,在经济战线和文化战线上,我们应当注意到阶级敌人正在变本加厉地向我们发出威胁。谁掩盖和过低估计当前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谁就是在破坏我们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就是使工人阶级失去警惕性。尽管取得了种种成绩,但我们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关于这个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讲得非常正确,提纲也谈到了。粮食和黑色冶金业,我们的薄弱环节以及黄金储备问题,正像昨天李可夫同志在报告中讲到的,我们的情况非常严重,商品极度匮乏,今年的粮食供应会非常紧张。全面总结过去一个经济年度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分析1928—1929年度的主要计划方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当前的困难和危机现象是伴随这种大规模、高速度的发展而出现的。当前时期的整个形势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应当全面、充分地坚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立场并向前发展,绝不后退。

喊声:对!

加马尔尼克:我认为,整个的形势充分证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证明,我们必须沿着实施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道路前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写道:“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¹⁰⁸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抓住了这个特殊的环节,现在毫无必要改变它,而是要牢牢地把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抓住的这个环节,毫不放松,从而真正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后过渡到下一个更高的环节上去,通过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阵地来改变环节。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代表大会向全党发出了什么指示?我想,这个问题在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的总结报告中已得到详尽阐述,并被代表大会通过。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党的任务: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已经达到的发展速度,并在最近的将来加快这种速度,以便创造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必需的有利条件。”¹⁰⁹而关于农业,斯大林同志说:“农村中的情形却与此相反,产值的增长比较缓慢……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这种增长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是打破纪录的,也不能认为这种增长足以使农业和我们的国有化工业之间将来保持必要的平衡……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在于放慢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吧?绝不能这样做!这是一种极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空想。国有化工业应当而且一定要加速发展。这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证。这是最后使

农业本身工业化的保证。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¹¹⁰

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我认为讲得很详尽)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否继续有效呢？当然，它依旧完全有效。而由于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遇到的那些困难，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存在的其他许多问题，我们是否就要作一些修正，是否就要放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各项立场呢？无论如何不能说放弃这些立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的整个时期充分证明这些立场是正确的。我想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这些立场出发，谈一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报告中和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草案中的那些说法。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上一次全会上要求我们对，对中央委员会提出批评。我认为，在这次全会上不妨利用一下李可夫同志在上一次全会上的这个请求。

有人喊[米高扬]：你认为这个请求现在还有意义？

加马尔尼克：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着重谈谈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报告中的某些论点，特别是有关工业化问题的论点。我完全同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说法，并且我也认为，如果以为在这个礼堂中没有哪一位中央委员认为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将按照一定的、准确规定的级数加快工业化发展速度，那就可笑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李可夫同志的论点，在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上和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想，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确定工业化发展速度的任务是努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得对，但说得不全面。确定发展速度一事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点，即我们必须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到这个第二项任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就其实质来说，这是确定发展速度和促使我们去完成工业化的最重要的任务。不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为我们大量引证的美国质量指标的数据必然会随时提醒我们注意工作质量，注意工业化的速度。这些数据必然会使工人国家加快发展工业的速度，从而尽快缩短我国工业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差距，赶上并超过它们，为此就要集中工人国家的全部力量来实现工业化。我们坚决反对超级工业化，反对托洛茨基的反中农、反农民、实质上是反革命的计画，但我们赞成提高和加快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而且不仅要使工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还要在尽可能短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问题。我认为政治局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决议草案中突出强调了振兴农业的问题。我认为,米柳亭同志列举的有关最近几年农业发展变化的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情况,比那些实际上热衷于谈论农业的递减曲线的同志讲得要好,如果同意这些数据,那就绝不应该放松对振兴农业的极其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对农业的薄弱环节,对农业的谷物部门的关注。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在于动员大家都来关注振兴农业,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还在于农业的发展方向。因此我想,我们完全应当坚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阐明的¹¹¹立场,即根本的、主要的出路在于实现农业集体化,在于从个体小农经济向大公有经济过渡。我要指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曾猛烈抨击乌克兰人的决议没有突出强调这个方针¹¹²,他做得完全正确。他说,乌克兰人的决议有点地方自治机关的味道。为了使我们在任何地方遇到这个问题时都绝对不偏向地方自治机关,就必须明确地突出强调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同时动员全党集中精力去想方设法发展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我觉得这还不够,我想,全会也不可能满意政治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的内容。决议草案中写道:

“中央全会肯定了最近一个时期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中取得的很大成绩,同时强调指出,在促进个体农民经济发展方面,党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还没有采取能够切实有效地发动基本农户的一切措施。”

这段引文的头两行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是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在实施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道路上走出了头几步,而且决议草案作出的“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评价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与这项决议其他几处的说法有明显的矛盾,因为在那一页的开头说,在这方面“在行将到来的1928—1929年度要迈出第一步”。知道了吧!如果1928—1929年度只是迈出第一步,那么怎么可以在下面又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呢。这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在这个决议中也不一致。卡尔马诺维奇同志刚刚着手建设国营农场,就祝贺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不符合自我批评的精神。

这一条的第二部分讲,要大力推动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正确的,而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第一部分讲得不对,总的来说,整个这一条应当彻底重新改写,要为党确定正确的方向,要使党在振兴农业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地执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要使我们队伍中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偏离党的正确道路。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并注意到我们现在正在经受的经济困难,我

们都清楚,我们的前面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就必须有主动进攻、勇往直前和与危言惑众的人作斗争的坚强意志。我们知道有两种危言惑众的人。一种是在退却时危言惑众的人,另一种是在进攻时危言惑众的人。这两种人我们都遇见过。我们都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¹¹³上谈到了对着在退却时危言惑众的人架起机关枪¹¹⁴,我们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十月革命期间也谈到了对着在进军时危言惑众的人架起机关枪。现在我们正在进攻,在这种进攻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危言惑众的人,他们制造的恐慌使我们难以尽快克服困难,所以应当对着他们架起列宁的机关枪。

我想就我们工作的质量问题再说几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这是最必要、最重要的任务,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决议草案十分正确而又充分地强调了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在我们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号召我们要与之进行斗争的奥勃洛莫夫习气仍多得很。

我想举两个有关质量指标的例子,不是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而是比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例子。几天前我与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还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手头有这方面的材料,他对我说,要使我们全党都知道这些材料。我给你们讲两件事。去年冬天远东地区的几位共产党员经济管理工作者去了一趟日本。他们中间有两位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乌苏里斯克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外贝加尔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他们带回了一些足以说明日本工作质量的材料。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日本现在机车大修只用6天,而我们这里机车大修大概要用70天(最好的情况)。这两位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做了这样一项工作:他们选了一个在日本货运周转能力最强的铁路段,查看了列车运行记录,好像是6个月的运行记录,结果发现,在6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列火车晚点过一分钟。而我们的特别快车在200—300俄里的运行中常常晚点1个、2个或3个小时。

丘巴尔:在车站要停1个小时。

加马尔尼克:丘巴尔同志说在车站停1个小时。

丘巴尔:在库尔斯克停1个小时,在基辅停3个小时。

加马尔尼克: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加强和改进所有的工作,加快工作的总节奏。但是,同志们,为此必须首先展开力所能及的自我批评,要大胆地、坚决地展开自我批评,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并且要使自我批评能够促使全党和工人阶级充分注意我们工作的质量,充分注意工作中明确的阶级路线,充分注意同各种倾向——托洛茨基主义或右倾的斗争,而当前首先是要注重同右倾的斗争。

关于黄金问题再说几句。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已将有关情况对我讲了。我本人已经不再管远东地区工作,我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关于黄金的问题是全苏联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列举的关于黄金储备状况的数字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关注黄金问题。我们都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1年在他的一篇题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的文章中是如何提出黄金问题的,当时他说,世界革命胜利后我们要用黄金在世界各大城市修建厕所,而目前“在俄罗斯联邦仍然应当爱惜黄金,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用黄金买商品时要买得便宜些”。¹¹⁵我认为,现在应当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说法作一点补充:现在在我国开采黄金时要开采得多些。因此要支持谢列布罗夫斯基关于黄金的意见。应该说,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对这个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还是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¹¹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经济委员会中就否决了我的意见,当时我只是建议在决议中提一下黄金问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拒绝把黄金问题写进决议的理由是,开采黄金的益处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认为黄金储备的现状,这一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已经讲了,还有进口的需求,都要求我们记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句老话——爱惜黄金,用黄金买东西时要买得便宜些,卖黄金时要卖得贵些,还要作一点十分重要的补充——开采黄金时要尽可能开采得多些。

最后我要谈一谈各种倾向和与之进行斗争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柯秀尔同志和戈洛谢金同志的提法,我认为,在决议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发言中,与各种倾向作斗争的问题表达得不够明确。依我看,提交我们讨论的有关控制数字和莫洛托夫同志报告的决议草案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不完全一样。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报告的决议草案对问题提得比较明确,相应的条款表述得好一些,说得比较清楚,尽管决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

喊声:对!

加马尔尼克:我想,我们应当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以便表达方式与党所说的一致。实际上党在这个问题上已表示了看法。我们在全会召开之前已经与全党通了气,党对我们说,党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党认为当前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因此党认为主要火力应当对准右倾,党坚决反对调和主义。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¹¹⁷上说,“两种倾向都坏”¹¹⁸。现在我们说两种倾向都坏也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不过,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两种倾向都坏的时候还说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讲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存在种种条件和情况,加上党

与两种倾向的斗争的准备程度不同,而且这两种倾向都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较强的火力集中到反对中农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上来。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吗?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道:

“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¹¹⁹

当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为——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是主要的、最危险的倾向,同时也要注意,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免疫力是很强的,所以必须把相当强的火力集中到右倾危险上来。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说:“我想,反对派的社会根源就在于城市小资产者阶层在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日益破产……反对派反映了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革命制度的怨恨和不满。”¹²⁰那么当前右倾的根源在那里呢?根源在于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在于出现了种种资产阶级倾向,在于富农仇恨我们的进攻。由于这一切,当前我们要向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发起坚决的进攻(这种进攻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向小资产阶级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式的动摇不定发起坚决的进攻。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也说,必须在党内造成一种让每一位同志都能在支部内发表看法并且不给他戴上错误倾向帽子的局面。我想,现在不应把支部的工作重心放在这方面。现在支部工作的重心应当是,通过开展自我批评、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教育工作,在支部内造成一种让支部能学会迅速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倾向的局面。

喊声:对!

加马尔尼克:这就是现在要求支部做的事情。要着重强调这一方面。我想,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初分别去了莫斯科精密仪器厂支部和列宁格勒普梯洛夫工厂支部,这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两个支部立即就明白和搞清了怎么回事,并义正词严地请他们离开。现在必须使精密仪器厂支部、普梯洛夫工厂支部和其他数千个支部马上搞清楚报告人讲的是什么、哪里存在错误倾向,要使他们能立即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倾向并谴责这种错误倾向。我想我们应当完全根据党的所有支部的要求来说明现在支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同时不忽视托洛茨基主义,并与它进行斗争,还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与右倾危险作斗争,要提高警惕,捍卫党的路线。

主席:现在请施瓦茨同志发言。

施瓦茨:只要你们看一看控制数字提纲,听一听李可夫同志的发言,你们就

会发现,谁都没有提及燃料问题。什么热门话题都谈了,从冶金工业说起,机器制造工业、建筑业,能想到的都谈了,唯独没有提燃料,燃料被忘记了,好像一切都很如意。

有人喊[丘巴尔]:外面很暖和。

施瓦茨:实际情况是这样吗?我想不是这样,而且我本来就认为一味地这样做是不对的,是错误的。现在我给你们读一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们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词,看看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下面就是他讲的有关煤炭的一段话: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和整个这一工业部门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你们当然都知道,没有煤炭工业,任何现代工业和任何工厂都是不可设想的。煤是工业的真正的粮食。没有这种粮食,工业就会瘫痪;没有这种粮食,铁路运输就会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无论怎样也恢复不了;没有这种粮食,各国的大工业就会崩溃、瓦解,就会退到原始野蛮状态。”¹²¹

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考虑、所说的。煤炭、燃料是什么?这是整个工业的粮食。

斯大林:煤炭——这可不是木柴。

施瓦茨:对,煤炭——这不是木柴。木柴、煤炭都是燃料。然而无论是决议中,还是主要的报告中,都只字未提燃料问题。

没错,国家计划委员会有点糊弄我们,就是糊弄。说什么很可能不久这将是薄弱的环节。我认为,今天这就是最薄弱的环节,昨天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既然能为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弄到钱并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工厂,进口工厂……

柯秀尔:两年的时间你能建一座什么样的冶金厂?

施瓦茨:可以进口工厂,什么样的冶金厂都可以花钱进口,然而花多少钱都不可能进口任何一个矿井,这是事实。

有人喊:煤炭可以进口。

施瓦茨:矿井是不能进口的。矿井可以开掘,煤炭可以进口,粮食也可以进口,一切都可以进口,我们谈的不是这个问题。

有人喊[柯秀尔]:你要步步进逼吗?

施瓦茨:我们是在谈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当然是谈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不可能谈我们将来要进口什么。如果明天发生战争呢?我们大家一同听取了温什里希特同志的发言,提纲也讲道,不应该忘记这一点。那时该怎么办?难道

那时能进口煤炭吗?不行。我肯定地说,这里所有的期限都延误了。我尽量给你们透露点燃料的状况。我们在各矿场有4000万普特的应急储备,现在不能动。截止到10月1日,在消费者那里我们有两个半月的储备。按照我们的规定,这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进行动员以及工业动员的最低储备。起码应该有三个月的储备,两个月的储备勉强够。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呢?你们都知道,我们在顿巴斯的工作已经受挫:10月份受挫,11月份受挫,一季度完全受挫,二季度看来也要受挫,这已成为事实。那么结果是,截止到10月1日,我们在所有的消费者那里还有26800万普特,可保证两个半月。10月份我们应当为消费者提供11200万,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是9900万。这样,我们少给了1300万普特,差了这么多,截止到12月1日还有25500万普特。11月份我们应提供13000万,而我们提供的是9900万,又差了3100万。这从哪里出呢?就从那些储备中出。这样,截止到11月1日我们将有22300万的储备。如果我们按这个比例来说,而12月份我们又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燃料,那么到1月份我们的储备就会是18400万普特,即1.7个月的需要量,这已经是危险的数字了。如果在第二季度我们的供应进度仍然如此,因为主要的第一季度已经受挫,那么我们只能有1.2*个月的燃料储备。我们应当有两个半月的储备,结果我们只能有一个月多一点的储备。

情况就是这样。当我们在顿巴斯的生产已经受挫的时候,无论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都没有向全会说明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做是错误的。说明天燃料将是一个薄弱环节,这是不对的,昨天就已经是这种情况了。煤炭工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大型矿井至少要经过4—5年才能开采。过去,甚至在战前,我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这方面通常是参照战前的情况,不过这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能这样来看待工业问题。如果从亚当和夏娃时期来看,那会有更好的指标。我认为,该是将这些没有用的、有害的指标抛弃的时候了。要坦率地讲明我们现在的情况,情况很糟糕。所以我想,要对提纲中的有关内容加以修正,在燃料方面,要说明期限已经过了,应当采取另一种工作速度,不仅是在燃料方面,而且在矿石方面,特别是在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矿石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这是燃料方面的工业支点。如果情况真如温什里希特在这里所说的那样,那么你们知道,一个月的储备可谓寸步难行。如果注意到,按照五年工业计划,我们的燃料供应量要超过现有水平,

* 原文如此。——俄文编者注

即每年要多提供3亿普特的燃料,那么整个工业和整个国家受到的威胁也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今天说需要进口,那么也要考虑到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口,要预先想出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我认为,在燃料方面期限全部延误了。我们自1920年以来一直在尽力设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在1920、1921、1922、1923和1924年用燃料的车可以跑来跑去,当时需要振兴整个落后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等,如果说当时靠主产矿井能够这样做,那么今天这样做就是犯罪。现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但愿不是有28口矿井,而是48口矿井!因为从我们在顿巴斯遇到的情况来看,我们简直是在走钢丝,工作负荷已达极限。为顿巴斯定的指标超出了它的最大生产能力,是完成不了的。我们可以把旧顿巴斯变成一个新顿巴斯。可以通过发展最新技术对旧顿巴斯进行改造、扩建,延长其开采期,将它建成一个新的顿巴斯。过去,按照我们旧的经济指标,巷道可延伸一公里,而今天可以乘汽动和电动车沿巷道走三公里。不过为此应当有起码的储备。我们说的是燃料储备和黄金、货币储备,等等。而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11口矿井¹²²停产,而是48口新矿井在生产,那我们就可以让一部分老矿井停产,对它们进行改建和扩建,把旧矿井变成新矿井。那么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会有燃料,而且一定会有生铁,因为没有燃料就不会有生铁。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对待燃料的顽固态度。否则对整个工业和国家都是不利的。

请允许我将话题转到我们的实质性工作上来,转到我们工作的质量上来。该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昨天,报告人把我们的工作和美国人的工作作了比较,这对我们很有益处。他举例说明了资本家是怎样工作的,我们是怎样工作的,谁将赶上和超过谁。在这方面必须尽力强调党的意图,要全面考虑。像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今年我走遍了整个顿巴斯。工作做得很差,糟透了。我还有机会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区转了转,看看那里的情况。我从利西昌斯克前往格里希诺,途经戈尔洛夫卡的矿场,察看了新的炼焦炉。

柯秀尔:你过夜了吗?

施瓦茨:我不需要过夜。在那里为我们安装新炼焦炉的是一家德国公司。

布勃诺夫:就是建立新矿井的那个地方吗?

施瓦茨:是的,是的。德国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有人报告了一位德国工程师,他就是这家公司的技术经理。

丘巴尔:他就在戈尔洛夫卡吗?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施瓦茨:他在那里领导工作,他是公司的一位技术经理。有人告诉他,来了一位主席,想看一看。

柯秀尔:什么,主席,是你吗?

施瓦茨:是的,是的。(全场大笑)想看看出焦的情况。他说:马上就出焦。由于我们的俄国工人操作“窄轨机车”慢了些,他便亲自跳上“窄轨机车”。可是在我们这里,按照惯例,是把所有的挂钩都挂上。他弄坏了一个挂钩,1.5英寸的挂钩。他宣布再过15分钟就能看到出焦。因怕碍事,这个时间我们便去看了看化学工厂。过了15分钟,他用气焊修好了1.5英寸挂钩,并用目光寻找我们。他一看到我们,便开动了“窄轨机车”,打开了炼焦炉,将焦炭倒在了一个平台上——随后也用机械装置把平台传送到灭火器下。一个俄国工人把焦炭送到了灭火器下,阀门没有打开,没有出水。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个阀门。再来看一看这位德国经理是怎么做的(在我们这里,可能连办事员都不会动手)。只见他飞快奔向灭火器,抓住阀门,没有弄开,于是他又跳入坑中,从坑中又去抓阀门,他抓住另一个阀门,一下子放出了水。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而俄国工人,很遗憾,动作迟缓,站在一边看。(主席铃响)

主席:施瓦茨同志请求再讲10分钟。

喊声:准许!

施瓦茨:那我就对我们的工程师说几句。诸位,看看吧,那个工程师是怎样为资本家工作的,而你们是怎样为自己、为苏维埃政权工作的?我们工作得不好,因为俄国工程师站在那里,没有跑去开阀门,而德国的经理工程师却跑过去了,我们非常遗憾,我们的工人竟没有赶紧去这么做。现在还有一个情况,这是来自乌拉尔的情况。我们在卡马河流域正在开采钾矿,我们有一个100人的托拉斯做这项工作,而那里还有人在做开采工作,一位总工程师和一个助手,还有一个办事员和一个翻译,已经干了几个月。总共4个人。每当工程师要去托拉斯接洽或送文件,他都要把这份文件在送件簿上登记后放到自己的公文包里,再去我们的托拉斯。这是一位总工程师。而我们这里连办事员都不会自己去送文件。

丘巴尔:我们这里也有工程师去送文件,而不是去做技术工作。

施瓦茨:这不可信。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这是事实。那边是4个人,而我们这里是100个人。

现在,如果我们拿采矿业的质量指标来说,我不能去谈在其他行业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指标与我们要赶超的美国同一行业加以比较,那么按

照我们的计划,我们为每个工人规定的定额是31普特,而在美国的采矿业中是4到10吨。

有人喊[丘巴尔]:矿层的厚度呢?

施瓦茨:我们库兹巴斯的矿层有10俄丈厚,也是这个定额。

有人喊:这是为采矿工定的还是为工人定的?

施瓦茨:不是为采矿工定的,是为工人定的。[要是为采矿工定的就好了。]而他们的费用是8戈比,我们的是18戈比。

正如米柳亭同志为我们介绍的,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米柳亭同志,为什么人家没有谈这些成就——而是谈成本呢?的确,顿巴斯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4年的成本却很难讲了。(笑声)这就是问题的症结——4年的时间,成本始终没有降下来。

[布勃诺夫:有些地方成本还提高了。]

古比雪夫:可以把成本降低5%¹²³。

施瓦茨:这才叫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赶超呢?如果我们就这样跃进,那我们一定赶不上,更不用说超越了,我们超越不了,这一点也需要明确。那么如何摆脱困境呢?同志们,我们,特别是经济工作者已经耽误了所有的期限,我考虑的是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们忘记了伊里奇说过的话——不文明的工人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却在使不文明的工人在我们这里出现,我们的矿井——大门敞开。福特公司在改造和重新设计工厂时,保留了4万名骨干工人,保留6个月,照发工资,而我们这里大门完全敞开,在矿井里吸烟,弄坏机器。不久前发生了爆炸,好在不是瓦斯,是煤尘。如果是瓦斯,如果造成100—200名工人死亡,那该怎么办?多亏我们还没怎么推行机械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大门敞开的情况下推行机械化,我们还会造成工人死亡,造成上百名工人死亡。我们应当彻底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要提供资金。要提供住房建设资金,要提供公用事业资金,要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提供资金,努力使我们企业的工人成为训练有素的、文明的工人。

有人喊:对。

施瓦茨:不过就是不要把钱投到跳芭蕾舞上,而要投到工人区,要进行再教育,而且要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把茶壶拴在工人身上,使他们能够在矿场生活。

斯克雷普尼克:请您讲一讲,工会都在做什么。你们的文教事业基金有几百方,这些资金都在做什么用?

施瓦茨:我现在就讲,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工会、党的经济工作者同样也都在

做工作。

安采洛维奇：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做什么？

施瓦茨：在培训工人，固定工人的岗位，使工人成为文明的人方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仅仅是培训工人，还有技术员，而且我们自己就是些不文明的人。我深信，如果在基层工会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党员那里搜寻一下，如果说他们与工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无非是从工人那里可以找到一瓶伏特加，而从他们那里可以找到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笑声)。我以性命担保，一定是这样。

喊声[丘巴尔]：那你的性命就得丢掉了。

施瓦茨：此话不对，决不会丢掉，我的眼光还是很准的，这个我知道。(笑声)如果我们不尽快改变对燃料工业的看法，不提供足够的资金……

有人喊：这不只是资金的问题。

施瓦茨：我知道，不只是资金的问题，还要学会怎么使用资金。就以建筑材料为例吧。现在正在进行争论。布哈林在争论时说：我们连砖都没有，何以制定建设计划？情况是这样吗？表面上是这样。如果没有砖，那就不能搞建设。这种说法对吗？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使用砖。我们建新房和砌墙都是用三到四层砖，头一年，这种房屋常常下沉，出现裂缝。你们不妨去一趟拉琴科领导的泥炭研究所，莫斯科国家建筑工程局在那里做了实验，砌墙用一层砖中间加一层泥炭板。这样造出的房屋很好，我在里面住了两天。

洛佐夫斯基：第三天就跑了。

施瓦茨：没有，没有跑。是进行了检验，那里又暖和，又舒适。那里是一层砖墙，还有一层泥炭衬料。为什么我们不在各地普遍这样做呢，我们的沼地是很多的。德国人在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用三层砖，而且头一年房屋就出现裂缝。有一位在矿上工作的女工就我的报告发表了看法，她说：“我们花的钱太多了，就连资本家也从来没有这样花过钱，他们善于使用每一戈比，而我们的每一戈比用得毫无价值。”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加强党的作用，如果我们不适当地进行责罚，情况会很糟糕。

主席：现在请安采洛维奇同志发言。

安采洛维奇：¹²⁴我可不指望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为我增加哪怕一点点时间，因此我只谈几个问题。我不谈纯属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中央全会不是预算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也在开会，可以去那里为一些问题申辩。还应该指出，新的国营农场，特别是老国营农场，我看没有获得应有的支持，新的国营农场没有获得在其建设发展初期所需要的支持，而老国营农场没有获得自身巩固和发展所

需要的支持。同志们,我想谈一谈,在我们所讨论的提纲中是否充分反映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无疑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

臧声[丘巴尔]:对。

安采洛维奇:给我的印象是,每过3个月,提纲中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的调子要降低。在这个提纲中,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是作为附带问题或补充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国营农场,还有集体农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7月的文件中不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得明确;而在这个文件中这个问题提得更加不明确。同志们,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讲,现在还不宜提农业基本建设问题,新建国营农场问题就是基本建设,除非工人阶级和党的全部力量都能集中到这个需要全党予以关注的最艰难的任务上来。要知道国营农场的建设,特别是老国营农场的建设存在很多不足。因此,同志们,不提供1亿资金(预计今年能提供这些)要比提供这笔资金而又不能动员党的必要力量来完成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一些。我想以此来说明,只有在工会、苏维埃和党的机关都关注国营农场建设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才会得到有效利用。我们来看看第3页的第8段。这里说:“确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近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确实有了一些成果,但我们现在对这些成绩津津乐道是否为时过早?下面接着又说:“在促进个体农户的发展方面,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远没有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大部分农户真正获得发展。”这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到目前为止同样没有为切实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是的,没有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首先是指老国营农场。古比雪夫同志,难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过一切必要措施来使糖业托拉斯的国营农场这笔巨大的财富发挥作用吗?

有人喊:够了,别再说了。

安采洛维奇:难道各共和国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采取过或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扶持由他们管辖的国营农场吗?这可是一个不仅关系到数百万普特粮食,而且关系到在需要的时候、在最艰难时刻能否得到这些粮食的实际问题。

丘巴尔:这是事实。

安采洛维奇:这是事实,丘巴尔同志,但是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根据这一事实作出充分的实际结论,而不仅仅对国营农场随便议论或夸夸其谈。

斯大林:是有人在夸夸其谈,就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笑声)。

安采洛维奇:我想,夸夸其谈的人甚至还提供资金(当然,资金是非常重要的),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仅此而已,因为我们的经营单位、领导干部情况非常

糟糕,因为我们60%的国营农场甚至没有党支部。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拨款(顺便提一下,给国营农场拨款非常不及时)解决不了新老国营农场的发展和建设问题。

古比雪夫同志:这就是你们工会的事情了。

安采洛维奇: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这样做并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笑声)

有人喊:对,是这样。(笑声)

安采洛维奇:在我们所讨论的提纲中,有关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国营农场、集体化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并没有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实际上,关于开展新老国营农场的建设问题,一年比一年紧迫。不仅要把这项建设工作与获得粮食的任务联系在一起,还要把它与缓解各工业中心日益严重的肉、奶、果品蔬菜困难,缓解城市其他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匮乏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对加强国营农场的问题提得非常明确¹²⁵。七月全会也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国营农场的问题¹²⁶。在我们所讨论的提纲中这一切都讲到了,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讲得不甚明确。这样做不能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组织国家农业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上来,相反,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党的注意力。

同志们,我想在全会上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向富农发起进攻的问题。

喊声:向什么样的富农进攻——富裕的富农还是中等富农?是不够自觉的富农吗?

安采洛维奇:我认为,对富农加以区分只能把人们的头脑搞乱。

喊声:完全正确。对。

安采洛维奇:我认为,倒是能够以此为根据来谈论耐普曼,例如富裕的耐普曼,贫困的耐普曼。要是都这样来划分,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划分。谁都不反对进攻富农。这个问题已明确提出。但是如果实施这种进攻,就要说明,在进攻富农的行动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维护雇农的利益。同志们,我认为,不能对富农发动进攻,如果……

有人喊:怎么不能?

安采洛维奇:如果这种进攻不能改善和提高对雇农利益的维护程度,那就不要发动进攻,而是要采取别的行动。

有人喊:仅此而已吗?

安采洛维奇:不,不是“仅此而已”,而是首先要维护雇农的利益。首先,由于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在保护雇佣工人免受其

他阶级剥削方面,在保护雇农、贫农、中农免受富农剥削方面,我们首先要分清同其他阶级的关系。而在当前的条件下,是否为了保护雇农的利益尽力了呢?我想,还没有尽力,做得还不够。应该说,农林工会存在的不足比该工会主席的头发还多。而我的头发还很多。

有人喊:你也快谢顶了。

安采洛维奇:是的,工会还很弱,不过,通过最近几年的工作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有益的起色、一些成就,从评价党在贫雇农中间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起色和成就还是很有意义的。下面的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工会已发展了近140万会员,其中100万是农业和林业男女工人。工会的年预算额已达2200万卢布¹²⁷。工会有近3万个基层机关。被选入工会各个机关的几万人中大多是男女农林工人。这几年工会得到了发展并有所壮大。但是,也不能在对富农进行有组织的进攻时把保护雇农的利益仅仅当成雇农工会的工作,当成该工会的某种专利。其实,工会的状态取决于雇农的主动性。在阶级意识方面我们对雇农的教育还不够。雇农积极分子的力量还很弱,工会也就很弱。每一个农村党支部,每一个团支部,每一个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应当关注和理解保护雇农免受富农剥削的工作。必须说明的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劳动法典,而不是根据《暂行条例》¹²⁸作出的关于保护富农农户中雇农的利益的决定甚至还没有在苏维埃系统公布,这一事实无助于明确党的路线以及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作。党关于必须根据劳动法典,而不是根据你们大家都熟知的《暂行条例》来保护富农农户中雇农的利益的决定至今尚未得到贯彻。我认为,党的代表大会作出这一决定已经一年,这段时间太长了。在我们光阴如梭的生活中这几乎是一个历史的间隔。雇农,特别是有组织的雇农都知道,党已决定根据劳动法典保护他们在富农经济中的利益。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苏维埃政权对此还没有作出决定。

尽管我这么说,但我并没有想过,现在也没有想把问题交给全会解决。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全苏工会代表大会¹²⁹召开前,由政治局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助于动员雇农去完成有组织地参加对富农的进攻、参加与富农的斗争这一任务,也无助于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必须认清,这样我们就不能制服富农。要知道,富农大多是在农业税、租赁等方面制造麻烦。好像谁都不想制服他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制服不了富农,但这样我们也不会失去雇农,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会失去他们的。雇农通过工会、党和苏维埃一年比一年更加紧密地与工业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如此保护雇农的

利益,我们就会使他们的积极性降低,使他们与富农作斗争的斗志松懈。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

我已经提出了这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对国营农场的建设这一社会主义农业的最重要的部分关注不够的问题,关于在党实行对富农发动进攻的正确政策的条件下如何保护雇农在富农经济中的利益问题。现在请允许我结合自己在斯摩棱斯克组织中近一个半月的经历作出几点结论¹³⁰。我认为,从斯摩棱斯克的脓疮中得出的这些结论在我们上次召开的七月全会上并没有得到充分阐明。我想,在斯摩棱斯克省发生的情况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其实除了斯摩棱斯克的党组织,沃特、克里米亚、索契、阿布哈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也都遇到过严重的情况。至少我本人在斯摩棱斯克组织中,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不过我在想,派我去那里还不如派其他人去。本应该派其他一些同志去那里。在前往斯摩棱斯克省之前,我对右倾危险在哪里基本上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不过那个时候和现在都有一些人对右倾危险在哪里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如果他们能出席斯摩棱斯克省的支部会、工人大会,看一看在这个省发生的情况(这个省离莫斯科并不很远),他们就会说:是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在猖狂地向我们党进逼。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斯摩棱斯克的事情。例如,可以从道德的角度,从那里有人酗酒的角度来看。然而,倘若问题仅在于此,那么我让全会关注这个问题就真的是多此一举了。可以并且应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在斯摩棱斯克组织中发生的一切。问题并不在于那里酗酒的人是多还是少。(笑声)坏就坏在他们喝酒喝掉了阶级路线,坏在他们已经不像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一些根本不饮酒的人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同志们,如何评价这样的事实呢?斯摩棱斯克省不是有省委、省监察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机关吗?然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占地建的独立农庄要比斯托雷平时多几倍。这么说吧,斯托雷平的理想差不多已实现了。将近75%的土地规划员在进行独立农庄土地规划。而且所建的独立农庄都有用链子拴着的狗。你们知道,支部的人是不能随便到那里去的。(笑声)独立农庄经济犹如一座小城堡,独立农庄主可以根本不受无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笑声)他甚至愿意纳税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为履行苏维埃法律做一切事情。然而谁都明白,这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村苏维埃建设的基础。而所有这一切竟是在土地管理机关的赞许下发生的,必须指出,还不仅仅是地方土地管理机关。在莫斯科,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工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正确的决议和通令,而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户却悄悄地

转向独立农庄的发展道路,[而独立农庄主的势力逐渐加强]。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苏联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的现状。我举的只是个别的例子。不过我也要指出,就连土地规划员——我们工会的成员,这可是很值得注意的,也有40%—50%的人为自己建起了拥有汽车、使用雇佣劳动的独立农庄。这不是杜撰出来的东西。我再向你们多说几句:甚至某些共产党员也惦记为自己建独立农庄。出现了拥有独立农庄的共产党员,使用雇佣劳动的共产党员,从事经济活动已达到应征收个别税程度的共产党员。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能莫洛托夫同志会谈到。如果他不谈,那么在讨论他的报告时,只要我有机会发言,我就会尽力说明这方面的情况。但是同志们,根据所说的这一切情况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不仅在党外作祟,而且它正在渗入党内,在党内作祟。我不同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看法,即要号召支部以容许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的特殊态度来对待右倾。不是要容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并存,而是要特别警惕,要与一切歪曲我们党唯一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唯一左的)、革命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作斗争。

有人喊:谈谈工会吧。

安采洛维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预先印有“与原本无误”字样的委托书,只代表他所在的组织说话,那么这样做未必就正确。

有人喊:工会的情况怎么样?

安采洛维奇:我下面就说工会的情况。我认为,工会是一个为几百万非党群众服务的群众性组织,并不是一个极为糟糕的组织。如果说几个月前或一年前工会就已不太糟糕(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我们毕竟共同驳斥过反对派对工会的诽谤)的话,那么今天却忽然有人只看到工会存在的缺点。这是错误的、不客观的态度。工会中存在的缺点是非常多的。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必须在对工会运动进行原则性的领导的基础上,在对每一个工会进行个别分析的基础上纠正这些缺点,慎重地对待工会工作的每一个问题。

有人喊:再讲一讲吧。

安采洛维奇:既然你们要我继续讲,那我就再给你们讲一讲下面的情况。不要忘记,在这些群众性的组织中我们已不再具有无限的影响力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雇农工会主席认为所有雇农无一例外地都拥护我,所有农艺师都拥护我(笑声)。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组织者。我认为,要加强党对工人阶级中的落后群众的影响,还要做许多工作。许多工会,例如建筑工会和其他工会,都是

这种情况。

斯摩棱斯克的事情说明,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某些环节已严重脱离群众。这是斯摩棱斯克的情况。能否总结一下斯摩棱斯克的事情以警示全联盟呢?我已经说过,我个人还没有对斯摩棱斯克的事情进行总结。但是我不能对这一切事实置之不理。我认为,根据这些事实必然还会得出如下结论:不应当过高估计广大群众党性修养的现有水平。广大党员群众只会理解明确的路线,任何不明确的东西只会使人头脑混乱。

臧声:对。

安采洛维奇:这是首先要关注的。你们很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在斯摩棱斯克省召开的一次党代表会议上,一个党员作了如下发言:“你们以为,我们往国外输出的粮食是2500万普特吗?不是,我们输出的粮食不是2500万普特,而是27000万普特。中央在撒谎。不要相信中央,那里的人在‘吃香的’、‘喝辣的’,等等。”

说来惭愧,党代表会议竟无言以对。只是在我按照自我批评的各项准则斥责了这个“农夫”(他客观上起到了挑拨者的作用)之后,代表会议才回过神来,对我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呢?我想说,尽管党的队伍在显著壮大,但还是不要过高估计广义的党员群众的水平。必须注意到,对党员群众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在同各种倾向的清醒的斗争中锻炼普通党员,不要使任何倾向合法化,也就是说不要将其“奉为典范”。一旦某一种倾向在党内获得了某种优势,那就会干扰党对普通党员的教育。至少说,这样一来便不能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教育。

斯克雷普尼克:这怎么理解呢?

安采洛维奇:这很好理解。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已经讲过,他说,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一种反党的思想体系,因此是在党外,而右倾是在党内。我想,在党员中不仅有右倾分子,而且还有其他倾向的分子。因为现实生活的发展进程是辩证的。它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倾向。例如,很可能在我们中间就存在着极左倾向。不过大家都清楚,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要知道,一旦对这种倾向作出一点让步,那么其他倾向也必然会立即要求作出让步。

臧声:对。

安采洛维奇:因此,无论对任何倾向都不能作出让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领导同志或普通同志在个别问题上的每一种想法、每一次犹豫或每一个错误都当作是倾向。

在与所有倾向展开的坚决的、直接的斗争中,而且特别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整个问题就是右倾危险问题。

主席:我宣布,休息 15 分钟。

(休息后)

主席:现在请列昂诺夫同志发言。

列昂诺夫:毫无疑问,提交讨论的这项决议带有强烈临产阵痛留下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还带有许多不够清晰和明确的表达的胎记。我想,中央全会的工作委员会在这方面大概要进行大量的修改和某些补充。不过我认为,党的基本路线,即进一步提高工业化速度、展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进一步对资本主义成分发动进攻并在经济上挤压它们的路线,在这个决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只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业问题。能否想象在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富农经济扩大了呢?能否想象在我们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富农农户的比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绝对数字)和播种面积以及总产量、富农农户产品的商品部分不会缩减呢?我认为作这样的想象未必正确,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不仅仅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还要通过摧毁富农成分的经济基础来进行。最近几年我们的集体农庄不断得到发展的事实,最近几年单是在北高加索(我比较了解那里的数据)就增加了 4 000 多个新集体农庄的事实,最近一年我们新建的集体农庄比前几年所建集体农庄总和还多的事实,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正在摧毁富农农户的经济基础。我们要让贫农摆脱的不仅仅是富农的政治影响。通过组织和加强集体农庄,用播种材料和贷款等为贫农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帮助贫农开发份地,我们正在使贫农摆脱富农的经济影响,正在摧毁富农剥削的基础,从而大大缩小这些富农农户的生产基础和生产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因此有了哪怕是总产量的稳定,有了哪怕是总产量的某些实际增长,那么我认为,总产量稳定这种情况是不应该掩饰的,不应该抹杀显示农业方面发生变化的那些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事实,例如中农农户和贫农农户的发展,中农农户和贫农农户在农民经济的总产量甚至商品量中的份额的扩大。总之,不能一味地提农业发展速度放慢的问题,而无视我们同时也在挤压富农农户并改变、增强日益发展的中农农户和贫农农户的份额这一事实。这表明,我们并不缺少促进个体中农经济发展的条件,有这个条件。富农农户逐步被组织起

来的集体农庄所取代的趋势是一种良好的趋势吗？是一种良好的趋势，要制止这种趋势的观点在党内恐怕会遭到反对，党会对这种观点给以坚决的回击。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拥有足够的促进个体中农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可能再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做任何工作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做许多工作。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它在决议中并没有得到足够明确的阐述，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工作实践必须发生转变，要使我们经济政策的整个方针完全允许的事情成为真正能够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要让合作社的有效利用中农积累的工作的整个实践沿着合作社的轨道进行，不过一定要顾及中农个人的经济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合作社的实践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还想谈一谈第二个问题，阶级斗争和右倾危险问题。这种右倾危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们按照我们的路线正在挤压资本主义成分，不仅对农村的富农农户进行挤压，而且在城市的小工业和商业领域也进行挤压，我们现有的资本主义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挤压和替代。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然而还不止如此。既然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在改造的过程处于困难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既然这些困难，尽管是发展中的困难，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物质生活水平、对我们党员的物质生活水平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既然这些困难使我们无法迅速地、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那么显而易见，挤压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就往往得不到工人阶级某些阶层和我们某些党员十分正确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随着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对我们的发展路线的错误评价、对我们的发展前景的错误估计、对我们的任务的错误提法也必然不断增多。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队伍中才会出现和形成右倾的基础。

那么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思想和右倾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认为在这里把沙图诺夫斯基说成是右倾的代表不太恰当。大家都知道，沙图诺夫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危险并不是从这个营垒中产生的。我认为，绝不应该把这两种危险——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混为一谈。当然，这两种危险都通向机会主义泥潭，都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危险，都会加强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归根结底，它们同样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不过两种危险的根源是不同的。在这方面加马尔尼克同志讲得非常正确：错误倾向有的是在我们进攻时期出现，有的是在我们退却时期出现。我认为，因我们实行某种机动退却或改变我们的进攻速度和前进速度而出现困难的时期恰恰是最容易产生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内部有一些缺乏耐心的人，他们总的来说活得

还不够好,这些人希望更快地向前发展,并没有认识到脱离广大群众的危险。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托洛茨基主义之类的极左辞藻得以泛滥的基础。总之,由于前进不够快或必须实行这样或那样的机动退却,使得托洛茨基思想体系有了基础。

右倾的基础则完全是另一种基础。这种倾向是在我们坚定不移地向前进、更加坚决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出现的,在这个时候,许多人受到我们在坚决进攻时必须克服的那些困难的影响,陷入不能继续前进的悲观情绪之中。这些人想更轻松地生活,想更平稳地向前发展,希望不要遇到阶级敌人强烈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我们在进攻中必须要击溃的。在这方面左倾和右倾危险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对此不能低估,不能只认为二者都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之间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于,我们正处在与这两种倾向的斗争的不同的阶段。如果说托洛茨基反对派是多年来在与我们党的斗争中形成的,如果说现在我们遇到的托洛茨基分子骨干是在党外,如果说多年来我们在与这种倾向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组织斗争过程中已把反对派所依靠的比较广泛的阶层争取过来,那么右倾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右倾不是作为一个已经成立的组织存在,所以我们的任务也不是采取镇压的措施与这一倾向作斗争,不是采取我们很长时间以来所采取的以及现在采取的与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的那种方式。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斗争,是争取广大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广大党员以及广大干部,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我们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影响下走入歧途,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动摇,从而为右倾,为右倾危险,即作为敌对政治势力的派别先后在党内和党外的形成,输送骨干力量和打造基础。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及时防止这种倾向形成,不给这种倾向的形成提供可乘之机。为此必须与政治上的种种倾向和动摇以及对待它们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揭露他们,以便使尽可能少的干部陷入这种动摇不定的危险境地和转向右倾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时期以思想斗争为主的缘故。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进行思想斗争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现在,在当前条件下,应该只是进行反对右倾的思想斗争?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提出问题。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右的倾向在我们党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党外,那么就应当把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而让右倾分子进入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把他们选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等。必须把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这是正确的,但是对托洛茨基分子只采用这一种办法当然是不够的,不仅要把他们投入监狱,而且每天都要在政治上揭露他们观点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从而使他们无法在出现这样或那样的

困难的情况下重新影响各个层次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右的倾向仅仅进行思想斗争是不够的。如果说可以在某个时期容忍右倾分子存在于人民委员部内的话,那么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容忍右倾分子存在于那些他们能够有组织地、直接地向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施加影响、散布自己思想的动摇情绪的岗位上。显而易见,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党无疑应该将他们从这些岗位上撤下来。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正在实行对资本主义阶层发动进攻的路线,那么主要危险就是面对这种进攻引起的种种困难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也就是右倾危险。既然主要是右倾危险和对其采取的调和主义态度,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反对右倾的思想斗争,目的在于使受到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情绪影响的干部尽可能少一些。但并不是只进行思想斗争。在某些情况下也必须采取一些组织措施防止右的倾向可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治派别,以保障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进行。

主席:现在请瑟尔佐夫同志发言。

瑟尔佐夫:在安采洛维奇同志这样具有火热的雇农激情的发言人之后发言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认为我现在发言不是时候。我觉得安采洛维奇同志有一个想法要么是失言,要么实际上是错误的。他说,因为我们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党的路线应当是明确的,以便党员群众能够弄清楚。于是便产生一种离奇的论点,如果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那么就可以允许实行非常不明确的政治路线。我想,恰恰是由于党员群众的政治水平提高了,才有了对明确路线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从这方面来看,提交讨论的提纲需要作相当重要的补充,以便使中央的这个文件不致让人感到它实际上使党倒退了一步。我想,应该对提纲草案作一些原则性的补充和修改,可以说,这些补充和修改会使这个文件稍稍符合党员群众的水平和即将在这个重要决议中提出的要求。不过我想事先对或许应该在这个决议中加以阐述的某些实际问题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必须最坚决地要求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为了在我们已经进入的复杂的改造时期能够担负起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必须提高工作质量。绝不能认为许多经济部门和领导部门的状况是令人满意的。这里已经谈过有一些说明我们在黑色冶金业存在不足的例子。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计划上的缺陷,也不仅仅是基本方针上的动摇不定、犹豫不决,而且还有实际操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曾经出现在捷里别斯厂的不可能的组合,现在又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厂重演。如果说对捷里别斯厂的问题有一些动摇是合理的,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么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厂的问题就不是这种情况了,然而我们在实行这

种组合的实际过程中却看到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动摇和徘徊。这可以作为我们政府部门风习的一个带有共性的实例。现在,在纠正捷里别斯问题上的错误时,却随之又出现了一系列其他的错误,而由于我们政府部门的因循守旧,这些错误纠正起来非常困难。在捷里别斯厂问题上的这种动摇不定的态度导致连接该厂的铁路建设工程下马。现在可能正在重建捷里别斯,但是,要想把由于在捷里别斯厂问题上动摇不定而取消的一切再恢复起来,就必须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克服政府部门因循守旧造成的强大的阻力。我们什么事情都抓,又什么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很多错误。由于工作质量非常低,克制政府部门的种种倾向和情绪是很困难的。比如说解决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问题¹³¹,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联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联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我们根本无法冲破政府部门的情绪。解决非常重大的问题的速度极其缓慢,这当然不能追究哪个人的过错,因为这是由我们共同存在的不足造成的,这种速度只能说明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质量是很差的。我觉得,自我批评已经开展得足够了,可以从批评地方存在的不足转向批评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甚至不必专门请人来批评。每个地区都会在任何一项实际工作中亲身感受到这些不足。对此大家却谈论得很少,因为我们这些乡巴佬都习惯于认为,中央机关存在的不足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天灾。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弃做这项工作,那就是对纠正不足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的可耻行为。在对待这些中央机关工作的种种不足的问题上,也绝不能成为调和分子。这些不足随处可见。以我们的煤炭工业为例,它对西伯利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是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因为边疆区的阶级成分复杂,我们应当珍惜每一个加强我们工人阶层的¹³¹机会。由于未能及时批准基本建设计划、煤场计划的生产规划和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规划的修改,西伯利亚的煤炭工业遇到了极大的麻烦和困难。

我们的运输部门情况怎么样呢?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醒人们注意,我们运输业的发展速度根本不能适应联盟向西伯利亚提出的任务和经济上的要求。几个月前我们从来到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同志¹³²那里得到了对这个问题的有力的证实。他确信我们的铁路运输极其落后。然而,对于这次向我们的运输业提出很高要求的粮食收购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一点儿实质性的改变。总而言之,中央机关,其中包括交通人民委员部,对为偏远地区服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距离莫斯科比较近的道路却处于优先地位,尽管它们在经济上发挥的作用比我们这里的道路要小得多。可是,由于部门的因循守旧和循规蹈矩,边远地区的交通问题并没有受到我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重视。

我想再谈谈我认为计划方面存在的一些失误,比如说,在电气化及冶金工业本身的首要任务方面。我们都非常了解电气化的作用和意义,极为关心和支持这一领域重大计划的实施。但是这些计划的实施往往带有部门性、地区性和偶然性,因而也就带有不合理性。目前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每个最小的加盟共和国都认为,必须在近期拥有自己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甚至不考虑是否能够以足够的生产效能、足够的生产能力来保证利用这种电能。所有这些都影响到重工业,也就是冶金工业紧要计划的完成。

即使拿奥尔沙奥西诺夫电站工程来说,也完全可以对位于波兰边境附近的这项工程的计划的合理性和紧要性产生怀疑。如果这些资金用于更快地发展冶金工业,用于白俄罗斯和整个联盟都希望加强的军事工业,这对于白俄罗斯和全联盟来说,也许更加合理,更加有利。

其次再谈谈工作质量问题。不仅要对机关提出工作质量问题,也同样要在工厂提出我们整个劳动质量问题。降低成本不仅需要提高工厂管理处、托拉斯及企业的工作质量,而且需要提高生产劳动质量,需要克服我们身上存在的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举止粗野的恶习。我认为,如果对这件事不予以一定的重视,提纲就将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工会这样的机构应负主要责任。工会主要应当培养工人对生产、对经济状况和国家状况的责任感,并发动工人同该领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作斗争。我认为,如果即将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¹³³是高水平的大会,那么它就应该把克服尾巴主义,把纠正我们很多工会工作者、很多工会机关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态度,作为一项主要的任务,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在提高劳动质量的基础上,才能有效保证进一步提高经济水平和工人群众的物质福利。

下面我再就一些与农业有关的问题说几句,用我们边疆区——西伯利亚的材料来说明这些看法和意见。在我们西伯利亚的现实条件下,在工人阶层不够强大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影响渗透到党内的客观可能性特别大。这就要求以农业为主的组织和地区要特别警惕在农村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种种情况。

因此,我想现在就谈谈这些情况。我们西伯利亚人有搞农业的实例和经验,听到各种有关农业退化和衰退的议论感到特别惊讶,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可证实这种观点和这种评价的任何带有一点儿实质性和征兆性的东西。战前我们的耕地面积为590万俄亩,现在有764.4万俄亩,而且现在我们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限制富农积累的各项措施不但过去没有影响农业的全面发展,没有影响生产力的提高,而且[现在也不妨碍农业的发展],在富农农户发展受到一定遏制的

同时,经济力量薄弱的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正得到发展。下面我再说说,是什么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是什么妨碍了它的发展。近一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近两年来,我们看到了经济力量薄弱的贫农和中农阶层的农户不断发展的十分明显的趋势,这种趋势使人确认,富农农户将十分自然地缩减,这一缩减会被贫农农户、中农农户和集体农庄的发展轻而易举、绰绰有余地加以补充。实行向富农发动更加强烈的进攻的路线使得富农发展有些缓慢。通过我们对典型的西伯利亚家庭进行的动态普查(涉及九千多农户)的材料,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农村中发生的情况。这些材料告诉我们,两年来,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富农农户的数量停止增加(它们的数量仍在增加),但毕竟其增加速度已大大减缓。这本身就说明,如果现在就说我们在限制富农积累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而且在控制这种积累方面也取得了成就,那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认真地对待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必须停止向富农进攻的隐蔽或公开的情绪。从中农农户的情况看(应当说在这段时间里中农阶层扩大了),我们要特别注意其中的不利征兆。关于这些征兆,我曾在四月全会上¹³⁴提出警告。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犯了一些错误,必须改正这些错误,才能消除阻碍中农农户发展的因素,才能增强生产的动因。

关于农业税。对于西伯利亚边疆区(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来说,农业税的增长幅度同农业的增长幅度持平。这一点可以用下列数字说明:近两个月,9—10月,西伯利亚农民仅粮食一项便收入了3500万卢布,而在农业税和保险费方面上缴了850万卢布。因此,即使从我们面临的实际任务和完成粮食收购的观点出发,我们也无论如何不能拒绝增加作为加强和扩大粮食收购的动因的农业税。我们对各阶层居民交售粮食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贫农目前已交售了自己剩余商品粮的一半或一多半(当然是指有剩余商品粮的那一部分贫农),中农交售了剩余商品粮的三分之一,富农交售了五分之一。在粮食收购方面我们将以商品争取广大中农。要保证商品的运输。从这一点来看,必须坚决反对农业人民委员部实行的毫无远见的政策,农业人民委员部没有考虑到今年我们获得了大丰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粮食比其他地区的粮食多,没有考虑到我们较大的振兴农业和扩大播种面积的可能性。农业人民委员部竟不顾这一切,减少了给我们的农业机械数量,减少了我们在俄罗斯联邦的份额,而这一份额本来就不大。农业人民委员部搞的是农民平均主义,在发展农业问题上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在完成粮食收购方面我们应当用商品争取中农,在这方面只靠印花布是不行的,要采取帮助中农生产、发展和巩固农户的生

产基础的办**法**,即使是为了执行、完成和实现我们制定的宏大的粮食收购计划也要这么做。对富农,对部分上层中农,不采取高额农业税和公益捐(当然,这种公益捐不应当也不可能过滥)这种财政措施是不行的。

关于农村生产动因问题。减少播种面积和扩大播种面积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今年春季进行得非常激烈。富农鼓动人们减少播种面积。但是他们知道向中农进行这种鼓动有困难,因此他们只能这样劝说人们,应当忍耐、坚持1—2年¹³⁵,在这段时间里减少播种面积,苏维埃政权必将作出让步。富农知道对中农应当谨慎从事,知道难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一方式。富农说只需忍耐1—2年就能扩大自己的经济。尽管我们在对待中农阶层方面犯有种种错误,尽管富农在进行鼓动,但我们还是增加了百分之六的播种面积。

主席:时间到了。

瑟尔佐夫:请再给我点时间。

主席:多少?

瑟尔佐夫:7分钟左右。

主席:有人提议再给瑟尔佐夫同志20分钟。

洛博夫:按他说的办,再给他7分钟。

主席:谁同意再给瑟尔佐夫同志7分钟?谁反对?您还有7分钟的时间。

瑟尔佐夫:虽然播种面积增加了,但我们仍要指出,同往年相比,这一增长速度放慢了。乳品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我们的奶牛数同战前相比大大增加了,但乳品业的商品率较低,且增长缓慢。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纠正在对待某些中农阶层方面犯下的实际错误,才能确保我们播种面积的扩大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达到应有的速度。但是,要坚决驳斥关于不管怎样必须削弱富农的各种说法,因为走削弱富农的路线就意味着放弃商品率的基础、我们农业的基础在于中农经济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不征收个别税¹³⁶,那就是对富农的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完全不能容忍的让步,这种让步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目前我们农村力量对比的情况下,都绝不会出现。建议不征收个别税就意味着陷入一种幻想,即相信富农才是发展和振兴我们农业的基础。不过,我们无疑应当消除中农经济方面的某些阻碍因素。在这方面,除了在提纲中就纠正中农经济方面所犯错误作出的一般性指示外,也许最好再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们存在阻碍因素往往是由于我们的某些措施不能完全相互协调,而且常常相互削弱。例如,中农不但经常畏惧我们提出的过高要求,比如农业税方面的过高要求,而且害怕我们往往是无缘无故地给予他们的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

优惠和让步,比如我们买某些东西时多付给他们钱或把价格定得非常高。现在,就拿我们的蛋禽公司¹³⁷来说,它特别爱愚弄庄稼汉(笑声),总是毫无经济根据地、毫无道理地定高价。因此,这种反复无常、变化不定的做法只能给农民造成混乱,使他们陷入迷茫,使他们对自己的经营活动失去信心。这种做法在农业税方面更为有害,我们紧张地搞了一年大幅度增加农业税的工作,可后来我们比庄稼汉还害怕,又向后退缩。这样做的结果是,庄稼汉不仅害怕提高农业税,而且害怕大幅降低农业税,因为他不知道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人明天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在农业税方面要谈的不是降低或增加的问题,而是保持一定稳定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让庄稼汉相信,目前的农业税税额和总的原则,当然作了某些具体的修改(这无疑是必要的),是已经确定了的,2—3年不会变,那么我们会使农民经济的扩大和稳定有一定的可信性,使其能够制定一年以上的、有一定可信性的计划。而今年农业税方面的乱子比任何时候都多,农业税的有利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这些乱子抵消了。必须坚决保证财产所得税和个别税的稳定性。不这么做就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就无法调节富农经济。顺便说一下,要纠正提纲中提到的只有富裕的富农应当纳税这一论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由于这一术语引发富农分为两类的议论,无疑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我是否反对百分之三这个数字呢?我不反对,但是应当注意到,富农不止是这个数字,我们这里的富农不是百分之三,他们的数量多得很,例如,在西伯利亚就超过百分之六。但是,就我们机构的水平而言,就我们财政机构的技术水平而言,再加上我们基层组织的现状,我们无法指望我们能够向所有的富农恰当地征税,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在这方面犯重大错误,因此我们只是提出了向某一部分富农征税的任务。必须采用另一种表述方式,即对拥有大量的剥削收入但没有被足额征收公共税的公认的富农农户征税,这样的表述要正确得多,或者采用别的说法,但无论如何不要导致在保留富裕的富农的提法时必然会产生的那些误解和失误。现在有一部分富农在征收个别税时没有缴税,我们没有能向他们征税;另一方面,却常常向中农农户征收个别税。这方面的原因在于各地在财政上缺乏远见的种种考虑,在于主管部门对阶级路线的曲解,无疑也在于我们基层党的机关对阶级路线的歪曲。只要我们注意到我们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成分,我们就可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可指出右的危险和右的倾向的某些根源,我们不应该把右的危险和右的倾向当作偶然现象来对待,而应该当作非常重大的事情来对待,必须对其加以重视。我们对一万个农户进行的研究再次证明,我们党的农村组织中有农村各个社会阶层的代表,而且在这些代表中雇农和贫农农户并非

总是占多数。我可以引用一个表格,从中能看出,在农村党组织中雇农代表有多少人,雇农中加入共青团、参加红军并任指挥员的有多少人,而富农代表又有多少人。显然,农村组织不仅与居民没有什么区别,比例也不利于农村中经济力量薄弱的阶层。尽管近两年西伯利亚农村组织把党内的雇农成分增加了两倍,但是单靠吸收雇农和贫农是改进不了工作的。我认为,一年半来我们进行了把富农分子清除出党的工作,这样做是正确的,但这还不够,还要坚决、果断地清除。粮食收购使我们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反应看出,基层组织的工作开展得不顺利。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西伯利亚的某种特殊情况。我认为,在我们联盟的许多农村地区,农村党组织的状况,就富农的存在和各种社会群体的比例关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而这种糟糕的状况不仅仅局限在农村,在农村以外的地方也能看到。我并不想说这是右的危险的唯一根源。毫无疑问,我们还看到许多其他的根源,但我们知道,我们已在各自的组织中亲身体会到,我们某些基层组织中的徘徊动摇者正在同存在于其他基层组织中并寻找理论根据的某些徘徊动摇者相勾结,或者正打算同他们相勾结。在我们的组织中,叫得出名的这样的人相当多。半年前,就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我点了一个莫斯科人的名,他曾经在西伯利亚工作,他的意见里有完全不能容忍的东西,当时就有人说,应当把他开除出党¹³⁸。但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或其他人显然没有注意到,他不但没有被开除,反而在苏维埃系统得到了晋升。目前他除了在某个中央机关制定计划,还被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提出的免缴个别税的请求搞得焦头烂额……

臧声:这人是谁?

瑟尔佐夫:包括他的父亲也要缴纳个别税。

臧声:这人是谁?

瑟尔佐夫:我已说过他的姓名。[这就是帕尔菲奥诺夫同志。而且半年来他的社会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西伯利亚组织还能够点出其他许多人的姓名。]考虑到这些迹象,这些事实,我们当然不能说右的危险和对其目光短浅的调和态度是谁恶意杜撰的,等等,右的危险有十分现实的根源,其根源还在于我们一系列的经济条件,对这一危险必须尽可能地予以充分重视。在提纲中也必须更加坚决地指出这一点。

我再谈最后一点意见。我认为,我们的许多机关,尤其是莫斯科的机关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总是按照客观情况向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他们应该提供的数字和事实。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往往出于一种官僚的热情去努力猜测,这对于“右的”方针或“左的”方针是否有用,往往以相应的方式去阿谀奉承、投

人所好,掩盖一些东西,举出不真实事例。我认为对事实和数字不能要求它们是右的还是左的。必须要求事实和数字是正确的,否则,政治领导者如果把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离开,就不能及时、快速地纠正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就不能制止这样或那样的歪曲做法。要坚决反对官僚的热情,其表现为阿谀奉承,热衷于投人所好,闭口不谈有关事实,有倾向性地选择材料。

主席:现在请哈塔耶维奇同志发言。

哈塔耶维奇:我认为需要首先向戈洛谢金同志提供一点情况。请戈洛谢金同志注意,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粮食收购计划比哈萨克斯坦多1 000万普特。我们拿出的这8 500万普特粮食(包括地方收购的粮食)不是产自600万公顷土地,而是产自伏尔加河左岸地区不足350万公顷的土地,因为伏尔加河右岸不是产粮区,而是农民人均不足半俄亩耕地的半消费区。

臧声:那里也可能产生右的倾向。

哈塔耶维奇:那里产生的大概不会是右的倾向,而是右岸倾向。

现在我认为必须指出在提交我们讨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点。草案根本没有提及对贫农农户的经济帮助,没有提及进一步向他们普及各种合作形式,等等。可以说过去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必要再重复,不过在提交我们讨论的决议草案中,在其他问题上却重复了许多以前说过的话。因此,在提交我们讨论的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及贫农的这一事实不由得让人担心,目前对在经济上帮助贫农这一问题关注不够。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库比亚克同志昨天的发言,那么这种担心立刻会成为非常现实的危险。昨天库比亚克同志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他告诉我们,说农业人民委员部要求,在机器供应方面要在“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术语)和集体农庄之间画等号。他建议向集体农庄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部新发明的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出售农业机器,收取现金。我认为,我们未必能够接受这一建议。不久前,在向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供应农业机器方面刚刚实行了对这些农户的一系列优惠¹³⁹。库比亚克同志告诉我们,正在打算取消所有这些优惠并确定发放机器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比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全苏党代表会议召开前的条件还要糟糕。

有人臧[丘巴尔]:实行了优惠,却没有提供贷款。

哈塔耶维奇: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就在不久前,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对一个大型信用合作社的领导人进行了审判,把他送上了被告席,举行了公开审判,近千名农民旁听了审判。我们对领导这个信用合作社的共产党员进行审判是因

为,为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规定的优惠条件没有实行,而机器的出售对象以及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富农。

有人喊:是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

哈塔耶维奇:不仅是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而且还有富裕的富农。请问现在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们审判他们,库比亚克同志?我认为这种经常变来变去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库比亚克昨天讲的那种贷款差别不可能成为改变和放弃我们近期实行的贷款和机器供应政策的理由。我想,还有其他的方法和出路,要找到这些方法和出路。

我认为决议草案中没有提及贫农农户与那位库比亚克同志关于预购合同的建议有关。库比亚克同志在报刊上建议规定最低限额:少于3俄亩耕地不签预购合同。很难这样做。要知道,我们不是同个别农民,而是同整个土地共耕社或各类农民签订预购合同,把他们组成播种协作社。库比亚克同志,您的意思莫非是不让耕地不足3公顷的农户参加这些协作社?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实行的政策呢?一点都不符合。必须找到能使我们避免预购资金陷在农村的其他方法和途径,但绝不允许拒绝同耕地不足3公顷的农户签订预购合同,特别是在人均土地保证量只有一俄亩的地区。而这样的地区我们有许多。这种建议无论如何是不能采纳的。

从向我们建议的这些“实际”措施来看,我认为非常危险的是在这个文件中根本不提进一步坚定不移地实行为贫农农户提供经济援助、继续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等项措施。

决议草案中提到,我们准备用3亿卢布实行预购。但不要只是用数量指标来衡量预购的成果,而应当特别注意实行预购的质量。其实,我们大大错过秋季播种运动的时机首先是人民委员会的过错。因为关于秋播作物预购合同的决定7月21日¹⁴⁰才颁布,而8月份就开始播种了。7月21日公布决定,8月13日我们在地方的州中心收到贷款和指示,当贷款和指示从州转到专区,再从专区转到各区就已经是8月底了,农民已经开始播种,没有等待决定。经常有这种情况,播种已经结束才发放预购贷款。这样的预购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坏处。显然,如果以后我们还说花多少钱实行了预购,却没有同时采取坚决措施改善其质量,那么这个数量指标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应当在决议中说明,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做好预购准备工作的问题,即把质量方面搞好的问题。

扩大播种面积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决议草案中说得完全正确。但我认为措施采取得还不够,在采取不同的方法保证各个地区能够扩大播

种面积方面做得还不够。在我们的中伏尔加州就有这种情况,每个丰收年之后,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播种面积必然减少。尤其是丰收后要是赶上一个多雨的季节,播种面积往往会大幅度减少。这是因为,扩大我们伏尔加河左岸地区的春播地几乎只能靠秋耕。如果农民获得好收成,由于缺少生产工具,由于大多数使用的是陈旧和原始的工具,他们连收获庄稼都来不及,更没有时间去秋耕了。我们州的农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并不亚于因旱灾遭受的损失。必须加紧向这些地区提供收割机、脱粒机和拖拉机。我们看到,今年提供收割机和其他机具的计划几乎一点也没有比去年扩大。1928年我们州的播种面积扩大了16%以上。如果能稳定地保持去年这样的播种面积,那就是成绩,因为以往我们在丰收年后,尤其是遇上多雨的秋季,总是减少播种面积。而今年就遇上了多雨的秋季。但我们仍然全力以赴争取再增加百分之十的播种面积,当然,条件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得到帮助,供应机器和拖拉机的计划不会缩减,就像现在所做的那样。

有人喊:都在缩减。

哈塔耶维奇:一些同志指出,提纲中有一个地方(第8条)说我们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发展中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我完全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如果这意味着,说出成绩就可以不求进取,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害的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方面有成绩,那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以接受的说法是,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是很大的成绩。为了提高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即农业的整个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分的高度的组织性,并使其在数量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昨天才理解库比亚克同志说的话:我们需要的只是从质量上巩固集体农庄,没有提在数量上发展集体农庄的任务。如果我对他的话理解得不对,那就好了,不过我认为,在从质量上巩固集体农庄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不懈地通过吸收广大农民加入集体农庄,通过把最简单的生产合作联合组织变为更高级的集体联合组织,进一步做好在数量上发展集体农庄的工作。

喊声:说得对。

哈塔耶维奇:吸收农民加入各种生产合作社的水平目前在苏联未必超过15%—17% (而在我们各州只达到12%—13%)。必须承认,吸收农民加入生产合作社的这一百分比是十分不够的。在提纲中也要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吸收农户加入各种生产合作社。如果我们现在已有15%的农民参加生产合作社,那就应当提出在一年之内达到25%的任务。我们面临的严峻任务是,不仅要在质量上,而且还要在数量上发展和巩固集体农庄及各种其

他形式的生产合作社。所有这些在决议草案中都没有明确提到,这是不对的。

谈到粮食收购问题,必须指出,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现在正遭到富农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有很大差价的地区。我们州发生了不少散发富农反对粮食收购的传单的事件,传单中恐吓贫农和中农说,春季粮价将暴涨,他们连自己对粮食的需求也满足不了。总之,富农已经活跃起来,他们的秘密活动更加猖獗,他们的恐怖活动持续不断,富农阶级比从前更起劲地利用各种合法的方式反对我们。从这种猖獗活动来看,提交本次政治局全会审议的政治文件对此只字未提是令人奇怪的,因为以往的文件对此谈得很多,也许有人会说,用不着反复强调。但在我们的政治文件中,特别是在评价阶级斗争状况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时,我们经常反复强调此事。

如果要指望贫农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粮食收购,那么首先必须使农村的广大贫农有一种稳定、平和的心态,有一种坚定的信心,相信我们将在春季的4、5、6三个月按固定价格向贫农,特别是向主要粮食收购地区的贫农提供粮食。要从每一俄升粮食中提取特别储备,告诉贫农该储备的确切数量,让他们相信我们会按固定价格向他们提供粮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在百分之百和更好地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工作中得到贫农应有的积极协助和帮助。

我对提交政治局讨论的提纲的印象是,如果这一提纲未经任何修改便被通过,就会使许多工作人员和组织放松对在贫农和雇农中开展工作的及对集体化问题的关注。也可能这种担心根据不足,但它毕竟是存在的。

既然提交我们讨论的提纲不是在个别词句上,而是在整体上坚持工业化路线,坚持进一步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路线,那么在进行一系列修改后,这个提纲终究还是能够被通过的。但是听了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后,我对他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感到更加不安: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同政治局的提纲不一致。在提纲的第16页讲到,要坚决反对各种倾向,并特别强调了同右的危险进行思想斗争的必要性。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完全不是这样。他要求我们对右倾采取宽容的态度,相反却极力强调应该只同托洛茨基危险作斗争。李可夫同志不仅没有维护提纲中提出的反对右的危险在当前非常重要这一论点,而且似乎还反对这一论点。

李可夫同志对右倾和左倾之间差别的解释也令我十分惊讶。如果他指的是党内倾向,那么他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党内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派别已不存在,即使它还存在,那也是一种地下活动,是秘密的,非法的。如果他指的是国内和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各种倾向及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影响,那么这种解释

也完全是错误的,是非辩证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李可夫同志不久前还反对陈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当然,他作出的解释并非陈规旧套,这种解释观点独到,与众不同,但它仍然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解释。李可夫同志强调说,只能在思想上同右倾进行斗争,他似乎还间接地指责过有的地方对右倾拥护者作出组织结论的做法。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李可夫同志可能说过,如果不这么做,那么更糟糕。看来,这里所说的是不久前发生在莫斯科组织内的事件。莫斯科组织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里的个别同志没有反映广大党员的观点,因而被广大党员解除了党的领导工作。难道可以禁止按照党内民主程序作出组织结论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您近来多次谈到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等等。但您对发生在莫斯科组织内的这件事情不满就是反对党内民主。实际上,一个人,即便是很优秀的同志和工作者,如果他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能反映其在党组织全体党员的观点,那他又怎么能继续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呢?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全会在这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当接受李可夫同志的观点。

主席:大家是否还想听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喊声:不用听了。

主席: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 11 时开会。

第五次会议

11月19日上午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现在开始。按讨论顺序,现在请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一些人声明有必要对政治局提出的有关控制数字的建议加以补充,即指出我们在煤炭方面、在满足恢复乌克兰草原地带谷物业这一全联盟的需要方面的任务,我对此表示赞成。我想用几分钟时间谈谈政治局决议中关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基础的那些建议和声明。我认为提纲中说得对:“一方面要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坚决从根本上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干人员队伍,这是完成整个经济计划的前提”。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且它被写入提交我们讨论的决议草案,这非常好。但是,我认为这个论点无疑有不足之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不够全面;其次,这个论点会使人认为我们的文化建设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有些对立。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列宁的这样一段话:识字不是文化的一部分,却是它的前提和条件,就像我国居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前提一样。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观点上就不正确了。我们现在应该坚决地抛弃优先战线的旧思想,抛弃那种认为提高我国劳动居民文化水平的工作是一条特殊的文化战线的思想。我们正在完成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向我们提出一个紧迫问题——如何认识文化工作,如何认识提高劳动群众文化水平、培养生气勃勃的熟练劳动力等工作,也就是说,要认识到整个这项工作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已经把劳动保护费和社会保险费作为经济管理的一部分必要费用。现在只有个别顽固的、有重商主义思想的经济工作者把社会保险费同对经济工作的总投资对立起来。党已经抛弃了这些重商主义思想,所以在对自己的

各项经济创举进行核算时总会考虑到,基本建设工程和采取经济措施所需要的费用中应该包括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保险费这一组成部分,而且这一部分确实被包括进去。遗憾的是,必须承认,我们对提高国家文化水平的费用、对文化工作的费用还没有这样的认识。总是产生对立,总是在对经济建设进行核算时不考虑这个必要因素。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必须克服的工人阶级内部的主要障碍是:愚昧、无知、缺乏工作能力和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应当说,列宁的这些话至今仍然十分正确。

我们在调查沙赫特事件时就明显地、充分地、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障碍。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上,沙赫特事件使我们直接面对一个问题: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就要考虑如何消除文化水平低下现象,如何改造和造就新的经济工作骨干,如何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文化革命问题不是华丽的词藻,不是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平行或对立的某种东西,而是我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在文化工作方面的体现。还要看一看,我们从沙赫特事件中明显感到的那种危险会不会更加严重,在文化建设速度和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的速度之间会不会出现剪刀差。我可以肯定,这种剪刀差是存在的。

我先说说反映这一过程的几个预算数字。我国预算中用于经济建设的开支的增加,包括绝对数字的增加和在整个预算中的百分比的增加,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用于文化建设的开支,用于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基础的开支,从绝对数字看也在增加,但在预算中的百分比都在不断下降。我以我们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开支的百分比作为指标,当然,这完全是一个标准的指标。1925—1926年度这一开支占整个联盟预算的4.1%,1926—1927年度占3.7%,去年跌至2.6%。而在今年,在我们直接提出文化革命问题时,我们关于文化革命的所有这些愿望和美好的话语只表现为给国民教育事业增加0.2%的预算开支。是的,应当承认,我们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运输系统教育局用于完成同样文化任务,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其大量科学机构的开支;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许多部门的这些开支今年增加了4800万卢布。但是,用于完成我们联盟的社会文化任务的开支总额所占百分比从1924年开始一直在降低,今年也没有增加,虽然绝对数字增加了,但百分比降低了。这仅仅是预算所反映的数字,我们再看看其他数字。很遗憾,我手头没有绝对准确的数字,不过,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并比较一下两个数字——一个是日益增加的对我国经济的投资,另一个是用于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提供文化服务的款项,就会发现,我们为经济建设每注入100万

投资,与这100万投资相应的、用于完成社会文化任务开支的投资都会缩小,都会减少。

请允许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确定并已经确定一定的百分比来保证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拥有生气勃勃的劳动力呢?的确,这个百分比对于各个生产部门来说,对于轻工业和重工业来说,是不一样的,但同时它又是固定的,而且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什么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来看待我们正在进行的保障我国文化水平的整个过程呢?

有人喊[施瓦茨]:说得对。

斯克雷普尼克:这里必须直接地、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现在对我国国民经济投资的拨款,从而在增加生产开支的同时增加一定比重的用于保障文化水平的开支。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计算过,化学工业发展五年计划的一个方案就使人看到了全联盟的一种状况:我们缺少生气勃勃的经过培训的熟练劳动力,高级的、中级的、初级的都缺,缺少为化学工业提供的科研服务。为了给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这种有专业科学知识的科研力量,有必要关闭一个化工厂,而开设一些必要的科研机构。这会不会妨碍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呢?不会,这可以为它提供保障。如果认为发展化学工业就是力求为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我们就不会去建一座没有房顶的工厂,也不会只建工厂而不为其提供必要的科研服务。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向我们提出这一观点是不够的。不能只指出广大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是我们完成整个经济计划的前提,同时还必须指出,提高我国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这一任务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要对提纲作一个小小的修改。我们现在的开支、预算拨款还是比提交的提纲中所列各项多。提纲中说:“按照计划,1928—1929年度的教育投入应为18400万卢布,1927—1928年度为9600万卢布。”这些数字表示的仅仅是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教育开支。这里没有提到联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开支,那里今年的超额开支为4800万卢布;也没有指出所有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庞大开支。数字应该改变。

还有,我认为政治局在决议中自夸不符合它的一贯做法,在提交我们讨论的文本第15页上有如下表述:“由于七月全会作出的各项决议,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不起,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怎么能这样表述呢?难道你们忘了政治局已经同意对上次全会作出的拿出4500万卢布来提高我们

的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决定进行修改吗?

柯秀尔:全会没有就此作过决定。

斯克雷普尼克:可是现在政治局认为,可以同意联盟人民委员会要求减少1 200万的决定¹⁴¹。为什么必须保持我们联盟预算的平衡,为什么必须削减职业技术教育开支,我不知道。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增加4 800万卢布用于它所进行的科学工作,一个戈比也不减少,而按各加盟共和国的预算给职业技术教育的拨款却被削减。这是个不正确的提案。

此外,令我疑惑的是,为什么政治局认为今年可以把我们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7%。国家计划委员会列举的关于可以把成本降低8%的数据有一定的说服力。的确,工业家们要求只把成本降低6%,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工作者可能受到了某种经济惰性的影响并想逃避责任。也许有必要把我们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7.5%¹⁴²,而这意味着把工业本身的资金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款项增加5 000万,把预算中用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国家投资削减同样数目,即削减5 000万,可是要执行七月全会的决议,就不用增加和减少这两笔钱——这两个5 000万了。

仔细地看完提交讨论的提纲后,我感到很吃惊,我必须指出,该提纲竟然对工会的任务只字未提。就连“工会”这个字眼也没有,似乎不广泛动员加入工会组织的劳动者、我们的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我们拟议的这项必要的工作就可以进行。安采洛维奇同志谈到了我们的工会和工会中我们的共产党员干部在确定我党的路线和同现有种种倾向作斗争方面的作用,我应该借用他的建议在这里表明,很有必要让我们各级工会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整个工会工作的领导者托姆斯基同志在这里发个言,清楚明确地阐述一下由他领导的那些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对党内问题以及整个党内工作制度问题的态度。

喊声:说得对。

斯克雷普尼克:因为我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报纸上只能看到工会党团关于右倾的一个决议,就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的决议¹⁴³,它认为《劳动报》采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没有表示对右的危险的态度。

有人喊:政治局内没有倾向,而托姆斯基领导……

斯克雷普尼克:我说的可不是托姆斯基同志的倾向,我说的是托姆斯基同志同右的危险进行的斗争,并且想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说明这种危险。

同志们,提交我们讨论的决议中有一部分是谈右倾的,我认为,那样谈右倾,决议是不可能被通过的。

有人喊：为什么？

斯克雷普尼克：如果我们在决议中不对党面临的所有问题作出直接而又明确的答复，那么这只会把许多人搞糊涂，而有保留地答复客观上将起到某种平衡器的作用。

奥尔忠尼启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斯克雷普尼克：既然我们已经在全党进行搞清右的倾向的原因和影响的工作，那就不该在全会上提交一个指出存在右的倾向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共同根源和共同基础的决议。决议第15页给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各种倾向——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得以产生的社会政治土壤。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正是这些基础培育了党内的各种倾向。”好吧，谢谢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在我们面临需要与之斗争的右的倾向时，关于各种各样的倾向你们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的基础，我们已经清楚了，党对此深有体会，党进行过这场斗争，我们用不着去考虑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同右的危险作斗争的任务。可决议却告诉我们：还存在各种倾向，还存在某种土壤，等等。难道政治局应该给我们党这样一个答复吗？绝对不应该。

奥尔忠尼启则：政治局不中用了！

斯克雷普尼克：而说到判定右的倾向，那么，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右的倾向正在浮出水面”。为什么是“浮出水面”？（笑声）不过，就让决议在这方面随波逐流吧，就让右的倾向浮出水面吧，现在问题不在这里。“右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倾向正在浮出水面，其表现是：竭力阻止大工业的进一步建设，看不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轻视、压制同富农的斗争，以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群众的需求，轻视同官僚主义的斗争，轻视右的危险，等等。”以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群众的需求，不仅是右的倾向的特点，而且也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特点，看看我们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央和共产国际全会的决议吧，那里面直截了当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畸形的官僚主义，其特点是以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群众的需求。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任何倾向都具有的一个特点——偏离党的正确路线。应当对右的倾向作出基本评价，而右的倾向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把党的注意力从主要任务——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重工业转移到轻工业上。在这方面，莫斯科党组织的一些同志似乎犯了一点错误。

有人喊：不对。

斯克雷普尼克：您还是在作全会发言时再这么说吧。莫斯科的同志们不妨也说说。但是避而不谈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就是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忘记核心。所以，以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群众需求的问题可以说，但不能忽视对右的危险的一个基本特点给予一定的非官僚主义的关注。

另外，在说到同党内右的危险的最重要的斗争时，决议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附加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附加建议。党作出过几十个、几百个决议，认为主要的、基本的任务是消除右的危险。我们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把它从我们党内赶了出去，正如李可夫同志所说，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一种倾向，而成为倾向的是右的倾向。现在我们首先要完成的是另外一项任务——同右的倾向作斗争。关于这一点，决议中是这么说的：“中央全会坚决反对任何倾向并特别强调（在附加建议中！）已经展开的同右的危险的思想斗争（“思想”用了着重标记是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丝毫削弱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同时，中央全会提醒党注意……”等等，等等。

整个斗争，同右的倾向的最重要的斗争被列入附加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即不应削弱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决议中大概有6次一谈到右的危险，口气立刻就变得十分谦恭——对不起，我们要同右的危险作斗争，我们自认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将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

然而决议谈的是“各种各样的”倾向，它不可能只指出右的倾向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例如，决议还指出：“无原则的、尾巴主义的实际主义无视党的根本的、主要的发展方针、目标和任务”。为什么我们单单要抨击这样的实际主义，单单要抨击无原则的、尾巴主义的实际主义呢？事务主义的实际主义也应该抨击。

[布勃诺夫：这一点谈到了。]

斯克雷普尼克：下面说的更有意思：“还要同空想的虚伪‘原则性’作斗争，因为它忽视当前的特殊任务，因而也违反了列宁的实践的基本法则——既要有基本方针，又要看到当前的具体情况”。我要说，这真是胡扯。（笑声）这就像马拉什金¹⁴⁴在他的小说中说到一名人民委员时描写的那样：“一个球状的身影在移动，从小腿到膝盖之间有很大的间隙，这是尤里·彼得洛维奇的影子。”（全场大笑）再看这里：“忽视实际任务的空想的虚伪原则性”，等等。在各种场合总有人说，必须指名道姓。我可不太相信那些要求指名道姓的同志。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的姓名。但我希望他们稍微给我解释一下，他们所说的“空想的虚伪原则性”指的是什么？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倾向——一共四种倾

向,还有对其中的每一种倾向的调和态度,结果让人搞不清楚现在右的倾向在哪里,天知道它在哪里。既然决议中指出那么多的倾向,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这里有没有右的倾向呢?因为弗鲁姆金同志在他那份已经分发给我们的长达数页的声明¹⁴⁵中强烈抗议把他称为右派。那么我们的右的倾向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认为提交讨论的决议里说的倾向太多了,让人找不到右的倾向。决议接下来宣称:“要消除这些倾向,也必须反对对待这些倾向的庸俗的、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调和态度)”。说的全是调和态度。别的什么也没说。所以,亲爱的同志们,请注意,决议认为首要任务是不对各种倾向持宽容态度,却没有为党提出反对右的倾向、反对对待这个右的倾向的调和态度这场特殊斗争的当前任务。由此可见,党的首要任务不是同右的危险作斗争,也不是同对待右的危险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而是同一切调和态度作斗争。不是尖锐地提出问题,不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清楚明了地向党指出党同右的倾向作斗争所应走的道路,却搞出一个“从小腿到膝盖之间有很大间隙的球状物”。(笑声)我认为,必须对现在这个决议作大的修改,从而得到一个清楚明确的方针来捍卫列宁的反对右的倾向、反对对待右的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方针。(鼓掌)

主席:请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发言。

弗拉基米尔斯基:昨天我同一个同志谈过话,他来自坦波夫省最边远的一个地方。他对我讲了我们的基层工作者正在多么焦急地等待着此次全会的决议。首先,这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党取得的政治上的巨大进步;其次,这说明此次全会正在讨论的问题和任务是重要的,也说明所有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正在遭遇种种困难;第三,这就要求我们在这里就此问题酝酿一个决议,作出一个与我们党所取得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发展相应的、可以成为全党正在进行的整个艰难实践工作的明确指南的决议。

我想先谈谈这项工作的一个小的方面,即我在农业合作社工作中所要完成的这项工作。况且也有必要谈谈这项工作,因为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现象:我们各级党组织对农业合作社工作有多么重视,他们在合作社工作的问题上对全会有什么期盼;而报告人关于这些问题又说了什么,他们几乎完全回避了合作社问题;还有,提交全会讨论的决议中谈得非常少,而且我认为谈得也不对。我就谈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并尽量谈得简短些。我不想夸大农业合作社的成绩。有些同志认为,农业合作社的弱点,尤其是在生产合作方面工作开展得不够充分,是我们在经济战线的斗争中遭遇种种困难,包括粮食收购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上次中央全会上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说法。

正是因为对我们合作社组织的弱点的这种承认,以及对农业合作社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的承认,我们才有责任通过中央全会促使各级党组织中已经开始出现的合作社方面的转变得以巩固,从而使仍显薄弱的合作社系统有所加强。

是的,我们在供应和销售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部分原料而言,农业合作社是某些种类原料的主要的、最大的计划采购者,农业合作社对国家采购者的排挤作用越来越大,它将成为几乎占有垄断地位的采购者。但是,在合作社工作的这一方面取得极大成就这一事实有时会妨碍我们正确评价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妨碍我们发现它的弱点。如果我们谈的不是计划采购者的市场,而是整个市场,我们就会发现,私营者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肉品市场上),甚至整个市场的3/4都被私营者控制。农业合作社还不大善于同私营者进行斗争,还不能在市场上取代私营者,这也是合作社同我们在采购市场上曾经遭遇到和正在遭遇的困难斗争不力的一个原因。要使党内形成一种必须把合作社的这项工作搞起来的意识。

然而,供应工作和销售工作并不是合作社和全党现在应该关注的工作形式。农业合作社面临着一项新任务——对农民的小型、零散的经济的生产过程施加影响。常常听到有人说,合作社只从事商业工作,一位报告人也在这里说过,合作社“脱离了农民”。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就在最近几年,甚至在最近几个月,合作社与农民已经非常接近,它也应该这样接近农民,因为它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现在我们的农村正在进行着深入的创造过程,以新的方式改革农业的过程,以及我们称之为农业改造的工作。农民正在创造性地寻找振兴农民经济的新形式、新路子、新手段和新方法。农业过于落后的状况,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在日益发展的文化革命的影响下农村中新需求的出现,促使农民以及农村的所有社会阶层去寻找可以振兴农业、可以使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在出卖商品的市场上变得比较强大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在这个寻找新形式的过程中,在这场谋求较高级的经济形式的斗争中,现在正明显地表现出农村中各个集团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对立。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现在首要的是争取各种机会来开发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得到的土地。这就是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

对于农村的这些需求,对于寻找新形式的这些过程,农业合作社作出了新的回应。它信步走来,农民都知道,“像个庄稼汉似的”走来:它推出了一种把农村经济与城市结合起来的新形式,这就是预购合同制形式。早已采用的预购合同制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农村群众性的生产合作形式。我们看到,尽管在这项工

作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并且我们对此也缺乏经验,尽管给农民说的是一个令人费神的外国词儿,但我们联盟各个地区的几千个村子、大批大批的家庭还是加入到实行预购合同制的过程中来。无论如何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对农民的这一需求,作出回应的不是农业机关,恰恰是合作社。当然,这丝毫不能说明农业机关软弱无能,问题不在这里。这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我们制定的合作社计划是一项完美的计划、伟大的计划。在我们看来,这种普遍生产合作化的形式,这种还带有很大缺陷的形式,这种无疑会被其他更为完善的形式所取代的形式,是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第一次尝试、第一条途径。农业合作社应该成为并且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农业的主要的、总的组织者。

现在有必要对普遍合作化的初级形式的这种作用进行全面评价,而且这应该充分体现在全会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中,因为控制数字不仅是经济报告,也是关于我们去年的整个经济活动的政治总结报告。即使看看提交我们讨论的那个决议草案,我也看不到对合作社运动的这种评价。如果你们看看第7条,恐怕是唯一讲到这个问题的一条,那么你们只会看到以下的话:“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方面最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认为,这些成就远没有那么大,但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接着又说:“然而中央指出,在刺激个体农民经济的增长方面,党和苏维埃机关还远没有采取所有的措施”,等等。关于个体农民经济就是这么说的,在这方面“没有采取所有的措施”,而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说法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已经采取了所有的措施。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连合作社为使党和苏维埃机关重视生产合作化的作用而进行的最初尝试,也遭到了我们苏维埃机关的极力反对。昨天,哈塔耶维奇同志还指责我们,说我们拖延了预购合同制的实行,拖延了贷款的转拨,等等。因此,我得请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¹⁴⁶主席别连基同志给我提供有关明年春季预购合同准备情况的材料。春季预购合同的准备工作应该从秋季开始,在秋耕前结束。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早在7月底就制定了1929年春播作物预购合同计划。8月25日,这项计划得到了商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批准,此后,一直到现在,该计划还在各委员会传来传去。在此期间,俄罗斯联邦经济会议却在执行一项决定,该决定采纳了农业人民委员部在纯种良种作物预购合同方面的建议,反对签订条播谷类作物的预购合同。

我还想说说预购合同制给农业的组织工作带来的根本变化。同整个整个村庄、同一组组协作村签订合同,一个个拖拉机队投入使用,这引发了经济上的一些变化,例如,打破地界,取消个人份地,把这些份地连成一整块地,使依靠拖拉

机队进行的所有生产过程社会化,形成面积达数万公顷的大片土地和有数万公顷耕地的大型谷物农场。总之,正在实行使农业社会化的措施。

我们在考虑到这些形式无疑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应该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在实行生产合作化的这些形式时,贫农的利益受到多大的保护,贫农的利益是否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实行这些普遍的合作化形式的过程中,必须使贫农,比如在生产资料的使用上,同富裕阶层处于同样的地位,甚至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偏偏在这个时候却又搞出库比亚克同志提到的那些新的贷款等级,它们只会使贫农和相当多的中农根本得不到劳动工具,使他们不得不用现金去买犁和收割机,而这使生产合作化的整个社会主义意义受到威胁。鉴于这些措施,现在非常有必要回想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工作的意义的一段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或者我们使这些小所有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只有把贫苦农民即多数居民或者说半无产者组织在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¹⁴⁷,相反,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这些小私有者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占上风。我认为,现在,在谈论我们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时,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贫苦农民在这场运动中的利益。

我们还要从与普遍合作化的联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集体农庄运动。这方面有两项主要任务:

1. 集体农庄应该把自身工作与预购合同制紧密结合起来,从中找到解决扩大集体农庄问题的办法。

2. 集体农庄应该与农业的进一步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农业的工业化,包括集体农庄的工业化、基本建设问题,都要服从农业的改造和公有化的思想,而这就需要吸引广大合作社群众在经济上参与农业的工业化工作,吸引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包括吸收农民的闲置资金进行基本建设。这项工作需要党的大力帮助。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再占用你们一两分钟时间来指出我们合作社运动中日益增大的另一个危险,一个党应该极其关注的危险。我认为,未必有哪个地方的右的危险会比我们农业合作社运动中存在的这一危险大……

斯克雷普尼克:说得对。

弗拉基米尔斯基:这一运动与小商品生产者有直接联系。我担心李可夫同志说的“可能存在调和分子”这句话会在合作社范围内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早在这次全会召开之前,一位来自合作社的同志(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是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说：“这真是个好决议！”这就能把右倾归咎于我吗？！

斯克雷普尼克：就是，就是。

喊声：说得对！说得太好了！

弗拉基米尔斯基：我想，“调和分子可能存在”的说法将会变成“必然存在”，调和主义是我们党内“一种合理的色彩”。我认为，这一派别首先，而且多半是在我们的合作社工作人员中间形成的。

如此说来，我们离使右倾得以“浮现出来”的那种自发势力最近。我对这一说法就是这样理解的，使右倾得以出现的是自发势力，是小商品生产者的自发势力，是乡巴佬的自发势力。这一倾向正是从那里浮现出来的。你们知道什么是产生小商品生产者的土壤吗？就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上面对那段话中提到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产生了拿破仑们、卡芬雅克们，等等。这个右倾的危险就在这里，危险不在于右倾在不在党内，而在于它恰恰反映了农民的复旧情绪。

乌格拉诺夫：这里就有人问，我像不像波拿巴？

弗拉基米尔斯基：乌格拉诺夫同志，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要是您在这里讲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如何向您提出这一点，讲莫斯科组织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说，您像谁、您曾经像谁。我认为，乌格拉诺夫同志，您应该更关注这一点。这种倾向之所以恶劣和危险，是因为你不能一下子说出为它辩解的人像谁。这一派别的特点就是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我没时间再阐述这一点了。请回忆一下或者读一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小册子《怎么办？》吧，看看他是如何阐述革命理论的作用以及机会主义所特有的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的¹⁴⁸。所以我们的任务，全会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的党员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我们方方面面的工作，包括合作社工作中的这种倾向的危险。

我用我在开头说的话来结束发言：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党的政治意识的增强不是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工业中心，而是指边远农村，这就要求我们把决议制定得更加清楚、更加固定、更加细致、更加准确，少在决议的各条中附加五花八门的保留意见，而且决议中绝对不应有丝毫的调和主义。（鼓掌）

主席：现在请丘巴尔同志发言。

丘巴尔：决议草案对经济状况作出了总的评价，既肯定了我们取得的成果，又指出了我们的不足之处，我认为这一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一肯定中，主要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已经获得了有利于进一步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当丰硕的成果、相当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当显著的成就。至于不足之处，

我认为,某些情况我们即使不在决议里加以说明,那么也可以而且应该在这里,在全会上说清楚。既然柯秀尔同志说,李可夫同志的话有点恐吓的味道,我就预先作个声明,我可能也算是这种“恐吓者”,因为我要引用乌克兰的一些数字,那里的状况远比全联盟的状况糟。

有人喊:是件危险的事。

丘巴尔:是危险的事,但我不怕做这件事,因为在总决议中未揭露出来的那些事实——它们在各地区也没有被揭露出来,毕竟应该让中央委员会知道。

米柳亭同志在说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我们进行的种种经济过程时,将一年前进行的过程和今年发生的事情加以区分,我认为他说的完全对。我认为他这么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谁要是在作出或者打算作出基本的政治结论时,不考虑今年农业的特殊情况,谁就必然要犯错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加以区别的话,就必然犯政治错误。不过,在这方面还可能犯第二个错误。如果对今年特殊的困难估计不足,那么,尽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业务计划上也可能犯错误,然后这些错误就会导致动摇,导致对党的路线的攻击,导致对党的经济路线的攻击。在党内,我在这里不是说中央委员会,在困难变得严重时,就可能有人对情况作出这样的估计,也要看到这一点,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不必在这里为清楚、明确地强调我们的不足之处而担心,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经验表明,每当困难出现在我们面前、出现在无产阶级联盟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再次加强,看到无产阶级对这些困难的攻势再次加强。看看国内战争时期,看看我们遇到的所有经济困难吧。我认为,我们,中央委员会,需要动员党的力量,党还有工人阶级和所有与我们同行的人的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

有人喊:还需要把问题搞清楚。

丘巴尔:对,还需要把问题搞清楚。正是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才认为,控制数字、所有的计算以及1928—1929年度的业务计划都低估了乌克兰的巨大缺口。我来说几个数字。在米柳亭同志分发的这本册子中,第50页上就有粮食总产量的数据。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据(这些数据有些过高),去年我们在乌克兰收了10.236亿普特的谷类作物,今年收了7.999亿普特,也就是说,少收了3.23亿普特。决议中讲,全联盟各地的粮食产量平均比去年少2亿普特。但是,我们全联盟各地平均少收2亿普特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对乌克兰来说(只有乌克兰的歉收量超过3亿普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在乌克兰我们少收了3.23亿普特,如果没有少收这么多粮食的话,党内、国内就不会有许多人对我们说三道四

了,大概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就不会犹豫不决了。这也说明了我的观点:对本年度情况的关注应该少一些,要稍稍关注一下对我们上年农业政策的评价。另一方面,这个数字也说明,不经受痛苦,不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堵上这个缺口的。既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表明,要给乌克兰4200万卢布来消除歉收带来的后果,那么就比较一下负的3.23亿和援助的4200万这两个数字吧。这些钱够不够弥补这个漏洞呢?绝对不够。要是再解释一下这4200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1050万卢布是为居民提供食品的无偿援助(为孩子和成年人提供食品),然而我们需要救助的人口有300多万。请算算,一个人一年能从这1050万卢布中得到多少呢?一年3.5卢布。所以我们只能保障12%—13%的人的生活,其余的人将进一步挖掘各自的生产能力,靠他们的经营活动来养活自己。用什么来恢复经营活动呢?用需偿还的贷款。4200万中的剩余款额(除去上述1050万卢布)为需偿还的贷款。库比亚克同志在这里作过说明,贷款这东西并非总能起作用。遭遇歉收的是什么人呢?是贫农和中农农户。我们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经济援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在近800万俄亩的作物被冻死和烧死的草原,我们的阵地越来越不牢固。我们的草原现有播种面积约1000万俄亩。如果不算顿巴斯区(它也属于草原)的话,就是近800万俄亩。800万俄亩——这差不多有整个西伯利亚边疆区那么大。到目前为止,草原地区在我们联盟的粮食饲料平衡方面一直起着极大的作用,将来也会起而且应该起这样的作用,要是提供的资金不足,经济援助不够,就意味着也会在明年给整个联盟造成粮食困难。我们的秋播运动进行得很广泛,但仍比乌克兰的计划少播种约9%—10%。柯秀尔同志在这里说了歉收地区少播种面积数。进行春季播种运动时,我们应该更加坚决、更加努力。但我们能不能保证为春播运动做好充分准备呢?我们不能光靠钱来播种,我们需要种子。种子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粮食非常少,希望得到联盟的援助。秋季得到过一些,希望春季也能得到,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分歧和争论,即该得到多少。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存在一种危险:我们会把收购来的春播作物多吃掉一些,因为总得吃点东西,而吃掉的越多,播种的就越少。在这方面,不仅需要我们以及各个地方的努力,而且还需要全联盟的努力。我们在我们这里的各个地区发现:哪里的情況不好,哪里的工作就进行得比较紧张。在情况比较好的地方,就相对松懈一些。我非常担心,联盟其他那些收成好的地区的同志们恐怕会为他们的粮食收购计划很好地、百分之百地完成以及一切顺利而满足,恐怕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在春播运动前向乌克兰提供种子和物资、帮助其恢复

播种面积以及扩大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商品粮产区的播种面积无关紧要。

喊声：说得对！

丘巴尔：不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在以后的全会上就还得计算这些缺口，还得说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因此，我也在这里强调，我们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应该保证今年春季恢复我们草原地区的播种面积。我们的工作计划要以发展草原地区那种几乎是单一谷物业的农业为目标，使草原地区的农业恢复其全部生产能力。我们今年歉收的那些地区去年上缴了8500万普特小麦。我们能够也应该每年都获得这8500万普特，并使这个数字逐年扩大。

埃赫：在机器方面呢？

丘巴尔：关于机器，我在这里也要说，对草原地区来讲，机器，尤其是拖拉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我们乌克兰，请埃赫同志注意，每匹马要耕5.4俄亩地（根据中央统计局的这本小册子）。每匹马平均要耕这么多地，而在草原地区几乎多出一倍。在你们西伯利亚，每匹役马耕3俄亩地，所以，你们需要给你们的马加活儿，而我们什么活儿也加不了，我们需要用拖拉机来帮助那些已经不堪重负的马。

柯秀尔：对！给埃赫和瑟尔佐夫加活儿。（笑声）

丘巴尔：既然我们制定的是全联盟的计划，那就该停止各地区之间的这种争执。不能认为哪个地区该有什么样的比例。这是中央统计局的客观数据，让你们的马去耕5.5俄亩地吧，可实际上你们的每匹马只有3俄亩地可耕。在我们这里，每匹役马应耕的耕地数量最多，可是役马又很少，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多马；而今年由于歉收，马匹数量不断减少，因此，我们比任何一个地区都更需要拖拉机……

柯秀尔：说得对。

丘巴尔：我们真的想收获那些粮食，我们有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更早收获那些粮食，没有那些粮食，我们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必然会出现断粮情况。

草原地区问题——这不仅仅是提供贷款的问题，这是为土地整治、土壤改良工作即增加草原地区蓄水量的工作，以及抗旱方面的其他各项工作直接提供大量拨款的问题。把这一切都纳入共和国的预算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预算方面，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这在控制数字中可以看到），要给我们的是4200万卢布，这我已经说过，但从我们的预算看，划给我们的是3700万。如此看来，这笔资金中最大的一份还是划给乌克兰的那份。有过这样一个打算：从我们的名下划4300万，给我们4200万，有人想从乌克兰的歉收中赚100万。现在，通过

分析来看,我们名义上还是得到了钱,但从我们的预算看,用于歉收地区恢复工作的500万已被减掉,所以我们的恢复措施也取消了。我由此得出结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小册子¹⁴⁹中提到的整个这项援助是令人怀疑的,甚至该受到批评。

至于那些平衡表……我在这里就不引用确切数字了,但是关于我们的那些粮食平衡表,我们认为,没有联盟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同志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制定自己的平衡表的吧?米柳亨同志清楚这个情况。因为从平衡表看,我们没有剩余商品粮,相反,却出现很大的赤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森林草原地区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水平下降5%,草原地区下降15%;森林草原地区黑麦和小麦的消费量(这不是我们的计划消费量,而是农民的消费量)将下降10%,草原地区下降30%;牲畜饲料也是如此,多林低地地区的黑麦和小麦消费量将下降25%,右岸地区和左岸地区均下降50%。城市消费总水平已下降5%,还有20%的杂粮被算作黑麦和小麦。这是我们统计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在缺少大约4300万普特(中央统计局统计的数字为1400万普特)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可能保持一定的平衡。但如果农民认为最好吃掉我们赖以制定计划的这些粮食,那我们到春季就不会有我们所需的播种物资了。要想从农民那里不仅拿走今年收获的粮食,而且拿走他们的大部分备荒粮,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我们认为,从秋天起就要往乌克兰运送粮食,少运一些也行,以免出现太大的粮食差价并因此使粮食收购计划难以完成。在我们全联盟范围内,收购工作正在进行,也应该做到从秋天起就向我们提供援助,从而使我们能在冬天将收购计划全部完成。春季必须提供种子援助,前提是,我们不想保持市场平衡,但想保持最重要的粮食产区的经济生产能力。

我不再拿数字来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这种困难状况了,我认为,同志们,你们都非常清楚,今年我们在乌克兰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工作的,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不指望能很容易地得到联盟其他地区的大力帮助,我们应该自力更生,这也许会稍稍打乱我们的一些计划,如果使我们的农户的生产能力减弱,如果我们使我们乌克兰农业的总的生产资源减少,这必将在明年影响到联盟的所有资源。这一点也要考虑到。

关于粮食收购工作。柯秀尔同志在这里已经谈过我们的情况,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的发言时间已经用完。

喊声:接着说。

丘巴尔:我只想强调,我们在决议中也要着重谈谈节约粮食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全联盟不能做到通过对磨粮进行限制、通过在粮食消耗方面建立明确的

制度来进一步节约粮食的话,那么到春季我们就可能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尤其是在播种物资保障方面。对我们来说,对乌克兰来说,恢复和继续发展谷物业的任务具有极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决议中在谈到百分之七的播种面积和百分之三的增产率时,对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调得不够。我认为,这项任务之所以很紧迫,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总政策,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并力求在今年补上那个自然缺口,即由于大部分秋播作物冻死、春播作物早死而出现的缺口。在分析自然缺口的原因时,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天气。我们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也是一个原因。实现集体化和发展国营农场是我们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不仅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如此,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也是如此。但是,同志们,有些时候虽然有好的决议,有好的规定,还是会出现一些糟糕的事情:去年我们得到2500万卢布的机器供应贷款,其中只有12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

只能用这1200万卢布来为那些想加入集体的人提供机器。这些钱是不够的。今年这方面的拨款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由于我们一部分农民对机器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降低(因为我们有11个区的生活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常轨),所以我们不能增加机器,我们需要贷款来保证机器供应,因为机器毕竟要提供给那些组成集体的贫苦农民,他们无法用现金购买机器,而按照我们的机器供应计划,差不多有近60%¹⁵⁰的机器我们要用现金结算。在机器供应得不到贷款计划充分保证的情况下,究竟如何保证以阶级的态度对待机器分配、如何保证集体化动因的产生呢?农业银行¹⁵¹的计划应该进行重新分配,使机器供应完全得到贷款的保证。

我认为,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一紧迫任务要同关于工业化速度的那些十分正确、十分明确的观点和看法联系起来。我们应该保证而且将切实保证工业化的速度,因此必须完成我们在谷物方面为春播运动提出的艰巨任务。秋季我们已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拨发了大量的秋播种子——我们为乌克兰的播种运动拨发了1420万普特的秋播黑麦和小麦。这是工人阶级和国家做出的最大牺牲,国家不得不限制对黑麦和小麦的需求,精打细算地拨发播种物资。春季前我们要更多地动员自己的力量,从组织上保证调动农民各阶层的力量去扩大播种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可是,即使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对于上层群体即富农,我们也不应该提供任何特殊优惠。我认为,为了上层“专家”群体而对农业税做种种修改是不正确的。我觉得那些修改做得有些草率,它们机械地限制了征税,它们破坏了征税。需要进行修改,需要克服种种弊端,但不能机

械地处理,不能机械地限制,因为这样做也会机械地妨碍深入摸清富农的实际收入。依我看,在农业税方面,对收入超过400卢布的中农农户一概加税要比区别对待更危险。这种机械地加税的做法打击了中农,而且还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35%的农户被彻底免税,从零征税制向征收第一类税的改变非常大,也许在某些地区应该给25%的农户完全免税,而为10%—15%的农户规定一定的税率。这样一来,现在看上去往往会被免税的农户将会支付一些税,而现在被改变了征税标准的中农看上去将会少交一些税。我认为,不应该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里给上层富农群体规定百分比,因为在每一个村子,在每一个地区,这个百分比可能会有很大差别,而我们已经习惯很肤浅地看待比例。

有人喊:要是有很大的差别就不好了!

丘巴尔: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且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有区别地征税的农户的数量。

现在谈谈农业税制度有没有引起农户分散的问题。我在我们乌克兰的情况下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说说这些数字。在这里,我们按户征税的原则,也就是按农户计算收入,已经实行了几年。1923—1928年,我们的农户增加了8.3%,每年大约增加1.7%¹⁵²,这主要是因为农业人口的实际数量不断增加,增加了2.2%。凭这些数据,我可不敢在这项征税原则在全联盟实行一年后就把它完全取消。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地区进行研究,看这么做的效果怎样。致使农户分散的不仅仅是农业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是一个显然无法完全制止的过程。我认为,我们的出路在于让这些分散的农户参加合作社,参加劳动集体。生产合作社可以使分散的农户摆脱困境。就这一点来看,到目前为止,党在集体化和社会化方面的努力已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对于完成我们在振兴农业和发展工业化的工作中所面临的任务来说,这些是根本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决议中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这项工作,并且指出,小农户在反对自发势力以及提高商品率、合理使用机器的斗争中的出路在于集体化。

谈谈对工业的几点看法。工业的核心问题是降低成本。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党和全体工人阶级必须集中力量解决的问题,因为不降低成本,工业化的速度、基本建设的速度就要受到影响。这项任务需要突出强调并深入宣传,因为,虽然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很多,可是认为不可能降低成本的理由也很多,如粮食供应状况糟糕、合理化程度低下、机械化水平不高等等。要知道,我们在工业和农业中都得使用我们现有的那些资源,要用它们去完成这些指标,而且这一点往往得不到正确认识。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我们有拖拉机,集体化就会容易

实行,如果设备得到更新,企业得到改造,产品价格就会降低。但是,即使没有拖拉机,集体化也还是要实行,因为,如果我们不实行集体化,那么我们就根本积蓄不出购买拖拉机的资金。拖拉机可以促进集体化,为集体化提供保障,但是,在我们的货币条件好转时我们才能得到拖拉机。工业方面也一样:我们应该不等到改造就降低成本,因为,不在现在的基础上降低成本,我们就积蓄不出进行改造的资金。

我认为,在基本建设中,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缩短建设工期。在这方面,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厂的建设即使推迟一年、不开工我也不担心,因为:建这个工厂需要钢铁,我们缺少钢铁。我们现在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乌拉尔和乌克兰现有的工厂建造高炉,并且要保证为这些工程提供必需的钢铁和设备。

有人喊:说得对。

丘巴尔:我不反对建捷里别斯厂,因为这个厂有特殊作用,但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厂最好还是从一开始就好好准备,然后按预定的工期完工。从技术上讲,这是完全可能的。党曾强调认真准备建设工程的重要性,但我们还是逐渐走上了贪婪的路子:赶快开工,甚至不看看什么地方还有问题,而为此我们付出了几百万的代价。我们的建设工程的供应没有保障,所以一切都没完没了地拖延:德国人9个月就建造一座高炉,而我们要用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更好地进行建设工程的预先准备工作来消除这个差距。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生铁。从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看,原先缺少的那20万吨生铁似乎现在已找到,因为有可能增产27万吨生铁。我十分怀疑这一可能性,因为我们的旧高炉的事故率会使这些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需要对我们的机器制造业进行再保险,并要从我们现有的钢铁资源中节省出一些。假如我们要使用2000万普特房盖铁的话,那么,能否从中拿出哪怕1000万普特,这相当于1400万普特型材或大约2000万普特铸铁,把它们用在工业化上,而不要用在盖屋顶上,再说,盖屋顶用的干性油也没有。干性油是用亚麻籽榨制的,但我们缺少亚麻籽,因为居民的食用油不够用。能不能使一部分钢铁得到更合理地使用呢?我想,通过这一途径,节省钢铁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也必将做到。此外,还应当从其他方面加把劲,我们一定会找到几千万普特的。

李可夫同志说进口生铁不会造成大的恶果,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不是成就,而是一大失败,因为现在进口生铁还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如果将来真的遭遇封锁,如果要打仗,我们怎么办,难道靠进口的生铁去打仗吗?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祸患,我们的不幸。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在年度业务

计划中把它看成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是应该采取这样一个方针:不进口生铁,只进口那些可以加快我们工业改造的东西。

最后谈谈各部门的工作质量问题。我觉得,我们总是谈工作质量问题,但我们又被某种惰性所困扰。这方面还没有改进。在全会召开前几天,我去过马里乌波尔冶金厂。厂长报告说,他那里最近几天将出现这样的情况:5名工程师要去论证工业财务计划,22名工程师因一年前一根坠落的管子惹祸被传唤出庭,其中一部分人作为被告,另一部分人作为证人。27名工程师离开工厂一个星期,也可能是两个星期。厂里靠谁去生产?谁去关心工作质量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在就沙赫特事件作决定时写有这样的话,要用懂得生产以及其他工作的优秀管理者来取代那些能力差的委员,等等。但我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为现在的管理者提供充实知识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不幸。

关于阶级斗争和右的危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柯秀尔同志说的话,既要同右的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同对右的危险的调和态度进行斗争。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情况下,不应有丝毫的松懈和宽容。必须同右的危险进行斗争,同对右的危险的调和态度进行斗争。有一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一个类比,说我们现在正在实现像1917年十月革命那样的急剧的转变。他是把现在的情况同1917年的十月革命进行类比。我认为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

斯大林:这是谁?

丘巴尔:好像是加马尔尼克,要不就是哈塔耶维奇。

喊声:加马尔尼克。

柯秀尔:但他不是这么说的。

丘巴尔:他说的是,现在我们这里正出现一种急剧的高涨,一些人对这种高涨惊恐不安,就像他们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胆战心惊一样。他在评价我们1928—1929年的进攻时拿十月革命作了类比。在评价我们的进攻、评价我们的工作^时拿十月革命作类比,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现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同了,任务不同了,消除国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根源的方法也不同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卓有成效地实现我们的口号,贯彻党的指示,完成预定的经济计划。从这个角度看,在谴责这种实用主义和谴责事务主义方面我们不应该过于求全责备。决议草案说得对,应该抨击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党的总路线。应该抨击实用主义,因为它的种种做法模糊党的路线。应该抨击事务主义,因为它使人走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但我们的不幸和我们的薄弱之处在于:有几十万人远不是在

做实际工作,鼓动和宣传搞得很多,在该负责任地工作的地方却很少有人这样做。我看了我们的一大堆业务杂志。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是我们如何教工人技能、如何提高他们的水平、如何给农民传授农业知识吗?只有一点点。同志们,这一情况我们知道。然而,要是那些被安排做这件事的同志们不做这件事,不通过这些杂志和手册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提高群众的技术、农业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实现不了急剧的高涨,就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控制数字中提出的降低成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的那些指标,只靠党即150万党员是完成不了的。这一点不能忘记。不仅要政治上动员全体工人阶级、中农和贫农,还要让他们掌握技术知识。

我在《真理报》上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¹⁵³,请允许我再谈谈这个问题,我们的纸张在相当程度上用的不是地方。教科书用纸都不够,而我们的许多纸却被用来印外国的和国内的那些没用的东西,用来反反复复地印同样的东西,与此同时,工人、农民,尤其是贫农,非常需要我们在上层开展的那种学习。我们苏联有从事学术工作的机构,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这些研究机构到工农群众的传送带工作效率太低,致使群众现在仍然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为了保证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在这一方面要加把劲儿。文化革命的口号需要用具体的内容来充实。我认为,党在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找到足够的力量来坚持列宁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明确方针,并完成自己的实际任务。在这方面不能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如果我们不真正学会比资本主义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的话,我们就会被赶下台。更好地服务就是更好地安排实际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弱点,而且,尽管我们有诸多强大的方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觉得忽视这一方面是不对的!

主席:现在请米尔佐扬同志发言。

米尔佐扬:今天早上分发给我们一封弗鲁姆金同志的信¹⁵⁴,这封信非常值得注意。我认为,有必要在中央全会上谈谈这封信。我觉得,弗鲁姆金同志在这封信中又犯了他在第一封信中所犯的那些主要错误。我想谈谈这封信中的两处违背党所作出的各项决定的地方。此外,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也违背现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那份决议。在这封信中有一处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一直认为,比这些暂时措施危险得多的是1—3月的*粮食收购过程中形成的那种反中农的思想,这种思想直到七月全会召开前还未被清除。”¹⁵⁵依我看,这与党中央的七

* 原文如此。——俄文编者注

月全会所作出的评价是不一致的。在七月全会上曾谈到,尽管各级党组织都犯有某些错误,尽管各地都犯有许多错误,但是,党根本没有产生过弗鲁姆金同志所说的那种反中农的思想。我还记得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发言,他说,假如现在党内出现反中农的思想,那么就必然会发生与中农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会发展为起义,等等。我们知道此类事情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生过。显然,弗鲁姆金同志的这个说法与七月全会的决定不相符。信中另一处说我们的农民经济正在衰退。我把这一处也读一下:

“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停滞状态使我们的工业无法进一步发展,使出口和储备减少,使党内出现不利的政治局面,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复杂起来,全党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在报刊上写关于衰退的文章。但是,在党内我们不必讳言:‘落后’就等于衰退。我们应该非常仔细地看看那些最重要的生产指标。”¹⁵⁶

在弗鲁姆金同志看来,衰退是存在的,这一点无可争议,但可以不在报刊上写文章谈这种衰退,不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而在中央委员会内,在党内,谈这个问题是应该的。我觉得,对我们农民经济状况的这种评价同已经确定的党的路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那个决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这里宣读的一些数字,特别是米柳亭同志引用的那些数字,完全可以驳倒弗鲁姆金同志的这种说法。弗鲁姆金同志从发展农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中得出的是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我可以根据外高加索地区农民经济的状况肯定地说,弗鲁姆金同志关于衰退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弗鲁姆金同志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加深和扩大了这些错误。

因时间不多,我不想再谈其他错误了,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弗鲁姆金同志曾宣称:每100万普特的粮食,无论其来自哪里,都可以起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要看每100万普特的粮食来自哪里。这一错误当时已被莫洛托夫同志纠正了¹⁵⁷,况且斯大林同志也对弗鲁姆金的第一封信作了答复¹⁵⁸。我只想谈谈这些看法并指出,这封信完全违背了党就农民经济问题所作出的那些决定,也是党内右倾的真实反映。

现在,我想就两个实际问题谈几点看法。首先,我想谈谈棉花问题,李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假如我们所具有的发展轻工业的可能性比我们在拟订计划时推测的这种可能性大,我们就能实现这种发展。但是农业原料限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而棉花限制了纺织业的发展。没有棉花和农业原料,就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大规模地发展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进一步发展纺织业(当然,不

能损害重工业)的必要性表明,我们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种棉业。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那里有产棉区,也不是因为我身上有什么地方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情感在起作用。绝对没有。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每年都要花费数千万、数亿卢布去购买外国的棉花。我们每年都要用数亿卢布、用外汇去购买美国、埃及和其他国家的棉花。可见,棉花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对外贸易的问题,同时也是保存国内外汇的问题,同时也是减少黄金和外汇流向国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棉花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我觉得,对这个大问题应该特别关注。现在,比如说,乌克兰正在进行发展种棉业的实验,但是,难道我们的老产棉区发展种棉业的潜力已经耗尽了吗?难道我们这里,比如说在中亚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没有更广泛地发展种棉业的潜力了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发展种棉业的潜力是有的,包括在我们这个地区。

斯克雷普尼克:你想保持外高加索地区对棉花的垄断吗?

米尔佐扬:不,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不是保持外高加索地区的垄断,而是应该在适宜的地方发展种棉业。应该把钱花在可以得到棉花的地方。我们可没有对你们乌克兰在煤炭、冶金等方面的垄断提出异议。

斯克雷普尼克:你们也去找煤开采吧。

米尔佐扬:我认为乌克兰的煤炭工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在那些已经拥有种棉业的地区进一步发展种棉业,而是现在就开始寻找新的地区的话,我们会犯错误。在外高加索地区,包括阿塞拜疆,目前有几十万俄亩土地可以种棉花,我觉得,如果我们向这个方面投资的话,情况会更好。

在发展种棉业方面,供应问题是很重要的。我想在这里提出关于及时地、有保证地为种棉区供应工业品和粮食的问题。由于今年在我们的供应方面出现了几次中断,我们在一些种棉区已发现向谷物业和其他经济领域转变的自发倾向。农民不想种棉花,因为他们得不到粮食,得不到布匹。我认为,我们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构应该考虑到,对种棉区的工业品和粮食供应要同对我们国家一些最重要的地区、对工业区的供应一样。

在机器供应、拖拉机供应等方面也同样要这么做。我们现在把机器和拖拉机主要投放到谷物种植地区,当然,我们这么做是完全对的。但我认为,对种棉区的拖拉机和机器供应要同对我们的国营农场的供应一样,或者仅次于国营农场。要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投放到种棉区,以便在近几年内取得最大的成效,在最近几年内摆脱现在这种大量进口棉花的状况。

我想谈的下一个问题是石油问题。早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就分发的控制数

字详细说明了我们的对外贸易规划。这些数字表明,石油在我们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正逐年加大。李可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也在报告中证实,石油在我们的出口方面,在补充外汇储备等方面,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同志们,我们并没有想方设法来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的石油工业,来保证最大限度地出口我们的石油产品。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我们的计划经济机关的许多错误,有必要谈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石油工业方面的一些错误。一年又一年地反复犯这些错误,而且它们没有得到纠正,有些错误现在还在犯。

鲁希莫维奇:说说看,是什么错误。

米尔佐扬:我现在就来说说。例如,石油工业发展不平衡。要么是只把钱投到钻探上,忽略了工厂建设,因此工厂建设常常落后;要么是把钱一股脑地都投到工厂建设上,忽略了钻探。长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石油工业总有一个部门是落后的。的确,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了某些措施来改善这一状况,但是这些错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目前我们已经在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代价,而且也看不出要想方设法使国家在两年后避免过去这些错误以及新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的迹象。

现在需要大量的石油产品用于出口。但我要问问柯秀尔同志和鲁希莫维奇同志:我们工厂的设备能提供外贸所需的那些石油产品吗?当然不能。鲁希莫维奇同志,您给阿塞拜疆石油天然气托拉斯的那个出口石油产品的生产规划几乎无法完成,因为工厂的设备不能加工那么多石油。现在,在建设巴库—巴统石油管道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件事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建设石油管道并开始在巴库和巴统兴建许多新工厂的时候,又开始削减我们的钻探资金了,而钻探工作对石油产业具有巨大作用。我们要做到,两年后我们在石油工业部门中不遭遇危机,不陷入石油管道已铺好、新工厂已建成而石油量却不足的境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关心为确定新的石油作业而进行的勘探工作。我们不是展开和扩大钻探工作,而是使这项工作的速度有所放慢。所以,首先要对我们的石油工业进行正确的领导,其次,要扩大和增加对石油工业的投资。

我想结合这一点谈谈成本问题。古比雪夫同志在这里说过,石油工业的合理化工作做得最好。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全部,这不是说石油工业的合理化工作已经结束。在合理化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进行的合理化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效果。我应该告诉大家,我们任何一个工业部门的价格都不如石油工业的价格降得低。石油工业是唯一一个价格低于战前水平的工业

部门。在其他工业部门价格降幅很小,或者几乎没有下降的同时,我们石油工业实行了大幅降价。正因为如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把钻探成本降低14%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是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困难的事情也要去做,容易的事情谁都能做。

米尔佐扬:不仅仅是困难的事情,我认为这还是一件几乎无法做到的事情。

奥尔忠尼启则:几乎——这就是还可以。

米尔佐扬:1923年,我们的钻探成本是400多卢布,而今年是180卢布,您提出要在一年内将这个数字降到155卢布,也就是说,一下减少25卢布即减少14%。这是件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把钻探成本降到这么低,我们实际上只能把拨给的资金用于钻探少量油井。这样的危险并未消除,所以我认为,在提出降低成本的比例问题之前,要考虑到一切可能性,要考虑到石油工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裂化问题再说几句。现在石油部门的主要问题就是裂化问题。裂化是石油工业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今年我们能搞4次裂化。去年我们搞裂化的经验表明,在这方面需要开展极其广泛的建设,因为重油可以裂化出31%的汽油,而我们用普通方法只能得到5%—6%的汽油。我们需要大张旗鼓地开展裂化建设,可是只让我们搞4次。4次裂化,根本不够。太少了,同志们。

古比雪夫:16次。

米尔佐扬:16次,总共是这么多次,不知为什么也只让阿塞拜疆石油天然气托拉斯搞4次,况且,搞裂化实际上花不了很多钱。裂化设备总共价值90万卢布,要么就是100万卢布。依我看,为了对外贸易,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为了缓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的出口部门的石油工业。同志们,我希望我们的制订计划的机关能考虑到这一点。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右倾的问题。现在我们党正等待着中央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可是我觉得,提交我们审议的那些决议并非都能使我们全党满意。我认为,首先必须在中央的决议里提到在反对右倾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全党思想动员。因为在那段不长的时间里,全党曾一致地反对右倾,反对右的危险。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不能不提到这一点,况且中央全会恰恰是在进行了我们全党范围内这一大规模运动之后立即召开的。党当然有权希望中央委员会提到这种一致的行动,提到党内进行的这种思想动员并对它们作出适当的评价。可是中央的决议里恰恰没有谈到这一点。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

提法,党就不会理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党在反对右的危险的斗争中丧失斗志。但现在可能还谈不上党在这个问题上丧失斗志,现在要谈的是加强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准备好同右的危险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武器。因为犹豫、动摇这些小资产阶级情绪渗入我们党内的可能性不但没有消除,反而由于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日益猖獗而不断增加。我认为这一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在决议里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分清楚地说明问题,以免出现两种意见,以免对此产生任何疑问。不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消除右的倾向,就不可能克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由此可见,同右的危险作斗争是党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主席:现在请基尔基日同志发言。

基尔基日:我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号召和党组织作出的那些决定,从检查党的工作的角度来看问题。许多同志在这里谈到了决议草案的第7条。这一条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我们在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接下来却说,我们不够关注个体经济。从地方实践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一直都在用国家机构的种种手段来加强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所以我觉得,现在谈论我们不够关注个体经济,还不如再谈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党内有过某些意见,说发展国营农场毫无用处,例如在我们中亚地区有人说,发展国营农场是荒谬的,是不了解地方情况。通过具体分析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党员没有完全领会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向集体农庄征收的农业税与向富农农户征收的个别税一样多。这证明,在党员的思想中,对通过使贫农加入集体农庄来发展农业的基本任务的理解还没有发生转变。我们在第7条中既强调这个方针,又强调那个方针,我觉得,这会对理解党在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方面的总任务产生负面影响。我认为,无需在这里对集体化施加任何压力,但必须转变党员的思想,转变民众的思想。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加强解释工作,所以我认为,决议中要提出更加明确的方针,不要使党员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困惑。

第二个问题。李可夫同志在发言时说,在中农中出现了一种缩小播种面积的倾向。我不知道其他地区怎么样,但是就我们这里各个地方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情况正相反。既然国家已采取措施限制上层富农,限制他们的剥削倾向,那么,现在说一部分中农在缩小播种面积就是不对的。相反,我认为,中农和贫农恰恰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也应当搞清楚,否则会使人有些不解。

现在说说第10条。这里有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中的几段话,其中最后一

段说,必须防止投入到重工业中的资金闲置。现在有些党员说,我们给重工业的钱太多了,这个数字可能会使人觉得加快工业发展的总方针有所动摇,也可能会使人感到有所困惑。我想,关于这一点应当讲得更清楚一些,以免有人说,瞧:一面说要加强重工业,一面又在决议中提出要防止重工业中的资金闲置。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中亚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无论是作主报告的人,还是作副报告的人,都只字未提在中亚建设大型工厂的问题。

臧声:这是你的事儿。是说冶金厂吗?

基尔基日:我想,冶金厂也可以建。古比雪夫同志说,有些地区建的冶金厂得从2 000俄里以外的地方运煤。如果在中亚建的话,我们有煤,有石油,总之有巨大的潜力……

斯克雷普尼克:有矿石吗?

基尔基日:是发展大工业的“巨大潜力”。这里的许多人会说,我们那里没有黑色金属矿石,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有色金属矿石,即使不能谈黑色金属和大型冶金厂的问题,那么有色金属厂的问题还是可以谈的,而且这些厂也是可以建的。应该指出这一点。最好来看看这个例子:我们正在沙尔斯开采石油,现在一眼油井一昼夜能产16 000普特石油。这表明:同其他许多地区相比,甚至在开支少的情况下,我们中亚地区发展工业的潜力更大,而且连花费都更少。所以,也应当关注一下中亚地区!

第二,如果拿种棉业的发展来说,中亚地区可以有相当大的增长,今年比去年增长了22%。可是用于购买肥料的钱,用于对修建发展种棉业所必需的氮肥厂进行相应投资的钱,总共才有40万卢布。

鲁希莫维奇:按计划办,基尔基日同志。

基尔基日:不错,要按计划办,但我想,不能总是一味地制订计划,还应该去建厂。

丘巴尔:没有计划是不行的。

基尔基日: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年一年地计划好,而实际上什么也不去做,这可不行。

我认为,在这方面要着手实际工作,要拨出适量的资金,要考虑到中亚地区发展种棉业的潜力很大。如果今年我们整个中亚地区有望生产出4 700万普特籽棉,那么,我们就能减少一定的进口,节省我们的一部分资金。我想,对这个问题应当予以极大的关注,不能像现在这样。

简单说说粮食问题。我们今年第一次在中亚地区进行粮食收购工作。在乌

兹别克斯坦,我们总共收购了450万普特。米高扬同志提供的数字是,在中亚共收购1000万普特。

瓦雷基斯:不多。

基尔基日:我想,先不要说是多还是少,而要先看看我们所处的条件,我们是缺粮区,而且是第一年实行粮食收购。

瓦雷基斯: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搞。

基尔基日:我们想逐渐减少谷类作物,发展种棉业。种棉业的发展实际上要靠贫农。70%的棉花是由贫农播种的。如果我们不为他们供应充足的粮食,这无疑会影响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

彼得罗夫斯基:你们要援助乌克兰。

基尔基日:我不反对向乌克兰提供适当的援助,因为那里出现了歉收。应该让乌克兰向一些地区供应更多的粮食,可是今年乌克兰的粮食歉收,我们这里也出现了非常大的粮食缺口。我们常说要搞一些粮食储备,而今年我们任何粮食储备也搞不成。一旦冬季到来,我们那里很可能被积雪覆盖,我们将遇到粮食方面的巨大困难。我想,应该预见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右倾问题。我认为,现在各地都已经充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党组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看过决议后产生这么一种印象:决议中对坚定不移地同右倾作斗争的方针讲得不够。只从思想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在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正在明目张胆地进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只从思想上作斗争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加坚决地强调党组织作出的那些决定。要让所有党组织中、所有支部中的党员都了解右的危险,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要对个别人在各支部反右倾斗争中违背党的方针的任何表现予以坚决的抨击,要使这种右的倾向在党员群众中得不到任何支持。我想,现在应该十分坚决地强调这一点。

有些同志们在这里说,我们低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危险。依我看,斯克雷普尼克同志说得很对,一方面,我们要谈论右倾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又不能低估托洛茨基主义。要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做过了头也是不对的。现在应该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反对以调和态度对待右倾的那部分人。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当忽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托洛茨基主义在我们党内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批判。党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我们应该同这种危险一直斗争下去,应该看到这种危险,但党对右的倾向还了解得不够。所以,我认为决议中要更加清楚明确而又坚决地提出右倾问题,不要让任何人产生任何困惑,因为我们在全会结束

后还要向各级党组织作汇报。

主席:休息后由布勃诺夫同志发言,然后是苏霍姆林同志。我宣布,休息10分钟。

(休息后)

主席:现在请布勃诺夫同志发言。

布勃诺夫¹⁵⁹:同志们,在各位发言者向全会列举的大量数字中,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是那些表明工业投资增长的数字。米柳亭同志报告的数字也很重要,它表明,我们现在在世界煤炭开采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1913年。表明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极大成就的这些指标对解决同我国国防相关的所有问题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重工业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和巩固国防。而且也因为,正是在我国发展的当前时期,在我们沿着国家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加速前进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在我们的国防措施方面采取可以保证我们在数年内正确实施这些措施的方针。

近两年,关于整个国防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提出,而且在这方面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尽管如此,每年的军事预算仍很紧张,常常使许多军事措施难以按正确的方针实施。今年军事部门的预算所面临的那些情况又让人非常担心,国防措施方面的这一正确方针可能发生扭曲。首先,应当善于找到全国预算和军事预算之间正确的、合理的(从国防和国家的角度看)比例关系。假如我们的军事预算过多、过大,那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崩溃。

与此同时,要是预算太少,不能满足起码的军事需求,就可能瓦解整个国防事业。我这里有一些指标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情况。近4年来,军事预算在全国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连续下降。1923—1924年度的军事预算占全国预算的17%,而1927—1928年度仅占11.5%。如果看看我们国家预算的增加速度和我们军事预算的增加速度,就会发现这里同样存在增长缓慢的问题。1924—1925年度的国家预算比上一年度增长30%,我只说整数,而军事预算才增长8%。如果拿1927—1928年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国家预算又增长29%,而我们的军事预算仍然只增长17%。所以说,我们的军事预算虽然保持着绝对增长,但各方面都增长缓慢。

我们不仅在全国预算和军事预算之间的比例上存在增长缓慢的问题,还有一个指标也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让我们来看看国内物质技术资源的积累即对工业投入的增长,并把它同我们的军事预算对技术供应的拨款的增长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对工业的投入从1924—1925年度起在4年内差不多增加了4倍,而技术装备供应的开支(军事预算中的)仅仅增加1.5倍;而且要注意到,在1924—1925年度即比较期的头一年中,我们的军事预算对军事技术装备的投入数量非常少。

这两种对比表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令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军事预算太多了,而是恰恰相反,我们的预算捉襟见肘,不能满足所有的军事需求,当然只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如果拿今年来看,我们觉得军事预算的情况又不大乐观。在此我要给大家列举涉及两个方案的一些数据,因为,起初政治局批准的军事预算为8.9亿,而后来人民委员会把它减到8.4亿¹⁶⁰。

结果怎样呢?如果说8.9亿的预算占全国预算的11.5%即同1927—1928年度的军事预算在全国预算中所占比例一样,那么减少以后,我们的军事预算便不是占11.5%,而是占10.9%,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预算在全国预算中的比重又下降了。

拿1928—1929年度对工业投入的增加和我们对军事技术装备的拨款来看,按照第一个方案,我们对军队的技术装备供应可增加25.4%,而按照第二个方案只能增加16.5%。又减少了,而且减幅很大。

同时,我们对军事工业的补贴也大大削减,削减了整整3000万。

再说说我们的技术资源,尽管近几年党、国家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此作了种种努力,但我们的技术资源目前可以说仍然非常少。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现代式样的轻机枪,尽管设计已经有了,没有坦克,也是只有设计,等等。

许多极为重要的军事装备我们都难以保证供给。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些很有说服力的实例,但是最好还是别说了。

那我们今年的情况呢?

今年我们的情况很困难。李可夫同志说,我们的军事工业订货要用15个月完成,后来又说要用18个月。我们非常担心这些订货实际上会拖延1年时间。此外,还要考虑到,4年来我们在研究所、在军事工业中一直在研制一系列新式军事装备——杰格加廖夫机枪、营属火炮、坦克、金属歼击机和轰炸机等,今年,我们要拿出第一批总订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向军队供应这些经过改进的军事装备。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由政治局批准的我们的预算被削减了5000

万,而军事工业的订货被拖延15—18个月,而且实际上,我们无疑会拖延更长的时间。把已经批准的预算削减5000万,这样做令人担忧,而对于今年的军事工作来说,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种做法打乱了实际上已经在实施的各项措施计划(技术装备、整编等等),打乱了我们军事工作的整个五年计划。还应提到的是,我们完成这些订货非常困难,除非大大压缩我们军队的那些极其庞大和迫切的需求。而且这是在我们的经济成就应该在军事建设中相应地体现出来的时候。这种体现无疑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只看到今天,我们就是非常没有远见的人。我们应当看到明天。当然,我们目前还无法与欧洲的军事技术相抗衡,但全会应该了解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它正在解决的问题。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随着物质技术资源的快速积累,我们必将面临在这方面首先赶上欧洲的技术水平的任务。在所有欧洲大国,尤其是在美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军事技术的快速“进步”,其主导思想是所谓的军队摩托化和机械化的思想。大约在两年以前,这一观点的最狂热的倡导者——英军总参谋长的前助手富勒上校写了一篇文章,这也是他以前的著作的续篇,他在这篇文章中非常急切地,甚至可以说非常离奇地提出了军队机械化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内容不仅包括把后勤、运输和武器等改为机械牵引,而且包括建立以摩托车和坦克为主体的军队。

富勒在他的极其离奇的《战争的根本改变》¹⁶¹一书中对战争作了如下描述:
“未来的战争将是带有移动补给库的移动堡垒之间的厮杀。”

因为他相信:“坦克将使现有的作战方式迅速发生转变。”

在我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他详细分析了建设这样的军队的具体计划。

他写道:“未来最好的武器是火炮,最好的士兵是坦克炮兵,而最好的军队是主要由机械化移动火炮构成的军队。今天,我们正面临第三大战术周期(时代)——火炮周期。”

这当然不是今天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明天的事情,但这是欧洲和美国军事发展的方向。还要指出的是,两年前富勒的思想还无人谈及,还受到怀疑,而现在实际上已开始实现。

目前看来似乎“为时过早的”这些计划在部分地实现。

在英国的军队中,军师一级的运输已经实现摩托化,炮兵摩托化乃至自行火炮的制造正在进行,尽管进展缓慢。美国军队也是如此。法国军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此外,英国于1927年组建了特种机械化部队,今年改编为装甲部队。美国在1928年上半年也组建了类似的机械化部队。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初步

的试验,但是它们都是按富勒的思路进行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潜在敌人的“后勤”。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军队的机械化当然不是一项今天或明天就能完成的军事工作,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军事思想”,以便了解和掌握帝国主义的军事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军事计划的目标。我们不应该在发展我们的军事技术方面制定一些虚无缥缈的、充满幻想的计划,而应该考虑到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物质条件,记住我们生活在工业化年代,顽强地、不懈地和努力地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实力,进一步用技术“充实”我们的军队。帝国主义害怕群众,所以它要组建职业雇佣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是依靠同群众的紧密联系、依靠士兵的阶级觉悟来建设我们的军队的。

同志们,技术,军事技术,应该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今年的预算让我们感受到了切肤之痛,因为它给已经实施的计划出了难题,它使近几年实行的军事方针受到影响。

我已经说过,尽管我们近几年在军事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和成就,但我们的军事技术水平还是不高。应该想方设法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尤其是在当前时期,因为当前我们的工业正在快速发展,群众的文化水平正不断提高。但也不要忽略军事方面所谓的“消费性”开支。“消费性开支”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术语,它的意思是,似乎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开支,或者说,从备战的角度看,这些开支没有多大用处。

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军事方面的消费性开支呢?这是指用于对士兵以及指挥员进行一定水平的军事训练的军事开支。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这些开支。任何削减这些开支的做法对军队都是不利的。如果军队中没有有阶级觉悟的、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有文化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军队就不能提高技术水平,不能掌握先进技术装备。要提高红军的技术水平,就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对军队的一定程度的战术完善。所有这些都是靠“日常的”军事开支,即用于对士兵和指挥员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开支来保证的。看看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吧。如果拿我们近几年的军事预算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预算的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

我们要把大约三分之二的钱用于军队的广义开销,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用于技术装备供应的钱大约占军事预算的1/3,有几年多一些。从1923—1924年度起,我们军事预算的绝对数字不断增加,但预算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

有必要指出,用于技术装备供应的开支在军事预算中的比重正在不断增长。

1924—1925年度,这一比重下降到27.2%,然后便不断增长,1925—1926年度增长到30.4%,1926—1927年度增长到31.4%,1927—1928年度增长到36.6%。今年该比重也增长了,但是增幅不大(增长1.1%)。

今年,我们在加强国防方面恰恰需要大量增加军事预算。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确定了今年的军事预算申请,数额为9.6亿卢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业状况逐渐好转,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从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和用军事技术“充实”军队的程度、积累动员储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军队的技术“充实”程度一再提高,需要增加军事预算中所谓的“消费性”开支,也就是日常训练开支。所以,从8.9亿卢布的预算中削减5000万的做法非常令人担忧。

为了进一步说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预算的所有问题,我来讲一下每年预算增加的情况,从1924—1925年度说起——我们的预算从这一年度开始逐年增加。1924—1925年度,我们的预算比上一年增加3100万,1925—1926年度增加1.44亿,1926—1927年度增加8200万,1927—1928年度增加1.08亿。这就是在上述几年中,每年的军事预算比上年增加的情况。不妨说说我们每年分配这部分增加额的情况。我之所以要给大家列举这些数字,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明我们的军事预算十分吃紧,并且我想分析一下这些数字,让大家明白,军事预算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一年增加被服和伙食方面的开支,下一年则“撤下”这一方面,去增加工资,再下一年又“撤下”这项开支,将重点转到技术方面。我们其实就是在各项主要的军事需求之间分配每年军事预算的增加额而折腾来折腾去,却不能真正满足其中任何一项需求。

例如,1924—1925年度增加额为3100万,其中84%用于增加工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的指挥员的工资很低,应该把我们所能拿出来的钱都用到这方面。我们靠什么办法来做这件事呢?办法是,我们把用于技术装备供应的开支削减了整整9000万(占预算增加额的29%)。

下一年度即1925—1926年度增加的是技术装备方面的开支。我们全部增加额(1.44亿)的40%被用于增加我们的技术装备供应。接下来,在1926—1927年度,我们减少了增加额中用于技术装备的开支,把其中的大部分钱——5000万(占增加额的61%)用到被服供应、粮食等方面,而当时我们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动。

这就是我们以往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否有利于正确地、持久地、不懈地开展我军的军事训练和技术供应工作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我们的确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忙完这部分开支,又忙那部分开支,如此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军事预算极其吃紧,常常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些极为迫切的需求。今年军事预算的削减就使我们在开支方面受到部分影响。如果再比较一下两种情况(增加额)就会看到,我们原打算(从1.47亿的增加额中)拿出5000万(即34%)用于被服供应、伙食等方面,而我们总共才得到2700万(即被削减为9900万的增加额的27.3%)。指挥员的工资(某些级别的)我们要增发。同志们,要知道所谓的“消费性”开支在欧洲军队中也很高。例如在英国,把军事预算和海军预算加在一起看,其中的68%用于这些日常军事开支,德国为70%,波兰大约为62%,法国大约为69%,等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些军队拥有高水平的技术装备,需要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精通军事的军官。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一情况。在欧洲军队中,德国军队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而尤为注重提高人员的战斗素养。

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一位军队的同志来信中的两段话,他深入了解过德国军队的情况。他写道:

“据我们观察,‘国防军’的纪律相当严明,执行勤务的表现以及勤务以外的行为都实在无可挑剔。”

他又写道:

“在我看来,军官、士官和士兵的文化水平比我们的要高很多。在许多课目和练习中,几乎听不到长官粗鲁的叫喊声。士官的素养很高,他们能承担种种繁重的日常勤务和工作。许多部队的士兵在进行冬季室内课目时都学习高等数学。”

说说我们的工资。我们目前的工资根本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军人的工资比工人的工资还低。有一次,李可夫同志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上说,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现象,因为,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对比,所以进入军队和军校的主要就是那些无专业知识的工人,这是其一;其二,还有大量的失业者和文化程度很低的工人。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下面我说一些数字,它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用3—4年时间培养出来的一个排长的收入为103卢布,而用不到三年时间培养出来的一名旋工、钳工以及同等级别的具有中等技能的工人,从正式统计数据看,收入为112—130卢布。用7—8年时间培养出来的一个连长的收入为123卢布,而一个相应级别的工人的收入为121—132卢布;一个营长的收入为133卢布,而一个工长的收入为172—222卢布。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不可能不

对我们军校的人员补充造成不利影响。

有人喊:但他们可以得到制服。

布勃诺夫:现在我们已经不发制服了。要知道,参加地方民兵¹⁶²或征集前训练的指挥员至少半年不在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有两个家。

说说我们的伙食,我们军队的伙食仅仅比罗马尼亚军队强,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差,相当于德国军队给养的72%。

斯克雷普尼克:比波兰军队还差吗?

布勃诺夫:比波兰军队差,只比罗马尼亚军队强。对此应当再补充一点,我们军营的物质生活还不够好。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其后果是,我们的军队里出现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表现在哪里呢?它表现在,我们每年都要接收文化程度更高、物质需求更高的补充兵员,而军队中的物质文化条件却未相应地改善。有各级首长文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也有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军队中所谓的“集体闹事事件”¹⁶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这是士兵、红军战士表示自身不满的一种形式。

当然,这也是目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攻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军营生活单调,我们的伙食不好,我们的一部分指挥员素质不高、文化水平不高。我了解过1927年10月1日至1928年5月1日期间发生的“集体闹事事件”,并分析了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其中的65.5%是因为军营生活单调、伙食不好以及某些首长不善于真诚地对待红军战士而发生的。在这65.5%当中:因为对伙食不满的占23.5%,因为首长工作中有问题的占17.9%,因为对军营生活不满的占24.1%。同志们,还要注意到,在这些“集体闹事事件”中带头闹事的往往是一些工人、共青团员和党员,也就是一些极其活跃的人,这些人不能容忍军营中种种物质上的缺欠并要求指挥员给予一定的关注,他们还提出,既然你要求我遵守军队的法规,你自己也要遵守,要作出表率。如果指挥员错误地即不按条令下达命令,比如说,如果指挥员在午饭休息时间不让士兵吃饭和休息,而是让他去马厩给马匹洗澡,士兵就会提出抗议。产生所有这些物质欠缺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开支,用于对士兵以及干部进行一定程度的军事训练的日常军事开支,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一切也直接影响到政治工作的物质保障。

请允许我在这里简单谈谈我们的预算即工农红军政治部的预算第49项。我们已经3年都没有增加这部分预算了。今年,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大幅增加这部分预算。该这么做了。现在我们连这部分预算也削减了。同志们,你

们要知道,军队不仅接受国家供给,不仅准备打仗,而且军队现在已经对国家,尤其是对农村做出很大贡献。最近3年,我们已经给农村输送了65 000名训练有素的、有文化的工作人员(阅览室管理员,合作社工作人员等等)。我们的红军战士是农村积极分子中相当重要的核心,而且往往担任农村政权的领导。最近3年,我们从军队输送出7 600名共产党员和87 000名共青团员。我们给国家培养出55万名有文化的工农青年,而入伍时他们都不识字。我们正进行大量的政治文化工作。大家都明白,由于减少我们这部分军事工作的预算,这项十分艰巨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工作将会受到打击。

我之所以对今年的预算产生疑问,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已经面临迟早要缩短服役期的问题。我们的红军战士,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红军中的服役期比许多国家的军人都长。法国的军人服役期是一年,意大利是一年半,波兰是一年半,芬兰是一年,等等。近几年我们就得实际地提出缩短服役期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服役期长,也是因为我们已经可以把服役期缩短,而且还因为,从普及对青年人的军事训练的角度看,缩短服役期对我们有利。

从军事预算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日常军事开支的增加。既然预见到这一点,我们今年就不应当削减已经确定的军事预算。

当然,中央全会不是预算委员会,不可能去搞具体的、“部门的”数字。我的目的是把军事预算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

尽管全会不是预算委员会,但毕竟有一次全会履行过预算委员会的职责。1925年1月的中央全会就给军事预算增加了500万¹⁶⁴,因为全会认为应该增加。我请求让我们进入将要根据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并建议政治局就国防和军事预算问题下达明确的指示。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个对军队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国防是党的政治大业,所以军队同党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一些发言者在谈到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的政治部分时说得非常对。一些同志认为,决议中关于种种倾向的那几条的措辞应该再强硬一些,再明确一些,我同意他们的观点。

我提出这个看法不仅是由于我仍然认为,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我这样做也是因为,经验和我对我军党组织的观察告诉我,在这方面要有一条坚定、明确和清晰的路线,才能正确地从思想上武装所有党员,尤其是在红军和海军中工作的那部分党员。我这里有一些决议,它们可以表明,并非总是一切都清楚、正确。这往往是因为一些同志不是总能搞清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例如,我这里有一份军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的决议,那里面首先指

出,是这么说的,要痛击被抛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接着又补充道,右的倾向“也很危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这里还有我们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决议,例如,有的写道:“要打击右的倾向,同时也不能削弱和减少同左的危险的斗争”。够了。这也是不对的。这些例子说明,应当集中一切力量,继续把右倾和同右倾的思想斗争讲清楚。

请允许我再举两个例子,它们表明,富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借我们取得各项成就之机向军队发动的进攻正在渗入许多党组织内部。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在卫戍部队党的会议(在萨马拉)上的一段发言:

“我们对农业的落后负有责任,我们对农业很少关注。农民感到不满意,因为革命没有给农业带来任何好处。把小农户变成大农户是不可能的,建立集体农庄也是白费力气,它们是搞不起来的。用小舟是造不成大船的,想造也造不成。”

再给大家读一段发言:

“我们要让我们这里没有贫农,要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富人。但愿贫农成为中农,中农达到富农的水平。(笑声)说我们将失去投票权,这是一派胡言。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不会失去投票权,富起来吧,同志们!”

喊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布勃诺夫:这些都是前不久在讨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问题时说的。

我不能说我们记下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但这样的情绪——动摇、糊涂、怀疑,数不胜数。同志们,这必然再一次使我们去关注右的倾向。我们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火力集中在这个方向。

主席:现在请苏霍姆林同志发言。

苏霍姆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指出,分析控制数字时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划分,即对阶级关系的技术经济划分、经济统计划分和社会政治划分,这是正确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对我们的控制数字以及根据控制数字制定的计划和必要措施进行了社会政治分析,但他对阶级关系的状况阐述得不够清楚和明确,没有对右的倾向作适当的说明,没有指出右倾的突出特点,也就是使普通党员能够确定右的倾向并同它进行坚决斗争的那些特点。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指出了右倾的危险,但我觉得他低估了这个危险。他指出必须同右倾和所谓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作斗争,这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在对付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方面,党员群众和党已经武装得很充分了,而在对待右倾的问题上,广大党员和党还没有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布勃诺夫

同志在这里读的那些材料,依我看,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说明。所以,我完全同意一些同志的观点,即现阶段必须把思想斗争的矛头指向右倾和调和主义。我不能再多说了,我只想说,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同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观点,他指出,有必要把提纲写得更明确一些。至于技术经济划分,我应该说,如果在进行这种划分时控制数字和计划尚未搞出来,就很难对控制数字进行技术经济分析。

应该说我们的计划的制订过程。我们的计划和控制数字往往要搞很长时间。这使得托拉斯和企业在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准备工作难以进行。今年劳动国防委员会作了一些调整,不再要求我们制订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的计划,只要求制定控制数字,这加快了制定控制数字的速度。但是,如果考虑到必须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与审议我们的控制数字的话,那么这种办法,这种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广大工人群众甚至专业机构的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使每个企业、每个托拉斯每年在制定控制数字之前制订合理化和改造计划成为一项制度,以便根据这个计划来制定控制数字和技术经济计划。在制定我们的控制数字——无论是年度控制数字还是将来的控制数字(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控制数字制定得太仓促,因此它们往往毫无意义,而且,尽管如此仓促,但在经济年度开始前还是搞不出来。劳动国防委员会确定的预先规定最低数字的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制度应当加强。控制数字只有在搞清楚收成之后才可以制定。合理化计划可以从1月份开始制订,那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我们的这些重大问题并为制定控制数字打下基础,就会保证广大群众和工会能够参与研究问题。我们的控制数字是根据指令性限额制定的。制定合理化计划应该没有限额,但要规定各项措施的顺序。福特公司是怎么制定计划的呢?福特公司在同我们就汽车租赁问题进行谈判时向我们提出了哪些条件呢?他们首先要求确定汽车生产数量,声称如果我们不答应一年生产10万辆汽车,他们就不能保证成本,而成本应当是最重要的。降低成本是我们工业的核心,我们所有的措施都必须围绕它来实行。降低成本应该是投资的主要来源。每个工厂在制定合理化计划时都应该依据三条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工人的生产环境。只有在这些计划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控制数字,合理投放资金。同志们,如果从保障工业化的合理速度的角度来谈我们的控制数字,那么我认为,尽管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毫不掩饰地指出了工业的薄弱环节——说起来让人十分担忧——生铁产量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79%,而与此同时整个工业的发

展远远超过了战前水平,但我觉得,有些同志对这一情况估计不足。虽然米柳亭同志完全正确地确定了农业的方针,但我认为,就连他对工业问题的态度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试图利用我们在工业方面无疑已取得的成就来淡化煤和钢铁的危机。我觉得,布勃诺夫同志拿我们的生产成就同国外的成就相比也是在淡化钢铁的危机状况。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将来有多少钢铁也关系到国家的防御。

我认为,古比雪夫同志以及李可夫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对此作了出色的分析,但拟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与分析不一致。从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报告的数据看,1928—1929 年度的生铁产量将达到战前水平的 92.3%,而生铁的供应水平将比上一年度下降,从 95.4% 降至 75.1%,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促使我们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而不是只做 5—6 年的打算。我觉得需要研究一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拟订的新的基本建设工程规划。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念叨无谓的牺牲”——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我认为,如果不指出这种不一致就会对工业化不利。

谈谈生铁短缺、新工厂和建造炼铁炉的问题。丘巴尔同志谈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厂的情况。昨天的《工商报》¹⁶⁵用了整整一版来赞扬这件事,那些极力主张这个厂今年开工的同志写道,之所以要开工,是因为建新工厂一事我们已经拖了六七年。六七年来我们一无所获,而今天又被生铁短缺所困扰。估计该厂在满负荷的情况下的生产能力为 65.6 万吨¹⁶⁶,总开支为 12 400 万卢布。按照最初计划,今年南方冶金托拉斯的卡季耶夫斯克厂要投产,该厂有两座炼铁炉;有一座炼铁炉的“C”厂要投产;“普罗维丹斯”厂要恢复生产;现在不仅这些工厂已被从今年的计划项目中取消,而且捷尔任斯基厂的 7 号炉和马里乌波尔厂的 3 号炉也被取消。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两座炼铁炉——7 号炉和 3 号炉总开支预计为 1 000 万卢布,今年需要 300 万卢布,但我们得到的生铁可能将不是 65.6 万吨,而是 80 万吨,而且可能不是在 1934—1935 年度,而是在 1930—1931 年度。我认为,不仅要从某个边疆区或某个加盟共和国的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且要从保证全联盟工业化速度的角度来看问题。现在生铁已经不只是一个薄弱环节了,它逐渐从数量问题变为一个真正的难题,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某些措施,而不把希望寄托在今后六七年。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不知道将来情况会怎么样;也许这六七年中我们会有喘息之机,也许一切都会很好,但是,只要生铁的状况依然如此,某些地方就还得压缩机器制造业。

什维尔尼克:苏霍姆林!你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

苏霍姆林:对不起,是谁缺乏信心?我觉得您更缺乏信心。我拥护积极的工

业政策。我不赞成总是一味索取的工业化,我主张降低成本。

柯秀尔:在乌克兰、乌拉尔都要降低吗?

苏霍姆林:对,在乌克兰、乌拉尔都要降低。1926—1927年度我们把成本降低了6.12%¹⁶⁷,1927—1928年度要降低7%。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让我们降低7.3%或7.7%。我们认为这一点不仅应当做到,而且必须做到,我们将坚决实行积极的工业政策,以保证工业化的速度。我不反对建新工厂,但我赞成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中开始摆脱生铁缺乏状况。我们应该搞清楚实际情况。我们不妨来看看《经济研究所通报》第5、6、7期的数据,如果把1913年世界生铁产量算作100的话,我们就会算出,1927年这一产量为106.8,1928年3月为113.9,而我们的产量只是战前水平的79。要是大家看看钢铁价格,那么数字就更惊人了。如果把苏联的钢铁价格算作100的话,我们就能算出,英国的钢铁价格1913年为74,1927年10月1日为46,1928年6月1日为47。德国的同期价格分别为78¹⁶⁸、48和49,法国分别为73、51和52,美国分别为79、54和55,而我们的钢铁成本比战前水平高出1倍。所以我认为,需要对这方面的控制数字加以修改,以保证尽快摆脱钢铁短缺状况并降低钢铁成本。不能削减钢铁工业最迫切的、最必要的需求。我还可以列举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的卢甘斯克厂、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和“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造船厂”的一些情况。去年我和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一起去过“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造船厂”,当时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认为必须让这个厂尽快开工。该厂已经开工了,可是现在又传说这个最新的工厂要关闭。我们知道其他许多工厂也有同样的情况。我想反驳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即乌克兰捞走了所有的钱。乌克兰正在修建第聂伯河水电站,因此所有的钱都被投到建设中。下面请允许我给大家说一些数据:根据五年计划,水电站工程预计需要18亿卢布,其中拨给乌克兰4.85亿卢布,即占26.8%。这包括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用款。是的,现在这个数字有所增加。我知道当时计算的造价为1.6亿卢布。现在计算出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造价为2亿卢布,但整个水电站工程用款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有些同志认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建设必然要拖延几年,从而造成资金呆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建设过程不会比开掘新矿井准备过程长。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发电量相当于1亿普特煤,如果要准备开掘一个煤产量为1亿普特的新矿井的话,同样需要花费2亿卢布。要是再看看将要修建的与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相关的那些工厂,看看乌克兰和全联盟的所有工厂和工程,我就要说,我们的比重从1926—1927年度的31%降至1927—1928年度的

28.8%，又降至1928—1929年度的27.8%，而到五年计划末期则会降至25%。所以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

我认为有必要再列举一些数据，看看那些能够促使工业化尽快实现的地区投入资金额有多大。请看全联盟工业投资的数据：俄罗斯联邦1928—1929年度的投资比1926—1927年度增加72.5%，乌克兰的增幅为40%，当时俄罗斯的生产增长了14%，乌克兰增长21.5%。我还可以列举各加盟共和国工业的一些数据，它们更有说服力。当然，尽管投资这么多，我们的生铁产量也只能达到战前水平的79%。

我还要谈一个在我看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降低成本与生产合理化的问题。降低成本问题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它要求我们实行积极的工业政策。我们应该极为坚决地采取这方面的措施。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注重生产的合理化。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指出，要让我们的学术力量参与解决降低成本的问题，我认为他说得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报告了为各研究所和工业科研工作拨款6800万卢布的情况。各加盟共和国的在全联盟有影响的研究所，煤炭研究所也好，钢铁研究所也好，都应该适用这种拨款制度或由预算拨款，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正常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想，我们还应该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们乌共(布)中央全会上，一些工厂的负责人提出可以增加生铁产量，前提是我们要搞好对矿石和焦炭质量的合乎规范的监督。的确，在矿石储备只够用一两天的情况下，这是很难搞好的。采矿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投资。但我认为，监督工作当然是可以搞好的，不过这项工作不能再由各消费部门来做，要把它交给一个可以对矿石、煤炭乃至钢铁进行监督的科学机构来做，这样一来，任何相互推诿的现象都不会再出现，我们也可以增加生铁产量，并提高它的质量。

现在谈谈另一个工业部门，在报告和控制数字里都没有对该部门的情况加以说明，但我认为，这个部门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手工业部门。我手头没有全联盟的数据，我引用的是乌克兰的数据。我们乌克兰的手工业有74万名从业者——这几乎与产业工人一样多。此外手工业的产值达到64360万卢布。可是存在这样一种状况：手工业者数量的增加快于生产的增长。如果拿乌克兰整个手工业的数字来看，情况是这样的，去年生产增长了10%，而手工业者的数量增加了12%。今年我们从理论上稍微改变了这一状况：打算使生产增长11.2%，手工业者增加9.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如果说1910年单是农村的手工业者就带有20000名学徒的话，那么1926年农

村和城市的手工业学徒总共只有16 000名。如果说革命前手工业艺徒学校很少的话,那么现在这样的学校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去过一些有手工业生产的地区,例如克罗列韦茨,那里有3 000名手工织布者,领导他们的是一名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请来的织布师傅,而且这个织布师傅已经65岁了。谁来培养手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和手工业的技术领导者呢?在哪里培养?不能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丢掉手工业,丢掉64 360万卢布和74万个劳动力,要把这个问题同消除年轻人中的失业现象的问题联系起来。所以我想,对这个方面也应当加以关注。

我想再谈谈补充劳动力问题,还有柯秀尔同志在这里谈到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前几次全会就顿巴斯问题——供水、住房等问题所作的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的补充工业劳动力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例如,一个有24俄亩土地、4匹马和数头母牛的人也当上了工人。对于在工厂贯彻执行我们的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巩固劳动纪律来说,这名工人当然非常不合适。

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有两条原则不能改变:保持一种能够“赶超”的工业化速度,按社会主义方式,通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就确定的合作社计划及其高级形式——集体化对农业进行改造。

主席:下面本应是卡明斯基同志发言,现在改由柳比莫夫同志发言。

喊声:已经3点了。休息,休息!

主席:我同意。谁赞成现在宣布休息?多数人。谁赞成继续开会?少数人。那就宣布休息。

晚上首先由柳比莫夫同志发言,第二个发言的是斯大林同志。我宣布,散会。

第六次会议

11月19日晚间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现在开始。现在请柳比莫夫同志发言。

柳比莫夫:我首先要谈谈与商业工作和合作社工作相关的一些问题,况且全会决议草案中又没有充分地阐述商业机构面临的主要任务。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在他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些问题。然而,我们现在在经济和建设中所遭遇的困难已经暴露在广大群众面前,这些困难主要是通过合作社暴露出来的。广大群众,狭义地说是消费群众认为我们在建设方面的不足之处就是商品缺乏、商品质量让人不满意、商品种类让人不满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把这些不足之处归咎于消费合作社的活动本身,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搞明白现在缺乏商品、商品种类让人不够满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某一时期商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越大,合作社所提供商品的短缺量越大,对合作社的抱怨就越多,抱怨声就越大。

下面我摘引最近两三天的报纸上的一些话,给大家读一下报纸上常见的一些标题:《合作社的工作令人极为不满》、《国营商业零售网点严重不足》、《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不能令人满意》。所有主要报纸上都可看到大字标题:《为什么商店里的长队已经让人习以为常》。还有表示愿望的:《多一些合作社的店铺和售货亭》、《合作社挤走了私营者,却没有取代他》等等。

И. 柯秀尔:说得对。(笑声)

柯秀尔:那您就回答说:“致合作社的敬礼。”

柳比莫夫:最近两三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有这样的标题。

丘巴尔:店铺我们倒是有的,可是店铺里没有商品。

柳比莫夫:合作社是商品运销的基本环节,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对供应状况、对商业机构的状况及其工作负有责任。所有那些缺点和对合作社的那些抱怨,可以部分归咎于合作社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归咎于合作社机构的工作不明

确。但是不能把供应不足,甚至排队全都归咎于合作社。你们大家都清楚,而且也有必要强调一下,商品短缺既是指工业商品短缺,也是指农产品短缺。这不是合作社的错,而是因为按计划拨给合作社的商品储备不足,投放市场的商品不足。但是,往往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就连一些主要的报纸也有这样的看法:所有问题——商品总是短缺,合作社又未及时提供商品,这一切都是合作社的错。在第一个问题即商品短缺问题上,应该给合作社洗刷罪名。

克服合作社工作中的缺点,正确地安排合作社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经济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最好从我们的基本任务——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同时发展日用品生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合作社的工作,看看消费合作社有什么特点。在这方面,要是安排正确得当的话,合作社可以做许多事情。从工业发展和工业方针的角度来看,消费合作社组织和领导的大多是食品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消费合作社自有资金的投入。我们有这样一些数字:1925—1926年度合作社投入工业建设的自有资金为750万卢布,现在合作社投入这项事业的自有资金是565万卢布。如果对合作社工业的发展给予相应的、哪怕是不大的支持的话,这一工业就能大大地向前迈进,就能以比现在更快的速度迅速发展。但是合作社工业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且许多地方单位都有自己的工业品贸易机构,有自己的种种机构,它们只关心预算的利润提成收入,几乎根本不关心合作社工业,也不给它足够的支持。

关于为国家、为国家工业化腾出资金即腾出合作社周转资金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26—1927年度合作社的自有资金在周转额中占36.5%,借入资金占63.5%,现在合作社的自有资金在周转额中已占63%,而借入资金占37%。随着合作社的活动不断发展和扩大,合作社的自有资金也在通过商业积累和股本聚集的方式逐渐增加。合作社正在腾出过去用于其商业周转的借入资金,即银行贷款和工业贷款,腾出这些资金来完成其他任务、实现其他目标,包括直接把资金投入工业渠道,同时逐渐减少合作社使用的工业贷款。现在整个合作社系统的自有资金为7.6亿卢布,其中作为中央机构的中央联社¹⁶⁹有近7000万卢布。此外,还有必要指出,积累的主要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靠利润产生的商业积累的比例逐年缩小,靠股金聚集产生的积累的比例不断加大。1926—1927年度得到的商业利润为1.3亿卢布,聚集的股金为5000万卢布,1927—1928年度得到的商业利润则为8000万卢布,而聚集的股金为1亿多卢布。

柯秀尔:成反比。

柳比莫夫:是的,成反比。不过在财政方面,就征税来看,合作社现在的地位同私营者一样。

斯克雷普尼克:不对。

柳比莫夫:只不过对合作社和私人资本的方针有所不同。

我来说一些准确的数据,也就是副财政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同志在预算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列举的数据:城市中对合作社征收的工业税是其周转额的4.1%,对私人资本周转额的征税则为5.2%。实际上相差1.1%——前者是4.1%,后者是5.2%。然而大家都知道,私人资本可以通过加价和加成来获取利润,其卖价比合作社高出10%—20%,甚至是30%,平均高出15%—20%。所以说,我们的税收对合作社来说太重了,其他任何国家都绝没有如此沉重的税负。

斯克雷普尼克: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吗?

柳比莫夫: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像我们这么高的商业税,包括对合作社征收的商业税,也没有像我们的合作社这么低的工业品加价。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大致计算,如果某种商品的价值是1卢布,那么合作社的商业开支即用于机构的开支为19.2%,或者19.2戈比,而英国的对工业品加价高达40%—45%。所以,当一个商业部门,好像是罗戈日—西蒙诺沃区的,要求合作社把面包、牛奶和其他食品分送到户时,我们只能说,国外的加价与我们完全不同,技术基础也不一样。人家的一个合作社一年的周转额为7000万卢布,有300辆汽车和300匹马,而我们的一个合作社只有3辆汽车和5匹马。人家的整个技术基础完全不同,条件也不一样。还有,同志们,当然可以组建运输车队并尝试分送货物,但往往是没有东西可送:今天有牛奶,而明天就没有了,于是这个机构就会无事可做。所有这些条件不仅取决于合作社,而且也取决于我们全部商品储备,取决于所有现有的、可以提供给消费者的全部商品。

同志们,到今年12月1日为止,我们合作社系统已有2250万人入股者,一年后将达到2900万名,但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合作社工作人员在说,不能如此广泛地提合作化问题,因为现在并非每一个消费者都是合作社员,这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往往会使通过消费合作社消费商品受到某种限制。现在,在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合作社社员、每一个人都渴望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限制商品。我们无法满足广大入股者的大量需求,而且零售网点严重不足,服务人员数量太少,使得工作实在难以进行。最近几周,莫斯科的商店门前排起两条

队。一队人等着领取10磅面粉,旁边的另外一队人在登记加入合作社,因为面粉只凭合作社社员证发放,即只发给缴纳一定数额股金的人。

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要为人股者服务,也要为广大未入股的消费者服务。建立我们的财政基础的任务现在还在于:通过增加股金积累使明年聚集的股金不再是1亿卢布¹⁷⁰,而是1.5亿卢布,通过股金积累建立合作社自己的基金,此外,还要设法吸收消费者即未入股者参加这项工作,使他们把钱用于建立合作社的商业技术基础。某些机构已根据这一方针提出了一些方案,哈尔科夫还进行过规定两种价格——为人股者和未入股者分别规定价格的试验。

有人喊:我们已经把它取消了,因为产生了不良后果。

柳比莫夫:对这一试验研究得还不够,我们还未确切地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但我们的大量资金正在被收走,也就是工业税,它现在一下子增加了大约6500万卢布,这种做法……

斯克雷普尼克:他是在发牢骚。

柳比莫夫:这使得我们的商业利润的全部实际效益几乎为零。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你们这些地方工作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想让合作社正确地、合理地开展工作,让排队现象不再存在,让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更加周到,让服务更加全面,让工作安排得更加明确,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我们的工作建立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增加店铺的数量,增加服务人员的数量,因为服务人员的负担太重了,没有一个合作社组织不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各级组织、我们的中央组织现在提出的关于建立自有股本的所有措施,例如规定按不同群体居民中的收入或者工资实行级差股,农村大致分为3—4个等级,工人也大致这样划分。而服务问题……

什维尔尼克:是累进股。

柳比莫夫:改进我们的工作为主要问题。当我们采取这些措施后,当合作社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的哪怕是能把所拥有的商品安排好时,就可以把服务仍然不好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合作社,而现在听到的大量抱怨,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即商品短缺引起的;当然,合作社本身的大量缺点也还没有克服。

鉴于在为消费者提供粮食方面出现的危机和困难,我们现在尤其要关注修建、建设粮食工厂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合作社的资金根本不够。地方组织应该帮助我们的消费组织。

同志们,我还想就粮食收购工作说几句。我很想在此向地方工作人员提出

一个工作方法和组织方法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召开的一次全会上曾作出一个规定,根据这个规定,消费合作社要为全苏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公司¹⁷¹收购所有粮食。据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工作人员报告,这种形式不但没有给工作带来方便,没有为更好地工作创造条件,而且,正如我们的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这种形式给工作造成很大“障碍”,造成领导方面、结算职能方面的一些不必要的环节,除此之外,它也没有消除过去谈论过的、也是一些人提出要建立联合组织的理由的那种竞争。我觉得应当考虑到这个经验。

在粮食收购工作方面还要注意一种情况,那就是到目前为止,消费合作社在粮食收购工作中仍然遇到地方上的各种阻力。但是尽管如此,消费合作社的工作速度还是没有放慢。去年的速度提高了26.5%的话,今年大约可提高28%。总之,这是一个组织问题,解决这个组织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可能顺利开展粮食收购运动。这个问题我们无疑要提出来。

谈谈农业。我有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的许多地方组织似乎不太了解前两次全会确定的我们对恢复农业和谷物业的方针。而且从决议中可以看出,右倾的特征之一就是轻视我们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措施。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人认为应当只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却不大强调并且轻视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相应措施。我在莫斯科一个工人支部的会上听过一位比较老的党务工作者的报告,他在讲到恢复农业、谷物业时,只字未提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当全场150—170位听众向他提问时,我这个听众只好出面纠正这种做法。

我在一个乡里还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于相关机构规定种子只分给劳动集体,于是地方机构便给劳动集体分了大约25普特亚麻种子,还有75普特因未正确理解我们的措施和我们对个体经济的态度而没有分下去。

斯克雷普尼克:讲讲中央联社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柳比莫夫:看来在这方面需要经常加以纠正。

我觉得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提纲中似乎也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的农村干部、我们的积极分子还不太善于领会我们的整个方针,不太善于在实行农业措施和在发展农业方面进行领导。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应当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安排。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弗拉基米尔斯斯基已经在这里谈过了,现在,可以这么说,斯克雷普尼克同志也让我谈这个问题。同志们,既然提出了右倾问题,那么我就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合作社中,包括在消费合作社中,无疑存在着、也许比其他地方更多地存在着助长脱离正确立场的倾向的因素。要知道,我们总是搞广

泛的市场,搞纯消费品市场,消费环境的这种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要么可能引起人们的批评,要么可能造成对我们正在实行的国家工业化即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的不够确切的评价。我必须指出,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也特别让人怀疑。我刚从国外出差(四五天)回来不久,不可能直接积极参与同右倾有关的这场运动。(笑声)但是,现在党员中存在的某种怯懦情绪引起了我的注意。例如,要是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上,那么,恐怕就不能大谈个体经济了。有人害怕。(笑声)要是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寄托在重工业上,那就谁都不敢提缺少商品、需要大量日用商品了,因为这会被视为轻视工业化。

斯克雷普尼克:在你们的中央联社全体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柳比莫夫:在我们中央联社理事会最近一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提出了工业品供应状况的问题。一位同志在发言中大致作了如下表示:我们无疑要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我们正在实行这一方针,但我们作为消费者还是应当指出,我们的日用消费品现在还不够多。就连这样一番话都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右倾,为此,这位同志不仅要受到怀疑,而且还要对他作出某种组织结论。

一些同志说,提纲中有必要对右倾问题给出一个更加明确、更加清楚的提法,应当说,我个人赞同他们的意见。无论从右倾这一危险来说,还是从目前各级党组织的反右倾斗争的规模来说,都需要这样做。

主席:下面请斯大林同志发言。

斯大林¹⁷²:同志们,我的发言会超过规定的时间。

喊声:不要紧,说吧,只要讲话嗓门大一些就行。

斯大林:同志们,我要讲的是政治局提纲中所提出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关于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保证其尽可能快的速度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的问题。其次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国内政策方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提高农业,改造农业的问题。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目前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的问题。

一、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

关键。这个原理是我们提纲的出发点。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是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最近三年来，在改造时期中，我们的控制数字的特点是：这些数字的制定和实现都是很紧的。无论是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或者是翻一翻我们的预算草案，或者是和我们党内的同志（无论是在党组织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领导我们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和合作社建设的同志）谈一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当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迫使我们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分析一下迫使我们高速度发展工业的这些外部和内部的条件。

外部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除了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以外，我们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你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技术不仅是在前进，而且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超过了旧式的工业技术。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

术,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这种落后是历来就有的,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种落后,无论是在从前,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或是在后来,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人们都觉得是一种祸害。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旧的阶级,无论是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而且这些阶级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并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

如果以为我国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取得了政权并担负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对一切负责而且应当对一切负责,既对好的负责也对坏的负责。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不断地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而我们已经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或突如其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早在1917年9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在他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着重标记是我加的。——斯大林)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第14卷第2册第213页)¹⁷³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问题。

这段话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写的,当时

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政权,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还没有广泛发展的包括千百万农民的合作社网,还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一些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大体这样变动一下:“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政治方面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运输业、信用系统等等,利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以便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像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像德国那样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工业,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们。而那时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了。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德国的,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还远没有赶上德国。

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加入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作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

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像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

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么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当然，改造分散的零星的农业比起改造联合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来，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工作。但是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把它解决。而解决这个任务非在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不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回到资本主义去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第17卷第427—428页）¹⁷⁴

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着重标记是我加的。——斯大林），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

这个演说是列宁在1920年12月，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所谓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时发表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说：这段话里所说的原理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试问，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当然是事实。我们现在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拥有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的集体农庄,我们拥有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我们拥有稠密的发达的合作社网,我们拥有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我们现在采用预购的方法作为结合的新形式,我们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杠杆来逐步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

列宁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1921年3—4月间)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纲要中也说过同样的但是更加尖锐的话:

“如果经过10—20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¹⁷⁵

又说:

“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选集》第4卷第374页)¹⁷⁶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对于“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理解的。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农民表示爱抚,并把这看作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方针,因为靠爱抚是做不出大事来的;问题在于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因为这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高速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

迫使我们要高速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迫使我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定得很紧的外部 and 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问,提纲中什么地方,提纲中哪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呢?

有人喊:是呀,什么地方谈到了这一点呢?

斯大林:提纲中规定的1928—1929年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就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把提纲叫作控制数字提纲。同志们,好像是这样的吧?

有人喊:是的。

斯大林:那么,在这个提纲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1928—1929年度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16.5亿卢布。换句话说,我们本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度多3.3亿卢布。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保持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还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工业投资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说,使工业中的基本建设项目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了。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的主要点就在这里。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们只是对控制数字提纲的细节乱加批评,而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看见。

二、谷物问题

我在上面所讲的是提纲中的第一个大问题——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大问题——谷物问题。提纲的特点是,它着重地提到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问题。提纲的这种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早在七月全会¹⁷⁷上就已经说过,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过分落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弱点。有人一讲到我们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就抱怨,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农业一向落后于工业,并且将来还会落后于工业。在我国工业高度集中而农业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联合的工业当然要比分散的农业发展得快。由此也就产生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此,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还不能作为提出谷物问题的理由。只有当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变为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时候,才出现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业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区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务不在于把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谷物业的发展水平(这样会使一切混乱起来,会使发展变成倒退),而在于使谷物业的发展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把谷物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迅速前进的水平。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谷物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乡村之间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同志们,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谷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谷物业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或者甚至“退化”了

呢？弗鲁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今天已经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了。他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他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在报刊上谈论退化，但是我们在党内不应当掩盖，这种落后等于退化。”弗鲁姆金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我们政治局委员完全不同意这个论断，而政治局的提纲和这种对谷物业状况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退化是什么？它在农业中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显然，它应当表现在农业的后退、下降，表现在从新的经营方式倒退到旧的中世纪的经营方式。它应当表现在农民比如说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熟荒耕作制，由使用铁犁和机器改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选种子和纯种种子改为使用非精选种子和不良种子，由现代的农业文化降为低级的农业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吗？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户农民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种子改为使用纯种种子，由使用木犁改为使用铁犁和机器，由低级的农业文化转上高级的农业文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这算什么退化呢？

弗鲁姆金总是喜欢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员的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可能，他这次将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只字，以便证明布哈林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布哈林远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鲁姆金做的是什么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这一抽象问题说成农业退化的事实了。这就是他所谓对谷物业状况的分析！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农业退化了，那它还好在哪儿！这样的政权应该赶走，不应该支持。

如果这个政权真的使农业退化了，那么工人们早就把它赶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专家向我们叫嚷退化，他们甚至睡觉都梦见农业退化。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向我们叫嚷过退化。我没有料到弗鲁姆金也会走上这条可疑的道路。

弗鲁姆金关于退化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是今年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小了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灾，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今夏又遭了旱灾。假如没有这些完全能左右农业的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谷物播种面积至少要比去年多100万俄亩。其次，他的断言的

根据是我们今年的谷物总产量仅仅比去年稍微多一点(多7000万普特),而小麦和黑麦比去年少了2亿普特左右。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切情况呢?这也是因为遭了旱灾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灾。如果没有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比去年多3亿普特左右。怎么能把旱灾、霜灾等等这样一些对某些地区的收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不谈呢?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扩大播种面积7%,提高单位面积产量3%,增加谷物总产量约10%。毫无疑问,我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灾或旱灾,发生局部的歉收;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使谷物总产量比我们计划的数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总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是不是说农业“正在退化”,而这种“退化”应归咎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刺激,我们“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呢?

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过这种错误,硬说“下雨”对农业没有作用。李可夫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下驳斥了他。现在弗鲁姆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对农业起作用的气候条件,力图把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

要提高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呢?必须采取的途径或方法有三个:(一)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二)继续发展集体农庄;(三)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关于这些,早在七月全会¹⁷⁸的决议中就已经说过了。提纲重申了七月全会上说过的东西,但是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提出了这方面一定的投资数字。弗鲁姆金在这里又找到借口来吹毛求疵了。他认为,既然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么这无非是表明他的观点胜利了。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当然,如果从某些农业形式的比重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个体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乎多五倍。但是,如果从经济类型,从哪一种经济形式最接近我们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一位,因为和个体农民经济相比较起来,它们是农业的高级类型。这两种看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使农业首先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在实际上提高呢?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使他们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题。应当抛弃关于一般农业的泛论和空谈,而最终转到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制定提高谷物业的实际措施。已经到了从言论转为行动

并最终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即研究怎样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怎样改进并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怎样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良种牲畜方面帮助农民,怎样通过农具租赁站用机器和其他农具帮助农民,怎样扩大并改进预购的工作和一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

有人喊[丘巴尔]:这是实际主义。

斯大林:这种实际主义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有把解决谷物问题这一极重要的工作湮没在关于一般农业的空谈中的危险。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我们的主要产粮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作一些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具体报告。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听到安德烈耶夫同志关于解决北高加索谷物问题的途径的报告。我想,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听取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地区、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类似的报告。为了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谷物问题方面来,并最终使我们党的干部转上具体地提出和谷物问题有关的问题的轨道,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必须使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其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把他们搅在一起,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现在总该是消灭这些所谓错误的时候了。例如拿个别税的问题来说吧。我们政治局的决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个别税的征收面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2%—3%¹⁷⁹,就是说,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征收。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有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10%或12%,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现在还不到结束这种罪行的时候吗!可是我们亲爱的“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诸如此类的恶劣现象的具体办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议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改为“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富农”或“最上层的一部分富农”。好像这些并不是一个意思!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5%。已经证实:按照法律应该缴纳个别税的农户只占2%—3%,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已经证实:在实践中许多地区违反了这项法律。而“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这些现象的具体办法,却在字眼上进行无谓的批评,不愿意了解这样做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十足的书呆子!

柯秀尔:有人提议向所有的富农征收个别税。

斯大林:这么说来,就应当要求废除只向2%—3%的农户征收个别税的法律了。可是,我倒没有听到有谁要求废除关于个别税的法律。有人说,随意扩大个别税征收面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地方预算。但是补充地方预算是不能用违反法律、违反党的指示的方法的。我们党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苏维埃政权还存

在,它还没有被消灭。如果地方预算的经费不够,就应该提出地方预算的问题,而不应该违反法律,不应该取消党的指示。

再其次,必须继续加强对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刺激。毫无疑问,粮价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实际执行,用预购的方式给予贫农中农农户的实际帮助等等,将大大地增进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弗鲁姆金认为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这种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这当然是胡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费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别是能够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具有生产性的商品(机器、肥料等等)。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们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还远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不会很快消除。我们党内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现象。可惜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第一,是和工农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长有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虽然逐年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业改造时期有联系的。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不这样做,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业改造,尤其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钱投入新企业的建设,城市和新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而这些新企业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不难了解,这种情况是不会有有助于消除商品缺乏现象的。这是不是说,在商品缺乏的现象面前我们只好束手无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具体办法来缓和、减少商品缺乏的现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立即应当做到的。为此必须竭力加强那些和提高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沃罗涅什选种筒制造厂以及其他等等)。其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加强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绒、玻璃、钉子等等)有关的工业部门。最后,为此可以从国外多进口一些稀缺商品(呢绒、化

肥、农业机器等等),而且我们只能以贷款的形式获得这些商品,从一些资料来看,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进口2 000万—3 000万卢布的这类商品,以此来扩大粮食采购。

有人问:这不会使汇率发生变化吗?

斯大林:这绝不会使汇率发生变化。我们正在扩大、将来还要扩大我国的羊毛生产以供应我们的工厂。我们正在扩大、将来还要扩大我国企业的农业机器和化肥的生产。我们照例不会进口那些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和我国有其生产原料的商品。但我们不会拒绝贷款,比如说2 000万—3 000万的贷款,用于购买稀缺成品,前提是有人向我们提供贷款,并且我们自己缺少这些商品的生产原料。

库比亚克说,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来看,本年度用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库比亚克大概没有把我们本年度用预购的方式给农民的约3亿卢布的贷款(比上年度几乎多1亿卢布)计算在内。如果估计到这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能不估计到的),那么可以看出,我们本年度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多。至于新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资金将近18 000万卢布(比上年度多7 500万卢布左右)。

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的方法。不能把这些东西看作仅仅是扩大我们商品粮食资源的手段。它们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的新形式。关于预购的方法我们已经讲得很多,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谁都明白,普遍采用预购的方法有助于把个体农户所做的努力联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固定起来,从而使城乡结合巩固起来。我希望你们注意集体农庄,特别是注意国营农场,把它们看作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促进农业改造的杠杆,是在农民的头脑中引起革命并帮助他们摆脱因循习气、守旧思想的杠杆。拖拉机、大型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队在我们产粮区出现,对于周围的农民经济不会没有作用。用种子、机器、拖拉机帮助周围的农民,无疑会被农民评价为和看作是竭力引导他们走上农业大大提高的康庄大道的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威力的标志。这个情况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现在大概也还估计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解决谷物问题和巩固新的结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解决谷物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现在来谈谈我们提纲中的第三个大问题——关于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问题。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在我国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我们党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就是如此。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这里指的主要是右倾。右倾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使我们的政策迁就“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像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

右倾的趋向主要潜伏在什么地方呢？潜伏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也潜伏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农村下层环节中。

我们党员中间有没有表现右倾的人呢？无疑是有的。李可夫举出反对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的沙图诺夫斯基为例。毫无疑问，沙图诺夫斯基犯了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我还是认为沙图诺夫斯基用来说明右倾特征、右倾面目并不典型。我认为在这方面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同志去坐。（笑声）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1928年6月）以及在这里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他的第二封信（1928年11月）。

现在把这两封信分析一下。我们先看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论点”。

（1）“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这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就连一点结合的影子都不会有了。要知道，从6月（信是在6月写的）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谁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存在并日益巩固。弗鲁姆金同志写这种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吓党，使党向右倾让步。

（2）“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¹⁸⁰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今年春季我们已经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么所有主要产粮区的中农就不会扩大春季

播种面积了。我国春季播种是在几月进行的？

柯秀尔：在4月、5月。

斯大林：而弗鲁姆金同志的信是在6月写的。在我国，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是粮食的主要收购者呢？是国家以及和国家相联系的合作社。很明显，如果中农群众苦于经济上没有前途，如果他们处于和苏维埃政权“破裂”的状态，那他们就不会按照国家这个粮食主要收购者的愿望去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弗鲁姆金同志的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弗鲁姆金同志在这里也竭力想以没有前途这种“惨象”来恐吓党，使党向他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让步。

(3)“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在这里讲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这个口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弃“加紧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¹⁸¹。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弗鲁姆金同志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来否认党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进的一步，而否认这前进的一步就是把党拉向后退。中央七月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结论。全会在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这一决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的表现”¹⁸²。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告诉弗鲁姆金同志，政治局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指的弗鲁姆金同志和他的第一封信。

(4)“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农民。”我们从来就是尽力和尽可能地给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没有加入集体的贫农以最大限度的帮助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新东西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弗鲁姆金同志嘴里说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贫农，实质上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这一党的任务敷衍推诿。弗鲁姆金同志实质上是反对展开从集体农庄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

(5)“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同志不会不知道，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进行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这一工作。弗鲁姆金同志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笔用于这个目的的后备资金，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所应拿出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是用来引起人们的“恐怖”，并以此掩饰自

己不愿意稍微认真地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同志实质上是在这里反对从国营农场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同志的所有这些论点汇集起来,就会得到说明右倾的一个总的概念。

现在来看一看弗鲁姆金同志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第一封信里说中农经济没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则说农业“退化”。第一封信里说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即放松对富农的进攻,而第二封信里则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第一封信里关于工业只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则发挥了少向工业建设投资的“新”理论。但是,这两封信有两点是一致的,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鲁姆金同志在两封信里都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显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关于“退化”论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那些一味叫喊苏维埃政权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专家捏造的。弗鲁姆金同志让那些栖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周围的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吓倒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企图恐吓党,想使党对右倾让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讲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复了。让我们来看看其余两点: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关于富农经济。弗鲁姆金同志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而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纵农村资本主义,给它自由,让它发展。这恰恰是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老口号:“让他做吧,让他走吧”,就是说,不要妨碍资产阶级干它自己的事,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自由行动。这个口号是法国的老自由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束缚资产阶级而不让它发展的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应当从社会主义的口号——“要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见控制数字提纲),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不要束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难道我们想由布尔什维克变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吗?弗鲁姆金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和党的路线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弗鲁姆金:斯大林同志,请把其他几点也读出来。

斯大林:我把这一点全读出来。“我们也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怎么,可敬的弗鲁姆金同志,难道你以为下半句话会使情况变好而不会变坏吗?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要知

道,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这个口号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方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并且把我们力图消灭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和我们当时因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灭的非奴役性的、所谓“进步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但是那时我们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现在,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持的方针是而且不能不是消灭一切剥削方式,其中包括“进步的”剥削方式。你怎么能要我们从正在发展并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向后转,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上去呢?

洛莫夫:我们那时把这个叫作“奴役性的残余”。

斯大林:弗鲁姆金同志,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其次,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要求封建政权不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时候,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给资产阶级政权。当时他们是对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权。因此,如果推论下去,那就应当说:让富农参加政权。因为终究必须了解:剥夺富农的政权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缚富农经济的发展。这些就是读了弗鲁姆金同志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三种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 8.25 亿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给 7.5 亿卢布,而财政人民委员部只同意给 6.5 亿卢布。我们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决定的呢?党中央决定给 8 亿卢布,也就是说,比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整整多 1.5 亿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得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财政人民委员部吝啬,它也不能不吝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弗鲁姆金同志所以坚持只给 6.5 亿卢布,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以新创的“可能”论为根据的,他在他的第二封信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断言:如果我们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 6.5 亿卢布,那就必定会使我们的经济状况恶化。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弗鲁姆金同志反对保持现在工业发展的速度,显然,他不了解降低这个速度才真的会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同志第二封信里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基本建设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论,你们就会看到右倾的面目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右倾,右倾是什么样子吗?读一读弗鲁姆金同志的两封

信,研究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

关于右倾面目的问题就是如此。但是,提纲不仅谈到右倾,还谈到所谓“左”倾。什么是“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真有所谓“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有像我们提纲中所说的反中农倾向,超工业化倾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七月全会早就提出了这一点。我指的是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著名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谈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那些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后退的人(这是右派),也反对那些要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¹⁸³)。很明显,我们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因素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争论的时候,好像将近有6000人投票反对我们的纲领。¹⁸⁴

有人喊:有1万人。

斯大林:我想,如果投票反对的党员有1万,那么因为没有到会而根本没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该有2万了。这就是那些没有退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应当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后来脱离托洛茨基组织回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他们大概也不反对在党员中间散布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托洛茨基主义又有些抬头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你们就会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来说明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存在。

这是很明显的: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自发势力向我们党侵袭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不会没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干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一回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另一回事,这会更困难一些。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¹⁸⁵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右派,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也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作右派,把另一些人叫作“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

那么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第聂伯河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第聂伯河工程”,(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不带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作为极左派不愿意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作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叫作“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叫作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作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

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倾向。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反列宁主义的联盟,真正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不带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不会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¹⁸⁶一部分类似沙图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的本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他们摇摆着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不能把中派主义看作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相对立的。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不带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

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理由的。

有人喊: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

斯大林: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⁸⁷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学理主义者的斗争¹⁸⁸。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

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倾向这个概念的¹⁸⁹。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是一个东西。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不带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我们党内的唯一左派(不带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对党的犯罪行为。

有人问: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

斯大林: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是“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些分子都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党内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的政策。

其次,提纲中说,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最好回忆一下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是从何着手的呢?也许是从组织处理着手的吧?当然不是。我们是从思想斗争着手的。这个斗争从1918年进行到1925年。在1924年,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已经作出决议¹⁹⁰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托洛茨基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可见我们“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为什么我们容许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呢?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和党有分歧,对中央的决议还是服从的,对党还是忠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处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派别,成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央,把自己的派别组织变为新的党并开始号召人们举行反苏维埃游

行以后。我认为我们同右倾作斗争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作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形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该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个结论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员中间有着相反的倾向:同右倾作斗争不从思想斗争着手,而从组织处理着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们指出10个、20个右倾的人吧,我们一转眼就会把他们粉碎,这样就铲除了右倾。同志们,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和危险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绪东漂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必须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说我们排斥任何组织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说,组织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既然右倾分子没有破坏党的决议,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们赶出这些或那些领导组织和领导机关。

沙茨金:莫斯科的做法呢?

斯大林: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那里有过对右倾情绪的不正确的态度。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倾向。但是我不能说,莫斯科委员会中有过右倾。

臧声:组织斗争不是有过吗?

斯大林:组织斗争是有过的,虽然只占从属地位。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笑声)

柯秀尔:所以在改选期间不能“忍让”。

沙茨金:难道我们宣布过改选书记吗?

斯大林:谁也没有禁止过改选书记。中央的六月宣言¹⁹¹明确指出,如果不能保证下层组织有撤换任何书记和任何委员会的权利,那么开展自我批评就会成为空谈。你能用什么话来反对这样的宣言呢?

有人臧:在党代表会议以前吗?

斯大林:是的,即使在党代表会议以前。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脸上流露出捉弄人的微笑。同志们,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们中间某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尽快撤销某些表现右倾的人的职务。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

然,撤销职务比开展一个解释运动来广泛地透彻地把右倾、右倾危险以及反右倾斗争的问题解释清楚要容易。但是不能认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组织广泛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解释运动,不要吝惜时间,这样你们会看到,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对右倾就愈不利。所以,我认为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反右倾斗争的中心环节。

至于说到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对于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结论时所说的话还能作些什么补充。他坦白地声明:“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1921年我在列宁格勒和季诺维也夫作战的情形,就会知道当时‘激战’的规模比现在大些,当时我们战胜了,因为我们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错了。这对我们是会有益的。”¹⁹²可见乌格拉诺夫同志现在进行了斗争。如同他当时进行过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一样。但是他最近进行斗争究竟是反对谁呢?看来是反对中央的政策。还能是反对谁呢?这个斗争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进行呢?显然是在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基础上。

因此,提纲完全正确地强调必须反对对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提纲中指出,我们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倾危险在目前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斗争,并且是集中火力的斗争,我们已经进行了10年。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骨干。不能说,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最近也进行得同样激烈。这种斗争所以没有进行得特别激烈,是因为右倾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形成和定形的时期,它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加强(与我们的粮食收购困难有关)而正在加强和增长起来。所以主要的打击应当对准右倾。

再就我们的批评家说两句。我指的是在这里对政治局提纲的某些条目提出批评的一些同志。当然,全会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党的最高机构。我们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提纲是完美无缺的。全会可以对提纲中的一些不当之处进行修改,而且的确要修改。提纲不经全会加以一定补充、不被全会改好或改坏的事是没有的。(笑声)但还是请允许我说一句,我们的批评家同志们,我也叫他们书呆子,只是泛泛而论,而且大多是咬文嚼字,而不是实质性的批评。我听了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和戈洛谢金同志的发言,他们对提纲进行了批评,使得全会的气氛很热烈。听他们发言时,我以为他们要闹翻天呢。可是他们批评以后又怎么样呢?

结果,连只跳蚤也没有伤害。(笑声)至于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的批评,他指责李可夫同志有曼德尔施塔姆习气¹⁹³,那么请允许我表明态度,我认为这种批评纯粹是胡说八道。真难以理解,我国工业的那些聪明而又有魄力的组织者,比如像改组了石油工业、目前又正在改组黄金工业的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怎么会如此胡说八道呢?(笑声)

同志们,我在结束讲话之前还想指出一个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政治局委员向你们提出了控制数字提纲。我在演说中维护了这个提纲。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谈对这个提纲可能提出的个别修正。但是,这个提纲基本上是正确的,它能保证我们正确执行列宁的路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应当向你们声明,这个提纲是我们在政治局内一致通过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意义,因为一切对我们党不怀好意的人、反对我们党的人以及我们党的敌人不时在我们队伍里散布谣言。我指的谣言是:说我们政治局内有右倾、“左”倾、调和态度以及鬼才晓得的其他什么东西。就让这个提纲作为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证明吧。我希望这次全会同样一致地通过这个提纲作为基础。(鼓掌)

(休息后)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继续开会。现在请卡明斯基同志发言。

卡明斯基:提纲中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在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相差很远。

提纲详细阐述了我们在谷物领域和畜牧业部门遇到的困难。

我认为,提纲中对农业原料领域现状的阐述需要作某些修改。即使在总体上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在农业部门也会遇到许多严重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主要有:经济作物产量极低,通常比战前产量还低,某些领域的商品率非常低。我们在亚麻业中遇到的困难大家都很清楚。去年淀粉糖浆制造业的马铃薯原料供应也出现了严重困难。烟草领域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我们在振兴农业首先是振兴谷物领域的工作中所应采取的方法和捷径。

但是在谈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以下情况。毫无疑问,我们在发现目前农业中的上述困难的同时,也看到了表明农业发展中即将发生或已部分发生的转变的一些新过程。我们在建设国营农场方面所做的那些事情,集体农庄建设

的迅速展开,群众性的农业合作形式的普遍巩固和发展,预购近来出现的非同寻常的发展势头,各项农业措施的实施,——这一切无疑表明,我们正处在重大转变的起点上,我们正在进入对农业进行有效改造的阶段。要认真研究所有这些事实以及我们的工作实践,因为它们能够指出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具体形式和切实可行的途径。特别是围绕决议第七条进行的争论,依我看,它们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一个公认的、起码的道理:在我国农业的条件下,小个体经济的增长与农民的合作化事业是密不可分的。合作化的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巩固是加快个体小农户增长速度的条件,就像决议中提到的那些条件一样,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条件。中央七月全会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思想,使全党都注意到,解决谷物问题同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密不可分。但是要承认,直到目前,在实现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这一事业中仍有一些非常大的障碍和不足,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好转。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认识到农业合作社的“巨大意义”,而这一意义目前比任何时候都大。

居民生产合作化的工作近来与预购有极为紧密的联系。预购在巩固和改善农业合作社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由于实行预购,农业合作社的经营活动性质最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合作社完成了向组织农民生产并为其提供服务方面的重大转变。同时,预购也使合作化的原有速度大大改变。大家知道,在棉花和甜菜种植业中,预购已促使这些作物的种植者几乎百分之百地参加了合作社。现在,随着预购向其他领域推广,我们看到,在这些领域中也同样出现了大批居民、有时几乎是全部居民参加合作社的情况。在这些地区,组织全面播种精选谷物的工作与居民几乎全部参加合作社密不可分。所以说,在谷物业的合作化方面我们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由于实行了预购,亚麻产区的合作化速度也明显加快了。最后,试验表明,普遍实行预购是促使农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强大因素。通过实行预购,粮食和种子繁育合作社的优良谷物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50万公顷。预购促进了最简便的农业技术改进措施的广泛运用,如种子的精选、种子的消毒,无机肥料、联合机器的使用,等等。预购也大大推动了生产联合体和集体农庄的建设,显著提高了集体农庄,尤其是新的集体农庄的稳定性,加强了它们与整个合作化运动的联系。

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一领域远不是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承认预购在组织农产品销售和农民生产方面的巨大作用。可是在实践中却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我们的每一次预购都拖拖拉拉。我们今年秋播作物的预购以及明年春播作物的预购极其拖拉。秋耕已经结束,冬天到了,而政府还没有解决

1929年的春播作物的预购问题。其实,春季预购要从前一年秋季开始,而秋季预购要从当年春季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预购真正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预购问题迟迟未解决不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机关工作人员消极怠惰、因循守旧,因为常常有人不相信这项工作并阻挠其展开。不该再用突击的方式实行预购了,在这方面应改用正常的工作方法。

还必须承认,直到最近,在对预购的基本任务的理解上仍存在很大分歧。有人建议我们不要在贫农农户中实行预购,理由是,贫农农户无商品可言,从其自身特性来看,也不可能在他们当中实行预购。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预购的试行表明,这一措施对发动贫农农户、使其摆脱富农的剥削具有重要意义;预购会逐渐排除并取代富农租佃。即使我们不能给每个农民马和犁来耕田,我们也基本上能够在预购时付给他必要的预付款,有了这笔钱,贫农就能租到马和农具,也就不会按对分制出租自己的土地了。

至于在目前条件下预购的任务不只是组织销售,而首先是组织农民生产和搬迁,我就不说了。从这方面来看,把贫农农户排除在预购之外的建议是不堪一驳的。

还有一个错误。有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在富裕农户中实行预购,或者说,要实行使农村中那部分富裕农户根本无法参与的预购。这样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我们要努力通过预购把所有农户,包括富裕农户,都吸引到国家的调节和计划轨道上来。预购是使富农农户接受国家监督和调节的有效方法之一。可以这么说,预购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在实行的吸收成批的居民、整个整个的土地共用社参与预购的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些条件下,预购可以成为对剥削活动发起经济进攻的一种最有效形式,成为巩固贫农和中农的反富农联盟的一种最有效形式。

还要指出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更加坚决地从一年期预购转向多年期预购。

要特别注重发展和改进谷类作物预购的实施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出非常具体的任务:明年通过预购收的粮食不少于2亿普特。今年我们通过预购收的粮食大约为5000万普特。明年这个数字可能扩大到4倍。完成这项任务会对谷物业的发展和粮食市场的改善产生巨大影响。

这方面的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精选谷类作物的预购。目前,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正在进行1929年精选作物预购。如果该联社的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明年就能至少收8000万普特的精选谷物。至于8000万

普特精选谷物储备的建立是一项多么大的成就,这已无需证明。

必须加强预购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在实行预购的基础上,比现在更广泛地开展农户的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工作。

根据拟定的年度计划,明年预购的谷类作物种植面积为1 200万—1 400万公顷,我们认为完全可以提出一项任务,即明年秋收时把集体农庄和低级联合组织的商品粮产量提高到1亿普特。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和全俄农业劳动组织联合会目前正致力于完成这一任务。今年我们有望从集体农庄和低级联合组织收购约5 000万普特谷物。明年这个数字应扩大一倍。

斯大林:可以上交多少商品粮食?

卡明斯基:我认为,明年我们应该能够从集体农庄和低级联合组织收购不少于1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斯大林:是1928年的收成吗?

卡明斯基:是1929年的。

斯大林:那今年是多少呢?

卡明斯基:我们认为,今年能从集体农庄和低级联合组织收购不少于5 000万普特的商品粮食,其中包括从实行土地共耕制的公社、劳动组合和协作社收购的约3 000万普特。

扎东斯基:是俄罗斯联邦的,还是全联盟的?

卡明斯基:全联盟的。

安德烈耶夫:你们是在蛮干!

卡明斯基:安德烈耶夫同志说,“你们是在蛮干”。不,我们没有蛮干。

我这样说并不是指那些低级的生产联合组织,如播种协作社。

斯大林:上交给我们还是别人?

卡明斯基:上交给我们。

到今年9月1日,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已收购1.02亿普特,也就是说,与去年全年采购的一样多。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年的粮食收购中起到巨大作用的是集体农庄和低级联合组织。截至9月1日,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已从集体农庄收购1 800多万普特,这一数字还不完全,未包括上交给全俄农业合作社育种联社的粮食。

斯大林:米高扬怎么不说话?

卡明斯基:我再说一遍,我们完全可以提出明年把集体农庄和向它们靠拢的那些低级的生产联合组织的商品粮食产量提高到1亿普特的计划。

斯大林: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不是“计划”。

卡明斯基:这不单是一项计划,而是全俄农业劳动组织联合会和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给自己提出的具体任务,是我们正在努力完成并且希望完成的具体任务。当然,这一切要以继续坚定地实行最大限度地开展集体农庄建设的政策为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机关中至今仍有人极力反对这一政策。贬低集体农庄运动的表现是,有人公开呼吁“有组织地后退”,有人则比较隐讳地提出“少一些数量,多一些质量”之类的口号。这些口号是不对的。集体农庄运动应该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同步发展。

臧声:说得对。

卡明斯基:两者是紧密相连的,这一运动的规模越大,其质量也会越高。同时还要指出,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中发现,目前我们的组织能力和我们拥有的技术设备极不相称。我们都知道,去年集体农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可是去年给集体农庄的拖拉机却比前年少,而今年要给的又比去年少。

拖拉机供应和拖拉机生产问题正逐渐成为集体农庄建设中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决议中提出要加快建设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还不够。我们需要重新研究和扩大拖拉机生产计划。

瓦雷基斯:在中部黑土地区应该建两个厂。

卡明斯基:瓦雷基斯同志说得完全对,要建两个拖拉机厂,也许要建三个。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们的运动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拖拉机供应问题。最近,我们和农业合作社——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和农业合作社联社¹⁹⁴——一起搞了一次组织拖拉机队¹⁹⁵的有意义的试验。我们现在有14个拖拉机队:9个在粮食合作系统,5个在农业合作供应系统。例如,我们在中部黑土地区有4个拖拉机队。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区的塔洛夫斯卡亚拖拉机队耕种10个土地共耕社的5625公顷耕地。帕里耶夫斯卡亚拖拉机队把5个相邻的土地共耕社的农民份地连成一片,面积达7000公顷。阿赫特尔斯卡亚拖拉机队联合了11个村社,等等。

整个整个村庄、整个整个相邻村庄的组合纷纷转为土地共耕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把发动个体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的工作与集体农庄建设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

[斯大林:一些经济上的促进因素不会因此而消失吗?]

卡明斯基:不,绝不会消失。通过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这些途径,只会大大地振兴农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已开始明白这一点。整个村庄实现集体化,

这在昨天看来还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今天正在成为事实。

目前我们正以长期预购为基础,开始建立一些大型谷物种植集体农庄,共耕地面积达数千公顷,有的超过1万公顷。我再说一遍,整体上看,这项工作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的技术设备有限。

[斯大林:钱不够。]

卡明斯基:钱当然是很少,但我认为,还可以为这项工作再筹措一些钱。

主席:会议到此结束。

第七次会议

11月20日上午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我宣布,全会会议开始。现在请北高加索的伊万诺夫同志发言,然后是洛米纳泽同志发言。

伊万诺夫:我不想照本宣科,而想按照通常所说的自我批评的方式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如果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对决议加以修改,澄清一些说法,再把斯大林同志的讲话收入决议作为前言,那么我们这次全会就会创作出极有价值的党的文献。我觉得,没有一个同志会对这样一份文献投反对票。

首先,我想谈几个与下一个经济年度的控制数字有关的具体问题。我这里指的主要是燃料问题(石油和煤炭),因为在我们北高加索必然要涉及这些工业部门。我们对石油业采取的是[掠夺性]方针,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近期就有停工的可能。我们现在必须加快石油业的发展,尤其是必须堵上出口计划出现的缺口。轻质油品,主要是汽油,目前是出口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在出口计划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因此,格罗兹尼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今年接到的生产任务可以说是最紧迫的。由于生产压力大,我们的炼油厂,也就是从重油中提炼轻质油品——汽油的工厂,简直是在提心吊胆地工作。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型干部拒绝在完成给我们格罗兹尼生产部门下达的生产计划时对工厂的状况负责。当地的工会机关出于技术安全考虑作出了工厂停工检修的决定。情况非常紧迫,一大批工厂现在就需要检修。可我们又不能停工检修,这样就完不成生产计划。我们并不是提出要减少生产计划的问题。我们苏联经济的利益现在要求并且迫使我们接受这种紧迫的生产计划。我们要使大家乃至每个人都对这个生产计划的完成负起责任来。但同时,如果不能使格罗兹尼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的生产机构做好准备,以使其在将来能够担起逐年增加的生产任务,具备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不正确的。由此产生了对格罗兹尼石油工业

进行大量投资的任务,以使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对石油业提出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

因此,我们面临着进一步进行钻探的任务。我们不能缩减、相反要扩大钻探规模,否则我们就会使石油工业本身的原料资源受到限制,使提轻质油品开采的能力受到限制。其现在,当对石油工业提出完成相当大部分出口任务的迫切要求时,我们所执行的生产—财务计划就出现了缺口:投资比生产财务计划减少1 000万卢布。

第二个问题是煤炭问题。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谈到了燃料战线目前可能的发展前景和存在的一些困难。我认为,为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制订的计划,尤其是压缩新矿井的开掘,一段时期后会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们的煤炭业将无法¹满足整个国民经济对它的要求。为了奠定今后几年煤炭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应扩大并加紧开掘新矿井。我们将井下工作日改为六小时,而采煤过程的机械化程度只能达到25%(据主管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洛莫夫同志提供的资料)。机械化程度不够会导致完不成生产计划,另一方面还会导致提高成本,这已经在井下工作日改为六小时后的第一阶段表现出来。

对这一战线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最终确定控制数字时,要使我们的燃料经济能满足我们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求做好准备。

第三个具体的问题是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党提出的必须提高农业尤其是谷物业的方针是党的基本任务。加快农业尤其是谷物业发展速度的任务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关键问题。但我认为,必须用区别对待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农业方面采取的是既不要使其萧条,也不要使其停滞的政策。我们的政策经过了实际生活的考验,能够确保农业持续向前发展,而我们则必须加快这一发展的速度。我们今年特别明显地感受到由于农业发展速度缓慢造成的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我们苏联两个最重要的农业地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出现的不利气候条件对我们整个农业的平衡产生了影响。因此,在按地区、地域确定今年受不利气候条件和自然现象影响的农业地区的控制数字时,应当确保这些地区能够更快地发展。

柯秀尔:说得对。

伊万诺夫: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和乌克兰人找到共同语言。

现在我就有关控制数字的决议草案谈几点原则性的意见。只要仔细读一下二月全会决议草案,七月全会决议草案,尤其是本次全会的决议草案,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莫非我们的政治局都成了素食主义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决议草

案有点像一种食物——凉拌菜。凉拌菜是一种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任意选择的菜。假如你不喜欢土豆,可以吃块儿黄瓜;假如你不喜欢黄瓜或甜菜,可以吃块儿土豆,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决议草案正是这样一道可以按口味选取的菜。其实,我们中间对七月全会决议的解释各不相同并非偶然现象。有些同志试图根据二月全会¹⁹⁶和七月全会决议得出极其错误的甚至会导致对党的基本决议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作出重大修改的结论。这就是应对本次中央全会的决议草案进行若干修改的原因。

凉拌菜是“唯一的”一道菜,我认为这一点每个人都清楚,但这道菜毕竟是由各种各样的配料做出来的。

柯秀尔:别把问题搞复杂了。

伊万诺夫: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道菜中挑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人喊:这是在用烹调的方法对待决议。

伊万诺夫:形象的比喻,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玩笑,有了形象的比喻,事情会更简单明了,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对别人的发言产生误解。

我们应当指出,我们党内的某些人仍在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在党看来,他们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决议背道而驰的。例如,斯大林昨天谈到了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仍坚持他从前的错误立场。

有人喊:他还提到了跳蚤。

伊万诺夫:我不抓跳蚤,这和我说的东西没关系。但至少弗鲁姆金同志在第二份文件¹⁹⁷中所说的内容印证了他遭到党批驳的第一份文件,可见,他,弗鲁姆金仍然坚持他从前的、与党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的立场。因此,党的任务是——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中央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应当成为党的政治总路线的集中体现。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起草决议,对我们的经济应如何发展以及走怎样的道路等等都制定了具体的方针。这个指示应是党的基本政治路线的集中反映。从这一点来看,需要对决议的一些说法加以澄清,作些补充。不要违背党员、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希望澄清这个决议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提到那只没有被“逮住”,但好像有人要逮,却逮不着的跳蚤时,他(斯大林)这样说绝不是反对作出使决议增色的修改。

显而易见,我们是从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出发来确定经济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的。在解决这个正确的政治任务时,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无

产阶级专政时代,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列宁的学说和共产党的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和增长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与农民这种相互关系的形式和建立联盟的形式将会发生某些变化。

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发展的现阶段存在一些特殊性。决议草案中有这样一条。我认为,对这一条要多强调一些,多挖掘一些,给一个全面的提法,因为这一点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决议的这一部分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党又重新面临着无产阶级对中农和贫农的态度这一头等重要的问题。目前,工人阶级对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经济关系转向公有化方面给以革命性影响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可见,决议强调指出的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的工业,为我国农业真正实现技术改造提供了可能性,为在更大程度上使农业沿着将分散的农民经济公有化的社会主义轨道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要更加明确地强调这一条,因为形势的特点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把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置于稍有不同的基础之上。这个不同的基础就是伊里奇所说的:只要我们显示出我们有能力用新技术改造农业,有能力在新技术基础上和根据这一新的技术基础,使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沿着公有化、集体化这些能使农业具备小农经济和分散经济所不具备的公有大经济的全部优越性的道路前进,农民就会跟我们走,就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那么现在,在我们已经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向农业供应机器、实行预购合同制和帮助集体农庄的一系列措施后,这种可能性对我们来说正在变为现实。必须特别明确地强调这一点,因为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对这一提法进行解释,有助于党进一步弄清党内目前进行的争论。有些人总是抱怨,似乎我们在农村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似乎我们在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上有些冷淡,似乎这种关系几乎意味着大难临头,这个提法也是对这种人的答复。

其次,决议中没有谈到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决议中有一条对“乌托邦”式的所谓原则性进行了谴责,因为这种原则性忘记了“当前的特殊任务——当前的具体条件”。这是正确的。但我要问:难道阶级的对比,阶级斗争就不再是当前形势的特点了吗?为什么这份决议没有对力量的阶级对比进行分析评价呢?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整整一年了,一年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贯彻这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开展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在阶级关系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上以及农村中贫农、中农与富农等的关系上具有了自己的特点。我们在起草控制数字指示时,也确定了我们近期的

政治任务,我们也要进行年度的政治总结。我们作了全面经济总结,但没有作全面的政治总结,我们没有分析阶级力量的对比,没有分析在贯彻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向城市和农村中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进攻的决议、关于沿着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我国经济的决议一年后,阶级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开展阶级斗争是事实,也不能怀疑敌对阶级对我们的仇恨。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党有所作为。我们在决议中没有看到这些。要把这个遗漏的地方补上,因为党过去和现在都出现过这样的争论。中央委员会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会使全党对一系列方针更加明确。中央全会应该说明它如何评价当前的政治形势和阶级的对比,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一年来贯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工作有何成果。

再谈一点对农业的意见。在我们谈到由于农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所造成的困难时,我认为,正像斯大林同志昨天在这里所说的,不要忘记一点,由于战前资本家掠夺性地利用土地和掠夺性地经营,造成农业收成的下降。以斯塔夫罗波尔专区为例。在对两个八年(第一个八年是1898年到1906年,第二个八年是1906年到1913年)的数据进行对比时,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八年小麦的收成平均为7.1公担,第二个八年为5公担,第一个八年大麦的收成平均为9公担,第二个八年仅为6公担。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农业发展水平已呈现下降趋势,这就要求我们作出一定的具体结论。基本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农业技术落后和分散的情况下)首先在于对农业进行改造,为农业奠定新的技术基础,只有国家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的公有化能够为此提供保障。在对今年的农业进行总的评价时不能忽视一点,即今年是特殊的一年,由于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损失了大约500万俄亩(北高加索和乌克兰)。有些人企图把农业发展的速度极其缓慢归咎于对农民的态度不正确。这是错误的。农民的积极性即他们对农业发展的关心要靠我们总的政治路线来保障。这即使从春季播种运动的总结、从秋季播种运动的过程以及从圆满完成粮食收购任务等方面都能看出来。我们总的政治路线不会妨碍农业的发展,它能够为工农联盟提供保障。

许多同志说税收是妨碍农业发展的因素。今年的税收比去年多,但不会挫伤个体农户关心农业发展的积极性。比方说,在北高加索(北高加索是典型的农业边疆区)以及包括库班、顿河地区、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7个最重要的地区,我们有关于农业税的数额以及农业税如何在农民各社会集团之间分配的資料。结果是,55%的农户(大约30%的免税贫农农户未列入其中)今年纳税仅占

全部税额的38%，而去年则为48.6%。今年，这55%的农户即基本农户的纳税额与去年相比只增加了2%。这一结果表明，我们的实际方针没有限制农民发展农业的个人积极性。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过火行为，对这种行为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要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党应该进行最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要创造这样的工作条件，在安排党的干部时要在我们的实践中杜绝、消除这种现象。

同志们，我认为，应在决议中补充一些与右倾及右倾调和主义作斗争方面的内容。因为全党对右倾及右倾调和主义已经作出了反应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其实每个支部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全体党员群众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要求与右倾和调和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让我们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对党组织对此作出的反应加以总结，对党的舆论作出评价，把这些舆论记录下来并在广大党员群众发表的意见上盖上党中央委员会的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对事实不能视而不见。党可是在等待全会在这方面的决定。我认为，可以作出结论并声明，中央委员会是如何评价全体党员群众坚决反击右倾的行为的。对当前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右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右倾和调和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们不会放松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打击和回击，我们不会让托洛茨基主义卷土重来，我们的力量足以立即击退托洛茨基主义卷土重来的任何企图。我认为，对此不应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党应该武装起来反击右倾，如果现在不存在派别，如果现在只有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只有斯大林同志昨天所说的向某一方面偏离的倾向，那么党就要全力阻止这一倾向发展下去，不让这种倾向留在共产党内。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条件，不让右倾有直接表现的机会。要把党反对右倾的舆论提高到使右倾在党内必将遭到彻底失败并以布尔什维克的不妥协精神给予其坚决回击的高度。当然，思想斗争是与右倾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同时也不能不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以保证贯彻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同志们，我要问的是，假如明天（我举一个有些离谱的例子）弗鲁姆金同志被派到某个边疆区党委去做党的工作，你们会怎么做呢？我问你们：从党的利益、党的团结和在党内坚持列宁主义方针等等立场出发，能允许（当弗鲁姆金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仍然坚持某些与党背道而驰的观点时）把弗鲁姆金放到区委书记的位置上吗？我看，这可不行。不能让弗鲁姆金之流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我认为，这样的组织措施应得到保障，否则，同志们，我们就会滑向泥潭。我认为，那些能确保党的领导掌握在坚定分子（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手中的组织措施应该有其一席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党不偏离列宁主义道路。

主席：现在请洛米纳泽同志发言。

有人喊：请按规定时间发言。

洛米纳泽：我请求给我和所有发言者同样多的时间。

弗鲁姆金同志在信中声称，政治局的实践与他的建议和观点完全一致。我认为，本次全会批准的控制数字是对他这一说法的最有力驳斥。

卡冈诺维奇：说得对。

洛米纳泽：控制数字不但能保持，而且能提高工业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控制数字确立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正确的关系；控制数字无疑会保证基本的贫农和中农农户的快速发展并提高社会主义成分在农业中的比重。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最重要的成就。既然控制数字是全会工作的主要对象并将在全会上通过，那么它也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成就。明年这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将意味着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进展，无产阶级阵地的加强，这对整个改造时期来说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改造时期的最初几年，社会、经济、文化和组织技术方面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在这一改造的初期能够保持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一事实，是对布哈林同志早在上次中央全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经得起改造时期对其提出的考验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¹⁹⁸。我认为，我们通过的并且无疑将由党和工人阶级实现的国民经济计划本身会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这一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要求党和工人阶级付出巨大的努力。大家都承认并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提高群众参与解决经济任务和战胜困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但为了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他们参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要彻底搞清我们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方针问题。在思想政治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提高群众参与解决经济任务积极性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条件。但我认为，任何掩饰尖锐问题的行为，任何回避尖锐问题的企图都会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巨大损失。党在近几个月比任何时候都更认真、更深刻地讨论了各支部及各个组织中的经济问题。党内当前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已形成了明确的观点体系。这一观点体系是在与右倾和所谓的“左”倾斗争中形成的，全党期待着全会对作为斗争的目标、作为所有党支部进行最严肃讨论题目的那些问题给予全面准确的答复。

那么我认为，从这一观点来看，从彻底弄清的角度来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提纲不能满足党组织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那些要求。的确，昨天斯大林同志用不大赞同的口吻谈到了对个别措辞吹毛求疵的书呆子。不过，这些书呆子中

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全会,至少几乎都是在这里发言的同志。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提纲逐字推敲、严格要求并没什么不好。前不久列扎瓦同志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支部会上发表了讲话。昨天斯大林同志也扼要地提到了他的讲话。我过一会儿再详细分析他讲话的实质。顺便说一句,列扎瓦同志在支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有一种精神病正在党内蔓延,说了些话,犯了些错误就说你是右倾”。对右派来说,假如没有人注意到个别的话和个别的错误的话,当然不是什么坏事,那样的话,右倾就更容易伪装他们自己了。我认为,对提纲的每个字都要更严格地推敲,这恰恰是因为,连列扎瓦这样的同志都把这种严格要求说成是精神病。我简单分析一下提纲中我认为不妥或不够准确的几处措辞。第六条有这样一段话:“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粮食和原料基础的发展。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工业的真正发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是不够的。除了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分子,谁都不会否认,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并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另外一种依赖性,农业对工业的依赖性,不过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方面,工业起着决定和主导的作用。这一点古比雪夫说过,斯大林同志昨天也说过,但提纲中没提这一点。提纲也没提农业发展问题最终取决于工业的发展这一观点。而这一思想已经牢牢地融入党的意识之中,它也应该在决议中反映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一思想是前不久我们党内和我国报刊上争论过的题目。弗鲁姆金同志不久前在《工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派的主要思想表述如下:“我们的市场比例失调,农民和工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党已经向反对派指出,这种基于把农民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必然会导致工人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联盟的瓦解。”

被弗鲁姆金同志称为反对派观点的东西实际上是党的观点,《工商报》对他的反驳是完全正确的。党从未反对过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党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振兴农业的决定性措施。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与党的方针的区别在于,托洛茨基分子认为必须以飞快的、必然导致工业和农业脱节的速度加速工业发展。但是把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思想本身说成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超级工业化”方针,意味着反对党的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方针。这也是右倾。既然党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过并正在进行斗争,就必须在决议中明确突出工业的主导作用、重要意义以及农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工业发展的观点。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当前农业极端落后是产生巨大困难的根源,因此目

前尚未解决的任务,当前的任务,就像斯大林同志昨天详细说过的,集中在发展谷物业的话,那么必须在提纲中指出,国家以前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工业发展的低水平,是最近的整个时期内主要的比例失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指出了这一点¹⁹⁹。这一比例失调的表现就是商品奇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已阐明了这一点,现在决议中也必须阐明这一点,尽管现在发展谷物业在全部经济问题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决议中要更明确地阐述关于我国主要的比例失调及能使这一现象得到克服的基本路线的这个思想。

决议中有一条指出,我们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这一条强调要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多数与会同志发言时都对此提出了批评。当然,进一步发展个体中农和贫农经济是当前极其重要的任务。但我认为,应当像莫洛托夫同志在上次全会上所做的那样强调指出,只有首先通过合作化才能完成这项任务²⁰⁰。当提纲谈及农民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广阔空间、激发农民的经济兴趣等问题时,不要忘记列宁的话,他说,我们认为合作化恰恰是农民的个人兴趣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相结合的必要阶段。其次,这个几乎遭到所有发言同志批评的错误的说法的错误还在于,似乎全党已经熟知和认识了农业集体化的任务,至少这一任务已经不那么紧迫了。不过,同志们,我认为,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今天来说也是绝对正确的。我读一小段他的话。莫洛托夫同志说:

“从现在起……党在农村全部政策的根本任务是,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群众和整个苏维埃国家从小农个体经济顺利过渡到社会化大经济。这也是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我们现在对这项根本任务的重视程度很不够,态度极不正确……党在农村政策的中心任务就是将注意力转到这些任务上来。这才是真正要谈的转变,也就是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注意力的转变。”²⁰¹

决议中有一条谈到,我们在农村集体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这符合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党的注意力向这方面转变的这一要求吗?我们能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已经转移了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注意力,这项任务确实作为中心任务摆在他们面前了吗?当然不能,我们不能这样说。同志们,提纲中应对莫洛托夫同志的想法加以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党内正在围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进行斗争,甚至站在正确立场上的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也常常袖手等待。我指的是库比亚克同志的讲话,他在这里说,集体农庄的建设不要追求数量,他还把扩大集体农庄运动与抓

质量对立起来。当然,这个方针完全是错误的,它也就被我们党内的右倾分子给接了过去。我想谈一下列扎瓦同志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支部会上讲话时恰好提到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预购合同制政策的一段话:

“把几亿甚至几十亿卢布用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合同制上合理吗?理智吗?只有很少一部分集体农庄是货真价实的集体农庄,我们投入的巨额资金全都被那些骗子、无赖、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坏蛋们窃取一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了。要不要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呢?不要!最好开发10万俄亩,而不是20万、30万俄亩,但要确保这种经营活动能够产生稳定的‘效果’,不要白白浪费钱。

关于预购合同制。我不知道,这个预购合同制是谁发明的。我们在这方面好像得了某种狂热病。应该只对那些能够及时缴粮的农户实行预购合同制,而不要搞社会保障。”

库比亚克同志一到这个讲坛上就说什么,预购合同制只应在播种面积不少于3俄亩的农户中推广。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明确,特别清楚,绝不能有半点含糊,否则,我们就要在这里向列扎瓦同志伸手要钱了,他是比弗鲁姆金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出色的右倾代言人。

有人喊[柯秀尔]:你们的队伍壮大了。

洛米纳泽:列扎瓦同志说:“我基本上同意实行集体农庄和预购合同制,但请你们论证一下这些投资的经济意义,然后再来跟我们要钱。”这些话不需要加注解。(主席铃响)请再给我10分钟。

有人喊:给他。

主席:谁同意再给他10分钟?通过。

洛米纳泽:斯大林同志昨天把那些要求从决议中将有关富裕富农的话删除的书呆子讽刺了一番。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书呆子的?

洛米纳泽:我同意所有的“书呆子”在这里提出的要求从决议中将有关富裕富农的话删除的建议。斯大林同志说:哎,那您用什么来代替“富裕富农”这个词呢?说富农的上层部分,还不是都一样?依我看,提纲中要说得简单明了,别发明什么新名词,征收个别税的农户不得超过3%,就得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要给党的意识造成混乱,其实混乱是存在的——未被任何人指责为右倾的库比亚克同志就是证明。(笑声)

洛莫夫:一派胡言。

柯秀尔:库比亚克有点儿右倾。

洛米纳泽:库比亚克来到这里就说,向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提供机器大致要比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条件。富裕富农出现后就会出现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全会上不是已经有人叫喊说,我们很快就会有中等富农的富裕上层的说法吗?这就会造成混乱,这些新名词会助长某些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同志划分出“经济力量薄弱的”富农这一特殊类别,党对他们要采取特殊的、不同的政策。在结束对农业问题的看法时,我认为有必须强调一下哈塔耶维奇同志所说的话:今年的任务是对贫农提供经济帮助,特别是保证贫困户起码有最低标准的粮食收购,这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之一。在这里要记住并认真落实斯大林同志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现在谈谈阶级斗争和右倾的问题。提纲分析困难时没有强调阶级斗争的因素,也没有提及阶级斗争的因素,这是提纲最大的缺陷之一。我们知道,我们党内正进行着路线斗争和争论,即经济困难仅仅是计划失误、主观错误造成的,还是一些客观因素,其中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的。提纲在分析这些困难时只字未提阶级斗争。这个缺陷要纠正过来。正像一些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李可夫的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的问题谈得相当模糊,至少是提得不清楚、不明确。那么,为什么要重新强调和突出这一点呢?其实,党以前的全部文献对阶级斗争问题提得并不少。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城市和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仍很尖锐。农村问题我不再多说,一些同志已经说得相当多了。说到城市,我们难免会或多或少地重复沙赫特事件这样的事情,中央四月全会有关专家问题的说法应当完全保留下来。

现在谈谈右倾和左倾问题。我认为,提纲中对右倾的评价不多。提纲认为右倾有下列特征:

“右倾(公开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的表现是,竭力阻挠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忽视或否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阶级斗争、尤其是对和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对群众的需要采取漠不关心的和官僚主义态度,对与官僚主义的斗争、对军事危险估计不足,等等。”

这是不够全面和不够明确的评价。必须指出的是,右倾不仅表现为竭力阻挠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还表现为竭力降低工业化的速度,而速度问题恰恰是决定性问题。应该在提纲中指出右倾的一些本质特征,如竭力主张重新分配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主张“让步论”,等等

有人喊:新经济政策的扩展。

洛米纳泽:我认为,绝对要指出这一点。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无疑是加剧目前右倾的根源。弗鲁姆金同志在他那份分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文件²⁰²中声称,我国的右倾危险没有加剧,阶级斗争也没有尖锐化。按照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说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可笑的。但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就是党内右倾分子的观点。但是应当把党意识到的思想直接、坚决而明确地在提纲中体现出来。就像阶级斗争的加剧首先是这种右倾的根源一样,应该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右倾是主要危险这一点表达出来。

我还想就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说上几句。当然,如果我们党与右倾的斗争的结果是党在思想政治方面向托洛茨基主义作出让步或者是小小的让步,那就意味着我们党的失败和灭亡,意味着承认党的整个路线的失败。我以为,即使党内有人认为在与右倾斗争的过程中应重新考虑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那么这也仅仅是极少数人,而我们党仍然有百万之众。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不能以新的方式提出来,因为右倾正在得到加强并正在成为主要危险。斯大林同志关于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并且仍将是布尔什维主义今后整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才要全力与各种完全把右倾归结为托洛茨基主义,并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²⁰³唯一存在的右倾的企图进行斗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表现形式,托洛茨基分子在我们党内或党外提出的具体要求与右倾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纲领或者要求截然不同。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要清楚地看到这个差别。昨天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了这个差别,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党内还存在一种抹杀右倾和左倾之间的差别的倾向。我们常常对反对右倾的决议投赞成票,因为据说右倾不是别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莫斯科这里的个别支部也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把这种东西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²⁰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声称,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就其形式和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正经历着困难时期。敌对的阶级势力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使我们党内的个别环节产生了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动摇现象。这句话就形式和实质来说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我认为这句话就形式来说是不成功的,就实质来说没有任何托洛茨基主义的东西。斯大林同志昨天说,右倾是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的反映,也就是说,这种思想不是别的,而是说我们党内的个别环节上存在着右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动摇现象。

多加多夫:替托洛茨基主义辩护也是右倾,[而你们正是这样做的]。

洛米纳泽：当你们企图指责每个尖锐提出右倾问题的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你们恰恰是错误的，多加多夫同志。

多加多夫：西尔伯曼就是因此被开除出党的。

洛米纳泽：我对西尔伯曼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既然西尔伯曼已被开除出党，那你们为什么还把他的文章完整地刊登出来，只删去了这一个地方？把这句话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并声明，替这句话辩护不是党的集体的职能，这是在误导党员，在给党指出错误的方向。根本不存在声明中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即党的个别环节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动摇。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党是知道的，党早就和这种倾向进行着斗争，而且斗争是完全自觉的。我再说一遍：假如谁企图在与右倾的斗争中哪怕给予托洛茨基主义以丝毫的帮助，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他就永远灭亡了。但是多加多夫同志，不能像您这样打着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幌子，讲出这样的话。由于时间所限，现在我只想谈一个问题，我们的敌对阵营对我们目前出现的右倾的反应。我认为，这一点应该说，这样弗鲁姆金同志就会看到：我们的右倾危险是否在加剧，我们的阶级斗争是否变得尖锐起来。弗鲁姆金同志认为，现在和1921—1922年的时候一样，右倾没有加剧，阶级斗争也没有减弱。

彼得罗夫斯基：他看过《社会主义通报》²⁰⁵。

洛米纳泽：他是看过《社会主义通报》，可我还是要在这一念一句话：“能否说右派反对派提出的经济纲领，就其实质来说比正式的党的策略更进步，从而更符合国家和生产力的利益吗？”²⁰⁶

接下来又说，孟什维克将支持一切克服经济空想主义，其中包括右派反对派清醒的经济纲领的行动。这就是对你们的问题——右倾危险是否在增长，是否存在危险增长的客观基础——的回答。《社会主义通报》支持右倾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最后我还要把我开始发言时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我们应该弄清全部政治和经济方针问题，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甚至有些领导同志都没搞清楚，这会在党的队伍中引起某种恐慌。

我还看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给党指出错误方向的那份决议；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在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上谈得不是特别清楚；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当我们发现甚至一些领导同志也产生了这种动摇情绪的时候，该怎么办？该如何纠正这种情绪？该怎么做？我认为，要按照列宁同志的嘱咐去做：“要帮助动

摇的人,自己就不能动摇”。

主席:现在请洛莫夫同志发言。

洛莫夫:这三位报告人对煤炭问题极不重视。只有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一个人谈了这个问题。米柳亭同志在讨论时说,苏联的煤炭工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与战前相比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依我看,这个论断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总的来说,我国煤炭工业的比重之所以提高,只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煤炭业都处于极度萧条中。这是因为,与其他工业领域相比,全世界煤炭业的技术老化程度极其严重,有待于进行技术改造。从这一意义上说,恰恰因为世界煤炭工业或者是停留在1913年的水平上,或者是与1913年相比落后了,因此我们似乎是稍稍前进了一点。但如果把我国煤炭工业机械化和改造的前进步伐哪怕是与石油工业相比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已经相当落后了。当石油工业第一阶段的改造结束时(现在石油工业已经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我国的煤炭工业才刚刚在机械化方面迈出胆怯的几步。这正是我们薄弱的方面,所以我们最近可能会出现煤炭紧缺加剧的情况。

我们要时刻关注我们将要面临的这一前景。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针对煤炭工业开掘新矿井和新的建设工程支出提供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提到的一个表格证明,起初,也就是1925—1926年度我们打算新开掘28座大型矿井,可现在我们只开掘了17座。从计划开掘28座到实际开掘17座——这就是我们的速度。煤炭工业领域新的建设工程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

如果新矿井全部投入使用的话,会有多少产量呢?这些矿井总共会给我们提供40万—45万普特^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提出了哪些任务呢?这个计划提出将开采量提高75%—80%,几乎使开采量翻一番。我们现在能提供大约15亿普特,也就是说,新矿井只能提供国家和党要求我们增加的开采量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我们又要依靠顿巴斯那些目前已超负荷运转的老矿井。我们就要加夜班,而且应当注意的是,老矿井的机械化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的。老矿井各个工作环节的机械化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的,而如果整个工作链不能实现机械化,机械化的效果就会大大降低。尽管新老矿井都已超负荷运转,但我们面临的局面是,我们的开采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4亿—4.5亿普特。——中译者注

量从1934年起将会下降。我们煤炭工业今后10年将不会出现逐渐攀升的曲线,而是从1934年起必然要出现下降曲线。从1934年起,煤炭工业将是所有大型工业部门中唯一被国家计划委员会削减建设规模的部门。我认为,必须把全党的注意力转移到将这一曲线变成直线的方面上来。只有在我们顿巴斯新的建设工程引起更多的注意并对此投入更多资金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工人的劳动是煤炭工业的主要部分(在一普特煤的成本核算中,用于劳动力和各项附加的开支占了将近65%),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煤炭工业的机械化,我们当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资金。

同志们,我们面临着焦炭严重短缺的问题。近些年冶金工业得不到发展,就是因为南方钢铁托拉斯兴建的所有新焦炭炉都遇到焦炭供应不足的问题。我这一结论是坚决而严肃的。我认为,必须比现在更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来谈谈我们顿巴斯地区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电力供应问题。计划架设250公里长的输电线路,有人想在这条线路上,在这个短短的线路上建设顿巴斯的供电线路。当计划将顿巴斯纳入国家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管理局的电网时,在顿巴斯本地区建设自己的供电基地就会引起质疑。这是可能引起质疑的。同志们对远距离供电的经验研究得不够。我们不妨以莫斯科本身为例:像莫斯科国营电站联合公司这样一个不错的部门,在它为鲁布廖夫卡供电时,每年都要停电近70次,平均每次停3小时,也就是每年停210个小时。那么如果从第聂伯河向顿巴斯供电,要停多少次呢?可能不止这些吧。电价是多少?不会比在顿巴斯本地利用燃料废料(煤粉)发电省钱。依我看,现在某些同志提出的全部问题就在于降低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意义。

我们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是为了让它日后为顿巴斯供电,这样会破坏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本身的设想。

我认为,必须明确提出在顿巴斯本地建造大型地区电站的问题。应该坚决提出尽快为什捷罗夫卡电站补充设备的问题,古比雪夫同志也谈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要坚决提出关于建设祖耶夫卡地区电站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谈得上为顿巴斯本身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现在常常有人不是从顿巴斯的利益出发,而是从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电似乎是无处可供的立场出发来提问题,这样提问题是完全错误的。

目前煤炭工业在其发展中遇到了极其困难的情况。我们正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大力推行六小时工作制。这样的话,那些过去平均每天工作6小时54分钟(根据215个矿井的调查结果)的工人现在的工作时间就是大约6个小时。但

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在各个地方都完全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在目前情况下,近30%的工人还在超时工作,有23%的工人还干不到6小时。

我们的劳动纪律极其松弛。因此,必须全力做到,让工会和所有其他组织以更加旺盛的精力进行工作。我们现在面临来自农民的一系列冲击,他们来到煤矿,使得劳动纪律遭到削弱。与此同时,顿巴斯的工作中还存在极其不利的情况,这就是在粮食供应方面存在巨大困难。

有一点也不容忽视,这也就是从去年10月起,我们的预算指数增长了18%,在这种情况下,10月份的实际工资与去年10月份相比实际上是下降了。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吸引所有组织,首先是工会组织的注意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不过我在这里要开诚布公地说,有时我们会看到,工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表现出某种中立的态度。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呼吁书,提出了工会所应采取的、在我们顿巴斯并不是总能够落实的方针。相反,过去我们在顿巴斯却遭到一些基层工会组织的农民情绪浪潮的冲击,来到我们矿上的部分工人阶级的农民情绪并不是总能遇到工会领导机关的应有回击。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谈谈右倾危险的问题。我认为,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和歉收的乌克兰能最全面地反映出农村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果我们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去着手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巨大危险就会立即暴露出来。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同志即乌克兰共产党(布)的中央委员们跑遍了乌克兰的一些地区,请看一个对于许多区和乡即我们党的最基层机关来说比较典型的情况。这是波尔塔瓦区的一个乡。该乡有13名党员,其中有9名党员在苏维埃机关,另外4名党员,正像他们所说的,“分散在各处”。坐机关的这9名党员都干什么呢?他们大多在从事户籍登记、摊派之类的工作,一句话,在从事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并没有用自己的路线来对抗富农所开展的广泛的政治行动。这个乡粮食多,于是农村中较富裕的富农阶层都在从事“拉脚”的生意,他们把粮食运到饥荒较重的地区,而且他们的生意是不断进行的,他们把粮食运到那里,再转手倒卖。这样的富农有几个被追究了责任呢?有一个富农还在押往波尔塔瓦的途中被释放。可见实际上根本没有用我们的任何政治路线来对抗富农这一重大的政治行动,而且这些地方的党员们甚至认定根本什么都“做不到”。而这时在我们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规定的肉价大大高于零售价,也就是说,该人民委员部鼓励的不是卖粮,而是卖肉。在这种条件下,小资产

阶级掀起的这种浊浪在基层不断蔓延。如果接着对一部分来到顿巴斯的工人阶级进行分析,大家就会看到,类似的倾向我们那儿的基层也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倾向甚至有所发展,在我们党的个别机关中甚至还很严重。右倾的危险甚至常常不在于右倾分子建立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在于农村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众多,在于我们周围有看不见的泥潭,尤其是在基层,我们还面临着个别党员和苏维埃机关堕落的危险;因此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乌克兰这样的地区(由于歉收,这里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表现得最明显)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明显。在这方面要坚决斗争,无情打击,并要特别重视处境极其危险的我们的基层机关。

主席:现在请格里亚金斯基同志发言。

格里亚金斯基:农业落后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困难。因此我想在发言中谈谈我们在发展农业,尤其是在发展个体经济方面遇到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在讲话时明确强调必须把发展农业与国家工业化结合起来。我也认为,提纲中关于工业发展和工业化取决于农业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在四月全会上统计粮食收购的结果时,[我们首先认为,我们之所以出现失误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地将粮食收购这一经济任务与阶级任务联系起来,并在这方面犯了一些错误],全会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对富农的进攻因此应当在大多数农户进一步商品化的基础上进行”。²⁰⁷我认为,大多数农户商品化是我们应当极其认真地加以研究的问题,因为农户商品化在近几年意味着个体农户的商品化。无论怎么说,集体经济在我们产品的商品部分中所占的比重比个体经济所占的比重重要少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探索能在近几年里产生最大成果并与阶级路线紧密相连的路线。主要的困难就在这里,因为经验表明,随着个体农户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我们会遇到一定的矛盾,安采洛维奇同志在巡视斯摩棱斯克省时也谈到了这一点。那里存在的矛盾是:当我们使个体农户更加商品化后,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农户,他们得到发展后就会说,我们不让你搞合作化。在中部黑土地地区就有这样的现象,在那里采取的提高个体农户商品化的措施导致的结果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根本不想参加合作社的个体农户。因此,应该把发展个体农户的问题与引导他们走集体化道路紧密结合起来。在把个体农户商品化的任务作为最迫切的任务提出来时,我们应当争取使这一任务直接处于我们集体经济的影响之下。应该说,从这方面来讲,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是这种商品化的合格的组织者,它们的发展与个体农户的发展没有足够的联系。个体农户的发展与这些农户的机械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生产尽

可能多的农机具。而我认为,这是工业发展中的主要缺陷。在我们中部黑土地地区,在俄罗斯联邦乃至整个苏联的最落后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地区用得最多的工具是木犁。政府宣布的三年内取消木犁的任务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地区150万件初级耕作农具中有大约87.5万副木犁。若用铁犁替换木犁的话,我们每年就要向农户提供至少30万副铁犁。那么,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丘巴尔:用铁犁耕地可以比用木犁耕得多一些,也就是说,铁犁的数量可以少一些。

格里亚金斯基:那么就算20万副铁犁吧。那么,工业在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1928—1929年度计划生产168万副铁犁。应该说,各地区生产铁犁的工厂只能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中部黑土地地区也有这样一个工厂——奥廖尔铁犁厂。该厂因生产优质铁犁而获得一等奖。这个工厂证明可以生产质优价廉的铁犁。它是怎样发展自己的生产的呢?这个厂一班可生产15万副铁犁。即使把产量扩大到25万副,也要再加一班。这表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原料。

柯秀尔:小事一桩。

格里亚金斯基:说是小事儿,2500吨适合的型铁,柯秀尔同志,这是小事儿吗?

丘巴尔:那就采纳我关于瓦垅铁的建议吧,那样就会有金属了。

格里亚金斯基:那你们乌克兰就用瓦当房顶吧。

丘巴尔:你们那儿用铁做?这可不行!

格里亚金斯基:我们没有用铁,现在用的是秸秆。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们是这样对待再加一班的问题的:向领导递交了申请,跑到商业人民委员部去,请求把型铁从广大市场上撤下来。我认为,这无疑是错误的,这种对待在中部黑土地地区或者乌克兰把木犁换成铁犁的任务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在此要对关于保证这种生产和扩大这种能确保农户机械化的生产的问题稍加强调一下。我们中部黑土地地区的畜力相当不足:有40%的农民没有马。当然,我们不能每人发一匹马,但我们应该走农业拖拉机化的道路,用拖拉机、用农户合作化的相应措施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们今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试点工作。昨天卡明斯基讲了中部黑土地地区的情况。我们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只有4个地区用上了拖拉机,同时与11个地区的农民达成了可行性协议。农民们同意采取初级的合作联合形式,同意取消地界。不过我们不能把农民及个体农户希望采取相应的合作方法耕种土地的愿望与相应的

耕作工具对立起来。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经济纲领不太重视发展拖拉机厂的问题。我们现有的两个拖拉机厂在开工的第一年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尽管我们缺乏生铁,缺乏原材料,甚至缺乏资金,但假如我们想认真谈论农户正常的商品化以及向合作化过渡,有关建设更多拖拉机厂的问题无疑是当务之急。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在不止一次的中央全会上说,我们不能正确地将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广大个体农户引导到合作化道路上来。

瓦雷基斯:还应当在中部黑土地地区建一个拖拉机厂。

丘巴尔:最好把哈尔科夫拖拉机厂发展起来。

格里亚金斯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要发展,这我不反对,但我们面临的拖拉机厂问题已迫在眉睫,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农户商品化问题与农户的分散有关。尽管丘巴尔同志试图证明,分散是由于……

丘巴尔:我证明过,农户分散不仅仅是农业税造成的。

格里亚金斯基:我认为,农户分散问题使农户的商品化受到极大的打击。拿中部黑土地地区来说,尽管我们已经把一些农户联合成了集体,尽管我们正在把一定数量的农户联合成集体农庄,我们的农户数量还是从1925年的190.4万个发展到1927年的198.7万个。这对农户的商品化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从而使我们难以解决或者消除谷物业首先遇到的困难。毫无疑问,在这方面对农户分散有影响的不单单是农业税。但农业税会对一些农户的分散产生影响,因此提纲中正确地指出,我们要消除农业税的这种影响。今年农业税影响的主要是人口多的农户。无论怎么说,我们今年绝不能在免除35%的贫农的农业税后,再增加农业税。我们在征收农业税时必须相应增加一部分中农农户的农业税,因为我们不能在减免贫农的农业税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仅仅增加富农农户的农业税。因此,要增加一部分中农农户的农业税,不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但这种增加的负担大部分落到了人口多的农户即无疑是更商品化的农户身上,于是这些农户会观望,看看能否分家。我们应该实行阶级农业税,但对人口多的农户要给予减免,以防止这部分农户分家,因为我们无疑会在农户的商品化方面遭受损失。

提纲中还谈到了我们应作为加强农户发展经济潜力基础的刺激因素,提出革命法制就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认为,决议中的说法对有关革命法制的问题阐述得不清楚,或者至少可以说,现在这样提问题会产生混乱。为什么?因为目前在农村,在我们实行了规范的粮食收购办法之后,无论是从保障农户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保障对我们一部分苏维埃人、我们的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实行革命法

制的角度,都会提出革命法制的问题。我这里指的是个人恐怖浪潮即农村中目前存在的纵火及其他政治行动。²⁰⁸中部黑土地地区的局势突出地表明,我们必须在打击农村刑事犯罪的斗争中体现出革命法制。可我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执行的方针是对当场被抓住的人也一律赦免。地方上要严惩,中央却赦免,这就难以对富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农村实施的刑事犯罪给予打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更多地配合地方的工作,这样才能保障农村有相应的革命法制。

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还什么都没说呢。

格里亚斯基:给我时间的话,我现在就说。

柯秀尔:他们没有收购粮食。

格里亚斯基:既然斯大林同志说应当谈谈粮食收购问题,那就请允许我谈谈这方面的问题。粮食收购问题的提出无疑和去年这个时候的提法大致一样。粮食收购要求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我认为,这些措施现在应大力加强我们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我们绝不应该采取派特派员的方法,不应该采取我们过去使用的方法,哪怕有人试图这样做。上面派下来的特派员无疑会引导整个组织使用往年的方法而不去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我认为,现在粮食收购问题要求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在工作中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绝不是通过上面派特派员的办法,这只会搞乱并破坏我们粮食收购机关的正常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再谈谈与右倾斗争的问题。这里有一些同志要求政治局提交给我们的决议中多一些像金属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行业需要像金属一样的东西……

有人喊:军工行业。

格里亚斯基:但我认为,我们在我们的决议中所呼唤的像金属一样的东西应满足所有的要求:韧性、脆性、硬度,以使其始终保持自己的面貌。政治局就是这种像金属一样的东西。如果政治局交给我们一个一致通过的决议,那我认为,在这里讲这种话似乎不大合适。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党的一部分像金属一样的东西。

柯秀尔:怎么,不能批评吗?

格里亚斯基:可以批评,但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批评。我认为,像斯克雷普尼克同志那样试图拿决议做煎饼,像伊万诺夫同志那样试图做凉拌菜,都是错误的。

伊万诺夫:遗憾的是,凉拌菜已经做出来了。

格里亚斯基:伊万诺夫同志说,决议是这样的:我要什么,就在决议中读什么。我认为,伊万诺夫同志,您应该读一读决议中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主要方面。我也认为,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将是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假如不是这样,才能说是凉拌菜,但既然工业化的方针贯穿着整个决议,那就不该说什么凉拌菜了。

主席:现在请波斯特舍夫同志发言。

波斯特舍夫:如果从反映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工业化总路线的角度研究控制数字,我们应该说,这个总路线无疑在控制数字中得到了反映。

同时,我想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就是最正确地向地方拨付控制数字所规定的资金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控制数字规定的基本建设资金,在我看来,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正确的分配,因此地方上经常出乱子,往往是出了乱子才去解决,而这是非常困难的。不是托拉斯给地方添麻烦,就是地方上找托拉斯的麻烦。最主要的是,这对生产和工人的情绪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地方上制定工业财务计划,筹划基本建设工程,在需要时加以协调,这些工作都有工人参加,而后来一切又被推翻重来。

当然,我说的大都是针对托拉斯的。我不打算在这里谈狭隘的地方主义需要,更不想抱怨。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原则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涉及所有人。我们不妨以乌拉尔为例。卡巴科夫同志前不久和我谈过这一话题。我直截了当地说,在分配基本建设资金时,一些托拉斯执行了不太正确的政策。请允许我列举一组数字。哈尔科夫有一个很大的国营电工器材厂。

柯秀尔:你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他们不清楚!

波斯特舍夫:他们非常清楚!但这个厂的比重却逐年下降,下降的原因是,我再说一遍,是托拉斯方面对这个工厂执行了不太正确的政策。

丘巴尔:你说的是哪个托拉斯?

波斯特舍夫: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首先,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工厂在萎缩,交给工人们生产的是4 000多种型号的各种产品。此外,工人们苦于没有机会提高工作技能,工厂接的净是些小额订单,变成了托拉斯其他工厂的某种附属工厂。

有人喊:这有什么不好?

波斯特舍夫:有什么不好,我已经说过。不好是因为,工厂会因此而遭受很大的损失。

柯秀尔:这样一来谈不上任何生产率,成本极高,等等。

波斯特舍夫:我们提出了工厂专业化的问题,但下面这组数字说明哈尔科夫

国营电工器材厂在整个托拉斯中的比重下降：

1926—1927 年度	1927—1928 年度	1929 年
36.6%	34.0%	30%
对电力、电器和哈尔科夫国营电工器材厂等工厂来说：		
1925—1926 年度	1926—1927 年度	1927—1928 年度
53.5%	48.5%	46%
1928—1929 年度的基本建设工程：		
哈尔科夫国营电工器材厂：	186 万卢布	
电力：	52.8 万卢布	
电器：	99.5 万卢布	
哈尔科夫国营电工器材厂：	358 万卢布	

我们认为，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在过去几年里执行的是不太正确的政策。我们看到另一个大工厂——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大体上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与过去相比，金属工业总局对它的关注比过去多了些。但我不得不在这里说说这个工厂，因为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面临倒闭的危险。请看该厂的生产情况：

以 1925—1926 年度为 100 计算：

1926—1927 年度：	122.3
1927—1928 年度：	119.3
1928—1929 年度：	107.0

“Э”系列电气机车的成本：

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	83 954 卢布——100%
索尔莫沃机车制造厂.....	88 171 卢布——105%
布良斯克机车制造厂.....	91 479 卢布——109%

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给这个厂下拨基本建设资金，可现在我们有材料证明，按照五年计划，金属工业总局基本上使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的生产保持稳定并提供 150 辆“T”系列机车。我们打算投资 3 000 万对 300 辆机车进行改造。按照 1926—1927 年度的价格计算，工厂就可以提供 6 000 万卢布的产品，而不

是2 000万卢布。那么现在,1929年,该厂能提供什么呢?请看一组值得注意的各托拉斯生产和基建投资的数据:

	<u>机械制造厂联合总</u> <u>公司(托拉斯)²⁰⁹</u>	<u>列宁格勒</u>	<u>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u>
<u>生产计划:</u>	<u>93%</u>	<u>34%</u>	<u>108%</u>
<u>基建投资:</u>	<u>82%</u>	<u>45%</u>	<u>13%</u>

古比雪夫同志在报告中谈到基本建设工程的方针时指出,用于旧厂维修、扩建及改造的资金在减少。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当然无法否认。但同时对另一种情况也不能忽视,即一些有前途、产品畅销的赢利大厂也在走下坡路,不但无法进行大修,眼看着也要倒闭。我再说一遍,绝不能允许出现这种结果,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此应该加以关注。我再一次声明,哈尔科夫机车制造厂和哈尔科夫国营电工器材厂是哈尔科夫最大的政治基地,这两个工厂有大批熟练工人骨干,可现如今,一个厂走下坡路,另一个厂在萎缩。我提出的问题是,应该为更加正确地在我国经济的基本部门分配资金指明方向,这样就会避免目前仍然存在并给工人群众、各级苏维埃组织和各地党组织带来很多干扰的混乱和麻烦。我并没有提出托拉斯在资金分配上的这种错误政策只涉及哈尔科夫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乌拉尔的同志和在私下谈论这一问题的其他同志的意见。

至于提出的全部控制数字,那么我应该说,这些数字完全反映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业化总路线。我认为,这一部分不会使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产生疑义。

但我想谈的不是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围绕着我们党的这一总路线和我们党为落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工业化决议而确定的速度出现的一些倾向。不仅存在负面的情绪,而且还存在公开敌对的情绪。现在,这些敌对的情绪主要是在农村的富农中形成的。不仅富农中间,个别中农中也存在这种情绪。甚至某些与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团体和阶层中也存在这种负面的情绪。同时,如果说我们个别党员身上存在的即使不是阶级敌对情绪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是修正主义倾向的情绪。关于这些修正主义情绪不少同志在这里已经谈了很多,斯大林同志也就这一问题谈了很长时间,而且谈得非常清楚。但如果说起以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我亲自和许多工人进行过交谈,列宁格勒同志们中的一些中央委员也和我谈过这一问题),那么这些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是怎样看待党的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业化总路线和中央为落实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规定并在这些控制数字中反映出来的速度的呢?工人们是这么说的:党提出的工业化政策、工业化速度是完全正确的。工人们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许多事情,我们也非常清楚,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当然要付出代价,就像在供应问题上一样,城市和农村都会出现缺陷、漏洞和困难。工人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工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甚至同那部分与农村有联系并且不同意工业化速度的工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如果说起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真正的无产者、无产阶级的基本骨干,那么工人们无疑是完完全全地赞成我们党的国家工业化路线的,他们不仅赞成而且还将和党一起彻底捍卫这一路线。

党在对右倾、右倾分子、右倾分子在工业化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时,捍卫工业化的问题也是工人阶级(他们并未袖手旁观)与右倾斗争的主要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是十分相信我们全党和党中央的。

即使在非党工人那里,右倾分子在工厂中流露出的任何企图,任何孟什维主义的情绪都会遭到一致的回击。现在一线党员工人与非党工人结成统一战线去捍卫党的路线并与右倾进行斗争。应该更加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不但要向党提出来,还要向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提出来。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李可夫同志的报告。我认为,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尤其是报告中关于右倾的那一部分写得不清楚。尽管斯大林同志说批评家是书呆子,但我认为,绝大多数进行批评的同志,确切地说,除极个别人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出了李可夫同志报告中这处不清楚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中显然没提到斯大林同志、党员群众乃至全党表现出的明确态度,我们应在这里指出这一点。

如何更正确地表述李可夫同志报告中不清楚的地方,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说,因为许多同志,最主要的是斯大林同志,已经就这一问题作了正确而明确的表述,我们党提出了非常正确、非常明确、有战斗精神的列宁主义的重要表述。

我们何必在这里冥思苦想呢?每个基层组织、各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联合基层组织会议都已经对右倾和与右倾作最重要斗争的必要性作了正确的表述。我们党的主要核心中央委员会不能忽略、漠视我们党作出的表述,要全面接受这一表述。

现在谈谈有关控制数字的决议。不能说决议一无是处,决议还是全面地反映了工业化总路线,但是需要和应当对决议作一些修改和补充。第一点补充是:应该对关于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组织发出的呼吁书的决议的个别要点明确表

态。²¹⁰如果全会无视这份呼吁书,那么对党来说这是无法理解的。应该在决议中表明,中央全会赞成这份呼吁书,认为它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或者说不赞同。我再说一遍,假如全会无视这份文件,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并会引起全党的疑惑。因此,要在决议中补充这样一点:中央全会完全赞同向莫斯科组织所发出的呼吁书。

我还想指出一点。决议中谈到有关在两条战线斗争的地方应该补充一点,即右倾也非常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洛米纳泽同志已经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与右倾分子一唱一和的。我对洛米纳泽同志的说明再作一下补充,社会民主党人向右派保证,说他们不只是会得到自己人的支持,他们公然声称,苏维埃俄罗斯的各个阶层,其中包括他们社会民主党人,都会支持右倾。因此应该说,右倾也非常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我再说一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席:现在休息。休息后发言的是:弗鲁姆金同志、沙茨金同志和茹柯夫同志。

(休息后)

主席:现在继续开会。请弗鲁姆金同志发言,然后是沙茨金同志。

弗鲁姆金:我知道,斯大林同志肯定会把弗鲁姆金选出来当靶子的(笑声),然而到现在为止,这是唯一的右派的名字。当然,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如果是为了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不能斤斤计较。(笑声)假如我确信我的“信”会附在速记记录后面,假如可以把我在“信”中所说的东西和斯大林有关我的讲话相比较,我是不会发言的。但由于我没有把握,所以我认为,为全会速记记录的读者着想,必须把在我看来斯大林同志理解错的一些地方反映出来。

斯大林同志硬说我要求或赞同富农农户的自由发展。应该说明的是,我没有速记记录,但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富农农户的自由发展会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自由发展,也必然会使那些资本主义分子的权利扩大。接着斯大林同志问道:如果提出这样的纲领,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谈得上向富农进攻呢?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速记记录,但我觉得我不会弄错。如果强加于我的那些东西属实的话,我认为,就不应该只是给我作出组织结论,撤销某个职务。应该把我开除出党。

有人喊:谈谈衰退问题吧。

弗鲁姆金:同志们,别急,有时间的话,我会谈这个问题的。1928—1929年

度能提出推广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吗？这些倾向是不应该在党内存在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糟糕了，但我不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如何得出这种结论的。我的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我不知道，他是在哪儿找到的。我不得不哪怕是扼要地援引一下涉及这一指责的地方。

有人喊：第26和27页。

弗鲁姆金：我这份是自己的，不是中央的。（笑声）

我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应该通过减少富农的积累、增加税收、使中农和贫农摆脱富农的经济（乃至政治）影响来同富农进行斗争，我们不应该用自己有限的贷款来支持富农，但我们不应该‘剥夺富农的财产’，消灭我们在若干年内仍然需要的富农经济和富农生产。”²¹¹

我在第二封信中根据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写道：

“无论如何都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值和商品率。工业的发展乃至整个苏联的全部工作均取决于这一点。完成这一指令性任务的主要方针是吸引广大的中农和贫农农户以及社会化经济成分。近期还必须吸引一些富裕群体，其中包括富农群体参与这一任务的完成。”²¹²

接下来是第九点：

“要把贫农这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靠支柱系统地组织起来，要将富裕中农和富农区别开来，不要害怕富裕中农经济的加强，要巩固与中农的联盟，要通过使贫农和中农摆脱富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利用税收减少富农的积累、与奴役性剥削作斗争的方式向富农进攻，绝不能让富农进入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但是要给予他们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目前还需要富农经济。”²¹³

我不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如何在这些地方找到“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自由发展”的？我根本没有提发展问题，至少没有提过什么自由。我说的是，必须利用现有的（富农）农户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发展工业化，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是否说错了，我一会儿再谈。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把这一点与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自由发展联系起来。的确，说与奴役性剥削作斗争，斯大林同志不满意。不但有奴役性剥削，还有“进步性”剥削。奴役性剥削指的是通过放高利贷、借粮、借工具以及旧时的土地出租等方式进行剥削。这些剥削方式是奴役性剥削方式。至于“进步性”剥削方式，既然斯大林同志举了农场主的例子，那就是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斯大林：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下，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

弗鲁姆金:是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条件下。除了奴役性剥削,还有其他剥削方式。说得一点儿不错。哪些剥削方式呢?雇佣劳动。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在关于与富农作斗争这一条中谈雇佣劳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富农。米柳亭同志能证实,有40%的雇农为中农农户做工。因此,应当把关于剥削劳动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任何地方、在各类农户中保护雇佣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应该仅仅在富农农户中保护劳动,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最革命的一条。可是在条件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富农农户更好的中农农户中呢?如果我们说的是其他的剥削方式,那么这些方式应该全面保护农业中首先是个体农户中的雇佣劳动的利益。我认为,这一条不应该引起对我的这种态度。

我们正在向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私营企业主发起进攻。我们是怎样发动进攻的呢?我们是通过发展工业发起进攻的,同时对小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进行排挤、巩固合作社、与商业资本作斗争的形式发起进攻的。

我们有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这些指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组织能力和物质能力来排挤它(私营企业主)。你们以为这次全会可能会决定,应该帮助小手工业生产,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行政手段去排挤它。这是些什么企业呢?小型资本主义企业?是的。但既然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企业,我们就要努力将这些小企业的工作纳入一定的轨道。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至少应容忍这些小企业的存在。米高扬同志前不久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有关私营商业的草案;其实,他的草案并没有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作什么修改和补充。他为什么提出这个草案呢?他显然是认为,以前的过火行为是有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合作社没能完全取代被排挤的私营企业主。

我们对农村也应该使用这个标准。我说的是,我们暂时还需要富裕的富农农户。为什么这么说呢?上星期我去了下伏尔加州普加乔夫区。这个地区土地资源丰富,有的农户的播种面积达100俄亩,有些农户的自有土地加上租赁的土地,达300—350俄亩。几乎所有的农户都租赁10—15俄亩用作草场,甚至中农也是这样。有2匹马、6俄亩庄稼的农户算是贫农农户。这些贫农农户大多不上缴农业税。这个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农户……

哈塔耶维奇:这是夸大其词。有2匹马的贫农这个地区就没有。

弗鲁姆金:夸大其词?您要是愿意,我可以说出名字来。收入为350—450卢布的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全免。叶尔绍夫区有53%的贫农免税,而杰尔加奇区有45%—48%的贫农免税,准确的数字我说不上来。在这里我们应该和谁作斗争呢?我们应该把矛头对准这些大的富农农户,其实就是地主。但是如

果我们限制富农农户耕种土地,哪怕是减少出租国家基金土地,贫农和中农也不会耕种富农让出来的土地,因为他们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失去一定数量的谷物产品。这种危险不仅存在于普加乔夫一个地区。我们都知道,西伯利亚有一些农户去年本应运出13 000普特小麦,但我不知道,他们运没运出来。有些农户有6 000—8 000普特的商品粮。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帮助贫农去耕种富农的土地。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主席铃响)请再给我点时间,我争取尽快讲完。

有人喊:让他接着讲,接着讲!

主席:您需要多长时间?

弗鲁姆金:给我15分钟。

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富农农户进行生产活动,或是由于害怕他们的阶级影响而不允许,应该谈谈这个问题,并且应当清楚明了地指出我们所面临的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缺粮,有些地方甚至没粮,第二种危险是富农分子及其对贫农和中农的影响。我充分认识到这两种危险,我还没有幼稚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地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成了“正常”情况了:在弗拉基米尔省、斯摩棱斯克省以及普斯科夫省的部分地区和一些粮食消费地区,一普特燕麦面粉已经卖到6—7卢布。谁会以这个价格买燕麦面呢?贫农、中农和富农自己都有粮食。当贫农和中农花6—7个卢布去买粮食时,他们中间会产生怎样的情绪呢?我们在哪里损失得多,哪里的危险就越大:是要我们应该并能够与之作斗争的富农生产者,还是要贫农和中农按这种价格去买粮食呢?根据埃斯蒙特同志的材料,每天从莫斯科仅仅通过铁路就运出10 000—15 000普特的烤面包,这绝不是偶然的。农民在莫斯科购买烤面包,再运到农村去。我们面临上述两个危险,我们还面临粮食消费地区粮食日益不足的危险(我们今天还听说,甚至顿巴斯也存在一些困难,尽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而且5、6月份全苏联的城市都将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估量一下这些危险的分量。哪个危险更大?哪个更容易克服,是农村的富农危险,还是由于粮食短缺引发的情绪?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时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弗鲁姆金同志,您这是怎么管理国家的,丰收了却没有粮食?”这种评价当然不是针对弗鲁姆金的活动,不是针对弗鲁姆金一个人的活动,而是针对政府和党的活动的。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每一百万普特粮食都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加强。哪个危险我们更容易克服:是农村的富农分子,还是粮食短缺引发的情绪?

古谢夫:您从富农那里能得到粮食吗?

弗鲁姆金：我们从富农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粮食，这一点我们会单独谈。我们掌握着一些材料，也许不太准确。我们以农业税全面核算材料为例。“最富裕的富农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17%。他们的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12.4%。他们参与生产的商品粮大约占20%，可以提供1.2亿、1.3亿、1.4亿普特的粮食。假定这一上层群体的粮食产量由于我们采取的措施下降20%，商品率下降25%，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将要损失3000万—3500万普特的商品粮。当然，在一般情况下，3000万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算不了什么，但是在目前条件下，3000万普特可以解决许多粮食消费地区、木材采运地区和城市的供应问题，可以解决粮食进出口方面的外汇问题，假如一旦面临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损失3000万普特的粮食，我们将会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如果我们将粮食不足的困难和我们在农村所面临的富农危险加以比较的话，那么粮食困难的分量更大。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当然不是我们七年前，甚或三年前所面临的情况。尽管现在困难重重，但我们远比从前更强大，对富农施压的手段比从前更多。

什维尔尼克：但我们现在还是得不到粮食。

弗鲁姆金：同志们给我指出过……

有人喊：富农越富，他们的阶级敌对情绪就越强。

弗鲁姆金：同志们对我说，许多富农可能因为担心再次实行第107条²¹⁴，他们不但会把粮食运走，还会索要收据。有一个叫索罗金的富农从普加乔夫专区叶尔绍夫区运走了11车皮的麦子。也许，富农中20%的商品粮我们得不到，所以必须要施加压力。

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粮食供应问题，事情就会非常糟糕。我再说一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危险：是粮食短缺还是富农危险？然后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卡明斯基同志昨天说，明年他给集体农庄分配1亿普特的粮食。那位似乎没有右倾嫌疑的安德烈耶夫同志甩给他一句：“你这是撒谎。”可是，假如我们从集体农庄得到的不是1亿普特，而是5000万普特怎么办。我们不能坐等我们在最近的将来，3—5年后才能得到的粮食。我们现在，也就是今年和明年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身陷这种困境不能自拔的话，我们可以让富农进行经营；同时要减少富农的积累，这是直接的进攻，还要通过间接的方式在其他方面进攻，例如加强现在受富农剥削的农户以及我们提供贷款的贫农和中农农户，还要走加强集体农庄的道路。

关于集体农庄我再说两句。斯大林同志引用我的话说，似乎我说过这样一

点:不要扶植集体农庄,而是要对走集体农庄道路的贫农加以组织和帮助。这第一部分——“不要扶植集体农庄”,我没有说过。我写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投入的相当一部分扶贫资金并没有用到生产需求上,而是用到了消费需求上。既然我们想把这些资金用到生产需求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钱通过集体农庄提供给参加集体农庄的贫农,就会更有保障。这是我写这点的意义。我们应当少给个体贫农农户钱,而要更多地吸引他们参加集体农庄,那样的话,资金就会更多地用于生产。我没有反对集体农庄的意思,第二封信中也没有。

关于农业衰退的问题。有人对我说:那你就谈谈衰退的问题吧。我说过:“……停滞无异于衰退。”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只要认真读一读政治局提交给本次全会成员的决议,把有关农业状况的所有段落和章节都收集到一起,你们就会看到停滞的局面。我不知道,从我国对外形势的角度来看,这份决议能否这样付印。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决议承认,西欧资本主义报刊关于我们、关于我国农业和粮食困难的报道是正确的。决议的个别地方集中谈了农业极其困难的状况,谈了农业的极度落后和停滞状态。不能只是列举农具和优良品种数量的增加,问题在于四年中播种面积仅增加了7%,这是鸭子走路的速度,这一速度甚至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慢。关于产量的争论可能上下只差百分之零点五,尽管我们向农村投入的生产工具比革命前多得多,但在四年的时间里没有取得进展。目前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应该在全会上指出这一点。决议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我的信是在政治局制定决议草案之前写的。只要认真地读一读决议,把有关农业的所有地方都收集到一起,你们就会看到,这个评价意味着什么。

苏霍姆林:这么说,决议是根据您的信写出来的了?

弗鲁姆金: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工业拨款的。斯大林同志指责我,说我提出了(的确提出了)6.5亿的工业预算,而政治局通过的预算是8亿。我认为,我们用投入的卢布数量来衡量对待工业化速度的态度是不好的。应该用这种情况下可能取得的建设成果的物资数量进行衡量。在基本建设方面我并没有差1.5亿。我不想用财政人民委员部也持这种意见的部门盾牌来掩饰,我是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之一,而财政人民委员部也持这种意见。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基本建设预算是15.8亿卢布,先是批准了16.47亿卢布,后来批准了16.59亿卢布。难道16亿卢布中的6000万卢布就能决定工业化的速度吗?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谁也不会指责我,说我反对冶金业、支持纺织业。我认为,在座的同志们以及研究控制数字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们会证实,我们在冶

金业上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同的是,我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张追加200万卢布。我坚持削减纺织工业并不是因为我与轻工业为敌,想赢得左的名声,而是因为限制轻工业的不是设备,而是原料,今年和明年都将是如此。我坚持最小的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数字是他们自己后来削减的。我赞成削减化学工业,不是因为不需要化学工业,而是因为化学工业的计划是1.25亿卢布,可是如果还没有成立大型企业的计划,这种计划将很难实现,我们也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是需要多还是少2000万或3000万的话,难道这能够解决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吗?难道重要的观点取决于此吗?这完全是小事一桩。我们不能这样看待问题。许多人在这里谈到可能性和紧张问题。我也想再说一下,尽管关于这一点以及紧张问题许多同志都谈了不少。是的,在我看来,紧张要有一定的限度。我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写道,应当考虑储备问题,其实这也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没有储备,这一点大家很清楚,李可夫同志也说过这一点,我们没有我们所需要的最大计划限度的外汇储备和原料储备。甚至少量的储备目前对我们来说都有着重大意义。对我们来说,3000万外汇在三年前简直算不了什么,可现在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难道能用3000万卢布来衡量对待工业化速度的态度吗?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坚持这样一点,要尽全力使储备问题、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储备问题得到解决,要尽最大努力发展工业化。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同志们指责我,说我害怕了,吓坏了,还吓唬别人。我可以不在乎那些说我吓坏了的无稽之谈,但我的确是有些担忧。计划中的许多问题都令人担忧。我们所有的人,每个工作人员,不论是专职党务工作者,还是经济工作者,在读这份决议时都有这种忧虑,为了顺利地完成我们的计划,这种忧虑是不应减弱的。

主席:现在请沙茨金同志发言。

沙茨金:弗鲁姆金同志试图在发言中证明,他的“不要阻止富农发展”的口号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毫无共同之处。他说,这仅仅是我们党不打算剥夺富农财产的方针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的证明毫无根据。不剥夺富农的财产,意味着不要利用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富农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阻止富农的发展。因为我们在税收、信贷、机器供应等方面的全部阶级政策,以及我们在直接加强和扶植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全部工作都会阻止富农的自由发展,阻止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全部生产能力的发展。二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向富农进攻即排挤富农的口号,或者

是“不要阻止富农发展”的口号,因为把逐步排挤富农的任务和“不要阻止富农发展”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互相矛盾的两条路线,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弗鲁姆金同志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哪个危险更大,我们情愿面临哪个危险,是来自富农的危险还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因此他说要有所选择。党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的。党提出的问题是,必须既排挤富农,又得到粮食。党在粮食问题上不是寄希望于发展富农经济,而是寄希望于发展贫农和中农农户,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大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我们就不能积累必要的机动储备,有了这些储备,我们才能够在利用其他经济政策杠杆的同时对富农施加压力,让富农给我们提供粮食。如果采取弗鲁姆金同志宣传的政策,我们可就真的得不到粮食了。

弗鲁姆金同志在这里谈到了富农经济中的奴役性的和进步性因素问题。斯大林同志谈富农经济中的奴役性和进步性因素时所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至于提到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把富农经济赖以生存的任何剥削分子说成是进步的。在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整个富农经济,富农经济的各个部分,农村中的整个富农阶层,国内的所有资本主义分子都不是进步分子,而是反动分子。我们的任务不是不去阻止这些成分的发展,而是相反,即利用各种经济和政治措施,不是在剥夺富农财产的基础上,而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这些成分排挤出去,代之以社会主义成分。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

弗鲁姆金同志试图在这里证实,他的提纲中没有任何内容能证明他主张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证明他的阶级路线不够明确。他只不过是忘记引用他在第一封信中写过并在第二封信中加以重申的那句著名的话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粮食,那么这些粮食来自哪些群体就是无关紧要的。不,同志们,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国农村走哪条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我们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

几年前,当路标转换派拥有自己的杂志时²¹⁵,他们也提出了弗鲁姆金关于发展某些“非党”生产力的理论。只要国家富裕了,只要有了粮食,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并不重要,等等。这个似乎客观的生产力理论的根源在司徒卢威那里,列宁当时与司徒卢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论战时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我们这个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也是阶级社会——生产力总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受某个阶级的“支配”²¹⁶。当然,如果放弃这些生产力发展的阶级形式,我们就不

能保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我们就不能坚定执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

弗鲁姆金同志还试图在这里为他在工业资金使用问题上的观点辩护,他的具体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求比政治局建议的速度稍稍慢一些,要求大大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他还说,我们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不能用钱,而要用生产的物质要素来衡量。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之一,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说出这种低估资金作用的话令人吃惊。我认为,我们现在说的不仅是生产的物质要素,而且是市场关系,也就是资金。在我们的现行制度下,没有资金,这些物质要素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关于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与资金的分配有着最紧密的、最直接的联系,凡是建议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1亿或1.5亿卢布的人,实际上就是建议降低工业化速度,就是建议修改我们党的总路线。

我认为,企图在这里对自己的信进行论证并加以辩解的弗鲁姆金同志发言之后,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未必会有人推举弗鲁姆金同志进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有人喊[乌加洛夫]:难道他提出过请求吗?

柯秀尔:于是推举他当区委书记。

沙茨金:我认为,在主要是反对右倾的思想斗争阶段,就是区委书记也未必会推举弗鲁姆金同志去当。

在弗鲁姆金同志发言后必须一再强调指出,决议必须旗帜鲜明,这恰恰是由于右倾日渐形成,恰恰是由于,右倾日渐分明地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做到旗帜鲜明,因此,我同意那些认为决议必须旗帜鲜明的“书呆子”的意见。

喊声:对。

沙茨金:我们所有参加全会的人几乎都成了“书呆子”,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大家都感到,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反右倾阶段,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模糊不清,对于正确引导党员和工人群众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正像洛米纳泽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因为我们一部分领导同志至少是没有(可能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但过去没搞清楚)完全搞清楚这些基本问题。我认为,在布哈林同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出版后,必须在决议中讲清这个问题,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打着反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社会分配理论的幌子,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抹杀关于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并论证了基本建设缩小的趋势。我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决议²¹⁷的主要之点在于,有人企图打着批评西尔伯曼同志(这个人我不了解,他是什么人

我们也不感兴趣)不妥当说法的名义,把党的观点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这样的决议发表后,如果我们想正确地为我党指明方向,决议中就不允许有任何不清楚的问题,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困难,出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内存在着右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动摇情绪。我认为,在李可夫同志作报告之后,我们的决议中不应该有任何模糊不清之处,他在这里对左右倾之间的界线作了不正确的界定并企图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宽容我们党内的右倾的观点辩护。

我们应该在这份决议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关于这一点要说得清清楚楚。否则,全会就不能向全党公布这份决议。应当在决议中对右倾本身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决议中除了没有提,比如说,洛米纳泽同志说的内容外,也没有提所谓经常地、不断地向富农让步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实质是,只要中农向富农方面摇摆,我们就必须立即让步,说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关键所在,等等。这就是右倾,这就是右倾观点的主要部分,应当在决议中指出这一点。还应当指出关于宽容各种偏离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倾向的理论,曼德尔施塔姆同志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理论作了阐述。²¹⁸当然,他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这已经刊登在党的刊物上了。右倾与托洛茨基的左倾在这一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大家都知道,把党看成是各种倾向、团体等的总和及联盟是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们必须在决议中更清楚地指出调和主义,不仅要指出“对他们的调和主义”,还要指出“对它”、对右倾危险的调和主义。当然,必须同时与对右倾和左倾的调和主义作斗争。谁不懂得我们现在应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谁就不懂得党的路线。但既然右倾是主要的危险,既然对右倾揭露得不够,既然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揭露得不够,那就应该突出强调对右倾危险的调和主义进行斗争。

决议中还应该谈莫斯科组织的问题。中央全会是在莫斯科组织从下到上振奋起来之后召开的,当时该组织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发生了令全党关注的事件。中央全会不能不对普通党员和莫斯科的积极分子在这起事件中的表现大加称赞。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此加以表达。也许,同志们会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莫斯科各区区委书记的改选活动是令人满意的”(笑声),或者用一个另外的说法。但对这个问题绝不能避而不谈。

说现阶段反右倾斗争的重心是思想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认为,全会不能不指出,在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只要右倾分子顽固不化,只要他们不想承认错误,只要他们反对党和党的决定,也不排除采取组织措施的可能。斯大林同

志问我,莫斯科组织中哪里有右倾分子。我认为,如果说的是莫斯科组织以前的领导,那么在这里应当谈的是调和派分子,而不是谈右倾分子,也许不应该谈彻头彻尾的调和派分子,而应该谈改邪归正的调和派分子……

柯秀尔:正在改邪归正的调和派分子。

沙茨金: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改到了什么程度,也许已经改过来了。但至少近两个月,在最近一次莫斯科全会之前,莫斯科组织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

乌格拉诺夫:奇怪,你过去怎么没说过这一点,你可是个大理论家啊。

沙茨金:当时你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说出来,让他们改正,因为你曾是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嘛。(笑声)

有人喊:现在还是领导人呢。

沙茨金:乌格拉诺夫现在是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但他过去也是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如果斯大林同志要求直接指出莫斯科组织的右倾言论,那我起码要说说利亚多夫同志的发言,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报刊上与他进行过论战。²¹⁹难道斯大林同志会否认,被斯大林同志本人称作“农民的哲学”的不断向中农让步的理论²²⁰不是右倾?我认为,“农民的哲学”从来都不是列宁主义,而鼓吹这一哲学过去和现在都是偏离列宁主义的右倾。

我就要讲完了。不算与偏离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作斗争,还有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方面要讲清楚的是,农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归根结底是工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发展。决议中这一点讲得不十分清楚。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对阶级力量对比的评价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尽管决议中的最后一点谈到了倾向问题,谈到了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谈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但对经济形势的整个分析没有反映出对当前形势的这个基本评价。决议要在这方面进行修改。第三个基本问题是集体化问题,是集体化与个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决议中重点提得不对,至少是说不清楚。这些问题必须讲清楚。

在第四个问题即倾向问题上,决议要作重大修改,因为正像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右倾正日益加强,反对右倾的斗争尚未结束,这场斗争将要继续下去。我们要动员群众参加这场斗争。如果我们真想动员群众,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份不会遭到任何曲解的决议,一份完全能成为反右倾斗争的真正坚实基础²²¹的决议。(鼓掌)

[乌格拉诺夫(嘲讽地):掌声真热烈啊。]

主席：现在请茹柯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苏利莫夫。

茹柯夫：我想谈谈决议中最能成为我们的现实任务的部分。这就是我国工业发展和与工业发展有关的那些任务的问题。

如果简要分析一下去年的工作和今年计划做的工作，那么，尤其是对我们列宁格勒的工业来说，任务是不轻的。去年，列宁格勒的工业实现了大约31%多一点的增长，按照计划，今年（如果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全苏的产品和产量增长大约17%的话）我们的增长率大约是30%—31%，当然，要在工资相应增长约6.8%—7%和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由于预计我们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大大超过其他地区，那么在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在生产率计划提高12%—13%、而全苏联的生产率提高15%的情况下，尽管有其他的任务，但最重要的任务是降低成本的任务。如果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并简单概括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话，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并不轻松。你们知道，我们全州今年因为天气不好出现了大面积歉收。因此我们的食品供应情况比去年差。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燕麦还在田里呢。

有人喊〔丘巴尔〕：还绿吗？

茹柯夫：还绿，但还没有收割，已经没什么用了。大部分马铃薯也死了，饲料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所以说和去年相比，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这就是说，为了保持这个速度，为了完成我们接到的降低成本方面的指示，为了实际贯彻这个指示，我们必须在粮食供应，尤其是原料供应方面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我在这里要简要地说说原料问题。既然许多在这里发言的同志都谈到我们的各种原料，其中包括钢材原料短缺的问题，那我们大概首先就要面临这些困难，因为，既然钢材是在乌克兰和乌拉尔进行加工，那么他们自然会首先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我们将遇到最大的困难。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应该使我们面临的任务——不仅我们的工业要增长31%—32%，而且要降低成本——变得现实一些。

丘巴尔：那你们要降低多少成本？

茹柯夫：我说了，降低31%—32%。

丘巴尔：成本要降低多少？

茹柯夫：我也说了，降低7%。

丘巴尔：不多，我们要降低7.7%呢。

茹柯夫：我还想谈谈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些困难。如果拿党在当时提出的自我批评这个绝对正确、绝对令人信服的口号来说，它在一些地方已经扭曲变

形,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扭曲变形,由于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纪律已经大大松弛。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组织把这个问题作为迫切的问题提了出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将尽一切努力来纠正纪律方面的这些问题。

有鉴于此,我想谈一个在报告中以及同志们在本次全会上的发言中谈得不够的问题,这就是新产业的问题。依我之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保持应有的速度,也没有执行更快、更明确的路线。我们随便举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缺皮革,缺油脂,缺羊毛等等,许多东西都缺。可我们又不善于用其他东西、其他什么代用品来代替这些东西,我们这方面非常差……

有人喊[米高扬]:说得对。

茹柯夫:如果我们生产更多的人造丝绸,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发展国外已有的人造毛生产,有什么不好;如果我们用人造鞋底、用各种替代物、用压制成型的纸板或消耗橡胶极少的人造橡胶来代替皮革的话,有什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进展不大。应该加紧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计划迟迟不能完成,时间拖得太长。因此,要把大力发展速度滞后的新产业作为工业的主要任务提出来。因此,我们要真正地在行动上落实我们关于吸引国外技术、把我们的人派到国外并把国外的人吸引到我们国家来服务于这项事业的全部决议。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说过很多,写过很多,但实际上这个事业仍无起色。结果是,我们在建立新产业方面落在了后面。

我认为,在斯大林同志谈过右倾和左倾问题之后,已没有必要对此加以补充、充实了。我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提法。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列宁格勒的工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还没有薄弱到可以受任何倾向摆布的地步。在我看来,他们对于必须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即不仅要反对右倾而且要反对左倾的认识不亚于我们中的任何人。

我还要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地方和中央在经济战线上的工作。我们应该比今天更快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多依靠一些地方,多给地方提供一些机会和权利,以使我们面临的任务能够切实地、真正地得以完成,而不是仅仅一致通过一些决议。我们这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完全赞同这项决议,认为它是正确的,但有时却忽略了我们所通过的东西。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地向我们存在问题的地方和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施压,无论如何要消除这些偏差,以承担起向我们提出的增加产量、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工作质量的任务。

主席:现在请苏利莫夫同志发言,下一个是卡巴科夫同志。

苏利莫夫:尽管斯大林同志作了极其详尽的解释,但我认为,控制数字提纲

仍需作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提纲对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坚持的立场会表达得更明确。我不准备说这个一般性的题目,我认为利用给我的这几分钟谈谈交通问题更合适。我认为控制数字提纲的一个大缺陷是根本没有讲清楚交通问题。

有人喊[米高扬]:说得对!

苏利莫夫:控制数字提纲关于交通问题的论述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我们满意,因为提纲中除了提出交通网络运营里程及货运量增加外,没有对交通现状作任何评价,就不用说工业和交通都需要指令了。总之,控制数字对于交通来说意味着一切。我们的全部预算、全部政策都依靠控制数字,因此我认为,控制数字避而不谈交通这个占国家全部预算八分之一²²¹的极其重要的部门是重大的疏忽。提纲以及李可夫同志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的报告均只字未提交通问题。古比雪夫同志理应该谈谈工业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在所有中央委员都收到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出版的《控制数字》这本小册子里有这么一个地方,说在目前这个经济年度,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交通并不是薄弱环节。我记得,一些人写过这个问题,一些人在政府机关讨论预算和控制数字时也不止一次谈过这个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默认。我担心,交通方面的状况日后会给我们敲起警钟。不能同意那个认为交通现在还不是薄弱环节的提纲。我们今年在粮食运输方面遇到的困难,尤其是我面对所有地方组织,特别是州级组织,在新的铁路建设及其他交通问题上所要承受的巨大压力,提纲倒是提了一下。

事实上,今年只要在各地之间对收获的粮食稍加调整,我们的交通就会面临巨大威胁。总之,我们苏联整个东部地区交通网的发展非常薄弱,从经济需求的观点来看,铁路交通网络相当不足,更不用说其他交通种类了。例如,与战前相比,水运比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任何一个部门都要落后。只要指出,我们的蒸汽船队的载重量只有1913年的42%,非蒸汽船队的载重量只有22.5%,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水运甚至是运输部门中最落后的部门。

[米高扬:说得对。]

苏利莫夫:当然,如果不算无轨交通的话,只是从今年起,无轨交通才以规范而务实的面貌出现在国家、百姓、尤其是农民的面前。尽管我们今年在无轨交通方面的拨款有大幅度的增加,但与对这种交通的需求相比,这笔款项还是杯水车薪。交通问题不仅在西伯利亚,而且在整个东部地区都相当突出。

丘巴尔:那在乌克兰呢?

苏利莫夫:乌克兰的交通当然也需要相当大的投资,但乌克兰目前的情况不

像其他一些地区那样迫切。请看看这种情况：梁赞—乌拉尔铁路是我国最重要的干线，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得到建设伏尔加河大桥的拨款。现在，大量的粮食储备都集中在那里，我们常常被困在萨拉托夫的伏尔加河渡口。萨拉托夫成了整个这段时间通过能力的瓶颈。

有人喊：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呢？

苏利莫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问题要和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工程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大概应先于其他交通问题。

我们接着说。卡巴科夫同志大概将要在这里证明，他们那里的交通问题有多么尖锐。建成像马格尼特这样的铁路支线，——今年这条支线要投入200万卢布，因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将在几年后建成。不过据我对乌拉尔冶金业的了解，它（冶金业）今年已经打算从马格尼特山向其目前已开工的厂子运矿石了，不这样的话，就用不着建支线了，而用200万卢布这条支线是建不成的。所以说，我们今年的交通计划与冶金业的计划明显不协调。我在这里指出的是比较常见的事实，但这些事实表明，我们今年在交通问题上有许多薄弱的地方，因此认为交通不是薄弱环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观点。

遗憾的是，由此得出的是一些具体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在确定交通方面的控制数字和预算时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方面。即使从交通的内部组织状况来看，党也应该对交通予以特别的关注……

柯秀尔：说得对。

苏利莫夫：我想以此来指出，我们的经济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党和苏维埃机关在近五年里对交通问题的研究比对国民经济任何一个部门的研究都要少，因此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将铁路网与正在实施的全苏区域划分结合起来。我们目前在这方面什么都没做。各州在制定本州经济计划时常常碰到我们的铁路网界线不协调的情况，这给地方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无疑，交通业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柯秀尔：说得对。

苏利莫夫：提纲必须把这个问题作为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今年就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交通的改造情况怎么样？我只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中援引一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1927—1928年间，在铁路运输工作的改造和合理

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对此我只能说：说得太客气了。应说得更尖锐、更果断，因为交通业现在大大落后于其他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落后的正是该部门的合理化和改造方面。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所有巨额支出，当然是我们近几年的巨额支出，几乎都具有恢复性质。直到今年我们才打算在合理化和技术改造的支出方面迈出一小步。

柯秀尔：这就不完全对了。

苏利莫夫：不，这是对的。每个与铁路打交道的人都能证实这一点。

有人喊：水运的情况就更糟糕了。

苏利莫夫：相当一部分基建投资用到哪儿去了？我们换了枕木和铁轨。

柯秀尔：那你就不算新机车了？

苏利莫夫：当然要算，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把旧机车换成了新机车，而是生产出了功率更大、装备有蒸汽过热器和水过热器的机车，所以在重建机车库的同时还进行了改造。但现在说的毕竟不是这一点。要把改造理解为对我国经济的重建，这样的重建能够为交通创造新的技术基础，能够建立自动闭塞系统、自动信号系统和自动扳道岔系统。

柯秀尔：还有新型机车、重型铁轨。

苏利莫夫：当然，这也是改造的一部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性支出……(主席铃响)

喊声：让他继续说，说说水运的问题。

苏利莫夫：我尽量不耽误你们的时间，我需要10分钟。

谈谈改造问题。加马尔尼克同志在这里发了言，并正确地谈了日本铁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然，他引用的有关我国的数字，有关我国机车大修时间的数据是不正确的。的确，在日本，机车大修需要六个半到七个昼夜。我们四年前大约平均停工100至120天。今年每条线路机车停工大修平均为40天。但有些修理厂，特别是乌苏里修理厂，显然是加马尔尼克同志提到的那个修理厂，那里停工大修的时间大约为70天。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也有大修时间为28天的修理厂。主要的困难在哪里，我们与日本铁路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修理厂的设备全都是落后设备，而相当数量的机车型号繁多，系列不同，差别很大。日本实际上总共只有两个主要型号的机车，而我们，比如说在像罗斯托夫这样的修理厂，要修理18种不同型号的机车。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修理不同型号的机车时，修理不可避免地具有手工性质。只有使我们的修理厂实行修理固定系列的专业化，对我们修理厂的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等，才能降低车辆和机车的

修理费用,加快车辆和机车的周转。

在运行方面,日本没有一公里不是自动闭塞,没有一处是手工操作,所有的道岔都是自动工作的。此外,日本整个铁路网有12 000公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对工作进行良好的组织。我们的铁路就很难与之相比。我们没有一公里的铁路有像日本那么好的设备。应该说,与许多西欧铁路不同的是,日本铁路工作得更好。应该说,我们的铁路落后于西欧、美国、尤其是日本,就像我们的工业落后于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工业一样。

同时,同志们,不能不指出的是,近些年的交通运营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举一个事实就能说明问题,今年运营支出占交通收入中的75%,也就是说,每个卢布中有75戈比用于运营工作,25戈比用于基本建设工程。交通工作的规模已达到战前的131%。那么成本如何呢?1926—1927年度吨公里运输成本为1.25戈比。去年,即1927—1928年度吨公里运输成本实际大概是1.17戈比。按照我们的预算,今年计划为1.13戈比。应该指出,这些数字表明在降低交通产品的成本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

谈到今年的预算,首先应该说,今年的预算制订得非常紧张。尽管交通业在货运量和修理单位方面的规模不断扩大,完成这项不断扩大的工作所需要的固定编制工人的数量却少于去年:我们1926—1927年度有固定编制工人79.3万名,第二年货运量增加了,但工人的数量为76.3万。1928—1929年度我们再次扩大了货运量,扩大了修理计划,而工人的数量却降到75万—75.5万人。我们今年的收入部分弄得过于紧张。在货运量预计增加8%、税率稳定的情况下,交通收入预计将增加12%。这就要给交通预算造成巨大的困难。我们将极其紧张地整整工作一年。交通业采取的这项大幅度增加收入的措施,是迫于国家预算不平衡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国家预算不平衡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每个部门的头上,我们部门也不能幸免。

1928—1929年度交通部门有这样一些打算:决心将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0%,改善并扩大我们的整个货运量,尤其是要加快机车和车辆的周转,扩大昼夜行驶距离,增加货运和客运车辆,最后,全面提高铁路运输工作的效率,但这个决心要实现是很困难的。这项任务是在预算框架内对交通业提出的现实和必须完成的任务。所有的技术指标,我们所有支出的拨款都是以我们似乎已经取得了这些成绩为依据的,并将这些成绩看作是事实。其实,这只是我们应该解决的任务。我们还应该增加行车里程,加快机车和车辆的运行和周转。同时,这在预算中是作为我们已经完成的任務来规划的。

有人喊[丘巴尔]: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

苏利莫夫:这在工业中具有较小的绝对意义。您是清楚的,丘巴尔同志,我们的整个预算,预算中的每个戈比都要靠国家拨款。而工业的130亿卢布周转额中只有10亿卢布是靠国家拨款(基建投资)。这就是区别。这里的区别就是比例关系。你们的比例关系是10亿比130亿,而我们整个23亿卢布的预算都要靠国家拨款。由此可见,我们铁路运输工作比工业紧张得多。我知道,全会不可能增加对铁路运输业乃至整个交通业的拨款。我在这里讲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非常清楚,不可能指望今年预算增加对交通的拨款。我讲这些是希望交通问题能在提纲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得到更多的关注。希望反驳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交通不是薄弱环节的意见,勾勒出目前已经成为薄弱环节的交通业的真实困难状况。

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铁路交通是靠国家预算拨款的经济部门。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今年及近几年来,我们的情况是:交通不但要负担自身的经营性支出,负担交通业基建投资支出,而且今年我们还从收入中拿出了大约7000万—8000万卢布给其他交通种类。如果铁路运输方面的收入都像今年4月份政府所决定的那样用于铁路本身的话,铁路交通的改造就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政府正是根据交通业的现状作出了这个完全正确的决定,但正像大家所看到的,几个月后政府在批准预算时又推翻了这一决定。

我要谈的最后一点。对交通的不关心还表现在,我们不仅在交通的改造和合理化方面做得很少,而且对这方面的准备不够,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也不足。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利用国外的经验。在工业上提出利用国外经验的问题是非常合理的。我手头有一份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1928—1929年度学习国外经验的外汇支出的决定。拨给工业1380万用于出国及学习经验,可只给交通业拨了10万。同志们,交通业当然不能奢望得到和工业一样多的拨款,工业的任务更重。尽管我们要的是一小笔钱,申请了近80万,但还是被无情地削减了。大家也知道,10万是任何国外经验都学不来的。另一个指标,也是最后一个。古比雪夫同志说,今年将向科学研究机构拨款6800万卢布。同志们,交通业根本没有开展这样的工作。我们今年第一次在我们的预算中安排了近200万卢布,而且这个数目已经被预算砍了一刀,尽管只是削减了拨款。好不容易才凑了150万卢布。但从交通业开展科研工作的需要来说,这是根本不够的。

主席:现在休息。

第八次会议

11月20日晚间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开始。现在请卡巴科夫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表明国家整个经济将有一个大的提高。

发言的同志在报告中以及文献中对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金属、外汇、化学、谷物业——作了相当充分而全面的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克服困难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需要更快地开发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一点在控制数字和散发的材料中已经明确反映出来。此外,控制数字还有一个特点。这些数字预先规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各地区经济专门化的方向。在讨论控制数字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丘巴尔同志发言时建议“各地区间不要争吵”。我认为,这个提议是相当及时的,因为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不能靠争吵和不必要的争论来解决经济问题。考虑到我国资源的全部潜力和各地区的特点,在讨论控制数字时无疑应该采取克制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搞清国家目前经济的实际潜力和状况。

乌拉尔是个什么样的地区呢?我认为,现在形成了一种通行的看法,认为乌拉尔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地区。我们认为,根据这个定义,在制定经济计划时,没有系统地、年复一年地考虑到发展乌拉尔冶金工业的意义。这使我们极感忧虑。一旦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边境工业区就完全可能陷于混乱状态。国家就可能缺少国防所必需的金属。乌拉尔的地理位置能使工业避免出现这种可能性,除了各种经济优势外,这种情况正是在乌拉尔州发展冶金工业的动因。确定控制数字时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这一点。大家好像都同意这个看法。古比雪夫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工业向东部发展的声明。²²²我和许多同志私下谈话时了解到,这种方针不会遭到激烈反对,并被看做是进行工业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方针。但是只要稍加研究,这个方针是如何在实际中发生变化,乌

拉尔冶金工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谈话的内容及种种许诺与乌拉尔冶金工业的实际发展之间的不协调就会明显表现出来。1913年乌拉尔加工的生铁占全国冶金工业的21%,1923—1924年度占37.3%,到了192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9.8%,1927—1928年度又下降了0.1%。乌拉尔比重的下降也许源于市场,有其偶然性,但对于我们的领导机关所提出的观点不能不加以关注。我手头有一篇季曼施泰因教授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经济生活报》的显著位置,编辑部未作任何说明。他写道:“不是作为临时性措施而将乌拉尔的冶金业建立在库兹涅茨克燃料基础上的想法是先验的和毫无根据的。”沙波什尼科夫教授在他提交的提纲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并指出:“要把首先在乌拉尔建设大型工厂看成是国家对工业合理的、必要的保护。”这里所表达的观点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官方观点大相径庭。这些观点什么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在乌拉尔发展冶金工业,哪怕是“临时的”和“毫无根据的”发展。如果打算要做什么的话,人家就说你是“国家保护主义”,尽管加上了合理的这个形容词,但我们并没有感到轻松。我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到我们需要某种“合理的保护主义”的层面。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以保护主义为基础,它完完全全是以科学为基础,并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只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想象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会看到,所有的科学定义可以归结为:乌拉尔应该在我国冶金工业中占有主要的一席之地。

费斯曼院士就这一问题分析写道:“对乌拉尔进行的地球化学研究使我们得出正确的答案并首先确认,乌拉尔不仅应该成为冶金业的中心,而且应该成为化工业的中心。”这一科学定义完全是根据乌拉尔的资源得出来的。我们在这里能看到最丰富的矿藏。只要看看马格尼特山的历史就知道了。洛卡茨科夫同志应该还记得马格尼特山总计拥有60亿普特矿石的时候。据不久前统计,那里的矿藏有120亿普特,但近来又有资料说,那里的矿石有160亿普特。但这还不是全部。考察工作尚未结束。煤的问题也是如此。基泽尔地区的煤储量有300亿普特。一个委员会到那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仔细计算,探明那里煤的储量大约有1000亿普特。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在什么地方?

卡巴科夫:基泽尔地区。我手头还有一份不长的申请,其中写道:“兹给您寄上尼科诺夫关于在上图里耶地区阿格拉诺夫林区进行煤炭勘探的申请。”这

份申请是在已被捕的前乌拉尔采矿工业托拉斯地质工作者利波夫斯基那里发现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一个典型的现象，近来一个时期，在进行逮捕时总会发现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明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很久就有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的已探明的矿藏。这份文件落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他对苏维埃政权隐瞒了这份文件，所以根本无人知晓这些煤藏。另外又查明，人们是在采掘白金时碰到煤层的，在记录这一事实时，破坏分子删去了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与挖白金没有关系，所以发现煤层的事情不用写。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乌拉尔的资源远未勘查清楚。不过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乌拉尔蕴藏着矿物燃料，只是应该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基泽尔地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拨50万卢布进行勘探。把乌拉尔面临的宏伟任务和50万卢布这一微不足道的数字对比一下，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在这里是遏制，而不是加速解决乌拉尔所面临的问题。请在这方面再加上大量其他的资源——锰、白金、镍、铜、铝土等等，这样大家就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顺利解决乌拉尔问题将大大有助于解决全苏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这样不仅会振兴冶金工业，而且将开采出各种用于出口的矿物。从这方面来说，乌拉尔蕴藏的自然资源坚决要求我们动员科学力量，解决诸如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基本部门以及能够使我们摆脱对国外依赖的生产部门的生产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如何呢？应当指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协助科学力量总结乌拉尔工业的经验方面做得不够，对国外成就的借鉴相当不够，在这方面的协助远远不够。

洛莫夫：说得对！

卡巴科夫：我们的著名工程师克拉皮温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在柏林的商务代表处可以看到，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从‘红色维堡人’工厂、奥布霍夫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埃列克特罗斯塔利（常驻）等到这里出差的人络绎不绝。”

丘巴尔：说得对。

卡巴科夫：“从罗斯托夫工厂来了以教授为首的一行六人，更不用说经常到处走的乌克兰人了……”

丘巴尔：这说得就不对了！（笑声）

卡巴科夫：“真替乌拉尔感到委屈。乌拉尔的技术力量薄弱，他们在闭门造车。可一旦要给乌拉尔增加营养，让它壮大起来的时候，就要求它厉行节约，对其他地区却不提这种要求。”说这话的是一位党外工程师，他是我国工业的最宝贵的财富。我认为，当我们谈及动员一切力量的问题时，就要消除我们存在的不足。尤其是要加紧解决制约黑色冶金工业发展的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最

短的时间内为冶金工业提供生产设备、燃料、动力、交通工具、矿石等保障。

乌拉尔冶金工业设备的现状我就不谈了。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说得相当多了。我想谈谈煤炭供应问题。乌拉尔的冶金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库兹涅茨克的煤田。许多乌克兰同志提出,乌拉尔的冶金工业应该完全用木炭。那么这个问题实际是如何解决的呢?说归说,煤照样是从库兹涅茨克煤田运来,生铁仍然用矿物燃料冶炼,乌拉尔工业加工的金属似乎仍然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定价。在这方面使用的库兹涅茨克煤已经超过14万吨。库兹涅茨克煤田的情况怎么样呢?西伯利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科尔涅夫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问题极不受重视。我们库兹巴斯的焦炭建设落后,不能满足乌拉尔的需要,我们没有对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矿的发展和勘查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就是乌拉尔冶金工业的煤炭供应情况。毫无疑问,要扶持库兹涅茨克煤田的发展。但更要重视乌拉尔本地煤的焦化问题。在这方面还是有工作可做的。我们去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利用基泽尔的煤炼出了质量较好的焦炭。这个成就要求我们更快地开发煤炭资源,并在乌拉尔建造炼焦炉。但是只要一一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就会遇到重重障碍。将冶金工业与各产煤区联合起来已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乌拉尔的同志已连续几年提出建设基泽尔—比谢尔铁路的问题。但是,乌拉尔工业的计划却与中央各机关的愿望相去甚远。这些机关认为,路是要修,但不是修到乌拉尔,而是从乌拉尔修到彼尔姆,煤也不是供给乌拉尔工业,而是运到莫斯科。我们认为,这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无论如何都不会促进冶金工业的发展。

现在说说我国的动力问题。乌拉尔工业的动力基础正处于起步阶段。每个工厂都在建设自己的电站,同时我们将地方的燃料(煤及水资源)结合起来,要求必须直接在燃料矿建设电站。车里雅宾斯克矿、基泽尔矿、丘索夫河上的电站工程以及博格斯洛夫斯克矿都能供电,并将整个乌拉尔工业连成统一的经济。乌拉尔的电气化时机已经成熟,只有这个措施能够促进并确保全面、充分地开发最丰富的矿藏。实际上我们国家把电站建在没有一个工厂的地方的事例可不少。

柯秀尔:能举个例子吗?

卡巴科夫:看一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地图,与在建电站的名单对比一下,就会找到例子了。

有人喊:说得对。

卡巴科夫:可我们提出的是在工业发达、当地有燃料的地区建设电站的问题。

[米高扬:说得对。]

卡巴科夫:我再说说交通问题。

科兹洛夫:你在讲课吗?

卡巴科夫:我不是在讲课,科兹洛夫同志,我是在向中央全会讲述与黑色冶金发展有关的迫切需求。西伯利亚对交通状况不满意,并采取了正确的做法: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货运量逐年增加,所有这些汇成一股洪流迅速涌向乌拉尔桥。

有人喊:大桥没坏吧?

卡巴科夫:如果你们检查一下彼尔姆道路的情况,你们就会看到,每年都有交通阻塞现象。交通人民委员部每年秋天都要动员全部力量,派遣特派员,等等,只求能够克服困难。我们认为,乌拉尔的交通问题需要整顿。苏利莫夫同志在乌拉尔时大讲特讲交通区划的必要性,可一到了交通人民委员部(笑声)……

有人喊:丢人!他就给忘了。

卡巴科夫:区划问题在他那里就变成次要问题了。

有人喊:丢人!

卡巴科夫:我们的交通是个特别薄弱的环节。我这就说完,我只说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然后再说一说……

有人喊:说什么?

卡巴科夫:再说说在建的工厂。

有人喊:对,再作一些补充!

卡巴科夫:我还要说两个问题。(会场内一片喧嚷、笑声,喊声:让他说,让他作一些补充)

主席:再给5分钟吗?卡巴科夫同志要求给10分钟。谁同意给10分钟,谁反对?反对的人不多。

卡巴科夫:我们现在的薄弱环节还有矿渣。洛卡茨科夫同志建议我们启用废弃的矿井。这里的前提当然是农民是否在利用这些矿井。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在当前说来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应该更加彻底地解决。举个小例子,马格尼特山拥有相当丰富的矿藏,那里矿藏的价格会相当低。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前提是……

奥尔忠尼启则:燃料非常便宜。

卡巴科夫:当然,及时地建设铁路会使乌拉尔的冶金工业在开采价格高的矿

藏时避免不必要的和非生产性开支。但我们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修建卡尔塔雷—马格尼特铁路的时机已成熟。这项工程的拨款总共200万卢布,而整个工程需要大约700万卢布。这条铁路夏天建成之后,我们明年秋天就会摆脱对农民的依赖。这项措施必须实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即一个夏天就要把这条铁路建成。

现在谈谈我们的高炉建设。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计划明年在乌拉尔建4座高炉。可是,如果比较一下这个建设项目的结果,我们就会看到,这4座高炉如果建在乌克兰,总生产能力是64万吨,可是如果建在乌拉尔,4座高炉的生产能力却只有22.4万吨。请看控制数字中写了什么:乌拉尔总共只建4座高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总共才建4座高炉,生产22.4万吨生铁”。这可是在国家急需生铁的时候。给高炉建设的拨款太少了。我们认为,今年向乌拉尔冶金工业的投资应确保进行更大规模的建设,以适应当前的整个形势。

现在简单说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就这一问题发言的同志们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

丘巴尔:高炉首先应建在现有的工厂。

卡巴科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认为,时间……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有人在那儿开小会儿呢。

主席:沙茨金同志,听人家发言。

卡巴科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建设时间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取决于建设速度加快多少,资金投入多少……

柯秀尔:我们同意。

卡巴科夫:为建设工程服务的人员由哪些人组成,如何订购设备,等等。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对你们的意见加以考虑。

丘巴尔:在哪儿建高炉我们都不反对,炼出铁以后再解决工厂的问题。

卡巴科夫:新旧设备混用不一定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从这方面来说,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举个小例子来说。炼钢生铁的价格要比老厂的生铁价格低28%,钢轨的价格低39%,长方木的价格低40%,型铁价格低43%,等等。

现在我谈谈,确切些说,我认为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必须要说。

柯秀尔:你大胆说吧!

卡巴科夫:是的,柯秀尔同志,这需要勇气,因为许多人可能不喜欢这个观点。现在一些城市正在建各式各样的金属加工厂:拖拉机修配厂、汽车修配厂、

农机修配厂,等等。

奥尔忠尼启则:那又怎么样,让他们建吧。

卡巴科夫:可这些厂都建在什么地方了呢?谢尔戈同志,您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尤其应该注意这方面。您想想,金属加工厂建在了距炼铁地点和原料采集地2 000 俄里的地方。

奥尔忠尼启则:工厂建在离燃料2 400 公里的地方。这你不知道吗?

卡巴科夫:我知道,我要告诉您的是,库兹涅茨克煤的质量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不错。可这煤离你们有多远呢?

卡巴科夫:2 000 俄里。但这已习以为常。可我不知道,把生铁送往金属加工地点的2 000 俄里运费从哪里出,而这笔费用是可以节省的。我们认为,使金属加工地点靠近冶金工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从这方面来说,从合理性方面来说,建拖拉机、农机等机械修配厂时要研究选址问题,要把它们建在有冶金工业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提出在乌拉尔建拖拉机厂的问题呢?

有人喊[丘巴尔]:或是在顿巴斯?

卡巴科夫:为什么不提出在乌拉尔建农机厂的问题呢?前不久我看见铁路线上正从罗斯托夫的“阿克赛”工厂往4 000—5 000 俄里外的西伯利亚运脱粒机。可是在这里,在邻近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就有优质的铁、钢和大量细工木材,等等。为什么不在乌拉尔建农机厂呢?

奥尔忠尼启则:在西伯利亚呢?

卡巴科夫:西伯利亚不具备这种综合的经济先决条件。从这方面来说,无疑需要重新研究新厂选址的政策。

波隆斯基:那图拉呢?你只顾骂苏利莫夫,把图拉都给忘了。

卡巴科夫:现在我想说说农业。

喊声:别说了。

卡巴科夫:既然不让说,我就不说了,只说说党的政策这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决议提出的措施中有些部分无疑需要修改。当然应该考虑同志们对个别地方提出的意见,而且那些不符合当前形势的说法也要删掉。由此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我们已经以比前些年快的速度推进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么一切束缚我们继续向前发展以及右倾在思想上对党进行破坏的行为,理应在这里遭到我们的谴责。党的实践工作中应提出的任务是,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深入更坚决地与右倾进行斗争。

主席:需要澄清一个问题,让不让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发言?谁同意让他发言?谁反对他发言?不到半数。

布留哈诺夫同志也要求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让布留哈诺夫发言。]

主席:因为弗鲁姆金同志发言了,布留哈诺夫同志就认为他必须发言。谁反对布留哈诺夫同志的请求?谁同意让布留哈诺夫同志发言?超过半数。

请布留哈诺夫同志发言10分钟。

布留哈诺夫:我要发言,因为我认为,必须指出决议草案和李可夫同志报告没有反映出来的一点,这一点与财政体系对我国工业化事业的财政支持有直接关系。

请你们注意这些数字(我的话非常短)。除了工业去年从国家预算所获得的资金和在这里多次提到的资金以外,工业还从我国的信用系统获得了相当大的帮助。只要告诉大家,我国经济去年对信用系统的债务增长总额近8亿卢布,其中将近5亿卢布是我国工业的新增债务,就足以说明问题。可见,除了预算拨款外,国家的工业化事业和我国工业的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我国信用系统来维持的。

信用系统的资金从何而来?如果说去年欠信用系统的债务增加总额,如我所说的有将近8亿卢布的话,那么其中将近一半是用于发行十卢布纸币。我认为大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种帮助就完全没有缺陷吗?加大帮助的力度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我想在这里指出李可夫同志说错的一个地方。他在报告中谈到,去年和明年——我们也预计到——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会有所提高,他显然是说错了。他说得不对。我们的指数是在提高,可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却有所降低。去年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按照不同计算方式为2.5%到5%—6%),而且我们认为,由于今年我们需要进一步紧缩财政,也会导致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应按照政治局的决议采取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措施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

这是很危险的吗?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幅度下,购买力的降低还不会带来很大的危险,也不会给我们的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但是如果在这方面绷得过紧,就会出现真正的和巨大的危险,应比政治局提交全会审议的决议更加关注这一危险。

这里有人谈到了这一点,他们抱怨说,右倾危险的问题是以补充建议的方式提出的。我想说的是,你们在决议草案中也会看到,我说的那种危险甚至连补充

建议也未提到。这个危险是在第10点中用“特别注意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这几个词提到的。

我认为,决议应对这个简要的补充建议略加说明,但不是关注危险本身,而是关注有助于避免这一危险的措施,关注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开支,关注最大限度地各方面厉行节约,挖掘潜力,至少尽可能少地、有节制地向我们的信用系统提出各种要求。

财政领域的第二个薄弱环节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这就是外汇问题。我不会在这里重提李可夫同志已指出的问题;我只是再次指出谢列布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强调指出过的观点,即克服我们这方面困难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我国的采金工业。但我还会指出达到这个目的另一个途径(这一点在决议草案中没有得到相应的表述)。决议中必须提到最大限度地发展我国出口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改善我国在这方面的外汇出口状况。最好再一次强调全党、各地方机构应对发展出口给予帮助的必要性。决议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将向全会选出的委员会建议,将这一点补充进去。

第三方面是预算。关于这一点大家在这里已经说得相当多了。我想强调下面一点:我们的预算对工业的拨款——不单单是给基本建设,而是给整个工业——是8.03亿卢布。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起初由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弗鲁姆金计划的数字。李可夫同志讲了造成我们目前这种紧张程度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提高了伏特加酒的价格,增发了国债并使国债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造成这种状况是因为我们硬性而过多地减少了对出口贸易的贷款,减少了给国防、军事部门、交通业、共和国需要及地方预算的拨款,显然,在农业方面也减少了拨款。

我们认为,要让我们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完全经受得住这种紧缩性计划,预算在一年内还要对农业、出口贸易以及国防作些补充。

有人喊:说得对。

布留哈诺夫:我认为,我们应对此问题有所准备。

我想在这里谈谈在我看来斯大林同志提得不正确、沙茨金同志似乎又紧抓不放的一点。斯大林同志指出,弗鲁姆金从右倾立场出发,提出了过低的工业投资数字。同意6.5亿这个数字的不单单是弗鲁姆金一个人,而是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我想提醒同志们,不要错误地利用斯大林同志的说法。不能用具有某种倾向的标准对待有关工业拨款数字的争论。只需援引这些数字即可。我认

为,古比雪夫同志不会拒绝证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最先提出的预算对工业的拨款数字是11亿卢布,这个数字不是古比雪夫同志提出的,而是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一些中央委员提出来的。古比雪夫同志认为这个数字明显太大,预算承受不了,建议将数字控制在9亿卢布内。怎么,身为农业专家的古比雪夫同志反对发展工业?当然不是这样。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同意古比雪夫同志的申请并提出7亿卢布的数字。怎么,国家计划委员会内是清一色的右倾分子?当然不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6.5亿卢布来代替古比雪夫同志提出的9亿卢布的数字。政治局提出的数字为7.8—8亿卢布。怎么,政治局内都是农业专家?显然不是。任何申请显然都不会如申请人所愿得到完全的满足。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那么,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内当然存在各种倾向,但也仅仅是倾向而已。财政人民委员部反对国防,这是温什里希特同志和布勃诺夫同志在这里说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反对农业,库比亚克同志力图证实这一点。财政人民委员部反对交通业(请看苏利莫夫的发言),反对教育(斯克雷普尼克说的)。财政人民委员部也反对工业,许多同志都说过。因此,根据这一观点来评价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数字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我就弗鲁姆金同志的发言和他写的两封信说两句。我认为,构成弗鲁姆金发言基础的是其在第二封信中相当明确地表述的观点。弗鲁姆金同志提出了关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产量和商品率”的论点。他在另一个地方强调指出,关于提高农业产量的问题是“绝对命令”。我认为,弗鲁姆金同志在这方面是完全错误的。他从纯市场的立场出发看待农业产量及提高产量的问题,脱离了农业和农村内部关系发展的社会政治意义。弗鲁姆金这种片面的、忘记农村阶级分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米高扬:说得对。]

布留哈诺夫:尽管弗鲁姆金同志今天还在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争论,说他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也是不正确的。只要引用两小段话就足以说明问题。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相当明确地指出了那种“不愿意理解反击富农并遏制其剥削意图的全部必要性”²²³的倾向。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向富农进攻”。²²⁴相反,弗鲁姆金同志提出的说法则要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进行限制性解释,而这种“压缩”就像我们在这里多次引用过的“我们不应该妨碍富农农户的生产,同时要同它们的奴役性剥削作斗争”这句话一样,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弗鲁姆金同志在这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我非常了解弗鲁姆金同志,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多年。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党的指示的人。但他在发表意见、维护自己的观点以及进行理论争论时往往又过于固执。(笑声)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在第二封信中不仅重复了第一封信中的错误,无疑又犯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

主席:现在请列扎瓦同志发言。

列扎瓦:我在准备发言稿时就听说,洛米纳泽同志在这里给我戴了个高帽,我也想作一些解释。大家知道,我认为,在这个会议大厅里,在我们讨论非常严肃而重大的问题以及与我们党有关的各种派别和倾向时,高度认真负责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洛米纳泽同志看的其实是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支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我并未审读过,而且我现在也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他在速记记录中当然能看到比他引用的两三个句子更有分量的内容。

洛米纳泽:这些就足够了。

列扎瓦:从任何人在这里的发言中摘出几句话,都能认为其中具有某种倾向。[从斯大林昨天的讲话中摘出几句话,也可以随意编造出一个连斯大林同志做梦都想不到的倾向。用这种方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可以把他变成倾向分子。根据他的讲话可以把他说成是俄国民族主义者,右倾分子,随便你怎么说。

柯秀尔:没那么容易。

列扎瓦:断章取义就能做到。]

现在我谈谈洛米纳泽同志所作的通报。我的速记记录的大部分内容与我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预算有关。在这里似乎也应该抓一些倾向。但洛米纳泽同志没找到任何能揭露我偏离党的路线的词语,可是当我批评我们的同志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某些纪律松弛现象时,他就火冒三丈,骂起他们来……

柯秀尔:骂得还非常不是地方。

列扎瓦:大家看看速记记录就会知道,骂得是不是地方。当我像现在这样,当着你们大家的面,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开始讲话的时候,当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显然比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责任都要大的人,应该向党和苏维埃政权显示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能力,并保护好投入建设的每一个卢布时,我便对我们机关中存在的不负责任、纪律松弛的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同志们说了许多尖刻和刺耳的话,——洛米纳泽同志就是从这些地方摘了几句话。我在政治局讨论目前的控制数字时讲的也是这些话。大家对我是相当了解的,谁会相信,我会说过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建设的话?一个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和新经济政策之后一直彻底维护所有合作社形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保护残存的合

作社组织进行过激烈斗争的人,怎么会说出反对集体农庄的话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洛米纳泽同志却怀疑我,说我不理解集体农庄建设!对不起,请看看速记记录和我的整个工作方针,看看我前不久就集体农庄问题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不过我确实抨击并经常批评集体农庄组织中、工业、出口及其他建设工程中存在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浪费钱财的行为,我说的是这个。有时也会随口说出“喂狗了”之类的粗鲁话。怎么,难道你们打算根据一句话对政治路线作出评价并将其拿到中央全会上来?这是不允许的!

现在谈谈我在那里都说了什么,关于右倾的谈话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应该考虑到说这些话的具体环境和所针对的对象。在由我管辖的机关支部里,连续三四次会议听到种种无稽之谈,并有出乱子的危险,应当把大家引导到一定的框架内。而您,洛米纳泽同志,是否向全会宣读过我速记记录中这样一段话,内容是说当一个同志明显表现出右的倾向时,就要对他进行劝导,假如他不听劝导、一意孤行,就要解除他的工作。我问您,洛米纳泽同志,您是否向全会宣读和通报过我速记记录中的这段话呢?

同志们,我想向你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洛米纳泽同志的举动是小事一桩,没有必要让大家过多地加以关注。我只想针对这个责任事件提一点要求,在真正与各种危险倾向进行斗争时既要进行思想斗争,也要进行非思想斗争,我认为,研究和确定事实时坚持慎之又慎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会扩大打击面。

主席:现在请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发言。

舍博尔达耶夫:关于是否让我发言的问题牵扯了大家如此多的注意力,我事先真该多申请一些发言的时间。从控制数字反映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济问题总路线的角度来看,控制数字本身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大多数同志的讲话完全正确,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确保实行控制数字中正确指出的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农业的路线。

我们都知道,关于数字、计划的问题,甚至关于按照这些计划投放相应数量资金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今年的经济活动将取得什么成果的问题。去年表明,我们在工业方面做得比计划多,这是党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我国工业问题上的结果。我们在农业方面没有做得这样多,这不好。但这说明,对我国经济某一部部门加以真正的关注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计划和投资方面,而且体现在对我国建设的某个领域提出的口号和方针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党动员群众时使用的口号和思想确实变成了力量,并在完成党的经济指标的增长

率中得到反映。因此我认为必须指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报告中的失误之处,这些失误有可能削弱我们对我国经济中重要部门的关注。

首先,谈谈全国的工业化。当我们提出关于大发展、关于集中最大力量进一步将工业化事业推向前进的问题时,提出了工业化速度可能降低的问题,并对显然不够详尽的我国轻工业发展计划作了补充说明。

一般说来,这种补充说明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们都清楚,党内外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工商报》及各种经济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甚至莫斯科组织中个别同志的发言恰恰也证明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佩尼科夫同志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对他在工业化问题上的错误是这么说的:“我犯了(其他同志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我曾认为,我们在重工业发展上过于冒进,应该更多地关注轻工业。”²²⁵ 这样的声明在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中相当之多。

另一个例子是库利科夫同志,他在斯大林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时也提出了必须加快发展纺织工业的观点,结果许多同志都不得不对他的发言进行批评。

乌格拉诺夫同志认为必须在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发言中引用我在萨拉托夫所作的报告,(顺便说一句,我的报告对这种错误进行了批评),同时他还把引自我的报告的一段话与不知是谁所说的关于“印花布省份”即轻视莫斯科省纺织工业的一句话联系起来。我认为,我们的纺织业地区,像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莫斯科省及其他地区,丝毫不比其他无产阶级地区差。我认为,我们地方党组织维护本地区的工业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觉得,当地方工业问题决定全党问题的路线时就不对了。我在报告中对莫斯科组织中个别同志的这些错误进行了批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正确的。

那些直接承受地方或部门利益压力,一旦对这些利益的反击力度不够就会偏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尤其应该严密注视路线是否明确。柳比莫夫同志说,在确定经营方针方面,尤其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的问题上,消费者对合作社的压力相当大。

我认为,迎合消费者的意愿是没有理由的。请看几组数字。与战前相比,我国农业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9%。与战前相比,我国轻工业如纺织业的产量增加了21%。控制数字规定,今年的居民收入将增加7%,而轻工业的增长将超过15%。这一切都说明,消费品问题不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部分。应当通过在我国手工业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改变农村需求的性质,通

过在我国重工业、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基础上生产的商品靠近并输入农村的方法解决消费品短缺的问题。而且要预见到,农业的改造必然会使农村的需求发生根本变化。有助于我们吸收农村支配的资金的另一条途径是农村的生产和文化措施,要把居民的资金吸引到这些措施上来。因此在评价商品短缺时不能从今天的需求出发。

鉴于目前我们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工业中面临着降低成本这一重大任务,我还想谈一个局部性问题。这就是工长的问题。有关工长的问题是企业与工人确立正常的关系、改善劳动组织以及根除行政管理人员与工人关系上广泛存在的突出缺陷等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克服这些缺陷就不能组织工人完成降低成本和节约基本建设资金的艰巨任务。

最后,关于工业问题我还想强调指出一点,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是否清楚、明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利完成我国明年的工业化计划。

现在来谈谈农业。我认为,弗鲁姆金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关于粮食短缺的问题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到过,中央全会提到过,政治局批准的那些提纲中也提到过。关于农业极度落后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党对由于谷类作物产量提高幅度不够所导致的粮食短缺以及农业普遍落后于国家的需求这一点相当清楚。存在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通过什么途径来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扩大播种面积,提高产量。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在这些问题上的提法必须极其准确,尤其是在评价农村状况以及在确定我们克服农村落后面貌的途径时更是如此。

在评价现状方面,认为中农缺少发展农业的动力的观点在我们的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

如果我们以不包括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连弗鲁姆金同志都没有加以指责的时期为例,如果我们以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为例,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说明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经济发展动力的标志:春播面积扩大,面积大幅度地急剧扩大——这完全是不争的事实。关于秋播运动,如在我们边疆区范围内,我们也看到,播种面积有一定程度的扩大,大约两个百分点,但德意志人的共和国除外,那里播种面积减少是由于改用良种更有利于发展小麦种植。再说秋耕地。虽说秋天天气不好,我们在这方面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and 拖拉,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秋耕地比去年有所增加。

至于说到农户的动力,我认为,应该相当明确地提出在不同群体中发展经济

的条件各不相同的问题。

富农作为发展自身经济的条件提出了什么要求呢？他们要求取消累进税，改变信贷政策，放弃集体农庄建设，因为集体农庄建设会引起一些麻烦，破坏轮作制，等等。这是富农热衷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

对于贫农来说动力问题就是信贷问题，因为贫农想干活、想种地，却没有资金。信贷问题即预购合同和长期贷款是贫农的主要问题。

对于中农来说，在现有的商品供应和粮价条件下，主要的动力……（主席铃响）可不可以再给我5分钟左右的时间？

喊声：可以。

乌格拉诺夫：你从纺织工业扯到“右倾”，接着扯。

主席：再给他点时间吗？通过。

舍博尔达耶夫：“主要的动力”是组织上和生产上给予帮助。预购合同问题是中农的动力、与中农结合的主要问题之一。这里有无限的活动空间。卡明斯基同志有些热衷于他的统计数字，不过不是没有理由的。看到农村开展预购合同工作的人都知道，这项工作对农民、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把预购合同作为边疆区农村工作的基础，并且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收购问题——从自发的粮食收购向更有组织的粮食收购过渡；这还决定着对农民经济的技术进行大规模改造的问题，当然，不是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而是以比从前更快的速度；最后这还决定着农村集体化的问题，因为我们必将在预购合同的基础上走向农村集体化。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经济的动力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结合起来。预购合同的实践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并解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发展个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集体化的问题。我们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事业。

弗鲁姆金同志不理解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村发生的变化，不理解农村新型关系所赖以形成和我们进一步推进农业改造和发展事业并排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所依靠的那些力量的变化。因此，当弗鲁姆金同志说他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历次全会以及党的所有决定没有分歧，同时却提议宽容富农的时候，说明他还不理解这些决定。如果我们同意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这就意味着使农村的力量对比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这意味着拒绝向富农进攻，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在农村的建设路线，意味着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后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弗鲁姆金同志所说的他与农村现

行的路线和实践没有分歧的说法。我们在积极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斗争,而弗鲁姆金同志却提议不再这样做并且说没有什么分歧。

最后,我再谈谈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遇到困难而在党内外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动摇和摇摆。

关于政治局提出的决议,我认为,从我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有些提法在我看来需要作重大修改,而且我们应该改正这些提法,改得好一些。

我认为,全会后我们将面临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在右倾危险以及右倾是当前主要危险的问题上,我们会给党以更加明确的提法,我们会澄清其他一些涉及我们党在农村的路线、我国的经济建设任务等方面的提法,或者是,各地出现一系列争论问题,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工作缺少统一的路线。不知到那时,我们现在批准的控制数字本身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不知这些数字仍仅仅是数字,还是能够变为具体的物质财富,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们这一经济年度能取得多少成果将取决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否明确。

我认为,全会的任务是帮助党落实这些控制数字。因此,必须弄清下面这些问题,我们将如何实施我们的经济计划,我们将如何回击那些试图“从右边”和“从左边”歪曲党的路线的势力。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削弱反对明显壮大的敌对势力的斗争,增加党内动摇的可能性。中央全会明确的决定将确保我们完成正在制定的经济建设计划,确保我们党的巩固。

主席:根据决定,讨论结束。

经与所有报告人协商,建议只由李可夫同志一个人作总结发言。谁同意这个建议?(通过)

喊声:该休息了。

主席:有人建议休息15分钟。

(休息后)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现在继续开会。请李可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李可夫:同志们,首先我应该请求大家原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能遵守每一次全会都照例通过和照例未被遵守的议程。

我的总结发言分两部分。一部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务实部分,这部分我准备只谈两个问题,就是:(1)在控制数字方面为国防提供保障的问题,和(2)在今年预算中保障农业需求的问题;我在第二部分中要对大家在这里对我的报告进行的论战性攻击作一下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要谈谈温什里希特同志和布勃诺夫同志的发言。

(未作速记记录,只是还原了李可夫同志答复温什里希特同志和布勃诺夫同志发言的那一部分)

当然,从狭隘的军事角度来看,抱怨压缩军队编制也许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脱离全部经济计划来分析国防。我们在物资技术方面为战争服务的能力直接和间接地取决于工农业的状况。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顺利解决生铁和粮食短缺方面的困难将大大有助于国防。此外,军事预算不包括、而且也不可能包括与国防有关的全部开支和工作。

至于第二个问题,可以说库比亚克同志就农业状况发表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引用了和我谈话的内容,我当时答应他,如果农业人民委员部的现有预算将使党帮助贫农的方针落实,我就帮他另找资金。我认为,我们不能允许那样做。应再检查一下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计算结果,如果计算正确,就要集中一切力量,保证我们帮助贫农的方针不致落空,因为如果我们向贫农提供的粮食不足,他们今年的情况可能不会太好。我认为不能减少我们对贫农在生产方面的帮助。

我们扩大了农机生产规模,但这些农机从工厂运到农村要用几个月的时间。从工厂买出农机再卖给农民需要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假如真如库比亚克同志所说,预算和信贷系统都没有安排这笔资金,我们的处境将十分尴尬。有巨大需要的农机将会躺在工厂的仓库里。如果农业人民委员部、合作社和农业银行靠拨给它们的资金无法把农机从工厂提出来送到农民手中,那么不管你愿不愿意,还得再拨给它们资金。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预算委员会现在正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补充预算……

[奥尔忠尼启则:已经追加了。]

李可夫:给谁追加和追加多少资金,应事先商妥。我已经和预算委员会的同志们说好,在筹措补充资金的问题上我不会干涉他们,至于如何“分配”这些资金,我们会一起讨论。等他们具体分配的时候,假如库比亚克同志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我再提出利用预算委员会工作的建议,以尽可能满足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需求。当然,即使如此,也会有“受委屈的人”,但我认为,库比亚克同志注意到的情况的确是控制数字和我们预算的薄弱环节之一。

农业投资扩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不会削弱我们决议中关于必须促进个体农民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我已经多次指出,农户内部流通的粮食有大约40亿普特,而我们通过统一收购从他们那里征收大约6亿普特,在我们向农民提供的

种子至多只有几千万普特时,农民自己却要投入至少8亿普特的种子。因此,我们以预算投资的方式向农业提供的帮助不能解决大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是个体商品生产者的积累。尽管每个农户的积累不算大,但2500—2600万农户的积累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不能把农业发展的命运仅仅与国家的帮助联系起来。

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些话,是因为现在下面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传言,说一些地方工作人员不便于回到组织中为促进个体中农发展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因为在某个地方,某个人因为主张“促进”挨了板子。也许,在这里,个别党员和中央委员也会感到有些不便,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明确指出,发展农业的主要物质基础在于农民的个人积累和提高农民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即使我们对农业各种措施的投资立即扩大2—3倍,这些投资与农民年复一年的周转资金相比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决议中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的那一段是决定性的。请允许我在总结发言的务实部分中只谈这些意见。

许多发言者都对决议和我的报告发表了意见。许多人的发言给我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发言批评了我的报告,而是因为这种批评没有切中要害。

从国内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向你们通报的控制数字是什么呢?控制数字是国家物资再分配的大规模推动计划以及通过这种再分配使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计划。从右倾危险的角度,从与右倾作斗争、减少国内中间阶级的“摇摆”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动摇的可能性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任务是在对所有经济成分进行极其认真平衡的基础上制定好控制数字,从而确保有可能最顺利地实施物质(经济)和社会(阶级)对策。可是与国内的资本主义基础、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情绪、与这种情绪对党和工人阶级的影响作斗争方面的具体计划,——这方面的具体计划,实际上每一个“批评家”都只字未提。我认为,这是讨论存在的主要缺点。沙茨金和洛米纳泽极“左”发言的调子会让人以为,这两位同志不反对大幅度“修改”有关控制数字的决议,因而也不反对修改控制数字,因为决议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控制数字本身,而且在于确定经济计划能够、也应该能够完成的条件和指示。我担心,沙茨金和洛米纳泽开始表现出的这种倾向能够改善的只能是促使国内反革命情绪的增长、小资产阶级阶层动摇情绪的增长及其对我们党影响增长的基础。我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他们对决议内容提出的局部修改,而是他们对决议草案“进攻”的主要倾向。从右倾或“左”倾危险的角度去评价控制数字的方法所要依靠的不是空谈,而是在考虑地方经验和认识整个苏

联经济的同时,对具体的经济发展计划认真进行分析。奇怪的是,在当今条件下,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竟能听到登台发言的人说:你们说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不够,而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发展得却非常好。我能接受并能理解各种各样的外省习惯,但毕竟不是这种和这种程度的外省习惯。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个国家不是哈萨克斯坦,而是苏联,我们不是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农业状况和农业计划。如果你“坐到了”联共(布)中央内,就应该明白,联共(布)中央是全苏机关,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机关,你要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一样,对苏联的政策负责。在准备与右倾思想进行最彻底、最不留情面的斗争时应该懂得,控制数字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作战计划,决定着社会主义基础的增长和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基础的进一步进攻。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讨论的缺点恰恰就在于,它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同时,对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控制数字进行讨论,这理应成为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我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下控制数字意义的理解。因此,我完全是有意地把有关各种倾向的问题放到了次要位置。如果中央全会打算对这个普遍问题进行详尽的讨论(也许也应该这样做),那就要把它形成专门的报告。本次全会讨论了四个决议——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关于党的成分的决议,关于七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和关于北高加索边疆区工作的决议。

除关于七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外,另外几个决议都提到了右倾问题。这岂不是说,我们的每项目程不要讨论每个具体问题,而要毫无休止地讨论右倾。这意味着放弃对经济的领导,拒绝解决列入日程的具体问题。

关于右倾问题我只谈了两点。第一,我谈了决定我们党内右倾危险增加的可能性的今年的特殊经济条件。我认为,为了表明必须在向全会报告的经济计划的基础上与右倾危险作斗争并克服实施经济计划中的困难,自己有责任这样做。第二,我谈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公开的右倾危险的区别,我认为,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这个问题我下面还要谈。但首先我要彻底批驳谢列布罗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及其他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对我进行的攻击。我维护的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但如果这些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同志以为,我好像已失去反驳的力量,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在这次全会上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回应这种攻击是多余的。但是在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攻击的事实本身表明,某些同志身上仍然存在着完全错误的方针和对局势的错误评价。

在谈右倾问题之前,我先谈谈发言者与我争论的两个出发点。这两个出发点在柯秀尔同志关于速度问题和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斗争的发言中得到了阐述。柯秀尔同志希望在速度问题上成为比我还大的工业化问题专家。我在报告中谈道,在此前制定的五年计划中,基本建设投资被设计成了“驼峰型”,也就是一开始迅速上升,然后再下降,依我之见,这样的设计在近几年是不正确的,但不应认为这种“驼峰型”是不可行的或根本不允许的。而柯秀尔却出来说什么:李可夫在这里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据他说,认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速度不但在未来五年,就是在未来十年都不会增长的想法是错误的。保持投资速度意味着每年投资的增长都保持相同的百分比。我完全负责地说,柯秀尔同志的这个观点——说得客气些——是因为不懂什么叫复利。

有人喊:五年后我们就能解决问题了。

李可夫:假如根据今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按照复利计算,5年后我们一年就应投入40亿卢布,10年后要投入120亿卢布,几十年后(柯秀尔同志说的)就要投入几百亿了。

考虑到工业发展的各种经验,我个人认为,这种把经济过程简化成算术语言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而当我们从谷底、从很小的数字起步时则另当别论,这时高增长率是不可避免的,这恰恰是因为起始的绝对数字小得可怜。

柯秀尔:关于绝对数字我已经谈过了。

李可夫:增长的速度就是这些绝对数字增长的速度。担保数十亿投资在几十年内每年增长20%—30%,这至少是轻率的。

在应该根据什么特征来确定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解。许多普通党员即使没有绝对化,也是首先把工业化的发展与商品数量的增加、减少工业品的短缺、降低工业品价格、改善工业品质量、减少失业联系起来。在工业化增长的这些特征中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即这些特征可以说是在消费特征、在广大群众最清楚的工业化结果方面决定着工业化的速度,而且这些特征没有说明有关经济和工业的内在结构、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以及要达到这些消费结果需要做什么的问题。

文献中通常按照投资的速度来确定工业化速度,这是相当正确的,但同时我们常常把所有的开支,即折旧费、部分利润、预算补贴统统混为一谈,也就是把决定简单再生产的要素(如折旧费)与决定扩大再生产的要素混淆起来,并且根据对这些数字的对比计算工业化的速度。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要求只能被理解为要求这个数字的增长率每年都有所提高。问题“被简单化”到极限,有时还打着

争取对问题有个原则性提法的幌子用这种“简单化”来对抗经济分析的种种尝试。对于控制数字的制定者来说,问题在于投入能筹集到的最大数额的资金。我们在按照苏维埃和党的程序对控制数字进行审查时增加了基本建设开支,根本不是按照算术方法对去年和今年的增长率进行计算的。我们有发展工业的需求,我们有物质资源,为了加强工业,我们顶住了其他各种各样需求的极大压力。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对问题唯一可能的和正确的提法。应该争论的问题是,能否筹集到资金,是否拥有加快工业发展的资金。

柯秀尔同志在发言中说,他也许是没明白我的意思。这我完全允许,但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最无可指责的。

柯秀尔:那你就说清楚点,好让大家都能听明白。

李可夫:对于有关速度问题的不够明确的提法我还有一点看法。我们现在已进入合理化和对我国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进行根本改造的时期,已进入用新的技术发明对生产发展实施革命化影响的时期。这必将带来的结果是,随着技术领域引进某种新发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就会生产出某种成本更低,基建投资更少的产品。有关速度的谈话是否都考虑到这一点了呢?没有考虑到。我们今年应该使建设指数降低15%,这显然会由于基本建设工程效率的提高而对速度本身产生影响。除了绝对投资数字和相对投资数字外,对于确定某种速度的现实意义来说,要考虑到合理化、效率、资金周转速度等等。因此完全可以想象,在增长率较小、但工作更加优秀的情况下,这种增长的现实经济意义将是巨大的。

谈到我们困难的程度和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势力加紧对抗,我要把还是这位柯秀尔同志的论断当作基础。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和柯秀尔是“敌人”(我和他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而是因为他的发言首先给后来发言的人定了调儿,并且给这个问题奠定了错误的概念基础。他的确是这样说的(我引用一段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

“同志们,我认为实施纲领时将要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在执行结合方针时,我们要和小农国家、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执行全部计划,必须与非无产阶级分子进行斗争,以遏止自发势力,使其服从我们的领导。在这方面走得越远,对抗就会越激烈,我们就要开展更大规模的工作来克服这些困难。在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中,阶级敌人会攻击我们最薄弱的环节。阶级敌人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简言之,他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实施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道路上走得越远,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就会越激烈,我们就会遇到更大障碍。或者用一句古老

的俄国俗语说就是：人林越深，木柴越多。

柯秀尔：你这是过于简单化了。

李可夫：我认为这个论题是不对的。

有人喊：这不是俄国式结论，是乌克兰式结论。

李可夫：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关于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存在阶级斗争的），那么按照柯秀尔的观点，社会主义敌对阶级的反抗必然会加剧。

柯秀尔：当然是在一定的阶段。

李可夫：柯秀尔说的更清楚：我们走得越远，困难就越多。我不知是在与加米涅夫还是与季诺维也夫争论时曾经说过：亲爱的朋友们，请进一步发挥你们的思想，直至逻辑的界限。如果阶级反抗不断加剧，也就是说，如果阶级敌人的力量不断壮大的话，那这不是别的，而是在论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思想。

有人喊：这不是力量，而是反抗。

李可夫：这里说的是反抗的力量。这个思想在不同的发言者那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种表达方式是反抗，一种是加剧，另一种是尖锐化。不管怎样去读柯秀尔的这个讲话——从头读、从后读或是从中间读——我都认为整个这一方针都是错误的。只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观点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资本主义复辟拥护者的阶级基础就越少，阶级矛盾也就越少。这是党的基本路线，它绝不能是别的什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只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不仅意味着我们阶级基础的扩大，即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比重在国家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增加，而且意味着作为国家政权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所谓的中间居民阶层影响的扩大。这就是基本路线。富农和耐普曼是我们的敌人。但中间摇摆阶层（中间阶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基本的农民群众）的状况决定着富农和耐普曼的力量，决定着他们与我们对抗、而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他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党的纲领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俄共对待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中农和富农区分开，党要认真对待中农的需求，从而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一边来，要通过在思想上施加影响，而不是压制的方法来与中农的落后性作斗争，在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尽量与他们进行实际协商，在制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时对他们作出让步。”²²⁶

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中也有相应的内容。²²⁷ 这

一方是在党的决议、党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纲领中总结出来的。事实上,党围绕这一方针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这一点正是争论的要点之一。其实托洛茨基在其《1905年》²²⁸一书的第1版前言中的确说过,无产阶级“不仅将与所有的资产阶级派别……,而且还将与帮助他们取得政权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发生冲突”,²²⁹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方针。这个问题是我们党内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完全不利于托洛茨基的。

有人喊:柯秀尔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

李可夫:我对柯秀尔相当了解,丝毫不认为他会变成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绝不能在在自己的圈子里因为某些提法有错误就立即创造出一个思想来。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绝不能在这里使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根据一块骨头复原出整个动物来。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能用在这里(笑声),不管怎么说,这不是那块能复原出整个柯秀尔同志的骨头。(笑声)

柯秀尔:这就是你对这个问题作的全部分析吗?

李可夫:这是柯秀尔同志与我争论时提出来、我觉得必须要讲清楚的两个问题,但我认为,在争论中正确的是我,而不是柯秀尔同志。柯秀尔同志的讲话,以及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观点的经验使我相信,党内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并不少见。例如,一部分党员到现在还认为,我们应该与手工业小商品生产者建立一种类似于大资本主义生产排挤小资本主义生产那样的关系,新工厂的建设意味着手工业者的必然破产。这些同志在一些情况下弄不清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对中间阶层的影响,弄不清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应如何与这些阶层建立关系。由此产生了对于最近屡见不鲜、在某些同志的一些重要观点中找到某种根据的行政手段和手工业中的各种“事件”的绝对不能允许的态度。

我所论述的过渡时期阶级力量对比方面的基本路线,在一些情况出现巧合时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形。敌对阶级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加强,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预见到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的一些阶段会暂时变得尖锐起来的共产国际纲领也考虑到了这一点。²³⁰

至于国内右倾危险、即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的问题,那么这个危险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存在。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只有两个基本的政治纲领——资产阶级政权的纲领和工人政权的纲领。除了工人政党不可能有比我们共产党更左的政党,因为没有比工人阶级更左的阶级。始终存在的国内右倾危险或者说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危险在个别时候有所增长。布列斯特和约²³¹时

期、喀琅施塔得叛乱²³²时期以及规模小得多(当时我们只在这方面发现了不多的迹象)的格鲁吉亚起义²³³时期就是如此。在所有这些阶段,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对党内出现动摇、摇摆情绪及各种倾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呢?我们正处于向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几乎是发起全面猛攻的时期。我们有效地遏制了商业领域的私人资本,我们不仅切实地开始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而且还着手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形式,我们开始切实清洗我们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敌对分子。近来,我们对沙赫特事件及其他一系列事件展开的调查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可见,党正对私人资本主义基础进行全面而有效的进攻。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在发动进攻时,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为资本主义分子利用中间阶级的动摇情绪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基础。换句话说,国内的反革命情绪可能会因此沉渣泛起,变本加厉。比如我们在粮食方面遇到的困难肯定会被用来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抵抗。国内的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个别党员的政治情绪,如果困难稍大一些,就会影响到党内一些阶层的情绪。所以,我在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把国内右倾危险和党内右倾的问题与我们落实控制数字遇到的困难联系起来。我们以前在工业化问题上也出现过这样的情绪和思想摇摆。例如,在实施工业化的道路方面大放厥词的沙宁²³⁴,还有曾抛出富农是“稻草人”的著名论题的博古舍夫斯基²³⁵。这种情绪在当时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也许,这些同志现在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这个我不知道,但像沙宁和博古舍夫斯基这些同志的典型情绪在困难的影响下将会再次表现出来。

有人指责我,说我将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危险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我说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左的词句为掩饰,按另一种方式利用我们的困难来维护自己同样是右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以左的词句为掩饰的右倾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与公开的右倾危险的区别。

从我在报告中对经济形势和1928—1929年度的控制数字的评价可以得出右倾危险有可能增加和必须与右倾斗争的结论。但有人对我说,斗争归斗争,可你没有把调和主义说清楚。假如需要斗争,就不能调和。(笑声)假如需要斗争(这是我强调的),就意味着不能调和。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我没有“一字不漏地”重复“不要停止和削弱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要把重点放在反对右倾危险、反对右倾调和的斗争上”这句套话而进行的“批评”,也是一种“倾向”,或者是同样不好的思维方式,即用一成不变的重复词句来代替思维。

但与右倾危险作斗争的困难在哪里?如果从整个思想、对国内和党内形势全面分析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这些危险。柯秀尔同志在谈到右倾时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倾向形成固定的风格、纲领或行动纲领,在这里可以说还是萌芽。按照柯秀尔的话说,如果我们不能“使党具有一定的免疫力”,我们所面对的萌芽将会使危险蔓延。

我现在不想就目前形势的实质进行争论,我认为,从这个说法中可以发现群众运动的困难所在,发现靠无休止地重复反对右倾危险的套话和诅咒是不可能开展群众运动的。我们组织数十万党员和数百万非党工人群众对右倾危险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应该知道,组织群众也就是组织群众开展一定方面的行动和完成相当明确的任务。我和柯秀尔同志可以从事写作工作,而由群众来行动。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挖苦讽刺孟什维克的,当时那位马尔托夫绘声绘色地向工人们讲述并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无序状态,而后来,当被他说服的工人们拿着棍子、长矛和左轮手枪走上街头的时候,他又感到惊讶。我,应该说,是不希望这样的,我只是证明资产阶级的部长们不是好人,而他们却要去战斗。对于著作家来说,他的工作在文章寄给报社编辑部之后就结束了,而对于被著作家说服的群众来说,事业才刚刚开始,对于组织起来的群众来说,事业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之中。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当前开展的运动的缺陷在于,缺乏大规模行动的具体行动纲领。群众被动员起来——这意味着群众行动起来了。据我掌握的材料,基层组织中很长时间内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并对有些地方发生的事情表示怀疑,而他们那里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正常。有些人认为,斗争是针对莫斯科,也就是针对以乌格拉诺夫为首的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与右倾危险作斗争的纲领,而这是组织大规模群众运动所必需的。凭良心说,我现在和将来不相信任何一个决议、任何一个农村党组织,他们会把套话写进决议中,然后再寄给我们,说他们那里一切都很好,而莫斯科的某个地方情况却很糟糕。我确信,甚至连土地国有化法这样的苏维埃政权基本的和原则性的法律,在我们苏联的许多地方也常常会由于党组织的沉默甚至姑息而遭到破坏。如果这样的基层组织拿出按照公式写出来的、把乌格拉诺夫或某个人还当成“倾向分子”并要人相信他们那里一切都很好的决议,那他们就是在撒谎。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们那里根本谈不上“很好”。

我们所有人在政治局,比如说,都相当坚决地认为,党在征收统一农业税方面的路线在很多情况下都遭到了破坏,损害了中农的利益。²³⁶许多地区偏离了党的路线;我们也收到了这些地区的决议。怎么,你们以为决议在这方面至少会

说上几句吗?当然没有。

乌格拉诺夫: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

李可夫:现在到处都在谈论有关乌格拉诺夫的事情。原来他们以为,如果他们卖掉土地,买卖合同在苏维埃进行登记,党对中农的路线遭到破坏,那么这根本不是什么倾向。我们开展群众运动时,没能把它组织成一场彻底清除右倾“奥吉亚斯牛圈”的运动。在提出谴责倾向的决议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似乎说的是莫斯科。我确信,在那些工作直接涉及农村、庄稼人、贫农和中农的基层支部和组织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偏离党的路线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因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主要来自农村。不要以为地方、外省和农村的做法都是对的,调和主义或者右倾只是在莫斯科存在。

有人喊:莫斯科的右倾最严重。

李可夫:那你们可要知道,在莫斯科,也就是说在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层中根本没有什么右倾。

有人喊:你干嘛为他辩解?

有人喊:当时是什么情况?

李可夫:当时的情况与乌格拉诺夫同志受到的指责是一致的:对右倾的斗争不够积极,不够坚决。

有人喊:瞧瞧,这是最主要的。

有人喊:就是说,和谁作过斗争。

李可夫:如果从莫斯科同志全部工作的真实情况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就应该证明,在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在与农村的关系方面,莫斯科委员会的政策及其全部活动与党的路线是没有区别的。

我们在政治局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认为,莫斯科委员会的路线与党的路线是没有区别的。²³⁷可是在你们买卖土地(喧嚷声),按照统一农业税向中农违法征税的地方,也存在这种倾向。

有人喊:说得对!

李可夫: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对莫斯科组织也不要有过火行为。

有人喊:我们有过火行为,你以为你在这里就没有过火行为?

阿库洛夫:这种情况到处都有。

李可夫: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政治局一直都认为,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路线基本上是党的路线,在对这一点进行评价时提出了各种说法,如“没有区别”,“和中央的路线一致”,等等。

有人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喊:那中央的通知呢?

李可夫:中央通知的内容和我跟你们说的一样。

有人喊:那佩尼科夫呢?²³⁸

李可夫:中央决议根本没提佩尼科夫。

有人喊:那全会上的发言呢?

李可夫:如果你们认为,我现在要谈各个组织内的所有发言,你们就错了。我要说的是莫斯科组织及其基本政治路线。

有人喊:谁也没指责这个路线。

李可夫:谁也没指责?所以也是右倾,是吗?除了偏离路线,能叫“右倾”吗?!而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的活动根本没有偏离正确的路线。

阿库洛夫:但是有估计不足的情况。

李可夫:是有这种情况,因此政治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存在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但莫斯科委员会马上自行纠正了这一点。但是我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呢?是为了表明,由于必须与党内右倾危险进行实际斗争,就要最大限度地根据党在一些地区和组织中的工作情况将这一斗争具体化。例如,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农村工作的经验,考虑到我们在路线上的偏差,比如与富农危险斗争不力,对中农的路线有偏差,以及对农村贫农群众组织的意义估计不足,那么柯秀尔的错误可能在于,他认为我们只存在右倾危险的萌芽。如果考虑到我说的那些情况,那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某种大于萌芽的情况。右倾危险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大量渗入党内。在农村,这一危险会由于我们的某些组织与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结合而表现出来;在城市,则会由于个别同志与官僚机构、有时是中立机构乃至敌对机构的结合而表现出来。右倾危险会通过两个渠道进入党内:一个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他们与我们的组织结合时会产生这一危险,还有大的苏维埃机构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样的机构里有我们的共产党员。如果你想真正地与右倾危险作斗争,就要使所有的组织不仅参加有关莫斯科组织问题的讨论,而且要在自己的组织中与右倾作斗争。

喊声:说得对。

李可夫:主要的任务是,要以应有的形式组织党和工人阶级落实控制数字和经济计划(尽管这些任务非常复杂,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并在维护党的经济政策过程中为克服种种倾向,首先是右倾,而进行斗争。

有人喊:我们地方上只要搞结合就要开除出党。

李可夫:这种“结合”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形成的,因此小资产阶级会腐蚀我们的同志。这不像主显圣容,是瞬间的事情,而是逐渐形成的。

有人喊:我们地方也在斗争。

李可夫:但我们斗争的力度还不够,党员中明显存在破坏苏维埃政权基本法——土地国有化法——的行为。当我外出在地方上打听这件事时,听到的回答相当冷静:“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也许会提交法院。我们这儿这种事太普遍了。”这难道不是明显在为资本对我们政策的基石——土地国有化——的打击而辩护吗?

对于歪曲我们在统一农业税方面的方针,还有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地方机构另外筹集资金建学校、医院、桥梁等的愿望是“合理的”。因此,现在有一种根本不把征税方面的各种倾向看作是倾向的趋势,因为,你们知道,这给一个地方组织的预算只带来区区50或100卢布。这促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作专门的讨论并进行干预,以确保党的基本路线得以落实。²³⁹

波泽恩:那里并没有组织过反对中央的活动。

李可夫:那里没有组织过,可这里组织过反对中央的活动。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全部谈话就应从这一点谈起。召开全会应该从谁、为什么、如何组织的,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入手。让我们专门来谈谈这个问题。那样的话,谁也不会指责我,说我没有证实波泽恩同志所说的事情。如果波泽恩同志想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特别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有人在这里严厉地指责我,说我根据表面特征错误地评价了公开的右倾危险和托洛茨基主义。应该说,我并没有说这一点,我说的和这一点完全相反。我说的是,只要不把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我说的是,不要以为党内没有托洛茨基分子了。我们的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工厂一个车间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是托派组织,并通过自己的支部委员会加入了非法组织。

有人喊:不是整个支部。

李可夫:我引用一下《真理报》刊登的内容:41人中有39人被监察委员会追究责任。²⁴⁰

有人喊:不是这样的!

波泽恩:有37个人已经解脱。

李可夫: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这个支部委员会执行的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是无可争议的。

我可以肯定,重新入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并没有停止他们在党内维护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斗争。

有人喊:只有一部分人。

李可夫: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可以用一些事实证明这一点。我跟你们说过,我们中的一位书记是托洛茨基非法组织的成员。这总能说明点什么吧。

有人喊: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李可夫:很显然,如果他是托洛茨基非法组织的成员,那他肯定是托洛茨基分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明明知道他是非法组织成员还吸收他参加工作。

我接着说。我在举右倾的例子时提到了沙图诺夫斯基的信²⁴¹,不知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仍然坚持认为,沙图诺夫斯基的信是极端右倾的明显表现。

有人喊:那弗鲁姆金呢?

李可夫:列昂诺夫等人在对沙图诺夫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这个论题上的“批判性思维”令人极为不解,据他们说,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说谁都不能随意改变——从生物学意义上——自己生身父母的话,那么从思想意义上变更“父母”则是常有的事儿,沙图诺夫斯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从一个超工业化分子几乎转向对工业化意义的全面否定,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看成是毫无用处的东西。怎么,难道这不是极端右倾的最极端的表现吗?

在这里坐在右边的“左翼”——沙茨金和其他人还在弗鲁姆金同志的问题上对我进行挑唆。

沙茨金:我根本没有挑唆您,也根本什么都没有问过。

李可夫:我在这里是从集合意义上提到您的名字的。我认为,弗鲁姆金同志在其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我还没来得及读完)中犯了一些错误,如他低估了工业对农业的革命性影响,在评价农业生产中的负面现象时有些过激,低估了集体农业生产形式的意义等等。

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我在报告中已经强调指出过,在社会阶级的意义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常常被低估,其实它们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以这种方式第一次真正开始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农业生产。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当然会遭遇一些挫折。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成就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领域的成就。与此同时要非常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农业中占有质量优势(正如决议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在这方面仅仅迈出了最初几步)的条件下,从目前粮食问题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数量

方面与农业中的小商品生产者的总数仍有很大的距离。

[安采洛维奇:秋天好在有3000万。

李可夫:假如安采洛维奇同志说的是钱的话,那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人把我看作是一个拎着钱袋到处走的人。

安采洛维奇:这3000万普粮食好就好在是在秋天。]

李可夫: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或者任何决定性数量粮食的可能性不取决于<今>年,也不取决于未来几年。但是随着农村按照社会化原则组织整个经济的工作的结束,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我们应该看到,按照与我国工业类似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来组织农业,过渡时期就将结束。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实现社会主义。从这一观点来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以说是我们按照新的原则对我国整个农业进行改造的最初尝试。因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它们的意义估计不足是危险的错误。我在上一次全会上已经谈到了弗鲁姆金同志的这些错误。我当时还谈到了弗鲁姆金同志的一个错误提法,他说,对我们来说从哪里(从哪些农民群体,从哪些农业经济成分)得到粮食似乎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从集体农庄得到的粮食,与从富农那里得到的粮食根本不是“一样”的。从中农农户那里得到的粮食也完全不同于从富农那里得到的粮食,富农是靠剥削生产出粮食的。这些我在上次全会上都说过了。²⁴²

我还想在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价方面消除一个误解,由于这个误解而使 我遭到大量指责。假如我说过,托洛茨基主义——按照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党外的和反党的政治流派,那么由此就不会得出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已经不需要思想斗争的结论。那些认为在思想方面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的同志是极其错误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工厂的一个支部,显然应该和有可能在思想上脱离托洛茨基分子。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分子采取其他的(镇压)措施并不是因为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斗争,而是因为光有思想斗争是不够的。

我现在谈思想斗争,是因为我们这里时常出现用完全错误的方法与右倾斗争的苗头。事实上,如果报纸上用大字刊出“我们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调和派分子”这样的标题,那么这种口号不是主张开除出党,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标题甚至出现在《真理报》上。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也是报纸上的。有一份报纸这样写道:“在合作化机体再生出来的一些细胞中,有一种极其危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官僚主义及本

位主义的亲近结合过程。党和积极参加合作化的广大群众应清醒地认识到,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应与对盗用公款和盗窃行为的斗争同样严厉。”所以说,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对盗用公款和盗窃行为的斗争应同样严厉。而按照我国的法律,对盗用公款和盗窃行为在不久之前是处以死刑,现在是处以10年监禁。我要问:与盗用公款和盗窃行为作严厉斗争是否意味着首先要进行思想上的斗争呢?

奥尔忠尼启则:绝不是思想斗争。

李可夫:这可是1928年10月6日的《真理报》社论。²⁴³

有人喊:哪个《真理报》?

李可夫:《真理报》是党的中央机关报。我在开会时常收到这样的便条:“你们说,右倾危险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危险,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那么请问,你们把公开的右派分子派到哪儿去了?”我这里还有一些便条,这些便条是针对一种不正确的问题提法的,这种提法反映在报纸就右倾和调和主义引用的例子中。当然,合作化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比盗用公款更危险,因为这种动摇性能为合作化的另一种阶级方针提供可能性,而盗窃行为绝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但盗窃是刑事犯罪,将刑事犯罪与党员的政治错误相提并论并要求与这些错误进行更严厉的斗争,这简直是太愚蠢了。当然,我从《真理报》的社论中引用的内容根本没有否认《真理报》执行的是党的路线,而且我引用这段话也不是出于这个目的。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有关我与弗鲁姆金同志的一次谈话的。弗鲁姆金同志找到我要求辞职,称由于反对他的那场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还由于他在右倾危险承载者中的受之有愧的“地位”,他不能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波斯特舍夫:辞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做法。

喊声:说得对。

李可夫:波斯特舍夫同志认为,辞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对此我要指出下面一点:我希望,你们大家不会怀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布尔什维克吧,但他曾两次递交辞职申请!²⁴⁴

有人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做,不是说别人也能这样做。

李可夫:我告诉弗鲁姆金同志,既然他服从党的决定,执行党的所有指示,既然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工作进行派别斗争,维护自己的见解,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接受他的辞职,于是我拒绝了弗鲁姆金同志的请求。

喊声：做得对。

李可夫：同时我对他说，我坚决反对这种导致遵守纪律的党员和在业务上称职的同志被解除工作的党的制度和工作条件（而弗鲁姆金同志即使不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最优秀的部务委员会委员，也是最优秀的委员之一）。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里的做法也是完全正确的。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没有发言，我认为他可能和我们有分歧。但我深信，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作为我国财政和我国经济的优秀专家之一，应该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最好的使用。党和政治局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经验和能力的话，那就不对了。

当然，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撤换某位同志的必要性。但与右倾危险斗争的主要手段应是思想斗争，而不是组织结论。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内容，绝不能得出接受弗鲁姆金同志辞职申请的结论，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最有能力的同志之一。

我再谈谈有关莫斯科组织的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我已经谈过。既然在这里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现在就读一下政治局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查明，莫斯科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来纠正所犯的错误，这已经在莫斯科委员会10月2日的信中反映出来。中央委员会声明，整个莫斯科委员会及其领导核心从前和现在都执行了党的路线并无条件地履行党的机关的决定。中央委员会驳斥了有关莫斯科委员会与党中央对立的说法，认为这不符合事实。”²⁴⁵

波泽恩同志，这就是对您的问题的答复。

波泽恩：我没说过这个问题。

李可夫：这是从中央告全体党员书中摘录的。

波泽恩：我没说过，莫斯科委员会组织了斗争。

李可夫：那您都说什么了？如果您没说有关乌格拉诺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事情，那么真不明白您都说什么了。我认为，为搞清莫斯科的问题，必须宣读政治局的另一份决定。政治局10月18日决定（批准中央联合书记处和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有关莫斯科组织问题的决定）写道：

“莫斯科委员会现有的领导核心无疑已保存下来，会议还一致拒绝了乌格拉诺夫同志关于解除其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的请求。”²⁴⁶

这里有人说，保留乌格拉诺夫同志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职务是破坏民主的行为。但民主体现在哪里呢？党内的一些阶层或党员提出了各种建议。政治局

和政治局委员的民主作风根本不在于他们必须同意所有的建议。民主赋予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党章范围内维护这一意见的权利。政治局领导的作用要求它这样做,否则它就不是领导机关了。我认为,这是民主的要求,而且我作为政治局委员有责任在党章范围内为政治局的决定而斗争。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但就重要性来说绝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土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比对其他问题的讨论有意义得多,许多人对在我的报告中遭到严厉批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比如关于农业衰退的问题。但对决议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我认为,埃赫同志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个“实质”,他反对在政治局的决议里用诸如“农业极其落后”这样的形容词来评价农业状况。我认为这是我在本次全会上听到的最危险的观点。现在对粮食问题的意义估计不足,这意味着愿意面对重大的经济困难,也可能还有政治困难。我在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如果我国农业近三年出现的现象(发展速度迟缓,农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工业)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工业化纲领就会遭到破坏。

粮食目前是制约我国整个建设事业的一个因素。近三年来,我们的粮食收获量居于中等,有时甚至是中等偏上,我们已经是第二个年头缺粮了。今年由于乌克兰的越冬作物绝收而遇到困难,但去年没有出现这种困难!粮食现在成了制约工业化、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因素,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这一点。我认为,对谷物业状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全党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其实正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概算所表明的,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履行有关将播种面积扩大4%的指示,达不到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的目标的话,我国明年的粮食供应形势就不会好于今年,就会比1926—1927年度还糟糕。其实应该明白这一点!对于埃赫及其他同志关于将决议改得缓和一些,使其对形势的评价更乐观一些的意见怎么能不表示反对!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两年的粮食供应是实行限制的。应该知道,凭票供应粮食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都认为,应当在工业领域赶上和超过西方。难道你们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不向居民供应他们所需的粮食来实现吗?不过,就算我,像谈到关于“右倾”和“左倾”数字的瑟尔佐夫同志所认定的那样,列举了悲观的数字。就算我所说的数字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今年和去年都没有向粮食消费地区农村居民提供他们实际需要的粮食,这可是事实啊!去年和今年都出现排长队现象,许多城市都对粮食供应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也是事实!如果连这些论据都不起作用的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证明我国粮食供应形势的严峻和这个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了。

难道非要对这些人实行列宁格勒某个郊区那样的粮食定量吗？我再说一遍，我对我国经济形势的看法是，假如粮食和食品的困难局面得不到缓解，我们就会毁掉我们的工业化计划。谁能反驳这一点，请吧。

这不，米柳亭同志走上这个讲台说，速度的提高是“实实在在的”：一开始播种面积增加5%，后来增加2%，再后来增加1%多一点，他同时证明，“理应”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已经是第二年遇到粮食问题。按照这个米柳亭的说法，这还是在收获量中等或中上等的情况下出现的。怎么能这样讨论重大问题，尽说一些什么悲观、乐观的废话。当我们在这里讨论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来自粮食消费地区的科洛季洛夫同志及其他同志却只字未提他们那个地方粮食供应的情况。让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来说说，在粮食供应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加速国家的工业化！

主要的问题在于，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使农业发生应有的变化，如何在明年将播种面积扩大7%并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这一指示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大家回到地方后，要在现有秋播地的情况下，在整个俄罗斯联邦至少将春播面积扩大9%。首先要认清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而不要无谓地相互指责“乐观”、“悲观”。要认清今年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将工业化继续下去。

与这个主要问题相比，所谓农民个别税的问题就成了次要问题。

请允许我援引瑟尔佐夫谈到个别税时说的一段话：

“走削弱富农的路线，意味着放弃个别税。我认为，这是对富农最不可思议的、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投降，这种投降毫无理由，其中包括农村现有力量的对比。”

有人喊：说得对。

李可夫：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在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内曾建议完全取消个别税，提高富农上层分子的税。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一致通过的政治局决议的措辞进行了研究。所以，正如瑟尔佐夫所说的，对个别税的“可怕”放弃恰恰是我的建议。瑟尔佐夫的讲话甚至读起来也很可怕：“……毫无理由的投降行为是最不可思议、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请看看对这个问题都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在这个建议里根本没说投降，甚至连这样的意思也没有。难道我们在农村征税的阶级性仅仅体现为征收个别税吗？难道税收的累进性会随着个别税的取消而消失吗？没有这样的事儿！我国有关农业税的法律是根据累进收税的原则制定的。我给大家看一份有关农业税占上层群体收入百分比的

资料:

按照纳税收入划分的类别:

	800—900 卢布	900—1 000 卢布	1 000 卢布以上
1927—1928 年度	13.0%	13.9%	16.9%
1928—1929 年度	21.3%	23.7%	28.4%

(含附加费)

扩大这种累进级数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非要把跟富农的斗争与个别税联系起来,这就让人完全搞不懂了。在实行新的农业税法²⁴⁷时,我本人是维护个别税的,也是这样论证的。由于我们计算富农积累所用的方法不够完备,由于富农知道如何掩盖他们收入的某些来源,我们试图让地方查清我们没有察觉和法律条文没有揭示的这些收入来源,如条件苛刻的贷款或借粮,等等。这是实行个别税的原因,但不是为了从某些富农(更不用说中农了)手里按照那些特征,或者像人们所说的,按照法律中规定的、按一定标准交税的征税对象再额外收点儿什么。那样的话,提高富农上层的纳税标准更容易,这个建议我在委员会也提过。关于税是如何收的,我已经谈过了。但为了避免在这方面滥用职权和为所欲为,我建议完全取消个别税,提高富农纳税的标准,而且不要少于个别税的数额。在这个建议里,绝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富农式的”、“过分的”和“投降的”东西。但你们这些地方工作人员应该指出来,是否有哪些地方的税收伤害了那些根本不能算作富农的中农群体的利益。 *

我还要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曾经提过,这就是关于刺激个体农户发展的问题。不过首先要谈谈米柳亭同志的讲话。总而言之,米柳亭同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晕头转向,这可得有大本事啊。(笑声)米柳亭同志在引用我和布哈林同志的话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自己说时却完全错了。我建议他今后不要再说自己的话。(笑声)

米柳亭同志引用了一些农产品数字,对那些据说想创造农业递减曲线论的人进行了猛烈抨击,而后又断言,目前只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才是摆脱粮食和食品短缺困境的出路。这是他讲话的主要意思。但这显然毫无新意,让人不解的是,在中央全会上怎么能讲这种话。显然,经营型的个体生产者,根本不同于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但个体生产者至少要交 90% 的粮食,这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令我们遗憾的是,就眼前的困难来说,个体生产者目前在数量上的作用仍

是决定性的。米柳亭在公开场合详细地谈过这些,不知为什么,有人还对他表示赞许和支持,说什么:“是啊,说得对,只有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我再说一遍,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需要组建,为此要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在目前,在今后的几年里,光靠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不能使我们摆脱危机,我再说一遍,不能。当我们把所有农村都组建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时,过渡时期就将结束了。也许到那时,我们就会出现真正的左派,他们将会提出关于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修正主义纲领,我们也将在全新的层面和全新的情况下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米柳亭同志的讲话没有弄到)但现在要说的是,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用来更好更快地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当前整个经济政策中的主要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但这个问题需要、而且能够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任何偏离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但若是在解决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时只是自我安慰,说什么去年我们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拨款几百万,今年要给它们拨几千万——这就是在加速危机的到来。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不要停止对富农的进攻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假如,我再说一遍,明年、后年也像前两年一样的话,我们就会连我在本次全会上所说的控制数字也拿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无法保持现有的工业化速度,而且发展速度还可能放慢。要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与这个主要问题相比,大家在这里谈的其他问题在目前来说都是次要问题。在这个主要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完全一致。至于说我们不善于利用所有的刺激因素和可能性来促使中农把自己的积累用于发展经济,我认为这已经无须证明。靠国家来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而且用国家的钱来发展个体农民经济也是完全不理智的。在继续与富农作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要帮助中农发展经济。所以说,我们党内有些人轻视过火行为(尽管是统一农业税方面的过火行为),是很危险的。其实过火行为在一些地区是相当严重的。假如说,有些地区不是向3%而是向20%的人收了个别税,而且其中的一半是中农,要知道,这样一来每10户中农就有一户要吃亏!若以为其他中农不会想到明天将轮到他们,纯粹是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农怎么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发展经济呢?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税率,在于全村、全区都知道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甚至在我们的统计工作中也存在许多这样的现象),并且在向这种行为“看齐”。如果说和前几年相比,现在已经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提供耕畜、机器,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技术潜力用于发展经济,那就说明我们以前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潜力,也不善于为

农民发展经济创造足够的动力。如果农民的这种动力完全消失,我们就会处于国内战争那样的困境。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与农民的关系相当和谐,相当稳定,只要我们今后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就能很快地解决粮食问题,使局面得到改善。我再说一遍,假如我们不能履行有关农业发展控制数字的指示(而且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因素,而不是扩大播种面积),国家在粮食和建立最低粮食机动储备方面将面临紧张的局面。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讨论情况。

可以把所有发言的人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按照洛米纳泽同志的说法,要求对决议进行彻底(!)修改。洛米纳泽同志在其发言中显然是认为,我们的决议可以说是右倾的表现。

洛米纳泽:说得不对。

李可夫:不是这样吗?可是如果“彻底”修改,该怎么改?

其实你们就是认为要对决议进行“彻底的”修改!

第二部分基本上表示赞同决议。第三部分同志对决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我认为,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具体修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决议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在某些说法上,有可能出现一些偏差,这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改进的。但绝不能改变决议的路线,不需要对决议作原则性或“彻底的”修改,我认为,中央全会应一致重申这一点,就像政治局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一样。重大的、原则性的修改应当被否决,因为这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修改。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份决议是长期工作的成果,在政治局的委员会和政治局内均得到了一致的通过。

关于这份决议可以说,它是我们在革命胜利后的11年中,在经济领域取得新的、很大的、可以说是巨大进展和条件下,向党发出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指示。

这个计划和这份决议应该在以前发展的成就、对工业巨大投资的基础上带来一个很大的飞跃,借助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定能取得稳固的²⁴⁸成就。针对我们去年遇到的困难,政治局提出在加强工业化方面进行反击。针对困难,在工业化方面进行反击,坚决改进食品和粮食供应恶化的状况。这个计划将要在整个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施,但同时也要克服一些大的困难。

这个计划将要在个别小资产阶级阶层的敌对情绪加剧、阶级斗争激化、国内反革命情绪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现在我们也能看到,我们机关里的一些非党工作人员、和我们长期共事的一些人存在着一些“松懈情绪”)。这个纲领只能在我们党绝对团结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现在带给大家一个一致通过和制

定出来的决议,就是我们党团结的证明。在履行这一决议、实施党的整个纲领时应当坚持的是组织工作和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必须有这种团结。(鼓掌)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现在我们将以政治局向全会提交的决议为基础进行表决。还有其他建议吗?现在表决。谁同意把政治局的决议作为基础?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现在有人建议选举一个由下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这些同志是:李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米柳亭、库比亚克、瑟尔佐夫、丘巴尔、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米尔佐扬、卡明斯基、柳比莫夫、茹柯夫、卡巴科夫、布勃诺夫、舍博尔达耶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鲁希莫维奇、科洛季洛夫、苏霍姆林、乌格拉诺夫、戈洛谢金、什维尔尼克、波隆斯基、卡冈诺维奇、雅科夫列夫和苏利莫夫。共32位同志。

还有别的建议吗?没有。谁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通过。还增补谁吗?

喊声:增补哈塔耶维奇、鲍曼、捷连斯基、温什里希特、弗拉基米尔斯基。

主席:不反对把这几位同志增补进委员会吧?通过。

这有一份加马尔尼克同志的声明,我来念一下:

“李可夫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谢列布罗夫斯基对他进行了攻击,加马尔尼克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攻击。我坚决否认我曾试图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在我的发言中什么地方会为‘攻击’的说法提供口实。因此我请求指出我的发言中李可夫同志认为是‘攻击’的地方。

我认为,这样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请将这个说明附于记录后面并在全会上宣读。加马尔尼克”。

现在散会。

第九次会议

11月21日上午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现在我宣布全会会议开始。

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初步总结并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报告人是施米特同志。

有人建议让弗拉基米尔斯基同志也进入控制数字委员会。没有不同意见吧?通过。现在请施米特同志作报告。

关于初步总结并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

施米特:我党关于在近年内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决定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的宣言²⁴⁹中正式提出的,这一决定对于工人阶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也是为落实我党纲领中关于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每天工作6小时这一条²⁵⁰而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对于我国工人阶级来说,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劳动保护条件,而且能为他们提高文化水平、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做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向我们提到的那一点——让每个工人学会管理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然而对我国工人阶级来说,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除了具有这一意义外,还具有重大国际意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使我们确信,我国的劳动立法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斗争有极大的影响。就连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经济极度落后国家的现行立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大不相同,而且比较为富有、技术上较为先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更胜一筹。我国的立法实践,特别是有关八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实践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和形形色色讨好资本家的人、社会主义的叛徒散布种种预言,说什么在我国的国民经济条

件下不可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八小时工作制在我国已经成为事实。它不仅是我国劳动法的一种庄严形式,而且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我国的劳动时间,包括加班时间,最多为7.3小时。这是因为,在我国,除了限制最长工作时间外,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从事有害工种的人还按缩短的工作时间工作。我国所有职员的工作时间为6小时,这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没有的。如果拿整个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来说,是7.3小时,这里还包括加班时间。

我们在实行这样的工作制的情况下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恢复了我国的工业,现在进入了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首先是改造我国工业的时期。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使我国的实际工资水平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有了更快的增长。我国近两年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增长了20%,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最多比战前增长2%—3%。我们正在逐渐缩小俄国工人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之间战前在工资水平方面的差距。因此,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我们不仅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而且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上遥遥领先于我国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毫无疑问,我们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也大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所以说,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即工人政策中这一最重要问题的解决,不仅没有使我们在恢复国民经济、改善工人阶级物质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方面处于落后地位,而且使我们在这方面迅速发展。

现在我们又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无疑会使我们在发展工业、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方面继续取得更大进展。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使得苏维埃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我们是在改造我国经济的时候提出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而且我们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同时也在使我国工业的整个工作过程变得更合理。

资本主义世界在向自身改造和建立生产合理化体系转变时期都做了些什么呢?它延长了工作时间,降低了工资,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与此同时,我国却在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缩短工作时间。这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合理化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合理化而采用的方法之间的根本差别,它无疑将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结果,资本主义改造的结果,正在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日益严重恶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西方工人阶级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席卷德国、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日益高涨的罢工运动浪潮、同盟歇业浪潮

证明,工人阶级已体尝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苦头,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种种办法的实行使他们不得不展开坚决的斗争,直至举行罢工,以便维持起码的经济生活水平。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一影响。

七小时工作制除了具有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加强对他们的劳动和健康保护的意义的意义外,它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我们既要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又要保持现有工资水平,确切地说,就是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时不降低现有工资水平。在改造我国工业并使生产合理化的同时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需要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保证,但我们不能把这个负担转嫁给工人。我们应当靠更合理地安排我们的全部工作——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更合理地组织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我们在制定工作方法、确定工作节奏时,不应当把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带来的全部负担统统加到工人的劳动强度上,我们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靠的是我国更高的生产技术。因此我们才说,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只有最大限度地集中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力量,只有最广泛地吸引最广大工人群众共同参与这项工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离开了这一点,我们就完不成在不降低工资水平,同时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等情况下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任务。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需要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在纺织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经验也促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以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关于七小时工作制实行情况初步总结的决议²⁵¹。我们在该决议中当然开诚布公地指出了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的许多错误和不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使七小时工作制的积极成果降低到了最低点。我们首先应当指出,已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群众本身对这一举措并不都那么欢迎。

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本应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使他们有可能把更多精力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可一些地方的工人却对它并不那么欢迎,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做得很不好,特别是我们没有向广大工人群众讲明情况,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这项工作。

这也是因为有许多情况我们当时无法改变。由于当时我国的纺织品奇缺,而从我国的原料情况看,我们有可能生产更多的纺织品,于是纺织企业改行三班倒。留给我们为改行三班倒和七小时工作制做准备的时间极少。一些企业接到的通知说,要在3—4天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和三班倒。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并同

时改为三班倒都需要做相应的准备工作,而在只有3—4天准备时间的条件下,企业的准备工作当然做得不充分,它们绝对不可能向广大群众讲清七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不可能召开工人会议说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理由,不可能征求工人的意见——为了更合理地安排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三班倒后的整个工作,需要如何解决生产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认为第二个原因是,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正好与签订集体合同运动²⁵²赶在一起,就是说,工人当时最关心的是签订集体合同后能拿多少工资、能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另外,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还赶上了一件事,这就是因改行三班倒和七小时工作制而采取的增加工作密集度的措施。以上列举的种种情况——未及时宣布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因而来不及为它做准备、签订集体合同运动和增加工作密集度等等,都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搅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指望工人理解七小时工作制对他们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又不能马上给工人带来任何结果,这种结果将来才能显现出来。许多工人反倒认为,尽管七小时工作制是一项不错的措施,但是一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就要增加工作密集度,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也不知道能拿多少工资,于是开始对这项好措施产生怀疑,并把一切不如意之处和自己的一切怀疑都归咎于七小时工作制。

还听到一些不加掩饰的说法:我们不需要七小时工作制,我们之所以不欢迎它,是因为它似乎是一种额外盘剥。当然了,这是个别人的说法,根本不能反映工人的普遍情绪,但是这种声音的出现本身就证明,这方面并非一切顺利,如果我们能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稍微做一点准备工作,能把这项工作安排得更好一点,就不至于听到工人的这种意见,哪怕是个别意见。因此,工人对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准备不足,往往根本没有准备,是初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主要失误之一。

第二个非常重大的失误无疑是由第一个失误引起的,这就是对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缺乏组织和技术上的准备,其结果是,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原材料质量极为低劣,生产过程中必需的各种辅助材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所有技术人员都没有做好准备,因而组织工作不到位。技术人员在这方面的表现,说得好听一点,是对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缺乏热情。但这不光是他们的过错,因为经济管理机构没有对他们进行足够的指导,没有告诉他们,为了顺利地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应当怎么做、应当做些什么。当然,不能以此作为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出现失误的唯一理由,因为技术人员了解自己的企业,了解企业的工作条件,他们自己应当

采取措施解决企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无须专项拨款和上级经济管理机构专门批准的那些技术问题。

匆匆忙忙地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使我国企业的工人成分变得良莠不齐。应当坦率地说,我国劳动市场上的失业者专业素质很差,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情况下,当然要增加工作密集度,一个纺织工要管3—4台织机并需要高超的劳动技能,而那些缺乏专业技能,有时根本就没有专业技能并因此而在劳动市场滞留几年的新劳动力,不具备胜任这项工作的能力,不适应变化了的工作节奏。一个人管3—4台织机需要有特殊的技能,而从劳动市场招来的新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要么是根本没有专业技能,要么是专业技能很差。我们曾经指望工厂艺徒学校给我们提供足够数量的熟练劳动力,并决定让工厂艺徒学校的学员提前毕业,尽快投身于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学习的时间够长了,我们也对工厂艺徒学校投入了很多精力。我们似乎是从那里得到了补充的熟练劳动力,它们似乎也能够在填补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和由此而形成的工作条件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要说,工厂艺徒学校培养的人与我们从劳动市场招来的人几乎具有同样的技能水平。

所以说,我们也不可能从工厂艺徒学校得到补充劳动力来填补我们熟练劳动力的不足。这一切导致了工人成分一定程度的良莠不齐,从而大大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旷工和事故也呈上升趋势,等等,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谈到。工人成分的良莠不齐还导致了企业的劳动纪律不严明,因为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时企业的劳动纪律已经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不同了。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条件下,已经不允许工人不利用自己的全部工作时间,或者说不准确地执行管理部门制定的规章,因为就正常的生产过程来说,这些规章是必须执行的。

我们还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已经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在劳动保护措施方面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增加了班次的企业,例如在实行了三班倒、几乎是连轴转的纺织企业,情况更是如此。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同,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时,健康的工作环境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工作节奏有了变化,我们将要进行的技术革新,无疑要求工人提高劳动强度,而这种劳动强度向我们提出了为企业的整个劳动创造更为健康的环境的任务。只有创造了健康的劳动环境,我们才能要求工人提高劳动强度。

我们过去在改为三班倒即生产过程几乎是连轴转的纺织企业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用于通风和修理织机的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劳动场所进行自然通风和创造比较符合标准的劳动环境。

这就需要在进行自然通风的同时采取一些技术措施进行人工通风,以便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健康的劳动环境。那么改为三班倒的纺织企业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最后一班工人的劳动环境简直糟糕透了——劳动场所的温度差不多能达到摄氏40度或列氏32—33度。

有人喊[柯秀尔]:温度“足够了”。

施米特:这个温度“完全足以”使人在工作1—2个小时后就感到疲惫不堪。然而,这样的温度不但对工人本身造成危害,而且也对生产过程造成了危害,因为在这样的温度下,纺织企业的原材料会逐渐变质,不再像原来那么好加工;经常发生大量断头现象,面料本身由于高温而发生变化,出现许多残次品,造成成本、劳动效用的损耗,等等。

面对纺织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后在劳动保护方面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应当格外重视劳动保护问题,因为它不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工人的健康,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我们同样关心的生产过程。

我们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工人的生活条件因此而变得更差,在没有增加班次时工人就住得挺拥挤,增加了补充班次,即增加了夜班后,住房的拥挤程度使工人根本无法忍受。由于匆忙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和三班倒,我们无法有计划地安顿新增的劳动力。我们不得不赶快让有房住的人挤出一点住房。如果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人都上正常班即白班,不上夜班,倒还可以比较正常地休息,但是如果加上第三班,差不多是连轴转的话,那就几乎没法一块儿住了。一个班次的人回来了,另一个班次的人走了,第三个班次的人又准备走,因此根本无法为几乎是连轴转的工人提供正常的休息条件。

合作商店为三班倒的工人提供服务的问题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企业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的纺织工人区,在人们几乎是不间断地工作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第三班的工人下班后,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为工人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会造成一些不利情况。这会使旷工和迟到现象增多,对劳动本身的强度产生影响,等等。

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失误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必须尽全力纠正这些失误,真正杜绝这些失误,相当多的失误都与一系列的物质投入有关。我们制定在工人阶级的住房、劳动保护和为他们提供其他服务方面的全部政策,都应立足于把我们本来有限的、还不足以为一切人做一切事的资金加以合理分配,使我们能在将要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地方为改善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和生活服务等条件做一切能做的事情,因为处理的这些生活琐事对于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在分配资金时必须格外注意这一方面。既然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们就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圆满一些,但是要解决企业工作的内部结构问题,我看还要花更大的气力。

我们正在考虑一些具有极大规模而且结构较为复杂的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如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冶金工业的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面临着组织—技术上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只能靠我们自己付出最大的努力,不克服这些困难,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后我们就可能遇到比纺织企业的问题更加难以意料的问题。为了改善生产过程,为了能在这里实现更大的技术改进,我们就要投入更多的资金。

让我们看看已经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普梯洛夫工厂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钢铁厂的情况。这类企业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投入的资金无疑更多,算起来得有几百万。在这里,为了把由于从八小时工作制改为七小时工作制而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全部损失真正转移到生产技术上去,用于准备工作的资金就会比纺织企业的还要多,在纺织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期,我们采取的补偿办法主要是实行三班倒,加大企业设备利用率,节约各项附加费用,以此来补偿企业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之初必然遭受的损失。而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钢铁厂这样的企业也采用这样的办法,对于我们来说困难就太大了,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技术—组织工作的角度看,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在不增加班次的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纺织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那里的情况真的糟糕到眼下这些失误还未克服,又会出现新的失误的程度吗?应当说,尽管存在着无疑有待克服的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失误,尽管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七小时工作制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必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并给工人带来完全不同的效益。

我们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结果怎样呢?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景象。纺织业分为两类企业——棉纺企业和制呢企业。制呢企业准备这项工作的时间较长,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技术条件也比较好,那情况究竟如何呢?如果拿棉纺企业来看,我们就会看到,那里最初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增长较为缓慢的情况。如果按季度计算,棉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有所增长呢?在刚刚开始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第一个季度,也就是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之前的第一个季

度,劳动生产率的指数为13.68,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第二季度,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其指数为13.41,第三季度的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其指数为13.29。如果把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之前的劳动生产率设定为100%,那么从我们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第二季度起,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第一季度下降2%,第二季度下降2.9%。工资增长的情况如何呢?按实际增长的金额来看,分别为2卢布18戈比、2卢布20戈比和2卢布22戈比。按百分比来看,第一季度增长1.8%,第二季度增长2.8%,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工人工资增长的幅度更大一些。

我们的制呢厂的情况如何呢?制呢厂的单位产值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之前为2卢布18戈比(战前卢布),后来为25卢布4戈比,第三季度为26卢布93戈比;或者按百分比计算,第一季度增长了12%,第二季度增长了21.4%。看得出,棉纺厂与制呢厂之间的差距极其巨大。工资的增长情况也是如此。制呢厂的工资增长了4.6%,而棉纺企业的工资的增长在增幅最大的第三季度才达到2.3%。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所做的不同程度的准备工作在这里产生的不同效果是极为明显的。哪里对这项工作准备得较充分,哪里技术准备工作做得较好,哪里整个工作的质量较高,那里的七小时工作制就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两个季度内提高21%,工资也就能增长——增长4%,而棉纺企业仅提高2%。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缺点指出来了。制呢厂的劳动力成分要比棉纺厂好得多,因为制呢厂录用的新工人很少。制呢厂几乎没有改变原有的工人成分。

美尔尼昌斯基:制呢厂在此之前就实行了三班倒。

施米特:尽管不是全部企业,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实行了三班倒,因此那里的组织上的变动就小一些,而在纺织企业,工人的成分已经更新。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约112家工厂中,有近20000名新工人,新成分占了近1/5。这当然会对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纺织业出现的种种组织上的混乱现象,如匆忙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产品质量低下,这一切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切地说是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当然,按照百分比来看,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头毕竟不像制呢企业那样显著。我想,这种现象马上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最后一个季度——第四季度的情况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应当重视休假期,它对纺织企业的产值增加有重大作用。至于说其他条件,随着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我们的情况无疑已经很好了,比如吸收新工人进厂,吸收的主要是工人子弟。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我们已经有了提高产品

产量的绝对把握。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尽管这些失误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七小时工作制的种种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但它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成果证明,我们在不断克服这些失误的过程中,无疑会取得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取得的那些成果——我国的工业一定会发展,劳动者的物质福利一定会改善,他们的文化水平一定会提高。

我们现在要对进一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提出哪些建议呢?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速度切实执行党作出的在近年内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呢?去年我们已经使近5%的在业工人,主要是纺织业的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个数字约占纺织工人总数的20%,约占全体工人总数的5%。为了切实坚持这一方针并让所有企业在近几年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今年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首先应当有一个总的目标,即我们希望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根据职业原则和后来由苏维埃系统确定并经政治局批准的经济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期限为5年,不超过5年。我们应当在近5年内让所有产业工人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作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为实现这个五年计划,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应当在第一年让20%的产业工人(包括已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也就是大约要有40万名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份经过协商的名单,连同已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在内大约为34万人,根据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同意的这份名单,我们打算让这34万人在今年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一来,就完成近20%(包括今年已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这一指标来说,还有近6万人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应当在1929—1930年度提出再让至少20%的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任务,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在五年内完成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所需的速度。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将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全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

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在工业各部门的分布情况如何呢?这里向你们提交的名单没有按工业部门进行划分。我倒是想谈一谈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在工业各部门的分布情况。我们预计今年让煤炭工业的22731名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不够。

有人喊:哪一年?

施米特:这项工作要在今年,即1928—1929年度进行。

有人喊:占多大比例?

施米特:占煤炭工业在业工人总数的10%。我们已经商定,今年石油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约为7 000人,占15%左右;冶金工业为73 000人,约占15%;电力工业为5 600人,约占17%;化学工业为8 500人,约占27%;建筑业为2 000人,约占2%;林业和木材加工业为4 500人,或者60%²⁵³。纺织业加上已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约为40 000人。然后是化学工业——24 000人,造纸工业——约53%……

有人喊:纺织工业有多少人?

施米特:近40 000人。造纸工业——4 900人,或16%;制革工业——7 600人,或11%;缝纫工业——4 800人,或8%;食品工业——18 000人,或12%;印刷工业,我再重复一遍,还得大大增加,现在预计为1 300人,或4%。

可见,包括去年已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在内,总共将有约36万人,或16.8%的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那么他们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分布情况如何呢?如果按照现行的方法来确定或评定,即重工业属于“A”部类,轻工业属于“B”部类,那么两者的比例是这样的:“A”部类今年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人数为13.4万人(包括1927—1928年度已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数),占12%;“B”部类即轻工业为23万人,占21%。由此可以看出,轻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的比例比重工业要大。这是因为轻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更容易一些,不需要像重工业那么多的花费;而在重工业,就拿顿涅茨矿区来说吧,我们不久前刚刚实行了井下六小时工作制,而且实行得不彻底,留下好大一个尾巴……

有人喊:百分之四十。

施米特:应当说,在煤炭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会有很大困难。要使重冶金业真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需要很大的投入。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我们也绝不会停止让这些行业尽快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步伐。

有人喊:会不会增加成本?

施米特: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成本,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做准备。我们认为,我们为这项工作准备得越充分,取得的成效就越大。这种效果在有些企业不可能马上显现出来,比如重冶金企业,它们还需要相当大的投入。但我们还是不应当在重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这些困难面前止步不前。当然,如果工人拿到名单并发现,拥有150人的制皂厂将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普梯洛夫工厂要到五年计划末才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会很难作出解释。工人会议论说,与制皂厂相比,我的工作更艰苦,工作条件也更差,可是制皂厂已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普梯洛夫工厂却要到五年计划末才能改。

会有很大困难。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必须更快地让重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不仅应当注意生产方面,而且应当注意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向全会提交的决议中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现有的这个名单来看,从我们正在研究的下一步有可能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来看,有必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和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向重工业部门,不应当只关注轻工业和重工业在整个这项工作中的比例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阻力还非常小,但是也该考虑考虑如何去做那些阻力大的企业的工作,如何让它们改行七小时工作制。

我认为,我们提请中央全会通过的这个方针将会纠正此前在纺织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时出现的失误,并使我们真正有可能围绕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正确路线展开讨论,而这个路线也要求工人阶级在七小时工作制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

我想简单谈谈关于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过程中修改劳动法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当然要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为前提,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因为,要是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断恶化,那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应当对我国的劳动法加以修改,使它能够适应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一任务的需要。因此,重新修改劳动保护、劳动调解和劳动力培训等方面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在这次全会上不提任何具体建议,我想,我们会在工会系统和经济管理部门预先讨论这些建议,因为对这些具体建议需要进行仔细研究。但是我们在修改我们的劳动法方面所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要使这个劳动法完全符合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需要,而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应该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使我们劳动法的作用降低。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由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由于我们肯定要增加劳动班次——我们无疑要这么做,就会产生让妇女上夜班的问题,而我们到目前为止对此都有极为严格的限制和一系列的规定。例如,我们曾安排纺织行业的妇女上夜班,这是我国的劳动法所不允许的,只有经劳动人民委员部批准才能这样做。现在妇女上夜班在我国已经很普遍,既然我们这样做了,就要考虑实行能够保护夜班女工的规定。

最后我想谈一谈劳动力的培训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纺织企业的经验使我们对此确信不疑。但是,随着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向需要高素质工人的机械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进一步推广,我们

在补充劳动力方面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另外,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必然要与改造我国的工业、使其实现合理化相结合,所以它无疑要以更高的技术为前提,非这样不可。更高的技术需要有更高文化水平的工人,需要他们更好地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而科学的工作方法又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否则,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要求工人更加紧张地劳动。

从各方面情况看,都需要有更高文化水平的工人,更守纪律的工人,需要他们更加紧张地劳动。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工人说明这一点,因为,不这样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改造我国的工业并使之合理化就都无从谈起。因此有文化的工人问题应当是首要问题。我们应当借用那些能够真正让工人更加紧张地劳动的新的工作方法。因此,这项工作不是在缺乏某一方面的劳动力时才要做的临时性工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工人队伍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经常性工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望得到文化水平高的、更加紧张地劳动的工人。这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看到的那种情况,那里有文化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要比我们高,他们的劳动也更紧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好我国的经济,使之得到发展并真正实现七小时工作制,而这一工作制将成为改善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文化水平的一个起点。

主席:下面进行讨论。现在请美尔尼昌斯基同志发言。

美尔尼昌斯基:同志们,我完全同意施米特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为使同志们明白施米特同志在谈到纺织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教训时阐述的观点,我想作一些补充。要我说,对纺织业试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要这样来看,这是未能使我们的企业恰当地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一个教训。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不是符合我党的宣言和指示的要求,而是符合市场的要求。当时提出了必须加快生产速度、提高纺织品产量的问题。因此向我们提出的纺织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期限非常短:3—5天,最多两周。提出提高某些商品的产量这一要求本身就等于预先规定了哪些企业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没有选择条件较好的企业,即有较好的设备、位于有失业熟练劳动力的地区的企业,而是选择了一些条件不太好的企业,是以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为选择依据。

这些因素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当然起了有害作用,并造成种种负面现象。应当说,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同时采取的加大劳动密集度,即增加班次的做法使得工作变得相当难做。这些因素施米特同志都谈到了。我们的纺织企业使用的大多是女工。75%—80%的女工在主要的纺织工序干活。

改为三班倒,即增设夜班,违反了禁止妇女上夜班的规定。不错,在修改劳

动法时加了一些附加条款,提出了不是所有妇女、所有女工都必须上夜班。但是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尽管在七小时工作制下实行三班倒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有关调节妇女夜班劳动的那些限制性规定还是没有得到落实。已拟定出的限制性规定涉及孕妇和哺乳的母亲。我们在落实这些规定时遇到了来自孕妇和哺乳的母亲的巨大阻力。这是由我国企业现行的劳动制度造成的。女工害怕失去自己的织机、自己使用的一套设备,害怕因此而降低工资,所以她们从来都不敢承认自己怀孕,不敢承认自己是哺乳孩子的妈妈。另外,女工就是不想服从这些规定。

这么一来,工作就更不好做了,而且自然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和设有夜班的那些企业,纺纱工的劳动密集度增加了12.3%,织布工的劳动密集度增加了16.8%。可见,劳动生产率是可以提高的,更充分地利用企业的机器并相应地增加工资也是可以做到的。施米特同志已经指出,在这一段时间,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和三班倒的工人相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两班倒的工人的工资增幅较大。这自然会对工人的情绪产生相应的影响。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7家棉纺厂工人9月份的日平均产量下降到过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的水平,纺纱工的日产量下降了3.6%,织布工下降了0.7%。机器利用率也下降了。

与1922年10月相比,纺纱工每台机器的有效利用率下降了4.9%,织布工则下降了6.8%。因此,一方面要设夜班,另一方面机器的有效利用率的降低又影响到工人的工资,影响到总产量,自然也影响到产品成本。我们至今没有达到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降低产品成本。劳动保护条件也比从前差得多。不错,我们得到了用于落实一系列措施的专项拨款,这笔拨款还没有使用,因为管理者不胜任自己的工作,不善于实行已经提到的那些措施。在改为三班倒和加大劳动密集度的情况下再次制定了可以改善劳动条件的一系列措施,如: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料,供应高质量的辅料,调整主要工序的工人的工作,不让他们再做辅助性工作。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现象:纺纱工和织布工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辅助性工作,而不是用于自己所在的主要工序。因此我们制定了改变这些情况的一系列措施,但管理者至今没有去落实。这自然会对工作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善我国纺织企业的原料质量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够好。那些已经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没有高质量的原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受到原料市场和整个原料的状况的制约。应当跟大家说,让企业有一定的棉花储

备是开展工作的正常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棉纱的必要的质量。3个月的棉花储备才算是正常储备。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只有6周的棉花储备,最近几个月甚至只有7天的棉花储备,有时还更少。这对工作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企业没有好的混合原料,常出废品和纱头,其结果是大量减产并进而败坏我国许多企业的声誉,也使七小时工作制受到非议。

夜班工作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对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总产量增加,但是工人的每小时劳动生产能力下降。我这里有一份记录纺织工业每小时劳动生产能力变化的图表,从中可以看出,夜班对工作量很有影响。工人上过夜班后,有一周的休息时间(这里指的是上白班)。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上完夜班休息一周后再上早班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组数字:上班后的第2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为102%,第3小时为99.2%,第6小时下降到98.5%,第7小时又上升到104%。上过一周夜班后又马上上白班的情况是这样的:上班后的第2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为101%,第3小时下降到95.5%,第6小时下降到91.1%,第7小时上升到97%。值得注意的是夜班的情况:上班后第2小时完成的工作量为104%,第3小时下降到90%,第4小时为89%,第6小时下降到83%,第7小时仅上升到90.4%。可见,夜班往往出现工作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并且对白班有影响。

这些情况表明,有必要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该不该让我们的企业继续实行三班倒即设立夜班。

我们的日常生活条件根本不适合设立夜班。我们的大多数已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都地处外省。许多工人住在离工厂6—7俄里、10俄里远的地方,既不通电车也没有铁路。夏季的几个月跑这么远的路上下班已经很难,冬秋季的几个月的艰难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住在企业附近的集体宿舍里的工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有时一间小屋要住3家人,即使一间小屋住一家人,那也是一个6—8口人之家,在如此拥挤的条件下,那些上夜班的人自然没有条件在白天睡觉。在纺织工人中妇女占多数。她们凌晨3—4点钟才下夜班回家,一个小时后丈夫、儿子或女儿又要去上白班、早班,母亲或妻子要给他们准备早饭。然后开始做家务。女工的一天往往就是这样在做家务中度过,所以说,她们白天睡不好觉。男工照样睡不好觉,因为我们的宿舍里的嘈杂声使他们无法入睡。所以说生活变得非常不方便,条件变得非常糟糕,这就使工人对七小时工作制产生不满。我们研究了我国工业的现有条件并认为,近期内不应把在企业设立夜班的问题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搅

在一起。

施米特同志举了制呢厂的例子。应当说,这些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三班倒,而且早已为增加工作密集度采取了措施,后来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就不那么困难。这些企业原来实行三班倒,每班工作8小时,每个班的工作时间缩短一小时后,一下子就感觉到劳动条件改善了。棉纺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有其先决条件,即那里的工作密集度大,每人看3—4部织机(在外省工作的同志们、省委书记们和区委书记们都清楚,看3—4台织机对工人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在我国工业现有的条件下增设夜班,却不采取措施改善劳动保护条件,不改善居住条件,——所有这一切在许多工人看来都是负面现象,他们说:“你们把工作时间缩短一小时是为了让我们干出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时还要多的活。”在几家工厂都听到过这种说法。还看到了这样一个决议:“我们对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表示欢迎,但是反对加大工作密集度,反对三班倒。”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说明,纺织工人的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必须首先改善这些条件,使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效。

再谈谈我国工业的合理化问题。应当说,我们还没有采取真正的合理化措施。许多企业只是重新摆放了织机,加宽了通道。往往只是改变一下工作形式,例如增加辅助劳动力,但真正广泛的技术合理化在我国企业中并没有实现。我国企业在实现合理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一直是加大劳动密集度,进一步提高劳动强度,这种做法当然没有带来,也不可能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所需要的成果。

我国工业的设备严重老化:走锭精纺机至今仍占31%,这种机器极不好使,占用的人手多,速度还慢。在国外,这种机器作为淘汰机型正逐渐被新型机器所取代。我国工业中的自动织布机仅占2.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设备和企业是个什么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的合理化程度有多么低。

我们纺织工会中央理事会与纺织企业的经营者在这方面并不存在分歧,我们认为,今后要更加慎重地对待我们的企业继续改行三班倒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也许应该完全停止继续让企业改行三班倒的做法,而要改行两班倒的七小时工作制。这也与目前棉花的供应紧张有关。我们让一些企业改为三班倒是为了提高总产量,可是不久前我们遇到了棉花供不应求的情况,只有7天的储备量,有时仅有4天的储备量,我国的棉纺企业面临着停产数日的危险。热力设备的情况也很糟糕。遗憾的是,我没能就第一个报告发表意见——当时我没赶上发言,我没能更详细地介绍原料的情况。我们过去根据某些情况让一些企业改

为三班倒,可是现在由于经常出现锅炉爆炸和停电等事故,企业一停工就是两三天。这使得我们的企业无法正常工作,也影响了工人的情绪。

今后在企业的选择上要更加慎重,选择企业时要根据我党提出的基本方针:要选择设备较好的企业,要在生产合理化方面先走一步,最主要的是,要对工人进行长期的、普遍的培训,使他们了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意义。现在又有一些企业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两班倒);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这些企业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我们的党组织、工会组织、经营管理者都没做任何工作。我们在改行两班倒(没设夜班)的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听到了对这项举措表示反对和怀疑的意见,因为工人们听说了其他企业的情况。不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我们就无法取得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后应当取得的那些成果。必须吸取我国纺织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的教训。还有一些因素也不能不提,就拿纺织业的工资制度以及其他工业部门也在实行的轮班制度来说吧,按照这样的制度,工人的24小时时间被扯得零零碎碎,他们24小时都被拴在企业里,因为每隔2—3小时就有一批工人轮班。工人工作3.5小时,然后休息3.5—4小时,接着又要工作2小时或3小时,然后再休息,——把工作时间扯得这么零碎是不行的。这使工人无法利用从工作中腾出的这一小时工余时间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为他们整天被拴在企业里,无暇光顾文化机构。

主席:现在请加利耶娃同志发言。

加利耶娃:我想谈谈我国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情况。应当承认,施米特同志说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好这个话是对的。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产品产量。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几乎全是次品。不仅如此,我们还出现了窝工现象。每个纺织女工都争着给自己挑选好的班次,我国近一半企业的好织机也恰恰因为我们要挑选好的纺织女工顶班而被闲置。

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呢?会议是开过了。工人们说,我们改成了看三台织机,你们不会是想骗我们,让我们再多看一台织机吧。产品的质量不会有提高,而最要紧的正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实现合理化。不错,我们的纺织女工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敏感,知道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后要增加一台织机,增加辅助劳动力。我们配备了织机润滑工、清洁工,还有纱轴搬运工,把织好的纱从织布机上拿走。但是存在亲疏之分。这正是我想说的。我们的织布厂叫作织布一厂,还有一个织布二厂。该厂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改为看4台织机,但是没给配备辅助劳动力。他们的人一来开会时就公开地说,织布一厂是亲娘养的,我们织布

二厂是后娘养的。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配备。施米特同志说,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他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必须提高质量,而且主要是需要辅助材料。纺织女工说得对:我们的第四台织机简直运转不起来,我们纯粹是在无偿地为它忙活,因为往往不是缺螺栓就是缺螺钉,缺这两样东西,织机就无法运转,纺织女工只能看3台织机。

现在谈谈改善住集体宿舍的工人的生活条件问题。就拿我所在的宿舍来说吧:128个房间里住着640口人,外加50个女清洁工。这里的工人的条件是不是正在改善呢?当然没有。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工人得不到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上夜班有什么照顾吗?根本没有任何照顾。另外,工人不但要上夜班,而且还要忍受40度的高温。工人上夜班就好比进浴室。一连3个小时不给通风换气。工人们只能等到午夜2点工作结束时才打开窗户,在夜间通通风。凌晨5点他们又要在这种温度下工作。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产品质量,配备辅助劳动力和辅助材料。第三是要有适宜的温度。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各种吸尘设备,什么都没有。

清洁工扫地时,乌烟瘴气。在改善工人的生产劳动条件方面做得很差。

现在谈谈改善女工的生活条件问题。我们至今没有执行有关保护哺乳的母亲和孕妇的法律。这个法律没有得到执行。我们开过两次女工会议贯彻这个法律,想让女工不上夜班。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女工们说,今天我怀孕,明天又有别人怀孕,谁也换不下来。四个人中就有两个哺乳的母亲。如果让男人来替换这些女工,男人就会说,干吗老让我替你们上夜班,我自己也想睡觉,我什么时候睡觉呢?说是要改善我们住集体宿舍的工人的生活条件,哪里改善了呢?既然女工要在家里待7个小时,她就要洗澡,可是浴室没有水。她就会说:让你们那个七小时工作制见鬼去吧,我7个小时都在浴室清理身上的棉絮,可是没有水,只好回家去洗。家里倒是有烧水锅,还是给点热水吧。她老是忙得团团转。任何企业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之前都应注意:(1)原材料的质量;(2)备齐辅助材料;(3)改善工人家里或集体宿舍的生活条件;(4)创办托儿园所以满足工人的需要。

我市有3家托儿所,但是不能满足孩子妈妈的需要,因为县卫生局至今没有安排保姆和护士上夜班,托儿所的资金不足;而且女工也不往托儿所送孩子,因为她们夜间反正要请保姆。现在谈谈幼儿园的情况。我市有两三所能分别容纳50个孩子的幼儿园,而我们每间集体宿舍里就有3个孩子。哪里谈得上什么改善?谈不上改善,最必要的改善都谈不上。国民教育网不普及。我到一家工厂

开过会。女工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让我们自己来办这件事,给我们场地就行。国家没有钱,我们就像办合作社那样,自己凑钱买书。可是我们还顾不上这些事。

我认为,我们的立法机关和其他一切组织要负起责任,千方百计在各地做这些事。如果我们还不能改善我们女工的生活条件,现在怎么在各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呢!因此,要落实这项工作,就要设法让女工不再上夜班,而我们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应当给各地下达指示。

主席:现在请日丹诺夫同志发言,然后是阿尔秋希娜同志。

日丹诺夫:我认为,如果要谈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我们各企业的工人首先什么都不要说,只要指出这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就就得了。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是我们取得成就的首要条件,这些成就正在对西方无产阶级产生影响,同时也让世界上的资产阶级胆战心惊。

施米特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各个工厂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他谈到了多少工人应当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多少工人已经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他同时还指出了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失误总是会有,这不难理解。我要谈的是雷西瓦区的情况。我们为研究这个问题所花的时间不是一两个月,而是更多。不仅支部、车间总支和厂党委研究过这个问题,而且厂部也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此外我们还曾两次为这个问题到这里来,到中央和州里来;不管怎么说吧,我们还是应当在本经济年度的第一季度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可能我们也会有某些失误,做事情就不可能没有失误。

一些同志在发言时谈到,怎么能在只给3天时间研究问题的情况下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呢?同志们,这的确很糟糕。应当把问题研究得更充分一些,这项工作的技术方面必须在拟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完全落实。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两项任务。

我同时还认为,加利耶娃同志说得非常正确,她指出了我们的托儿所数量不足等问题。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雷西瓦区的工厂有3200名女工,而我们的托儿所总共只有57个床位。这种状况能满足妇女的需要吗?当然不能。特别是我们还有夜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改为两班倒,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三班倒,我们要通过改行六小时工作制对各班次作出更明确的规定,以免浪费燃料等。还必须格外注意一般劳动条件,特别是女工的劳动条件。在没有托儿所的地方,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托儿所。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仅仅是因为,女工们只有在得知自己的孩子有托儿所上时,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女工

去上班,把自己的孩子扔在家里或集体宿舍里,孩子受教育的地方就是又黑又脏的街道。难道我们能容忍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中存在吗?不,不能。另外,女工下班回家后,家里还有一摊事情等着她去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谈到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就必须首先注意我们的住房问题。如果还是以我们的雷西瓦区的工厂的现有条件为例,那么应当说住房条件非常糟糕,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建起了一些大房子——有木结构的、砖结构的,什么样的都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旧房子已摇摇欲坠。前不久我们那里刮了一场大风,一场低等级的暴风,你们猜怎么样?一栋工人宿舍发生倾斜,300个家庭必须马上搬家,否则就会被砸在里面。从这一切情况看,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劳动生产率和质优产品的产量,还应关心工人本身的生活境况。

施米特同志在这里谈到了文化问题。他说得完全对,施米特同志,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对业余时间的增加和个人的自我发展等都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的大型企业的情况如何呢?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昨天在这里谈到我国的整个工业问题,谈到建设问题,那么我应当说,我们对文化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工厂在这方面是个什么情况呢?既然我们的工人数量很多,我们就要有一所可作影剧院的大房子。而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应当关注这项工作,应当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同时也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不要吝惜钱,因为就连工人自己都说:“你们就让我们自己筹款盖房子吧。”这就是工人的意见。这意味着,工人想拥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总之是想发展自己。因此我认为,要认真重视这项工作。

随着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每个劳动日的负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不想泛泛地谈所有的工人,只想谈谈某些情况,有些地方情况不好,工人不知道该如何支配一天的时间,如何消磨时光。工会和经营管理者、支部、车间总支不仅要重视劳动纪律,而且要重视窝工现象。为什么常有窝工现象呢?因为原料供应有问题,因为缺少这样那样的材料。这方面的工作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应当充分地、认真地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重视原料供应。我们这个区的情况如何呢?有人谈到了生铁不足的问题,而我们的情况是,即便拿平炉冶炼来说,我们的产量也增加了。我们过去用4座平炉,现在也是4座平炉,而熔炼的金属量差不多相当于5座平炉,生产能力也增加了。1号炉的产量过去是25吨,现在是33吨;2号炉过去是20吨,现在是25吨;3号炉过去是25吨,现在是28吨;4号炉过去是30吨,现在是33吨。我们有没有生铁呢?没有。真是岂有此理,乌拉尔采矿工业辛迪加给

我们派人来冲“拉模”，人是来了，可是结果怎样呢？在这些“拉模”上钻了几个孔就走人了。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能这么干事吗？不能。因此我提请大家重视这项工作，使我们的产品和原料都能齐全，因为我们是讲劳动效率的。平炉冶炼生产能不能扩大？能。我借这次发言请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重视平炉冶炼生产。要拨出资金为现有的平炉增加技术设备，因为生产能力还可能大大增加。需要一些大罐，为此要提供资金。

因此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不能出任何漏洞，不能有任何障碍。考虑到这一切，我认为有必要十分认真地对待降低成本这个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劳动效率问题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和降低成本问题都有关系。在我们的企业存在种种差距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降低成本吗？不能。因此我认为，要极其认真地把这项工作抓起来，要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显示出令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国家胆战心惊的实际效果并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主席：现在请阿尔秋希娜同志发言。

阿尔秋希娜：我想提请全会注意有关七小时工作制讨论中的不正常现象。根本没有经济管理人员参加讨论。

喊声：对。

有人喊：柯秀尔在场。

阿尔秋希娜：然而正常地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与经济管理人员有很大关系。没有一个经济管理人员到会，高层的、低层的都没有。

有人喊：不仅经济管理人员没有到会，一些该出席全会的人也没有到会。

主席：请不要打断阿尔秋希娜同志。

C. 柯秀尔：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帮助她，我们同意她的意见。

阿尔秋希娜：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对于女工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女工可以因此而少工作一小时，这对提高女工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吸引她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点来看，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应当算是女工的一大胜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混乱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在工人中，特别是在女工中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我了解瓦格扎诺夫工厂的情况，这个厂算是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情况比较好的工厂之一。我去的时候，正赶上该厂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厂里的人对我说，他们只有10—12天的准备时间。而这是一个拥有6500名工人的工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论工人、工会，还是经济经济管理机关当然都不可能做什么认真准备。该厂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

实际上进行得并不很顺利。经过了9个月的工作之后,该厂的工作才有所改进,情况可能也比其他厂稍好一些。

另一方面,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就要增加第三班即夜班,所以会给女工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在讨论七小时工作制问题时,女工部和工会都谈到,上夜班对于妇女,特别是孕妇和哺乳的母亲有害处。我们当时就非常清楚,我们的做法是违反我党纲领的,顺便说一句,一些同志已把党纲忘得一干二净。党纲中虽然没有提到禁止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上夜班,但规定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夜间劳动。我们安排妇女上夜班,不仅违反我党纲领,而且违反劳动法。在决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同经济管理机关磨了很长时间嘴皮子,因为他们根本不对夜班加以限制,甚至安排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上夜班。我们做了妥协,要求只让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不上夜班。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我们规定并宣布,不得让怀孕5个月以上的妇女和有不到7个月的吃奶孩子的母亲上夜班。在此之后本应具体落实这一措施,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的。有人对我们说:是女工自己不想退出夜班。我们进行了核实。原来这是因为,女工的劳动条件还会更差:她们退出夜班后一般都被安排做更差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经济管理者还没有认识到,应当十分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要选择合适的织机、班次和设备;要吸收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工程师具体落实这项工作。我本人是纺织女工,了解厂里的条件,我们企业现有的、应退出夜班的女工数量不多(占工人总数的6%—10%),我相信可以在不降低女工劳动条件的情况下让她们退出夜班。任何一家工厂都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在已经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28家企业中,只有9家企业执行了禁止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上夜班的决定。既然有9家企业已经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而且应当应用他们的经验。

另外,还必须在全会上指出,关于禁止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上夜班的决定根本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是一个有长期效力的决定。这是一个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我们在进行建设的艰难条件下又不得不执行的临时性决定。有人认为,这是我们采取的一项长期措施,甚至有人鼓吹,上夜班对孕妇和哺乳的母亲有益处,某些经济管理者就是这么做的,就连一些学者也这么做(有这样一些怪人,他们竟然说什么孕妇和哺乳的母亲适合上夜班,因为如果她们上白班的话,她们的奶水就会坏掉),他们迎合经济管理者集团中存在的那种极不严肃的态度,竭力为这种态度寻找科学根据。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总之,说到夜班问题,美尔尼昌斯基同志已经作出了基本结论:根据第一手资料可以认定,对于所有工人来说,夜班的效率比白班低。对于孕妇和哺乳的母

亲来说,夜班的效率会更低。有资料表明,与白班相比,夜班的产量低,残次品率高,工伤事故也多。这一初步结论要求我们必须研究第三班的劳动效率问题。如果夜间的第三班不像白班那么出活,那么,我们针对孕妇和哺乳的母亲采取的那些措施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必要的。来自奥列霍沃的加利耶娃同志在这里生动地描述了生产情况。可以拿任何一家纺织厂作例子,不只是奥列霍沃的纺织厂,特维尔的纺织厂、准备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莫斯科伏龙芝纺织厂都行。如果要看住房条件和生活条件,大家会发现,特维尔和莫斯科的纺织厂与奥列霍沃的纺织厂没有任何差别。一个房间里住两家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如果说男工下了夜班后白天还能睡觉的话,女工则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她们要烧饭、洗衣、照顾孩子。即使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的较好的条件下,家务劳动的担子也照样压在女工的肩上。

我认为,在决议中应当非常坚决地要求我国的国民教育机关和保健机关更加努力地、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做准备,使各自的机构适应这一转变。在许多机构,特别是保健所、托儿所和幼儿园,都要在已经增设夜班的情况下做好准备。要指示这些机构提早制定计划、提出具体建议,而不要拖到工厂开始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时候再做这些事情。我还认为,必须对施米特同志关于如何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做准备的第5条建议作一点补充,即责成经济管理机关与工会组织执行政府委员会关于禁止孕妇和哺乳的母亲上夜班的决定。

主席:现在请阿库洛夫同志发言。

阿库洛夫:施米特同志指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此话一点不错。这个问题具有重大国际意义,但是全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该出席全会的人没有到会。

有人喊[丘巴尔]:不是都没有到会。

阿库洛夫:许多该出席全会的人没有到会。

同志们,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让我国广泛的社会阶层,首先是工人群众重视它。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国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呢?看看我们的一般性报刊就会发现,它们对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的问题并不关注,或者说很少关注。看看党报,甚至是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你们顶多会看到,有关七小时工作制的内容都登在第4—5版上,而且都被排成小号字,刊载的位置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找得到的,工人就更找不到了,因为他们很难把报上的那么多内容都看遍。我们应当在决议中指出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整个准备工作做得有些封闭,在我们的报刊上看不到对政府的委员会——中

央政府的委员会及各共和国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的报道。工人群众根本没被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由此而造成了后果。在一些企业,在应当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中,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我们应当指出这个情况。今后不能再这样做工作。

施米特同志在这里谈到,我国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的。他说得对。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最容易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那些企业。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想真正干工作的话,就首先应当极为关注在重工业、在劳动更为艰苦和危险的工业部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实际上不是这样做的。关于这一点,施米特同志已经谈过。甚至在一些部门,我们也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展工作的。以冶金业或金属工业为例,我们看到,拟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首先是其中规模比较小、困难比较少的企业。拿我们乌克兰的采矿工业来看,我们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煤炭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被摆在第二位,而摆在第一位的是工作条件较好的制盐业;还有采矿业,那里的工作条件同样比煤炭业要好。应当放弃这样的工作方针,应当认认真真地研究本应首先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那些企业开展这项工作的问題。

我还想指出的是,负责我国工业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一工作的那些机构工作不够协调。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各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我们乌克兰就有这样的情况。对地方机构是可以信任的,对地方所做的工作是可以采取认真一些的态度。我们有自己的共和国政府的委员会,它当然更了解乌克兰的企业,能够提出应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名单。可是,中央政府的委员会²⁵⁴在根本未商量的情况下就作出让一些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决定,把我们乌克兰政府的委员会还未讨论过的企业列入了它拟定的名单。我认为,如果如此进行“协调”的话,除了造成许多误解外,是不会有结果的。政府的委员会是受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委托负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项工作的,它应当更加认真地对待地方所做的工作,应当对地方的工作、对他们提出的名单采取更加信任的态度。

克拉瓦利:你们的名单和提出名单的理由谁都不知道。

阿库洛夫:克拉瓦利同志说,谁都不知道我们的名单。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名单,你们就应当到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取这份名单。但不是这么回事,你们手中有我们拟定的名单。明知道由乌克兰的最高机关组建的委员会正在做工作,却在未提前与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公布应当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名单,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这是以官僚主义

态度对待非常严肃的问题。

简单谈谈这个决议中所作的承诺。我赞成这些承诺。决议中谈到,必须在实现合理化方面采取根本性措施,必须在住宅建设和劳动保护等方面采取措施,这一切我都赞成。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重复的意见我就不再说了。由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此要格外关注劳动保护问题。

但我想在这里提个希望,希望决议中写的东西都能落实。然而我们通过的决议在很多时候都得不到落实。我们有时候是开空头支票。

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免得空口无凭。我们在四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和改善顿巴斯工人生活条件的决定。²⁵⁵这个决定不仅在10月1日前没有得到执行,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执行,再过几个月也不会得到执行。既然作出了拨款的决定(中央全会向一系列有关单位下达了任务),就应当考虑让政治局去检查执行这些决定的情况。

简单谈谈加强我们的文化工作的必要性。我认为,工会组织对由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而需要他们完成的任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国的工业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意味着什么?近两三年内,我国工业大约一半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将变为7小时。这意味着,我国的工人将多出一小时的业余时间。如果我们不想让工人在小酒馆度过这些业余时间,就应当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工人在我们的文化机构度过这些业余时间。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但是我们对它考虑得很少。如果我们不希望由于工人多出的这一小时业余时间而给我国工业带来损失,如果我们真想让旷工的人数不再增加、让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等等,我们现在就应注意吸引工人参与公共文化工作,无论是工会工作者还是经济管理工作者都应这样做。别忘了,在我国的工业企业中有一大批农民干部,数量非常多,我们要始终注意对他们的培养。要提出为正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提供文化服务的任务,要坚定不移地提出这项任务。在这方面不能舍不得花钱,因为这些钱会使我们得到文化水平更高的工人,劳动更好的工人。

最后我还想谈谈乌克兰工业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施米特同志所说的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做工作的方针导致的结果是,最终在乌克兰这个重工业部门聚集地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速度已无法与全联盟的速度相比。乌克兰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方面落后了。我们算了一下账,如果拿乌克兰第一批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来说,加上我们安排第二批进行这项工作的企业(不过,

这些企业尚未得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即中央政府的委员会批准),我们那里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总共有 52 000 多人。如果加上将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那些企业,也就是按最顺利的情况来看,乌克兰在 1928—1929 年度将有近 16% 的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全联盟的这个比例平均为 20%,而我们乌克兰只有 16% 的工人将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认为,对于集中了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这些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业部门的乌克兰来说,这个速度,这个比例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坚决要求政府的委员会批准在乌克兰获得通过的那个企业名单。否则的话,一个最大的工业区,一个在煤炭、钢铁等方面对我们联盟起着决定作用的地区,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方面将落后于整个联盟。

主席:现在请科萨列夫同志发言。

喊声:该休息了,该休息了!

主席:我宣布休息 10 分钟。

(休息后)

主席:同志们,继续开会。有几位中央委员联名提出建议,在今天 3 点钟之前结束对施米特同志报告的讨论。在差半个小时或 20 分钟 3 点的时候要让施米特同志作总结发言。最后我们要选出一个小组委员会来起草决议,晚上要听取新的报告。对这个安排有没有异议?

有人喊:没有!

主席:现在请科萨列夫同志发言。

科萨列夫:我们想结合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就青年工人的劳动和教育问题提几点意见。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十分迫切地要求大力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我们不仅面临着对现有的成年无产者骨干的再培训问题,而且面临着从青年工人中培养新型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的问题。如果要问,一个从青年工人中培养出的有文化的新型工人应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在我们看来,他们应当在生产劳动中具有高速度,他们应当跟得上现代技术的发展。一个新型工人不仅应当了解生产活动、生产领域中的某几项业务,不仅应当熟悉某一项业务,而且应当同时对生产领域的其他部门有所了解。从青年工人中培养出的有文化的新型工人应当完全掌握劳动分工的方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应当具有足够的知识水平,不仅要懂得生产劳动的某几项业务,而且要懂得发展生产力,了解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我国的经济。

由此看来,现有的工厂艺徒学校是培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所需要的熟练

劳动力的最好形式。工厂艺徒学校把学知识、学一般理论与学员参加日常生产活动,与学员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我国工业中的日常工作结合了起来;而按照中央劳动研究所²⁵⁶的原则,按照加斯捷夫的原则对熟练劳动力进行培训,我们就只能掌握生产活动中某项范围狭窄的业务,只能掌握有限的几项生产业务活动,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原则完全否定一般理论知识的必要性。以工厂艺徒学校形式出现的现有工厂艺徒培训体系,已经完全证明了其自身的有效性。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原则只是以让工人掌握范围极其狭窄的几门业务为目的,根本不注重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注重对一般理论的了解。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劳动研究所培养的熟练劳动力似乎是有缺陷的,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对熟练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的。青年工人的劳动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他们在从事生产活动、参与生产的同时,还应千方百计地、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从而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工业条件下的劳动具有学习和生产的双重性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党不能从我国的当代青年中培养出我国革命所需要的、所必需的无产者骨干。

克拉瓦利:这与七小时工作制有什么关系?

科萨列夫:有很大关系,克拉瓦利同志。共青团与一些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的全部争论都是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的。²⁵⁷我们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劳动原则和教育青年工人为出发点的,而有些同志则是以卢布政策,以狭隘的经济任务为出发点,他们不看未来,不看前景,试图把以社会主义方式培训熟练劳动力的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试图让我们在工厂艺徒培训问题上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革命前的工厂艺徒培训体系是完美无缺的。不错,应当坦率地说,以工厂艺徒学校形式存在的现有工厂艺徒培训体系的确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在共青团实际参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工厂艺徒学校不符合我国工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后对工人培训的需要。但是我们及时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量使工厂艺徒学校适应我国经济建设任务的需要,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为此我们提出对工厂艺徒学校进行相应改组,改为三级式工厂艺徒学校,也就是能培养普遍职业的工人和少数具有高级技能的工人的三级制职工业徒学校。上述种种措施将使得我们的工厂艺徒培训体系能够极好地适应我国工业的需要,适应我国经济的需要。

除了在共青团实际参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的那些问题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方面,这就是许多共青团支部、工厂艺徒学校以及某些青年工人阶层率先提出了加大劳动密集度的主张。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可以

看到,我国工业的许多部门存在某些违反现行青年劳动法规的现象。中央全会知道,政府规定禁止未成年人上夜班。中央全会也知道,政府规定要缩短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²⁵⁸。而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些经济管理者自行其是,延长未成年工人的工作时间,使缩短未成年人工作时间的规定形同虚设。请看看莫斯科省一家大纺织厂,纳罗福明斯纺织厂的情况,该厂厂长在县纺织工人分会的帮助下不再执行缩短未成年人工作时间的规定。又是这个厂长,又是在这个县纺织工人分会的帮助下,安排未成年人上夜班。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有人在粗暴地破坏有关未成年工人劳动和教育的现行法规。

在我国的其他一些组织里,在我国的一些州和省里,都存在这样的事实。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共青团就要进一步加强同不执行有关青年工人劳动和教育的法规的种种倾向的斗争。我们认为,工会组织应当在我们这项共同的工作中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而现在他们做得还不够。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缩短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问题。要实行7小工作制,首先就应当进一步缩短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政府的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原则上承认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从具体实行情况来看,解决这个问题大约要拖延3年。我们认为,出于提高青年工人文化水平的考虑,出于培养能迅速胜任工作、有知识、有文化的即我们所需要的无产者骨干的考虑,我们认为,出于这一切考虑,应当结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加快解决缩短未成年人工作时间的问題,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稍微缩短一点。在青年工人的劳动和教育问题上存在着一些重大争议。我们认为,联共(布)中央有必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主席:现在请克拉瓦利同志发言。

克拉瓦利:我国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举措。这项举措的复杂性还在增加,因为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是在我国进行改造的时期,是在大搞生产的时期,是在我国工业的各项计划任务非常繁重的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整个工作的复杂性。我们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具有摧毁力的巨大冲击,因为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时间做个比较,就会看出其中的巨大差异。如果拿英国和德国来说,比如他们的井下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8.5小时,地面作业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0小时,那么,我们的顿巴斯煤矿的采煤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已经是6小时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要把这个六小时工作制巩固下来,不允许出现破坏这个制度的现象。如果拿北美合众国

这样的国家来说,那里的加工业的从业工人有880万人,其中225万人的工作时间为9小时以上。英国的许多工业部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9—10小时。有些生产部门(面包加工业和制衣业等)的工作时间至今为11—12小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当然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巨大冲击,在我国条件下,任何其他经济措施都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我们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无疑会有许多困难。主要的困难就在于,我们既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又不能降低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同时还要降低我国工业的成本,并且不使工人的人均产量增长速度放慢。

我们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时间缩短12.5%,并且不减少原定的发展生产的任务,还要降低人均产品的成本。这当然还会遇到许多困难。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极其慎重地对待将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每一个企业。我们应当把完成降低成本这一主要任务作为出发点,因为如果完不成这一任务,我们在本经济年度的整个经济计划就要落空。

对118 000名纺织工人上一经济年度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情况所作的初步总结表明,在这项工作中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去年,我国工业接受了党交给的在一个月额外加工80万普特棉花的战斗任务。我们只能靠增加第三班来完成这项额外加工任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是在保持纺织工业的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实行三班倒,要么是实行三班倒并缩短工作时间。我们认为,在七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改为三班倒要好一些,这样会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而在八小时工作制条件下这么做的效果就不太好。如果我们不在实行三班倒的同时缩短工作时间,那么我们遇到的困难无疑会比在缩短工作时间后遇到的困难更大。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被迫去做这个非做不可的转制工作。我们是被迫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让118 000名工人改行三班倒并同时缩短工作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三个班次都缺少熟练劳动力,因此劳动密集度必然大大增加。我们只选了19 000名新工人改为三班倒,如果我们不想使劳动密集度相应加大的话,那就要把工人的数量增加一倍半以上。正是由于缺乏后备熟练劳动力,在劳动时间缩短后,劳动的密集度加大了。

总的说来,纺织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同时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这些在中央就这项工作所作的专门决定中都提到了²⁵⁹。

美尔尼昌斯基在这里抱怨说,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要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慢一些。是的,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确实慢一些,但是要考虑到,所有这些企业招收的19 000

名新工人是来自劳动市场的欠熟练工,是技术不太熟练或者是从工厂艺徒学校毕业的未成年工人和工人子女。这些人使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他们没有受过看三四台织机、照顾三四条生产线的训练。生产率较低,工资的增长速度就稍慢一点,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让17%的纺织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后,他们的工资并没有降低,而是增加了,这一事实表明,总的说来,我们的这一举措是正确的。我们不但没有降低一点工资,而且使工资增加了近6%,尽管我们录用了大量欠熟练的新劳动力。

另外,美尔尼昌斯基在这里还对纺织工业实行三班倒的合理性表示怀疑。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凡是能缩短工作时间的地方,都要把工作时间缩短,同时还要安排第二班和第三班,对此我们责无旁贷。我们还认为,在有可能实行两班倒或三班倒的地方,一定要安排两班或三班。我们认为,在有可能增加第二班或第三班的地方,必须增加班次。我们认为,在可以增加班次的地方,就应该增加班次,因为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成本通常会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加大;因为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最初几个月,工人无法马上通过相应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工作时间缩短12.5%所造成的损失。在初始阶段,成本无疑会由于这些因素而加大。

在纺织工业,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工资在成本中所占比重增加。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国营托拉斯在每小时产量增加4.9%的情况下,每小时的工资额增加了19%;第二国营托拉斯(杰多夫斯克工厂)在每小时产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小时工资额增加了17.1%,等等。其他企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几乎所有企业用于支付工资的成本都在加大。然而,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让已经和正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成本保持不变,而且要完成降低成本方面的计划任务。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靠增加班次。

在用于劳动力的成本增加的同时,用于工厂一般性开支的成本大大减低了,这是实行三班倒带来的效果。用于工厂一般性开支的成本比过去降低了20%—30%,各企业的降幅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就抵消了工资方面增加的成本。我们实行三班倒的效果总的说来是好的。

美尔尼昌斯基同志在这里抱怨说,纺织工业的设备磨损极其严重。我认为,鉴于这种状况,必须抓紧更换这些严重磨损的设备。然而,若想更快地更换纺织工业的设备,就要更充分地利用旧设备,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那么富有,还不能使用新的、更完备的设备替换尚能使用的设备。我们的任务是,在改行三班倒的过程中加快用更完备的设备替换旧设备的速度,通过扩大折旧来加紧用更完备的

设备替换旧设备。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为了加快用新织布机即诺尔特洛普式织布机替换旧织布机的进程,就必须实行三班倒。美尔尼昌斯基同志的话是对的,他说,尽管纺织工业现在实行了三班倒,但是多数资金还是投向了生产生产资料、包括生产纺织业所用织布机的“A”部类。这些投资会使我们在今后几年进一步放开手脚,即重新分配今后几年的基本建设资金,并考虑到纺织工业的需要。大家十分清楚,对重工业的巨大投资会加快轻工业的设备更新速度。我认为,增加班次的问题,是我们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金属加工业和重工业改为两班倒或三班倒的工作尤为困难,因为那里存在一些瓶颈问题,假如一个车间现在实行了三班倒,而其他车间实行一班倒或两班倒,那么,实行三班倒的这个车间就无法照应实行一班倒和两班倒的车间。

要协调整个企业改行多班制的工作,就要恰当地分配对各企业和各车间的投资。去年我国的纺织工业遇到了特殊困难,今年不会有这种困难了。去年的棉花沾有黏土。这种情况降低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阻碍了工资的增长,有时甚至造成了工资的波动。我们今年不会有这种情况了。我们会有自己的国产棉花,还有质量好于去年的进口棉花。这种情况无疑是管理者无法克服的特殊困难,它也使得企业难以顺利地改行多班制。

当然,实行三班倒对于工会、党组织以及经济组织来说,更加困难,我们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反对实行三班倒。因为对于要上第三班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一班倒或两班倒当然要轻松一些。在实行三班倒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不得不加大技术人员的工作负荷。因此,加大了工作负荷的那些技术人员反对改行三班倒。但是,改行三班倒能给工业带来利润和好处,能加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调整投资。

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应当为上第三班的人提供托幼服务,就应当在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在许多日常生活条件方面为上第三班的人提供保障,就需要各类组织——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工作。

既然这项措施现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极为有利,就应当继续实行,如果放弃这项措施,必然会使成本大大增加。如果我们现在让纺织工业从三班倒改为两班倒,我们的成本必然会大幅度提高。

阿库洛夫同志在这里对政府的委员会通过的计划提出了批评,我认为他说得完全不对。阿库洛夫同志说,政府的委员会采取的方针不正确,计划的出发点是,我们是从计划所受阻力最小的地方(无论是整个工业,还是个别工业部门)开始工作的。

阿库洛夫:这一点在决议中已经谈到了。

克拉瓦利:决议中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这一点;如果谈到了,那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因为,在本经济年度即1928—1929年度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计划中,属于“A”部类的重工业部门改制的速度要比轻工业部门快。只要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提出的重工业改制企业的平均比例为10.4%,这并不包括1927—1928年度已经改制的企业和新增的改制企业,具体比例为:石油工业——15.7%,冶金工业——15.4%,电力工业——17.8%,重化工业——27.2%,煤炭工业——10%,等等。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本经济年度,无论是生产生产资料的整个“A”部类,还是重工业的个别部门,改制的速度都要比轻工业部门快。如果您认为这是错误的,您就该提出修改轻工业的有关比例的意见。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是要加快第一部类改制的速度,劳动国防委员会也建议按照这样的思路修改我们的计划,这恰恰是因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我国重工业改制的速度。

至于说制定整个计划的方针,我们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即使从某些工业部门来看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对企业进行了一定的筛选,我们的原则是,要挑选我们能在生产合理化方面最大限度地采取措施的企业,而这些措施能使我们在缩短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完成现在由中央全会的决定规定的将成本降低7%的任务。我们选择的是既能保证我们降低今年的成本、又不破坏我们的计划的企业。其中既包括像顿巴斯的列宁冶金工厂和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工厂这样的大中型企业,又包括顿巴斯的26个矿场和其他部门的一些特大企业。其中还包括几家比较容易缩短工作时间、同时又不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计划即可以降低成本的工厂。所以说,我们一些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一个以取得政治和经济效果为出发点的明确方针。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无须对计划作大的改动。

关于政府的委员会与包括乌克兰的委员会在内的各分支机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施米特同志肯定地说,乌克兰方面直到最后也没有就乌克兰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提出一个多少有些根据的计划。既然我们没有从乌克兰方面得到必要的材料,我们就只好在没有乌克兰方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总的安排,只得挑选一些组织得最好的企业并把它们列入计划,为的是不使乌克兰完全脱离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计划。前几天乌克兰报告说,他们正在让28个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但是我们政府的委员会至今不清楚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乌克兰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尽管政府的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

员会主席团曾几次问及此事。这里的主要问题显然在于,地方没有准备好材料,从中央方面能做的事我们已经做了,把一些乌克兰企业列入了计划。

还有,阿库洛夫同志在这里说,今年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数量好像是16%,因此乌克兰排在最后一位。此话不对。如果拿今年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人数量来说,乌克兰根本不是排在最后,而是名列前茅。

阿库洛夫同志,您应当知道,主要分歧可能产生于煤炭工业,那就应当向全会说明这一情况。您应当知道,顿巴斯的矿工刚刚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但是我国煤炭工业现在的人均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很多(达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大批工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有关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煤炭工业的整个经济计划就会受到破坏,就无法实现,计划所规定的任务我们就无法完成。在这方面必须把降低成本的措施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措施结合起来。

我还想就科萨列夫同志的发言提点意见。我认为,根本没必要把中央劳动研究所与共青团之间的争论提到今天的会议上来,在这个讲坛上攻击经济管理者,说他们反对用社会主义的形式培养劳动力,也是完全错误的。之所以说是错误的,首先是因为,这是诽谤;其次是因为,如果说中央劳动研究所培养的劳动力能管4—6台织机,而工厂艺徒学校培养的劳动力只能管2—3台织机,那么,中央劳动研究所就绝不是什么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如果中央劳动研究所培养的工人能管4—6台织机,那就要承认,这些工人是比毕业于工厂艺徒学校的人还要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有人喊:对。

克拉瓦利:我认为,采纳科萨列夫对这个提纲所作的修改,即关于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同时将未成年工人的工作时间由6小时缩短到5小时、由4小时缩短到3小时的建议,是错误的。既然我们还没有提出在这个五年计划内缩短有害工种车间全体工人的工作时间的任务,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提出缩短未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问题。政府的委员会也没提出要把缩短这部分人的工作时间一事拖上3年,因为并没有打算在这个五年计划内缩短这部分人的工作时间,没作出这样的决定,相反却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进一步缩短未成年人工作时间的的问题要在这个五年计划之后再提出来,到那时,缩短有害工种工人的工作时间的的问题也会提出来。

鉴于在落实今年这个压力极大的计划时必然遇到困难,各级组织都要直接关注各企业实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和为此做准备的情况,因为这关系到最终的

成果,包括经济成果。然而,在已经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我们并没有看到生产状况的好转,我们甚至发现,这些企业的劳动纪律有所松懈,旷工现象增多,次品数量和窝工次数都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多。对这种完全不能允许的现象要尽一切努力尽快加以扭转。今年要力争落实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这一重大而又现实的计划,而且纳入计划的这些企业各方面的实际工作都要比其他企业安排得更好。

主席:作总结发言的时间到了。表决一下吧。赞成结束讨论的人请举手。一致同意。现在请施米特同志作总结发言。

施米特:同志们,我的总结发言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实际上已经对我的报告中和政治局的决议中提出的主要结论给予了肯定。我只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增设夜班后女工上夜班的问题,另一个是科萨列夫同志提出的工厂艺徒学校问题。上夜班对于妇女来说的确很困难——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安排夜班又是必要的,克拉瓦利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正确。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上夜班应当成为长期的、正常的现象,上夜班是由于纺织企业的生产条件而出现的暂时现象,在这些条件逐渐消失的过程中,现有设备的不足、尽快更换这些设备的必要性都要求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为增加纺织品的产量付出更大的努力。由于这一切,我们还要继续增设夜班。然而,如果认为困难就在于妇女根本不能上夜班,那就意味着让妇女脱离生产。

阿尔秋希娜:你可别吓唬人。

施米特:我不是吓唬人,但是应当考虑到,在纺织工业中妇女占80%以上。怎么,您要光让男人上夜班吗?那您就要改变工人的构成,改变工人的构成就会导致排斥妇女劳动,你们自己应当清楚地记得煤炭工业使用女工的情况:在开始让妇女脱离井下作业时,同意让女工从事井下作业(妇女从事井下作业是被禁止的)的不是别人,正是女工部。后来不得不把女工撤下来,转做其他工作,对此女工有时还不满意,因为工资少了。有时也相信男工觉悟高,井下作业对他们有危害,多拿的那点工资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井下作业对他们造成的危害。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指出,让妇女改做井上作业并不总是令她们满意的事。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些妇女即使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也不想放弃夜班,怕的是失去自己的工资。因此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不能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放弃安排妇女上夜班的做法。全部问题都在于如何更好地、更合理地使用女工,如何减少夜班劳动对妇女健康的危害。另外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夜间不工作7小时,就是说少拿一小时的夜班加班费,按照法律规定,也应该这样,

因为夜班总是更辛苦一些,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的条件和各项经济指标的核定,我们应当把经济指标定得切实可行,定得对我们更加有利。

现在谈谈科萨列夫同志在这里提出的工厂艺徒学校问题。这场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如果要在这里提这个问题,那就要毫无偏见地提出来。在我看来,科萨列夫同志的最大误区在于,他把工厂艺徒学校当成了提高生产工人文化水平的唯一形式。如果这样提问题的话,就不应把工厂艺徒学校视为培养生产者的生产技能的学校,而应视为从事普通教育的学校,即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学校。我以为,科萨列夫同志这样片面地提问题是错误的。难道我们只能靠工厂艺徒学校来培养有文化的工人和未成年工人吗?那么党、工会和苏维埃机构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方面起什么作用呢?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党和工人组织都会尽一切力量不断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文化水平,不管他是未成年工人还是成年工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而且我们是在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各种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把工厂艺徒学校说成是唯一能够培养有文化的未成年工人的地方……

米利恰科夫: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施米特:不,您就这样说过,科萨列夫同志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

米利恰科夫:是培养新的劳动力骨干的主要形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施米特:培养劳动力的主要形式将包含在这方面采取的一定的方法中。我们在目前条件下也在谈论这些方法,我们还建议在中央的决议中强调。正是在目前条件下,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过程中,在采用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技术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文化的工人,这些工人首先应当是通过我们的学校培养的,而我们应当使这些学校首先吸纳各工业区的工人,使学校本身具备提高文化水平的基础,能为我们培养出有文化的工人。我们对培养能够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劳动的工人这一问题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说,在这里应当利用一切科学的方法。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只知道中央决议中列举的那些培养劳动力的科学方法,对其他科学方法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有个运用科学方法培养劳动力的中央劳动研究所。我们知道有几个劳动保护机构即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机构,它们正在制定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的某些科学培训方法,我们正在把这项工作同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因为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也会为培训劳动力,为劳动力更合理地劳动提供一定的科学方法,使工人不做无效劳动并千方百计地减轻他们的劳动。我们现在所能提出的只有这项工作。至于说这项工作将在什么地方进行,那就无所谓了。可以在工厂艺徒学校,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我们并不

仅仅局限于工厂艺徒学校,工厂艺徒学校的学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劳动力培训班。凡是要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地方都要讲这项工作,目的是培养出真正有文化的工人,让他们在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在党和工会的整个文化工作体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可以这样,也只能这样提出这个问题。

因此,科萨列夫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与我们提出的这个决议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要提这个问题,也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我们要在近期内向中央提出有关青年工人的培训、教育和提高其文化水平等问题。到那时我们会谈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想,在我们提出的这个决议中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

我想再谈谈阿库洛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即中央政府的委员会与地方的委员会在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上不够协调的问题。克拉瓦利同志说,乌克兰的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我认为此话绝对正确。尽管我们多次提醒阿库洛夫同志,但还是没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关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言之有据的材料。在中央政府的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已经结束后,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还是一份没有充分根据的材料。我们落实这一措施的工作本来就有些拖延,已经超过了中央委员会所规定的期限。因此我们不可能再等下去,于是我们便自己挑选了一些企业并批准了这个不合你们意愿的名单。我想,只要你们和中央政府的委员会都有诚意,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我认为,正如克拉瓦利同志在这里所说,阿库洛夫同志关于这份名单根本不合理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不应被我们在重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过程中将面临的困难所吓倒。我们应当把目标转向重工业。由我们提出并基本获得通过的这份名单是合理的,但是要对它进行调整和修改,使其有利于加强重工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纠正我们工作中难免出现的那些失误。但是如果认为整个名单基本不合理,那就不对了。我们从最便于开展工作即阻力最小的生产部门入手做工作,——这是合理的。

阿库洛夫:我就是这么说的。

施米特:您扯得远了点儿,您说整个名单基本上不合理。名单基本上是合理的,在落实过程中当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我们应当不畏惧困难,继续执行向重工业倾斜的方针。在下一步工作中,重工业领域应以更快的速度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且要在改制企业中占有更大比例。

主席:现在请苏霍姆林同志作一下说明。

苏霍姆林:我应当作如下说明。我们及时提交了拟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名单。克拉瓦利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他根据这个名单确定了联盟政府的委员会认为应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一些企业。有些企业要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首先就要投入资金去搞合理化工作。这一点被忽视了,因为政府的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没有同地方的委员会进行充分协商。这曾使我们在哈尔科夫的“镰刀和斧头”工厂陷入困境。这个厂改行七小时工作制需要70万卢布。我们当时正在审核有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政府的委员会没进行审核就宣布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另外,中央政府的委员会²⁶⁰不让地方的委员会参与南方钢铁托拉斯、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和国营煤炭化学托拉斯等联盟托拉斯的工作。所以,克拉瓦利和施米特两同志的说法,即委员会工作不协调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提供材料,并不完全正确。如果提供的材料不好,你们可以提出来,我们会作出反应,提供新的材料,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提供材料。

主席:请施米特同志说说。

施米特:苏霍姆林同志说得完全不对。

苏霍姆林:怎么不对?

施米特:你们提出要求说,要独立进行南方钢铁托拉斯和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我们说,不同意独立进行这项工作。

苏霍姆林:我们也要求进行协商和协调了。你们根本不让我们参与。

施米特:“既然你们不让我们这么做,我们就什么都不参加了。”这就是你们的事了。

主席:建议基本上按政治局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决议办。有没有其他意见?通过。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由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同志组成的委员会。被提名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美尔尼昌斯基、加利耶娃、日丹诺夫、阿尔秋希娜、阿库洛夫、科萨列夫、克拉瓦利、苏霍姆林、马祖罗夫、里亚博夫、彼得罗夫斯基和施米特。该委员会的召集人为施米特。有没有补充意见?名单通过。没有列入名单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现在要提一下晚上由谁作报告,是莫洛托夫同志还是安德烈耶夫同志?

喊声:莫洛托夫。

主席:一致要求莫洛托夫作报告,可是莫洛托夫同志请求,如果可能的话,将他的报告安排到明天上午——这样更好一些。

我同意。谁赞成今天听取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谁赞成听取莫洛托夫同

志的报告？那就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请求，将他的报告挪到明天上午。有人希望让温什里希特同志进入控制数字委员会。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现在我宣布休会，吃午饭。

第十次会议

9月21日晚间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继续进行。下面进行第四项议程——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振兴农业的措施的报告。现在请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应该定好发言时间。

安德烈耶夫:我一开始就想商量一下时间问题,因为报告人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所以我要求给我双倍的时间。

主席:安德烈耶夫同志要求一个半小时。

喊声:给他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主席:那就举手表决。谁同意一个半小时?通过。

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 振兴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安德烈耶夫:我受边疆区委员会的委托作这个报告,在报告中我要说明以下三个问题:(1)实事求是地介绍农业现状;(2)回答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边疆区委员会正在拟定的振兴农业的具体措施时提出的问题;(3)说明我们北高加索农村目前的社会阶级特征。这就是我在报告中将要说明的三个问题。

北高加索地区的农业现状。该地区农业的现状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讲。我在报告中不会引用大量的数字,因为已经有一本小册子详细列出了表示农业现状的所有主要指标²⁶¹(但愿各位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我只简单说几个必要的数字。如果根据两个主要指标(播种面积增加的指标和畜牧业现状的指标)来评价农业现状,那么,我们看到的数字是这样的:1922年北高加索地区的播种面积缩减到战前水平的51.4%;1927年达到了战前水平的88.2%;今年我们的播种面积有所减少,是战前水平的82.9%,这是由冻害和其他自然灾害造

成的,由于这些灾害,我们损失了近100万公顷秋播面积。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有的同志引用了播种面积减少的数字,这些数字引用得不对,说我们北高加索地区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了6%。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比较一下播种了多少地、耕作了多少地,这才是表明农民生产劳动情况的指标。拿1928年的总播种面积来说,如果不因自然灾害而减少,就会达到战前水平的92.3%,比去年的种植面积提高4%。这就是播种面积增加的情况。

农业的第二个部门是畜牧业。1922年这一部门的生产下降到战前水平的37.3%;1928年达到战前水平的77.6%。这一对比显示了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巨大增长。两个主要指标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在列举这些数字的同时,理应提到北高加索农业发生的改造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的秋播地面积扩大了,这无疑是农业的巨大成就,是改造的巨大成就。秋播地面积已达到战前水平的115%。我们的经济作物在农作物栽培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例如,向日葵的种植达到了战前水平的222%。我们的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也增加了。在分发给各位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出,革命前时期北高加索地区的农业经营方向单一,一味追求以粗放的方式扩大农作物栽培,而畜牧业则占次要地位。现在,畜牧部门在农业中的比重加大了。

最后,第四个变化是社会公有程度的变化,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的公有经济成分已经相当可观。

如果算上与集体农庄相比为数不多的农机协作社,我们的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边疆区农户总数的7%,其播种面积占边疆区总播种面积的7.4%。这无疑是改变北高加索地区农村面貌的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认为理应再说明一点,这种恢复当然不是自然发生的,农业的基本要素增长和改造性变化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我们对农业的推动。我想列举北高加索地区农业投资增长的数字来证明这一点,就列举近三年的数字吧。1926年的投资是1200万,1927年是2000万,1928年增长到了3300万。

有人喊[米高扬]:这是国家的投资。

安德烈耶夫:对,是国家的投资,没有算上农民的投资。我现在只说国家采取的推动措施。

1923年至1928年(包括1928年)期间,农机供应资金总额为7000万。今年农机供应资金为2200万。这一数字比前几年大大增加了。

还有一个可以表明对农业的推动的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说为农业提供农

艺服务。在革命前时期,整个边疆区总共才有240名农艺师,而且他们还是半军事人员。现在,我们的农艺师已经有1400名,而不是以前的240名。

最后一项推动措施是发展农业合作社。我这里说的不是消费合作社,它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作用很小。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农业合作社方面合作化的发展程度:1927年北高加索地区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占该地区农民总数的29%,今年已经达到44%。

我认为,这些简单的数字完完全全可以证实农业的基本要素持续提高的势头。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尽管农业的基本要素不断提高,我们北高加索农业的生产率还是非常低的。请允许我再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一下这个低水平的生产率。平均产量比战前水平低15%。1928年的农业总收获量只是战前水平的67.4%。

农业的谷物部门的总收获量同战前相比更少,加上玉米只达到战前水平的54%(我们的玉米种植面积是很大的)。不算玉米,谷物产量只是战前水平的42.2%。如果拿小麦来说……

有人喊:是今年的吗?

安德烈耶夫:我说的是1927年的小麦,因为拿今年的小麦说明不了问题,今年由于自然灾害,冬小麦播种面积大量减少。

如果拿小麦的总产值来说,它只是战前水平的51.6%。农业的第三个衡量标准——总商品率1927年为战前水平的60.7%。如果算上玉米,农业谷物部门的商品率是战前的33.5%,不算玉米只有25.9%。我就不列举小麦商品率的数字了,因为这一数字不太说明问题,我再说一遍,原因是秋播面积减少。今年小麦的商品率只有战前水平的19%。

这些数字说明,尽管播种面积总体上提高了,但北高加索地区的农业生产率还相当低。这一点从低水平的总产值来看,从平均比战前水平低15%的总产量来看,尤其是从农业商品率来看,都是很清楚的。

那么,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必须找出使我们得以在农业商品率方面、在生产率方面实现决定性的转变和决定性的进步的那些原因。我们能以充分理由确认的第一个原因在于革命前经营活动造成的后果,在于革命前掠夺性的粗放土地耕作造成的后果,当时的目标不是改善土地耕作质量,而是增加面积。沙皇时代采用的是旧的土地使用方法,也就是极具掠夺性的耕作方式:播种从不更换谷物品种,即从不实行轮作,采取非常原始的土地耕作方法,使用耕播覆土联合机,浅层耕作。

有人喊[丘巴尔]:没用!这种机器看着不错。(笑声)

安德烈耶夫:这种机器是这样的,它耕地的深度大约为1俄寸,有几个犁铧,上面装有一个小盒子,种子从盒中洒下来。其结果是土地的零碎化,是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等等。

于是,我们现在正为这种掠夺性的粗放经营付出某些代价,我们的农田严重荒芜,我们的土地状况严重恶化,土壤贫瘠、肥力下降。为了证明早在革命前时期这种粗放的土地耕作就已经对收成产生负面影响,我想在此公布斯塔夫罗波尔专区的一些数字。那里的情况是这样的:在革命前1898—1905年这8年时间里,每俄亩地产小麦42普特,大麦54普特,而在后来的8年里,即1906—1913年期间,这一产量下降了,每俄亩地产小麦30普特,大麦39普特。这些数字表明,在革命前时期斯塔夫罗波尔就已经出现明显的产量下降趋势。

第二个原因是经营分散化。这种经营分散化很大程度上是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得极其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结果。通过土地革命,50%的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50%的没有土地或常常要向哥萨克租种土地的外来农民也分到了土地。就革命前和现在每户的土地面积来说,革命前哥萨克中农农户每户有34到45俄亩土地,而现在每户平均有12—15俄亩。这表明了由于土地革命而出现严重的经营分散化,这场革命使50%的无地农民分得了土地。

安季波夫:使外来农民分得了土地。

斯克雷普尼克:那哥萨克呢?

安德烈耶夫:现在哥萨克和外来农民都一样了。这些原因无疑也对过渡时期的生产力起了降低作用。

第三个原因是在北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旷日持久、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几乎持续到1922年。单是过去的反革命大富农就有大约30万人移居国外。持久而又激烈的国内战争不能不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的恢复比联盟其他地区缓慢得多。

第四个原因是土地使用不合理。我们在土地使用方面大大不同于联盟其他地区。我们的村社比哪里的都大。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况:68.4%的农户距离自己的田地7俄里远,33.5%的农户距离自己的田地15俄里以上。这说明,由于存在着一定的经营分散化现象,由于缺少足够的农具,而且距离田地又那么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照料好田地,不可能精耕细作。这也是导致农业生产率降低的一个因素。

我们至今还看得到土地使用制方面的土地分散插花现象。我们至今还看得

到土地使用中的频繁重分土地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不稳定,造成了一种使农民不愿好好照料土地、照料本应该由他们长期使用的土地的状况。频繁重分土地使农民失去了精心照料土地的动力,而这一动力又是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所必需的。

在土地规划方面,我们只搞了13%的村内土地规划,87%的居民还没有实行村内土地规划。这就是制约农业生产率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是农具状况,这个原因也很重要。这方面的情况是,农具只相当于战前的50%。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各类农户中的农具分配情况更糟。农具的占有情况是不同的:41.5%的农户完全没有任何农具,56%的农户没有任何耕具。我们知道联盟其他地区的相关数字。它们的数字是这样的:乌克兰39.7%的农户没有耕具,西伯利亚是35.4%,而俄罗斯联邦平均为35.6%。

丘巴尔:就是说,情况好一些!

有人喊:你们那里是多少?

安德烈耶夫:我们56%的农户没有耕具,而无任何农具的农户,也就是既没有耕地用具,也没有收割用具以及其他用具的农户占41%。

有人喊:这说明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安德烈耶夫:我们一会儿再说分化。现在谈谈畜力。畜力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边疆区的畜力只相当于战前的51%。

我们48.4%的农户没有马。36.8%的农户没有任何畜力,没有牛,等等。在我们北高加索地区,只有23.4%的农户用自己的牲口和农具劳动,能完全用自己的工具和畜力耕地。我们知道其他地区的数字,例如,西伯利亚能用自己的农具和畜力耕地的农户为56.6%。遗憾的是,没有关于乌克兰的资料。俄罗斯联邦是56.8%。

这是农具和畜力的情况。在各类农户中农具的社会分配情况怎样呢?我们现有这样一些数字:33%的农户只拥有3.3%的农具;43.7%的农户只拥有34.3%的农具。

把这两组数字合起来就是,78.4%的农户拥有现有的37.8%的农具。其余22%的农户拥有62.2%的农具,最高类别的农户即富农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9%,拥有30%以上的农具。

这是农具在各社会类别的农民中的分配状况。这种状况带来了什么呢?由于这种状况,在扩大种植面积过程中出现了极大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这种情况使得土地耕作水平低下。第三,由于农具这样分配,播种就不及时,这无疑

会使收成降低,因为大量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只能等待较为富裕的农户腾出农具,只能很晚才播种自己的地。第四,农具的这种分配状况实质上是最富裕农户对贫农农户、甚至中农农户进行剥削的根源。

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占有也是现在农村中一切剥削现象的根源,这是剥削的主要根源。少数人阶层占有生产工具,用这些工具来剥削广大贫农,甚至也剥削中农阶层,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下。农具的这种分配状况首先导致的是贫农将土地出租,因为缺少农具,这种情况前些年就有了,截至今年,贫农农户出租的土地已经非常多了(1927年是140万公顷)。由于我们今年对贫农农户提供了生产上的帮助,土地出租量大大减少了。农具的这种分配状况是贫农乃至部分中农在经济上受制于富裕阶层的原因。如果说从前农业中剥削的基础在于富农出租土地——他们通过出租自己大片的农用地来剥削贫农,那么现在这种剥削已经从土地转移到生产资料上来。

还有下一个原因,就是种子标准的丧失。这也是导致农业产量降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整个过渡时期,尤其是在闹饥荒的1921年,所有粮食都被吃光了,种子粮也没剩,种子是从其他地区运来的,并不适合北高加索地区的生长条件。有的甚至是国外杂七杂八的种子。

在农业中这对产量有很大影响。甚至在今年搞播种时,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把种子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从顿涅茨克专区运到库班,因为种子不够,可北部的顿涅茨克专区的种子根本不适合库班的南部地区。这些因素对农业生产率也有影响,会使生产率降低。我们认为,这些就是北高加索地区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努力消除其中一些原因,争取实现北高加索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根本转变。

除了这些原因,我还想说说在发展北高加索农业方面已经具备的和我们所拥有的潜能。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我们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有巨大的潜能,至少可以扩大50%。我们还有能力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0%。我们能够把1000万公顷的播种面积扩大到1400万公顷。

波泽恩:不用大量投资吗?

安德烈耶夫:关于投资的事我们待会儿再说。(笑声)

投资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愿各位能明白关于农具的一种说法:用手指是挖不了地的,而要用工具来挖地。扩大播种面积完全要靠耕作工具。

有人喊:需要几百万?

有人喊:他最后会说的。

喊声：不要打岔。

安德烈耶夫：是的，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我们有能力在现有基础上增加50%。北高加索有这样一些特点：就拿我们当然还没有充分利用的土壤条件来说，属于黑土土壤条件，这非常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除了用这种办法来扩大播种面积外，我们还有亚速海沿岸区和外库巴河滩区这样一些地方，如果把水排掉，这就是30万俄亩土地。如果把这些沿岸区（河滩区）的水排掉，那么，不需要采取特别多的农艺措施就能保证平均每俄亩150普特的产量。

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在扩大播种面积方面开展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在这条道路上止步，无论如何不应该改变这方面的方针，应该想方设法努力扩大播种面积并利用各种条件，但我们觉得，主要力量还是应该放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上，这方面我们应该深入进行提高生产力、提高产量的工作，应该使各级组织都对这方面给予特别关注。或许，应该少追求数量，而在质量上多下功夫，在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上多下功夫，为使每俄亩地的产量提高一普特多下功夫，因为现有播种面积是1000万俄亩，每俄亩地产量提高一普特就意味着增加1000万普特粮食。使每俄亩地的产量提高一普特不是开玩笑。不要瞧不起这项工作，要为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率、为增加每一普特粮食产量而努力。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极大的、无穷的提高产量的潜力，例如与德国每俄亩的生产率相比，1925年德国每俄亩冬小麦的产量是138.8普特，而同年我们北高加索的产量只有59普特。当时，我们北高加索的地……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是好地。

安德烈耶夫：比德国的地好得多。

丘巴尔：这是事实。

安德烈耶夫：所以，就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率方面来说，我们还是有极大潜力的。

但是没必要去效仿德国。请让我举几个在我们身边的北高加索的例子。有三个例子。

有人喊[丘巴尔]：说一说，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经营得怎么样？

安德烈耶夫：他们经营得不太好。

有这样三个例子：北高加索的实验站和相邻的农户，还有按抗旱原则、为获得专项贷款（已发放的）而重组的农户，第三个是我们国营农场的生产率。

实验站每俄亩地产冬小麦118普特，相邻的农户的产量为32普特。

斯克雷普尼克：投入了多少钱？

安德烈耶夫:当然,实验站和农户的生产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说明我们的土壤潜力简直是太大了。德国的增长速度达到了每年0.5%,如果我们提高技术,就可以大大超过这一速度。但是各实验站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里的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各不相同。

还有重组的农户。他们的每俄亩地产冬小麦60普特,而相邻的农户的产量为36普特。

有人喊:那重组需要多少钱呢?

安德烈耶夫:当然有钱的问题,但是在这些重组的农户中,我们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还远没有采取一切办法。我们采取了初步措施,仅这些改善基本农艺条件的初步措施就能使我们的产量增加一倍。

1927年的时候,国营农场每俄亩小麦产量是42普特,而相邻的农户每俄亩的产量是31普特。

我认为,这些数字表明,从提高我国农业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率来看,我们拥有极大的潜力。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我们应该利用哪些手段、通过哪些途径来提高这个农业生产率。

斯克雷普尼克:就谈谈这个。

安德烈耶夫:我们北高加索党委要怎样提高这个农业生产率,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什么要求呢?我们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潜力既在于农业、农村自身内部手段的利用,也与国家给予的一定的帮助、一定的推动有关。

那么,在利用农业内部的条件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办法呢?我们首先要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要保证在农业中、包括在个体农民经济中实行一定的、可行的、起码的基本农艺措施,创造一定的、基本的农艺条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完全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做表面文章。我还没有彻底克服自己缺乏农艺知识的弱点,因此可能有些术语搞混了。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不要紧,不要紧。

安德烈耶夫: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帮我纠正。

[奥尔忠尼启则:感谢上帝,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安德烈耶夫:所以,我列举一些虽然让我们费点力气,但是可以在农业中实行并能马上给我们带来生产效益的办法。例如,保证有效地锄草。也就是锄掉田里的草和田埂上的草,这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而这一措施肯定能保证每俄亩地增产5普特。这是经过农艺师们确认的。

斯克雷普尼克:每俄亩地增产多少?

安德烈耶夫:5 普特。

斯克雷普尼克:投入多少?

安德烈耶夫:不需要任何投入,只要组织农民就行。有的地方的一些精明的经营者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我想,我们可以、也有权把居民组织起来或帮助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去实行这项措施。

第二项措施,在播种前用福尔马林对种子进行消毒。只要进行了种子消毒,马上就会获得生产效益,每俄亩地增产5—8 普特。

斯克雷普尼克:每俄亩地投入多少钱?(喧嚷)

彼得罗夫斯基:不要使报告人脱离主题。

柯秀尔:我们想知道,他怎么计算这么细,真见鬼。

安德烈耶夫:实行这样的措施当然需要一些投入,但是根据计算,根据很严格的计算,实行这一措施我们整个边疆区需要60万卢布。这些钱能使每个农户有一小瓶福尔马林。

有人喊[丘巴尔]:但是我们的福尔马林不够。

安德烈耶夫:不够?不行,我们需要为农业提供保障,这可不是什么需要大笔开支的事情。我们就那么不中用,那么不善经营,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成吗?如果我们确实能保证向我们的农户提供福尔马林,能提早关心这项工作,那么,我们显然就能把它当作每个农户必须实行的措施来实行。

斯克雷普尼克:对。

安德烈耶夫:第三项措施是最简单的农艺作业:谷物清选,即去除影响粮食产量的植物杂质。这项谷物清选工作能迅速带来生产效益,每俄亩地增产3 普特。同志们,这项工作有点麻烦,因为要使用叫作谷物清选机的机器进行谷物清选。

波德沃伊斯基:你不用解释什么是谷物清选机,说说你们那里这种机器的情况怎么样吧。

安德烈耶夫:从保证这种机器的供应来看,是有些困难,但是根据我们的农艺师和农业工作者估计,要保证边疆区里100%的谷物都经过清选,我们总共应当支出240万卢布。

柯秀尔:需要多少谷物清选机呢?

安德烈耶夫:需要多少我还不知道,但事实是,只需支出240万卢布,就能使每俄亩地多收3 普特粮食。如果我们能使这项谷物清选工作在近期内进行,

试问我们能保证每个农户都进行谷物清选吗?我们能。

第四项措施。有些措施我就不在这里给各位一一列举了,因为这些措施很多,但是我认为,这项措施你们会感兴趣的。

喊声:感兴趣,讲吧。

安德烈耶夫:第四项基本措施就是中耕作物即玉米和向日葵的疏苗和间苗。这好像就是把长出的多余的苗拔掉,以保证植物自由生长。

喊声:对!对!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各位对农业很在行。(笑声)这项措施带来的生产效益是每俄亩地增产5普特,而且这样不用任何机器耕作,就是到田里去用手拔掉多余的苗。

斯克雷普尼克:你去试试吧。

安德烈耶夫:我们能实行这项措施吗?能。农民会这么做吗?会的。

有人喊[柯秀尔]:大家都会这么做。

安德烈耶夫:还有一种措施,就是使用中耕机进行中耕,因为我们那里的中耕作物即向日葵和玉米的播种面积都很大。中耕机是很普通的农具,实际上很便宜,只值27卢布。

丘巴尔:还能更便宜些。

安德烈耶夫:据说,如果大批量生产,价格可以大大降低。使用这种大家争相购买、供不应求的极其普通的工具,可以带来增产10%的生产效益。至于其他一些极为简单的措施,例如禁止一茬接一茬地播种一种作物,而根本不进行轮作的做法,我就不说了。我们可以这样做,可以要求农民不得掠夺性地开发土地,而要像土地使用基本条例中规定的那样来使用土地。

有人喊:没有条例。

安德烈耶夫:土地使用法中规定了使用承租土地应该承担的义务。我们可以要求合理地使用土地。有了各级服务组织提供的一定保证,我们肯定可以实行这项措施。同志们,这些基本措施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但是这些基本措施能给我们带来农业上巨大的、直接的生产效益。

怎么实行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将一定的强制手段和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要使它们互相补充,要为经营活动规定一定的义务,而为了使这一义务得到履行,就要用社会责任感来加强这种强制手段,调动农民的社会责任感来实行这些措施。

应当承认,在我们边疆区提出这个问题时,有些神经脆弱的同志说,怎么能

这样,这是干涉,是强制,等等。我们怎么能这样干预农户的个体行为。我看,这些话都不值一提,是搞地方自治。

有人喊[米高扬]:这不是英国的工会。

安德烈耶夫:这是搞地方自治,是对农业和个体农户经济袖手旁观的旧情绪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直接干预各个过程,就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

有人喊[丘巴尔]:先进农民要求这样做。还有贫农。

安德烈耶夫:是的,先进农民要求这样做。我们已通过一次次增产大会验证了这一点²⁶²。所有人都完全支持这些措施。农业工作者也完全支持我们实行的这些办法。我们准备在1月1日前保证由边疆区委员会作出一项载入这些措施的决定,以便能够利用从1月1日到播种这段时间进行社会准备和安排我们在各地机关的工作,等等。很多措施不能强制实行,“强制”这个词可不是什么好词。

斯克雷普尼克:为什么?

安德烈耶夫:我们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热中于这种“强制”。我们应该注意到,如果不做一些应当做的工作,我们就会在这件事中陷入难堪的、非常难堪的境地。

丘巴尔: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我们既要采取在农户中实行基本农艺措施的办法,也要实行能使我们得到每一个土地共耕社、每一个乡会的广泛和无条件支持的一系列社会措施。我们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命令因素,即对待实行基本农艺措施工作的官僚态度的因素,而且这项工作的方式要有所改变。这样我才相信,我们实行这些措施一定会取得满意的效果。至于我们不能使用强制手段实行的措施,可以另外通过签订合同,通过签订预购合同²⁶³来实行。今年我们签订秋季预购合同的条款不只是我给你农民种子和钱,你明年返还商品粮,不只是这样的条款,我们还就如何生产签订了带有一系列农艺条款的合同。在我们那里,这类合同已经通过预购合同生效。既然我们提供钱和种子,并使农户相信这可为他的生产提供农具、种子原料等方面的保证,那么我们也就能保证做好及时播种这样的事情。及时播种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每俄亩小麦地多生产出8.5普特。农艺师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播种及时,按照农民的平均收成,我们就能多收8.5普特。还有秋耕这类措施。我们签订了合同:我们提供钱和种子,你要保证在秋季前对自己播种的土地进行秋耕。

这意味着什么?这也意味着每俄亩地能多收约8.5普特粮食。这就是这些

农艺措施的意义。同志们,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已经通过今年的秋季预购合同实行这些农艺措施。今年的秋季预购合同所涉及的播种面积占我们边疆区全部播种面积的42%。我认为,在实行农艺措施即基本农艺措施方面,我们对集体农庄的要求应该特别严格,因为我们对它们的帮助要比对个体农户的帮助多一些。集体农庄在这方面的潜力也比个体农户大。对于国营农场,也有实行农艺措施的严格规定。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甚至在公有经济成分方面也做得远远不够。这就是我们应该通过农业内部的工作保证实行的第一项措施,它不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我们应该实行并且可以实行的第二项实际措施,即我国农民经济必将实行的措施,就是建立备荒种子储备,这是为了保留本区、本村种用材料,即为了在粮食歉收、种用材料不足时保证供应;为了保证对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户的供应;第三,为了把这一储备作为交换储备用于换取精选种子,等等。

我们边疆区决定,1929年10月1日前建立300万普特的村苏维埃储备。当然,能否建成这300万普特的储备还很难说,但是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取得一定成果的。这项工作将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可以实行并已打算在北高加索实行的第四个措施是在边疆区植树,这项措施对于我们边疆区的主要粮食产区——草原部分地区来说有巨大意义。我们实行这一措施基本上也不需要国家花钱,只要提供技术和物资支持、提供树苗就可以组织群众来做。据从事实际工作的农艺师说,从防止各种形式的土壤流失、冻害和保持水分等角度看,这些措施对于农业有着巨大意义。我们想在明年初春就开始在这方面做大量工作。我们不是预言家,不知道会在这方面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再说一遍,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就会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们同样可以在农业内部实施的第五项措施是更合理地使用农具。很显然,在这方面,可以说得更确切些,在更有效地使用现有农具方面,我们还没有采取一切办法。在公有经济成分方面、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农具的使用情况尤其如此。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再取得一些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

请看两个对比。以国营粮食农场为例,它们的拖拉机可以耕种300俄亩,而集体农庄的拖拉机只能耕120俄亩的土地。

弗鲁姆金: 马力一样吗?

安德烈耶夫: 是一样马力的拖拉机。这表明,集体农庄的拖拉机使用不充分。

这些就是基本措施,我再说一遍,是基本措施,因为我们还要采取一系列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就可实行并能提高我们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有人喊:无机肥料呢?

安德烈耶夫:北高加索地区不太用得着无机肥料,因为黑土地不需要无机肥料,但是我们同样也通过专门的研究机构提出了这个问题,关于我们那里的农业是否需要这种肥料,它们会给我们答复的。

有人喊[丘巴尔]:目前不用这种肥料也行。

安德烈耶夫:现在我来说说那些不是靠农业的内在力量,而是基本上要靠国家帮助才能实施的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进行土地规划,即把土地调整好、安排好,以便更好地、更有效地使用它。我们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呢?我们建议在最近5年内在北高加索彻底完成村间和村内的土地规划。在5年期间要制定出这项工作的计划并保证计划所需资金,以便在这一短时期内完成整个土地规划工作。我们做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是,必须疏散大村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库班地区和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村的情况。这些哥萨克村的人口多达3万。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土地规划疏散这些大村社,当然不是疏散为小村庄,而是疏散为500人、1000人的小居民点,让居民离田地近一点。我们在农业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使土地使用具有相当长的稳定性。这是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必要条件,这样才能消除频繁划分土地现象,促使个体农户关心土地经营。

在进行土地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免得以后随着集体农庄的不断产生再重新划分土地。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民族地区土地划分的意义:在这些地区,土地规划是使农民摆脱富农剥削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它甚至具有农村土地革命的意义,所以我们才提出加快民族地区土地规划的建议,把期限缩短为2年。

需要国家协助的第二个方面是农业机械化,这也许是最主要的障碍;农具不足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最主要障碍。我们这个让一些同志担心的方针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方针的内容是,既提出机器供应的总计划,它应抵补全部农具的折旧,同时也提出一项具体任务,要在2年时间内完全满足边疆区对条播机的需求,保证条播机的供应能使所有的土地都实现条播。我应该列举一些数字来说明条播的效率。这种播种能使每俄亩地多产4普特粮食,此外,能使每俄亩地节省2普特种子。买条播机不用花太多的钱,由于节省了种子并提高了生产效率,一年就能完全收回成本。这是第一条,即我们提出的第一项具体任务。

第二项任务是谷物清选。关于谷物清选的问题,关于为边疆区供应谷物清选机以完全满足边疆区谷物清选需求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

第三项任务,给边疆区提供约 10 000 台拖拉机以弥补牵引力的不足,否则土地生产率不可能提高。通过养马来提高土地生产率是个很长的过程,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完全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不应该忽视马和牛的作用,斯米尔诺夫同志在人民委员会上对我们说的这番话很对。如此看来,第一年是 5 000 台拖拉机,两年就是 10 000 台,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牵引力需求,在 2 年内提高土地生产率。

丘巴尔:我们也能。

柯秀尔:我们对半分吧。

安德烈耶夫:我知道你们也能。这个我下面会说的。

同志们,我们只提出这三条作为对上级机关的要求。

丘巴尔:要求不高。

安德烈耶夫:我计算过,这大概需要 2 800 万卢布的贷款,这些贷款不但能大大提高商品粮产量,而且 2—3 年后就可以返还给国家。

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建议加强机器供应这一项工作的主要目的第一是保证集体农庄建设;第二是组织租赁点,巩固我们的国营农场,成立拖拉机队,等等。因为所有资料都表明,我们应该保证个体农户、各个个体农户在取得农业机器方面有一定优惠,但是经营情况即生产情况表明,对小的个体贫农农户甚至中农户来说,使用农业机器并不上算,应该让一些农户联合起来去使用机器,从而使机器得到充分利用。我们的农机供应工作就是从这一方针出发的。关于这些机器的使用我应该列举一些数字。例如,轻犁可以耕 5—6 俄亩地,而个体农户平均只用它耕 2 俄亩地。重犁可以耕 10—12 俄亩地,而个体农户只用它来耕 5 俄亩地。收割机可以收割 100 俄亩,个体农户却只用它收 16 俄亩。十一行的播种机可以播种 40—50 俄亩,可个体农户只用它播种 15 俄亩。这组数字引自一位同志的发言。因此,这位同志说,“最必要的改造和重组措施需要高度集约化作物、需要更加完善的耕种、牵引、清选和收割工具,只有在小农户扩大之后才有可能和有条件对其采取这一措施。我们应该采取并且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通过把个体农户联合成生产集体的途径来实现这种扩大。”

这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斯米尔诺夫同志说的,他说得完全对。我认为,应当通过研究这个问题制定出针对机器供应工作的某种经济方针,不分散使用农具,而是在农业中有组织地使用它们,要使农具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效用。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就加强机器供应工作问题提出的极其有限的要求。我还要指出的是,这样就能使举足轻重的北高加索农业得到相当大的改造。如果我们既采取我所谈到的组织措施,又加强机器供应工作,就无疑能保证两年后使北高加索的商品粮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亿—1.5亿普特。毫无疑问,国家应该要这些粮食。我们保证北高加索的工作会得到这样的成果。

柯秀尔:要过多长时间?

安德烈耶夫:两年。

柯秀尔:给他!给他!谁同意给?(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是给北高加索。]

安德烈耶夫:所有北高加索的农艺师都说,这一点我们在中等收成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到。

可能有些同志说我有点地方主义。

柯秀尔:瞧您说的,瞧您说的,没有。(笑声)

安德烈耶夫:我去了北高加索,就成了北高加索人。政治局的人对此有点意见。

柯秀尔:这是在说我。

有人喊:心虚了。(笑声)

柯秀尔:我没有心虚。

安德烈耶夫:说我有点地方主义,但我就是个北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乌拉尔人以及别的地方的人一样。

有人喊:你有义务发展边疆区。

安德烈耶夫:总之,我反对搞这种地方主义,我想我们应该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问题,不要在资金问题上扯皮,不要认为我们会通过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斯克雷普尼克:好样的。

И. 柯秀尔:别人都跟你要粮食,现在你说说你要什么。

С. 柯秀尔:所有的拖拉机。

安德烈耶夫:我认为,能够解决原料问题的不全是斯摩棱斯克省、卡卢加州或中部地区,而是北高加索、乌克兰草原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这些地区将能解决粮食问题。

我们的资金能不能同时满足所有地区的需要呢?我认为不能。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分散使用,我们就不能收到任何生产效益。所以,不妨以更加负责的态度

度对待粮食问题,把大量资金集中到那些能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更大效益、地理位置最为便利、出口通道最有保证的地区。所以,就应该提出为保证发展农业生产分配资金的问题,而不是平均分配的问题。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说的关于提高农业的途径、条件和资金问题。我想这一问题基本上比较清楚了。现在,我要说说北高加索各种农业形式的发展途径,说说我们对这些途径的设想。

主席:一个半小时已经过了。

丘巴尔:一个半小时就答应了增加1.5亿,那三个小时又会增加多少啊。

波德沃伊斯基:别打断,他刚刚转入正题。

安德烈耶夫:我要求再讲一个小时。

有人喊:给他一个小时。

主席:报告人要求再讲一个小时。有谁反对?没有。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后)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会议继续进行。请安德烈耶夫同志接着讲。

安德烈耶夫:同志们,我现在要说的是北高加索主要农业形式的发展途径,还有我们对这些途径的设想。北高加索41%的农户没有农具,48%的农户没有马,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农户的发展基本上要走集体化的道路,它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这一大批没有马、没有农具的农户基本上具备了集体化即扩大的条件。我不再用农户分散时的不利情况——使用机器方面的不利情况来论证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很明显的,而且,如果我们去发展机械化,在农业中使用比浅耕多铧犁等更为复杂的机具,在农业中更多地引入机器牵引力,就必定能使集体农庄建设在这一大批没有马、没有农具的农户中广泛开展起来。我想,我们具有苏联任何一个地区都比不上的农业集体化发展的高速度的事实就能证明这一点。我丝毫不想炫耀这一点并将其归功于我们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最不应该归功于我们,而最应该归功于农业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使得小的贫农户甚至中农户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否则就无法开发土地。

1928年的集体农庄同前一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00%,这种迅猛增长的基础是什么呢?集体农庄建设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贫农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希望开发国家给他们的土地,而在分散耕种的情况下是无法开发这些土地的,需要把力量联合起来。这基本上就是今年我们集体农庄建设发展的原因,今后,我想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我们集体农庄建设的速

度也不会放慢,只会加快,而且这不取决于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努力。

如果我们希望激发贫农和中农的经营主动性,就要为此做好准备。在北高加索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经营主动性必将转化为比其他地区快得多的集体农庄建设速度。我想,今年的集体农庄发展速度甚至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不是我们人为地建立了这些集体农庄,而是有点儿措手不及的我们没能为集体农庄这种成倍的增长做好充分的组织工作。

我给大家列举一些数字来说明北高加索集体农庄发展的特点。1927年有3700个集体农庄和1160个农机合作社。到1928年时,集体农庄已达6215个,农机合作社2230个,算上农机合作社,北高加索共有集体农庄8500个,而去年是4000多个。

波德沃伊斯基:那农户一共有多少?

安德烈耶夫:现在来看看集体农庄与农户和播种面积的比例关系。1927年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3.7%,1928年为7.4%。

斯克雷普尼克:不错。

安德烈耶夫:农户的比重1927年是3.1%,1928年是7%。

瓦雷基斯:是集体农庄吗?

有人喊:算上合作社。

瓦雷基斯:是集体农庄加上低级合作社吗?

安德烈耶夫:是的,而且据我们的经济工作者计算,集体农庄的商品率在我们的平衡表中已经占全边疆区商品率的10%。这已经不错了。再看看各个地区的情况。我们有一些地区,比如库班的科列诺夫斯克地区,顿河的库谢夫斯克地区,这些地方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25%。

我们曾对集体农庄如此快速的发展产生疑问:这不会是骗人的把戏吧?集体农庄不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碎吧,不会在播种之后,在有了机器后,就解散吧?我们检查了许多专区的情况后确认,今年解散的集体农庄的比例比去年低很多,我们现在新建立的集体农庄都是比较稳固的。

波德沃伊斯基:能不能说说解散的集体农庄的比例?

安德烈耶夫:很遗憾,我现在没有数字,但是我们认真作了这方面的检查,检查是专门进行的,由于有时不相信各地的信息,我们便派工作人员亲自到各地去,这才确定,今年解散的数字低于以往年份。这就是对集体农庄运动在数字上增长的说明。

现在请允许我公布一些通过从生产效果上与个体农户加以比较得出的、可

以说明集体农庄质量的非常重要的数字。我说说单位面积产量的数字:1927年集体农庄每俄亩地收获56普特秋播小麦,而附近的个体农户收获36普特。1928年由于受不利的气候条件影响,集体农庄每俄亩地收获45普特秋播小麦,而个体农户只收获24普特。1928年集体农庄春播小麦亩产55普特,而个体农户亩产49普特。这些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数字,通过对比这些数字,各位会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已经取得了一些生产效益,也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效益,从向大规模使用土地即土地使用社会化转变来看,这些数字对分散的个体农户产生的作用比任何宣传都强。

另一条就是每户的平均收入。在集体农庄中每户年收入为789卢布,而个体农户是541卢布。

这两个质量指标表明,我们不只是在数量增长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确切地说,这些质量指标表明,公有经济成分正在取得胜利。

现在来看看我们的集体农庄是由什么人构成的:参加集体农庄的是只有贫农,还是也有中农呢?这个问题我们也作过调查。我们有这样一些资料:在抽查的各个专区和地区的102个集体农庄中,贫农占72%,中农占24%,富农占2.9%。这表明,参加我们集体农庄的不只是贫农,现在已经有中农参加了,他们占集体农庄农户总数的24%。

但是我想,如果我只说质量和数量增长这些优点,这未免有点不妥。集体农庄运动中还有很多不足。第一个不足在于,我们的集体农庄还很零散,尽管从全苏联的平均指数来看,北高加索的集体农庄比其他地区的规模大。但我认为这些集体农庄还非常零散,还不能充分利用大型机械和拖拉机。

第二个不足是我们集体农庄人员构成的变化非常频繁。集体农庄虽然存在,但它的人员构成时常变化。一些人走了,另外一些人又来了。

第三个不足阻碍了集体农庄的内部团结和组织工作,这就是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不协调。个体农户的一些纯粹个人主义的日常生活特点仍然经常被带到集体农庄中来,这不利于集体农庄在日常生活方面协调一致。

第四个大的不足是,我们集体农庄中的公有化的生产资料所占比重不够大,集体农庄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进行单个经营,一部分对生产资料和土地实行了公有化。所以,我们的公有化比重,我再说一遍,虽然我们的指标比其他地区高,但这一比重还是不大,应该继续努力。我们认为,我们各级组织今后应该致力于消除集体农庄的这些不足。我们正在进行集体农庄的联营社式联合的实践。我们把许多小集体农庄联合成一个联营社,它通过各种生产关系等把这些集体

农庄维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转向并且正在进行这一实践。从集体农庄建设的角度看,必须做到使集体农庄不与个体农户隔绝。集体农庄中更先进的耕作方法必然对个体农户产生影响。要提供种子和农机等帮助,总之,要编织集体农庄和农户的相互关系网。这会促使个体农户看到集体经济的好处,等等。这些方面的工作即消除集体农庄种种不足的工作,使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更加紧密结合以促使后者采用更先进的土地耕作方法的工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搞起来并进行下去。

北高加索农业发展的第二个方面即第二种形式是国营农场这一公有经济成分。在国营农场建设方面有什么要说的呢?首先必须说的是,我们在老国营农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我们北高加索,老国营农场占有的耕地面积是15万俄亩。在这些国营农场的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生产成果,例如我已经说过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对个体农户施加影响,向他们提供精选种子。我们国营农场的所有田地播种的都是精选种子,农户的田里播种的也是这样的种子。

我想多说说新的国营谷物农场。不妨看看,我们在这些新的国营谷物农场发展初期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大家知道,在我们的萨利斯克有一个占地面积达15万公顷的国营农场。在这个农场中,已经翻耕土地65000公顷,其中12000公顷播种了秋播小麦。到了夏天收割的时候,我们这65000公顷秋播和春播作物的平均收成一定会达到250万普特左右,而且是我们推动个体农民经济所需的精选种子。从这一角度看,这项事业有巨大的意义。

第二个国营农场在顿河专区,耕地面积45000公顷,它将起到农场学校和示范农场的作用,它将在从事耕作的同时,通过实践工作,培养农业领导干部。第三个国营农场在沙赫京斯克专区,耕地面积55000公顷。我们目前正在致力于这三个农场的建设。我们计划发展的国营农场耕地总面积为50万公顷。

有人喊:到什么时候完成?

安德烈耶夫:到1930年。我想,根据土地条件来看,这项计划是能完成的,这还没有算上老国营农场,而且只是谷物农场。我们的事业能发展起来吗?我们对这些国营农场的初期工作成果有什么感想呢?

据说,这个大型国营农场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美国也没有这么大的农场,从它的工作情况来看,目前效果还不错。人们工作干劲很足,事业已见起色。农场的拖拉机和管理人员日夜不停地工作。效果似乎还不坏,耕地成本问题解决得也挺好。国营农场的耕地成本是8卢布,而农户的是14卢布。通过人们对

于事业的态度、人们在农场里的工作状况、事业的进展情况可以检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那里的300台拖拉机没有一台出故障,尽管机器都是24小时不间断地耕作,夜里也点着灯在草原上耕作,但是没有一台机器出故障。就是说,人们工作很努力。

柯秀尔:工作才刚刚开始……

安德烈耶夫:我们在进行萨利斯克国营农场本身的工作的同时,正在试行一项措施——在国营农场和周围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生产联系。现在,拖拉机已经耕完农场的65 000公顷土地,完成了计划,我们把农场腾出的这些拖拉机用到农民的地里,用到周围哥萨克村的秋耕地里。农场的第一个农民地助耕计划已经完成,现在我们得到信息,农民提出要求:再提供一些拖拉机,来耕我们的地。

有人喊:怎么办?

安德烈耶夫:当然是有一定条件的,条件是:农场要从这些用农场拖拉机耕地的农民那里收取一定的商品粮,不收钱,而是收商品粮。

这样发展下去,就有望在国营农场和个体农户之间建立直接生产联系,就会使个体农户对国营农场有一定的依附性。国营农场主要为周围农民提供生产服务,许多小农户都依附于国营农场,而农场则向他们收取一定的商品粮。此外,我们想通过这个国营农场以组织培训班、提供农场的农艺师服务和供应种子等方式为周围农民提供栽培技术帮助。

如果事情这样发展,即我们的国营农场将通过栽培农艺措施和种用材料等在生产上把周围农民一定程度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其实就已经使国营农场成了周围农民真正的合理化建议者。我们的国营农场不是从前那种坐在家里剥削周围农民的地主寄生虫,而是农民的合理化建议者,是小农户的帮手。我认为,我们应该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我们的国营农场,即不只是在这些谷物工厂自身的工作中,还要在对周围农民施加巨大影响方面取得成果。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国营农场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国营农场周围要有一些集体农庄和靠国营农场的生产工具联合起来依附于国营农场的农户,国营农场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这就是我们的国营农场、我们的这些谷物工厂的巨大意义,我们要沿着这条路线开展工作。

发展农业的第三种形式是实行个体农户的生产合作化和努力保证个体农户栽培水平的提高。我所说的保证农户栽培水平提高所需的条件不只是指价格问题,不只是指对保证农户栽培水平提高所需条件有重要意义的税收制度问题,

我说的创造这些条件也是指我们工作的实践问题。如果有人说不高加索同别的地区完全一样,也存在各种过火行为,我认为这样说是对的。我想,我们在收购粮食、发行工业化公债²⁶⁴、征收农业税时,远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我们有许多过火行为,这些过火行为往往会打击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不高加索也是极为有害的。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在实行生产合作化的同时保证提供必要的条件,使个体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在从事个体经营时不产生后顾之忧,不担心物质和法律上的限制。这种担心和后顾之忧经常是由我们的过火行为造成的,我们不高加索也多得。但是,另一方面还要指出,在前几次增产大会上,许多发言都谈到了农户的前景问题。我们听到农民说:“如果我们不参加集体农庄,还有什么前景可言,还怎么发展?你们说,要发展农业。你们要求振兴我们的农业。我们向哪里发展,发展的前景怎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曾作出坚决的、我想也是正确的回答:发展、改善和振兴农民经济的唯一前景和唯一途径是走生产合作化道路。对于个体农民经济来说,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可走。我们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工作,发展个体农民经济。

请允许我再列举不高加索农民合作化方面的几个数据来说明我们取得的成绩。下面就说一下合作化。

有人喊:是农业合作社吗?

安德烈耶夫:两方面的情况我都要说。在消费合作社方面,截至1927年10月1日,已经有40%的居民加入合作社了;到今年的10月1日,有75.8%的居民加入了合作社。

米高扬:是居民总数的75.8%吗?

安德烈耶夫:是的,75.8%的农民参加了消费合作社。

李可夫:多少?

安德烈耶夫:75.8%。

有人喊:是农户吗?

安德烈耶夫:是的,是的。

有人喊:每股的数额是多少呢?

安德烈耶夫:这个我说不准,大概8卢布。

丘巴尔:是实际数额吗?

安德烈耶夫:是实际数额,而农业合作社是6卢布左右。

有人喊[米高扬]:这是全国最高的数额。

安德烈耶夫:我要说的是,我们已经作出决定,如果没有受到反对和制止的话,我们打算在农村实行级差股份。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既然合作社对农户的服务义务不同——为贫农农户提供服务的最少,其次是中农农户,然后是富农农户,即根据不同需求提供服务,那么股份也应该是不同的。

奥尔忠尼启则:数额高一些?

安德烈耶夫:是的。

弗鲁姆金:是分为两种股份吗?

安德烈耶夫:我们要实行的是四个等级的级差股份。我们认为,从合作社具有一定公平性的角度看,从增加合作社自有资金的角度看,这样做都是对的。我稍微偏离一下话题。在消费合作社方面,我们有75.8%的居民加入了合作社。在农业合作社方面,截至去年的10月1日,居民入社比例是29%,到今年的10月1日为44%。现在再来说消费合作社的流转额问题。去年的流转额是1.91亿卢布。

米高扬:是农村这部分吗?

安德烈耶夫:我说的就是农村这部分。今年是2.55亿卢布。农业合作社去年的流转额是2.59亿卢布,而今年上半年是2亿卢布,也就是说,如果下半年按2亿卢布算的话,那么今年的流转额比去年几乎增加了一倍。

自有资金只能说说消费合作社的。去年10月有35.7%的自有资金用于流转,今年为43.5%。我们认为,相比较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了。由于消费合作社方面的这种合作化作用,现在农村私营者的势力非常微弱。如此看来,消费合作社的人社率是75%,农业合作社的人社率是44%,似乎我们已经是半个社会主义了,因为按照列宁的计划,100%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

有人喊[米高扬]:即使登记入社也行。

安德烈耶夫:实际上当然不是那样。用百分数无论如何不能算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比例。

下面我想说说合作社的主要缺点,来驳斥那种认为我们连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都差得很远的说法。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这不用驳斥。

安德烈耶夫:这谁都知道。根据我们边疆区合作社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第一个主要缺点是合作社只追求向更广阔的范围发展,而不是深入地为农民经济的生产过程服务。它主要追求的是为消费需求服务,而不是为农民的生产需求服务。第二个缺点是以商业为主的倾向,它不断地向各处渗透(当然,以商业为

主是消费合作社的特点),糟糕的是,它基本上也渗透到我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来,以商业为主取代了以生产为主,而农业合作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产。第三个缺点是吸引农民资金不力。这是非常大的缺点,我们的合作社还没有学会把农民的资金组织起来用于振兴农业生产。第四个缺点是农业生产合作化不够有序。

关于这个我想说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个农业基层组织的工作还不够明确。我们那里有统一的一级组织——农业协作社,它们无所不做、无所不管,既要履行农业生产方面的全部职责,还要履行一大堆它们根本履行不了的职责,结果,这种无所不做的基层合作社的形式并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上面有联盟的总机构,而下面只有合作社。我认为,这种形式本身对按部门发展生产合作化有阻碍作用,我们现在应该搞的不是农民的整体合作化,而是按部门的合作化,要考虑到经营生产部门的每一个方面。我认为这种不明确是生产合作化的障碍。

第五个缺点是社会性弱。我要不厌其烦地说,社会性仍然很弱。

合作社无论如何还没能摆脱店铺的特点,没能变成社会性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预购合同制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一系列其他运动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为了在进行这些运动的过程中发挥合作社的社会性,简直就得拖着合作社往前走。合作社的社会性不足甚至表现为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股东大会往往半年都不召开一次,有时直到下一次选举都没有开过会,而合作社本应一有事情、一遇到问题就调动和集中这种社会性来解决。缺点就在于,我们的合作社还不是社会性组织,而是有点像小店铺。我们认为,合作社对于完成我们提出的农业任务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我们所要得到的所有结果、所有成果都取决于我们在农业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将决定我们继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速度。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提出的任务是,合作社要力求把农民经济的一切要素,把这种个体经济的一切需求、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合作社的流转。这将是真正的合作社,因为个体农户在各方面都将完全依靠自己的合作社,依靠自己的组织!这才真正是百分之百的生产合作化!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应该不再提出广泛发展的任务,而要提出深度发展的任务,在质量上、在实质上把合作化提升到更高的阶段。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与实行预购合同制有关。签订预购合同的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42%。这对农业合作社起了推动作用,它已经通过签订预购合同投入生产,现在需要做的只是

推动这项工作,要使农业合作社不仅仅通过签订订购合同,还要通过其全部工作影响所有农业要素。

把居民的资金组织起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和主要的任务。我同意加里宁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通过吸收居民自己的资金来恢复农业的巨大潜力,只用国家的钱我们还不能恢复农业。国家的钱要给,为的是在此基础上动员居民的资金,应当把居民的资金汇集到国家投入农业的每一戈比和每一卢布上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想,即便是在现有的为农民经济提供资金保证的水平上我们也能把成百万的资金吸收到合作社的流转中来,用于一定的生产目的。实践表明,把居民的资金吸收到合作社的流转中的主要途径将不是对合作社投资,因为有更加可靠的储蓄所。

如果我们的合作社在吸收居民资金的时候每次都能提出具体的任务,那么居民会更愿意通过各种措施把他们的钱汇集起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我们合作社工作实践的问题。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我们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在解决我们对农业提出的种种问题和任务方面的组织潜力和能力。我想,既然我们对北高加索各级组织提出了开展各项运动的任务,既然这些运动总体上都进行了,而且是有保证地进行,我觉得,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说,我们的农村党组织无疑得到了加强,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也得到了一定的巩固。但与此同时,从自我批评的角度看,还必须指出我们苏维埃组织工作中的消极方面的一些主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尽管总体评价表明,我们北高加索农村党和苏维埃组织系统是巩固的,但是这一评价还表明了这一系统的非常大的组织弱点和我们干部的弱点,因此,当然也影响到工作质量。我们的党组织,我们的党员,力量还非常弱。党员只占整个农村人口的0.37%。但并不是说,这0.37%都是农民。其中的2/3是我们的公职人员。

加里宁:可能更多!

安德烈耶夫:我本人在巡视一些大的哥萨克村时曾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完全由公职人员组成:村苏维埃主席、合作社主席、共青团书记、民警等等。我们有这样的基层组织。

加里宁:不只你们有。

安德烈耶夫:我们北高加索一共有82 0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其中农村有30 000名。这就是党员干部的情况。他们的力量还非常弱,需要加强。贫农很少参加我们党组织,雇农也很少参加。我们尤其没有注意吸收雇农入党。

在我们苏维埃组织的工作中大致也存在同样的弱点。我们在保证苏维埃组织的社会成分方面做的比其他地区差,这一点我就不说了。论贫农和雇农参加苏维埃的比例,我们也许不比其他地区差,但是我们认为,在活跃苏维埃工作方面,在实现党的苏维埃建设的这一主要口号方面,我们还远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在我们那里经常会出现苏维埃连会都开不起来的情况。有的苏维埃半年都开不了会。这表明了我们在基层苏维埃建设中的极大不足。

我们基层组织干部的这种弱点当然也存在于其他工作中:妇女工作、共青团工作、农民互助协会工作等等。这一点用不着说太多,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说,为了帮助农村组织进行粮食收购工作,在粮食收购期间我们从各专区和边疆区向农村派去了一些工作人员,不算多也不算少,有4 000多人,派他们去帮助农村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提供了保证。我们把4 000多人派到农村去,这表明我们的干部力量非常弱,在这方面我们要给予帮助,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把贫农和中农拉到党内来,使党员的数量多起来,我们将从贫农和中农中招收干部,尽我们所能使这些干部成长起来,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向你们、尤其是向无产阶级地区提个要求。我认为,我们的无产阶级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起到为农民地区提供干部的作用。如果农村只有自己的干部,而城市不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干部不去帮助农村,那是不行的,我认为,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

什基里亚托夫:你们自己那里也有无产阶级。

安德烈耶夫:我们这里有无产阶级,但是很少,你们知道有多少,他们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北高加索那里特别需要得力的干部,因为我们的敌人——富农同别的地区不同,所以我认为,无产阶级地区应该帮助我们。中央委员会和组织局有责任提出一项任务——给我们各个地区和村庄派100名、200名、300名工作人员。城市的工作人员过剩,文化力量过剩,而农村非常缺乏,我们的很多措施之所以无法实行,就是因为我们的干部太少。

奥尔忠尼启则:你在组织局的时候,怎么没听到你说过这样的话。

米高扬:这是因为他在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

安德烈耶夫:在干部问题方面我们正在实行一项措施,尽管这只是缓解之策,就是派边疆区和各区的工作人员下去一个半月,这已成为一项制度,第一批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在各个村庄工作,并且我们的做法是,不搞走马观花,不是说把一个区交给某个工作人员,他就要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一遭。现在是,给你一个村子,你在那里待一个半月,帮助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学习

它们的经验,然后再离开那里,把经验带回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党组织和专区组织。从为农村提供帮助和使我们的机关更了解农业的角度看,这样做当然是非常有益的。

有人喊:派了多少人?

安德烈耶夫:边疆区第一批派出了40人左右,第二批大致也是这么多,9月15日出发,各专区也向农村派了大约300名工作人员。

现在说说我们基层机关状况的第二个特征,这就是工作上有些怠惰和迟滞。粮食收购工作的经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如果你不推一下,工作就进展缓慢;但是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如果推一下,工作就会干起来,就会干过头,非得拽着它不可。这就是我们机关状况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工作迟滞。

第三个特征。我们在发动基层组织开展各项运动方面做得很好,这是对的,但是,在我们的基层组织中,在地区一级和村一级组织中,参与组织农业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好,不仅如此,它们甚至对参与组织农业一事不太关心。各项运动正在进行,要想有条不紊地加以领导,就得过问组织农业的事,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做到。

我们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整个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直接参与农业,我们就可能收获不到,也许将来也收获不到我向你们说的那么多普特的粮食。我再说一次,我们这里搞地方自治的现象很多。站在一旁从统计数字上来研究农业,这是我们各级组织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们现在要直接过问农业的事情,就像我们在工业中所做的一样,实际地引导和领导农业。在农业中这样做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过问农业。否则,如果我们不实际地亲自过问这项工作,就不会实现对我们农业的任何改造。所以,基层组织、地区和专区等组织在农业领域的作用应该大大加强。

加里宁:在振兴个体经济方面也应加强。

安德烈耶夫:我想,农民——中农和贫农将会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因为我们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将真正带起头来,将成为得力的帮手、干实事的人,不光能收税和收购粮食,还能实际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这会彻底改变农民和我们各级组织之间的所有关系,真正地巩固农村的苏维埃政权,到那时,任何力量对我们来说都根本不可怕。但这要求做大量的工作。

应该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农业知识。

丘巴尔:是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农艺知识。

安德烈耶夫:所以,要消除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积极分子、尤其是直接做农村

工作的人不懂农艺的现象,不过,中央委员们不妨也学点农业知识。

臧声:对。

安德烈耶夫:否则,如果我们不多了解农业,我们就什么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

有人臧:安德烈耶夫,你指的是谁呀?

加里宁:就是说,要到农村去嘛。(笑声)

安德烈耶夫:在消除农盲现象方面我们提出了哪些建议、实行了哪些措施呢?目前,边疆区的培训班从10月10日起已开始授课,整个冬季要培训300名各地区的积极分子、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通过培训班使他们掌握一些农艺常识。当然,300人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我们觉得,作为开端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集体农庄的农艺培训班,能培训150人。我们打算在播种运动之前举行各区的培训班大会,为的是在一两周的时间里使基层骨干了解农艺和播种方面的安排,让基层的农艺师为此发挥作用。我们打算,一定要在北高加索的高级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党校开设农艺课程。我们认为,有必要使农村青年学校着重转向农艺培训。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普遍开展识字等工作的同时,在公共教育学校网中进行消除农盲现象的工作。我们决定把举办农业组织者培训班列入北高加索的两所农业大学的教学大纲,使这两所大学培养出的不只是农业理论专家,还有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生产合作社等单位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农业组织者。在农艺宣传方面,同志们,我们也给各位分配了一点工作。我们认为,只要我们愿意在这项工作中再加一把力,就会取得显著的成果。我们提出要加强农艺师的作用,利用他们的知识,使他们不再埋头于案头工作,还有报告资料等,加强他们在组织农业方面的作用,增加农艺师的数量,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是我们想要实行并且已对我们的干部实行的消除农盲现象的措施。

但是我们认为,仅仅组织这些干部是不够的。应该以这些干部为核心,并通过这些干部把广大农民的社会热情集中到农业问题上来。这应该是保证我们的措施实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你们会问,在这方面哪些我们做到了。我们实际做到的有:比如,我们的春播和秋播的运动都是在农民的社会热情非常高涨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召开了48次专区播种会议,128次地区播种会议,1185次村播种会议,共有几万农民参加。这些会议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播种运动上。我们在六个专区即六个主要农业专区召开了六次大会,比如库班大会,有近千人参加,其中800人是农民——贫农和中农。从人们的情绪等方面来看,这些大会开得相当成功。我们

就是用这样的社会措施把广大农民的社会热情吸引到播种运动上来的。

同志们,我们已经使农民摆脱了因粮食收购而引起的坏情绪,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播种运动上来。我们是通过向农民布置实际任务的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这一切有点晚了。

作为在发挥农民社会热情方面的一项试验,我们想扩大各地苏维埃所属农业部门的职权,赋予它们生产会议的职权。²⁶⁵当然,这将需要我们给予一定的关注和领导,以免富农从中作祟推行他们的路线。在那里要保证由我们领导。这些生产会议应该做些什么呢?它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际实行我们所要实行的农艺措施,审议本村的播种计划并保证其实施,还有正确进行土地规划工作、最合理地安排轮作以及这些组织可能面临的其他一系列问题。

我们决定在实行基本农艺措施的同时,实行一项社会性措施,——从土地共用社中选出一些农艺代表,其职责是监督农艺措施在个体农户中的实施情况。

应该说,这些措施当然都很好,但它们不能马上就实行。要好好研究这些措施,要付出巨大努力。

从保证实行我们这些措施的角度看,做好贫农的工作有着巨大意义。我们边疆区贫农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他们很重要。我们边疆区人口中的35%—40%是贫农。在保证贫农的物质利益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呢?请看两个数字。去年的贷款中有894.5万卢布发放给了贫农,而今年是4400万卢布。这已经能说明对贫农的物质利益的保证了,但同时也要承认,贫农的组织工作仍然非常糟糕,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一来运动就做,然后就抛在一边。许多贫农小组形式上是组织在合作社等单位的周围,但是经常不做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贫农工作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干好。

雇农工作的意义极为重大。我们那里雇农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已登记的21.6万个雇农中有7.5万人加入了协会。这个比例还很小。总共8.2万名党员中有1741名雇农,即2.1%,而我们那里的雇农阶层是很庞大的。

现在我来谈谈农村中的情绪问题。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要很认真地说,我的评价完全是根据事实、根据对登记情况的仔细检查作出的,农村中的情绪可以归结为:现在的情绪和春天时候的情绪相比当然有很大不同。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是好的不同还是坏的不同?

安德烈耶夫:是好的不同。如果说我在上次全会²⁶⁶上给你们讲农村中的情绪时说中农特别恐慌,那么现在中农的情绪已经大为好转,更加平静,更加相信我们真的修正了政策等、真正放弃了非常措施。现在中农不再沉默了,而是说出

自己的想法,这个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春播运动时中农始终保持沉默,一声不吭,而现在他们不沉默了,通过这几次的增产大会可以看出,他们的积极性特别高。

有人喊[柯秀尔]:就像在这里。

安德烈耶夫:要是让农民来发言,多长时间都不够用。另一方面,如果情绪恶化,如果我们做错了,那么我们进行的各项运动就会有许多的缺陷,就会进行得更加吃力。但是,对各项主要运动的检查表明,情况还不坏。在粮食收购方面,我们完成了年度计划的60%。与去年同期相比,与去年的这三个月相比,我们多收购了21%的粮食。在播种运动中,中农和贫农的劳动情绪特别高。我们曾经打算把秋播计划扩大9%。看来,我们完不成这一计划,但今年的秋播地面积决不会少于去年的秋播地面积,即不扣除死苗面积,而是去年秋天播种的面积。所有指标都表明,我们的播种面积会达到那么多。最终的数字我还说不准,因为播种正在进行。在南部地区播种会一直进行到12月1日。北部地区也有一些地方没有播种完,同南部地区相比,那里的秋播面积不算大,但由于气候原因我们的播种晚了整整四个星期,降水量不足——两个月没有下雨。

我们在播种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呢?从保证某些农艺措施实行的角度看,我们取得了哪些效果呢?我们取得的效果是,消毒和清选的种子比去年多了2倍,经种子清选机清选过的种子占全部播种种子的40%。35%的播种种子经过了消毒,是去年的2倍。在签订预购合同方面,我们超额12%完成了中央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在秋播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们打算到春天时把春播面积提高11%,这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现在对各种情况的评估表明,同去年相比秋耕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同志们,我应该指出,我们的播种运动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而我们必须有这个计划。我们还没有预购合同计划,机器供应计划也没有。我要坦率地反映一个意见,中央在这方面的拖延是不能容忍的。

米高扬:莫斯科有责任。

安德烈耶夫:是的,莫斯科有责任。我们至今还没有预购合同计划,没有机器供应计划,可能会耽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莫斯科的机关就不能抓紧点吗?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各类农户的播种面积扩大和缩小的问题,经济刺激对播种的影响问题。我应该介绍一些情况。在播种面积不到10俄亩的农户中,农户扩大了自己的播种面积;播种面积不到16俄亩的农户稳定在现有的水平上;播种面积超过16俄亩的农户则缩小了播种面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由此

可见,中农和贫农在扩大播种面积,富农在缩小播种面积。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谁的面积稳定不变?

安德烈耶夫:中农的,比较上层的中农。

农业税。关于农业税我要说的是,由于一系列过火行为和其他行为,农业税最初破坏了农民的情绪。纠正了这些过火行为之后,从各种资料看,农民的情绪大大好转。有哪些过火行为呢?借征收个别税向中农过多征税。例如,我们有些专区征收7%的个别税。现在我们的农业税工作取得了这样的效果(有6个专区的资料):31%的贫农被免除农业税,55.3%的农户的农业税只增加2%,12%的农户的税额提高了53%,1.6%的农户的税额提高了91%,就是说,在绝对增加的1200万农业税款中,占农户总数86%的两类农户——贫农和中农的税增加额仅为40—60万卢布,其余全部的税款由剩下的14%的农户——上层中农和富农支付。这就是农业税的分摊情况。我认为,这种分摊情况基本上说明征税是合理的。也许,我们对上层中农收的税多了些。至于农业税进款方面的成果,截至10月1日,我们已向50%的应纳税农户征税,收取了52%的税款,而且没有使用特别强制手段。

我应该从地方实际工作的角度来谈谈农业税的实质。我认为,造成过火行为的问题在于,对我们各级组织的培训期太短,用于对各级组织进行征收农业税工作培训的时间太少。需要较长的时间。那样我们的过火行为就会少一点。农业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稳定,这当然不会促进农业生产率的发展。我认为,必须使征收对象更加稳定。否则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刺激作用。农业税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它对多子女的中农的打击有点大。一些事实和实际情况表明,现在的税收甚至打击了集体农庄。个体贫农不加入集体农庄会更好,不必交税,加入集体农庄的话就会向他征税,因为集体农庄的起征点比较低。还有,对手工业者征税也有点多,导致手工业者逐渐减少。必须通过纠正这些不足改善税收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不断增加对富农剥削阶层的征税额的同时,要把我们的税收变成提高产量、提高劳动农户即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生产率的工具。我们能否找到使税收不仅成为为国家收集资金的工具,而且成为刺激劳动农户进行更高水平经营的工具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呢?为了使对农业税的所有这些修改办法、所有这些纠正办法都能很好地付诸实行,我认为,我们各地首先要研究利用税收的经验,财政人民委员部和人民委员会要吸收更多地方来制定农业税。那样的话,我们的税收措施在颁布后就不需要很多细则和说明了。

现在让我来说说最后一个问题。我已经对大家说过,我们那里的情绪还是

比较平静的,中农的情绪有了很大好转,他们相信我们真的不再采取非常措施了。但是在我们同中农的关系普遍好转的同时,我必须指出,北高加索的阶级斗争还是非常尖锐的。

有人喊:说得对。

安德烈耶夫:我想,你们都应该明白,北高加索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平静的地方,它与其他地区不同,但是,最近一年这里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北高加索之所以在这方面比较突出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富农有点不一样,我们那里的富农比较有文化,比较有影响,等等。我们那里的富农往往是过去的军官,现在靠土地生活,所以我们那里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北高加索剥夺了富农的财产,那纯粹是胡说。北高加索的富农还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忽视这一点是不行的。如果各位还清楚地记得,富农这种影响的根源、贫农和中农在经济上对富农的依赖性的根源在于生产工具等方面,就会明白富农还是非常大的力量。所有这些使得北高加索的富农成为一股特别强大的力量。

在北高加索,我们对富农的进攻遭到了富农的激烈反抗。我们进行的每一场运动,播种运动也好,签订预购合同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我们的阶级敌人总会出现在所有的阵地上,抵制我们的各项措施,并且将来还会进行抵制,还会进行反抗,当然不是永无终止,但是,只要我们还未变得更强大,他们就不会罢手。随着我们在农村的力量逐渐强大,富农的势力会越来越小。我们在哪些方面能感受到同富农的阶级斗争呢?阶级敌人同我们斗争的第一个方面是,剥削阶层要控制我们的各种经济形式并利用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想方设法控制合作社,控制农业信贷体系,控制机器供应体系。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他们甚至要控制集体农庄,以便获得机器等。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同我们的路线和改革进行斗争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做贫农工作。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提出了做贫农工作的任务。富农也非常高明地提出了做贫农工作的任务。他们在我们的力量薄弱的地方提出这项任务,而且提得非常巧妙。他们让贫农跟着他们走,尤其是当贫农在经济上、在生产工具和粮食等方面经常依赖于富农的时候。在我们北高加索有不少这样的情况,贫农在粮食收购过程中起阻碍作用,把富农的粮食藏起来,不让我们收购。有时会听到依附于富农的贫农这样说:“你们要把粮食运走,要收走富农的粮食,那我们吃什么?是的,富农剥削我们,但他们也养活我们。”贫农开始保护富农的粮食。

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些典型的案例,如果贫农坚决反对富农,那么富农就不同贫农往来,不给贫农粮食和生产资料。前不久在阿尔马维尔专区发生了一件事:富农宣称不再同贫农往来,他们也不再向贫农提供耕作工具。毫无办法,他们就是不给。好在我们动员了国营农场的拖拉机,才把地翻耕了。这就是斗争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从思想上影响我们的干部,影响我们的组织。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在粮食收购工作期间,为了保证粮食收购工作的进行,我们不得不把150名党员开除出党,因为他们阻碍我们在农村进行粮食收购工作,把富农的粮食藏了起来,还说他们不会去收购粮食,说党的政策不对,说他们没有粮食,等等。

把这些富农化的共产党员开除后,粮食收购工作有了起色。

有人喊:对。

安德烈耶夫:大约有600人落选并被免去村苏维埃主席、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委员、支部书记等职务,这是因为需要为粮食收购工作扫清道路并保证苏维埃和党的机关进行这项工作,结果粮食收购上来了。

有人喊:我们把整个区执行委员会都解散了。

安德烈耶夫:我们那里这种情况很多。为了扫清道路、开展粮食收购,有600多人被撤职。一些共产党员受到富农的影响,藏起粮食不给我们,说他们没有粮食,而我们把他们撤职后,我们就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

税收方面也是如此。我们那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苏维埃机关由于受到敌人的影响而把富农正式定为贫农,即给富农农户颁发贫困证明。富农来到莫斯科,他们不用交税,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上写着这个富农不是富农,而是贫农。这样的事我们那里有。

阶级斗争的第四个方面是企图通过使人沾染受贿、酗酒和各种腐败恶习来瓦解我们的组织。我们也有过这种情况,在异己分子影响下整个地区的党组织都被瓦解了,不得不将它解散。富农往往并不钻进苏维埃,而是对贫农和中农施加影响,从而瓦解和摧毁我们的组织。我已经说过,苏维埃常常半年、一年开不了会,因为富农四处挑拨说,你们要开会了,苏维埃成员召集你们开会,是要商量借款的事,等等。这是存心要瓦解和摧毁我们的组织。

我认为,我们的选举将要在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条件下进行。富农不会自己直接钻进苏维埃,而是通过玩弄招术,玩弄迂回的招术,让受到他们影响的贫农和中农进入苏维埃。所以,我们不应该沉迷于统计数字,认为社会方面一切都好。必须保证苏维埃选举的质量。

最后,阶级斗争的第五种形式是公开的反革命活动。在影响和利用这两种形式不起作用的地方,我们的敌人就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我只需要公布一组数字,消灭反革命团伙方面的“总量”数字。

有人喊[米高扬]:是商品率方面的吗?

安德烈耶夫:这个“总量”有所增长。1926年我们在乡村消灭的团伙比1927年少。1927年消灭了142个。

有人喊:是反革命团伙吗?

安德烈耶夫:是的,是反革命团伙,共有831个人参加。今年,我们在仅半年内就消灭了133个团伙,成员共616人。应该告诉大家,对这些团伙的甄别工作进行得很认真,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非常出色,这些团伙的成员都是穷凶极恶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错抓的。在民族地区,敌人利用宗教偏见进行更加猖獗的反革命活动。这一点通过巴克桑事件²⁶⁷,通过印古什风波,通过阿迪格的富农和毛拉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维埃活动,都可以看出来。这种反革命活动最终发展成为恐怖活动。这里有一组数字:半年内在我们边疆区发生了44起恐怖事件,最近3个月内发生了32起。杀害苏维埃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农村通讯员和农村阅览室管理员等人员的活动势头不断上升。

应该说,我们那里的阶级斗争有这样一个基本特点,哥萨克和外来居民的等级之争现在正逐渐结束,趋于平息。甚至民族间的斗争、各族居民和哥萨克之间的斗争也在趋于平息,并且正被阶级斗争彻底取代。反革命团伙中不只有富农,往往还有外来的小店主、外来的富农和民族地区的富农。

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同志们,我最后要说的是,根据对我们农村状况的这种评估,我认为:我们工作的困难还会更大,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低估,既然富农经济还非常强大,我们就应该继续坚决地向富农进攻。但同时,我们应该在发展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方面保证实行灵活的、非常正确的路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保证农村干部稳定,否则我们就搞不好这项工作。虽然我们那里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但是通过客观检验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农村,甚至在北高加索,仍然具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条件,这使得我们能够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极其广泛地开展工作的任务在边疆区实行的那些内部组织措施,如果这样做的话,第一,我们能保证真正解决粮食问题:两年后我们就将再增加1.5亿普特商品粮。第二,我们北高加索就将拥有一部分真正实现了工业化和合理化的农业。第三,我们就会真正成为农民自发势力的更加强大的领导者。

第四,我们就能根据本边疆区充分的客观条件把集体农庄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第五,我们就能真正使贫农和中农摆脱农村富农阶层的剥削。第六,我们就能通过各项措施真正把集体农庄联成一圈,包围我们的敌人——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富农,通过我们的各项措施把这个边疆区,这个目前为止政治危险最大的边疆区,这个被一些人称为旺代的边疆区,真正变成苏联最坚固的苏维埃堡垒。(掌声)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们,明天上午9点半举行中央检查委员会会议。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传上来一份声明(宣读声明)。]

我宣布散会。

第十一次会议

11月22日上午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现在开会。按讨论日程,现在由我发言。

彼得罗夫斯基:通过昨天安德烈耶夫同志内容丰富的报告,我们大家都了解到,北高加索边疆区有着无尽的资源和巨大的可开发潜力。但同时,在必须把农民经济和农民工作扶上联盟发展的正确道路方面,那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工作,因为在我发言之后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还要谈。首先必须指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在振兴和尽快改造农业方面需要党的帮助。这项工作必须比现在组织得更好。要知道,战前北高加索每年提供9亿多普特的粮食饲料,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水平。这显然是我国经济的巨大损失。安德烈耶夫同志列举的有意思的资料说明,我们对农业知之甚少。加里宁同志语出惊人,他说要响应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号召到农村去,也就是要深入全面地了解作为我国工业基础的农业,他的话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多么落后。是的,说实话,我们中间真正了解农民经济的人并不多。由此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我们要更加珍惜了解农业的人,另一方面要鞭策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安德烈耶夫同志昨天提出的那些近期振兴农业的方法大家都已知晓,但是,我认为,这些方法要成为规定。我们应该每年召开农艺师大会,总结农业方面的科学经验,归纳出比较正确的成熟的农业发展标准。我们刚刚开始这项工作。北高加索举行的农业生产会议很有意义。这些会议刚刚开始举行,还没有完全成熟,还不知道怎样更好地利用这些会议。大家知道,德国每年召开工程师大会,这使德国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我们应以此为榜样,在我们这个农业人口几乎占80%的国家召开农艺师大会。优秀农艺师和组织工作者之间的经验交流可以帮助我们将农业置于科学基础之上。也许,这项活动甚至应该用法律确定下来。

如果把北高加索前些年的粮食收获量同乌克兰加以比较,那么得出的数字有天壤之别。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人口800—900万的北高加索收获的粮食超过9亿普特,而我们乌克兰的人口是3000万,年平均粮食收获量却只有10亿普特。

有人喊[柯秀尔]:是少了点。

彼得罗夫斯基:如果以5至6年为一个时间段,那么年平均为11亿普特。多么巨大的差别,多么富饶的北高加索,它怎么会落到现在这样的状况。

柯秀尔:不是我们弄的,是十月革命弄的。

彼得罗夫斯基:当然,有罪的是反革命。如果提到革命,那么还能找出许多其他理由,但是也要看看自己,要学会找出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在面对如何更快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个问题时。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谈到工作中的诸多困难以及必须全力帮助克服这些困难时,绝对没有夸大其词。

说到集体化问题,那么从似乎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乌克兰的实践来看,任何情况下任何集体的收获量都比个体农户高10%—15%。好一些的集体比个体农户高30%,最好的高50%—60%。所以在集体化事业中要加强对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组织,而这项工作在北高加索很薄弱。关于这一点,即关于在整个工人阶级路线方面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安德烈耶夫同志只字未提。

安德烈耶夫:你那时候老不让我说。

彼得罗夫斯基:说了三个多小时还嫌时间不够,那多少才够。

现在说说国营农场。现在国营农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营农场要进行组织,除了要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做好内部工作,还必须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农户。但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最终我们还是依靠个体农户。我们的目标是国营农场要上交1亿普特商品粮。只是1亿普特,而我们的粮食平衡表要求有56亿普特。居民口粮和出口还得向个体农户要粮食。所以,国营农场无论如何不仅要成为目的本身,还要成为吸引成百上千农户的手段。放德萨的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就是这样组织的。那里整村整村的人都参加了拖拉机耕种活动。

还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试验站真正成为农业知识和农业经验的源泉,应该提高试验站的作用,把它们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地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很大不足,我们没能利用好试验站的工作,使其成为各区或各地区农业的实际领导力量。

安德烈耶夫同志关于在征收个别税时必须使农业税成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因素的正确论断应该引起特别关注。我经常听到中农说:好好干,拼上

全力,你想,要是我今年把税都缴上,明年就能好过了,因为我今年为国家干得多。而第二年我们的税没让人家好过。结果,农民失去了继续好好干的动力。安德烈耶夫同志谈到这个想法,对此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现在谈谈合作社问题,尽管安德烈耶夫同志承认,合作社距离成为社会主义学校这一理想还很远,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北高加索开展合作社工作的形式。我们从乌克兰的实践得知,合作社中富农和丑恶现象猖獗,它们破坏了群众的合作化事业。举个例子,有个区报告说,在检查合作社工作时发现,我们的基层组织中有65%的人盗用公款。富农对合作社的影响非常大,而合作社不追求公众和社会主义目的,安德烈耶夫同志是这样说的,但是他没有作必要的阶级分析。

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讲述了自己的痛苦经验后正确地指出,要像对待工业那样对待农业,要使用相同的领导方法。我觉得,在讨论州或地区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控制数字计划和年度、三年或五年预算时,一定要兼顾区和村,经济计划应该经过村苏维埃、镇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的缜密研究。这些组织也应该在最近的两三年或五年时间内研究和提出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问题。这个问题提出时不仅要包括集体,还要包括所有个体农户。基层组织应当考虑,实行哪一种多段轮作制,怎样更好地发展粮食饲料生产、经济作物生产和肥料的组织等等。除此以外,大家都知道,最近恢复蔬菜果木种植的必要性问题凸显出来。计划中一定要规定通过植树和其他措施来抗旱。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给地方机关颁布行政命令的权力,当然,这要在上级机关的监督之下。这也适用于防治农业害虫,因为害虫一旦在某个区或某一部分农户中出现,就会扩散到邻近各区各户。这样就会出现社会性危险。所以,对于安德烈耶夫同志列举的所有措施,包括除草、治鼠和具备一定的防治农业害虫的常识等,必须做到每户、整个村、整个区和镇苏维埃都执行。遗憾的是,党对这个领域的工作不够重视。

这可以说是普遍的问题。现在我要说的是那些应当由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和苏维埃机关负责的问题。(笑声)

[柯秀尔:根据痛苦的经历向法庭控告。]

安德烈耶夫:首先谈谈播种面积问题。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北高加索的播种面积少得不成比例,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每俄亩的产量之所以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是因为贫农和中农不能像几十年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科学地开发土地。这是普遍的问题:我们会发展,慢慢地进步。但是却并没有把播种面积扩大到应有的规模,从这一角度看,出现这种过失是不可原谅的。

臧声：说得对。

彼得罗夫斯基：现在我要说的是，有错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对农业不够重视。

有人臧[奥尔忠尼启则]：他指望乌克兰能帮他。

丘巴尔：我们那里的播种面积高于战前水平。

彼得罗夫斯基：抹杀和推卸这个错误是不可能的，不能不把它看成个错误。这是第一个错误，而且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个可以向法庭控告的大错误是，对民族问题不关心。

有人臧：这跟现在说的没关系。

有人臧：不，有关系。

彼得罗夫斯基：首先，您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中发现什么了吗？

米高扬：他说过了。

彼得罗夫斯基：不过，只是一带而过。

克拉瓦利：时间不够。

彼得罗夫斯基：又是时间不够。

有人臧[柯秀尔]：他们在北高加索作报告能作8个小时。

彼得罗夫斯基：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许多时间用在了讲话上。

(笑声)

现在说说民族问题。第一，这个问题说得很少；第二，在这里要直接说明，北高加索党组织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制定过路线。有一次我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上有人作了关于北高加索党组织执行民族政策的报告，我还听到了一些奇谈怪论，比如，说总的客观条件和等级斗争不允许在北高加索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民族政策。应让乌克兰人在北高加索找到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这个主要问题也被忘得一干二净。

柯秀尔：这一点说得对。

彼得罗夫斯基：不过，还是做了一点……

柯秀尔：几乎什么都没做。

彼得罗夫斯基：还是做了一点的。但做得漫不经心，敷衍了事。总的说来，北高加索的民族问题解决得很不好。

有人臧[米高扬]：喔，喔！

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人的文化发展必须要有最起码的条件。同时，在民族问题上可以将大批乌克兰知识分子、教师、合作社社员、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根

据阶级路线引导他们同富农作斗争。

有人喊：说得对。

彼得罗夫斯基：这是北高加索的党员同志们漏掉的一个主要方法。

C. 柯秀尔：从米高扬开始。

彼得罗夫斯基：我不同意柯秀尔的意见，他建议在控制数字中加入关于必须对乌克兰的谷物业提供更多帮助的问题。我认为，必须同时对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提供帮助。

喊声：啊—啊—啊。

伊万诺夫：我们不反对同时得到帮助。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们，你们喊也没有用。你们十分清楚，在同样有利的农业发展条件下，如果北高加索能出口1亿或1.5亿普特粮食，那么乌克兰就能出口3亿—3.5亿普特。

有人喊：说得对，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们，你们发什么感叹！柯秀尔同志赞同我的意见，应当同时对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提供帮助。

柯秀尔：我同意这个建议。

彼得罗夫斯基：大家知道，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谷物粮食质量最好，适宜出口。这里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最高的。总之，不管你们怎么说，全世界都知道，这两个地区不仅是苏联的粮仓，也是世界的粮仓。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农村力量的组织工作薄弱。我不知道北高加索是不是真有3万党员。这好像太多了，因为我们乌克兰的党员为21.2万人，在农村工作的有3万或3.4万人。如果你们有3万党员在农村为800万—900万人工作，而根据你们的所有材料，他们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好，尤其是在阶级方面，这就是说，你们那里党的工作比较薄弱。

柯秀尔：这就是总结。

波德沃伊斯基：党的工作做得越好，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彼得罗夫斯基：无论如何要让全党对我们的农村党组织给予最认真的注意。安德烈耶夫同志要求向农村派去更多的工人，这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为了在农村开展有机的工作，为了了解农民，应该把农民党员即雇农和贫农党员组织起来，而且肯定可以发现正直的中农。安德烈耶夫同志根据自身经验可以作出判断，了解农业知识并非易事。挑选和派出工人并不难，但结果通常都是，工人十之八九都成了农民要求的表达者，而且他们还不了解农民经济。但若是挑选雇

农和贫农党员,并且采取一切措施使他们沿着共产主义路线发展,那么这里就有了极大的保证,这些了解农民经济的人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所以,要在农村使用工人,就必须发展各方面的联系:上级和工会的影响,文化、政治和其他影响,利用一切工人组织。必须安排好到农村去的交通问题。当然,可以选派精明强干、经过阶级斗争锻炼的工人到农村去,不过大家都知道,从物质条件方面讲,这样做很困难。在每普特粮食3—5卢布的情况下,哪个工人会为了每月35—40卢布给你到农村去。这种有献身精神的人很难找到。所以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应转向从雇农、贫农和正直的中农(当然是数量不多)中挑选党员,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也要用尽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一切手段扩大我们城市党组织对农村的影响。但从这方面来看,北高加索的组织做得还不够。

这就是你们最严重的三个问题:第一,播种面积非常少;第二,在民族问题方面你们无所作为;第三,你们对贫农和雇农的组织很不力。由于富农的阶级反抗愈演愈烈,他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从这方面来看,边疆区组织要振作起来,中央委员会也应对这方面的工作给予认真的关注,并在工作中给予各种帮助。

柯秀尔:说得对,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现在请雅科夫列夫同志发言。

雅科夫列夫²⁶⁸:同志们,我认为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内容丰富,其中最宝贵之处在于,他揭示了在不对富农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大大加快农业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实质上回答了我们前些天讨论控制数字报告时所争论的问题。从实质上说问题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手段在不脱离无产阶级道路的情况下依靠我们的政策真正加快农业的发展?我认为,主要问题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总的说来,克服粮食困难有两个办法。其中一个是让富农交粮食。从表面上看,这也许是个办法:如果放手让富农发展、把希望寄托在富农身上,说什么钱不扎手粮食就不嫌多,那么我们是有可能得到粮食的。但无疑为了这些粮食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付出政权的代价。这实质上就是弗鲁姆金同志给我们指出的道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即发展农民经济的道路,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党组织书确认了这条道路。

我们掌握的所有材料都表明,我们能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加快发展贫农和中农经济的任务。我们能够较快地解决这一任务,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解决得很糟糕,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手段。有两种手段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第一个是商品。我想,你们每个人都考虑过商品生产方面控制数字的变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

会关于这部分控制数字的草案有所保留；看来我们有可能在控制数字草案的基础上把商品生产至少再提高2%—3%。

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控制数字基础上把商品生产增加1.5—2—2.5亿卢布,是完全现实和可以实现的任务。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在全党、全体经济工作者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下,今年的实际产量能够大大超过控制数字草案。在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在一些冶金和化工部门实行两班或三班倒并更加充分利用军事工业来生产民用产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预定的控制数字再增加2%—3%。我们在这方面的潜力才刚刚显示出来。全党还没有完全行动起来。我们相信,只要我国的每个工人都懂得扩大商品生产对于更好地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扩大农产品中商品部分的巨大意义,将来还会有一些潜力被开发出来。

除了通过工业品供应和不断增加农业机器及化肥的供应对我国主要的商品消费者——农民经济和贫农、中农经济施加影响外,还必须对农民经济使用农艺影响的杠杆。这一杠杆之所以能起特别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我国农民经济的极端落后,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着巨大的、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潜力来扩大这一影响方式对农民经济的作用,这一影响可以比我们现有的影响大许多倍。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杠杆的使用情况,那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痛苦而遗憾地承认,这方面的进展才刚刚开始。大家知道,俄罗斯联邦各自治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会²⁶⁹刚刚闭幕。在这次大会上,穆拉洛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实际上已经解决的任务:在最近五年内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12%—14%。将来大家会发现,很难想象能够这样低估我们的资源,不能认为在5年内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12%—14%的估算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求在未来5年内把单位面积产量只提高12%—14%,那就是说,我们将使今年的困难整整持续五年。

丘巴尔:我们在加剧困难。

雅科夫列夫:我们当然是在加剧困难。丘巴尔同志无疑是对的。如果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哪怕有一点点是正确的,那么困难只会加剧。

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杠杆和通过自己的途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指出的途径打破这个12%—14%呢?12%—14%意味着每年增长2%,这低于人口的增长。从本质上说,就像我们的一位教授在工农检查院会议上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让农民经济放任自流,因为产量和人口增长、技术的发展历来是一致的,即每年增长1%—1.5%,革命前也是这样。说我们应该在现行政策下将产量在五年内提高12%—14%,并且事先就承认未来五年粮食供应的困难将会加剧,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还好,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估算完全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的巨大资源。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给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关于加快发展贫农和中农经济的可能速度和方法的报告,我们已经发给大家了。我们根据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和我们人民委员部一年半以来的工作情况,检查了用于农业的资源的使用效率。我认为,只要你们看过这个报告,你们就会确信:到目前为止我们花起钱来常常是大手大脚;我们花了几百万,取得的都是几十万的效果,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要对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提个意见。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再给60万—90万卢布,我们就能消灭虫害。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我待会儿也要说说虫害的情况,不过是整个苏联的虫害情况。但是,安德烈耶夫同志去年向农业投入了3200万卢布。这些钱是怎么花掉的?这3200万卢布花的是否合理,是否每一卢布的产出都比用于消灭虫害斗争的一卢布多呢?难道就不能从这3200万卢布中拿出90万卢布用于消灭虫害,从而多打出几百万普特粮食吗?很遗憾,安德烈耶夫同志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而接下来你们会相信:我们很难认为这3200万卢布的使用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去年对北高加索农业的投入是3200万卢布,如果今年要投入大约4000万卢布,那么,不讨论这4000万的使用问题,就仍然会拿不出60万—90万卢布(这笔钱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用于消灭虫害。

有人喊[丘巴尔]:这是信贷体系的事。

雅科夫夫:这个体系可不怎么样。我们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今年向农业(包括贷款)投入10亿卢布,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资金的使用可以产生多大效果。我们是否实行了能给广大贫农和中农农户带来真正和快速效益的措施了,或者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很多我不得不遗憾地称之为大手大脚的东西?为了使这里谈的问题更清楚,同志们,我给你们讲讲我们作过的一个专门调查的结果。

在最近一年内,我们调查了近1000个个体农户,他们的产量大约比农民平均产量多一倍。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农户就是所谓的“改造”农户。我当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用了多少钱改造农户?安德烈耶夫同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向这样的改造农户投入50.09001亿卢布²⁷⁰(与我们在干旱地区的投入相同),获得了双倍的收成,那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我们没有能力给所有的基本农民群众每户1000卢布。如果我们要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应当采取一些不需要向每户投入这么多资金的措施。我们调查的数千户农民

(他们被称作是“有文化的”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均比全国大多数农户高,其中黑麦高76%,冬小麦高114%,春小麦高42%,燕麦高45%,谷物平均高63%。

在农民产量极低的情况下,这些农户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奇迹”。出现这种“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在等待问题的答案:他们是不是富农呢?

富农的产量比贫农和中农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如果调查的是有大量生产资料、以剥削为生的农户,那么并不难得出产量高的结果。我们调查的是些什么农户呢?我们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分析。

根据地方专业评估以及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评估的材料,我们所调查的农户中有15.8%属于剥削类型。我们从是否具有基本的剥削因素(雇用劳动力、租赁土地、拥有工商企业、出租农具和牲畜等)和拥有多少生产资料的角度,对所调查的所有农户进行了严格的检查,结果查明,富农农户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所占的比例确实要高一些,达到了22.2%。但是我们所调查的农户中产量提高的主要是非富农农户,其中65.9%是中农,11.9%是贫农。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些中农农户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比中农农户的平均水平要多得多。因此,仅仅根据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完全认定生产资料对于提高产量具有巨大的和决定性意义。

我们所调查的俄罗斯联邦农户在播种面积方面的情况分为:4俄亩以下占所有农户的17.1%,4—6俄亩占16.3%,6—10俄亩占27%,10—16俄亩占21.3%,16—25俄亩占10.2%,25俄亩以上占8.1%。应当指出,这些农户大多数选自土地多的地区(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乌拉尔和下伏尔加河流域)。

我们所调查的俄罗斯联邦农户在役畜方面的情况分为:没有役畜的占有所有农户的2.8%,有1—1.9头的占50.9%,有2—2.9头的占22.1%,有3—3.9头的占10.2%,有4头以上的占14%。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1.9头的占52.8%,有2—2.9头的占41.6%,有3头和3头以上的占5.6%。

显而易见,这些农户基本上是中农农户。

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中农都能有这样的收获量。一般来说,中农的收获量当然比富农少。我在历次全会上已经多次说明,收获量是怎样从中农的水平提高到一般富农的水平。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对我们很有意义,那就是:在我们所调查的收获量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1000个农户中大多数还是中农。

这一“奇迹”的基础是什么,这些农户采取了什么措施,是什么样的措施能让这些只有一匹马和两匹马的农户在不使用雇农的情况下取得这样高的收获量呢?我们分析了各种措施在这些农户提高收获量中所起的作用,并把这些资料同试验站的资料作了对比。得出的结果详见下面的图表:

使用改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后收获量的提高(单位:百分比)

地区	良种		改良休闲地		条播地	
	试验站	被调查农户	试验站	被调查农户	试验站	被调查农户
中部黑土地区	30—50	13—60	10—60	16—32	1—11	8—63
北高加索	10—30	3—69	30—75	53	—	—
乌拉尔	25—50	14—71	—	6—160	10—30	9—100
白俄罗斯	30—50	6—41	10—35	9—140	—	13—52
萨拉托夫省	10—50	7—54	70—95	5—166	10—25	21—27

根据我们所调查的农户的资料和试验站的资料,对三项重要措施的作用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第一,三项措施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第二,经过试验站检验的初级农业技术措施(遗憾的是,我国的试验站同所有其他国家的不同,至今仍与群众的经营活动缺少联系)若是在个体贫农和中农农户中使用,产生的效果大致相同,而在某些措施上取得的效果甚至比试验机构还好。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是根据普通农户的经验对这些措施的作用进行检验的。试验站的收获量提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某一项措施能提高试验站的收获量,但这一事实不能证明该措施也适用于普通农户。在我们的试验站与农户严重分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丘巴尔同志跟我说,前不久得知,距离一个刚刚庆祝过自己成立四十周年的大型试验站——波尔塔瓦试验站只有几俄里远的地方有个村子,而村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试验站。所以,重要的不是试验站证明了什么,而是我列举的上述措施的效率在农户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对于我们来说,上述事实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表明,中农在原有基础上,通过采取小农户和特小农户都能使用的改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能提高收获量。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问题。如果目前1 000个农户采取了一些几百万人都适用的简单措施就取得了这样高的收获量,如果包括农业信贷体系在内我们今年共向农业投入10亿卢布这样一笔巨款,并且,如果上述农业

技术措施耗资并不多,而我们现在取得的成果却很可能不值一提,原因是什么呢?

同志们,我现在谈谈工农检察院工作中的痛苦,并且我不是从各部门经常说的角度来谈,这些部门总是粉饰太平,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我不会作任何粉饰,有什么说什么。

第一个问题——国家良种储备。我国良种的使用情况如下。

请看表格:

年份	使用经过鉴定的良种的播种面积		国家良种储备收购		国家良种储备每公顷收购(单位:公担)
	公顷	%	公担	%	
1925	60 056	100	385 500	100	6.39
1926	321 000	534	705 700	183	2.2
1927	721 000	1 200	1 335 869	347	1.85
1928	1 500 000	2 479	2 995 000	777	1.99 (按计划)

从上表可以看出,1927年每公顷的国家良种储备收购量只有1.85公担,即平均产量的1/5。按照1928年的计划,每公顷将收购同样的数量。这意味着,不少于2/3的珍贵育种原料要么用于满足粮食需求,要么散布在各个农户中并因此失去价值。重要的是应指出,同1925年相比,我们退步了:1925年我们每公顷收购6.39公担作为国家良种储备,而1927年和1928年还不到2公担。乌克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所作的调查表明,俄罗斯联邦也不例外。位于乌克兰的制糖工业联合公司各国营农场在两年之内(1926和1927)仅良种小麦就有1600万普特用于满足粮食需求。应该认为,如果我们不把珍贵的育种原料分散和用于满足粮食需求,那么今年良种播种面积占俄罗斯联邦全部播种面积的比例就不是3%—4%,而至少是15%—20%。这样,今年就能多收1亿—1.5亿普特的粮食,而且是优质粮食。

总之,我们从每俄亩收购12普特良种作物即其种子至少能将产量提高20%的作物作为国家良种储备,而40—50普特用于吃饭或者分散。说真的,我们吃的是良种粮食还是普通粮食都完全无所谓,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会同意的。我认为,任何一名工人都同意吃普通粮食,不吃良种粮。

丘巴尔:要是没有普通粮食,只好吃良种粮了。

雅科夫列夫:这也有道理。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项事业的组

织。显然,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粮食资源的潜力取决于对这项事业的改善。为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该想办法为农民把一般的和低质量的种子换成清选的和改良的种子,并在每个乡、每个区建立良种田。

为了把收获量从50普特提高到60普特,需要采取效果大的方法和简单措施,但是,如果要把收获量从100普特提高到110普特,那就得采取非常复杂的措施。现在我们需要从50普特提高到60普特,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最简单但同时也最有效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这样组织工作:把良种全部收集上来,全部用于满足生产需要。

第二,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对,种子的清选可以带来巨大效益,但是,可能因为时间不够,他没有说他们那里谷物清选机的情况。要知道,在北高加索现有谷物清选机的基础上再稍加补充,我们现在就能对几乎所有的种子进行清选。

有人喊[安德烈耶夫]:所有的?

雅科夫列夫:是的,几乎所有的。一台谷物清选机1年能清选1.5万—2万普特,而春季在我们那里平均清选2000—3000普特。今年秋天在北高加索,由于做了大量工作,一台谷物清选机清选的谷物已经接近7000—8000普特。你们认为,一台谷物清选机每年清选2万普特是什么奇迹吗?根本不需要什么奇迹。当然,重要的只是不能等农民自己拉着粮食来找谷物清选机。农民做不到,因为北高加索有大量农户没有马,没有马当然就不能拉粮食来清选了。应该冬天用雪橇,夏天用四轮大车拉着谷物清选机挨家挨户在村子走,这样就能对农民所有的种子进行清选。这只需要苏维埃机关做一定的工作。解决问题不能只是喊:给我们谷物清选机。好吧,给你一台谷物清选机,两台,三台,但我国现在已有34000台种子谷物清选机在使用,但是和3000台一样。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实:34000台谷物清选机的工作效率等于3000台。我们当然可以在最近三年内使谷物清选机的数量达到7万—8万台,但是如果这些机器的工作效率只有10%,那么,同志们,用这些机器满足全国的需要,无异于用汤勺去舀海水。如果我们工作起来漫不经心,使谷物清选机只发挥10%的工作效率,那么就像不能用汤匙舀光海水一样,也不可能把农民的所有种子都进行清选。这就是第二个事实。

第三个。我们提供大量的复杂机器。供给农户的复杂机器的数量逐年增加。为了使这些机器开动,要有拖拉机,或者是某种复杂脱谷机或别的复杂机器,一定要能修理机器,一定要有备用零件。如果我们提供机器,却忘了这些机器需要修理,或者只是在中央农业银行计划²⁷¹中的相应一栏写上这么一条就心

满意足了,如果情况像我们调查的那样,最近的修理厂在区中心,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们不断增加复杂机器的数量,但却无法解决像保证备用零件供应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方面我们的情况非常糟。我们提供的拖拉机数量充足,但是因为要提供必要的备用零件,要让旧的和新的拖拉机都能使用,为此我们进行了3个月的普查登记,所有的机关都全力参加了这项工作,其中也包括工农检查院,我们互相鼓励,会议规定的所有工作我们都做了,但是备用零件的数量还是不足。如果我们提供复杂机器,每年送往农村的数量都增加,而修理却跟不上,那么每100台使用的机器中就会有20—30台不能运转,而能使用的机器则只能运转60—70天,而不是100天,拖拉机的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谈第四个问题——拖拉机,这个问题我只是一带而过。我们的拖拉机数量不少,但使用情况怎么样呢?由于我们还没有组织过拖拉机修理,没有组织过备用零件供应,拖拉机分散在广大地域内,从拖拉机所在地到修理厂通常要走上几百俄里,把拖拉机作为各种机器的发动机的工作做得不够,结果我们的拖拉机只发挥了实际功率的1/2和1/3,就像我们引进的34000台谷物清选机发挥的工作效率只相当于3500台充分使用的谷物清选机一样。

下一个问题——虫害。我完全赞同安德烈耶夫同志关于虫害的讲话。但是,我还有一个“不”要说。消灭虫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需要几十万或几百万卢布的农业贷款才能开展灭虫这项活动。这是对的。但难道仅仅如此吗?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的工业不能生产所需数量、规模和质量的灭虫药,这些物资仅以几戈比的支出就能产出一普特的储备粮食。我研究了所有关于虫害带来的损失的估计材料。我选取最谨慎的。在我们那里,虫害造成10亿卢布的损失,其中包括吃掉4.5亿普特粮食。因此,我们的情况是,害虫吃掉了4.5亿普特粮食,而我们需要向城市供应6亿普特……

有人喊[米高扬]:4.5亿普特。

雅科夫列夫:是的,城市4.5亿普特,其余的进入了经济作物种植区……我们有权提出:让我们解决这个不太复杂的工业问题,让我们提供灭虫所需规模、数量和质量的药剂,以便能在近几年从黄鼠、网纹蛴螬和其他害虫口中夺回1—2—3亿普特粮食。因此应当向工业提出从害虫口中夺回几亿普特粮食的问题。

灭虫花—卢布带来的效益是:灭蝗虫可以保住6卢布的粮食,灭黄地老虎为11卢布25戈比,灭菜园害虫为137卢布,灭黄鼠为15卢布。这是根据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植保司的资料算出来的。根据西伯利亚的资料,灭飞蝗花75—80戈比,种子消毒花55戈比,灭黄鼠花85戈比,都能保住一公担粮食。这

就是事实。还有一些事实: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从1925年起的3年内,有800万卢布用于灭虫,同时,这3年用于搬迁,即用于搬迁4万—5万农户花了5100万卢布。同志们,这是我在要钱——“给钱,给钱,再给钱!”之前想提出的问题。3年内,有800万卢布花在灭虫上,花在跟害虫争夺那些不是我们而是黄鼠和其他害虫吃掉的粮食上,而花在搬迁4万—5万农户(仅仅4万户)上达5100万卢布。这样对不对呢?我认为,这不仅是不对的,而且这里还存在浪费我们资源的真正因素。

在结束灭虫这个问题时,我还要说的是:第一,灭虫药生产的发展几乎为零;第二,这些灭虫药送到居民手里时运费就使价格翻了一番;第三,没有灭虫的工业发展计划;第四,虫害使各地区造成的损失没有登记;第五,地方居民和社会组织还没有被吸引到这项工作中来;第六,共和国间的措施没有协调一致,而害虫是不承认边界的。

彼得罗夫斯基:对民族疆界应该尊重。

米高扬:害虫可不愿意乌克兰化。

雅科夫列夫:不仅不愿意乌克兰化,也不愿意搞别的行动。(笑声)这当然让人很不愉快,但是这些害虫不但不承认地界,而且不承认共和国之间的边界。

洛莫夫:真是最“国际化的”生物。

雅科夫列夫:第七,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缺少组织。这个领域现有的科研工作要素分散,没有交流。这样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铁钉铁丝工厂,在对铁钉和铁丝用硫酸进行酸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绿矾是最珍贵的灭虫药。一方面,我们把绿矾倒进下水道,另一方面,附近田地的庄稼却被网纹蛭螭咬死。这是事实。如果生铁的生产能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今年年底达到战前规模,把产量提高到大大超出控制数字规定的水平,难道我们就不能把灭虫药的生产在2—3年内提高到能从害虫口中夺取1亿、1.5亿,甚至2亿普特粮食的规模和数量吗?

下面我谈谈移民。大家都记得,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预算,3年内我们花了840万卢布用于灭虫,而在这3年内花了8400万卢布用于移民,其中5100万卢布来自全苏储备。我们用这5100万卢布做了什么?要知道,这相当于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一个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是一个新拖拉机厂,是一个我们急需的拖拉机厂,下面我还要谈到这个厂。

这3年内,我们迁移了23.2万人,大约4—5万户。每一户的花费大约是1200卢布。按计划应迁移57.1万人,而实际迁移了23.2万人,即计划的

40%。根据我们的调查材料,这些人中有10%—15%由于住不惯,由于忍受不了我们的混乱状态,自动返回原籍了。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3年投入5100万卢布迁移这4万户——我国过剩人口的沧海一粟,合算吗?我国的过剩农户和人口达数百万之多,关于确切数字大家的意见不一,所以我没有确切说几百万。如果我们在这3年内从这个“过剩”人口的大海里取出4万户,没有一个地区会感到轻松……

[丘巴尔:实际上,没有过剩人口。]

雅科夫列夫:而这些用的是花在灭虫上能够产出几千万普特粮食的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下面请大家注意:从旧的、革命前的预备垦殖基金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于移民,而一半移民资金用于在条件极其困难的地区建立新基金。我在这里还没有说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迁移到那些需要大量准备工作、远离铁路、没有任何交通线的地区,此外,到目前为止还根本没有研究向新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区移民的问题,向该地区移民将来不仅可以依靠铁路,还可以依靠该地区建立起来的新的苏维埃生产部门。

这并不是说应该完全停止移民,但这意味着应该重新审议移民开支和大规模农业技术措施开支之间的比例,除此而外,应当郑重地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所有土地机关、党和苏维埃机关提出把移民资金用于生产的问题。

接下来是土地规划问题,土地规划是争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没有多少人反对土地规划。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土地规划形式呢?我们有权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土地规划的各种形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这些或那些土地规划形式的选择是否适宜的问题,我们对于土地规划资金的使用是否有效的问题,我们有没有选择能在最短时间内见到最大效益的土地规划形式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把过多的资金用在那些很长时间才能见效的费钱的土地规划形式上的问题。最简单最省钱并能在最短时间内把相对来说最多的农户包括进来的土地规划形式是:把地多的村社分成几部分,把土地整块分给各个村庄,并为农户小组建立宽条土地。这些土地规划形式消除了基本的缺陷:多条地、小条地和耕地交错现象,从而大大缓和了远离土地的情况。

最费钱的土地规划形式是建立新村,既要移民和转移建筑物,还要把土地规划落实到每一户。

最简单的土地规划开支同需要移民和引水的土地规划开支之间的比例关系

是：第一种土地规划一俄亩土地需要大约1卢布，第二种土地规划需要25卢布以上。

尽管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户来说迁移和建立新村无疑是摆脱村社和多农户村庄的困难的决定性出路，但是，全部问题在于，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是给予5%—6%的农户这种出路合算，还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用这些资金保证同一地区50%—60%—70%的农户能实行文明经营更合算？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对俄罗斯联邦境内不移民和不建立新村而分离部分村庄的情况作一个比较。1926—1927年度，在450万公顷土地上实施了第一种土地规划，在236万公顷的土地上实行了第二种土地规划（建立新村）。1927—1928年度在700万公顷土地上实行了第一种土地规划，在312万公顷土地上实行了第二种土地规划。

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土地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草案，规定在未来5年中平均每年在680万俄亩土地上不移民而分离部分村庄，在416万俄亩土地上建立新村。这意味着，从国民经济角度来看错误的和完全不合理的各种土地规划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近几年内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同时，对于评价这种土地规划工作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不仅在那些离土地较远现象严重的地区，甚至在那些土地使用的主要弊病与其说是离土地较远不如说是多条地和小条地现象严重的小村庄众多的地区，也出现了上述各种土地规划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扎波罗热州建立新村预计将涉及全部农户的8.5%，无须移民的分离将会涉及全部农户的5.9%；在中部黑土地地区移民将涉及全部农户的6.7%，无须移民的分离将涉及全部农户的8.9%等等）。

由于这种工作状况，1927—1928年度，俄罗斯联邦土地规划经费中有27%花在了移民上。土地计划委员会预计在未来五年中每年用于建立新村的资金将占俄罗斯联邦土地规划全部资金的59%。

如果采用最简单的土地规划形式，一俄亩花费一卢布和一俄亩花费一个半卢布就能在一年、两年、三年内给我国经济即几千万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带来效益，那么，我们把这么多钱花在建立新村上对吗？我们没必要隐瞒，在这些新村中有旧土地政策的因素，即土地规划的目的是建立独立农庄和单独田庄，斯托雷平把赌注压在独立农庄、单独田庄和移民村上，而在我们的土地机关中行政官员数量过多……

有人喊：裁减。

雅科夫列夫：有人把这种土地规划的新形式悄悄塞给我们的共产党员。

旧行政专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工作旧传统控制了我們。最可悲的是,今后还打算实行这种工作形式。如果大家看一看村镇的规模,就会知道这个问题非常尖锐。乌克兰的情况是,由大村庄组成的新村镇的数量同由小村庄组成的新村镇的数量持平。看,在乌克兰作过“单位面积产量”调查的扎东斯基同志不断地点头称是。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间接地、雄辩地证明,我们这儿不只是对多农户村庄进行了移民,而且行政专家和地方自治官员把旧的工作方法换了个形式带了进来,这也是事实。

我不建议完全停止移民,在个别地区移民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对这种土地规划形式的支出同最简单的土地规划形式的支出的比例关系重新进行研究。要停止建立极小规模村镇的胡闹行为,要想办法把旧土地官员从这项工作中驱逐出去。

现在看看中部黑土地地区的问题。

最近几年,中部黑土地地区同其他地区相比处于非常“优越的”条件下。三年内为振兴中部黑土地地区共拨款约5 300万卢布。在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中部黑土地地区平均每户获得24.6卢布农业贷款,每俄亩耕地3.95卢布,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平均每户获得13.9卢布农业贷款,每俄亩耕地2.01卢布。

总的来说,我们这里最集中地体现了“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方法,即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个体上,而不是群体上。

作为中部黑土地地区整个振兴事业主要思想的所谓综合村镇吸收了沃罗涅日省0.6%的农户,仅1925年和1926年平均每户就花去272卢布国家资金(现在还在花)。在库尔斯克省综合村镇吸收了全部农户的1.1%,拨给该省农业的国家预算和长期贷款资金中有9.6%用于这些农户。在沃罗涅日省的综合村镇中没有一个集体农庄。库尔斯克省综合村镇的绝大部分都是个体农户。

同时,90%的农户没有真正得到帮助,而若是换一种资金分配方式就可以提供这种帮助。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工农检查院的材料):如果我们把中部黑土地地区5 000万卢布的大部分用于将3%—4%的农户(把综合村镇和一般移民也算上)提高到富农水平,而对其余的群众即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却极少关注,那么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吗?我们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中部黑土地地区的真正发展吗?不,不能。最近三年中部黑土地地区的发展没有超过其他地区。该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俄罗斯联邦中的份额下降了。全部的“秘密”在于,钱都用在了发展“个体”上,我们给他们机会成长,所以他们时常受到我们反

富农斗争的压制,但对基本农户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使用影响的杠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有人喊:这不对。

雅科夫列夫:不,这是对的。那么请问,下面说的是不是实情:在中部黑土地地区农民只有大约5%的播种面积使用的是粮食作物良种,这是不是实情?是的。1927—1928年度连不大的良种繁育计划都没有完成,这是不是实情?是的。1927年库尔斯克省只有14%的播种材料经过清选,这是不是实情?这种情况是在库尔斯克省有足以在3个月之内把所有种子清选一遍的谷物清选机的条件下出现的,这是不是实情?是的。把在你们边疆区工作的所有专家都召集起来,我们向他们证实:以库尔斯克省现有的谷物清选机可以在3个月内清选所有种子,而实际上只清选了14%。1927年春库尔斯克省只有16%的播种材料经过消毒,而沃罗涅日省只有12%。尽管有被称为最珍贵的地方性肥料的丰富磷灰石矿,却没有加以利用,这是不是实情?1927年春,整个库尔斯克省只发放了48吨磷灰石粉,而磷灰石粉碎机却卖了5万到10万卢布,这是不是实情?没有人关注租赁站,是不是?博布罗夫县的租赁站从1924年起就没有添置过工具²⁷²。没有人关心灭虫工作,这是不是实情?是的。

如果这些都是实情,那么工农检察院是否有权根据中部黑土地地区的情况认定,我们的资金使用过于大手大脚,针对个体的方针经常变成针对富农的方针从而使我们束手无策,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整个的资金使用体系,以便采取能迅速见效并能使数百万真正的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而不是几万农户受益的措施呢?

最后,农艺师对于提高收获量的作用不容低估,而对他们的使用则存在很多不足。农艺师使用中的问题有:到目前为止,一半以上的农艺师常常被不相干的、与自己职责无直接联系的、文牍性的、代理的和会议工作所累;农艺师由于没有起码的交通工具(马、自行车)而被困在农艺站,如果给农艺师自行车,就能使他们的工作效率成倍提高;农艺师的工作没有同土地规划员的工作有机联系起来;在很多情况下农艺师的工作还没有摆脱地方自治机关的传统;农艺师没有组织和领导大多数农户转而采取经过改良的经营方法,而是主要在个体,尤其是富裕农户中开展工作;同时农艺师应该发挥类似工厂技术人员的作用,应该置身于一个农民自身的生产会议、代表会议和社会组织的体系之中,但迄今为止农艺师仍然是单枪匹马的文化传播者。

因此,对土地机关最重要的工作领域的调查表明,如果不彻底同地方自治机

关的传统和面向个体的方针决裂,如果不提高对广泛推广初级农业技术措施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就不能指望真正加快收获量的提高、真正迅速振兴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真正迅速克服野蛮的经营方法、真正利用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小农户和最小的农户提供的那些机会。

在同苏联最著名的专家审查了我们的各项核算之后,我们进行了估算并得出结论:光是按照我们计划的规模推行初级农业技术措施,就能在五年之后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20%。

在3年内以铁犁替换木犁,在最近2—3年内实现全部种子精选,在5—6年内主要作物都用上良种,在最近2年内工业要为农业提供所有必需的灭虫药,加快基本的土地规划项目,5年后在全部播种面积的50%采用条播,为实现农业技术目标利用预购合同制,所有这些措施在5年后肯定能将单位面积产量至少提高20%。

请各位把这个20%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在5年之后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12%的设想作一下比较,而且应当注意到,农业人民委员部关注的不仅是初级农业技术措施,而且还有我们对农村施加影响的各项措施。

如果大家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从每项措施的效益大约只是这些措施在我们所研究的农户中所产生效益的50%出发,认真研究我们单独对各个地区所作的估算,那么就会相信“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所有设想多么严重地低估了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的发展能力。

为了对5年之后单位面积产量实际提高的总体规模作出估计,还应注意以下情况:如果5年之后集体农庄的产量达到先进的集体农庄产量的 $\frac{2}{3}$,那么俄罗斯联邦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还能再提高3%,乌克兰提高2.6%,白俄罗斯提高2%。同时,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对新旧集体农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规模分别作了规定,今年之前建立的集体农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50%,5年之后建立的集体农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50%。

根据三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播种面积,国营农场的单位面积产量能相应提高1.6%。

当然,问题到此还没有完。我们能用最简单的措施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国农业闻所未闻的低水平使我们能在正确使用资金的条件下用这些简单的措施将收获量提高20%。但是,问题到此当然没有结束;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机器和化肥。

如果灭虫这件事使我们看到,工业在个别情况下决定着农业振兴事业,那

么,如果大家注意到只有机器能为农业技术措施奠定坚实基础这个事实,那这一点更是确定无疑了。难怪产量更高的中农农户的生产资料数量大大超过普通中农农户的生产资料数量。

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问题上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个厂的建设我们至少晚了2年。现在有什么结果呢?结果是3年以后我们才能每年得到3万台拖拉机;而3年之后仅拖拉机折旧就需要3万多台拖拉机,因为那时农户将拥有15万台拖拉机。

为了使这15万台拖拉机运转,每年需要提供3万—4万台拖拉机用于折旧。而3年之后我们只能得到3万—4万台拖拉机。必须承认这个错误。这是我们共同的错误,我们延误了这件事。好在我们在罗斯托夫新建了一个农业机械厂,工农检查院的调查表明,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工厂,在这个工厂中大量采用了欧洲和美国的技术规程。欧洲和美国的技术规程在相当大程度上用于制造农用车车轮和马拉普通大车。

除此以外,该厂还生产10—15年前就已经过时的转臂收割机。这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错,无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什么样,也不可能知道需要什么机器。应该知道的是土地机关。我们这方面的情况是,只是由于今年建立新的国营农场,我们的机关才头一次知道有联合收割机。

米高扬:我已经知道5年了。

有人喊:米高扬知道5年了,但是对此保持沉默,谁也不告诉!

米高扬:在北高加索做过试验。

有人喊:报纸上登过照片。

李可夫:但在人民委员会没有人解释这是什么东西。

雅科夫列夫:这是可以同时脱粒的收割机,是收割机和脱粒机组合在一起的机器。实际上,这种机器从1918年起就开始在美国获得迅猛发展。我调取了我们现有的关于这些机器在美国使用的结果的资料。原来,我们有美国对这些机器进行检验的资料,资料表明,美国有的州由于使用了联合收割机而使收获量提高了40%。这种机器从1918年开始在美国使用。每年都有一些新地区开始使用,这种机器带来的收益是粮食价格降低了15%—20%。同志们,粮食价格就是这样降低的。

有位外国工程师在我们的工农检查院工作,他既为这个工厂,但同时也为我们建成这么先进这么卓越的工厂只是生产农用车车轮和转臂收割机而深感惊讶。

所以问题在于机器的型号和质量。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更多地处于这样的境况下: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新机器,总是站在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的门外开展新的建设——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瞧瞧吧,联合收割机晚了10年,而现在德国已经在进行播种机试验。

米高扬:我们引进了几台。

雅科夫列夫:这种机器的实质就是它把中国的耕作方式机械化了。中国是世界上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的耕作方式对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适用,因为这种耕作方式需要地狱般的劳动,工作时间没有任何限制,每天的劳动报酬是15—20戈比。播种机把中国的这种耕作方式机械化了,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进行过这类试验。用这种机器耕作的结果是每俄亩产量达到了600普特。现有的美国联合收割机完全适用于它应该操作的环境。可是我们在做些什么?

现在,我们必须订购几台这样的机器,并开始进行试验。同志们,试验要进行好几年。这种机器完全经受住了检验,一些州40%的耕地都是用它耕种的。可我们偏偏还要花好几年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试验,看我们的火车到底能不能像德国火车那样跑,或是我们应该继续坐俄罗斯大车。资本主义工业在战后创造了一系列先进机器,这些机器大规模推广后可以给农村面貌带来不小的变化,同19世纪给工业生产面貌带来的变化相比并不逊色。拖拉机日益普及,但拖拉机只是在大块土地上使用才合算,在小农户中没什么用(德国一半以上的农户都非常小,在2公顷以下)。拖拉机同大量其他机器配合使用的经验显示了其无可争议的优越性。全世界的技术力量都在研究制造不同于农业中使用的普通机器的新机器,就像巨型蒸汽锤不同于农村铁匠铺的工具。目前列宁格勒中心科学研究实验室工厂、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制造的彻底改变土壤耕作方法的旋转犁,以机械方法进行“菜园式”准确播种的单籽机,舒列工厂制造的把簸谷机、筛子和精选机组合为一的谷物清选机,直接在田里收割和脱粒、同时把秸秆均匀分撒在田里用土盖上作肥料的美国康拜因,用“中国式”的插秧方法进行播种的机器,所有这些机器要么已经通过了试验,要么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地方接受检验。

蒸汽型和拖拉机在德国不同规模农户中使用的简单情况(根据1925年的资料)清楚地显示了这些机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应用的局限性:2公顷以下的农户使用蒸汽型的占1.3%,使用拖拉机的占0.4%;20—50公顷的农户使用蒸汽型的占4.5%,使用拖拉机的占7.7%;100—200公顷的农户使用蒸汽型的占

17.1%,使用拖拉机的占24.2%;最后,200公顷以上的农户使用蒸汽犁的占64.1%,使用拖拉机的占45.7%。

如果说19世纪是工业得到根本改造的世纪,如果说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根本改造工业劳动的任务,尽管工业已经创造了一系列能从根本上改造农村面貌的先进机器和工具,但是资本主义却由于土地私有制而无力完成对农业劳动进行相应改造的任务。改造农业劳动的任务和农业革命的任务是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也应该只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能够解决。

从这一角度观察我国农业机器制造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看出,我们的情况并非一切都好,我们过于盲目地效仿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苏维埃国家真正的根本目标——改造农业劳动这一角度看,这里必须进行修正,甚至是重大的修正。我们的农业机器生产部门几乎完全还在生产战前和革命前使用的机器,而资本主义技术已经生产和将要产生许多可以根本改变农业劳动性质的新机器。同时,我国由于合作化和集体化无疑为这些机器开辟了进入农户的道路,而且比进入受私有制束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户更快、规模更大。这样,不仅我刚才说的机器的质量很重要,而且我国工业生产的、能用于农业的机器的数量也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计划在五年计划末期生产价值3.5亿卢布的农业机器。这是对我们的潜力估计不足。今年的控制数字规定了农业机器生产的明确数字,结果我们能够多生产价值2000多万卢布的机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把这2000多万卢布的机器补充进自己的生产计划。我们应当把农业机器生产放到第一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任务,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在五年计划结束末期生产价值5亿卢布的农业机器,这是最低要求。如果三年之后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不能满足拖拉机折旧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提出在乌拉尔或乌克兰建设新的拖拉机厂的问题。

要立即开始新拖拉机厂的设计,这样才能在明年开始建设,否则两年之后我们又得承认这件事办晚了,就像现在承认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晚了一样。除此以外,同志们,当然还要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发展到生产4万台而不是2万台拖拉机的规模。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避免速度和时间上的损失。农业机器制造工业发展速度和时间上的损失不仅会导致完不成提高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还可能导致去年建立的集体生命力不强,因为它们缺少真正的大机器经济的基础。所以,我国提高收获量的任务不仅要求农业机器制造

的发展比现有草案快一倍,而且要求机器质量(型号和种类)发生决定性变化,这样我们才能把企业建立在美欧高技术成就基础之上。

接下来谈谈无机肥料。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决定,批准了无机肥料生产计划,要求在五年计划末期满足农业的某些最低需求。这一计划如果得到完全执行,将能保证提供糖用甜菜、棉花和亚麻的播种面积以及大约700万公顷其他作物,其中包括330万公顷粮食作物所需的全部肥料。同时,蕴藏丰富的磷灰岩和石灰利用得很不好,而在这些资源的研磨方面可以进行手工生产和合作化生产。

肥料研究所²⁷³今年10月24日在化学化委员会²⁷⁴正式通报: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安排磷灰岩粉磨厂的粉碎设备的生产,甚至没有研究这些粉磨厂的类型,也没有具体弄清原料基地。尽管有大量的原料资源,但是我们的建设很不合理,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粉磨厂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它们的原料基地根本不够用,(卡卢加粉磨厂的新设备没有相应的原料基地)。根据斯摩棱斯克工农检查院的资料,斯摩棱斯克粉磨厂在资金投入超过20万卢布的情况下三年内就会耗尽原料基地。

施用石灰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劳动国防委员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关于今年为35万公顷土地(即使在初期,这也太少太不够了)施用石灰的决定实际上没有完成。部门间关于进口必需的粉碎设备的谈判和讨论耗时达几个月。由于不清楚必需的粉碎设备类型,所以我们没有安排这种设备的生产,尽管这只是一-种最简单的设备,我们自己的工业力量完全可以生产。迄今为止,在政府批准的最小规模内施用石灰的计划还没有制定出来。

同时,一个非常现实的任务是,通过手工加工和合作社加工磷灰岩和石灰石,争取在5年内在肥料生产、保证至少给150万公顷施用磷矿肥以及给另外大约15%的粮食不能自给地区施用石灰等方面达到大工业生产的水平,实际上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合作社,却没有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今年合作社计划只建设7个粉磨厂)。我们的资源应该在真正革命的规模内,而不是在地方规模内得到利用,地方主义还在困扰我们,在建设磷矿厂和组织施用石灰方面我们还是地方规模。

我们应当影响的是几千万俄亩土地,必须用适当的方式在必要的范围内利用我们的杠杆。同志们,如果你们考虑到初级措施能够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使农业机械工业发展速度超过其他部门,从而把使用无机肥料和发展机械化所能带来的效益从50普特提高到60普特,那么你们就会看到,我们能够在五年计划末期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0%—35%,这一点在我们的材料中也

得到了确切无疑的证明。为了自我检验,我们召集了……

库比亚克:光有革命精神还不够。

雅科夫列夫:光要求地方意识形态服从行政官僚的传统也不够。

库比亚克:当然。

雅科夫列夫:问题就在这里。为了自我检验,我们召集了最著名的专家,不是行政工作人员,而是像威廉斯、列维茨基、布申斯基、利斯昆和普里亚尼什尼科夫这样的专家,他们是俄罗斯现在最著名的专家。他们不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0%—35%的任务是否现实。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的12%没有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还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不需要根据人口增长和技术设备起码的增长采取任何措施,单位面积产量就增长12%。

在下面的表格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计算的数字,我不打算对此加以评论,只是想再说一遍,根据正在改造的农业需求、根据在五年计划末期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0%—35%的任务来发展工业,是实际实现这些数字的先决条件。

各种措施促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一览表

共和国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三共和国总共
各共和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百分比	77.0	20.7	2.3	100.0
各共和国采用初级措施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效果总计(单位:%)	21.5	23.3	20.5	21.9
使用无机肥料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效果(单位:%)	1.2	0.6	6.1	0.2
个体农户采用改造措施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效果	3.6	4.0	2.0	3.6
实行集体化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效果	3.0	2.6	2.0	2.8
国营农场为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带来的效果	1.0	0.5	0.6	0.6
各共和国总计	31.3	31.0	31.2	31.1

我们提出的实际行动规划在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中得到了阐述,这一草案下周将在人民委员会内进行审议。

我们提出的基本措施包括了以下方面:

1. 确保在5—6年内用在各地区试验过的良种替换非良种。
2. 在3年内全面实行种子的净化和清选。

3. 在最近3年内进行必需的灭虫药的生产。
4. 确保更全面地使用复杂机器。
5. 发展修理厂。
6. 加快进行土地规划和大力发展最简单的土地规划形式。
7. 增加使用磷肥和施用石灰。
8. 提高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发展土地的社会化耕种。
9. 改善对农户的农业技术服务。
10. 发展对居民和苏维埃党积极分子的初级农业教育。
11. 鼓励最落后的农民采用改良后的耕作方法。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在近期召开的所有地区、乡和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发布要求相关地区或乡的全体农民采取某种初级农业技术措施(种子的净化、除杂草和种子的消毒)的决定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一项特殊日程。在经过村苏维埃农业问题小组、地区和乡执行委员会和村民大会讨论后,如果具备实施相应措施的物质条件,就应该按照必要的程序发布这些决定。

12. 加强苏维埃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工作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向近期召开的专区、省、地区和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村选举大会提出建议,在讨论乡、地区执行委员会和村苏维埃的总结报告时,要特别注意这些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是如何领导农业工作的。

在评价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工作时,必须看它们在维护贫农和中农利益以及同富农作斗争方面是否正确地执行了阶级路线,看它们是如何领导农业发展的。

为此,苏维埃政权投入农业的资金的使用应该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就像城市中的工人对基本建设的监督一样。

必须活跃和加强村苏维埃农业问题小组、地区和乡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把文明经营的集体经济成员和个体贫农、中农吸收进这些机构,按照工业企业中的生产会议模式组织农业问题小组的工作。

必须使农业问题小组的成员承担农村农业技术执行人的责任,监督初级农业技术措施在农户中的推行。

必须推行在一些地区(北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区和下伏尔加河流域等)召开广泛的农民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地区的、专区的和边疆区的)讨论单位面积产量问题的做法。应对定期召开地方的地区和乡代表会议予以特别关注,应安排这些会议在举办农业展览和竞赛时召开。

13. 确保农业机器制造工业发展具有相应的形式和速度。

农业人民委员部应该根据现有的欧洲和美国技术成果以及在五年计划末期将单位面积产量至少提高30%—35%的任务,向工业提出申请。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制定自己的五年计划。

我再说一遍,党组织应以适当的方式把工作转移到这个方向,必须知道在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专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两个判定工作质量的基本标准。第一个标准,阶级政策执行的对不对;第二个标准,是不是在领导小农户和极小农户的发展,这里要把工作做到位,要让人们在党代表会议和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各自从这个角度来检查领导工作,我们不要都在一边乱出主意,要把农民组织在这项工作周围。

这就是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基本措施。这意味着,别的暂且不说,应当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土地机关的状况。我想就此结束发言。我们的基层土地机关的素质极低。如果不向这些机关派人,如果不把有经验的党的组织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安排到那里,就根本无法推动这项工作。如果不把这些把我们拖向富农和单干户的革命前的行政专家、腐败透顶的人从土地机关中驱逐出去,如果不用那些在各个部门、各个试验站大量成长起来的真正的人取代他们,如果与此同时不吸收现有的著名专家即行政官员不允许稍微接近土地机关的人,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这些都是必须实行的组织措施。最近的组织措施也与此有关。

我不知道能否容忍全苏农业工作领导中的混乱状况。我们有10—12个管理农业的全苏机构。我们通过全苏领导班子管理着农业工作的所有部门,有管移民的,有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的委员会,有“牧羊人”股份公司²⁷⁵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业处,等等,这些机关应该发挥这一作用。同时人民委员会缺乏在全苏范围内真正管理和调节这项工作的能力。

在此我不说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问题²⁷⁶。但应考虑以何种形式理顺这项工作的全国领导问题,以保证全国范围内农业的计划和协调,用一个机构来代替这10个苏联假“农业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不剥夺俄罗斯、乌克兰等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任何一项权力,同时又能实行现在实际上无人过问的对全国的领导。所以,需要在全苏机构内提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问题,应当知道如何消除现有的组织混乱状况,如何协调10—12个机关的工作,它们似乎都在领导这项工作,但很遗憾的是,却从来没有一个机关告诉工业应当建设什么、建设多少以及为了中止混乱、不协调的现象和我们存在的其他问题应该做些

什么。

我这就说完。我的主要结论是,如果我们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办一切事情,我们就能够在五年计划末期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0%—35%,而不是农业人民委员部计划的12%—14%。应当使这项工作不只是土地机关的工作,还是全党和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不要可怜任何人,要结束组织上的混乱状态,同时要想方设法利用农民、贫农和中农的经济核算,相应调整工业的发展,正确使用资金,杜绝我们现有的浪费现象,结束浪费和老爷习气,结束面向单干户的方针,要把工作的希望寄托在几百万贫农和中农身上,把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和经济努力同贫农和中农的经济核算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12%—14%的可恶的计划。(鼓掌)

主席:两个通知。第一,李可夫同志要求所有的同志对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今天晚上之前打印好交给李可夫同志。

第二个,施米特同志要求通知七小时工作制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今天的委员会会议5点钟在这里召开。

休息后发言的是克维林同志、加里宁同志和斯克雷普尼克同志。

现在休息15分钟。

(休息后)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继续开会。现在请克维林同志发言。

克维林:安德烈耶夫同志关于北高加索农业状况的报告反映了全国农业的现状,所以,这个报告所得出的结论使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一经济部门面临的共同任务。我认为,主要的结论是,我们在指出农业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指出北高加索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远远没有得到恢复。所以,我们必须提到和必须采取的农业领域的具体措施主要是粮食生产领域的措施。

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措施。我基本上完全同意他所提出的原则。我想谈谈恢复粮食生产这项任务的另一方面——扩大播种面积的任务,这一任务在最近1年甚至最近2—3年是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大家知道,控制数字中提出明年的播种面积扩大7%,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我想通过数字告诉大家,这个指令对国民经济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个指令不能完成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过去的1928年,我们收获了7450万吨粮食。我们关于播种面积扩大7%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的建议意味着粮食产

量总体增加整整10个百分点。如果这个任务能够完成,我们明年的粮食总收获量将达到8200万吨。这可能吗,这对我国经济的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从明年开始我们将面临改善国内粮食状况和增加畜牧业的谷物使用量的任务,一句话,就是要提高国内的消费总水平。可以说,两年之前即1926—1927年度的消费定额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那时的粮食状况比现在好得多,如果我们明年能够恢复这些定额,那就意味着去年和今年特有的粮食困难和经济困难已被克服。所以,我们在计算时为明年规定了1926—1927年度的消费定额。考虑到1928—1929年度的人口比1926—1927年度增长了(分别为1.47亿和1.56亿)900万,我们明年必须收获8060万吨粮食,才能满足国内的消费。因此,如果我们能全面完成我们的任务,即把谷物的收获量增加10%,那么我们就恢复1926—1927年度的消费定额,我们还可以剩余大约8000万普特粮食供出口。

丘巴尔:比今年增加10%?不应该跟今年相比。

克维林:丘巴尔同志,我是在陈述政治局提纲中通过的指令,这个指令中要求播种面积比1927—1928年度提高7%,单位面积产量比今年提高3%。总计明年应当产8200万吨粮食,也就是恢复1926—1927年度的消费定额,还有大约8000万普特可以出口。

但是我们现在能说单位面积产量肯定会提高百分之三吗?即使我们为此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毕竟,到目前为止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主要还是靠上帝,而不是我们。如果明年的气候比今年坏,我们不能在播种面积扩大7%的情况下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那会怎样呢?那就根本不会有粮食供出口。粮食出口将停止,消费定额将比1926—1927年度有所下降。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播种面积扩大7%的指令,试问,我们能完成4%吗?米柳亭同志好像说过(我没有听清他的话),似乎播种面积扩大2%是正常的。这完全不正常。如果我们的播种面积不是扩大2%,而是4%,那明年会怎么样?那样不仅谈不上出口,连人均定额都要比1928—1929年度低一些,也就是说,粮食困难会加剧。

同志们,这就是我要说的。因此,明年把播种面积扩大7%是整个经济计划中最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能保证我们明年的经济发展。同志们,应当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明年就不能保持已有的工业化速度。这一点应铭记在心并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必须采取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各种措施,以便扩大播种面积。同时,现在出现的情况使人们在这方面产生了某种忧虑。为了明年把播种面积提高7%,需要做些什么?需要首先把秋播地恢

恢复到1927年的规模,即恢复今年损失的那部分。今年秋天播种面积的数字还没有最终统计出来,但是初步资料显示,相对于1927年还有大约50万俄亩没有恢复。

丘巴尔:全国一共这些吗?

克维林:是的,全国,但这50万俄亩主要在乌克兰。但是,我们只能晚些时候得出最终统计数字。无论如何,这给扩大春播作物提出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问题在于:由于重播,去年春播面积扩大的主要是乌克兰,而俄罗斯联邦1928年的春播面积和1927年的春播面积持平,也就是说俄罗斯联邦1928年的春播面积较1927年没有增加。例如,北高加索的达吉斯坦大约100万公顷秋播作物死亡,而1928年的春播粮食地总共比1927年增加了35万公顷,而同年乌克兰有500万公顷秋播作物死亡,春播面积增加了380万公顷。由此可见,今年扩大春播面积的任务落在了俄罗斯联邦身上,而且主要落在了俄罗斯联邦的东部地区,其中包括北高加索。根据我们的计算,为了完成播种面积扩大7%的指令,整个俄罗斯联邦需要把春播面积扩大9%。同时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从春播面积扩大7%出发,通过了开展春播运动的计划。如果不对这些计划进行重新研究并加以提高,如果俄罗斯联邦东部地区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至少9%,那我们就不能完成全国扩大7%的计划,而只能扩大6%或者5.5%左右。如果明年收获量不是特别高,扩大播种面积的计划不能完成,这将会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困难,而最近两年东部地区春播面积变动的资料表明,那里有能力将播种面积扩大这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1928年的春播面积比1927年低了整整6%;当然,这对仍有很大潜力大幅度扩大播种面积的哈萨克斯坦是个坏标志,但是这也说明,明年我们应该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督促哈萨克斯坦利用这些潜力。(主席铃响)

我再说几分钟。这些任务非常尖锐地把农业发展的总体前景摆在了我们面前。雅科夫列夫同志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只想给你们举几个对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发展农业有决定意义的数字。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了未来五年发展农业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基本上赞同这一草案,现正对一些细节进行研究。根据这一草案,在未来五年之内,确切地说是在五年之后,全国应该有15万台拖拉机,其中10万台是进口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列表对比了农业和工业的机械化装备程度。从他列举的资料无疑可以得出正在加紧给农业装备机器的结论。

同时,我们提出了使用无机肥料扩大棉花、亚麻、糖用甜菜播种面积和700

万公顷其他作物播种面积的任务。当然,如果注意到全国的播种面积是1.35亿公顷,这就远远不够了。执行这个有关拖拉机和无机肥料的规划要求为工业提供数亿基建投资并大大增加出口。进口10万台带牵引工具的拖拉机需要大约3亿卢布。尽管5年内将向化学(肥料)工业投入4亿卢布,但对于施用无机肥料这个庞大计划来说国内生产还是不足,因此需要增加进口,而这还需要整整2亿卢布。这就是我们在全面提出复兴农业的任务时所面对的数字。用不着害怕这些数字,因为很快就会收回成本。当安德烈耶夫同志主张从其他所谓的竞争地区调1万台拖拉机给北高加索时,有人插话表示不满。

有人喊[丘巴尔]:恰恰相反,非常满意。

克维林:同志们,我认为,只有我们下决心走这条采取大量措施推进农业机械化和使用无机肥料的道路,只有我们在最近5年之内在这项工作上投入几亿卢布,我们才能真正地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站稳脚跟。没有拖拉机,没有无机肥料,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农业,尤其不能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在农业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业得到应有的发展。

主席:现在请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发言,下一个是斯克雷普尼克。

加里宁:同志们,我在这里不是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发言……(笑声)

有人喊:噢!

加里宁:而是作为一个农民……(笑声)

有人喊:“中农”。

克利缅科:是非党农民还是党员农民?

加里宁:而且是顿河专区的集体主义者……

安德烈耶夫:哪个州的?

有人喊:特维尔省基姆雷县的。

加里宁:北高加索边疆区,叶伊斯克区,新谢尔宾斯克村。

有人喊:你在那儿参加劳动吗?

加里宁:分给我的那10俄亩地现在归集体使用,所以,你们对我的话应该……

米高扬:十分尊重。

加里宁:可以说是非常关注。(笑声)我可以说是直接生产者……(笑声)

[乌格拉诺夫:可能也是直接消费者,对吗?]

加里宁:是(生产者),可不是生产者的助手。

所以,同志们,既然我们就控制数字通过了决议……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有人喊：基本上通过。

加里宁：别抢话，决议的基本通过不会改变实质。

有人喊：说得对。

加里宁：所以，可以认为，农业方面的指导性草案已经提出来了。这一草案的实质是：把全党最敏锐的注意力集中到农业发展上，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和加强谷物的商品化上。这是党摆在全国面前的突击任务。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因此，这项任务和决议中提到的所有措施得到了我们大家一致的肯定和赞同。

米高扬：毫无疑问。

加里宁：是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疑问。这些措施分为两部分：技术措施和政治措施。哪一类措施现在都没有疑问。

我们刚刚听取了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的报告。遗憾的是，由于技术条件这是我们听的第三个报告，本来应该在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之后马上听这个报告。

有人喊[米高扬]：说得对，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加里宁：因为控制数字提出了党的总指示，为地方党的工作人员指明了总路线。在就北高加索边疆区的报告进行的讨论和作出的决议中我们应该揭示内在的本质，对农业领域的政策进行具体的解释。控制数字指的是总计数字，这些数字对一切作了综合……

米高扬：加权平均数字。

加里宁：有关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数字都作了综合和汇总。而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各地的报告对这个总计划的每个部分进行深入研究，尤其应对今后发展和振兴农业的具体条件进行研究。我们通过的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和对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之间应该具有这样的联系。应当说，边疆区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并主动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作了关于边疆区农业的报告。同时需要指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作这个报告非常坚决。我认为，他们做得非常正确，这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的功劳。

喊声：说得对！

加里宁：我不否认，是客观条件推动他们这样做的，而委员会则及时地抓住时机，作了关于边疆区农业的报告。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提得快，我们就能找到办法根除农业中的所有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北高加索边疆区而且整个苏联都存在。

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给我们分发了还是手稿的关于北高加索农业现状和农村工作的材料。我要说的是，这份材料太好了！当然，我说“太好了”是同在

此之前、在这份材料之前出现的东西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从应该怎么做角度说的,当然,材料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一般应该把现在的成就同此前的成就加以衡量和比较。从这个角度看,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材料太好了。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报告从头到尾看一遍并进行研究。应该说,对每一条款都应该作详细研究。每一条款单独看都很紧凑,谈了一个小问题;它没有揭示总的情况,所以,在讨论时,如果讨论组织得好的话,我们大家最好作一下分工,每个人都从所有的条款中选一条进行研究,然后让安德烈耶夫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回答;而你,阁下……

有人喊:安德烈耶夫同志。

加里宁:我们是按照“英国方式”,用的是议会中“客气的”术语。兄弟,揭开这些简洁说法的内在本质吧,因为,米高扬同志说得非常对,如果我们的决议引用了加权平均总数,那么这在你的报告中应该得到实际反映,而在关于报告的决议中我们应该从泛泛的代数公式转向具体的算术数字。如果我们坐在这里用四天时间讨论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那么,我认为,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我们关于控制数字的整个决议的真正本质。这种提出实际建议的广泛讨论不仅对北高加索边疆区有益,而且对全党、对整个联盟都是有益的。

因为我只有 15 分钟的时间……

喊声:继续说。

加里宁:不,我不想多要了。

主席:应该严格遵守时间规定。

加里宁:我只谈种植业,把研究农业其他领域的机会更多地让给后面的发言者。因此,我想请大家注意两个表格。说实话,我用这两个表格,是因为它们非常醒目。我在研究这两个表格中使用的方法可以而且应该用于今后对每个单个条款的研究。这更是必要的,因为其他条款要有意思得多,而其内在本质也更隐蔽。

现在,我举第 13 页关于北高加索总收获量的表格为例。这个表格显示:1913 年种植业的总产值是 7.83791 亿卢布,1925—1926 年度是 5.99771 亿卢布,1926—1927 年度是 5.0383 亿卢布,1927—1928 年度是 4.48616 亿卢布。为了更有说服力,为了让大家对历年的数量关系有更直观的认识,我列举一下北高加索种植业总产值相对于 1913 年所占的百分比。请看,1925—1926 年度是 76.5%,1926—1927 年度是 64.3%,1927—1928 年度是 57.2%。因此,在 1925—1926 年度即国内战争之后,在经历过饥荒之后,一句话,就是米高扬同志

管理北高加索的最后一年(笑声),北高加索边疆区种植业的总产值是5.99771亿卢布,是1913年总产值的76.5%。我不知道,以往几年取得了什么成就,但一个事实是,北高加索边疆区1925—1926年度的种植业总产值正在接近或正在努力接近战前水平。这是事实。凭借农业现有的畜力和工具,在我们当时的支持下,依靠我们当时执行的政策,在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下,1925—1926年度种植业总产值是5.99771亿卢布,1926—1927年度是5.0383亿卢布,即减少了9500万卢布。1927—1928年度种植业总产值又减少了5500万卢布,降至4.88616亿卢布²⁷⁷。乍一看这些数字,我认为种植业总产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连年的歉收。诚然,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歉收。但是,随后再看一看1928—1929年度的数字指标,发现种植业的总产值只有4.61736亿卢布,这也就是说,同1927—1928年度相比并没有增加多少,仍远远低于1925—1926年度(更不要说1913年了)的相应指标,我对自己说,别急,因为问题不仅在于连连歉收,还有别的原因。

如果再看看现在我们尤其感兴趣的粮食,那我们也许会发现情况更糟。请大家看一组非常说明问题的数字:1931年,粮食总收获量价值4.83668亿卢布(作为100%),1925—1926年度为3.6419亿卢布(75.3%),1926—1927年度为3.02015亿卢布(62.4%),1927—1928年度为2.42285亿卢布(50.1%)。请将这些数字与我刚才为大家列举的整个种植业总产值指标作一下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是很明显的。那么,北高加索边疆区在1928—1929年度粮食总产值增长方面有什么计划呢?计划粮食产值达到2.46683亿卢布,即比1927—1928年度多440万卢布,比1925—1926年度少1.17亿卢布。大家可以看到,情况非常非常糟糕,甚至可以说糟透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表格,在第14页。这个表格涉及农业产值中的商品部分。还是从种植业讲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1913年种植业的商品部分价值为2.32691亿卢布(作为100%),1925—1926年度为1.64474亿卢布(70.7%),1926—1927年度为1.33153亿卢布(57.2%),1927—1928年度为1.01392亿卢布(43.6%),而1928—1929年度为0.99571亿卢布(42.8%)。可见,整个耕种业产值的商品部分最大的飞跃是在1925—1926年度实现的(1913年的70.7%),然后开始下降,越来越少。同志们,你们发现了吗,甚至在已到来的1928—1929年度北高加索边疆区也无力扼制这种下降趋势。

研究粮食产值的商品部分变化的数字指标时会看到一种更让人伤心的景象。事实上,1913年粮食产值的商品部分的价值为2.00286亿卢布(作为

100%), 1925—1926 年度为 1.31056 亿卢布(65.4%), 1926—1927 年度为 1.05935 亿卢布(52.9%), 1927—1928 年度为 0.62973 亿卢布(31.4%), 最后, 1928—1929 年度计划为 0.52939 亿卢布(26.4%)。大家自己评判、议论吧。我认为, 没有比这些数字更有说服力和表现力的了。这就是我列举这些数字的原因, 并且我认为, 事情远远不能只归咎于局部的歉收。同志们, 此后我们应该更密切地关注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整个报告。安德烈耶夫同志展示了这些数字, 然后动用大量重型、轻型火炮和他想到的几乎一切武器来加强他的论点, 即这些及其他类似现象都可以用客观原因来解释, 而这些原因在我们的意志之外, 不由我们的行为所决定。当然, 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正确的, 客观条件对种植业和谷物业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在这些年。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是这两年相当多的地区歉收。这是对的。这是使单位面积产量降低的客观条件, 无可争议。但是, 同志们, 如果我们一方面不同歉收作斗争, 另一方面又把一切都归咎于客观条件, 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就不是共产主义先锋队。不, 这是不够的, 还要在这里面找主观原因。实际上, 我们根本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歉收, 但种植业产值的商品部分, 尤其是粮食产值的商品部分却还在继续下降。问题出在哪里? 也许有一些我们自己造成的原因吧? 也许这些原因是由我们的意志决定的吧? 要把这些原因找出来。

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像潺潺小溪, 与雅科夫列夫同志不一样。雅科夫列夫同志说起话来像机关枪, 力图用说话速度和字数打败对手, 让对手没有时间反应(笑声), 不加批评地接受他的思想。安德烈耶夫同志却相反, 他不急不躁, 静静地说啊说, 最后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人喊[米高扬]: 而且很有说服力。

加里宁: 当你读他的材料, 听他的报告时, 我仔细听过他的报告, 那你真的会确信, 客观原因太多了, 几乎没有主观原因的位置。但我还是认为, 这是不对的。坦率地说, 如果其中没有任何由我们的意志决定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这实质上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有人喊[米高扬]: 他说了, 比如过火行为!

加里宁: 同志们, 我们所有的报告人为了免遭批评都谈了过火行为。他还会说自己的错误, 说农民的无知和自己的无知。当然, 如果说到旱灾, 那么这是比较轻的因素。但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消除我们可以消除的客观原因。我们需要同客观原因作长期的斗争。比如, 与旱灾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要作长期斗争。大家听听雅科夫列夫的发言, 看他指出了多少原因和列举了多少措施!

再看看克维林,他说如果有10万台拖拉机,就有粮食。要是没有10万台拖拉机(不可能很快有这么多台拖拉机),那我们就该饿死吗?(笑声)请原谅!只有置身具体现实之外,充满幻想的计划编制者才会这样说……

有人喊[米高扬]:空中计划大队。

加里宁:我们现在就要这些粮食,而不是在有钱买10万台拖拉机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这些粮食,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那么多拖拉机。

有人喊:这是最好的计划。(笑声)

丘巴尔:不是没有钱,而是因为花在这上面的钱少。

加里宁:这真是最好的计划!如果布尔什维克总是按照欧洲的方法,一定要等所有物质前提都具备才解决自己的任务,那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有时候甚至会忘记我们是布尔什维克,还以为我们只是经济工作者,只想着预算平衡表、数字和计划,除此以外对于我们来说什么都不存在。我不是轻视平衡表、数字和计划,只是想提醒大家,除了这些,我们还是布尔什维克。

所以我认为,北高加索边疆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不正确的。我给大家列举了北高加索边疆区每年生产的粮食的数量。

乌格拉诺夫:你说的再清楚点,怎么才能弄到粮食。

加里宁:粮食生产一直在下降。现在,我说一下种子贷款分配方面的数字,以便直观地说明这些措施是不正确的。同时,我要说明,列举这些数字只是要你们明白我的方法,而不是形式。这些数字在安德烈耶夫同志尤其感到自豪的第28页上。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是按照严格的阶级比例进行这项贷款的分配的,从党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难怪宣读这些数字的时候,安德烈耶夫同志还提高了嗓门。分配结果是:贫农86.3%,中农13.6%,富裕农民0.1%。

大家可以看到,安德烈耶夫同志违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只有13.7%,而在全联盟他也许是最轻的罪人,因为在其他地区根本没有这样分配种子贷款的。当我在家乡,也就是北高加索的谢尔宾斯克村(我在什么地方提到过)时,有些地方区工作人员来找我谈心。

有人喊[米高扬]:你会谈心吗?

加里宁:当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与移民谈心》。(笑声)

一共来了四个人。其中一位是农业局局长,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个精明的庄稼人,他说:“我知道,我很快就能拿到30万或3万普特的种子,数字我没记准。我发放这些种子可以做到,既能收回利息,还能见成效,因为我很清楚农民是怎

么耕作的,谁会用一半种子,谁会把种子全吃掉。但是也有一些农民,我四年来一直给他们提供种子,但他们总是把种子吃光,一次也不还。”我是逐字逐句地转述这次谈话的。

有人喊:这是无赖,懒汉。

加里宁:不,这样说不行,不能这么说,我认为,这是过火行为。吃光种子的不只是无赖。闹饥荒的时候,即使是很勤奋的人也会在没什么可吃的时候吃种子。他问我:“如果我把种子分给中农,支部和支部书记会把我吃了,我怎么办?加里宁同志,请您告诉我,怎样采取正确的方针?”我应该当场告诉他怎样采取正确的方针。我先是问:同志,你是生产者还是社保工作者?他说:“我是生产者。”好,我们认定你是生产者。现在再问你,你是哪儿的生产者,外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苏维埃国家的?是苏联的。这是第二条。这就是说,你是个生产者,但在英国,而是在苏维埃国家。这要求什么?这要求你亲临生产一线,同时你也要注意,在社会生产工作中对贫农的援助不可避免会带来损失,不可能没有损失。我们为什么进行革命?贫农为什么支持我们?你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要记住,肯定会损失一定的利息。同时你作为生产者应当使这些损失得到相应的补偿,即用从其他人——富农、中农等得到的利息作相应补偿。农业局局长是生产者。而如果你想像社保工作者那样只支持贫农,那你就应当变成一个社保工作者,那样一来农业人民委员部就变成了社会保障机关。不能强迫柯秀尔付给收入不多的工人薪水。对此,他会公正地说:“找保险公司去要!”这里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从生产的角度提出问题,那就应当按照苏维埃的方式从生产角度提出来。这就是说,既要坚持阶级路线,也要取得生产效益。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发放种子贷款,不只是让人民吃饱肚子,而且我们希望这项贷款在种植业的发展中发挥效益。

安德烈耶夫同志在作报告的时候提到了种子贷款分配的数字,他差一点就要说:瞧瞧,我们做得多好。从数字上看,你们是好样的。但是,贷款就是贷款。既然如此,就要弄清楚,收回了多少贷款,取得了怎样的生产效益。假如贷款的50%给了贫农,大约50%给了中农,还有你们确定的给富农的比例……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比例不够。

加里宁:要我说,贷款的分配方式改变了,要知道我可是非常现实的人,从来没有分配过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换一种方式分配贷款,大约50%给贫农,49%多给中农,剩下的一点给富农,那会取得怎样的生产效益呢?我相信,这样北高加索会多生产大约5000万普特粮食。应不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呢?所有人

都会说应该。如果是那样,我要说,现在北高加索确定的种子贷款分配比例就会引起人们对其生产目的性的怀疑。

按照我提出的分配比例,非生产性损失就将是200万—300万普特。正像我对大家说过的那样,非生产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苏维埃国家。但在分配种子贷款时,必须尽力做到使其他农民阶层的显著生产效益能补偿非生产性损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分配数字是好样的。但遗憾的是,在北高加索看不到这种情况。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展示给大家的数字看起来很好。但是,对这些数字的分析和对其内在本质的揭示却使我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有人说,种子贷款的分配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对此我有点怀疑。因为我在这里给大家念的那些数字一方面确定了无产阶级和贫农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确定了无产阶级和中农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既然这样,我认为,当我们讨论这类问题和了解同志们的地方政策时,我们应该非常敏锐地对这一地方性政策进行观察,应争取使其真正成为阶级政策,使其真正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如果不加强工人阶级与中农的结合,这是不可想像的。当我研究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中农的政治方针时,我从种子贷款的分配上看到了这一方针的重大缺陷。如果中农只得到贷款的13%,那么我认为,这个贷款不多。我认为,从政策和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些贷款少,这个比例小。大家肯定会觉得,我对北高加索的同志们取得的成果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

总之,存在一些客观条件,这样说是对的。这些条件大概把种植业的产值降低了大约10%—15%。但是,如果我们拿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政策来说,那么……

有人喊[米高扬]:法律是你在莫斯科颁布的。

加里宁:我给您讲过了,法律是怎么执行的。

有人喊[米高扬]:哈,他已经作过解释了。

加里宁:我知道,分配贷款的政策很容易执行,它能给一个人带来好前程和好名声,通常都能。如果农业局局长分配了所有的种子,却没有收回,结果他会说……

有人喊[丘巴尔]:就是这么做工作。

加里宁:但是我认为,由于在座的都是中央委员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所以不能说,一切都不取决于我们。当然,像其他同志一样,北高加索的同志们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只是说:我们过去有一些错误和过火行为。同志们,不光是

这样。在这里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农业税也在其中起了作用。安德烈耶夫同志生动地表明,农业税征收的主要负担落在了14%的生产者身上,而这14%是生产者的基本部分,大概是这样吧?……

安德烈耶夫:是一小部分。

加里宁:这就是说,他们占全部生产者的40%,不少于40%。当我们的农业税重重地打击这部分生产者时,也就间接地打击了向14%靠拢的另外至少5%的人。这一点必须弄明白。当有关农业税的这部法律出台时,负责生产粮食的地方似乎应该说:“不,中央考虑的不周全,因为这个税会打击粮食生产。不能这样做。”我相信,如果坚持这样的立场,中央政府和党会被无数不能实行这一税收的电报淹没。同志们,没有这样的电报。

有人喊[米高扬]:相反,中央发出了很多电报。

加里宁:同志们,这说明了什么?对农业税的恐慌不是下面来的,而是上面来的。老实说,从我的角度来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好的政治兆头。

大家都知道,距离群众最远的是我们——中央,而你们离群众至少要近100公里或俄里。所以,群众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需要,理应由你们最先作出反应。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农业税几乎全部进入地方预算;而地方预算中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想办法堵上。这些说得都很对。但是,同志们,我们不只是经济工作者,不只是行政人员,我们还是政治家。(主席铃响)

喊声:延长时间。

有人喊:他自己要求打断他,不要让他长篇大论。

加里宁:我不反对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打断我的话,他是我的同事,和我地位平等。(笑声)

有人喊[奥尔忠尼启则]:他是社会活动家还是昏庸的官僚?

加里宁:肯定是社会活动家。(笑声)

柯秀尔:那我们是昏庸的官僚了。

有人喊:是中间分子。

加里宁:在您看来,首席贵族首先是社会活动家还是昏庸的官僚?(笑声)

柯秀尔:但要知道,我们是根据宗教的方针而不是贵族的方针采取我们自己的方针。

加里宁:您的意思是,您既是首席贵族,也是高级僧侣。(笑声)

有人喊:是都主教。(笑声)

加里宁(对着奥尔忠尼启则):你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现在由你来决定。

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不要跑题。

加里宁:我认为,当人们从事紧张的脑力劳动的时候(中央全会会议当然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有可能过度劳累,这时候稍微跑题不碍事。(笑声)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和我的同事有点分歧。(笑声)

有人喊[米高扬]:是原则性分歧吗?

加里宁:所以,同志们,……我刚才说的什么?(笑声)

喊声:说的是“衰退”。(笑声)

加里宁:同其他发言者相比,我的优势在于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鼓掌)所以,同志们,提醒我说过什么的是听众,而不是速记员。(笑声)遗憾的是,这一次大家提醒的不是我说过的。关于农业衰退,斯大林讲得非常清楚。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所以你们提示我说“衰退”是不对的。如果你们试图这样解释我的讲话,那就坚持到底:把“衰退”塞给关于安德烈耶夫同志报告的决议草案——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起草者吧。决议是怎么说的?是这样说的:“北高加索实际播种面积的总规模低于苏联的平均水平,只有战前的88%,种植业总收获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57.2%,粮食作物商品率奇低,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北高加索农业处于非常严重的状况。”(着重标记是我加的)根本用不着提“衰退”,北高加索农业无疑取得了成就。我所以没有谈这些成就,是因为安德烈耶夫同志已经作了相当详尽的阐述。

现在我都想起来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总政策,同样,任何时候也不能对农民群众的政治状况视若无睹。当然,在用错误理解的阶级政策辩解时,总是可以解释说:不是所有农民都不满意,只是上层对某些措施不满,或者说最上层和很小一部分中农不满等等。但是,同志们,要知道这样说是不对的。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每一项涉及农民的措施都将不涉及所有农民,而只是农民的某一阶层。我们共产党员在这方面不同于机会主义者。我们认为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所以,农民的政治状况对我们来说并非无所谓,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非无所谓。我认为,必须对此予以特别关注。

我认为,在已提出被政治局作为基础通过的决议中有很多多余的条款。说多余的条款很多,并不是说这些条款不需要,而是说由于有了这么多条款,使得粮食产值和种植业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不占主导地位。关于农村工作的许多条款都应该删除,例如第16条,因为这一条所规定的东西可以而且应该以特别指

示的形式推行,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它可以通过组织局和政治局相应决定的方式来实施。必须更加强调粮食问题,而不要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我认为,应当做到使北高加索的同志们和其他同志们看到这些条款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生产的气息。

我再谈谈我给叶伊斯克农业局局长上的那一课。我劝他说:“你是苏联生产者,你应该自觉地把一定数量的钱花在贫农身上,不能不这么做,否则你就不是苏联的生产者了。”对于他来说这是美国。阶级路线的本质就在于此,而根本不在于拿到什么就分下去什么。因为,如果只是分下去,意味着要么你只是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不是生产者,要么你只是个社保工作者。来了个好心的苏维埃大叔给大家分东西。这样做的意义不大!生产者不仅要为生产的前景操心,而且要尽心尽力地维护政治的利益。如果我们坚持这一方针(这个方针只有在地方同志们的强大支持下才能坚持得住),我认为,我们就能够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提高粮食产量的任务。

同志们,接下来我想就雅科夫列夫同志的发言说几句。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改善农业的措施的万花筒。关于这些措施我想说的大致是:我们都知道,做一个诚实的人很好,有好处,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不诚实的。

[柯秀尔:你这是暗指谁?]

加里宁:这是些普遍的、本身就很有说服力的建议,在这里没什么可说的。这说不说都无所谓,就像雅科夫列夫同志试图给我们证明水是湿的一样。但是,农民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实行这些措施的,那样农民简直是糊涂蛋,要不就是不会算计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如果说农民只是因为疏忽没有给种子消毒,这样解释有点可笑。显然,有更深刻的原因。

柯秀尔:是什么原因?叶伊斯克区的农民,请你揭开这个秘密吧,让我们看看。

加里宁:我不明白,你柯秀尔同志怎么会问有哪些原因,在通过的控制数字决议中可是白纸黑字、工工整整地写着:“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怎么,你忘了?

现在你们应该自己到各地去看看,怎样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你们让我做乡执行委员会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可能会把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召集起来,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上4—5个小时;告诉他们为了实现我们的阶级政策要推行哪些实际措施;显然,用冷漠无情的指示不能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们就会从真正的阶级政策转向纯粹的感情用事,就会自我取代社会保障机

关,而不能像真正的苏联生产者那样行动,也就是既考虑到政治的利益,也记住自己对贫农的义务。这样我就能得到地方党的机关书记和整个地方党组织完全的、明确的支持。有了这样的条件,我就能在实践中执行真正的阶级政策。你们要我现在就列举这些实践措施吗?问问雅科夫列夫吧,他会给各位说出一千条措施来。(笑声)同志们,请允许我就此结束发言。

主席:现在请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发言。

斯克雷普尼克:在我们的会议日程中我的报告的名称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振兴农业的措施的报告》。关于振兴农业安德烈耶夫同志说了一个半小时外加一个小时零几分钟,还是没说够。(笑声)但是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对农村工作却说得很少。没时间说了。(笑声)我担心,就像我有一次说过的那样,他们用北高加索运粮食的大车偷运不正确的农村政策。

喊声:噢!

斯克雷普尼克:应当认真地用心观察,他们在各个方面执行什么样的政策。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所以只谈一个问题,即北高加索在执行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路线方面奉行的方针。

奥尔忠尼启则:这与单位面积产量有关。(笑声)

斯克雷普尼克:加里宁同志说得对,他说,粮食问题就是我们的政策问题,正确的农村政策问题。不管你有什么正确的和好的农艺措施,但是如果你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出了问题,你为我们苏联就生产和贡献不了多少粮食。

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我们在北高加索是通过建立一大批自治州、专区等等的形式实行的,那里原先受压迫的民族,尤其是被沙皇政权征服的山地民族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苏维埃自治权。在发放的还是手稿的小册子《关于北高加索的农业状况和农村工作》中,例如,在第39页提出,自治州的情况同12个俄罗斯专区不相上下。北高加索党委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说法使我对他们的党的方针产生了疑问。

[奥尔忠尼启则:是彼得罗夫斯基的说法。]

根据中央统计局在一份大型月刊《苏联统计》中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北高加索各专区住着310万乌克兰人。同志们,你们把他们忘了。

[丘巴尔:他们没有专区。]

斯克雷普尼克:你们为什么在陈述自己的政策时,忘了你们边疆区310万乌克兰人这个不大的数字呢?1926年2月17日普查时,中央统计局试图把北高加索乌克兰居民的数量数据同1897年普查的数据作比较,但我拿不到可比较的数

据,因为在过去,革命前时期,沙皇政府伪造普查数据,即把乌克兰居民算作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

[奥尔忠尼启则: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

斯克雷普尼克:试问,现在北高加索的情况怎么样?这种观点现在不是还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吗?例如,有这样一件事,根据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928年11月16日在罗斯托夫市召开了“有科研人员参加的研究乌克兰语对库班居民是否适用问题研讨会”。

难道你们认为库班和苏联其他所有地区的乌克兰居民能接受这种类似政治讽刺的消息吗?

喊声:可耻。

斯克雷普尼克:对,同志们,真可耻!在为居民的自主活动开辟了广阔空间的十月革命已过去十多年的今天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有“科研人员”来参加这些问题的研究,真是可耻。这是一种讽刺,这表明,那里存在许多不真实和不正确的东西。需要对此进行修正。应当指出,由于沙皇政府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压迫政策,这310万乌克兰人中的相当大部分确实已经俄罗斯化了。在整个边疆区310万乌克兰人说俄语和混合语的大约有100万。

有人喊:一共是多少人?

斯克雷普尼克:一共310万人,其中大约100万人讲俄语或混合语,大约200万人说乌克兰语。这表明北高加索的同志们面临的任务是复杂的。

柯秀尔:说得对。

斯克雷普尼克:在那些由于百年压迫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地方,在一部分居民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但却说俄语的地方,这个任务非但不轻松,而且很复杂。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因此而十分复杂,但我们绝不放弃这些任务。210万乌克兰人说乌克兰语,而去年即1927年那里却颁布了一系列通令,禁止继续扩大乌克兰学校的数量,当然这些通令后来被党委会撤销。那里的初级中学数量很少,没有一所高级中学,也没有一所40人的中等师范学校。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打官司和办事——村民和粮食生产者来到苏维埃政权机关,只能用俄语交谈和处理公文。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1928年7月17日库班专区执行委员会就乌克兰化问题召开的会议的速记记录中有这样的信息,一会儿我念给大家听。

有人喊:他从哪里找到的?

斯克雷普尼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机关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的乌克兰人

说：“不要讲你们的鸟语，别乱叫，说你们该说的话。”

有人喊[米高扬]：噢，这样的人是无赖。无赖还真不少。

斯克雷普尼克：是的，只有无赖才会这样说。如果连这样的无赖行为都会发生，那我们北高加索的同志们应当用烧红的铁烙这些无赖。

奥尔忠尼启则：干嘛用烧红的铁，天哪，你怎么啦。

安德烈耶夫：所以烧红的铁不够用。

斯克雷普尼克：我认为，应当随时同党的路线的敌人进行严厉的对话，为此我们布尔什维克从不缺少钢铁般的意志。同时，由于这项工作做得不好，结果出现了下列数据：我们举一个专区为例，随便哪一个专区都行，就举顿河专区吧，在那里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克兰语的有9万人，其中识文断字的有419人。

有人喊[米高扬]：认识乌克兰文的？

斯克雷普尼克：20万乌克兰人中认识俄文的有3.6万人。

有人喊：太少了。

斯克雷普尼克：说得非常对，太少了。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表明，无论俄语和乌克兰语在词汇上多么接近，但只有用乌克兰人的母语开展工作，才能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即为他们新的自主活动创造基础。在无产阶级革命已过去十多年的今天，必须说说这个问题。必须对此进行讨论并在罗斯托夫和库班建立一个又一个委员会，必须讨论在那里是否需要在对待乌克兰语方面执行党的路线。同时，我们看到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大约三年前去过库班，据他后来说，他当时没弄清楚就说应该用母语即用库班语教育当地的孩子，而不要用乌克兰语。扎东斯基当时在报刊上回敬了他，扎东斯基正确指出：要是我们在奥德萨用当地的俄语教育当地的孩子，我们就有好看了。这不是母语，而是骂人语。(笑声)说这话的罗斯托夫的同志即科学院语言学学部院士候选人不要再操心骂人的库班话了，应该给居民提供学习和说母语即乌克兰语的机会。

我列举了一个专区的数字。如果你们再看看其他专区，就会吃惊地发现那些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顿河专区的12万乌克兰人中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克兰语并认识乌克兰文的有1913人。

有人喊：用俄语的呢？

斯克雷普尼克：总数为49.8万人的乌克兰人中认识俄文的共有14万人。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你们怎么看，但是我要说：在北高加索边疆区的这个“丹麦王国”，在执行党的民族问题路线方面做得不太好。需要在那里执行和保

持这一路线。

有人喊[布勃诺夫]:没有证明这一点。

斯克雷普尼克:这310万人没有一个村苏维埃。

有人喊[米高扬]:有的,有的。

斯克雷普尼克: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乌克兰语的有200万人,但他们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公文翻译成乌克兰语的乡执行委员会。请问,这样做对吗?我们在乌克兰经常听人说,似乎我们在乌克兰化²⁷⁸方面冒进了,我们做得太过分了,等等,拉林同志和其他人的文章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完全用俄语接受教育的孩子的比例完全符合俄罗斯族居民的比例,而用乌克兰语教学的中学肯定都教授俄语,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

[柯秀尔:那你想怎样?]

斯克雷普尼克:在我们乌克兰有多达几十上百个由俄罗斯居民主持并用俄语处理公文的村苏维埃。我们组织了由俄罗斯居民主持的区执行委员会,这些区执行委员会用俄语处理公文并建立了用俄语审案的法院和用俄语教学的学校。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谁压制俄罗斯居民的文化需求,实行乌克兰化,他就是不可宽恕的沙文主义者。以库班为例。那里的乌克兰居民是否得到了文化保障,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呢?请问,这是党的路线吗?不,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党的路线。1924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共(布)代表团根据政治局的决定通过了一项由专门委员会早先通过的关于乌克兰共产党党员和他们加入我们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²⁷⁹的决议,针对乌克兰共产党党员、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和不执行列宁主义政策的人的沙文主义论断,决议指出并强调了联共对乌克兰居民执行的正确路线,指出了一系列为乌克兰居民提供保障并最终消除他们在革命前的殖民地地位的措施。决议就是这样说的。我要告诉大家,决议中提到将毗邻乌克兰而且大部分居民为乌克兰人的区域并入乌克兰,比如顿涅茨克专区或者别尔哥罗德专区。我还要告诉大家,当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即罗斯托夫需要一个港口,于是将塔甘罗格专区从乌克兰分离出来,并入北高加索边疆区。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米高扬的错。]

斯克雷普尼克:告诉大家一个结果,在乌克兰居民多达80%以上的地方,移交三年半、四年之后,如今那里没剩下一所乌克兰语的中学,而从前有300所。

[布勃诺夫:难道塔甘罗格是乌克兰城市吗?]

米高扬:不,是北高加索的。]

斯克雷普尼克:亲爱的同志们,一些工作人员声称,哥萨克和外地人的阶层划分与民族划分的重合导致库班乌克兰问题的复杂化。例如,库班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马卡罗夫在我召集的一次协商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中部黑土地地区的数据推翻了他的说法,并且表明,在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库班地区3/4也就是大约75%的外地人都是乌克兰人。

亲爱的同志们,谈起不愉快的事情让人不愉快,公布这样的现象和信息也让人不愉快。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怎么成了小市民和庸夫俗子,竟然认为谁说存在丑事谁就是干丑事的人。

有人喊[米高扬]:什么丑事也没有。

斯克雷普尼克:要知道,庸夫俗子们全部默不作声,所有人都知道有丑事,但是谁也不说,似乎天下太平。要是谁说出了不能允许的、显而易见的现象,那大家就一定会说丑事是他干的,他是不合群的人等等。布尔什维克绝不能走这条路。我公布的信息只是我所掌握的信息的一部分,这些信息是我从中部黑土地地区的统计数据中,从罗斯托夫和库班的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中以及从在这里召开的讨论这一问题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得到的。我认为,为了保证今后农业的正确发展,必须保证在所有方面,其中包括在民族方面开展正确的工作。在这方面许多东西需要加以纠正。实际开展的工作在许许多多地方被曲解,结果使我们党的路线遭到扭曲和歪曲。

主席:现在休息,晚上继续开会。

第十二次会议

11月22日晚间

主席(彼得罗夫斯基):全会会议现在开始。按讨论顺序现在请鲍曼同志发言。

鲍曼:同志们,我请求“按规矩”多给我一点时间。

有人喊:行,给他!

有人喊[米高扬]:那么全体与会者就会对你说,你的规矩太多了。

鲍曼:我请求给我半小时……

有人喊:给他!

鲍曼: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无疑是一个内容十分全面、详细的好报告。虽然北高加索的情况有些特殊,但这个报告是对我们党的政治总方针的极好说明。

如果以1922年为起点,那我们无疑可以确定,农业发展了,而没有衰退。1925年是一个大丰收年。如果与1925年相比,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退步,但总的来说,北高加索的恢复工作仍然取得了进展,只是进展的速度非常缓慢。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谷物方面尤其落后。北高加索的报告中所引用的那些统计数字表明,除玉米外的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只恢复了75%,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5%—16%,从其他材料来看则下降得更多,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5%—30%。除玉米外的总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45%。谷类作物(黑麦、小麦、大麦和燕麦)的剩余商品粮只是1913年的22%。这无疑说明,北高加索,我国以前的粮仓,现在在粮食供应方面已经大大落后。所以,北高加索现在无疑面临着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这是一项必须坚决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在不断加强对富农的进攻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

关于秋播作物的初步材料表明,秋播地没有得到足够的扩大。所以,今年春天北高加索确实应当付出极大的努力,力争使春播作物至少增加10%—11%。

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无疑有广泛的可能性。

据安德烈耶夫同志讲,还有近500万俄亩适合耕种的土地,其中的50万俄亩打算由国营农场在5年内开垦。这样一来,在最近5年或10年内还需要开垦450万俄亩的土地,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这里,我想首先肯定从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整个报告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即完成这项任务与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任务有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北高加索的工作报告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一个原则:必须把发动广大个体农户即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同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农庄建设结合起来。个别同志有时仍然忽视把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任务同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认为集体化的任务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将来唱的歌,而生产合作化和与之相关的集体化是今天的、十分迫切的经济需要,因为只有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才是发动经济力量薄弱的农户的有力杠杆。合作社是一种现有的、可以帮助小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大农户的种种优势并最终把小农户联合成大农户的形式。如果我们根据农户的财产状况来看待北高加索的农户构成,那么很显然,除了使贫农农户集体化的方法外,我们不可能以其他方法来迅速发动这些农户。请回忆一下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中的那些数字,他们那里无马户占48%,无任何畜力的农户占36%,无农具的农户占40%,无耕具的农户占56%。怎么能够想象不通过生产合作化,而通过其他方法来大规模地发动这些农户呢。我们知道,向个体农户提供马匹和农具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我们也知道,通过个体供应的方式要用很多年才能把这些农户发动起来。

我认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十分客观地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北高加索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把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的任务同集体化的任务结合起来。

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对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工作不够重视。根据安德烈耶夫同志提供的材料,参加集体农庄的中农占集体农庄总人数的24%。同志们,尽管北高加索的分化过程越来越明显,但那里的中农仍是农业的主体。毫无疑问,集体化运动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贫农和中农的运动,它完全可以使贫农和中农结成反对富农的联盟。吸收中农参加集体农庄也有助于动员更多的资金,能使集体农庄得到改善、巩固并使其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当然,贫农应当成为集体化运动的先锋队。贫农不会向后看,向资本主义看,那里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贫农由于自身的艰难处境也绝不会停滞不前,他们一定会向前看,向社会主义看。中农可能表现出很强的戒心,也就是说,可能盯着土地,而贫农由于其经济处境必然要走向合作化和集体化。贫农是先锋队。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交给北高加索土地局局长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对的,在发放贷款时也应该考虑生产效益,我们应当成为苏维埃的生产者。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我们阶级路线的实质在于,我们在发放贷款时就预先舍弃给贫农提供的这部分贷款。仅此而已。

有人喊[米高扬]:这是必然的。

鲍曼:现在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不应该为贫农损失一部分贷款。就这一点来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教导得对,这是由我们党的路线决定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考虑到,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贷款把贫农农户发动起来,必须把贷款帮助与对贫农农户其他形式的帮助结合起来,与吸收他们参加集体农庄结合起来,从而使他们具有今后持久发展的可能性和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把这个意思完全表达出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这种学习就是完全正确的。需要的不仅仅是以社会保障的方式救济贫农,这不是我们的阶级路线的实质,而是要从经济上把贫农组织起来,让它能够继续持久地发展,而这只有在集体化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

此外我还想指出,根据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材料可以看出,参加集体农庄运动的党员和团员还不够多。党员数量非常不够。在北高加索只有1.7%,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党员总共只有13 600人,或者说只占农村党组织总人数的4.2%,占农民党员人数的14%。这是非常少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下达一项要求农民党员必须参加生产合作社组织,即其本人必须参加集体农庄或其他生产经营联合组织的指示。当然也可以不下达要求党员和团员必须参加集体农庄的指示,但是党员和团员必须成为集体农庄运动的发起者、领头者和组织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这是衡量我们那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是否具有坚定而又完全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同志们,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北高加索的重大问题是全联盟相当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农具问题。北高加索的农具数量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51%,所以,北高加索提出的在最近两年内为其提供1万台拖拉机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目前我们的农机具极其紧缺,应该赞成政府关于新建一座拖拉机厂的决定。我还想强调的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真正合理地组织工人阶级和农民,我们不仅以不断增加农机输送量的形式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商品,而且我们还可以得到从农村输送回来的商品。如果我们提供的是印花布,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整个农村提供换取农产品的商品;如果我们提供的是拖拉机、犁耙和无机肥料,

我们就能使几千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同样也会把自己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提供给我们。

尽管我们正在加快生产农业机器的进程并迅速把农业机器运到农村,但仍然要指出,与此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对现有农具的合理使用。这方面的一系列数字表明,北高加索与全联盟一样,就连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协作社的这项工作都进行得很不好。我认为,根据北高加索现在的农具分配情况,还可以提出下面一项任务。从报告中我们看到,5.9%的农户占有30%的农具,却只耕种14%的土地。无疑可以在这里提出有计划地把富农的农具用于贫农农户耕作的任务。春播运动期间北高加索有时这样做过,但不是十分顺利。例如,说好使用农具要付费,却经常有人不支付。所以富农,还有春天提供农具给贫农耕地的中农,不愿意再提供了。合作社无疑可以充当中间人,着手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利用富农这些农村上层集团的农具来耕种更多的土地。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向集体化前进,在这方面应当利用写入我国土地法中的那条原则,即土地法的第32条:土地共耕社有权以多数票决定让整个村庄改行土地共耕制。我可以举出北高加索的整个整个村庄在组织拖拉机队和实行预购合同制后改行土地共耕制的许多例子。我们在库班专区、捷列克专区、顿河专区以及中部黑土地区、伏尔加河中游区和下游区等地区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让整个村庄改行土地共耕制的想法正在变为现实。我认为,这同时也为更加有效地、合理地使用现有农具和我们购买大型机器的费用提供了保证。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对我们全国具有共同意义的一项成绩,这就是预购合同的迅速增加,北高加索签订了预购合同的耕地面积占42%。同时,尤其是在签订了长期预购合同的地方,实行了一系列农艺措施,如:取消地界、实行多圃制和合理轮作,改种精选作物,等等。

我们讨论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报告时,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争论:可不可以预购富农的作物?我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富农预购,因为预购就意味着确立国家监督,无产阶级国家对富农生产的监督。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特有的因素。列宁曾经(1921年)在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时说:我们这里有租让和合作社这样一些形式。的确,后来他又说合作社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接着,他谈到要把作为代销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这后两种形式,我们根本没有人谈过,根本没有人想

过,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这种情况的产生,倒不是由于我们又强又聪明,而是由于我们又弱又愚蠢。我们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所摆布。”²⁸⁰

这段话当然是针对1921年的情况说的。从那时起又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方面,在组织国家商业和合作制商业等方面已大大地向前迈进。但是,如果拿农业来说,难道我们在这方面没有许多落后的形式——宗法式成分和小商品生产成分吗?难道我们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分子、富农分子吗?肯定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即同富农农户签订预购合同,无疑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有很多闲置土地的地方,例如哈萨克,根据一定的合同把土地出租给资本家、富农或富农劳动组合,就像通常对待承种人的做法一样,也就是按份额提成向国家提供产品。

我不敢担保这种做法会收到什么实际效果。我认为,这类做法在原则上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实际地想一想,我们是否能够因此在最近几年内多得到几十万俄亩的播种面积并相应地得到几千万普特的粮食。

我们现在正在强调消除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在向富农进攻。但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向富农进攻、使富农经济服从我们国家调节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说我们在当前时期提资本主义成分,强调这一点,那么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排斥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成分。

如果有人提出,只要多得到100万普特的粮食就行,不管这些粮食是从哪里——从富农那里还是集体农庄那里来的,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不正确的、毫无远见的观点,它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但我认为,要是有人提出,我们绝不接受富农的粮食,让富农去随便处理这些粮食吧(这些粮食当然会被他们拿到私营市场上去投机或者去奴役贫农),那就太愚蠢了。这是愚蠢的。我认为,不妨考虑一下农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我只是把这一点作为问题提出来。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就曾经说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接下来我想着重指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他们把国营农场建设问题与为农户提供精选种子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在报告的第17页上看到,由于使用精选种子,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提高了。冬小麦每公顷增产2公担,春小麦每公顷增产1.4公担,燕麦每公顷增产1.2公担。这就是8—12普特。北高加索正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只是前进的速度还很慢。还应当让国

营农场再加把劲,在发展良种繁育合作社方面再加把劲。

在此我还想强调一下前面谈到过的那个基本思想,不能把集体农庄建设,不仅是集体农庄,还有国营农场建设,同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对立起来。这两项任务是结合在一起的。难道可以在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农民经济中生产出良种吗?不能,没有集体组织,不组建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这是不可能普遍做到的。正因为如此,在当前发展阶段,从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商品粮产量以及加强发动广大农户的手段来看,建立国营农场是经济上的需要,而不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党采取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在经济上确实是有根据的。

我不能不简单谈谈北高加索的一项非常有益的创举即农业命令制。命令一词在这里不十分合适,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把广大贫农和中农组织起来去实行无产阶级国家某些改良农业技术的措施。我们确实应该把苏维埃的农业问题小组、增产大会变成类似我们工厂的生产会议²⁸¹那样的群众组织。加里宁说得完全对,农民确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我们应当使农民群众的创造力通过各种途径发挥出来,依靠广大农民大张旗鼓地去完成、实现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产量的任务。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我所列举的种种因素毫无顾忌地、十分果断地得出结论:是的,我们能够把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产量的任务与向富农的进攻完全结合起来,从发动广大农户即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角度来看,从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而且能够实现这项任务。不言而喻,只有在竭尽全力发展我国工业,使农业有足够的机器并享受到发展国家电气化的好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只有在实行普遍的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采用预购合同制方法、建设国营农场、组织拖拉机队对土地进行机器耕作等基础上,才有可能彻底地、大规模地发动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现阶段经济上的当务之急,而不是什么未来的颂歌。谁把这项任务放到次要地位,谁就完成不了振兴我国农业的任务,同时也就看不到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我国农业的未来。

其次,为了促进个体农户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无疑应当使我国有关农民经济的法律,首先是农业税和公益捐方面的法律,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要使法律成为农民生产成本核算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可能对这个问题谈得不太透彻,于是弗鲁姆金同志在信中引用了我说的话,而且还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可以以某种形式……同富农签订预购合同,也可以确定今后三年的农业税税额,同时要求最大的、资本最多的谷物种植户按固定价格向我们出售一部分粮食”。²⁸²弗鲁姆金

同志还把米高扬同志扯进来,认为这种想法表明“有人准备通过确定三年的税额来安抚富农,使对他们的积累的剥夺保持稳定,只要能得到粮食就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稳定税额,是对广大农民群众实行更稳定的征税政策。既然对富农征收个别税,那么对这些富农,至少是它的上层的征税就可以有相当大的浮动。我认为这种观点基本正确。米高扬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说,有些地区的新增播种面积应当免税。我认为,这个问题也要考虑。总之,主要意思就是使税法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做可以更大地刺激农民生产。

第三个结论是,我们应当通过实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实现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来坚决消除资本主义成分,帮助贫农在经济上摆脱对富农的依附,大力限制各种形式的剥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要消除资本主义成分,也不意味着我们拒绝通过把这些资本主义成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对其加以利用。

现在让我来谈谈边疆区委员会领导上的一些情况。首先,到过北高加索的中央督导员诺维科夫同志指出,今年春天之前边疆区委员会很少关注农业。他对库班专区委员会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最近一年来,边疆区委员会完全修正了这一方针。但是,如果看看关于农业税执行情况的一些材料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是犯了许多错误。例如,从一些经济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征收个别税²⁸³的情况看,我们征收的税额比经济力量较强的地区高很多。这项工作最初做得有些过火,而现在可以说有些欠火候。北高加索的富农比例比我国其他许多地区都大,而这里被征收个别税的富农只占农户总数的1.6%。此外,我们一方面向富农征收的个别税很少,另一方面却又向人口多的中农农户征收个别税,例如向有小牲畜,尤其是有小马的农户征收个别税,这表明地方组织不了解农村的阶级敌人到底是谁。这是利夫希茨同志提供的材料。

接下来说说公益捐²⁸⁴。你们的征税量最大(近40%来自农业税),但三分之二的税款至今没有使用。农民甚至不知道这些税款要花到什么地方。既然三分之二的税款没有使用,既然农民常常不知道钱的去向,又怎么能开展接下来的公益捐运动呢。

另外,必须指出去年粮食收购期间对中农采取的一系列过火行为。根据第107条,有1600多个中农被判罪。这一切当然表明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然而边疆区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贫农在村苏维埃和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中占多数。关于农业合作社是这样说的,在我们的管理委员会中,贫农占62.5%,中农占34.5%;关于村苏维埃——贫农占57%,中农占

37%。在消费合作社中贫农的比例小得很,只占约30%。这一点值得认真思考,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认为不准确,况且您安德烈耶夫同志说,苏维埃机关中混进许多富农,对合作社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那里有近32%的不称职者和社会异己分子。我认为,完善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任务也是一项阶级任务。特别是我们在贫农工作方面,在普遍开展农村社会政治工作方面,做得还不好。据督导员统计,在庫班只做了25%的贫农的工作。农业合作社的贫农基金²⁸⁵利用得不够——仅为48%。我们还看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要召集富农(而不是组织贫农)来对付富农的反抗。例如有这样一个决定,斯捷博里耶夫斯基村的党支部书记召集了71个富农,他们作出决定:我们、富农和富裕户,从今天起不再进行任何反苏维埃宣传,等等。(笑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定。没有提出在贫农中组织贫农小组、开展群众工作的任务,却去劝说富农当听话的孩子。谁能保证富农明天不会进行反苏维埃宣传。指望这一点是愚蠢的。同样,如果拿雇农来说,我们的工作也做得极差。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在入社的21.6万人中总共只有7.5万个雇农,约占35%,同样,签有劳动合同的雇农不超过8万人,即不到40%。我们看到富农无耻剥削、任意压迫雇农的许多事实。例如,在斯塔夫罗波尔专区的季温斯克区,牧羊人的报酬从5卢布增加到23卢布,有个富农就为此杀了他的牧羊人。我们看到富农百般嘲弄、极力剥削雇农的许多事实。

我还想指出其他发言人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在北高加索乃至全苏联,雇农的文化教育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例如,在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乌拉尔、库尔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等省,不识字的雇农有31.4万人。按照扫盲计划,打算只给3.2万人扫盲。以这样的速度给雇农扫盲,得需要10年的时间。

洛佐夫斯基:在这期间还会增加新的文盲!

鲍曼:同时,在萨利斯克专区——北高加索雇农和农业工人集中地区,取消了20个扫盲站。这样做非常不对,应当更多地关注扫盲工作和雇农文化工作。苏维埃农业问题小组的工作也做得不好。特别是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长时间不开展工作,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农业问题小组的工作安排得很不好。我不能不说说我们党组织在领导方面热衷采用行政命令手段的问题。曾到过那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塔兰尼科夫同志列举了一些事实,例如,有个地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发布如下命令:“每天至少要逮捕15—20人并向我报告这一情况。”这当然是一个少有的行政过火行为的实例。

斯克雷普尼克:这不是过火行为,而是专横行为和愚蠢行为。

丘巴尔：以什么罪名逮捕？

有人喊：凭什么这样摊派？

鲍曼：就是这样摊派的：为了加强粮食收购工作，每天至少要逮捕 15—20 人。

喊声：在什么地方？这是在什么地方？

鲍曼：在库班，在乌斯季拉宾斯克地区。

而且，去过那里、去过北高加索的诺维科夫同志也这么说。

喊声：他去过哪里？

鲍曼：他去过库班专区和斯塔夫罗波尔专区。他说，在苏维埃机关中常常可以看到非常粗暴的态度，工作人员不愿意同农民交谈，等等，所采用的大多是行政命令方法，因此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不满情绪、甚至仇视情绪不断增长。当然，这里可能还有其他内在原因，但苏维埃机关工作中无疑存在着这个问题。除了这些行政命令方法以外，我们还有许多经济犯罪以及道德败坏的事实。例如在库班专区，农村的共产党员利用清理富农财产的机会收购这些财产，不仅是收购单件农具，还收购整座房屋。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一些道德严重败坏的事情。例如，曾经为负责人员设立了一个专门聚会的地点，结果聚会地点的女负责人受到惩处（判刑 5 年），而负责人员却没有受到惩处。的确，这件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所以，在我们这里无疑存在着一些与通常所理解的右的和左的倾向完全不同，却又与它们有一定联系的倾向，有经济犯罪，有同富农的勾结，有道德败坏，同时还有行政命令手段。结果，这使得贫农、雇农以及中农中的群众工作开展得不好。所以，没有给富农势力以应有的打击。这无疑与各级组织的社会构成有关。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强调指出，在农村基层组织中职员占有很大的优势。此外，在农民党员中约有 5% 的富农。这是党员中的情况。总之，这些材料可以说明我们整个共和国的情况。

从柴斯杜格同志根据中央委员会统计处和农村工作处的计划整理的中央统计局调查材料看，在俄罗斯联邦，富农分子在农村共产党员中占 4.5%，在乌克兰，富农分子占 5%。

有人喊：那雇农呢？

鲍曼：正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雇农在整个北高加索组织中占 2%，在农村党员中占 7%。有些农村组织中的雇农更少。因此，吸收雇农和贫农入党的任务是改善组织的社会成分并纠正各种思想倾向的一项战斗任务。

我最后谈谈农民的情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再次提到弗鲁姆金同志，

他曾引用我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对农民情绪的评价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引用的是我发言中的下面一段话：“我的基本结论是，贫农离我们远了一些，因为我们不能养活他们；中农离富农近了一些（着重标记是我用的），因为我们在很多地区对中农采取过分的行政手段，富农因此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巩固了自己在农村中的阵地。”²⁸⁶

于是，接下来弗鲁姆金同志写道，这番话比他说过的话要尖锐得多，因为他只是说“中农不再理睬我们”。争论的不是用词问题。我说“中农离我们远了一些”指的不是所有中农，而只是中农里的某些人，也不是完全附和富农，而是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粮食价格问题上反对采取非常措施等）附和他们。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农村政治状况恶化已得到中央七月全会确认。

弗鲁姆金同志下一次应该更准确地引用别人的话。我就这个问题接着说道：

“但是，当然绝不能由此得出我们已同中农断绝联系的结论。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同中农的关系有些疏远，有些紧张”，接着，我对奥新斯基同志和斯捷茨基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提这一点是为了不再让弗鲁姆金同志说出曲解的话。对集体化、国营农场建设、国家工业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当前阶级斗争性质的不同理解使我同弗鲁姆金同志产生了很大的隔阂。不过，在本次中央全会上，弗鲁姆金同志在这方面已经作出应有的评价。再接着谈一谈北高加索。诺维科夫同志的材料里说，中农仍然经常保持沉默。安德烈耶夫同志讲，中农现在说话“超出了规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他的话。我们会认为农村的政治状况与春季相比已经改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完全同意安德烈耶夫同志得出的那些结论，农村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富农与我们争取对中农的影响的斗争正在进行并具有一些新的形式。

除了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里非常正确地谈到的那些形式外，我还想指出宗教方面的斗争之类的形式。宗教信徒乃至整个教会正在起着富农的思想家的重大作用。这一点不应当忘记。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计划、实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的工作以及集体化工作无疑正在成为已经尖锐起来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焦点，这无疑是在向前迈出了一步。农村的阶级斗争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我认为，我们在听取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以后，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使北高加索重新成为我国的粮仓。古罗马人曾经说：迦太基国家应该毁灭。他们每天都重复这句话。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同样坚持不懈地、充满信心地说：北高加

索应当重新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粮仓。(鼓掌)

有人喊:说得对。

主席:现在请丘巴尔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克利缅科同志。

丘巴尔:我认为,我们听取的有关北高加索农业情况的报告表明,我们解决发展北高加索农业的问题确实有些晚了。既然苏联中央统计局在这里分发的这本小册子第52页上写着:1925—1926年度北高加索的粮食总产量为53000万,到1928—1929年度下降到32700万,逐年下降,那么苏联中央统计局必然会提示,那里不是遭遇了特殊的自然灾害,就是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喊[米高扬]:问题是遇到了自然灾害。

丘巴尔: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先于我们了解情况的中央统计局机关就必须提出如何处理、弥补这一缺损,如何消除这一不幸所造成后果的问题。如果我们在总产量下降的第四个年头才转身面对这个缺口,我认为就有点晚了。这自然包括北高加索,也包括我们的草原地带,那里的情况几乎相同,可能要好一些,因为那里的播种面积差不多已恢复到战前水平,那里无地可种的农户的数量也少于北高加索,等等。这两个地区的谷物业占大田种植业的90%以上(例如,我们那里为95%),这些产粮区应当受到关注,不要等到第四年出了事才祷告,而要通过连贯的、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不让自然力左右我国这些最重要的产粮区。我们现在需要弥补损失。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两条途径来弥补损失。第一条途径就是某位同志,好像是克维林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国家提供的拨款、拖拉机和投资。这条道路已经相当成熟,通过这条途径已经输送了无产阶级的很多钱。第二条途径是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发展其生产潜力并结合无产阶级国家提供的资金来利用这些潜力。我认为,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的重要性在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的是,党已经转身面对我国经营管理方面、经济方面的弱点,面对解决整个工业化问题方面的弱点(因为没有粮食就不能实现工业化),党已经转身面对这个弱点,并将产生足够的力量和能力,使农民内在的生产潜力比以前更好地得到利用。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在我国生产资源的现有条件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它应当盖过对联盟预算、共和国预算、整个国家预算的一切指望和一切要求。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主要的,而且要让地方工作人员——从村庄到州和共和国机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仅计算需要几千台拖拉机、需要投入几百万预算资金,而且要让他们监督这些钱中的每一戈比是如何使用的,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戈比吸纳了农民的多少卢布;农民的劳动、农民的能量、农民的

组织程度。我们要集中力量做这件事,在这方面我也应当指出,我们耽搁得太久了,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任务,而我们只是到现在,在一年以后,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春天将要过去,看来只有到明年秋天我们才能百分之百地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了。北高加索今年夏天在谷物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无疑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多。这是北高加索各级领导机关的功劳,秋播运动前和春天到来前都开展大量自下而上的工作。这项工作无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有许多问题,它们不仅是北高加索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草原地区的问题,联盟的其他地区也需要注意这些问题。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在上一次全会上我曾对关于国营农场的决议提出修改意见,认为国营农场作为生产种子、用改良种子帮助改造农民经济的单位的作用已显现出来,然而这一作用没有引起你们的重视,因为当时种子问题在发展我国农民经济中的作用被低估了。我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在三个月后的这次全会上,我们将把国营农场的这种作用写进每一项决议中,并且会写上,要让发展整个谷物业方面的最重要的工具——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起到主要作用,而不是次要作用。这对快速发展农民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民经济是绝对必要的。

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引用了表明精选种子流失情况的图表,在口粮不足、生活没有储备粮的情况下,这个图表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应当在每个集体农庄、每个国营农场、土地合作社中,在每个地区和专区、每个边疆区的计划中,多多关注种子问题:哪里能弄到种子,什么样的种子,把种子给谁,等等。有些专区,有些地区,把钱花在了毫无效益的小工业企业上,而对农业工作根本不关心。现在,应当力争让中央在种子问题方面提出的方针在今年冬天贯彻到最基层,以便在春天不失时机地做好明年秋季运动的准备工作。

至于农民经济,安德烈耶夫同志提出了非常正确的观点,即我们需要过问这件事。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观点。问题完全在于如何过问,运用哪些杠杆,而且还要小心别在这方面做出蠢事,因为任何疏漏、任何错误都会毁掉计划采取的重大措施,虽然我们认为这项措施没有丝毫问题,但它可能受到农民和小私有者的抵制。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在某些地方第一次播种了冬小麦,因为我们认为应当发展小麦生产。当年小麦就冻死了,有些种过小麦的村庄今年秋天拒绝播种小麦。你们以强制手段实施一项措施试试看,如果这项措施失败,那么一切都会归咎于苏维埃政权,大家不仅会反对这项措施,也会反对其他措施。在这方面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在适当的地区实行一定的农业基本措施还

是需要的。我认为应当这样循序渐进,既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业还处于低水平,那就让我们首先极其坚决地、极其认真地来努力做这件事。只要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取得实际成果,农民中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实行我们的措施。另一方面,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当在种子、机器、机耕地方面更广泛地帮助附近的农民。我们也应当经常不断地向已完成土地规划的合作社和与我们签订了播种合同的人提出一些小的要求。

我认为,安德烈耶夫同志强调发展集体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十分正确的,但提出的理由不正确。他说(我手上没有准确的原话),一个中农问,既然他不能成为富农,他将往何处去,当人们对他讲,除集体外你没有其他前途,他就加入了集体。

安德烈耶夫:是生产合作,而不仅仅是集体。

丘巴尔:对,是生产合作,包括加入集体和公社。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有点矛盾,因为按照这个理论富农是最没有前途的,他应当最早加入这种联合。这就是说,在我们有组织地建立社会主义农业阵地的初期要引狼入室。我认为,应当把重心转向另一方面:中农不是由于没有前途而需要被拉入集体,由于没有前途而需要被拉入集体的是贫农,因为在最近几年内,根据他们的和我国的物质资源来看,他们不可能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改善自身状况、摆脱富农的奴役性剥削。

应当让中农加入,让他觉得他在集体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将比他在单个经营时有更大的增长。这一提法已写进七月全会的决议。这是列宁的提法。列宁多次说过,参加集体应当是自愿的,当集体真正显示出强于个体分散经营的优越性时,它就会得到发展,就会深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从这方面来说,我们应当这样来实行集体化:要让现有的和新成立的集体拥有充足的资源——机器、贷款和有组织的供应。只要他们正确使用这些资源,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商品率和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使贫农和中农群众强烈渴望参加集体。应当在我们所有计划和实际措施中把这一点摆在首位。我们已经向贫农证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我们还应当向大部分中农证明。应当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没有生产的社会化,无论他们怎样发展自己的分散经济,都不能克服自然力的阻碍,不能转而建立快速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技术基础。在此我想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中的一段话,他说……

有人喊:第几卷?第几页?

丘巴尔:第1卷。你们找找页码,因为通读全卷有好处,而不要只读某一页。

(笑声)马克思在谈到“联合力量”的优势时说: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和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²⁸⁷

这一原则在简单操作中容易掌握,但是,要使农民群众转到社会化生产的轨道上来,就需要让这一原则深入到他们之中去。

尽管个体经济是强大的中农经济,同自然力的斗争(特别是在农业中),争取加强技术基础和掌握科技成就的斗争,靠个体经济是不行的,即使是强大的中农经济也不行。从这方面来说,合作化、社会化、生产联合是农民摆脱贫困和不文明的唯一可行的出路。我们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努力加快社会化的进程。

沙茨金:这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协作!

丘巴尔:这是“联合力量”的普遍原则。我这里说的不是合作社运动的形式。

有人喊:他说的是简单合作。

丘巴尔:请原谅,简单合作也可以从量变转为质变。我们仍然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最简单形式的劳动集体的巨大作用,却想马上成立高级形式。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当地的准备情况、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来成立联合体。这样,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建立高级形式的联合体。如果不这样做,如果只想建立最高级形式,那我们就利用不到丰富的物资,这些物资是我们向更有效地劳动、更正确地使用耕畜和农具等过渡而首先应当利用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雅科夫列夫同志在发言中对争取提高产量提出的建议和看法。应当说,我完全承认我们国内资源对发展我国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作用。我们自己也盘算过如何使明年的粮食总产量不是比今年提高10%,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今年的收成很低,而是比近五年的平均收成提高10%,并且是按1927年的播种面积即最大的播种面积计算。已经清楚的是,我们在乌克兰只能把播种面积扩大2.5%,因为我们现在的播种面积已经略高

于战前水平,而且没有闲置的土地。靠什么来扩大这部分播种面积呢?靠的是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因为我们有20%以上的不宜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使用。这就需要改变农民经济的结构并使某些经营过程社会化。

扩大这部分播种面积可以让我们的总产量增加3.5%,通过采用雅科夫列夫同志说的那些简单的农艺措施,我们就能增产6.5%。这些措施简单易行,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完全能做到的,可是有人却对这些措施不屑一顾。应当克服对存在于我们身边却极少被我们利用的这类“小事”的轻视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顺利提高产量。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你们总对我们说国外的情况!国外有化学工业,有机器,等等。”而我在国外看到的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用两匹马拉的犁耕地,土质很差。我还亲眼看见广泛使用粪肥、泥炭和清洁桶里的肥料的现象。

有人喊[米高扬]:这是他们故意做给你看的。

丘巴尔:不仅我看见了,其他同志也看见了这些情况。

在进行了那种“化学化”以后,在进行了那种耕作以后,还要用镰刀割。当然这是对小农和小生产者而言,那里的小农和小生产者约占30%,但是他们收获的产量比我们高1—2倍。我不再举国外的例子了,但我还是要说,我们提高产量所需的内部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利用。为了不重复雅科夫列夫同志的话,我只强调指出我们在“自产”肥料方面的潜力。我们那里到处都是死亡牲畜遗骨,而且很少能看到有人去拾捡它们。一普特骨头几乎就相当于一普特过磷酸钙肥料。将骨头磨成粉末撒到地里无须大笔开支,而增加的产量不比施过磷酸钙肥的地少。

说说粪肥。我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应当给土地施粪肥,于是农艺师们对我说,在农民住房没有任何东西可取暖的情况下,怎么把粪肥运到地里。结果,波尔塔瓦试验站确认,焚烧粪肥、麦秸和向日葵后得到的草木灰含有2%—3%的磷酸,也就是肥料所需的磷酸。我们脚下白白踩着几百万普特我所说的那种肥料。我们在这方面是多么的无知,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去年我们实行了大规模的预购计划,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了各个共和国的计划,苏联人民委员会讨论、争论过预购向日葵还是啤酒花的问题,没有采纳我们预购小麦种子的建议,而且在乌克兰的计划中,也许还有俄罗斯联邦的计划,没有预购羽扇豆这种作物。其实,这种生长在波列西耶的作物在沙土地上可大大提高产量。一普特羽扇豆粉相当于30普特粪肥。如果施用羽扇豆粉肥料,每普特羽扇豆粉可以使马铃薯产量提高8.7普特,使黑麦产量提高2.2普特。可以用粉施肥,也可以用茎

叶翻耕,这在沙地、沙质土壤上是最重要的施肥方式。去年我们没有预购这种作物。今年,我在同农艺师商量如何提高产量时偶然提到了它,而我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我们苏联的沙地很多,应该到处种这种作物。还有泥炭,泥炭其实也是肥料。各地有很多资金,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发挥主动性、向群众普及农艺知识来使用它们,而不必大手大脚地花钱。

最后再概括地谈谈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那些建议。大部分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给予支持并坚决地纳入我们的日常计划中,甚至可以颁布相关法律。我对是否需要在本次全体会议上规定五年内增产30%或35%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估计,我们还要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五年计划,也许在讨论后我们会把增幅从35%提高到40%,可能某些农作物的增幅要提高到50%。不应当在这次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必须在此提醒一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全面制定五年计划的指示在我们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我遇到过这事,例如审议乌克兰五年远景规划。当时也曾建议我们到五年计划末增产13%,在施加压力后,便可以增产22%。我认为,在各地认真制定计划并为此动员一切力量后,也许可以使产量增幅达到30%以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所有地方组织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这样成功就会有保证。

现在再谈谈关于成立对农业进行调节并制定农业计划的全联盟机构的建议。这里说的当然是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²⁸⁸。由于农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个人不反对成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但有一个条件:这个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不能阻碍工作,不能当监护人,而是实实在在地制定计划。同志们,我们现在有什么呢?今年的预购计划至今还……

有人喊[米高扬]:在人民委员会里放着。

丘巴尔:很遗憾,还在人民委员会里放着,我们还没有计划,而且我认为,我们在中央机关通过这些计划、讨论计划的细节是在浪费时间,而不是带着总的计划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工作中去并保证及时制定必要措施来更好地完成计划。因此,不仅要提出成立一个机构的问题,而且要提出让它制定什么计划、发挥什么职能的问题,要让它作为强有力的杠杆帮助完成各地进行的工作,而不是阻碍和扰乱工作,这种现象在具体工作中经常出现。

雅科夫列夫同志提出的关于向农村提供农艺书籍和加强农艺知识宣传的建议值得特别注意。安德烈耶夫同志强调农艺师作用的重要性完全正确,但是,同志们,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如果不坚决改进在农村推广农艺书籍和报刊的工作,不消除我们的积极分子中不懂农艺的现象,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不发生根本的

转变,那么农艺师就会落后于实际生活,而且一个人也不可能为所有人服务。

的确,我们正在教农民青年识字,在成年人中扫除文盲,建立农村阅览室、图书馆,我们有无线广播,向人们灌输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很少向群众传授必要的、实用的农艺知识,很少普及这些知识。应该让我们所有的报刊、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更加关注这方面,哪怕腾出一小块版面也行,这样我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我就不在这里谈北高加索委员会在农村的工作了,因为时间不够。我已经占用了这么多时间。但是我认为,他们那里的农村工作做得不好,因为生产成效很低。这大概不是由于民族政策不得力和不够正确,而是由于我们普遍的弱点,即我们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开展群众工作不力,这对全联盟来说是一大不幸。我们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对群众工作的作用、对农村生产工作的作用估计不足。现在,北高加索的谷物业的水平已大大降低,我们的草原地区谷物业的情况也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这件坏事会对我们产生相应的推动力,只要我们重整队伍、动员力量,利用我们国家的资金并动员农民的资金,就会走上开展创造性工作、弥补我们在谷物产量上的缺口的宽广道路。到那时,安德烈耶夫同志许诺的1.5亿普特和彼得罗夫斯基许诺的3.5亿普特都会成为现实,无产阶级国家将卖掉这些粮食,不仅是供应国内市场,还要出口,然后运回我们需要的机器和拖拉机。

主席(李可夫):我这里有两张纸条。一张建议不要再进行讨论了,另一张建议进行讨论,但要考虑到今天还要听总结发言。

有人喊:对。

主席:经过同安德烈耶夫同志商量,由波格丹诺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柯秀尔:有一个人的嗓子已经哑了。

主席:一个人嗓子哑了,而另一个人想得到40分钟到1小时的时间发言。我建议继续讨论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报告,今天要把这个问题讨论完。没有不同意见吧?现在请克利缅科同志发言。

克利缅科:我完全没想到雅科夫列夫同志的第二个报告讲了一个半小时,而且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批评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土地机关的工作。

有人喊:毕竟是工农检察院。

克利缅科: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要袒护我们的某些土地机关,而只是要说明我认为雅科夫列夫同志没有完全弄清楚和使全会参加者产生误解的那些问题。

加里宁:这是客气话。

克利緬科:既然有两份报告,既然农业人民委员部与这两份报告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我就请求至少给我半小时时间。

主席:不行,这通不过。

有人喊[米高扬]:先讲15分钟,然后视情况再说。

主席:已经决定要在今天下午的会上讨论完这个问题,我不会再就任何问题提议表决。15分钟一过就不让发言人继续说了。

克利緬科:我无法对雅科夫列夫同志报告中的一系列问题都作出答复,我只谈两个问题——迁移问题和土地规划问题。从雅科夫列夫同志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迁移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合算,而且似乎用不着这样做。我们不仅要从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待迁移问题,就像雅科夫列夫同志想象的那样,还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是如何安排的呢?我们主要是向远东和西伯利亚迁移。往远东迁移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远东的谷类饲料供求状况非常糟糕,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谷类饲料的供求状况,即不再从几千俄里外的其他地区调运粮食。第二,向远东迁移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正在向远东迁移,这对处于边境地带的整个边疆区构成政治威胁。

有人喊[米高扬]:听说远东的人正向这里迁移,是吗?

克利緬科:这两点向我们说明,对向远东迁移的问题不应当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至于向西伯利亚迁移,我们考虑的是可以去开采原始森林。一片林子一代人只能开采一次,第二次就没有什么可开采的了。国内战争时期在中部地区开采了很多林子,我们现在的砍伐量也非常大,而我们国内和出口需要越来越多的建筑材料。

有人喊:这是最主要的。

雅科夫列夫: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花了800万,搞迁移却花5100万,这合适吗?

克利緬科:这些年用于迁移的无偿拨款为33 546 880卢布,需偿还的贷款为22 059 280卢布,安置了332 955人或60 540户。

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创造条件去尽快地开采原始森林,也就是接近原始森林,同时开垦靠近原始森林的大片闲置土地。向西伯利亚迁移对我国将要开展的大规模建设有着极大的经济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土地规划问题。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在报刊上反对分迁,并建议进行某种简单的土地规划。

在主要产粮区,农业的问题首先是离田地太远。例如,北高加索 68.4% 的农户到田地的距离在 7 俄里以上,33.5% 的农户的距离在 15 俄里以上。因此耕作质量差,田里杂草丛生,结果收成非常少。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有乌拉尔和萨马拉省的一些材料,那里进行土地规划后,田地至农户的距离缩短到原来的五分之二至七分之一。结果,已完成土地规划的合作社的播种面积平均扩大了一倍,即每户从 4 俄亩扩大到 8 俄亩。中耕面积从 8.3 俄亩扩大到 11.5 俄亩。后来有 72% 的已完成土地规划的合作社改为多段轮作制。在这些地区,为每一个农户进行土地规划需要花费约 13—15 卢布,而缩短下地距离后每户可节省 70 卢布。

应当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经济由于革命而受到破坏,并因此有了很多无马户和无农具户。此外,在革命时期我国农田荒芜状况非常严重。安德烈耶夫同志昨天在会上说,应当把田埂的杂草割掉,但是在北高加索几乎整块地都是田埂,那里到处杂草丛生,不只是田埂。田地远离农户是经济力量薄弱的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发展的主要障碍。要进行耕作,要除草,可是中农农户和贫农农户非常缺少农庄内部交通工具。在革命前时期,大型经济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交通运输能力强,农具有充足保障,土地使用情况稳定,田地远离农户还没有成为一大障碍,经济不断发展。但由于革命那里的经济遭到破坏,有一半是无马户,有 58% 的无犁户,于是这种距离就成了改善经济、提高产量的主要障碍。我认为,在土地多并有大型村庄的地区搞土地规划,搞分散迁移即让农户迁到离土地近的地方,这是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经营的起码条件。因此,对土地规划和分散迁移的投资会产生极大的效益。应当指出,在这件事情上,除了国家投入的资金外,农民至少也要投入自己的一半资金。

雅科夫列夫同志谈到了农业方面的科技工作和科研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赞同他的意见——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工作。

更确切说,我们在这方面还在采用手工业方式。试验工作多少作了一些安排,但在科研的技术工作和与国外的联系方面,即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我们几乎没有人做任何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不仅与北高加索有关,也与全联盟对农业的调节有关。在改造时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和农业恢复期结束后,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项主要工作。全联盟的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正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在这些机关中没有农业代表,没有从事这项工作并为此负责的机构。应当考虑一种代表形式,但形式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

质,而这个实质就是,要有解决制定农业计划的主要问题的一个全联盟的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中要有农业代表。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北高加索问题。与其他地区相比,北高加索在农业方面所处条件最困难。如果说北高加索在经济作物方面、在畜牧业方面的发展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致相同,那么它在谷类作物方面则非常落后。而北高加索是以谷物业为主的地区。

那里的播种面积相当于1913年的75%,总产量相当于40.8%,在战争和革命时期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15.7%。于是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历史事件影响了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农业,但我认为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北高加索的机器供应率为战前的50%,而农户几乎多了一倍。原来机器供应率为每俄亩播种面积21卢布,而现在为12卢布。无犁户占58%,无农具户占41.5%。这里的机具极其缺乏。土地耕作在北高加索是最重要的事情。那里没有矿物肥料,可能连育种水平都很低,土地耕作具有重要作用。从土地杂草丛生这一点看,北高加索具有极大的“生产能力”。那里田埂密布,看来那里的土壤中有无数的草籽。为北高加索补充短缺的机器和畜力——这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首要条件。

除了加强机器和畜力以外,还要提出土地规划、分散迁移以及稳定土地使用的问题。如果没有土地使用的稳定,就不能清除杂草,而北高加索的杂草正在侵蚀粮食作物。无论如何必须力争让土地的使用保持稳定。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农业合作社建设和播种运动问题。现在实际上实行的是取消基层合作组织即农业信用社的路线,而农业信用社兼管着合作社系统的贷款、生产资料 and 无须采用专门农艺措施的主要农产品,也就是粮食。现在成立的其实是一些小区域的机器联合会,也就是说,机器和贷款不再由基层机构管了。还成立了一些小区域的临近火车站的粮食合作点,这就是说,与贷款相关的粮食也不用信用社管了。因此,农业信用社的作用正在逐渐丧失,它们将不再是农村主要的基层合作组织。工作越来越分散,我们在以生产的社会化为基础开展大规模生产合作化运动方面、在利用信贷和机器这些主要杠杆方面的阵地越来越不稳固。对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注意。现在还有另一种情况。例如,在信贷方面,库班专区的情况是这样的:58个农业合作社购买机器的情况为:集体农庄占88.5%,个体农民占11.5%,给集体农庄的贷款为236 914卢布,给个体农民的贷款为30 586卢布。

鄂木斯克专区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去年个体贫农的贷款份额为29.7%,今

年,截至1928年5月1日,他们得到的贷款份额为8.6%。中农去年得到的贷款份额为63%,今年为12.4%。集体农庄去年的货币贷款份额为5.5%,实物信贷为38.5%,今年为54.3%。这就对农业信用社构成了危险,因为那里的每个人股者都要为自己协作社的贷款承担10倍的责任。结果是,我们把给个体农民——贫农和中农的贷款份额大大减少,减少到11%—12%,而他们承担的却是全部责任。既然在协作社里个体农民占多数,看来就应当纠正这些偏差。因为任何指示中都没有提到过个体农民之间和集体农庄之间的这种关系。

必须专门研究合作社建设中的组织问题,并且要巩固作为农村基层合作组织的农业信用社。

现在谈谈播种运动。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和关于控制数字的报告都谈到一个主要问题——我国今年的播种运动将怎么搞。克维林同志在这里说,我们应当把春播面积扩大9%,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3%,最终单位面积产量将增加7%,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扩大秋播作物的种植面积,就要靠春播来弥补这一块。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供应标准就会大致接近前年的水平。扩大播种面积——这当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困难任务。首先是刺激手段问题。例如,去年我们做了什么,如何对播种小组进行重新分类?如果拿俄罗斯联邦来说,根据中央统计局春季调查表的材料,无耕畜户扩大了7%的播种面积。有一头耕畜的农户扩大了1%,有两头耕畜的农户减少了2%的播种面积,有三头耕畜的农户减少了4%,有四头耕畜的农户减少了7%。就北高加索来说,情况更明显。安德烈耶夫同志昨天说,播种面积在10俄亩以下的农户先是上升,然后下滑。如果就北高加索的马匹情况来看,就会看到:无耕畜户扩大了9%的播种面积,这里包括秋播面积和春播面积,有一头耕畜的农户扩大了1%,有三头耕畜的农户减少了12%的播种面积,有四头耕畜以上的农户减少了19%,也就是说,这些数字说明贫农农户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农户正在发展。这很好。应当尽力支持和帮助他们发展。但是,我们提出的是把播种面积扩大7%或9%的问题,我们给自己提出的是农业商品的扩大再生产问题,而这种扩大现在当然主要与个体农户,尤其是生产商品粮的中农农户有关。如果在重新分类时看到这个过程的话,就会产生某种忧虑,也就是说,这一切要求我们执行就第一个问题——鼓励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扩大播种面积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我对这些数字持批评态度,它们并未完全正确地反映数字方面的真实情况,但那些倾向已经出现,对此应当注意。在这方面应当非常广泛地开展工作。例如,我们显然会遇到粮食收购工作的困难。我们还记得,去年许多地区的贫农生活很困难,他们常常阻止把粮食运

出本地区。我认为,应当事先想办法使粮食收购地区的向贫农供应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有所缓解。这件事可以通过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而且这件事情应该做。

下面谈一下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今年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上交了粮食,但是向集体农庄供应工业品和生产资料的工作做得很不好。集体农庄早在秋天就上交了粮食,拿到了钱,可是这些钱什么也买不到。个体农户在陆续上交粮食的同时,也在陆续购买商品,他们在逐渐适应市场,针对本地区的市场行情进行有计划的经营。集体农庄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它们远未得到与其上交的粮食量相当的商品和生产资料。

现在谈谈中农。我认为,在对待中农农户方面,现在应当着手研究一下,针对中农商品经济的农业税条例第27条²⁸⁹在鼓励扩大播种面积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有人喊:是第28条²⁹⁰。

克利缅科:第28条是个别税。不对,这笔自动追加的税款超过400卢布。我认为,在这一条中,或许在执行这一条的过程中,潜藏着对中农农户扩大播种面积的巨大危险。(主席铃响)我马上就结束。我认为,在贫农中开展我针对集体农庄说的这方面的工作时,应当特别注意第27条所涉及的中农农户,因为如果我们不鼓励多播种一俄亩地,不鼓励中农农户商品生产的扩大再生产,那么今年春天恐怕就扩大不了播种面积。这类(中农)农户中有大量的农具和畜力。每一个了解农民经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农户播种5俄亩地,那对他来说播种6俄亩地也容易做到。但如果根据第27条这第6俄亩地要使他多交50%的税,有时可能多交100%的税,那么,他就不会去播种这第6俄亩地,尽管按经济实力他可以缴纳这部分税款。为了让大多数中农农户的生产得到发展,无论如何应当纠正以前那些偏差。这件事应当立即去做,因为播种运动必须预先做好准备。

主席:现在请米高扬同志发言。

米高扬:在关于第一个问题的报告和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总的政治方针,并确认粮食问题是我们计划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加强这一环节我们今后就无法快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我确信,尽管现在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相当快,但只要我们的粮食比现在多出5亿普特,我们就能够使今年的工业发展多提高几个百分点,至少提高5%。鉴于谷物问题的意义,安排安德烈耶夫同志所作的这类重要报告是非常必要的。全会可以对关于最重要产粮区情况的报告进行全

面讨论,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任何一次全会上进行的任何一次有关农业问题的讨论,都不如就北高加索工作报告进行的讨论那么内容丰富、充实。安排安德烈耶夫同志作报告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打算着手具体研究振兴北高加索农业的办法,从而帮助它发展并根据这个地区的经验教训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且还因为全党都在关注谷物业以及整个农业。谷物问题的紧迫性不仅在于我国的粮食满足不了国内市场的供应。即使是粮食能满足市场供应,我们也不能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战前我国有7亿普特的粮食出口。我认为,在改造我国经济的过程中,要想满足国内对进口的需求,就得恢复2亿—3亿普特的粮食出口。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改变我国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因此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我们要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7亿普特的粮食出口,而是2亿—3亿普特,7亿普特的任务不太现实,因为我国的经济已发生改变。正因为如此,在人口增长、城市发展、需要谷物的牲畜增加的情况下对国内市场的供应,还有恢复粮食出口的任务,都向我们提出了紧迫的粮食问题。

但是,我们在制定谷物业指标时,往往采用平均数字。而在领导谷物业的过程中以平均数字为依据,就会犯严重错误。这样的数字只适用于评估市场行情,而对解决问题来说是不够的。这就更需要我们针对每个地区的经济特点进行经济上的具体领导。在谷物业问题上我们也应当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是扩大播种面积,第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然而应当指出,既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所有地区的共同任务,那我们就不能向全国普遍提出扩大播种面积的任务——这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首先,在许多地方,所有的土地或者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已被使用,这里今后不能再致力于粗放式发展;第二,这些地区由于从3期轮种改为6期或4期轮种,必将减少谷物的播种,扩大块根植物、牧草的播种,用块根植物取代谷物来喂养牲畜,就可以节省谷物。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谷物播种面积将要减少,那里的谷物作物将被经济原料作物取代,在那些地方,我们不仅不应当扩大谷物播种面积,而且应当有意识地压缩谷物播种面积,以使用经济作物来代替谷物。

所以,从扩大谷物播种的角度来看,抛开所有这些地区不说,谷物领域的工作范围就是苏联那些最重要的粮食工厂——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我们要把全部精力用到这方面来,而且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粮仓,是生产大量商品粮的地区。但这里的谷物业为什么仍然落后呢?首先应当指出,农业剪刀差造成的全部重负并没有对苏联整个农业

部门产生大的压力,经济作物和畜牧业部门的压力较小,承受压力的主要是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地区。剪刀差就是把农村的资金转到城市,转到工业,它对农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是谷物产区。此外也不应当忘记,这些地区原来有大地主经济和富农经济,这种经济的缩小也必然使这里的谷物业及其商品率遭到特别大的打击。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极其残酷的、极具破坏性的国内战争在这些谷物产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乌克兰南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正是最顽固的反革命势力藏身之地和破坏性很大的战争的发生地。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在这些地区还没有完全恢复谷物业。如果我们打算解决联盟的谷物问题,那就应当发展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南部以及西伯利亚的谷物业,这些地方的谷物业虽然已有所恢复,但还应继续发展,而且也有可能继续发展。

我认为,雅科夫列夫同志所提出的、安德烈耶夫同志将其扩展为一项庞大计划的那些措施,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需要的只是去实行这些措施。在播种面积方面,还需要采取能够迅速扩大播种面积的一系列措施。

在谈这些建议之前,我还想说说北高加索。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说,主要的不幸,或者说主要的错误、缺点,或者说我们应当对北高加索人提出的主要指责是,他们的播种面积扩大得太少了,他们仍大大地落后于战前水平。

我认为,加里宁同志的话很对、很重要,在进行指责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搞清楚这个地区的特殊原因。当然,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非常多。我们可以尽可能快地制定一系列措施,其中很多措施显然制定晚了,不过在评价北高加索的情况和经济措施、发展北高加索谷物业的措施之前,除考虑全国总的情况外,仍然应当注意到并考虑到有关北高加索的一些关键性数字。不仅应当考虑到那里现在有多大的播种面积、多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应当考虑到那里将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去扩大播种面积,而不是只考虑单位面积产量。

我只提请大家注意一个数字,从这个数字中可以明显看出恢复北高加索战前播种面积的全部困难。北高加索1913年有362.9万匹马,而1922年,也就是这里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总共有120.5万匹马。不是战前的360万匹,而是120.5万匹,也就是说相当于战前的33%。这一点大家也都清楚。谁不知道在整个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国家的各个骑兵部队都依靠北高加索的战马和骑手。几十万匹战马死在德国前线,死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北

高加索人在从1922年起的五年时间里从哪里弄到或重新得到240万匹战马,或者说在5年里使马匹数量增加两倍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5年中增加了50万匹,现在北高加索有170万匹马。我们也许可以增加得稍微快一些,不是增加50万匹,而是增加70万匹或80万匹,但仍然不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数量。要想恢复北高加索的养马业还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而且这个基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1922年我曾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坐在司令部里,面前有一张北高加索边疆区地图,上面插着几十面小旗,标明散布在各个车站的白匪骑兵,有数千名白匪骑兵和一些白匪游击队。这是在1922—1923年度,而在1924—1925年度公开的国内战争已彻底结束,从这一年起,只过了4年,北高加索的同志就前进了,就搞起了自己的经济建设。丘巴尔同志说,那里的工作搞得不好,这话不对。总的说,各地的农村工作都搞得不好,而北高加索人的工作表现不比其他地方的人差,他们的粮食收购工作做得最好,每年都不间断,在这方面欠账最少。

但北高加索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不仅是苏联的旺代,这还是被无产阶级军队占领的旺代。党的领导成员、所有领导干部、农村的各个组织几年前还是别的地方委派来的。只是最近才有了由当地人组成的干部队伍。所有这一切当然表明了一些特殊原因。

我想反驳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的指责,他非常尖刻地指责了北高加索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歪曲或没有执行党的民族问题路线。当然,这里并非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但我要说的是:难道乌克兰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不是在2—3年前开始大规模地使学校和机关乌克兰化吗?尽管共和国早已存在,但是您,握有权力的丘巴尔同志,只是没有那么早地开始实行乌克兰化,只在不久前才在乌克兰的机关和学校里听到乌克兰话。而您希望在北高加索边疆区的特殊条件下,在乌克兰居民巨大的同化作用影响下,在库班那里也能听到乌克兰话,就像在哈尔科夫和乌克兰的其他地区一样。

有人说库班的乌克兰人相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受压迫的居民,这是不对的。库班那里的条件与其他地方不同。那里的主要居民是库班哥萨克——乌克兰人,在外来居民中有很多大俄罗斯人,库班哥萨克——乌克兰人曾经压迫大俄罗斯人,就像顿河大俄罗斯人哥萨克压迫外来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样。正因为如此,无论在沙皇时期还是现在,哥萨克和外来居民之间的整个斗争一直是等级之争。正因为如此,北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对这些部族来说不可能那么尖锐。如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300万乌克兰人是准确的,如果乌克兰人在那里受

压迫、没有自己的学校等情况属实,那么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在10年时间里都没有被发现。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当然过分夸大了主要矛盾和不满情绪,库班的暴动也不是由乌克兰化引发的,而是由于哥萨克问题、等级之争、阶级路线等因素引发的。那里的民族问题从来都不那么尖锐。禁止开办乌克兰语学校一事是不确切的。同志们都承认,我也记得,很多年来在北高加索有一条由执行委员会颁布、党委会批准的规定,如果一个地方有60位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乌克兰语,那么他们就有权提出要求,而且也应该为他们办乌克兰语学校。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他的发言的某些部分中不客气地指责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批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但是,他不能批评边疆区党委的任何一项决定。您认为有一件事是不对的,即苏维埃机关或者某个部门的决定被边疆区党委撤销了,这事我不知道。再没有举出任何其他事实。如果说北高加索党组织破坏党的民族问题路线,那是不正确的,相反,北高加索组织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取得很多成绩。至于说到北高加索的乌克兰人,不应当忘记,如果不是所有原乌克兰人都希望说乌克兰语,希望他们学习乌克兰语的话,我们就不能强迫他们。乌克兰往往是在行政手段的压制下实行乌克兰化的,是以“自愿加强制”的方式强迫实行乌克兰化的,而在俄罗斯联邦就不能强迫实行乌克兰化——这是应当注意的。

斯克雷普尼克:那可以实行俄罗斯化吗?

米高扬:谁也不会这么做。应当完全保证自愿实行乌克兰化,但是,如果居民——原乌克兰人不愿意上乌克兰语学校,就不能把他们赶到那里去。波格丹诺夫同志也许能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实际情况,那里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并不存在可以让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对整个北高加索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大肆指责的问题。

现在谈谈北高加索的农业政策问题。我要再说说这个主要的事实,关键的事实,即北高加索现有马匹数量只是战前的一半。尽管畜力每年都有增加,但总畜力只相当于战前的51%,而播种面积不是靠手来扩大的,应当依靠马匹、拖拉机或者牛来扩大。如果你们总共只聚集和得到51%的农民劳动力的话,那么,或者通过恢复到战前的畜力水平,或者通过使用拖拉机,才可以恢复到战前的播种面积。要知道,北高加索的马匹现在承担的耕作量几乎是战前的两倍。问题是,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对:人们为了节省畜力,对土地翻耕得非常浅。现在还在这样做。如果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需要进行深层翻耕,秋耕地也如此——这比简单方法需要更多的畜力。况且,在北高加索,一匹马要翻耕9公顷地,在

其他地区一匹马只耕4—6公顷地,正常情况下至多耕4—5公顷,而在斯塔夫罗波尔和顿河流域草原的土壤条件下——那里需要深层翻耕和大量畜力,北高加索的一匹马要翻耕9公顷地。

正因为如此,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翻耕,就得解决畜力问题。正因为如此,提出北高加索的拖拉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种子精选措施当然可以带来很大成效,但是,不进行深层翻耕,不扩大播种面积,我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应当提出在几年内提高北高加索畜力的任务,而且我们应当在两年内提供至少1万台拖拉机。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拖拉机完全解决不了畜力问题。北高加索有400万公顷土地,我们用多少年才能恢复到战前的播种面积并将其扩大?我们能翻耕多少地,这需要多少畜力?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想翻耕北高加索的大片耕地,我们就必须考虑畜力问题并满足北高加索提出的近几年提供拖拉机的要求。用这些拖拉机可以翻耕80万公顷或100万公顷的耕地,其余耕地将靠增加当地牲畜和从耕作量小的地区调运牲畜来完成。成立在北高加索大有前途的大型谷物国营农场和劳动集体,没有拖拉机也是不行的。

接下来,说到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一些对其他地区也很重要的普遍问题,我们应当向北高加索人学习的经验首先是增产大会,这已经被一些地区自发地采用了。其次是实行国家规定的某些基本的、必要的农艺措施,而且要选择这样一些基本措施,第一是完全能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的,第二是技术上可行的。如果我们热衷并提出那些在农业技术上行不通或者广大农民群众接受不了的措施,我们就可能遭到失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让它失败,应当在实行这些必要措施时向居民解释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发展预购合同制来实行更加复杂的措施,在自愿和与农民联合体协商的基础上实行预购合同制是发展农民经济、采用新的农艺方法、使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实现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途径。

第三条经验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已经向自己党组织提出,要认真地、自上而下地着手发展农业,特别是谷物业。

加里宁同志早在七月全会上就说过,我们应当做到,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在汇报工作时,除了谈党员人数、省里的政治形势、他们的工作情况以及其他情况外,还要谈他们如何发展农业、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了哪些成绩,要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来评价他们的工作。这一点我们至今也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基层。各省和各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专区,尤其是在区和乡村,直到现在

也没有这样做,包括北高加索,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得对,那里热衷行政领导工作,效仿以前的哥萨克头领,只注重维持秩序,而不注重发展经济。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头领,哪怕是苏维埃的头领,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新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农民经济的组织者。

下面谈谈发展谷物业的措施。我想,我们今后应当在一些地区采取特殊的措施。鲍曼同志已经提到了一些措施。我认为,我们今年的税收总额未必能比去年增加很多。我们需要保持税收制度的稳定。我认为,对那些同意根据预购合同、按我们的价格把剩余产品全部出售给国家的农户,我们应当而且可以采用优惠的税收办法。其实我们已经对亚麻、甜菜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户采取了对棉花种植户的优惠税收办法。这项措施完全正确并且非常有效。但是,如果说我们在棉花方面有把握得到全部产品,那么在粮食方面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建议原则上采取这种优惠税收办法。我们要对那些根据合同、按国家价格把产品全部出售给国家的农户实行优惠。

还应当对最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的所有农户,如粮食、亚麻、油料作物种植户实行优惠,对奶牛饲养户和牧草播种户实行优惠。我认为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农民经济的商品率问题是中心问题。我们这样做不仅能保证扩大播种面积,还能保证提高商品率,不断把产品提供给无产阶级国家支配。

我建议,对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的许多地区、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在两年内均按今年的播种面积征税,也就是说对这些地区在两年内增加的播种面积免于征税。我们当然还要对富农征收个别税。另一方面,我们加在上层中农身上的税费负担已经很重了,我们未必还能增加他们的这一负担,因此我们将促使他们扩大播种面积,可见,享受这种优惠的将主要是广大中农。这里还必须考虑农民的心理,他们很重视各种税收优惠,而不太重视通过其他途径、哪怕是价格途径获取资金。这些税收优惠办法应当作为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条件来实行。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大大增加播种面积,保证我们的国家得到剩余产品。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措施。鲍曼同志在这里正确地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必要性,看来雅科夫列夫同志和大家对这一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向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委员会决定在全会上对此问题进行讨论,而没有先把它写进提纲。我认为,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它将对我国上述主要产粮区的春季和秋季谷物播种产生影响。

有人喊:这些措施要及时实施才行。

米高扬:当然,如果这些措施实施得晚的话,效果就会差一些。

我想,我们要说的就是使我们的经济领导工作具体化,我们要让每个州和每个专区针对本地区的经济特点采取各种措施。即使是北高加索已经采用的那些措施对各个地区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我确信(我手边没有数字)库班的播种面积差不多达到了战前水平,许多山区也是如此,然而斯塔夫罗波尔专区、顿涅茨克专区、顿河专区和萨利斯克专区的播种面积只相当于战前的一半。就是说,在北高加索我们不应当要求所有专区都要扩大播种面积,应当扩大播种面积的是那些因歉收和国内战争而遭受困苦的地区,没有开垦所有闲置土地的地区,具有巨大潜力的地区。

党要认真关注谷物业,在这方面预购合同制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预购合同制不仅能保证有计划地销售剩余产品,而且能使农民经济在协商的基础上采用更高的技术,这是其一;其二,采用集体农庄组织发展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我们这里对预购合同制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人倾向于让农民签订格式化的合同,然而我们应当根据农民的传统、习惯和他们以往的素养来对待这个问题。应当让他们签订内容不同的合同。一些合同非常简单,如产品销售合同,预付款合同和供货合同;另一些合同比较复杂,是让集体农户签的合同,里面规定有一系列生产措施和一些最简单的临时形式。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合同,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又一步地试行。这方面需要党组织参加,需要全党参加,否则这件事情肯定做不好。另外,围绕着预购合同制发生了很多争论。我们的人民委员会至今也没能批准计划,这是因为两个月来各个部门一直在无休止地争论。在这一点上刚刚协调一致、解决争论,在另一点上又争论开了,等等。

全会应当直接而又明确地提出,尽管预购合同制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着缺陷,但它完全称得上一项可以改善农业、扩大商品交换、组织广大农户的措施。在这方面全党要有统一的提法,以使我们不再针对预购合同制进行争论,不再就预购合同制这项制度进行争论,而是就改进实行预购合同制的实际工作、克服这方面的缺点等具体问题进行争论。正因为如此,全会的决议应当在这一点上更准确、更清楚地向我们说明预购合同制。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采取的那些措施可以使我们发展北高加索的谷物业,有人在此指责说,北高加索近两年产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北高加索的同志实行的政策造成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能否认,这几年那里马匹的数量不断增加,不久前播种面积曾经扩大,但后来播种面积由于秋播作物死亡而减少。秋播作物的总产量和商品产量直接取决于决定收成的条件,也就是说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措施,而且也取决于天气。夏天,在

举行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时,我们以为北高加索的谷物收成会比现在多1亿普特,因为7月的旱灾,我们失去了北高加索的1亿普特粮食。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北高加索经济的不幸在于,自1926年以来,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许多地区出现了春播作物或秋播作物死亡的现象。我们应该提高农业技术,以减轻因这种打击而遭受的损害。北高加索是个交通极为便利的边疆区,无论就未开垦的富饶土地来说,还是就非常有利的气候条件来说,都是全苏联最好的地区,它对国内供应起着重要作用,满足出口需要也不成问题,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大力发展这一地区,把它变成一个盛产谷物的工厂,要在那里建立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帮助贫农和中农,提供拖拉机,把新的改良农艺技术引入农村。

主席:现在请日丹诺夫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雷西瓦钢铁厂):我认为,从昨天安德烈耶夫同志在报告中谈的主要情况不仅能看出北高加索农业的生产能力,而且还能看出全联盟农业的生产能力。他谈了些什么呢?他指出了那里取得的各项成绩以及存在的所有缺点。我认为,全会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个普遍问题,因为北高加索的收成不好,就此问题进行的讨论使人更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地方工作人员要思考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思考。首先,我们基层的情况如何呢?同志们,我们那里的情况是这样的。请想象一下,例如对某个农村提供援助,我们偶尔到那里去演演节目,作作报告,事情就算做完了。而真正需要的是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农业问题,这一点我们似乎还做不到。我们的援助徒具形式,千篇一律。安德烈耶夫同志在报告中说,他认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似乎不得力。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他指出,他们那里的土质不好,看来只是因为土地翻耕得不好。我认为,如果在这个黑土地带农民的地只能打35—36普特粮食的话,那就太少了。

有人喊:对!

日丹诺夫:那里有没有领导呢?我不想指责安德烈耶夫同志,说那里没有领导,但那里的领导不得力,而且哪儿对这项工作的领导都不得力。必须十分认真地注意这方面。对农民要少说多做。安德烈耶夫同志指出,那里有41%的农民没有农具,48%的农民没有马匹。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呢?同志们,我认为这意味着耽误了时间。安德烈耶夫同志说,那里成立了好的国营农场和好的集体农庄。但我认为,应当吸收所有无马的农民和无农具的农民参加这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里吸收了27%—37%

的农民。安德烈耶夫同志,这很好,但是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吸收。

扎东斯基:总共吸收了7%的农民。

日丹诺夫:瞧,同志们,这很不好,太少了。我想,那里还有一些不足。安德烈耶夫同志说,村庄的共产主义化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党员人数很少——在800万—900万居民中总共有84 000名党员。同时,安德烈耶夫同志说,应当给他们提供优秀的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和1万台拖拉机,这样的话,一年半至两年后就能多上交1.5亿普特的粮食。这非常好,安德烈耶夫同志,要力争达到这一目标。但与此同时,安德烈耶夫同志,你们不仅要争取得到1万台拖拉机,而且要争取在84 000名党员的基础上再增加15 000名党员。总之,要使乡村进一步共产主义化,要吸收更多的农民入党,要使我们农民中的党员比例不再是现在的0.75%,要让农村中的党员比例至少达到2%—2.5%。到那时,北高加索的工作就更容易开展了。不过我应当指出,如果我们这些开机床出身的工作人员到乡村去工作,或者说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工作,那么,我们可能连一只草鞋都编不好,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技能。应当从优秀的人才中挑选一些农民党员,他们一定会切实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接下来,安德烈耶夫同志谈到了许多必须要实行的措施,谈到了社会活动等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往中央全会等会议就这个问题作出的指示。党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我们不仅要使农村共产主义化,还要吸引所有农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然而我们各地的情况如何呢?就拿农业合作社工作来说吧。我们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农业合作社本应使居民在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在粮食产品等基础上进行合作,可是它们本身却在搞一些消费合作活动。农业合作社经常购买各种消费品并把它们出售给居民。这是不对的,对此也要特别注意,因为农业合作社的做法正在使合作化逐渐失去意义。这方面也可能产生我们自己发现不了的各种倾向。如果是这样,那就应当及早看到这一点并把农业合作社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最主要的。

安德烈耶夫同志接着又说,应当组织培训班等等。完全正确。我们的农艺技术即使有的话,也是非常糟糕的。在农村,在所有种粮地区情况怎样呢?农艺技术非常缺乏,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安德烈耶夫同志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党一定会就此作出指示,我们也一定会执行这项指示。

现在我来谈谈整个农业。如果从乌拉尔地区的现实生活谈起,我认为,那里似乎有些不正常。我们乌拉尔地区的现实生活情况是这样的:你闹不清某个人究竟是农民、工人,还是干其他什么工作的。为此也应当给高级机关,特别是工

厂区的高级机关下达一项指示。例如,在我们的一些工厂里有近25%—35.5%的私营小业主。他们有土地,同时又在工厂上班。在此我想请大家认真关注这一点。在我们那里,所有拥有土地的人到工厂来不是工作,而是休息。尤其是在夏天。他们想两头兼顾,却一事无成。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做点什么。从这方面来看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把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周围的所有土地由小私有制转为大经济。在现有的这些小块土地上耗费劳动,却什么也得不到。要把所有这些小块土地连成一片,要在那里建立国营农场。不管它们是根据合作原则、公益原则还是其他什么原则存在,这些工人区的土地都要改为蔬菜栽培地。我们有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缺乏某些产品,而当地恰恰就有这些产品,我们却搞不到。我们正在大的工人区修建一些菜窖,但那里有什么呢?我们建好了菜窖,可是里面却没有产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产品要从其他地方运来。我们在这里总谈发展农业问题,但还应当考虑考虑道路交通即农村地区的乡间土路问题。要知道,我们那里的这些道路搞得一团糟,我们在讨论中却恰恰没有谈及这个问题。我认为也必须关注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建立道路交通系统,从而使农民的产品确实可以通过这一系统运到我们的市场和我们的工人区,充实各地区现有的菜窖。

李可夫同志,我再讲两分钟。我们有这样一个口号——离农村近一些,李可夫同志,我也想走出工人圈子,离农村近一些。同志们在这里发言说,即使从乌拉尔的情况看,我们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已提高了25%—30%。情况可能是这样。我不否认这一点,这非常好,可是工作质量如何呢?我们从土地上收获了什么呢?不仅要扩大播种面积,还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使乌拉尔的一俄亩地不是产35普特粮食,而是至少产70—80普特粮食。这一点应该能做到。加里宁同志在这里说得非常好,他说,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并说出了他要说的话。我同安德烈耶夫同志的看法完全一致,应当支持他,除此之外,还要把他的报告作为基础。正像我在发言开头所说的,我们要把这作为一条主线,并要沿着这条主线继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项工作中要少一些涣散,少一些消沉,多一些果敢,多一些毅力,这样我们就能消除在农业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障碍。我们应该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不仅如此,还要提供用于出口的粮食。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主席:下面发言的是特先科同志。

特先科:毫无疑问,高加索比我们乌克兰落后了50%以上。从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们在这方面打算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庄稼人。最好的办法是从农业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按安德烈耶夫同志及其他同志的说法，是从农业中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那里的土地非常适宜耕种，粮食产量高，但我认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里没有共产主义眼光。我们的中央代表已经发现，从这方面来看，那里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接下来我就不说这个问题了，同志们在这方面都是“老手”。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我们期待的那1万台拖拉机。我们目前还在等待这些拖拉机，土地将会闲置。对贫农来说只有一条出路——农业合作社，此外，还要有共产主义眼光，不然的话，你们就会把谷物清选机从农舍里拉走，而且什么都不剩，到那时你们就不再搞农业了。正如列宁同志说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应当关注农业合作社。它的情况如何？它在做什么？什么也没有做。如果我们能等来1万台拖拉机，那就是一片“阳光普照，露珠闪烁”的景象。我们的政府必须特别关注农业合作社，应当把资金投入这项事业中去……

臧声：说得对！

特先科：要指出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臧声：对。

特先科：必须在那里修建租赁站。我们要让贫农摆脱富农的控制。

我真想收拾一下富农。我真想上百次地向他们征税，然后把这些钱转交给贫农，用来发动贫农。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你们花掉的那些钱。你们必须把钱投到农业中去，投到必将接纳全体农民的农业合作社中去。我们应当用贫农基金资助贫农参加合作社，而向富农多征税，不是按5卢布收，而是按10—11卢布收。在我们乌克兰，一股最少是11卢布。同志们，这就是一股的钱！如果你们不建租赁站，也不向那里投资来帮助贫农，那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你们不建租赁站，不帮助贫农种植块根植物等，你们就不能使贫农摆脱富农的控制，富农还会剥削贫农。不应当姑息富农，因为如果我们放松管制，我们就不能完成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富农已经很猖狂了，我们本该进行压制，但遗憾的是，我们根本不管他们。

我还想谈谈谷物清选机和中耕器。安德烈耶夫同志说的中耕器所能提高的产量无疑不是10%，我认为，它们可以使产量增加一倍；如果现在产30普特，将来就会产60普特；如果现在产50普特，将来就能产100普特。使用中耕器、谷物清选机和条播机可以获得丰收。他说用耙子耙，就让他去耙吧，但是只要使用条播机播种，很快就会出苗，再用中耕器过一遍，就可以获得好收成。这样一来，

人的劳动、纯体力劳动就可减少。中耕器还可以使第二年获得很好的收成,它既可使土地休闲,又可使土地丰产。

米高扬同志说,牲畜吃掉大量的谷物。这有什么,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他列出了一些表明多区轮作使母牛数量减少的数字,说必须拿谷物喂养母牛。不对,米高扬同志。在实行多区轮作的情况下我们还可得到所播种的块根植物,可以用它们来喂养牲畜,这样就可以省下谷物,而且我们的牲畜也长得肥壮。播种过块根植物后,我们要让土地休闲。我们有些时候让土地休闲,选一些小块地,其余的地种块根植物。我们播种两次,可以收获优质的块根,而且我们有很高的收割量,也就是收成。这样就不用担心在实行多区轮作的情况下牲畜没有饲料可吃了。完全不会这样。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乌克兰搞一块休闲地,比如说2—3俄亩地,我在这块地上播种,比如说播种40—50行红甜菜,那么我既有休闲地,又有饲料,还不需要很多谷物。接着我再种50行土豆,这些土豆用来喂猪和所有你要喂的牲畜。土豆喂得饱它们,谷物就不需要了,于是我今天既得到一块好的休耕地,又得到优质的冬小麦。然后,我在耕过的地上只种草。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让那里有草,同志们,应当有这些草。这些草也可以先割掉,然后再稍微进行所谓的翻耕——翻1俄寸或者1.5俄寸,这样,秋播作物就可以长得很好,就能有好收成。

饲草也有了;羊群吃得饱,饲草备得足。所以说,应当了解农活。

我还想谈谈贫农。我知道,高加索那里的贫农受压迫。这一点从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来,北高加索的报告人一次也没有提到政府给他们的资金的使用情况。给贫农的钱只有40%,贫农得到了40%,剩下的钱在哪儿?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农投了一些钱,因此他们可以支取这些钱。你们通过这个例子看得出在那里党算什么,工作人员算什么,他们有什么价值——在集市日他们一文不值。应当善于吸收居民参加合作社,善于让贫农和中农了解合作社是什么,让富农感到合作社有力量,它已经不需要富农。这就是要做的事情。但有一位同志说,他们拒绝工作,什么也不干,每年都让富农打谷。你们到丘巴尔同志那里看看修理农具的情况吧,我敢保证,什么也看不到。(笑声)

关于这些工作人员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在这份报告中对妇女问题只字未提。报告人一句也没有提到她们。在任何一次会议上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看不出他们要把妇女组织起来。看不出他们的计划中有什么地方提到了这个问题。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报告人对组织妇女、解放妇女、办工厂托儿所等问题只字不提。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提这个问题。然而,她们中有无产者,也有贫

农,她们已被遗忘。确实是需要有人去关注她们一下了。(笑声,鼓掌)

主席:现在请波格丹诺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波格丹诺夫:加里宁同志说,大田作物总产量自1925年以来逐渐减少,他通过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如果看看我们的小册子第9页上用普特表示(因为1925年以前我们不用货币统计)的总产量表,就会发现,1925年的产量高于其他年份,既比以前几年高,也比后来几年高。但是,如果抛开这一年,那么用普特计算的总产量每年都相差很小。因此,谈不上最近几年我们的总产量在不断下降。

还有很多同志说,尽管我们对北高加索的农业贡献很大,但是,即使总产量没有下降,至少它也没有增加。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还说,北高加索的人“应当送交法庭审判”,因为他们在发展农业方面工作做得很糟糕。

柯秀尔:他说得绘声绘色。

波格丹诺夫: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农业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提高。不要忘了,1922年我们的播种面积只相当于战前的51%,去年已扩大到88%。要是今年春天没有发生几百万公顷秋播作物死亡的现象,我们的播种面积就会扩大到92%。大家比较一下北高加索和整个联盟的播种面积扩大情况就能看出,我们最近三年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与全联盟的增长速度是一样的。如果今年春天没有发生秋播作物死亡这一不幸现象的话,我们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将超过联盟的增长速度。

由此可见,不能指责我们在农业的主要方面——播种面积方面比整个联盟增长得慢。而这正表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取得了应有的结果。

丘巴尔:全联盟增长得慢是因为你们的增长速度慢。

波格丹诺夫:这不对,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不比联盟的慢。另外,如果拿牲畜的恢复情况来说,数字相当令人满意。说过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我要指出,我们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已非常接近战前水平,在产品畜方面,例如母牛饲养方面,已经超过了这一水平。这一时期,我们为制造农业机器、进行土壤改良以及实行其他农艺措施投入了许多资金。但这些投资和我们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边疆区的农业正处于困境之中,这种困境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很低,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如果说产量下降的原因,那么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关于这些原因安德烈耶夫同志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只需要补充一点,即米高扬同志所说的国内战争时期马匹大量死亡,可能还要补充一点,近20万农村业主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国外侨居,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产业经营

状况。

这些主要是客观原因。但同志们想找的是主观原因,那就请允许我谈一下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的第二点意见,即关于我们对农村各个阶级集团的信贷政策的意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援引了第28页上的表格,这张表格表明,我们给中农的种子贷款只占13.6%。首先,我要说明一下,这张表格表明的只是普通种子贷款的分配情况,而且只是在个体农户之间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全部种子贷款的35%给了集体农庄,只有剩下的65%给了个体农户,而且这65%在表上显示为100%。我们在进行分配这笔普通种子贷款工作时,恰恰考虑到了生产方式,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却指责我们缺少这方面的考虑。其实我们并不负责把种子全部提供给所有农户。在春播运动中我们顶多分配所需全部种子的20%,剩下的80%由农民自己解决。因此,既然我们有普通种子贷款,那就完全应当首先把它分配给没有种子的贫农农户,以增强这些贫农农户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考虑到,稍微有点经济力量的农户和中农农户有可能在市场上弄到普通良种。至于国家的良种储备,则完全在集体农庄和土地协作社之间进行分配,当然,贫农、中农和富裕农户也能得到,因为我们分配良种是为了搞大面积播种,不允许与普通种子交错播种。所以,无论是良种贷款还是普通种子贷款,都是根据生产特点来分配的。我顺便说一下农业机器的分配情况,39%的农业机器根据预购合同分配给中农,预购合同是帮助农业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形式加强对农业的改造,我们有45%的集体农庄、约30%的中农农户、19%的贫农农户签了普通预购合同,如果拿在北高加索起很大作用的工业品预购合同来说,你们那里签了合同的集体农庄占55%,中农农户占26%,贫农农户占16.5%。这些数字表明,贷款和我们对农户的一切帮助主要针对的是集体农庄和中农农户,也就是农村那部分能产生最大商品效益的农户,包括在给我们的市场提供商品粮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中农农户。

此外,必须把发展谷物业的措施和条件同稳定农业的大问题联系起来。其实我们的不幸就在于,尽管我们进行了投资,并且在分配这些资金方面执行了基本正确的政策,但是我们的产量还是下降,这既同气象条件有关,也同其他许多客观原因有关,其中就包括因战前以及革命后滥用各类土地而导致的土地贫瘠。所以,要提高边疆区的谷物产量,就必须加强稳定农业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非常重视在合理轮作的基础上扩大秋播地和中耕作物以及交替播种有助于增强土壤肥力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作物。既然这种合理轮作也包括牧草播种,我们就必然要相应地发展和扩大畜牧业。因此,我们在发展谷物业并为其建

立稳固基础的同时,也在着手建立完全有合理安排的农业,包括交替播种经济作物、中耕作物和谷类作物,相应发展畜牧业。说到我国的农业状况,我们也要谈雅科夫列夫同志提出的那些措施。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提出的观点和雅科夫列夫同志的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在谈到实行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措施时,就应当稍微降低雅科夫列夫同志所提建议的高度,使它们更加现实可行。不要忘记,100%地使用机器——这是一件好事,但在实践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雅科夫列夫:那10%呢?

波格丹诺夫:要是您雅科夫列夫同志考虑到一台谷物清选机一天可以清选约100普特,而在北高加索,收获春播作物和开始秋播之间最多只有1个半月时间,那么,尽管您非常想使每台谷物清选机的清选量超过4500—5000普特,但是您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是做不到的。

雅科夫列夫:到春播前呢?

波格丹诺夫:在秋播和春播之间有2个月到2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您可以使一台谷物清选机的清选量达6000—7000普特。

雅科夫列夫:是7个月,不是2个月。

波格丹诺夫:但这6000—7000普特毕竟不是您说的30000普特。

雅科夫列夫:7个月,不是2个月。

波格丹诺夫:最多3—4个月,不会有7个月。

关于土地规划问题克利缅科同志已经谈了很多。我想再就此说明一点,据我们统计,由于边疆区存在着远离耕地的现象,农民下地劳动往返要走几公里路,每年为此花掉近2亿卢布,要是不存在远离耕地的情况,这笔钱就能得到更合理的使用。当然可以提出一些简单的土地规划形式,不把大村社分割为一个个小村子,但有一个条件,即我们能迅速用拖拉机填补畜力的不足。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进行简单土地规划时把土地分成一个个大地块就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进行土地规划后,现在在几个地块上有自己耕地的农户得到的地将在最远的地块上,距离将增加1—2倍。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出现。如果你们要完成迅速提供足够数量的拖拉机、弥补畜力的不足并为用机器共同耕地创造条件的任务的话,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眼下农民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另外,他们在从大村社迁到一个个小村子后,赶役畜下地不用走远路。

关于种子问题,我对丘巴尔同志的发言作一个补充,我们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不仅是提供良种,而且要在正确选择当地耐寒和抗旱种子的基础上,通过各个实验站的育种部门制定相应的标准,有了这一标

准,就可以制定出北高加索自己的标准,并且可以重新种植单位面积产量高、对出口非常重要的“库班小麦”。

关于保证农业机器供应的问题。雅科夫列夫同志提出要有最好的机器,这一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要考虑到,像割草机、犁或者其他农具这类农民常用的家什目前也是必需的。这种农民常用家什我们缺少上百万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用美国完善的方式去制造它们,从而降低它们的成本呢?这是一项完全应当完成的任务,这绝不是什么无稽之谈。转臂收割机也一样。转臂收割机这种机器将来会被淘汰,但它目前可以当两种机器——收割机和割草机使用,而且,在北高加索现在缺少大量农具的情况下,在存在大量贫农农户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农户的情况下,这种机器简直就是我国农民的救命机器,他们花比较少的钱就可得到这种几乎无所不能的机器,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土地。

雅科夫列夫:在阿克赛就能生产这种机器。

波格丹诺夫:是的。我们的农业机器制造厂将来就不生产转臂收割机了,因为这种机器是临时性产品,它们随时有可能被割捆机、割草机等机器取代,只要工厂达到相应的生产能力就会这么做。我们非常明白,要发展农业,我们就必须有最好的机器,正因为如此,我们向政治局提出了关于有必要重新修改并适当补充农业机器制造厂计划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关于需要生产目前缺乏的脱粒机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关于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生产拖拉机用联挂式农具的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拖拉机将被大量运到北高加索。政治局成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专门委员会²⁹¹,我们希望这个委员会使农业机器制造厂未来的产品符合更完善的机器的要求。

雅科夫列夫同志提出了农业中的浪费问题。如果对北高加索提出这一问题,那么从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那里没有浪费,而是在合理地使用投入的资金。春播运动和秋播运动也可以表明这一点,在此期间我们大力加强了一系列增产措施的实施。在春播运动中我们对20%的种子进行了消毒,在秋播运动中这个数字会增加到50%。在谷粒清选方面:我们在春播运动中清选了16%的种子,在秋播运动中这个数字会提高到36%。这是可使产量和商品率大大提高的两个因素。在实行预购合同制方面:过去一年中集体化的扩大表明,根据预购合同投入的资金产生了极好的效益。接下来,如果拿雅科夫列夫同志在这里说的那3200万的分配情况看,这在我们的材料中可以找到,那么,相当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农业机器、改良土壤,用于实行扩大农艺网的措施,用于建立租赁站,等等,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从生产方面看,这3200万的使用是完全合

理的。

说到向农业包括耕作的高级技术基础过渡的必要性,我们应当特别着重提出农艺科研力量问题和实验工作问题。边疆区在战前只有6个试验站,各地区在经济上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发展农业进行什么重大的科研工作。因此,开展实验工作、把科研力量吸引到北高加索来的任务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我们特别强调让育种部门展开工作的问题,因为,我已经说过,我们失去了种子标准(安德烈耶夫同志说的标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通过试验站育种部门进行耐心的、长期的、顽强的工作,恢复失去的种子标准。

我们必须把我们试验站的工作成果同基层农艺网和农民极为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应当引起农业领导人的极大关注。以前,试验站取得的成果通常只为试验站内部的学者了解,或是发表在专门的科学杂志上,等等。农民和基层农艺师往往对这些成果一无所知。因此,我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首先是成立专门的农艺研究所,它可以把各个试验站的工作成果汇集起来并就和农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加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提出,这个中心研究所要同广大农民和基层农艺网建立联系。为此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拥有4万订户的《农民的道路》杂志(这份杂志两天前已经发给你们)。通过各个农民订户和杂志之间以问卷调查方式建立的密切联系,我们希望获得,而且已经开始获得极为有用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农民纷纷就发展农业问题给我们答复。

李可夫:是苏维埃机关刊物吗?

波格丹诺夫:就是一份农民的刊物。大家算一算,如果每个农民的这份杂志有4—5个邻居读,那么就有15%—20%的农民在读这份杂志。通过问卷调查得到的答复现在非常值得重视。农民在答复中谈他们对提高产量问题的看法,而且有一点很明显,同我们的官方数字相比,他们的回答往往能表明提高产量有更大的可能性。对这些问卷进行整理能为成立的中心研究所就农民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提供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杂志及其同农民的密切联系,我们的研究所将向农民传播科学知识。

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在提高产量的整个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安德烈耶夫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也想谈谈这个问题,作一些补充。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提出的第二个指责是我们的农村工作做得不好,认为凭这一点就“应当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我当然绝不可以说,北高加索的基层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进行得很好。我们有很多缺点,这一方面是因为北高加索的工

作非常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苏维埃和党的基层机关工作不太得力,尽管我们在农村有3万名党员(此数字已经过核实,因为它曾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我认为,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我们北高加索农村的工作进行得不坏也不好。既然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亲口说过,我们的粮食收购工作完成得比其他地区好,那我就再补充说一点,我们自愿交纳公益捐的人最多,其比例相当于我们的农民在全联盟农民总数中的比例的一倍半。

李可夫:这是“自愿”情况,具体纳税数字是多少?

波格丹诺夫:我认为,这些数字无法统计。

鲍曼:1 100多万。

波格丹诺夫:总共约1 200万。

柯秀尔:既有自愿认捐情况,也有具体纳税数字。

(丘巴尔:每户按4俄亩纳捐。)

波格丹诺夫:所以我认为,从履行许多全国性义务的情况看,我们的机关的工作还不是那么糟糕。用鲍曼同志的话说,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处今年已恢复,其工作成果已经在各地产生良好的影响。

但是,要完成我们提出的产量任务,就得大大改变基层苏维埃的工作。我们认为苏维埃的农业问题小组的工作特别重要,而且现在应当非常具体地安排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放弃说大话和下达笼统的指示的做法,要使苏维埃的农业问题小组就提高产量问题进行的工作有具体实际的内容。首先,这些农业问题小组应该根据农艺师的报告审议本村开展播种运动的计划,研究如何说明各项任务、检查实施计划的物质条件。在这方面,要搞清租赁站的实力,要具备种子消毒材料,等等。这些农业问题小组应当监督以预购合同形式签订的合同、同各个集体农庄和土地协作社签订的增产合同的执行情况。此外,我们正在试行农艺代表制度,即由居民按50—60—70户一人的比例选出农艺代表,让他们对居民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他们在向群众贯彻各项指示、执行写入合同的基本农艺措施方面会成为基层农艺师最得力的帮手。这些农艺代表向农业问题小组汇报工作,要是他们报告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存在问题,农业问题小组就在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不履行合同的问题。如果村苏维埃以其社会威望对不认真履行预购合同或增产合同的人进行公开谴责或予以处罚的话,我们认为,这只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实行农艺代表制度的工作应当受到我们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高度重视,在选举这些代表之前要进行全面的社会调研。

在行将开始的苏维埃选举运动的过程中,应当主要注意改革村苏维埃工作

的问题。在这次选举运动中,我们要确定苏维埃工作的新方法,从纯行政方法和财政方法即征税方法转向经济方法。苏维埃除了要报告其工作的政治成果外,还要报告它播种了多少地,播种得怎样,它的公民的田地里收成如何。

在这套吸收基层社会人士参加我们工作的办法中,增产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就主持过一次边疆区增产大会和三次专区增产大会,应当指出,这几次大会取得了很有意义的结果,这些结果有助于分析实施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那些措施的可能性。参加这些大会的大多是农民,是中农和贫农,这表明,我国的农民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台上已经看不到3—4年前特有的那种留着大胡子、翻来覆去地说着央求话的发言者形象。现在上台发言的是干练的中年农民,他们阐述的是在行的、有时简直可以登到专业杂志上的极其合理的农业计划。因此,要特别注意倾听这种没有夸张色彩的话(极个别情况除外)。

总的来说,这些大会的农民发言主要谈到了如下内容。首先他们指出,必须使农业领导工作以及对农民,特别是对中农执行的政治路线保持极大的稳定性。粮食收购时期我们采取非常措施的过火行为,实行统一农业税的种种弊端,都使中农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农民一提起这些事就会问:你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要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如果我(这是原话)多种一俄亩地,而你们却以农业税的方式把我这一俄亩地的收入拿走,那我明年就不会再种这一俄亩地了。”第二个要求是,要为我们打算采取的那些增产措施奠定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要有优秀的农业技术人员,要及时供应优良种子,要有种子消毒材料、谷物清选机,等等。农民还指出,要是农民因为缺乏执行措施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物资而失望的话,那你们所说的增产就完全没有意义,任何结果都不会得到。

丘巴尔:他们答应拿出自己的资金吗?

波格丹诺夫:因此,必须要把我们发动的那些社会运动同相应的物质措施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使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因素分隔开来。

关于居民投入自己的资金,我们听丘巴尔同志说过这样的话:“……产量低是农民自己的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不听农艺师的话,不投入自己的资金。”在萨利斯克的大会上,有一个农民说:“不管气候条件如何,我都没有遇到过歉收,而且农业税对我来说并不重。”这是一个文明的土地经营者,他按照农艺师的指点投入了劳动和资金。

这些大会强调指出,采取强制手段实行基本农艺措施是非常应该的。在这件事上丘巴尔同志担心我们可能会失败,我认为不会这样。

丘巴尔：我没有说过一定会失败，而是说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波格丹诺夫：当然不能采取我们在强制进行秋耕时采取的措施，但可以采取农民能做到的、有社会准备的一些基本措施，而且合理实行的、有社会准备的强制措施无疑会在广大农民中间引起良好反响。

同时应当看到，这些大会表明，集体农庄建设的思想在北高加索已经深入到广大农民的意识中，农民知道转入集体农庄建设的重要性，认为这对发展中的中农经济来说，对振兴贫农经济来说，都是摆脱困境的出路。

我必须承认，鲍曼同志关于我们集体农庄中缺少中农的说法在这些大会上引起普遍反响，许多农民对不让中农参加集体农庄表示抱怨，并提出了让更多的中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这些大会的发言基本上表明，如果撇开今年秋播失败等因素我们在农村对农民实行的政策得到了农民的充分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发展集体农庄、发展个体经济、关注中农经济的方针，我们的农业税政策（如果不算今年不成功的做法的话），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变得尖锐起来，主要是因为在农村对农民采取了行政命令的过火行为及其种种不正确的做法。加强和巩固苏维埃，加强我们当前首要的社会工作，必将有助于消除这些热衷于行政命令的缺点，增强农民从事播种工作的热情。

在此我必须回答克利缅科同志：他掌握的材料不如安德烈耶夫同志引用的材料新。我们几天前刚刚对边疆区的一些专区进行了10%的抽样调查，安德烈耶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数字就是根据这次调查得出的。农业人民委员部不知道这些数字，克利缅科同志引用的是春天的数字，其中可能不包括补种的冻死秧苗的秋播地（我们补种了60%冻死秧苗的秋播地）。安德烈耶夫同志引用的那些材料表明，有10俄亩以下耕地的中农农户扩大了自己的播种面积，有10—16俄亩地的农户的播种面积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略有增加，因为他们的播种面积没有变，但农户数量减少了，所以平均每户的播种面积有所增加。

我认为这些数字是完全可信的。因此，我认为根据这些数字可以说我国农民具有播种热情，也可以说，我们为开展播种运动实行的措施有助于消除农民的封闭状态和去年粮食收购以后出现的困境，帮助农民走上正常的生产轨道。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这里通过批评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我们的民族政策要同谷物业可能取得的成就联系起来的问题。除非常熟悉北高加索边疆区的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的情况外，我还要说说以下……

（丘巴尔：他不知道你们关闭了学校。）

波格丹诺夫:北高加索的民族问题主要同我们各民族地区的状况以及几十个小民族杂居的状况有关。因此,我们不得不非常认真地关注这个问题。我不再引用令大家厌烦的数字了,请看看我们的材料吧,我只谈一点:在北高加索边疆区成立以前,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人均支出是3—4卢布。现在的人均支出为16—22卢布,边疆区的平均支出为14卢布。我们的民族地区已远远走在边疆区其他专区的前面,而且他们的文化支出也一年比一年有保障,经济也在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的播种面积已超过边疆区的平均水平,达到战前的94%,而边疆区1927年的平均播种面积为战前的88%,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民族地区的牲畜总头数比1916年增加了60%,而边疆区的增幅不到8%。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我们对曾在沙皇制度下遭受压迫的各民族是非常关心的,我们现在正医治他们的创伤。

我再谈谈乌克兰化。北高加索的乌克兰化问题十分复杂。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们没有成立委员会。

斯克雷普尼克:9月14日你们宣布了关于这件事的决定。

波格丹诺夫:为了研究北高加索现有民族的语言,我们受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的委托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实行乌克兰化方面的具体措施。我们提出让语言学专家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指定我们所需要的课本等方面会对我们有帮助。

斯克雷普尼克:是连斯基教授吗?

波格丹诺夫:不过,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得对我们从哈尔科夫弄到的那些课本进行修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会说母语的库班哥萨克和外来居民都要求我们修改这些课本。

有人喊[丘巴尔]:那俄语课本也要修改吗?

波格丹诺夫:我们对待这个问题非常谨慎,提出根据父母的愿望安排孩子上学。既然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我们不能让来自北高加索的乌克兰人说他们的语言进入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乃至最高机关——因为我们的基本国语是俄语,那么我们就不能提出必须实行乌克兰化的问题。1926—1927年,我在库班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同一些代表进行了交谈,他们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反对强制实行乌克兰化,因为我们认为乌克兰语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没有远大的前途……”

现在来谈谈实际情况。我面前就放着边疆区委员会常委会8月9日作出的决定……

斯克雷普尼克:是9月14日吧?

波格丹诺夫:<决定>“继续开展进一步实行乌克兰化的工作,建议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党团就此制定专门的措施”。

这就是我们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党团的决定,我们党团已完成自己的工作并“认为必须在乌克兰居民占多数的地区使干部地方化”,并让这些地区使用当地语言,包括公文处理在内”。

有人喊: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波格丹诺夫:这是今年秋天决定的,曾经对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地、十分谨慎地进行了研究,因为在我们那里的乌克兰居民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但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使居民乌克兰化的。

有人喊[丘巴尔]:不是被迫的吗?

波格丹诺夫:同志们,我们认为现在不存在这样一个乌克兰化问题,即库班哥萨克和外来居民的经济难以发展是由于未加紧实行乌克兰化而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存在的话,那乌克兰化就已经实现了。

斯克雷普尼克同志在这里发言时言辞非常激烈,但在我看来,他在乌克兰化问题上是同北高加索的“风车”作战……

斯克雷普尼克:在你们高加索工作的人就是风车!

波格丹诺夫:像著名小说中的堂吉珂德那样同风车作战。但是,我们还听到对这个问题的另一个说法。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党团会议上,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就我的报告讲道:“我们号召许多民族过文明生活,既然它们已经开始以越来越大的步伐向前迈进,那么,这些民族现在所在的地区,也就是北高加索,就必将同乌克兰人合并”(摘自速记记录)。同志们,我认为,在提出北高加索乌克兰化的问题时,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分割问题……

斯克雷普尼克:你说什么?分割?这真是岂有此理!

波格丹诺夫:把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分割>给乌克兰,这是彼得罗夫斯基同志的做法。这么做只会使乌克兰化的问题难以得到合理解决。

斯克雷普尼克:这是为什么?那顿涅茨克专区、塔甘罗格专区呢?您打算保持以前的做法吗?

(丘巴尔:米列罗沃地区呢?)

波格丹诺夫:下面我讲最后一点。安德烈耶夫同志提出了关于把有助于作

* 推荐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俄文编者注

为共和国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的北高加索提高产量、发展农业的那些措施集中起来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些具体措施,比如建立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它们应该提供给北高加索)这类物质基础以及其他措施,都已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预先研究。这些估计是准确的,而且有充分的根据。我认为,既然我们的实际要求没有遭到权威专家和工作者的反对,既然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提出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没有遭到反对,反而在全会上得到了极大的支持,那么我认为,高度关注作为共和国主要的谷物种植区之一的北高加索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全会批准,我们也一定能够真正发展我们的农业,起到北高加索在我们共和国应当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主席:建议就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和分发给大家的决议草案选举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安德烈耶夫、加里宁、扎东斯基、托马斯·斯米尔诺夫²⁹²、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埃赫、波格丹诺夫、莫洛托夫、基洛夫、乌格拉诺夫、克维林、库比亚克、乌汉诺夫、布留哈诺夫、戈洛谢金、什维尔尼克、雅科夫列夫。

有人喊:还有鲍曼、卡雷金娜。

主席:我同意。谁同意由包括卡雷金娜和鲍曼在内的这些人组成工作委员会?谁反对?没有人反对。通过。要不要对决议进行表决?

有人喊:不需要。就以它为基础吧。

主席: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已同意以决议为基础。我建议,以决议为基础,将决议交给工作委员会。我同意。谁同意这个建议?多数同意。谁反对?少数。

明天上午由莫洛托夫同志作报告。散会。

俄罗斯档案馆

第十三次会议

11月23日上午

主席(古比雪夫):中央全会会议继续进行。请莫洛托夫同志作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的报告。

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

莫洛托夫²⁹³:同志们!十月革命后党的成分问题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与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有关。十月革命后不能抛开机制、抛开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来看待我们的党。党是这一专政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主义就对党的成分问题、党的建设以及党的组织建设原则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党执政之后,这个问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这时起,我们党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作用有了极大的加强。这一点不言而喻,因为党领导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同时,由于我国农民占大多数,工人阶级所占数量比重很小,所以工人阶级要实现对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党要实现对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在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条件下执政党的地位要求特别关注的首先是加强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没有工人以及全体劳动群众的大力支持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党一贯主张加紧吸收工人加入自己的组织。我们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始终与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问题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党在近10—11年间还尖锐地提出将异己分子、混入党内分子和思想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加紧吸收工人和女工人党与清除党组织中的社会异己分子和思想异己分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目前,在开始全面实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关于党的成分和党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中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它的经济改造，是当前世界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

实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用先进技术改造工业的情况下，在全力促进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发展、用大生产技术和集体化改造农业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展整个工业——轻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改造时期是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工人阶级通过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而全面（包括在农村）转向更加坚定地铲除依靠小商品经济生存的资本主义根子。这一时期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建立基本的技术和经济先决条件时期。既然我们已经进入这一时期，改造的各项任务也就决定了我们整个工作的主要方面。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和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就必须肩负起实现它们的重担。没有工人的异常英勇精神，没有异常的献身精神，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无产阶级队伍的纪律，就完成不了改造任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才可能取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全体劳动群众的“领导”。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指出：“没有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要实现这种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²⁹⁴在用新的方法、用先进技术和靠小生产社会化以及小生产向大经济过渡开始对整个经济进行改造的时期，特别需要记住的是，只有在确保那个“唯一由资本主义培养起来从事大生产的和唯一摆脱了小私有者利益的阶级”的领导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才能完成。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它应当将工人阶级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和先进分子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现在，当发展经济的实际工作与完成直接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时，尤其需要这么做。

早在四年多前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党就提出过一项任务，即保证使自己的一多半成员是生产工人²⁹⁵。然而这项任务不仅在一年中没有完成，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成。一年前中央委员会再次坚决地提出了这项任务，并决定在两年内完成。从中央作出这项决定²⁹⁶一年之后的情况来看，按照现在吸收工人入党和党的发展的速度我们在两年之内是无法完成所提出的任务的。有些地方在着手执行这项任务时过于简单化，采取了机械的方式。要知道，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完成生产工人占党员人数一半这项任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仅有充分的理由来完成这项任务，同时还必须认清，这项任务是最低限度，务必要在近期内完成，而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只是数量，不只是党员中要有一半是生产工

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真正先进的工人,需要那些能够成为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工人。如此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问问自己——以现有的力量,现有的党的干部,我们能否胜任这些任务?我们应当给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整个经济的改造任务在党的成分和发展问题上向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在提出这些问题后我们应当指出,保证党员中至少一半是生产工人十分必要,而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来说的确是最低限度。

在现阶段,在改造时期,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首先要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执行政治路线、实际克服社会主义建设困难的一贯性。意味着不能迷失方向,坚决回击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各种压力,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在目前条件下站在工人最前列意味着要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提高生产、发展工业的工作中去,特别是要帮助扩大生产资料和重工业的生产。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机关、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以及党自身中的官僚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勇敢无畏的斗争;不与官僚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就无法达到必须吸引千百万工人群众和农村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站在最前列意味着要以最积极的方式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改造时期站在工人阶级最前列意味着要以全部精力巩固工农联盟,在先进技术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千方百计促进农业生产的提高和逐步改造。成为工人先锋队意味着要永远走在群众前面。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意味着大大加强与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者的直接联系。我们只有强调指出这些任务,我们才能正确地提出有关共产主义先锋队、有关党、有关党的成分和发展的问題。

接下来我再讲讲目前党的成分及其近些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我从主要问题讲起:党和工人阶级。我们党对工人阶级的成分了解得如何呢?

首先说数字,我需要作一个补充说明。为了回答提出的问题,我不仅要弄清党的成分,还要弄清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可惜的是,关于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成分问题,我们没有多少充分的材料。我们生活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却对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知之甚少。比如关于工人的工龄、工人与农村的关系、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社会异己分子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要么是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材料,要么就是这些材料根本不完整。尽管找过我们的各种机关和组织,但我没能搞到有关工人阶级队伍成分的许多极其重要问题的最起码的材料。看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工人阶级的成分。

沙茨金:也包括工会?

莫洛托夫:我说的是所有组织:党的、苏维埃的和工会的。关于我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我没能搞到多少靠得住的材料。因此今后在分析党的某些社会成分时我甚至无法利用有关工人阶级成分的必不可少的类似材料。当然,对于基本的政治结论来说,关于党内工人成分的数据提供了有关整个工人阶级成分的重要材料。

接下来谈谈有关党的成分的材料。我们党现有 39 213 个支部(不包括红军),除此之外,在农村还有 3 370 个预备党员小组。这样我们大约有 40 000 个支部,其中工人支部 9 963 个,农村支部 20 660 个,其余为机关支部等。

到今年 7 月 1 日党内共有 1 418 060 名党员和预备党员。这个数字以后我不会再用,因为我对党的社会成分进行的分析不包括红军支部和国外支部。除这两类支部(大约共有 100 000 人)外,党内共有 1 317 369 人。

雅罗斯拉夫斯基:当然,不包括 1928 年 10 月吸收的党员和为纪念党成立 25 周年而吸收的党员。

莫洛托夫:我引用的是 1928 年 7 月 1 日的材料。

我现在谈谈社会成分。党内工人党员人数为 793 984 人(将近 800 000 人),即占总数的 61%。我再举一些工人党员百分比大大超过平均数的组织。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列宁格勒——工人党员人数占 74%,第二位是俄联邦各工业省——占 70%,第三位是乌克兰——占 68%。这些组织中工人党员占总人数 2/3 以上。

近几年党的成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此我无须引用过去整个时期有关党的成分的材料。我只需引用 1924 年 1 月起有关党的成分的主要材料,而在缺少 1924 年的全部材料的情况下,只需引用 1925 年 1 月起的材料,就足以说明问题。这就是说,我将主要引用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²⁹⁷之前时期相比的有关党的成分的材料。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是党的发展的新阶段,因此能够对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之前和之后时期作出比较的有关党的成分的材料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24 年之后这一时期党员人数从 446 000 增长到 1 317 000,即大约增加了两倍。这期间工人党员的比重从 44% 上升到 61%,而且工人在党员中的比重的这种增加源于职员及“其他人”百分比的变化,这些人的份额由 36% 降至 18%,即减少了一半。农民在党内的百分比从 20% 增加到 21%,几乎没有变化。

但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表明其出身的党的社会成分,对于我们来说,党的成

分中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问题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部分工人完全生活在工人群众中,党只有通过他们才能与全体工人阶级群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所以我们对党的成分中这一无产阶级部分的增长问题尤为关注。

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引用一些基本数字。

目前党员中有 552 536 名生产工人,占全体党员人数的 42%。

有人问:包括管理人员吗?

莫洛托夫:不包括,只是工人、雇农和所谓下层服务人员(企业中的看门人、清洁工等)。我列举一些生产工人的比重高于 60% 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不多。其中有北高加索的格罗兹尼组织、顿巴斯的斯大林组织和阿尔乔姆组织以及乌拉尔的兹拉托乌斯特组织。我说的不只是城市,而是周围相关地区,也就是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整个地区。我再举巴库为例。巴库本身生产工人占 68%,而整个阿塞拜疆的生产工人占 57%。我还要指出的是,生产工人比重高于 50% 的组织(区及省)共计 19 个。下面谈谈党的成分的变化问题。

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之前的时期相比,党内生产工人数量增加了 5.5 倍。这表明,近 4—5 年来工厂支部人员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引用 1925 年初以后的材料,——我们有关于这一时期所有党员类别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数字:这一时期工人数量增长了将近 1 倍;农民—庄稼人数量增长了 1 倍多(尽管在绝对数字上生产工人的增长超过农民—庄稼人好几倍);职员及其他人的数量增长了一半多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 1925 年年初,生产工人在党的成分中所占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变,——当时是 41%,现在是 42%。可见,在最近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在提高生产工人在党内成分中的比重方面没有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在 1926 年及 1927 年初这一期间生产工人在党内的比重甚至有所下降,去年 10 月和今年上半年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纠正。

共产党员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比重如何,换句话说,党员在无产阶级中所占比例大吗?如果以工厂无产阶级(2 900 000 人)为例,那么党员在其中占 12% (确切说是 11.9%),而 1925 年年初为 11.4%。今后应以整个工人阶级为例,而不能仅限于我所谈到的这近 300 万工厂工人。据中央统计局统计,工人阶级总数(1927—1928 年度苏联工人平均人数)为 7 148 000 人。

有人问:是雇佣工人吗?

莫洛托夫:是的,其中包括工厂工人、运输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以及从事小工业和手工工业的工人。

有人问:管理人员呢?

莫洛托夫:7 148 000 人中只包括工人和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下层服务人员。很难准确确定工人阶级各个部分中的党员人数。这方面我只有一些大致的统计数字。如我前面所说,工厂无产阶级中党员占12%,运输业无产阶级中党员占近14%。工人阶级其他部分中则少得多。如在从事建筑业、小工业和手工工业的工人中党员占5%,而在农业工人中党员大约占1%。我们举一些生产部门为例。在石油工业中党员所占比例最高,达18.5%。近1/5的石油工人入了党。紧随其后的是印刷业,党员比例大致相同。皮革工人中党员比例稍低一些,往后依次是冶金工人、化工工人和食品工人。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冶金工人中党员比例平均达近14%,但在乌拉尔,在大型冶金工业中心,党员比例只略高于9%。至于一些大地区,比如说乌克兰,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党员比例均低于平均数。在这方面,只有纺织工业是个例外。(全场大笑)

有人喊: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纺织工业。

莫洛托夫:最后我讲一下我国两个最大的中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数字。在莫斯科省,党员在工人中的比例为9%,在列宁格勒超过19%。这一点体现了生产部门的差别,也就是这两个最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在文化政治水平上的差别。

关于吸收无产阶级新干部入党的可能性问题,我准备谈谈所谓的“强拉”入党的问题。在最近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共收到1 867 000份要求加入我们党的申请书。其中近100万份来自工人。在此期间我们共吸收793 000人入党,其中工人占57%。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就发展预备党员而言,不难看出,工人占多数,但如果从转正情况来看情况就不像这样令人满意了。因为工人要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必须要有一个飞跃。

什么样的工人后备力量能被接受入党呢?

非党无产阶级积极分子是党发展壮大的主要基础。这些积极分子主要是在工会和生产会议²⁹⁸、苏维埃和合作社、女工代表会议²⁹⁹和共青团等组织中从事某种社会工作的工人干部。其人数根本无法确定。如果把所有履行某种工会职能,甚至在本车间收会费的工人都算作工会积极分子的话,那就有近百万人。除此之外,还可根据其他一些材料来判断非党工人积极分子的人数。比如,女工表达十多万,合作社及苏维埃中的积极分子数以万计,企业共青团员中的积极分子有好几万。其实,整个共青团中的无产阶级部分就是党的后备力量,而这一部分大约有65万人。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吸收入党的人中,此前已参加某个无产阶级组织工作的工人占2/3,这一事实表明非党工人积极分子干部对补

充党的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何为非党无产阶级积极分子？不消说，就是他的水平总是很高。可以举出不少非党工人指摘共产党员文化政治水平低这样的例子。这种事确实有。另一方面，在非党积极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真正积极和先进的无产阶级分子。越来越多的苏维埃忠诚的工作者干部、社会主义积极建设者干部正在从他们中成长起来。有一个偶然得知的事例我认为有必要讲一讲。我要举的是中央委员会组织调配局调查材料中的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位极为关心合作社工作的工人积极分子的事：

“巴斯卡科夫厂工人积极分子德罗兹杰茨基(45岁)向委员会反映说，他每天晚上都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合作社转转，顺便观察一下合作社的工作。在一个商店里他发现自来水管坏了。大量面粉被水浸泡。德罗兹杰茨基同志找到商店经理，建议他立即采取措施抢救面粉。经理不以为然并说：‘关你什么事？’于是德罗兹杰茨基同志拿出自己的合作社社员证，找出一张报纸，上面有篇文章说合作社社员有义务过问本合作社的工作，他说在面粉的安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是不会离开合作社的。结果，商店经理打电话叫来了管道工，修好了水管并采取了面粉干燥措施。”

你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事例。它从某个方面说明了我们合作社以及群众组织中数量不断增长的非党工人积极分子的特点。在面粉和粮食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情况下，这种关心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是非常需要的，他们确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参加者。

在充实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工人阶级几个阶层中，我首先要谈谈共青团。目前近1/3的新党员都来自共青团。因此共青团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不言自明。毫无疑问，工人共青团青年的主要部分是党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依靠共青团员来发展壮大党组织方面做得并非很好。例如，在加入党组织的共青团员中，一线工人的比例比新吸收入党的人员总数低5.5%。另一方面，入党的共青团员中职员所占份额比入党人员总数高6%。党组织和共青团本身都应改变这种局面。

应当承认，大约占整个工人阶级30%的女工群众在最近一个时期成为一支庞大的基本后备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大地落伍了。党内共有女党员172 000名，其中41%为一线女工。近几年女党员在党的成分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从1924年的9%上升到1928年的13%。但目前这一百分比仍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一线女工中的党员比例仅为6.5%。在以妇女劳动为主的重要工业部

门,比如纺织业,女工中的党员不到4%。在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所有农业女工(198 000人)中党员只占1.3%。由此可见,女工中有我们可以用于充实党的队伍的无限力量。顺便要指出的是,党员中农业女工的百分比要比相应工人的百分比少许多。这间接地表明,在从事工业生产的女工中我们确实拥有大量无产阶级干部,她们中有大批新的力量可以入党。

在解决加紧吸收工人和女工人党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我们应当坚定地指出,必须重视新入党的工人的无产阶级素质。下面有关所谓党员工龄的材料(有关9个工业中心省的材料)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正式党员的平均工龄为14—17年,而预备党员的平均工龄为10—12年。有关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吸收入党³⁰⁰的材料说,45%即近一半入党工人的工龄不满5年。由此可见,青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还不光如此。在党员干部与农村的关系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有关的是正式党员与预备党员之间的差别:在工人正式党员中,与土地有关系的仅为10%,而在工人预备党员中,与土地有关系的党员将近17%。显然,我们在越来越多地吸收那些与农村关系密切的工人入党。这就需要加倍关注被吸收入党者的无产阶级素质问题。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多少关于工人阶级成分的可利用的材料,而且这种成分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类同之处越来越少。近10—15年来有数十万优秀的无产者脱离了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不久前才脱离农村的大批干部被补充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不可忘记的还有,在战争和革命年代,被革命粉碎的阶级中有一部分公开的社会异己分子混入了工人阶级队伍。因此在加紧吸收工人入党时应考虑到工人成分严重不纯的问题。要避免采取时紧时松的吸收方式以及类似分配、上级下达任务等的机械方法。在发展党员时应侧重考虑那些工龄长的工人,特别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党的后备力量。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不断增加,成为充实党的队伍的最好基础。毫无疑问,党员中一线工人达到50%的任务是能够实现的。为此,最近两年中必须保证入党者中一线工人不少于80%,而在这两年中至少要发展30—35万³⁰¹一线工人入党。应当靠吸收最忠诚、最积极和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无产阶级骨干来完成这项任务。

接下来我谈第二个问题——农村中的党组织问题。

最近我得到的有关农村党组织成分的材料使我不得不建议全会对决议作一

些补充。这些材料要求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改善农村党组织的成分。

我下面列举的只是不久前调查时所获得的最具代表性的数字。中央统计局对许多地区的农户进行了一次调查,顺便也调查了党员农户。调查涉及574家,即574个农户群体,并且还调查了4000多个党员农户³⁰²。这一为数不多的农户群体不可能为有关农村党员情况作结论提供充分的可能,但中央统计局的材料为判断我们农村组织发展中的某些最重要趋势提供了可能。

根据党的统计材料,农村组织成分中工人部分的比重达25%,同时目前仍按雇佣方式工作的雇农占8%左右。有关富裕人员的比重问题对评价农村组织的社会成分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统计局的调查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极重要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将最富裕阶层在整个农村居民中的比重与其在农村党组织中的相应百分比进行的对比是很说明问题的。结果,生产资料价值为800到1600卢布之间的农户在居民中占13%,而在党组织成员中占20%。生产资料价值超过1600卢布的农户(多半是富农)在居民中占3%,而在我们的党组织成员中则超过4%。由此可见,富裕人员在农村党组织成员中的比重大大高于富裕人员在整个农村居民群众中的比重。此外,中央统计局专门挑选的是只从事农业的党员。因此,情况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好。在这一党员群体中,拥有800—1600卢布生产资料的农户的百分比约为27%(在居民中为13%),生产资料超过1600卢布的农户达8%(在居民中为3%)。由此可见,这些事实明显显示出农村最富裕阶层在农村组织成分中比重的增长。我再举一个类似的突出例子。根据中央统计局的同一份材料,在克里米亚农村中近60%的党员农户使用雇佣工人。难怪在克里米亚会发生“伊布赖伊莫夫事件”³⁰³,这一事件的根源在于富农,而且显然在于农村组织本身中的富农分子。对沃洛格达省986户党员农户的调查数字可以证实,中央统计局的材料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我们农村组织的社会性质。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数字:拥有两匹或两匹以上马匹的农户在整个农村居民中的比重为7%,同时这样的农户在党员农户中的比重为12%;有3头或3头以上奶牛的农户占20%,而在党员农户中这样的农户占29%。这些材料同样明显显示出富裕农户在农村组织中比重的增长。

斯滕:别再往下讲了。为什么这一情况我们过去没有提起过?

莫洛托夫:必须讲这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就我们在农村组织中的任务作出结论。

让我们来看一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以国营农场为例。在我们的5885个国营农场中,只有1/10即602个

国营农场有党支部;9/10的国营农场没有党支部。在加入农林工会的140 000名国营农场工人中只有7 280名党员,即占5%。国营农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再以集体农庄为例。到今年5月我国共有32 500个集体农庄,联合了大约400 000农户。到7月1日集体农庄中有587个支部,党员超过13 000人。这就是关于集体农庄建设中党组织作用的决定性数字。在农村工作的所有党员中加入集体农庄的……

加里宁:包括我在内。

莫洛托夫:根据加里宁同志的声明,包括他在内,超过4%!311 000名农村党员中只有13 000多人参加了集体农庄联合组织。这个数字——4%的农村党员参加集体农庄——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就此我想举两封寄给《贫农报》³⁰⁴的信为例。第一封是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托波尔科夫斯克乡乡党委书记谢尔然托夫同志的信。谢尔然托夫同志写道:

“到1928年8月1日,托波尔科夫斯克乡党组织连党员带预备党员在内共有21人,其中贫农——3人,工人——1人,中农——7人,职员——6人,富裕户——4人。没有一个党员加入集体农庄。富裕户和中农都竭力想保住自己的家产。关于富裕户党员和农庄党员问题,我认为,这只是我们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同路人。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7月的时候我开始在非拉京村组建集体农庄,我的家业在那儿。党外人士都乐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身为党员的庄主伊万·古谢夫却断然拒绝参加集体农庄,担心会因此破产,自己的土地回不到自己手里。他的拒绝使集体农庄的建立受阻。伊万·谢苗诺夫·别利亚科夫进行反集体农庄宣传,告诉农民说,党拉农民入集体农庄是不对的。这样的党员我们这儿有不少。有家业的富裕户党员不仅不维护集体农庄,反而还公开反对集体农庄。”

有人喊:这种事哪儿都有。

莫洛托夫:下面是斯摩棱斯克省亚尔采沃县尤金诺村斯洛博德邮电分局Э.汤姆森同志的来信摘录。他写道:

“我是整个组织中唯一入社的党员。其他农民党员目前都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继续靠自己的家业过日子。我们的党员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的倒是拥护公社、拥护集体的宣传。但不能说,这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并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这就是农村组织中的实际情况。就此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和这些干部一起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吗?我们组织的这种成分能保证正确地执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向富农进攻的指示吗?事实上,目前提高和改造农

业的任务已变得异常重要和刻不容缓。与工业不同,我们的农业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在这一经济领域我们的进展过于缓慢,而提高农业(增加收获量,扩大播种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使农民合作化、集体化在目前又极为迫切。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整个报告表明,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提出的提高农业的任务要求在广大农户中广泛实行改造措施。提高农业的任务越来越离不开农业的改造,离不开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以上材料所反映的农村组织成分问题上我们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使党在农村的任务与这种成分相适应。我们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党组织的改善、清理和更新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空话,而是认真着手提高并逐步改造农业的话,那么农村组织现有的成分是绝不会令我们满意的。在现有的成分中,那些没有能力执行这些任务、有时甚至阻碍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总之,如果我们不是从机械调整的角度和单纯的百分比出发去看待党组织成分问题,而是抓住问题的本质,指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的组织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干部,那么调整党的发展问题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农村组织的例子我们看到,党组织现有的成分在很多方面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无法靠现有的党的干部去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当然不只是一要对农村组织提出改善成分和清理党的队伍问题。这一点我下面还会讲到。

下一个问题——党和国家机关问题。

苏维埃是一个既能体现工人阶级专政又能通过它实现工人阶级对农民群众领导的组织。这是一个领导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组织。因此从改造时期任务的角度来看,国家机关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党员在国家机关工作者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下面我想引用一些有关近几年来国家机关党员情况变化的材料。这里的党员情况有很大的改观。近三年来职员(指的是所有职员,其大多数人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数量增加了200 000人,党员在职员中的比例现已将近12%(11.6%)。在党的总体(包括预备党员)构成中职员占35%,在正式党员中职员占43%。我要特别指出职员中工人党员的增加。近四年来国家机关中的工人党员人数增加了1倍。在职员党员总数中工人党员占一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机关中的党员成分有了质的改善。但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职员在党员成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给党造成了某种不良的后果。旧官僚阶层对国家机关的巨大影响在某些在此工

作的党员身上也留下了痕迹。官僚主义、与群众联系不够、有时是异己分子和腐化分子的影响,深深渗透到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甚至在国家机关党员的身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因此在吸收职员入党问题上党始终遵循严格限制的方针。这一点在提出的决议中也有所反映。

政治局的决议指出,必须“在最近两年内最大限度地限制吸收非工人分子入党,同时职员的介绍人中至少应当有几名一线工人(在农村则是雇农和农业工人)”。这是决议的要点之一。这方面的一些疑问似乎已经消失。实质上,在这一要点中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指示,即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人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这一措施不是机械地限制,而是正确地从政治上强调指出了看待吸收非工人分子入党的角度。必须吸收有文化的新干部,特别是技术知识分子入党。鉴于经济改造任务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如果党的成员中有文化者不增强,如果既有文化又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不进入党内,这些任务能顺利地完成吗?不能,绝不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努力提高工人群众和全体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部门所需要的新的、有高度技能的专家型干部。党应当从这些干部中吸收大量新成员,从那些真心和彻底转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现有专家干部中吸收一小部分。我们队伍中有高度技能的专家型干部为数甚少。我在上次全会上作有关高等技术院校的报告³⁰⁵时曾列举生产一线党员工程师的数字,他们共有138人。这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现在被吸收入党的工人中有相当多的人,大约1/5,是工厂生产会议³⁰⁶的积极参与者。经过生产会议和生产委员会³⁰⁷的社会工作锻炼的工人干部在被吸收入党的工人中将越来越多。可是在这些委员会和会议中还有一些优秀的技术员和工程师与工人一起积极而忠实地工作着。难道这些专家中的优秀分子不应当加入我们党的队伍吗?我曾想在我们党的统计材料中获得有关我们党最有文化的干部的数字,但我们这方面的文化水平还无法使我们获得必要的数字。我们的统计材料列出了一批高级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农艺师、林积测定员、土地测量员、林务员、地形测绘员、建筑师等。这批人在党内共有796人。

斯克雷普尼克:是所有部门还是生产一线?

莫洛托夫:这里说的只是那些直接从事上述专业工作的人。昨天报纸上刊登的斯米滕同志的文章³⁰⁸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农村组织(俄罗斯联邦11个省,加上乌拉尔11个区和北高加索8个区)的32000名党员—职员中有8名医生党员,3名兽医党员。由此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说我们拥有足够的有文化的人。而我们知道,缺少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在领导整个建

设的党内,就无法实现对我国经济的改造。

我们现有的专家当然不可能大批进入党内。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最基础的任务即分化任务,应最大限度地吸引这些干部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工作。近一时期经济困难的加剧再次表明,迄今为止我们的专家中仍然存在着随时企图发起公开的反革命进攻的凶恶敌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发动反苏维埃的厚颜无耻的进攻,这反映了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著名教授格鲁姆-格尔日迈洛。这位以黑帮分子观点而闻名的教授在夏天的时候(7月18日)给金属工业总局管理局局长梅日劳克同志写了一封带有挑衅性质的信,顺便说一下,他在信中声称:“但是……事实上,俄国的政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这是事实,必须容忍。布尔什维克试图以社会主义方式建设国家。这种尝试将付出极高的代价。可鞑鞑枷锁的代价会更高。”(笑声)这是一位著名的旧专家的看法。作为冶金专家他具有极高的价值。但要论其观点则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因此我们用不着为他不久前去世而惋惜。

齐夫里诺维奇:这之后……

莫洛托夫:下面要讲的就是格鲁姆-格尔日迈洛教授去世后所发生的事。为了纪念他,曾和他一起在乌拉尔工作的工程师们于11月2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召开的,乌拉尔综合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以及许多教授出席了会议。化学家马科韦茨基教授在会上讲了话。马科韦茨基的讲话充满了对格鲁姆-格尔日迈洛的赞美之词,尤其赞同他对苏联经济的看法。同时马科韦茨基教授挖苦社会主义国家说,“它除了要承担所有强力职能外,还要承担工业家和商人职能”。对于苏维埃国家所获得的利润,这位可敬的教授声称:“不管后来这些利润用于什么目的——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福利,还是为了世界革命,抑或是为了苏联的工业化,反正这些利润早晚会使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久就会成为敲骨吸髓的商人。”(笑声)这就是马科韦茨基教授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

有人喊[丘巴尔]:这是一位年轻的教授。

莫洛托夫:他接下去说道:“一个人是不能包办一切的。但是二三十个聪明人就能掌握、管理和发展德国的整个工业,而且做得比两三百万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强得多,假使他们当中没有一人熟悉自己的专业,也没有一个或多个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的人。那些缺少专业知识、对任何事情都不够关心的人会不会成为真正的‘贪官’呢?”反革命教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综合中等技术学校举行的学

生和工程师大会上就是如此肆无忌惮。

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专家公然敌视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但这已经足够了。上述例子说明,在我们身边的专家中目前仍存在最凶恶的敌人,但是作为专家,作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还需要他们。没有这些有文化的人我们应付不了目前的局面,我们还得花很长时间才能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自己的有高度技能的专家。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一个事实,即一些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代表、一些著名学者心甘情愿地加入我们的党。今年我们已吸收著名哲学工作者德波林入党,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事实上我在党的机关监督之下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早已将我同联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另一个例子是著名农业专家、不久前刚刚入党的威廉斯教授。毫无疑问,今后为了工作,定会有一批又一批的新学者向我党队伍靠拢。我们将从新干部、从正在成长的来自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年轻专家中获得大批有高度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劳动者。

决议提出大力限制职员入党,指的是最大限度地防止投机者和追求名利者混入党内。另一方面,党不仅不应该疏远那些接近我们并得到工人信任的工程师、教师、农艺师等,而且还应该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中来。那些真正忠于社会主义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推荐一线工人方面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同时,在职员入党问题上需要加强审查和监督措施并吸收工人参与这项工作。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国家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

头一个例子说的是农村的事。这就是雅罗斯拉夫尔省监察委员会在一封信中通报的有关卡拉什斯卡亚乡党组织的情况。该信介绍了卡拉什斯卡亚乡和伊利因斯卡亚乡的情况。富农农户在这两个乡的经济中占有显要的地位。有一批年周转额达6万、15万和20万卢布的企业。富农农户即雇用若干劳动者(雇农)的农户对当地机关影响很大。对此信中描述如下:

“乡里一小撮富农分子在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的默许和袒护下干了许多丑事;在乡里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头面人物常常无原则地光顾富农家,比如乡执委会主席、联共(布)党员、前军官、白绿匪帮指挥官库钦就是富农家的常客……库钦如此积极活动的结果是他很快盖起了一幢价值不低于1500—2000卢布的豪宅。村苏维埃主席奥克鲁日诺夫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因为常被请去富农家吃饭而使自己的经济状况一跃由贫农变成了殷实的中农……某些县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不能不谈。县执委会指导员拉夫罗夫(联共党员,白卫匪帮参与者)、财务检查员鲍里索夫和格罗莫夫在商人多洛特采夫家喝

得酩酊大醉,被多洛特采夫送回家……在富农纳税方面库钦采取的方法是5次降低税额。由此得出结论:苏维埃机关领导人腐化变质,丧失了嗅觉,出卖自己且酗酒,而且许多人是党的异己分子,与苏维埃国家的方针毫无共同之处。”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来自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马里州的调查。下面我引用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利亚克苏特基同志报告中的材料。马里州曾对苏维埃机关进行清理。共审查了45个机关的1603人。马里人在机关中总共只占20%左右。在被清理的270人当中有30名马里人。被免职的原因是什么?

“宗教人士及其家属——33人,警察及其家属——11人,地方自治机关长官——3人,白卫分子和起义参加者及其家属——46人,富农——22人,被流放者——13人,被判罪及受到审判者——13人,商人、工厂主及过去的木材商——32人,其他人——40人。占百分比最高的当属活跃的前白卫分子、商人和工厂主。”

下面引用的材料讲的是,在一些苏维埃机关中党的政策是由谁来贯彻执行的。

“比如,在农业银行,6个白卫分子在贷款方向问题上起着不小的作用。在马里州联合会,2个富农和4个警察使1个贫农‘合作化’。在商务处,收购问题由3个被解除了教职的牧师决定……土地规划问题由拥有1500箱蜜蜂的富农掌握……中农的农业税负担过重,这引起中农的强烈不满。全州有近4500人抱怨税负不合理。许多中农因20—25普特粮食而受到第107条³⁰⁹及其他条款的处罚。”

下面是利亚克苏特金同志这篇报告对在马里州担任极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的评价。州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亚姆博斯同志雇用雇农。建筑工人联合会秘书什特加莫夫像真正的富农一样使用雇佣劳动力。马里州建筑公司*经理亚穆洛夫同志拥有富农般的家业,雇用雇农。州工会理事会主席柳巴诺夫同志过去拥有殷实的富农般家业。全苏共青团州委书记马特维耶夫是牧师的儿子。农业信贷协会指导员阿加乔夫缴纳225卢布的农业税,雇用雇农。马里州联合会主席米古诺夫是富农。利亚克苏特金同志写道:“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有人喊:还有情况更糟的吗?

莫洛托夫:有。但我认为这已足够说明问题,我不追求最轰动的例子。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的政策就是由这样一些人来实行的。怎么可以认为这些

* 原文如此。——俄文编者注

人能保证正确地实行工人阶级的政策,实行进攻富农、切实保护贫雇农和帮助中农的政策,更不要说农村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的任务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地方机关工作中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滥用第107条和一般的歪曲事件,盘踞在某些国家机关中的富农分子和白卫分子故意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对上级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指示不屑一顾,但却常常不受处罚。

最后对我们驻外机构的缺点说上两句。前不久搞过一次统计,对于这些年来不想从国外返回苏联的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的数量提供了准确的材料。这种人在我们的驻外机构中有132个,其中18人是共产党员。这是整个十年的情况,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拒绝返回苏联的人中共产党员也不在少数。而且据说就是这些人在我们的驻外机构中实行党的政策!不能认为这方面的情况令人满意。

关于根本改进我们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的选拔问题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同时需要借助群众的批评、借助群众参与苏维埃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我们机关的检查,大胆提拔新干部。自我批评的口号对于国家机关来说具有现实意义。

有人喊:自我批评只触及经济工作负责人。

莫洛托夫:一部分经济工作负责人大致真正感受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触及了他们。自我批评还应当触及其他人。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无须多说。

喊声:休息,休息!

(休息后)

主席(李可夫):请莫洛托夫同志继续作报告。

莫洛托夫:同志们!我们已经不是第一年提出关于复苏苏维埃的问题了。由于工人群众以及广大农村群众积极性的提高,这项任务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在实际复苏苏维埃方面我们的进展异常缓慢。现在我们无论如何要在这方面,在根本改善国家机关方面取得真正重大的进展。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要依靠无产阶级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

鉴于改造时期的基本任务,工会工作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工会是工人专政的基本杠杆和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学校。工会应当在提高生产、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吸引广大工人群众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方面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同时工会组织应最大限度地注意保护工人的利益。为此应更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分子、脱离群众的墨守成规分子以及对待工

人群众落后阶层的尾巴主义情绪进行斗争。几星期后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³¹⁰将对工会工作进行总结,表彰成绩,当然也要批评不足,尤其是工会民主和自我批评方面。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特别指出群众组织,首先是工会工作中的不足,这些不足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有多么落后。最近报刊上广为报道的侮辱犹太女工巴尔沙伊的博布鲁伊斯克事件令人气愤,这一事件突出表明了我们某些工会机关(其实不只是工会机关,还有党和其他机关)工作的落后。现在中央和地方报刊都在报道这一事件。确实,很难举出比博布鲁伊斯克区的一座工厂发生的反犹太人兽行更卑鄙的例子来。

现在大家都已知道了,事件的经过。我引用的都是近几期《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³¹¹上的材料。

“‘十月’玻璃厂(博布鲁伊斯克区)发生了欺负和辱骂犹太女工巴尔沙伊的事件。三个工长——托奇林、格拉德科夫和格鲁兹杰夫——老是找这名女工的碴儿,叫她犹太佬,想方设法欺侮她。可是他们的行径并不止这些。前不久工长托奇林在午休时扯下姑娘的连衣裙,将一股股凉水倒在她裸露的身体上。聚在一旁的工人们看着工长们野蛮的恶作剧直笑。”我没有引用其他人的描述,还有更野蛮的侮辱和流氓行为。之所以能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反犹太人的丑行,显然是由于工厂里没有开展任何文化工作和群众工作。在我们当中,甚至在工人中间一再出现反犹太人丑行和辱骂行为且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仅此一点就说明,这方面工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这样的事件只有在完全不同反犹太主义作斗争,根本不关注文化工作,工会、党及其他组织对辱骂和暴力的受害者根本不注意保护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地方组织在报刊报道之后对这一事件表明态度很说明问题。在报纸上的第一批消息发表之后不久,在距工厂几公里的地方召开了区党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代表区委作报告的是女工巴尔沙伊一案调查委员会主席,他就是博布鲁伊斯克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巴姆皮同志。但在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仍然根本没提“十月”工厂犹太女工受辱一事。白俄罗斯化学家中央委员会派他们的秘书库德里亚耶夫同志参加该区调查“十月”工厂事件委员会。库德里亚耶夫同志参加了“调查”委员会,去了工厂附近,可就是没工夫去工厂看看。可以列举大量其他事实来说明地方工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对工人及女工令人愤慨的不关心态度。现在,由于人们议论纷纷,地方组织开始有所行动。现在在白俄罗斯的区工会机关及中央工会机关的决议中不仅抨击这种反犹太主义的辱骂行

为是阶级敌人的进攻,而且还强调指出存在其他反犹太人的丑行和流氓行为。但是仍然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在工厂里,而且是在有800多人工作的工厂里,也就是博布鲁伊斯克区最大的一家工厂里一再出现反犹太人的丑行和侮辱女工的流氓行为时,我们的组织到哪儿去了。地方工会组织与工人最起码的联系在哪儿,它们对女工的关心在哪儿,工会、党及其他机关对工人和女工的关心又体现在哪儿?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强调在我们的群众组织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我再举一个没那么严重,但十分突出的例子。这一次事情与博布鲁伊斯克区无关,而是发生在莫斯科。刚才我听说了发生在“新曙光”工厂女工科斯季娜家的事。科斯季娜同志昨晚从工厂下班回家后发现自家的家人——丈夫和5岁的孩子——被从屋里赶到了走廊上。从莫斯科化工工会理事会的住宅里被强迫迁出。要知道,科斯季娜的丈夫曾是该理事会的门卫,几个月前被解雇,还没有找到其他的住房,于是在有关的苏维埃机关的协助下这个工人家庭被强迫迁出了化工工会理事会的住宅。这件与一位女工,与一位加入了化工工会的共产党员女工有关的事就发生在莫斯科的中心(格奥尔吉耶夫斯基街)。还用得着去远处找官僚主义的、不关心工人需求的例子吗?这件不大的事不正说明没必要去博布鲁伊斯克区找类似的例子吗?

我不想再举例说明工会机关等工作中的不足。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只要回忆一下几年前党提出的关于工会任务的列宁主义决议即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指出:“与群众,即与绝大多数工人(其次是全体劳动者)的联系是工会任何活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决议接着指出,工会中尤其需要共产党员,“他们应当体验工人的生活,对它了如指掌,能够根据任何问题随时准确无误地判断群众的情绪,了解他们真正的渴望、需求、想法,能够丝毫不理想化地判断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旧时代某些偏见及残余的影响力,能够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尽力满足其需要从而获得他们的无限信任”。以上列举的事实说明,为了更加坚定不移地把工会工作朝这项列宁主义决议指出的方向推进,我们需要做许多事情。因此在政治局提出的决议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实际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和真正发展工会民主方面还要取得更大的进展”。我们的工会团结着9/10以上的工人群众。这是工会工作的巨大优势,但也是巨大的困难。工人阶级中既有先进分子,也有落后分子。落后阶层的存在不可能不对工会工作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在工会民主和工会中的自我批评方面确实有明显进展,这种涉及广大工人和职员群众的进展具有

极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更加坚定地在这个方面工作,力争使我们的群众组织更加关注工人和女工的需求,充分利用它们掌握的巨大潜力来动员工人群众去解决基本任务并克服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

下面我谈谈党组织本身的情况。

应当坦率地讲,我们习惯于把党的生活中的许多坏人坏事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来加以概括——“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常常把那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所完全不能容忍的事情归结为“不正常的现象”和“毛病”。而且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在党组织中的许多方面仍有所表现。同时在我们的条件下真正开展党内民主对于发展无产阶级民主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党组织应当走在其他组织的前面。

鉴于目前工厂的状况,党的工作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是我们的主要基地,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改进工作。然而即使是在大企业里,我们的党组织有时候也没有起到真正先锋队和工人组织中心的作用,而是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

不久前发生在莫斯科省的一座大型工厂——波多利斯克机械厂的事情可谓是这种状况的明证。10月5日,加里宁同志在有7000人出席的全厂工人大会上作了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明显露出非无产阶级情绪。几个人发表了典型的富农讲话。加里宁同志不仅遭到批评,而且多次遭到恶毒的反革命攻击。大多数共产党员在会上的表现和作用很说明问题。当然,一些同志对个别“工人”(实际是典型的富农分子)明显的富农言论给予了应有的驳斥,但拥有500人的支部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在会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工厂中的党员向来不把全厂工人大会当回事,认为最好由党来处理所有的问题,而且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责任到此结束。可以举出许多党员这样对待工人大会的事情。对此我们还没有进行必要的斗争。出席波多利斯克厂这次大会的党员并不少,但在反击敌对情绪和反苏维埃行为上表现得非常软弱。

地方党组织的表现这样软弱并非偶然。它反映出党在企业中的工作普遍软弱。波多利斯克厂有大量半农村工人,但该厂至少有1000名技术熟练的工人。以下事实(援引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鼓动材料)表明党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车间公开会议,900—1000名非党工人中有7—8人出席;党的教育系统总共吸收了7名非党工人;工厂的墙报每年只出4期;工人入党人数极少,等等。不根本改善党在工厂中的工作,企业党支部就不能发挥真正先锋队的作用——10月

5日的大会对此是一个应有的教训。

下面我将引用一位工人来信中的几段话,这些话使我们认识到甚至在工厂党的生活中也有腐化分子。我要援引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人莫罗兹的来信,前不久他在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中阐明了自己退党的理由。下面是莫罗兹同志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评价:

“我是一名冶金工人,今年42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列宁工厂作轧钢工,工龄26年。我从14岁起开始做工,亲身感受过资本主义剥削的滋味。参加过帝国主义大厮杀,当过3年俘虏,1918年年末回到家乡。1923年入党。下面我将向你们说明我退党的理由。我上过3所政治常识学校,最后一所为提高类,还上过一所普通教育学校。我从入党之日起就希望将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革命,我为党积极工作了4年,这期间我几乎连任车间支部委员,我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曾任市、村苏维埃委员,车间工会负责人,工会代表等。积极与我们车间的反对派进行斗争。在凯达克党代表会议³¹²上我第一个发言反对拉柯夫斯基,但是突然之间我的生活航线转到了相反的一边,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就像‘神’话一样,在我们领导机关的促进下,我突然变成了……反对派。但我要从头开始。我在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说过,我希望参加争取世界革命的伟大斗争,我这样写是问心无愧的,没有任何别的用意。但当我开始观察了解党的生活,当我接触到党的生活中所有不好的东西(任人唯亲、自私自利、阿谀奉承等)时,我震惊了。生产支部变成了庇护所,党员们恬不知耻地为自己讨要挣钱多的职务,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以退党相要挟并去区委告状。”

下面是莫罗兹同志在这封信中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想说一说工人群众说的话:

(1)工人群众认为,应当停止提拔干部,因为现有的干部够用10年,否则庞大的编制使支部难以精简,因为新提拔的数十名干部都抓住自己的职位不放,如同溺水者抓救命稻草一样。有一个例子:工会基层委员会精简了总工长(职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又给恢复了,而且还因此解散了工会基层委员会。

(2)工人群众认为,应当进行全面清党,而且要毫不留情,现在许多人披着工人的外衣,各种卑鄙龌龊之人打着工人的幌子钻进党内。通过初步的动员已经看出,许多自私自利者隐藏在这块招牌之下。留下一少半就行,但这是为了让党成为燧石,而非果羹。我们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靠百万人的党,而是靠数万人的、铁一般的党。当你们将所有自私分子赶出党外(为此需要吸引广大非党群众,清除党的队伍中的一切污泥浊水)时,党员的流失就会停止。”

我曾征询过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作的梅德韦杰夫同志以及其他乌克兰同志对该信作者的看法。他们向我表示,莫罗兹同志的意见值得重视。当然,绝不能同意莫罗兹同志的结论。他的眼界因其周围的生活环境而过于狭窄。他反对从工人中提拔干部显然是错误的,尽管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做法具有争名夺利和自私自利的特征,也就是说有时在实践中被歪曲了。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莫罗兹同志在一个方面,即在关于全面清党的必要性方面正确地引用了工人群众的意见。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对的。

喊声:没错!

莫洛托夫:清党问题从不同方面提了出来。农村党组织的状况要求在这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对机关支部来说也应如此。还有,对工厂组织应提出审查和改善其成分的问题。我们应当把加紧吸收工人和女工人党与审查和清理我们组织的措施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近几年内花费了多少精力来审查和清理我们的组织,我们未必可以认为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可以说,这几年内所实行的相关措施过于软弱,过于温和。在这方面,我们各级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进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和中央委员会也应承担责任。

下面举一些近几年内被开除出党人数的材料:1925年被开除出党的人占2.3%,1926年占2.3%,1927年占1.5%。今年上半年占1.1%。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被开除出党的百分比在下降,但同时自愿退党的百分比却在增长。令人遗憾的是,退党人员中工人所占比例特别高。对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将专门援引关于如何同党内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材料。我所举的数字出自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材料。1926年上半年因官僚主义、利用职权及任人唯亲被追究责任者占(被追究者总数的)7%。1927年下半年因这些过失被追究者已占(被追究者总数的)8%。但是如果说第一年被开除者百分比达到了4.5%,那么第二年则仅为2.2%。也就是说,1926年因上述过失被追究责任者有大约2/3被开除出党,1927年被开除出党者则降至1/4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说中央监察委员会过于软弱,不够严厉。

有人喊:没错!

有人喊:人道的机关!

莫洛托夫:目前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尤为必要。

上述相当一部分工人退党的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像巴库这样强有力的组织不久前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退党。这意味着,在工人大量涌

入我们组织的情况下新党员干部不善于工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近一时期我们在自我批评的口号下展开了全面工作。我们已揭露出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弊端。那些轰动一时的事件,如斯摩棱斯克事件³¹³、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³¹⁴、索契事件³¹⁵等,大家都记忆犹新。我们应当在自我批评的口号下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现在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在开展群众性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清理我们的组织方面采取重要的实际步骤?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经落后?为了让工人完全清楚自我批评这一口号具有的深刻的实际意义,我们应当坚决果断地铲除我们多次揭露的腐朽的东西和腐化分子。不能光是叫喊症结,而不由此得出清除党内腐化分子的实际结论。我认为,全面清党迫在眉睫。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愈来愈触及清理党组织的问题。如果说对于国家机关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实行一系列更加坚决的反官僚主义实际措施的话,那么对于党组织则要提出清党问题。这两项任务在目前的条件下彼此相连。显然,在最近召开的全苏党代表会议³¹⁶上我们将认真对待这些任务。

我们提出了在最近两年内保证使党的成分中一线工人不少于50%的任务。我们应当大胆地着手实施这项任务。一方面我们应当坚决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混入党内分子、异己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应当将工厂、农业工人及雇农中的优秀的无产阶级骨干补充进我们的组织。这些新补充的先进工人和女工使我们得到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新补充的无产阶级力量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党组织。1919年列宁在总结莫斯科征收党员周吸收工人入党工作时指出了工人阶级新生力量进入党内的巨大的积极意义。列宁在指出这些新干部大多缺乏国家管理经验这一事实时强调说,“他们比别的人更有力量,更富朝气,更耿直,更坚强,更真诚”,因此他建议“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³¹⁷在无产阶级干部大大增强的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期望,大量工人入党将使我们得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补充人员、一批又一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和真正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大量新干部入党应当引起我们对全体党员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重视。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大力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以及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情况下,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责任大大增加。

我在作报告的时候多次将目前的党内状况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期相比较。众所周知,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使近20万工人成了新党员。新的无产阶级骨干大量涌入联共(布)队伍是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出现的最好回答,该反

对派于1923年底开始与党进行公开的斗争。

托洛茨基反对派最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某些阶层中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他们从1923年秋开始公开反对党的路线。正是在那个时期,当我们在恢复工业和确立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方面迈出最初的重要几步时,当合作社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的商品流转方面取得最初的重大成就时,在农业确实开始明显提高时,从党的队伍中传来了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关于十月革命危机和灭亡的叫喊。应当记住,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时,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基础开始明显巩固,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由于资本主义成分比重下降而开始明显上升时,明显受到国内小资产阶级情绪影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开始批评和指责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20万无产者加入联共的队伍——对当时的反对派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动摇与惊慌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众所周知,由于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孟什维克开始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随后的分裂。孟什维克达林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比作“特洛伊木马”,说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把共产主义的敌人从自己的肚子里放出来并使党分裂。然而后来近5年的历史大大地嘲笑了孟什维克的预言。从那时起,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相当大部分成为了党的基层积极分子。可以说,正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期间进入我们组织的那部分工人现在成了工人积极分子的主要骨干。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工人支部中2/3以上的支部成员是为纪念列宁而被吸收入党及在这之后入党的。这些支部的书记几乎也是这种情况。从那时起工人支部大大增加并变得坚强起来,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团结。在与反对派斗争时期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入党的工人骨干始终与坚决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党内优秀分子站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对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情况下与各种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斗争的问题再次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1923年年底,从著名的“46人”声明³¹⁸开始,托洛茨基反对派自新经济政策时期起第一次转向与党进行公开的斗争。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斗争的几个阶段都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将那些试图在左的词句掩饰下在党内为半孟什维克政策辩护的人赶出了布尔什维克组织。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胜利缺乏信心的表现。托洛茨基主义被粉碎,其骨干被开除出党。然而现在我们看到,托洛茨基分子又蠢蠢欲动,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党内部分复活。近一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斗争不力,这点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加以注意。

另一方面,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近来有所抬头。这也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一种表现,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反映。右倾是在我国经济形势更加紧张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不能说,右倾的出现只与今年的局势有关。无疑,右倾的根源更深。不能把右倾视为一时的现象。

右倾作为机会主义的一种露骨表现,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下将党的阵地拱手交出。在开始改造整个经济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困难、最重要的时期,在执行党所制定的方针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摇摆不能不在我们党的某些阶层中有所反映。尽管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困难而漫长,我们还是着手实行这些任务。我们的任务确实伟大而艰巨。在工业方面,我们必须增加基建开支以使重工业得到特别发展,这样将会大大提高产量,但不是马上,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们在生产合作化及农业集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工作规模也在逐步扩大。工农业方面的这些任务是长期的,但是要求现在就集中全部力量去做。这里我们要认真地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铲除从数百万小商品经济获得其所需养分的资本主义根子方面多年持续不断地工作。我们要完成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中,最困难、最根本的任务。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动摇以及公开机会主义情绪的死灰复燃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右倾不只是与经济困难有关。机会主义增长的危险在于改造时期所伴生的特殊困难。

所有这些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现在需要在两条战线同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必须加强与党外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并同党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死灰复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党不允许向托洛茨基分子及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作任何让步。另一方面,党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更加坚强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考虑到目前的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必须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与右倾危险的斗争上来,集中到与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上来。现阶段阶级斗争的激化使后一项任务以及反对对党内右倾危险采取任何调和主义态度的斗争任务更加突出。

下面我着重分析一下两种倾向的思想特征。背离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各种倾向与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农民占多数且处于外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的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条件这一基本问题有关。无论是托洛茨基主义,还是犯有各种错误的右倾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条件列宁曾说过,这个问题可以撇开外部环境来

提出。列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³¹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定义非常坚决地强调了维护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但这个定义不光提到了这一点。定义还指出了执政的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的必要性。因此，列宁关于专政的定义提出了两种思想：工人同农民联盟的思想以及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思想。

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体系与列宁的这一定义格格不入。托洛茨基主义从一开始就不重视同农民联盟的思想。它实际上否定这一思想并成为反中农的思想体系。无论托洛茨基主义如何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反中农政策，其实质就是否定列宁的一个基本思想——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思想。

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忽略了列宁定义的第二部分。右倾强调同农民联盟的思想的意义，但实际上丢掉了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思想。不管这一点是否以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右倾的特点就是不重视、实际上是放弃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思想。这样右倾就歪曲了列宁关于专政的最高原则的定义。所以说右倾的思想体系与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上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的实质在于，它包含两种思想——同农民联盟的思想和工人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思想。列宁的定义是二位一体的，而右倾和左倾则将其分割开来，从而使其遭到彻底的歪曲。无论如何，党的整个政策和全部实践都是列宁这个二位一体的定义的体现。

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期，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党始终特别坚持必须无条件地同农民结成联盟。党过去和现在都坚定地认为，没有同农民的牢固联盟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一联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将灭亡。我们为捍卫这一思想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使这一思想基本上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这是斗争最重要的成果和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但我们不能不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以及强调同中农联盟的重要性被人片面地理解。党员中的一些人只记得列宁定义中的这一部分，只记得同中农联盟的必要性。这样理解“专政的最高原则”导致对列宁定义的歪曲和实际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无疑，应当坚持同中农联盟的思想，因为这是专政胜利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但目前我们应当坚决反对错误理解列宁同农民联盟的思想，这种错误表现为不重视工人阶级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党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否定同中农牢固联盟的必要性、不愿考虑农民基本群众的状况及生活条件的思想。但党同样应当反对要求放弃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从而在小

资产阶级情绪的压力下将工人阶级的基本阵地拱手让出的思想。右倾在这一点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右倾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从弗鲁姆金同志所持的观点来看,右倾思想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弗鲁姆金同志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两封信³²⁰中和本次全会的发言中充分揭示了右倾的实质。他在中央全会的发言中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如下表述:“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对我们来说什么更危险:是缺少粮食还是富农带来的危险?这样你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种提法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问题:如果我们同富农进行斗争,我们就有粮食;而如果我们同富农进行斗争,我们就没有粮食。这是不折不扣的惧怕富农的思想。应当记住,粮食的主要生产者不是富农,而是农村的中农群众。当然,我们也从拥有一定数量商品粮的富农那里购买粮食。但是谁也没有提出不买或是不付给富农这部分粮款。问题显然不在于此。不能采取只顾今天,不顾明天,不顾全局的鼠目寸光的官僚观点。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不考虑明天的利益、不了解发展的前景就无法解决的重大任务。弗鲁姆金同志信奉的右倾哲学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贫农和中农经济发展的最困难问题的障碍之一。如果因现时农村的上层富农问题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如果把解决当前的基本任务同上层富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么非但不能摆脱困难,而且会加深和扩大这些困难。粮食问题与发展农村贫农和中农群众的经济紧密相连。弗鲁姆金同志偏离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思想不仅不能帮助,反而会使无产阶级国家更难摆脱当前的经济困难。

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他的观点就是竭力回避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回避切实发展贫农和中农群众经济的任务。不仅如此,弗鲁姆金同志还劝说我们:“我们不应该妨碍富农农户的生产。”这种观点的含义非常清楚。弗鲁姆金同志是在鼓吹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思想。

有人喊:没错!

莫洛托夫:这就是弗鲁姆金同志思想中的“新东西”。弗鲁姆金同志为什么会产生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难道这是可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可以顺利推进我国经济改造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与农村资本主义上层合作的思想是与我们党格格不入的,它是机会主义的思想,是右倾的思想。弗鲁姆金同志是当前这一思想最完整的表达者。

这一倾向的社会本质是清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农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特别是在经济形势紧张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动摇必然会一次又一次产生。应当承认,在我们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关中官僚主义病态严重,这不能不反映到国

家机关一部分党员的身上。国家机关时常而且明显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与这些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党内的反无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在小资产阶级阶层通过国家机关对党内个别阶层产生明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时,我们应当加强思想斗争,不让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健康的党员。在目前阶段,我们首先应当同右倾以及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思想斗争,这一斗争(还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变种的斗争)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我们就越是能阻止和削弱这一与党格格不入的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弗鲁姆金同志的观点的核心是维护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那么这也是一条完整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机会主义是同资产阶级合作,同资本家合作的思想。这一思想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不容许用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合作的思想来偷换同中农联盟的思想,实际上弗鲁姆金同志就是这样做的。绝不能把我们在保证执政的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同中农的联盟等同于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合作。相反,为了进一步加强同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为了更加坚决地铲除资本主义根源,我们必须同中农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之路。

近年来党已吸收大量新无产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党以此加强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巩固了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这一点通过反击托洛茨基主义得到了最好的证实。党也将给予右倾一致且致命的回击。

在我们党这样一个集中的组织内,部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不要忘记,近5—7年内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现在党员群众对动摇以及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表现的反应要快得多,也积极得多。最近一些与反对右倾斗争有关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党员群众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对党的大力支持是我国建设进一步取得实际成就以及党坚定不移地实行列宁主义路线的保证。(鼓掌)

主席:可以开始讨论了吗?还有半小时。

喊声:可以。

主席:现在请斯捷茨基同志发言。

斯捷茨基:如果看一下工人充实我党队伍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中1919年³²¹、1924年³²²、1925年³²³和1927年³²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几年。在这几年里我们党向工人阶级发出号召,呼吁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几年我们党的队伍靠工人阶级得到了相当大的充实。

以列宁格勒组织为例,在列宁格勒组织中的10万党员中有6万是我们在这

几年,在这些日子,在我们党开展的这几场运动中吸收入党的。这些运动大大充实了我们党的队伍。但与此同时在这些运动的间隔时期我们放松了吸收党员的工作。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全部集中在这些突击性的时期。而在这些运动的间隔时期我们放松了吸收工作。同时这些在我们国内和我们党内最困难的时期开展的运动,一方面给工人阶级队伍带来了最好的、最自觉的东西,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仔细挑选,结果那些成为我党队伍包袱的人也混进了党内。

现在充实党的队伍的任务有所不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有步骤地吸收优秀非党工人入党。自然,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不得不按另一种方式来安排工作,按另一种方式来安排我们的群众工作,而吸收党外人士入党是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目的。

中央目前向我们提出的这项任务使列宁格勒组织也承担起极大的责任。目前列宁格勒市组织共有 100 525 名党员,其中 59% 为一线工人。应当说,最近一年内我们组织中一线工人的比例有所增加。1928 年 1 月 1 日一线工人占 57.4%,到 10 月 1 日一线工人已占 59%。但目前中央向我党提出的这项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并在最近两年内吸收 54 000 名一线工人加入组织,使工人达到全体党员的 2/3。不言而喻,这项任务要求党组织进行大量而紧张的工作。在列宁格勒我们有进行这种补充的相应的后备力量吗?当然有。这种力量在大企业中也有,在这些企业里工人党员的比例还不够高,至少还可以提高。目前大企业中的党员占 19%,而小企业的党员比例为 28%。显而易见,如果将工作重心转向车间支部,我们就能大大提高吸收一线工人入党的工作。

此外,某些企业,如冶金工业企业和纺织工业企业的一线工人党员比例存在极大的差别。如果说冶金工业企业的一线工人党员比例达到 22%,那么纺织工业企业则只有 11%。这里吸收一线工人入党的空间相当大。最后,在列宁格勒,在我们的工会组织、苏维埃组织、合作社周围有大量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中有大约 6 万名工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近 6 万名一线工人共青团员,他们同样是我们党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很自然,我们的组织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尽管要费很大的劲。

我们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即着手补充我们组织的工人党员核心,并在最近几个月内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州委会已向我们的各区组织下达了有关指示。先后在“普季洛韦茨”、“红三角”等工厂和各地区召开了非党工人专门会议,会上澄清了工人入党问题。这些会议具有极大的意义。会议唤醒了工人积极分子并提

供了大量有关工人对党的态度问题的材料。在提出入党问题时工人们说了些什么,他们有哪些疑虑和犹豫?在我们几个最大的工人区召开的这些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说工人对党的政治路线存有什么较大的疑虑。没有这样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意见和疑虑都是针对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状况的,是针对工人所面临的各种日常障碍的。比如在 these 会议上曾经谈论过,库拉科夫厂的一名工人说:“在我国的建设中,异己分子总是捣乱,而诚实的非党工人却很少得到信任。”这是阻碍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些人说:“入党就要进行政治学习,我当然不反对这样做,但要结合实际,不了解历史,有时很难。”这里学习负担重也是一个困难。下一位说:“大多数有高度技能的工人不入党是因为不想和那些过去反对过我们的官吏及官僚共事。如果是红色专家的话,那工人们就都加入联共了。”另一位说:“应当建立铁一般的党的纪律,不允许纪律涣散及官僚主义继续发展。”

女工谈的主要是一些妨碍入党的日常问题。比如,“红旗”厂的一位女工指出:“如果入了党,就需要做一些工作,就要承担一些责任,而在干了8个小时的活之后很难再有精力做这些。这是许多女工,尤其是中年女工不入党的原因。”妨碍老工人入党另有原因——他们不愿“受年轻人支配”。使他们犹豫不决的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入党,受年轻人的支配,还要有6个月的预备期,这不合适,再说现在和谁斗争,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就是非党工人的意见。这种意见表明,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政治障碍或是来自工人阶级的疑虑,这里只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考虑,主要是女工的困难情况和中老年工人的特殊情况。显而易见,这些情况不是“不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成功地说服了工人并将入党工作推向前进。

如果我们看看列宁格勒组织是如何开展这项工作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在,即在这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28年7—9月已收到4661份入党申请书,而1928年前3个月为2661份,1927年7—9月为1636份。可以说,现在在列宁格勒工作已全面展开。

我应当着重谈谈当前有助于吸收工人入党的主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我们组织内开展自我批评和无产阶级民主。现在工人们看到,党已开始与机关中的缺点及不良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党正在吸引基层群众参加这一斗争,这一工作不讲情面地进行,现在这唤起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对我们党的信任。现在每一个工人都感觉到,他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极重要的一点,它有助于吸引工人加入我们党的队伍。

第二个条件非常重要,这就是将非党工人提拔到我们的工会、合作社及苏维埃组织的领导机构中。这一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些被提拔者中有充实党的队伍的最直接、最接近的后备力量。只要指出列宁格勒第十届苏维埃中50%的非党苏维埃成员在任期届满时都加入了党组织就足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提拔向工人表明,党不只是批评自己的错误,也不只是采取措施来改善苏维埃的工作等,党同时还采取严格的措施使工人在这些机关中占大多数。另一方面,被提拔者使我们的机关有可能更加关注、更加贴近工人群众。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对待妇女的例子。当女工占多数的“红线”厂(维堡区)由男领导人员管理时,吸收妇女入党的工作进展很慢。但当这些男领导人员被免职并提拔该厂女工接替他们的职务后,入党申请书的数量一月之间就增加了一倍,这是因为这些新女领导者更贴近也更关心企业妇女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我认为,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注意,尤其是妇女后备力量我们还远未利用起来。在列宁格勒组织中妇女只占20%。毫无疑问,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而在女代表工作方面我们可做的还很多。

最后一个条件是我们吸收工人入党工作极为重要的条件,也是主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组织自上而下实行鲜明、明确的政治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目前我们正处在困难的、阶级斗争激化的环境之中,敌对阶级不仅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抵抗,而且通过多种渠道试图对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以及我们党的队伍施加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无产阶级和我们党的阶级警惕性及敏锐性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绝不能说目前在我们组织内开展的反右倾危险的广泛运动似乎是无的放矢。

要知道,不仅在农村支部内有些领导者会对富农纵容姑息,而且在我们城市支部内也存在尾巴主义的现象,于是在困难的影响下,有时会出现我们的政策不正确的议论。甚至在出现像弗鲁姆金的信这种文件的上级机关里也存在我们应当与之斗争并应动员党员群众加以反对的右倾危险分子。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让工人对目前力量的阶级分布情况、对阶级斗争的性质和动态、对我们的方针有一个清楚明了的认识。

在此我应当指出,我们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持这种敏锐性。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应当同所有掩饰和掩盖阶级斗争并因此而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的人进行斗争。同时我们也要指出那些在这方面作出不正确或不准确展望或是曲解我党提出的方针的人的错误。最近我们中间有人对阶级斗争前景作出了不正确的判

断。我对《经济生活报》1928年9月30日发表的社论感到惊讶。在这份我国经济刊物的指导性机关报中,在一篇展望下一个经济年度的文章中,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进程作了表述,我想大家谁也不会同意这一表述。社论阐述了下面这一原则性观点:“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程度是与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程度成正比的。”这是错误的观点。这不是辩证的提法,因为按照过渡时期的这一特殊定律,事情应当是这样的,即在那一美好时刻——当我们早上醒来时看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生活在无阶级的社会里——到来之前我们将一直生活在阶级斗争不断增长的时代。显然,事情远非如此。当我们为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取得胜利后,随着已经给予和仍将给予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某种可能性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我国的经济成了这一斗争的主要舞台,而且当初我们是为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经济阵地而进行斗争。现在,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的任务从保持和巩固我们的阵地变为扩大这些阵地,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资本主义成分发动进攻。而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阶级敌人的反抗以及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的进逼,我们无疑将面临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但同样,同志们,毫无疑问,我国庞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越强大,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越巩固,我们也就更容易地战胜我国阶级敌人的反抗,尽管阶级斗争今后不会失去其尖锐性,但其规模和强度将会有所不同,因为敌人在我们今后的进攻下将会日益衰弱,而我们将日益巩固。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表述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忽略了巩固与农民基本群众联盟的必要性,而我们必须在这一联盟的支持下把事业推向前进并建立起无阶级的社会。

但是,同志们,毫无疑问,现在,在目前阶段,在当前时期,我们无疑将面临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而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农村都将是这场斗争的主要舞台。但是这场斗争不只是在经济方面进行,它的舞台也不只是在农村,它的舞台还包括文化领域。莫洛托夫同志今天所讲的东西,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列举的有关某些学者近期言行的事例,这些言行都是很说明问题的。这些臭名昭著的白卫言行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目前在这一领域,在文化领域转入进攻有关。我们在4月和7月通过了关于我国技术干部的决议³²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阵地上,在企业技术领导阵地上的进攻。我们现在正在向旧文化堡垒之一——科学院挺进³²⁶,可惜的是,科学在那里至今仍与最臭名昭著的蒙昧主义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这一进攻遇到了

阶级敌人的相应抵抗和回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即当我们发动进攻并需要战胜阶级敌人的顽强抵抗时,当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同我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进行交锋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克服目前已在我党队伍中表现出来并试图拉我们倒退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危险,我们还需要在工业化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右倾危险问题上同各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吞吞吐吐的言论进行斗争,因为在我国政策基本问题上的这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言论和动摇会在工人阶级落后阶层以及某些党员中引起极坏的、令人厌恶的共鸣。这会给我们在党的旗帜下动员工人阶级的事业造成困难。

最后我应当指出,近几年来列宁格勒组织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坚定性和稳定性。今后它仍将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坚定性。

主席:还有5分钟。现在休息吃午饭。

第十四次会议

11月23日晚间

主席(C.柯秀尔):首先请瓦雷基斯同志发言,然后是米柳亭同志。

瓦雷基斯:我认为中央全会提出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成分问题,以及目前关于在我们党内进行系统清理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毫无疑问,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首先我们的某些组织中表现出动摇和不稳定性,缺乏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必需的共产主义坚定性,其次,腐化堕落现象比比皆是,不光是索契组织³²⁷、斯摩棱斯克³²⁸组织有,其他许多组织也有,尤其是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组织情况更为严重。

什基里亚托夫:斯摩棱斯克组织不是最基层组织。

瓦雷基斯:我说的是不光斯摩棱斯克组织有,其他许多组织也有,尤其是我们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我们在11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期间所采用的招收党员方式通常有两种:系统的日常工作和运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当然,我们的最大不足在于,对系统的日常组织工作,即在非党工人中进行党性宣传极不重视。如果说革命前我们在向工人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吸收工人入党的目的和任务方面进行过大量工作的话,那么革命后我们则很少在日常的群众组织工作中进行这样的宣传。在非党工人中进行党性宣传的任务对每一个工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如果他在实际上想成为一名先进战士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入党;要为争取每一名新党员而不懈地斗争;要在自己的整个群众工作中提出具体的实际任务,以便将所有的工人新干部吸收到党内,从而不断地巩固党——国内无产阶级领导的基础,而这恰好是我们日常群众工作中最为薄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若是我们在目前已经具备开展我们党的工作、大量招收工人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情况下,若是我们在将一种方式与另一种方式相比较之后,认为不需要运动,而只需要系统的工作或者是不需要系统的工作,而只应当以运动的方式进

行招收,并且在这些运动之间不需要在非党群众中进行任何有关党性、有关招收工人的工作,这同样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运动。相反,在革命的每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如果我们能动员优秀的工人,吸收他们入党,我们就应当这么做。在列宁去世时就曾这样正确地做过——把工人阶级动员在党的周围并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1927年10月也曾这样正确地做过,尽管事先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我们今后也不应该拒绝这么做。比如说举这么一个例子:如果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怎么办?这可是革命、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关头之一。我想,我们谁也无法拒绝战争,因为战争的危險正在增加,而我们同战争危險进行斗争,全力做好在战争中进行反击的准备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样的关头开展运动,开展大规模招收党员的运动或许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运用两种方式是非常正确的:一是运动,这样可以吸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二是在群众中进行系统的日常的党性宣传。我认为,对于我们党的状况,尤其是农村支部、农村党组织的状况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已作了非常正确的描述。纵观我们最落后的中部黑土地地区党组织的状况——那里农村党员数量极少,我们确信,基层组织、基层农村党组织非常薄弱。而且不光是薄弱,还受到腐化分子的腐蚀。我们在区域划分之后对党的基层组织——区、乡、村的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最终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些组织进行清理。这种事奥廖尔区有,库尔斯克区也有这种现象,不久前我们在对坦波夫区农村组织进行调查时也遇到过。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只要是我們接触过的基层农村组织,都混进了富农分子,与富农勾结在一起的分子,公开的腐化分子。我觉得,1925年以后,也就是对我们的农村组织进行清理之后,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农村组织重又变得混杂起来。我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建议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清理这些组织,但我以为可以通过重新审查这些基层农村组织的成分来对农村组织进行大清理。

有人喊:那职员呢?

瓦雷基斯:我不知道,对城市组织该怎么办。让工人地区的同志们说吧,他们在这方面更有发言权,你们要是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太可笑了。我个人认为在工人地区不需要审查成分。

或许,应当在工人支部中真正最广泛地使用自我批评的口号,使其成为清除所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腐化分子的工具。如果我们认为清理只是审查成分,那就不完全正确了。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有三种清理形式:(1)负责我党清理工作的监察委员会的系统日常工作;(2)偶尔对某个[支部]或整个组织、

甚至是全党(1921年)³²⁹的成分的定期审查;(3)系统地开展群众性自我批评,而且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自我批评,而是实际上不仅纠正错误,还对所有腐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对所有具体弊端——官僚主义、腐化等的公开载体进行毫不留情清理的自我批评。我认为这就是在一定情况下这三种形式都可以接受的原因,而且,在开展自我批评的情况下监察委员会会有极大的可能来进行这项工作。假如我们对全党进行普遍的重新审查,实行我们在1921年底实行过的大清理,那肯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但这不是全部。我认为,可以只进行大清理,即对农村组织进行重新审查并利用自我批评的口号对无产阶级组织进行真正的清理。

说到农村组织,则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存在极大的不足。顺便说一句,这与我们干部极度缺乏有关。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农村组织中的那种不得力的干部。毫无疑问,在这里进行清理是必要的。革命的经验已向我们证明并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但如果我们不提出加强农村组织的任务,不在农村培养和造就能在目前紧张的农村阶级关系这一复杂情况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那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的话,就目前条件来说,缺乏这样的干部,我们将很快再现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极具说服力地揭示的所有不足。因此我认为,关于干部、关于这些干部在农村的增加以及他们的培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顺便说一句,在农村建党必须得有这些干部,因为我们知道在那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小商品生产者的影响非常严重,小商品生产者极力追求积累,贫农和中农也拼命追求积累。而这种欲望在沾染了小商品生产者所有不可避免的偏见的农村共产党员身上同样存在。农村党员在管理个体经济的过程中往往由贫农变成了中农,再由中农变成了富裕户。难怪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说富裕户和富农在农村组织中所占的百分比要比他们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高得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农村党组织专门招收富裕户。它们招收的往往都是贫农和中农。但是这个中农在入党之后即开始利用合作社和苏维埃等机关的党支部所授予他的权利。这样一来,他往往获得了积累的额外来源。同志们,我认为,干部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在农村进行的这项重要政治工作中,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在农村如果不同敌对阶级,即农业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真正彻底的政治阶级斗争,就无法采取任何一项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实际上,如果说三年前在有富农阶级的农村中,富农实质上还没有这样活跃,还没有这样强烈的独立性,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文化的骨干,那么现在则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现在在农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甚至是争取每一个集体农庄的斗

争都是阶级斗争。那些现在提出我们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将处于怎样的阶级关系中这一理论问题的同志说得对,我们不可能要那种使国内阶级矛盾在扩大的基础上一再扩大的发展;这种情况将真正导致灾难和失败。这样的发展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进行。我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毋庸置疑,我们有一切基础,一切先决条件,只要我们依靠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目前农村的阶级斗争……(主席铃响)我请求再给我5分钟时间。

喊声:接着说,给他时间。

瓦雷基斯:目前农村的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场斗争中势必会造就出一批新人,同时我们也要改组组织和清理成分。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需要的不只是清理,还有改组农村中的整个组织工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

农村共产党员是如何实施我们党的政策的呢?请看这样一个例子:叶列茨地区举行了一次讨论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贫农会议。会议作出了什么决定呢?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请听:“在听取了霍霍列夫同志关于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的报告之后,贫农和中农会议指出,主持整个共产党工作的领导人关于力量分布情况的意见是正确的,建议领导机关将力量放到揭露奸细散布的谣言和挑拨上,让他们闭上自己的嘴,再也不要让愚昧和没有文化的人感到恐慌,再也不允许进行挑拨,在苏联没有你们的位置。”

这种说法能带给支部什么呢?这说明,各支部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实际上是很弱的。不只是支部,还有地位高的工作人员,比如区土地管理局局长——一位应当在农村推行集体化、领导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他是如何看待集体的呢?他在自己的发言中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踊跃参加集体农庄建设进行辩护,他试图用列宁下面一段话作为理由:“列宁同志教导说,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毫无价值的。”(笑声)

有人喊:他的意思是应当用机器工作。

瓦雷基斯:原来他是这样理解列宁的话的!为什么他要加入集体,为什么党员要全部加入集体,“这样的党员毫无价值”,因为列宁“说过”,“不要用自己的双手,共产党员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农村,党的干部问题与招收贫雇农入党,与对贫雇农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我个人深信,我们在农村贫农中,而一些地区则是在经济方面和雇农中大力开展的工作的一个最大不

足是,我们没有把这项工作同动员、吸收贫雇农加入我们党结合起来。我们的农村党组织以中农为主,然而与中农,尤其是富裕户相比,更应当被我们吸收入党的是雇农和贫农,哪怕是文化政治方面较为落后的雇农和贫农。因此吸收贫农和雇农入党是切实加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你不可能让许多人都到农村去。可以进行1—2次甚至更多次动员,但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够让人们到农村去啊!当然,可以到农村去1—2个月,但这解决不了农村中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的解决要靠在农村造就无产阶级领导干部、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将通过千百万农民的亲身体验使人们相信必须在农村搞社会主义。这是主要任务。

最后我就总路线谈几点意见。我以为,正确的论点只有一半可以归结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地与右倾,与在实行阶级路线比如说土地国有化等问题中的缺点、歪曲和错误进行斗争。经验表明,而且从中央在斯摩棱斯克事件之后发出的号召书³³⁰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在正确、明确的路线之下才能进行正确而彻底的反右倾和反调和主义斗争,如果我们全党在与各种倾向、首先是与右倾的斗争中有一条鲜明的、正确的、明确的政治路线的话,如果在目前改造时期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确实能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团结、确实有一条鲜明的列宁主义路线的话。我以为,不这样,我们就是不抓大事,而没有一条总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就无法取得我们在反右倾反调和主义的斗争中依靠中央和我们全党正确的政治路线所能取得的成就。因此我认为在右倾危险、机会主义增长的目前时期,正确的列宁主义政治路线以及这一路线的明确性是巩固我们党的最重要的条件。

主席:现在请米柳亭同志发言,然后是波隆斯基同志。

米柳亭:莫洛托夫同志极其重要的报告不仅使我们看到我们在改善党的状况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也指出了当前必须要特别加以关注的薄弱环节。因此我在自己的发言中想谈谈后一个问题。谁要是以为,在当前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目前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具体条件下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轻松,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战争危险时刻威胁着我们。此外,在国内,改造问题也遇到我们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困难。谁要是以为克服了一些困难就能消除今后的困难,那他就是不了解当前的形势和当前的发展。增长中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因而对它们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党的状况问题以及对这些困难的预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莫洛托夫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与农民的相互关系

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中心问题。因此我们党在农村的状况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和农村的关系首先当然是由农村中我们党组织的状况来决定的。在这方面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我只举两组数字作为补充: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员中,租地的占15%;在农村党员中雇农按整数计算占1%,而所有雇农大约占5%。

有人喊[丘巴尔]:这是在哪些地区?

米柳亭: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这已经是后来作的大致计算。

在我们党的农民阶层中,收入超过1600卢布的上层群体占8.4%,而在整个农民中这一群体总共只占3.4%。这是个薄弱环节,它是产生各种右倾的先决条件。因此目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出右倾问题。

应当说,毫无疑问,谁也不希望成为右倾分子,但是右倾分子的暴露往往是因为他们在开始揭露和批评右倾时表现得过于敏感。(笑声)

应当说,我的看法是,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未必能下决心发表自己的纲领。尽管右倾的迹象就已在党内引起了这样的反击,但是右倾分子也未必能下决心(至少在最近时期内)发表比较明确的纲领。我不愿意成为预言家,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足够合理的想法。

但是尽管如此,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如此,我们的义务是极其明确地告诉党右倾表现在什么地方。

有人喊:萌芽。

米柳亭:我在自己的第一次发言中就已将揭露这一点作为自己的任务。李可夫同志对我的发言反应强烈,他认为原因在于我似乎是有意避而不谈粮食问题,因此这使他非常激动,在这方面产生了深深的误解。我在发言一开始即表示赞同政治局提出的提纲,李可夫同志³³¹投票赞成这些提纲,并在发言中对当前形势及这个问题作了评价。鉴于目前这个问题对于我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着重谈了一下右倾的内容。

我认为现在有四个基本因素可以确定我们与农民关系方面的右倾。

第一个因素——这正是右倾分子对目前农业状况的评价,也就是弗鲁姆金所说的衰落,或是其他人所说的递减曲线。对于这种理论必须加以反击,因为它掩盖了对我们农村政策的修改。这一理论,这一先决条件掩盖了对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的不可避免的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李可夫同志产生了误解,他认为我只不过是随便列举了一组有关播种面积的数字。绝非如此!这是为了驳斥这一理论。我不明白,李可夫同志是怎么回事,他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

承认右倾对我们来说是主要危险,他怎么会不明白,为了推翻右倾的这一先决条件,必须要证明这一点。他应该明白这一点。

第二,右倾表现为依靠富农或富裕户,因为富农和富裕户的经济内容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列宁曾经说过。因此我引用李可夫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讲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他会因此而生气?或许只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报告中给富农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定义。对党来说必须鲜明而准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依靠富农、依靠富裕户是与我们改造我国经济、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相抵触的。

当我们现在谈论党的状况时,当我们现在找出那些有可能成为实行这一改造的不稳定因素的薄弱环节时,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含糊其词、动摇不定、遮遮掩掩,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三是农业集体化。在这方面应直接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李可夫同志在反驳我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理论,认为重要的是农业集体化的质量,至于数量他认为并不重要。这是不对的。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重要的。而且数量将转化为质量。只有当我们的集体农庄拥有1亿普特商品粮,同时优秀集体农庄带动集体农庄的数量增长时,农民乃至全国才会真正认真对待农业集体化这个问题。因此保证农业集体化的这种速度是我们分内的、直接的任务。

当瓦雷基斯同志向我们列举一些党员对集体农庄的态度令人费解的事例后,当我们发现集体农庄存在莫洛托夫所说的党员很少参加集体农庄的现象时,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必须要加以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个问题,米柳亭为什么会因增长速度、农业集体化数量的增加而焦虑不安?这至少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对农业集体化的态度。我不知道该把这个叫作什么,——李可夫同志提出的全面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让集体农庄遍及农村。我怀疑他在这里忘记了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知道的一个起码的论点,即社会主义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集体农庄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这是共耕社,是劳动组合,是公社。但即便在公社内生产资料也没有完全公有化,更别说共耕社、劳动组合了。列宁曾经说过,合作社的一般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相一致的。但他还列举了其他一系列要素:国家对所有大型生产资料的控制,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就,合作社;他说,所有这些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必要因素)。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即在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我们能

够让共耕社遍及全国,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个人手中。

但甚至这一点也被用来反对我,理由是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急于进行农业集体化了。问题的提法令人费解。

李可夫同志说,他也有牙(这是他跟加马尔尼克说的),并说不应忘记这一点。李可夫同志用这些牙咬我、柯秀尔、埃赫,咬抨击右倾的同志们。但这些牙却极其友善地避开了弗鲁姆金同志。我想劝李可夫同志拔掉这些牙换上别的牙,否则他的这些牙会腐烂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认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什么也保证不了,一年以后,或者,或许是在明年,——我不想成为预言家——我们将是歉收年。如果说现在,在丰收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看到党内出现了动摇并发现了薄弱之处,那么在未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更多的动摇。因此我们必须预见到这些困难以巩固我们党的队伍,首先是农村的队伍,农村党组织应当靠农村的贫雇农阶层来加强;我们应当揭露那些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在预见未来的困难方面表现为右倾的危险。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在我们的队伍团结统一的情况下经受住我们将要面临的斗争。所以不要害怕对错误行为进行斗争,这种行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克服我们现有的困难构成威胁。

主席:现在请波隆斯基同志发言。

波隆斯基: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所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提出的纲领也会得到全会的一致赞同。

我想就莫斯科组织、莫斯科组织的成分谈几点意见。目前莫斯科组织再加上军队支部共有165 0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最近4年增加了107 000人,而且现在工人占71.6%,其中一线工人占47.3%。新增党员的60%来自全党运动。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任务不光是要靠全党的威望和在全党运动期间增加我们党的人数。关键是要在组织的日常工作过程中使党员数量不断增长。应当指出,我们吸收无产阶级新干部加入党的队伍的工作所具有的这种运动性质影响了被接受入党者的质量。全党运动时期吸收新党员自然不可能进行仔细的、必不可少的考查。所以有相当多在全党运动期间被接受入党的人被清除出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个党的机关或确切说是各个党的机关的工作使组织实现持续不断的生长。这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困难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还需要发挥每一位普通党员的最大积极性,同时通过他们的

一切实际工作使群众性无产阶级组织参与进来。我认为,党的发展是决定工人阶级如何评价我们整个工作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假如我们看看目前在这方面我们的群众性无产阶级组织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党团作为党的机关并没有参与到党的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中来。我指的不是直接的招收职能,而是每一个经济、工会、合作社及苏维埃机关周围都有自己的非党积极分子。然而企业、甚至是超大企业的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几乎都没有将组织和培养这些积极分子作为自己的任务,即为他们指出入党之路、帮助他们入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仅把这些基本后备力量作为非党积极分子,而且作为我们党未来的党员加以培养。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党的发展在目前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想引用列宁同志的一段话。他在1922年3月给莫洛托夫同志的信中说:“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³³²

目前我们党内的情况告诉我们,必须依靠与生产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工人和女工来进一步加强我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先进工人和女工能够带来生气,产生直接的健康作用并加强工人阶级对我们党以及党的整个工作的影响。

如果从我们所有组织日常的系统的工作角度去看待党的发展问题的话,那么质量问题,也就是被吸收入党的新干部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水平问题应当占有最主要的位置。但是我认为,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同时对新党员的布尔什维主义教育和组织培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情况,那么我们党,包括中央全会都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专门而特殊的措施,如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便在党的队伍中进行学习、教育和组织培训。目前的这种发展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不够巩固,而且它的培训和教育方式存在着非常大的不足。当然要尽快让我们的新党员做工作。但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把所有事务性工作——收取国际革命战士接济会支部党费,支部中的事务性工作,甚至清扫支部办公室地板——都看成是党的工作,看成是实际培训新党员的一种措施。列宁曾经说过,“一切党的组织都应当对怎样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当然,所谓大胆,并不是马上就把重要的职务交给新手担任,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所需要的知识,新手还没有掌握。要大胆,是说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

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要大胆,是说要立即给这些新手在广阔的工作领域中施展才能和一显身手的机会。要大胆,是说要决心以革命的速度为新党员改变工作方式,以便更快地考验他们,更快地给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³³³在提供确实能让新党员发挥主动性的工作方面,这种大胆大多没有体现出来,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在小组和政治常识学校中对我们的新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学习,而是必须把学习和宣传与能够使们得到满足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即让他们感到他们加入我们党确实巩固了党的队伍并积极参与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

关于清除谈几点意见。如果把自动退党的人和被我们开除出党的人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准备引用的这些数字与整个党的成分无关,而是与我们党的增长的数字有关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透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的大背景来分析这些过程。在这场阶级斗争过程中我们遭到巨大损失,其中包括一部分党员自动脱离我党队伍、一部分党员被开除和腐化所造成的损失。请看一组来自莫斯科组织的实际数字。1927年10—12月,减少的党员数量占同期入党人数的12.5%。1928年1—3月,第一季度,减少的党员数量占我们吸收的党员人数的27.4%。1928年4月和6月减少的党员总数已占我们吸收的入党人数的47%。我以为不只是在莫斯科组织有这种状况。如果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正在遭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没能把许多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留在党的队伍中,而是让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将他们从我们的队伍中夺走了。所以我以为,应当更加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透过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场阶级斗争的大背景来分析这个问题,不仅把它与我们群众性的教育工作的不足联系起来,而且与各条战线的阶级斗争尖锐化联系起来。

下面,同志们,请允许我就莫斯科组织的状况讲几句。

波斯特舍夫:讲吧,讲吧,我们等着听你说呢。

喊声:讲吧,应该讲讲。

波隆斯基:已经有许多同志谈过莫斯科组织的状况,有报告人,还有发言者。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再谈谈这个问题,而且会场内外有许多同志都要求我讲。

喊声:太应该谈了。

波隆斯基:莫斯科组织是在什么样的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呢?第一个和基本的口号是——“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这是如何开始的呢?远

的我就不说了。8月份《真理报》上刊登了曼德尔施塔姆³³⁴关于容忍各种倾向的文章,文章一经刊出不仅在莫斯科组织,而且在全党都得到反响。这之后我们举行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九月全会,乌格拉诺夫作了报告和闭幕词。如大家所知,报告经中央委员会修改过。³³⁵政治局的修改收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材料中。闭幕词未经修改。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次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作过哪些指示,我引用乌格拉诺夫同志闭幕词中的一段话。他说:“研究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的过程是重要的,但当人们在这里尖锐地提出目前工人阶级中小资产阶级情绪抬头的问题时,就不正确了。因此我认为,现在不要特别强调与无产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有,但没那么严重,以至于我们要掉转自己的炮口,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上面来。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潘科夫同志讲话结尾所说的事情上去,集中精力更好地经营,算账,精确地计算钱财,而且就像昨天一位同志所说的那样,要爱惜钱财。”³³⁶(《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九月全会速记记录》)

乌格拉诺夫:没错,那样党和工人阶级内就不会有人动摇了。如果经营管理混乱,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就会对我们发起猛攻。

波隆斯基:我并不反对节俭和搞好经营,但是同志们,我认为,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事务主义哲学,而且在这方面,它显然是与符合我党现行方针的一切事物相抵触的。九月全会根据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相当尖锐地提出了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但对中央委员会的口号——“两条战线的斗争”和右倾危险却只字未提。各区积极分子对这个决议有什么反映呢?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外³³⁷,他们全都和中央委员会及《真理报》一起开始纠正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领导层的这些错误。这些纠正口头上被接受,但各区、县仍试图实行九月全会的路线。十月初,迫于上下的压力,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改选支部委员会的信,信的内容完全正确,但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下已无法使组织平静下来,因为,除了所有其他情况外,这封信在莫斯科委员会内通过时争议极大,而且恰恰是在这一问题——关于容忍右倾和右倾危险的问题上意见不一。

如果看一下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书,可以看到该文件明确地指出,“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个别委员和某些区领导人近一时期内在与背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右倾进行斗争方面表现出某种不稳定和动摇,容许对这一倾向采取布尔什维克党所不能接受的调和主义态度”。³³⁸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莫斯科组织内围绕其进行斗争的基本问题、基本口号正是“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这一口号。

莫斯科组织内围绕其进行斗争的第二个口号是“捍卫我党的基本路线”，因为有人攻击这一路线。可以举佩尼科夫同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的讲话为例。(主席铃响)

喊声：延长时间，让他讲下去。

波隆斯基：我们以佩尼科夫同志在十月全会上的讲话为例。他直截了当地说：“同志们，在工业化问题上我有错误。或许其他同志也有错误。我认为，我们在发展工业方面过于冒进，应该更多关注轻工业。”³³⁹（《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速记记录》，第44页）这是根本违背党的路线的。他还说：“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我认为，我们过于排挤城乡中的私商，同时又没有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取代他们。”（同上）他的观点比弗鲁姆金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佩尼科夫同志不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佩尼科夫同志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和组织者，他曾当过区委书记，因此当他持有这种观点时，显然不能不在他所从事的所有工作中有所反映，不论是区委书记的工作，还是莫斯科党委会委员的工作。

请看候补中央委员留京同志同样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说过的话。他说：“中央七月全会召开前我们经常谈论莫斯科及莫斯科省的纺织工业状况。但是应当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抓得过紧，结果出现了冒进，影响了全力发展重工业的任务。”（《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13页）

毫无疑问，这同样不能不在其工作中有所反映。

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这些发言后的总结发言中说了下面一段话：“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党的领导的危机问题。目前，在本次全会召开前，莫斯科组织的党的领导确实处于严重的状况中。我同意同志们在发言中所作的评价，并首先为区里的工作人员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假如后者有这些错误并且这些工作人员对我完全信任的话。作为莫斯科组织的负责人，我将对这些错误承担全部责任，我是不会推诿的，因为这些直接或间接的错误是我们领导的一种反映。”（同上书，第122页）

乌格拉诺夫同志不但不与连莫斯科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也认为是明显错误的路线划清界限，反而表示赞同这一路线。我认为，正因为如此许多关于动员我党团结在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周围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中（无论是在其内容还是口号中）有所反映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中央委员会在告莫斯科组织的号召书中说：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工

人群众团结在我党基本口号的周围,这些口号是“完全保持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开展大规模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工人及农村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等。³⁴⁰中央委员会在颁布这项指示时看到了莫斯科组织中进行的斗争,它认为“捍卫我党的基本原则立场”是这场斗争的基本口号之一。

莫斯科组织内围绕其进行斗争的第三个口号是——“拥护我党的中央委员会”。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捍卫党的路线,纠正莫斯科领导人的错误,这种纠正虽然被领导同志们所接受,但同时却大造舆论,说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中伤莫斯科组织。关于这一点,“莫斯科汽车厂”支部书记伊格纳托夫同志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他讲了佩尼科夫把他叫到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委会的情况:“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会在《真理报》上对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进行中伤。为了说明右派分子可能做什么,搬出了台尔曼事件³⁴¹。总之,他说,党内不存在任何右倾,因而他关注的不是右倾,而是眼下的中伤。”由此可见莫斯科组织中舆论的走向。还是以佩尼科夫本人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的表白为例,他在会上毫不掩饰地说:“我承认,我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委员会的指责不恰当。很长时间内我都觉得这种纠正错误的方法不对。”³⁴²而留京同志则声明如下。他在十月全会上的表白具有特殊的意义:“经验再次表明,即便是踩了刹车也还会继续向前滑行,我们今后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使得莫斯科组织,或者确切地说,使莫斯科组织的领导集团与中央委员会产生了某种疏远,某种隔绝。在这方面危险已然出现,因为今后我们必然会与派别分子发生冲突。”(《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14页)这就是当莫斯科委员会某些成员及区领导人反对党的基本的、原则性的决定时,中央委员会维护这些决定的原因,否则,就不会出现某些同志客观上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情况。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说得非常正确:“可能许多人没有想到和料到这一点,但却这么发生了,否则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莫斯科组织在纠正其领导人的错误时,起来维护‘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基本总路线’的原因。”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的号召书中讲得无疑是对的,整个莫斯科委员会没有与中央委员会相对抗,但莫斯科委员会的个别成员曾尝试组织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或许有的人这样做是无意的,对此我不作评判,这很有可能,但至少许多人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显然,没有充分做好准备,过快地暴露了自己并遭到整个组织强烈而一致的反击。

决定这场斗争的规模、意义和结果的主要东西,是组织本身——从支部到区再到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全会——的政治敏感性和巨大积极性。如果整个组织没有表现出如此程度的敏感性和积极性,事情就会闹到像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列宁格勒所发生的斗争³⁴³的那种程度,当时中央委员们不得不到各支部去,进行争论,解散党的机关,解除许多人的工作,等等,而我们则只是根据下面的倡议和在下面的压力之下由组织本身撤换了15名主要领导人。同时,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许多没有马上弄清事情真相的同志有些动摇,但在下面的强大压力下能够及时恢复常态并站到党的原则立场上来。应当支持他们,不让他们与党疏远并最终留住他们,因为党的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干部并尽力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之前和全会期间的基本情况。

现在,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首先应当承认,莫斯科组织的状况异常紧张。组织对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实际工作的软弱无力而忧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的领导人,觉得他们不够明确。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大概都听到过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庄严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1月6日这一讲话通过广播传遍全苏联,引起许多议论,11月10日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党团讨论了这一讲话,在2票弃权、1票(乌格拉诺夫同志本人)不参加表决的情况下,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党团以23票中的21票赞成作出如下决定:“乌格拉诺夫同志准备对将要登载在报刊上的速记记录进行修改,同时根据所附的讲话提纲对速记记录进行补充,着重阐述农业集体化问题和农村阶级斗争问题。特此告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进行纠正是一回事。但如果莫斯科苏维埃党团作出这样的决定,表示不同意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说明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说明目前对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明确性和原则性的担忧无疑是有道理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表明只是组织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波隆斯基:在此我顺便宣读一下这个讲话的某些片段。乌格拉诺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这样说道:“我们把这条道路看作是在更高的文化基础和技术基础上不断改造我国的道路。”而在刊登出来的速记记录中则写道:“通过重工业的发展、电气化、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数百万农民群众的合作化、农村集体化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就是途径,沿着这条途径……”

有人喊:区别在哪儿?

波隆斯基:这里有极其重要的区别。其次是第二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同样极具代表性。乌格拉诺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是怎么说的?“只有在与几百万中农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只有在像列宁同志教导的那样,我们带领几百万农民前进时,我们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而在发表的速记记录中说道:“今后的路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不断发展国家工业化,加强与几百万中农群众的结合,巩固工农联盟,组织贫农,团结贫农与中农一起反对富农。”

这次发言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出了一份专门文件。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我们发表了由“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签署的莫斯科党委会号召书,刊登在11月6日《真理报》上。党的所有基本口号在这一号召书里都有所反映。11月7日在莫斯科党委会的《工人莫斯科报》上刊登了由莫斯科党委会书记乌格拉诺夫同志签署的告莫斯科全体工人、女工和红军战士书。呼吁书开头写道:“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以无产阶级方式向你们致敬……”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书记处,还是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都不曾讨论过这一号召书,只有乌格拉诺夫同志一人知道,号召书是他亲自写的,由他一个人签署并负责发表。这份文件——号召书不知为什么带有论战性质,完全不像是为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而发出的告全体工人书。呼吁书的发表,与刊登在《真理报》上由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签署的号召书一样,在组织中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并使局势更加紧张。所有人都在自问:乌格拉诺夫同志在和谁论战?

斯克雷普尼克:哪方面的论战?

波隆斯基:许多了解过去与中央委员会斗争的人,把这看成是对中央委员会的某种攻击。呼吁书的发表本身以及它所具有的论战口气刚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看一看它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可以指出的只有一点,就是缺少明确的原则。因此,可以说,假如这是一篇文章,或许不会马上把它登出来,而是建议对其进行修改。但是作为号召书,而且还是以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号召书,自然不会使任何人感到任何程度的满意。例如,它即没有谈到贫农、富农、农村阶级斗争、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提到中央委员会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告莫斯科组织书中所提出的任何一个口号。因此它在整个莫斯科组织内引起强烈的反响不足为奇。我这有一封奥列霍沃-祖耶沃组织致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他们写道:“通过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通过的决定,我们曾相信,你,乌格拉诺夫同志,作为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将会领导布尔什维克同托洛茨基主义残余,尤其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调和主义倾向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然而,《工人莫斯科报》上刊登的由H.乌格拉

诺夫签署的《告莫斯科全体工人书》使我们对评价目前你所持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

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后指出，“许多基层党组织来函对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刊登在《真理报》和《工人莫斯科报》上的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号召书提出质询，通过对比发现两份号召书的观点总的来看有所不同，这在组织中引起不安”。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许多委员纷纷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公开表示不同意由乌格拉诺夫同志签署的这一号召书，而且在最近的一次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也是这么做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许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在参加完九月全会回到各自的组织后在支部里一再遭到盘问：你们怎么不好好看看就投票赞成只字不提右倾危险和在两条战线斗争的决议呢？布良斯克枢纽站支部全体会议的决议很有代表性，完全反映了基层的情绪，决议指出：“全体会议认为，刊登在《工人莫斯科报》上的乌格拉诺夫同志11月6日的号召书是错误的，不符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党所决定的路线。全体会议认为必须制止这一行为。”决议还指出：“全体会议委托新一届常委会向指出乌格拉诺夫同志这一行动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致意。”

在各支部目前自发通过的大量决议中可以看看“红色教授学院”和许多工厂的决议。我想再宣读一下“三山手工工厂”支部的决议，决议指出：

“在中央委员会发出告莫斯科组织书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全体会议不可能避而不谈1928年11月7日《工人莫斯科报》刊登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号召书，这份号召书与同年11月6日《真理报》刊登的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号召书似乎针锋相对。此外，乌格拉诺夫同志的信中有许多不正确和不明确的原则性观点，这些观点有可能削弱党组织与党内右倾危险进行斗争的警惕性。”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组织内的工作显然是无法正常进行的。请看，党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书是如何评价莫斯科组织的：

“所以党应当像过去坚决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和将来坚决与托洛茨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一样，与公开的机会主义右倾进行斗争，也就是说与对机会主义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斗争。

“在这场党反对各种背离布尔什维主义总路线的倾向，其中包括反对右倾的斗争中，莫斯科组织始终站在党的前列。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央委员会捍卫和坚决贯彻我党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路线的坚强支柱。它给予托洛茨基反对

派以毁灭性的回击,克服了本组织中某些成员思想上的动摇。无论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还是现在,莫斯科组织在莫斯科委员会的带领下始终完全站在党的路线一边,坚定不移地同偏离全党路线的各种现象进行斗争。政治上成熟的、经过布尔什维克传统教育的莫斯科组织在党的领导的原则坚定性方面始终表现出极高的敏锐性和自律要求,对各种抹杀全党方针的企图给予坚决的回击。”³⁴⁴

现在莫斯科组织仍要求这种领导的原则性和明确性。这种要求不仅符合莫斯科组织的作用和水平,而且完全是建立在实行党内民主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同志们,我以为,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将要讨论所有与加强莫斯科领导有关的问题,以确保其明确的政治方针和实际工作。

主席:现在请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发言,然后是克里尼茨基同志。

奥拉赫拉什维利:莫洛托夫同志在关于我党发展的统计和进程的报告中作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分析,但遗憾的是,分析没有涉及各民族共和国的情况。之所以应当这样做不是因为这些共和国在组织政策方面享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这些共和国处于一种独特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给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限定了一定的范围。

斯克雷普尼克:是限定了基本原则吗?

奥拉赫拉什维利:我的话的意思是,这些共和国具有独特的环境,党的组织原则在这种环境中会产生独特的折射。比如说在外高加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党在那里遇到的困难不仅有的时候看起来无法克服,而且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这样。在外高加索既有政治上、文化上高度发达的民族,同时也有落后部族,像塔雷什人、库尔德人,像斯万人等。在经济方面,除高度工业化的巴库之外,还有仍使用罗马木犁和没有听说过农业机械的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阶级关系也独特地折射其中。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党是引导这些民族的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党还领导着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同时是民族和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的工具,最有效的工具。我们的组织所受到的这些限制和赋予它们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艰巨任务,使得我们组织的处境自然要比我们苏联任何一个地区都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在克服这些障碍时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应当被提到。

莫洛托夫同志在回答米尔佐扬同志的反驳时指出,巴库组织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截止到今年10月1日巴库组织中一线工人占大约70%。就整个外高加索组织而言,今天我们组织中57%为工人,其中42.9%为

一线工人。例如在梯弗利斯组织,截止到今年10月1日一线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0%。我以为这个成绩是相当大的,而这一成绩的取得是近些年我们有系统有计划地工作的结果,有些人对这样的工作持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党的“经济”不需要受到计划的影响。我们边疆区委员会的观点是,必须对党的工作加以计划,所以我们制订了我们组织今后两年的发展计划。现在应该进行修改,使我们组织的这个发展计划时限不是两年,而是三年。回顾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应当指出我们在吸引妇女,尤其是女工入党方面的落后状况。在大部分妇女不能见面,出门还裹着恰德拉披纱的地方,妇女在组织中占的比率非常低,大约占6%,尽管当地有着人数可观的纯工业类非党女工后备力量。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员们不准她们摘掉恰德拉披纱的,可你们却还容许她们待在党内。

奥拉赫拉什维利:有这样的事,这首先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他委任的地方工作人员的问题,我们过去不会,今后也不会原谅这样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像外高加索这样的地区,党组织中的雇农阶层很少:目前外高加索共有大约10万名雇农,而党组织中的雇农只不过占1.9%。我们在吸收共青团员充实我党队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超龄团员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至今没能解决。根据这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我们的计划规定了我们的组织在近两年内的发展,规定充实组织的一线工人比例要达到47%。为了全部完成本次全会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在决议草案中拟订完成的任务,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为了使组织的一线工人达到50%,就必须使这些工人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实际上,我们只有铁路沿线从巴库到巴统和埃里瓦尼的一小片工业区,而我们现在根据国家工业化安排的新的建筑工程是将来的事,尽管是不久的将来。因此47%的一线工人和4%的雇农就是我们最近两年的计划。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指出我们这些组织的特殊性,就是说那种无论是作为萌芽,还是作为趋势,抑或是作为已然成形的东西在这里,在中央出现的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我们中间也有特殊的反映。那些不久前说明了我们组织性质的倾向,比如说民族主义倾向³⁴⁵,是一种包罗了这里出现的这些倾向的普遍形式。

可以说,起源于这里的那些倾向将不会在外高加索照原样再现,因为这些萌芽早在我们1921年开始实施的有“左”右倾偏向的民族主义实践中就已经出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有“左”右倾偏向的民族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致和

协调上。

洛米纳泽：难道外高加索就没有右倾分子吗？

奥拉赫拉什维利：我认为，我们早在你们之前就有右倾分子。民族主义倾向不仅意味着力求使国家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分隔开来，即实行某种分离主义，而且意味着在这种分离的基础上实行小资产阶级经济政策。而且它不仅表现在对国外廉价商品的追求上，还表现在力求放弃土地革命上，表现在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看法上。我认为，这里出现的这种倾向符合我们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的基本特征，与托洛茨基主义结为一体的这种倾向把右的实践与左的词句连在一起。托洛茨基主义从格鲁吉亚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中接过一个基本口号：破坏外高加索联邦。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志的话是绝对真理，他说，托洛茨基主义与右倾，尽管叫法上有所区别，但来源是同一个，一旦它们取得了胜利，后果都将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受到了孟什维主义、木沙瓦特主义³⁴⁶和达什纳克主义³⁴⁷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资本主义发展，即没能通过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实现的发展感到惋惜，这些共和国的苏维埃革命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因此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向各种倾向作任何让步。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没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托洛茨基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不采取任何中间立场。我们尚留有接近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左”右倾偏向的政策尾巴，但是我们不仅过去不妥协，现在仍然坚持自己反对各种倾向的立场，过去反对调和主义，现在仍然如此。我们不曾采取任何中间立场。倾向的因素依然存在，因为我们各个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仍然是产生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动摇的源泉，现在这种动摇正在向我们党内扩散、渗透。但是我们已经洞悉这种试图使我们的路线发生偏差、试图歪曲我们的农村政策路线的行径。因此这是吓不倒我们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清党问题。我认为，最好在这里回顾一下列宁同志1919年4月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讲话。他说：“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³⁴⁸现在应当强调的正是这点，即力争在我们这个农民大国里我们能够使农民彻底转到无产阶级一边，使其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帮助并与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清党是一项及时的措施，因为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自然净化可以巩固我们的党，还应当认识到现在不仅党面向农村，而且国家财富、所有现代科技成果

也要合理地面向农村,还要面向农村开展安德烈耶夫同志在此次全会的报告中所开创的工作,我认为对这项措施需要进行补充的是,我们将不仅向农民提供精选的种子,我们还将向农民提供精选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共产党员。

所以党的选种机可以补充农业选种机的不足,而这,同志们,将提供我们在列宁的党中还不曾知晓的力量。

主席:现在请克里尼茨基同志发言。

克里尼茨基:我认为招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成分是一个大问题,我现在谈谈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吸收几十万一线工人入党的重要问题。不必总是说为了实现党的这项重大任务需要的不是什么“运动”,而是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工人中的群众工作和提高全体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

我认为,必须以明确的观点去看待检查和加强工人中整个群众工作的任务并回答一个问题,即党的整个群众工作做得如何,是否足以符合无产阶级在目前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革命任务。我准备谈谈群众工作的两种基本形式——针对无产阶级和党根据阶级斗争尖锐化提出的任务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宣传和工会的文化工作。

在讨论第一项议事日程时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个可以分解为许多其他问题的重要问题无疑应在不久的将来在每一位党员的意识之中,尤其是在党的宣传中占有比迄今为止重要得多的位置。如果就这个极重要的问题给出错误的提法(对此我们在讨论第一个报告时已然看得十分清楚),那么将产生一系列的右倾错误。

众所周知,列宁的著作首先极其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列宁在《列宁文集》第三卷中刊登的札记中,在《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非常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一种形式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并指出“阶级斗争异常(特别)残酷”。资产阶级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将会减弱或激烈到什么程度?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几种回答。一种是:无产阶级越强大,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中、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越强大,阶级斗争就越弱。这显然是导致右倾错误的不正确的提法。第二种可能的回答比第一种错误稍小一些,即阶级斗争的尖锐,取决于某些暂时现象:经济困难——阶级斗争就尖锐,今年的困难过去了——阶级斗争就减弱。这种提法回避了主要问题,是错误的。第三种可能的回答(我的确没发现党内有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我觉得,李可夫同志说柯秀尔同志有这种观点是没有

根据的)是: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之前,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时刻”之前,无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巩固而进行的进攻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同步进行的。

列宁提出和党所坚持的观点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然会尖锐到一定的限度。这一限度由什么来确定呢?我以为,限度就是阶级斗争开始根本减弱,国家开始快速向无阶级社会前进,——这一限度由农村小生产改造的实际成果来确定。小生产公有化发展的成果将坚决而彻底地铲除农村资本主义的基础并将其连根消灭。从而使小生产者的动摇和犹豫更快地减少,使资本主义残余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赖以反击无产阶级的进攻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肥沃土壤愈来愈贫瘠。

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把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解为无产阶级阶级敌人的增强是完全错误的。那些害怕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和取得成就时期更加尖锐这一事实的同志正是在这一点上常常出错。

现在在党内,正确理解过渡时期的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性质对每一个党员来说都是必要的。许多同志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说明,党内应当更加认真地研究和弄清这个问题。况且这种混乱正在导致一系列右倾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牢记列宁的至理名言,他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³⁴⁹

显然,现在党内的右倾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和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反映。

我们在谈论群众工作和党的宣传时应当非常准确地作出回答——工人中有没有这样的情绪。是的,有。我认为,每一个党员都应当了解这一点并对斯捷茨基同志宣读的信中流露的这种情绪给予积极的反击(不知他因为什么没有着重指出这个地方):那个没有意识到入党必要性的工人是这么说的(这句话在那封信的结尾):“现在和谁斗争,——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们或许常常认为,不止一个工人这样提问题。这表明无产阶级某一阶层的阶级觉悟和阶级积极性有一定的“复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我们群众宣传最重要的任务是——不允许削弱工人的革命警惕性和阶级嗅觉。这种削弱是工人入党的障碍和主要妨碍。所以,党应当通过在群众中的整

个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教育工人,提高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特殊形式的认识。高度的阶级觉悟是使无产阶级有能力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中进行领导的必要条件。

下面我谈谈党的宣传问题。

我认为,在我党的工作中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没有认真提出以应有的革命气势进行宣传,并使这种宣传接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这样说是正确的。卡冈诺维奇同志在组织局的一次会议上说得非常对,春季宣传鼓动会议认为党内宣传鼓动工作存在的不足是书生气的工作方式在工作中盛行。大家比较一下国内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初期,比如列宁时期,回忆一下党曾开展过多么广泛、深入、渗透到“基层”的群众工作,把这一工作同我们现在的政治宣传比较一下就不能不承认宣传工作中的不足。当然,现在是不同的时期,宣传更应针对建设中的日常问题,把这些问题与工人阶级的共同任务联系在一起。对于工人为什么不入党这个问题,工人们的解释和回答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莫斯科几家工厂的工人在《真理报》进行的无记名问卷调查中作出的解释就很有意思。工人们提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不足:“党员们解释问题含糊不清,不明朗”;“有些党员连报都不看,你能问他什么”;“党员们就像小卒,本身就一无所知”;“很少能澄清有争议的问题”;“应该多和非党群众交谈并对各种不满作出解释”;“常去车间转转”;“给非党群众更多的信任”;“个别党员把自己与非党人士隔离开来,高高在上”;“脱离非党群众”;“希望能对党内状况作详细介绍并学习党章”;“党员纪律松懈,会上说得多,会下什么也不做”;等等。

总的说来,这些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宣传正需要根据这种批评进行改变。要从“临时突击搞运动的方式”、从泛泛的政治话题转向具体的任务,要更贴近车间、深入车间,动员工人与困难作斗争,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些困难,为加强纪律、为工人的团结积极斗争,积极宣传布尔什维克党性,宣传入党。我们也会以运动的方式向工人发出入党的号召,同时布尔什维克党性宣传和入党宣传应当成为我们工作的日常内容,应当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口号联系起来。

关于工会的文化工作。这是最重要的群众工作形式,应当成为党的宣传的直接延续。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缺点。我认为,在即将召开的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应当提出彻底转变文化工作的问题。无法用三两句话来转述报纸和杂志上有关检查工会文化工作的丰富材料。但一个共同的简短结论是——工会文化工作严重脱离党的政治群众工作,不问政治、目光短浅的“文化至上主义”成为顽

症。同工人中资产阶级残余的斗争异常不力。反犹太主义、信教、酗酒、劳动纪律涣散，——所有这些都是异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正在瓦解无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现象几乎完全没有遭到工会群众文化工作的反击。一些材料，比如《工人俱乐部》杂志³⁵⁰1925—1927年间关于五金工会的材料表明，俱乐部的艺术工作形式——戏剧、音乐会、电影——正在取代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座谈、演讲、参观和公开审判)，在俱乐部工作中所占比重达90%。在这种情况下工会文化工作不可能成为党的政治工作的重要延续。

首先要根除工会文化工作中不问政治、目光短浅的“文化至上主义”顽症，将文化与政治更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关于文化工作的三个方面我再讲几句。

关于扫盲。需要说明的是，这方面的数字比你们想的要严重得多。党明确提出吸收工人和女工人党的任务，但在许多地区，首先是纺织区，文盲比率极高，我们无法进行任何深入的工作。例如：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一个叫博尼亚奇金的工厂里，6 500名工人中不识字的——1 800人，识字不多的——1 400人。显然，我们的政治群众工作在这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和极大的阻力。“文化进军”——确切说是由共青团、党及部分工会(应当说，在这方面工会很少参加)进行的“实地考察”——的材料写道，在完成这项重大任务，即争取实现工人人人识字方面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但从另一方面讲，靠社会力量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提高积极分子的文化水平。大家知道，成年工人对学习的需求非常大，他们向往在成人培训班里学习，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力求扩大技术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全国，在这种“成人学校和培训班”里学习的有工人、职员，还有农民，也包括党员，但只有大约10万人，其中工人(连党员)占一半多一点，这与工人对提高文化水平的极度向往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数字。

我不打算详细探讨群众性文艺工作，尽管从教育群众的角度来看它是重要的。党应当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党为了自己的影响而应当利用的手段，诸如文艺演出、戏剧、电影，暂时多多少少还能起点作用。但有时候我们会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党员身上看到我们这项群众工作所固有的露骨的机会主义和右倾的特殊表现。我认为，由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组建的“文学艺术总局”在自己的工作中常常表现出对阶级路线的歪曲，放弃了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根本任务。

我原本该谈谈由共青团、妇女代表会议进行的大规模群众文化工作，但因时

间不够,谈谈自己发言的最后部分——关于提高党内思想政治水平问题。只谈4点意见。关于政治教育网的规模。不要忘记,在城市中党使460 000名学员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党的教育。不过他们中42%是职员。所以,要吸纳广大的工人干部,就要大规模地扩展这张网。有30%的非党群众在我们的组、学校、培训班里学习。在十月入党的同志中已在我们党校学习过的比例为:列宁格勒工人党员的52%,哈尔科夫工人党员的35%,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人党员的32%。换句话说,党的教育网吸引了相当多的非党工人,它具有重要的预备阶段的作用,工人特别是工人共青团员要经过这个阶段进入党内。由此产生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实际任务——通过投入人力和物力来保证扩大党的教育网,吸引更多的工人进入其中。

第二点——关于党员的学习内容。当然,在提高党员学习的马列主义质量方面我们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屏弃了墨守成规、形式主义和手工业方式。但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我应当说,即使是在大的党组织的指导性材料中,尤其是在基层工作环节中,还有不少这种墨守成规和形式主义的现象。请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莫斯科第一模范印刷厂支部对要入党的工人进行“考试”。支部书记叫道:“某某同志”;开始对她进行“测试”,以考核其政治修养。“十月革命给妇女带来了什么?”“自由。”“还有问题吗?——没了。”“谁同意接受她入党?通过。”或是提这样一些问题:“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议事日程是什么?”回答“不知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什么时候举行的?”“党是什么时候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等等。当然,并非每一个工人都记得这些东西,而且也不是非用这些东西来判断一个同志是否具备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能力。因为这根本不是这些正式材料中的主要内容。

[尼古拉耶娃:主考人本身也知道得不多。]

克里尼茨基:但是这些在吸收工人入党时出现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基层群众政治学习中还未能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成为主要内容。因此主要任务就是——提高我们学习的理论水平,吸引优秀的、最可靠的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对学习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学习更好地磨炼党的明确的路线。现在强调普及列宁思想的任务尤为重要。对列宁原著的学习我们搞得不好,遗憾的是,我们提供给党员学员的课本时差时好,但很少提供列宁原著。列宁研究院带了个好头——出版列宁著作普及版和列宁主要著作普及丛书。要让每一个工人、每一名党员养成首先学习列宁著作的习惯。

关于党员积极分子的自学。党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是提高党员积极分子的理论水平。实际上在这方面广泛的工作现已开始。显然,如果不提高积极分子中的理论工作,就无法提高全体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在党内发展自学和函授教学系统尤为重要。

最后一点——关于共产党员的普通教育水平。必须进一步要求每一名党员有更高的普通教育水平。不这样就无法使党在政治上进一步提高,就无法加强党的领导。本次全会以及关于控制数字的决定在党内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尤其要让生产一线党员和农村党员懂得工业技术和农业技术。

主席:休息5分钟。

(休息后)

主席:现在请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发言。

什基里亚托夫: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提出我们党的发展要达到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的这种规模的问题。有一个建议说,要在最近两年内接受不少于80%的一线工人入党。对此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

鉴于这样一个百分比,我们在一些城市一个职员也不能接受。

有人喊[波斯特舍夫]:必须得这样。

什基里亚托夫:当然必须得这样。我赞成这一百分比,但是必须知道,过去在历次全会和组织局的决定中我们总是强调,我们必须提高一线工人在党内的百分比,使这一百分比占到整个组织的一半,但这一点尚未做到。随着党内工人人数的增长,职员的人数也在增长。目前各组织还承受不了我们的决定所规定的这个百分比。余下的20%我们应当这样分配。首先应当接受的是工人中的大学生,也就是那些出去学习过的工人。然后是农民。

斯克雷普尼克:那共青团员呢?

什基里亚托夫: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共青团员将作为一线工人入党,不在生产部门工作的共青团员,作为上述20%入党。不仅要接受这样的百分比,还要落实它,为此各党组织要加紧工作。

现在我想谈谈下面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面面俱到:对工会、苏维埃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他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讲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整党的发展的情况。但我觉得,在这里他好像把谁忘了。在此我想指出莫洛托夫同志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评价,能否让它与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共同分担这一过失,否则它们会因为被忘记而感到委屈。

我们,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时会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你采取严格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在一些齐心协力的组织面前接连碰壁。当然要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可是我们的官僚主义者在哪儿呢?他们不在工厂里,而在我们的机关里。工厂里也有,当然有,但不像我们大家工作的机关里那么多。是吧?

有人喊:是!

什基里亚托夫:所以在那里,你只要一碰某一位官僚主义者,马上就会有許多庇护者跳出来——不许碰他——他们施加压力,打电话,递条子,为了包庇他,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如果要同官僚主义斗争,就要真正地进行斗争,不要只限于口头上。“我们必须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大家知道,这只是一句诺言,而当落实到行动中时,有时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因某种过失处罚一个工人,可以顺利地得到省委员会的批准,但若是触及机关中的某个人,立刻就会有人给省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施加压力,而在报请州委员会或省委员会批准时常会有人提出:请省监察委员会对决定进行修改。有这种事吧?

波斯特舍夫:有。

什基里亚托夫:这您最清楚,波斯特舍夫同志,您过去在监察委员会待过,现在又是书记。省委员会提出过修改决定的要求,而且提过好几次。

波斯特舍夫:那你们不就高兴了吗。

什基里亚托夫:波斯特舍夫同志说:你们为此而高兴。波斯特舍夫同志凭什么这么说呢?相反,各级监察委员会往往与省委员会意见不一致,而且往往因此而发生冲突。在这些问题上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更多的自主权,但目前缺乏应有的措施。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人,对此不应该抱怨,中央委员会从不妨碍我们,也很少有案件发回再议的。但越是基层,问题越糟糕,发回再议的事情也越多。要杜绝这种现象。还必须消除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替不配做党员的人求情。这种例子我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说库季什。他被开除过一次,可很快就又混进了党内,而且马上身居要职——他是一个攻于心计的人,他像所有新提拔的负责干部一样,用流畅的语言给你们写报告,报告写得很完美,挑不出毛病,报告巧妙地回避了所有的问题,后经对他的调查得知,他不仅报告写得好,而且花起苏维埃的钱来也不含糊。若是你想开除他,立刻就会有差不多20名老党员奔走活动,联名写信向你求情。我们应当追究那些妨碍同这种弊端进行斗争的人的责任。当然,我不否认,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是软弱无力的。当莫洛托夫同志提到这一点时,我是认同的,但这是我们——各级监察委员

会和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共同的方针。如果需要更加坚决地斗争,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进行这场斗争吧。这里有一个同志谈到基层组织出现腐化问题。我问他:斯摩棱斯克——这算基层组织吗?到你们州、你们区走一走你们就会看到,比起下边来上边的腐化更严重。无论是上边,还是下边,我们都要好好地查一查。我认为,这么做是必要的。

喊声:对!

什基里亚托夫:如果党不抓此事,我们就会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过去是个小伤口,现在却成了脓包,将来就会变成脓疮。那么我们怎样做呢?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做的,——年轻人,据说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我们是不会碰你的,尽管你也有错误,——但过后我们马上发现了不可救药的脓疮。如果我们不进行斗争,不发出警告的话,我们就将永远弄到脓疮的地步。而这不只是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事,光靠它们是没有力量的,这也是省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事。

所以我认为,报纸上把最好的事当成不好的事报道了,最好加以改正。我以为,在与官僚主义斗争方面,各级党委承担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大。

下面我想就退党问题说两句。有一位同志,大概是波隆斯基同志解释说,退党是由于阶级斗争和清除部分不合格分子引起的。我认为,这种说法用在工人中不完全对。有人退党是因为我们对新接纳的党员教育得不够。克里尼茨基同志提出对新接纳的党员常搞一些考试:某次代表大会是在哪一年举行的?请问,美国有多少个政党,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应当先做这位同志的工作,教育他,然后再进行考试。

我认为,退党现象的出现多半是因为我们在吸收党员时不够认真,对吸收入党的同志教育得不够。我们的情况通常是:刚刚发展了一名党员,马上就有人提出,主要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该让这位同志自己发展了,他现在已经是党员了。但同时我们却全然忘记了,还需要对他进行教育,要培养他,要让他懂得,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有怎样的区别,他肩负的责任是什么。

喊声:对!

什基里亚托夫:这样的事也常有:有人入党后,马上一连几个月不交党费。可是却没有把他叫到支部去,和他谈一谈。如果我们提出,接纳的人中必须有80%是一线工人,而我们又不准备对接纳的人进行教育的话,那么结果就会是接纳了80%,而30%又要退出。一些人被我们所接纳,而另一些人则要退出。显然,各级党委在被接纳的同志们中的工作做得不够。应当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即对准备接纳和已被接纳的人都进行教育。各级党委应当认真地提出这项工作并关注其基层支部的这个问题。

怎么有时候接纳工人入党要拖这么久？莫洛托夫同志说过，接纳工作应当不超过2周，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工人都已经用了1个多月，有时甚至3个月……

有人喊：6个月，8个月。

什基里亚托夫：(3个月)才被接纳。工人不知要跑多少趟办公室，不是让你明天再来，稍等，要不就干脆把你忘到了一边。这就是磨炼和入党的过程。应当对此加以关注。这种缺点我们确实有，而且相当严重。

这里有人说，本次全会的几乎每一个报告都提到右倾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好事，应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想谈党员中是否存在右倾，因为这里谁都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想谈谈如何对待右倾。或许，在这里，在全会上，我感受不到这一点(笑声)，但在全会之外，显然有同志这样议论说：尽瞎扯，根本就没有右倾，都是些虚构的东西，是想利用右倾做文章。一些同志就是这么说的。

有人喊：有这事。

什基里亚托夫：当我们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志就议论说：平白无故开除这么多人，这是在施加压力，毫无理由地施加压力，是吹毛求疵。现在他们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他们由于亲眼目睹而相信，托洛茨基分子开始组织另一个政党。现在对于右倾问题他们同样说，这都是虚构的，说什么根本就不存在右倾。如果我们党内有这种思潮的话，那这就是掩盖右倾的危险。应当随时随地讲清、指出这一危险。这是每一个党员的重要任务。无疑，在一些支部，或许有些地方说得太不准确，右倾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这不算什么大毛病，但如果不和右倾进行斗争，那就糟了。但我要向你们说的是，实质不在于说法，不在于说法不准确，但意思是清楚的，应打击什么也是显而易见的。不恰当地批评某一个人——这种事常有。某一位同志并不是右倾，却硬要给他扣上右倾的帽子。这没什么，用不着感到委屈，因为这可以证明，同志们最终也会理解，如果你在和右倾斗争的话。在如此庞大的一个党内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支部都顺顺当当，现在有，将来仍会有一些偏差。当然，要向党作解释，不要给不是右倾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但是党应当同这一倾向进行斗争并且对其更加关注。这样做是对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提到有人卖地。是的，有人卖地，而且得到鼓励。要和这种现象作斗争，既有一些党员在耐普曼的包围中堕落，做了根本不是党员应做之事，也有一些党员有时在耐普曼和富农的压力下而作出让步。这难

道不是右倾?如果说我们在有些地方对右倾的打击重了些,但事业并不会因此而受损失,而如果我们不指出这一点,那么事业就会因此而受损失。我认为,在调整党的发展的时候,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党内右倾危险上。

喊声:对!(掌声)

主席(卡冈诺维奇):全会主席团,如果可以把它叫作主席团的话,收到了许多声明,要求明天务必结束全会工作。

喊声:同意。几点钟?

主席:收到的建议各不相同。一部分建议明天白天结束,另一部分则建议晚上。不过即使是明天晚上结束,我们今天也必须停止讨论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这样一来,明天上午就可以作总结发言,然后所有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认识到,对各委员会的工作来说,需要的不是时间,而是非常重要的决议。就是说,有人建议今天结束讨论。

喊声:对!

主席:为了让一些发言者更多地发表意见,有人建议将每位发言者的时间限定为10分钟。

喊声:同意——而且要严格遵守。

主席:而且应责成主席严格遵守会议的议程。

有人喊:没错。

主席:谁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喊声: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发言。

主席:请讲,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认为,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极其深刻且内涵丰富,从而要求我们进行同样深刻的讨论。

喊声:对。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能抱着在讨论一开始便草草结束的想法而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以为,如果把这一问题同其他列入议程的问题加以比较,那么尽管列入我们议程第一项的是一些极其重大和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同样重要。

有人喊:说得对!

雅罗斯拉夫斯基:因此我认为,不能要求今天无论如何要在2点甚至1点半完成和结束工作。

喊声:甚至在1点。

雅罗斯拉夫斯基:用10分钟时间匆忙进行讨论。不能这么做。

主席:柯秀尔同志要求发言。

C. 柯秀尔: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叶梅利扬关于应当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意见,但这样一来,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还得在这里待一个星期。

有人喊:“事务主义!”

柯秀尔:各地的粮食收购搞得很糟,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我们的情况很糟。顿巴斯很快就将断粮,我们让各次旅客列车都腾出一节车厢运送粮食,因此我认为,明天无论如何都应当结束全会的工作。至多可以达成的折中方案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需要40分钟,明天再用2个小时来讨论和作总结发言。今天的会议开到11点,明天10点钟开会,但明天必须在12点或1点之前全部结束总结发言,之后各委员会开始工作。

喊声:同意!

主席:那样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议程:明天上午10点钟开会,中午1点之前结束讨论和总结发言。然后各委员会开会,而全会会议定于晚上7点钟开始。

有人喊[什基里亚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应当告诉大家10点钟到,不然他们就不来了。

主席:不管怎样,明天晚上开会的时间可以先不定。我是这么想的,明天上午10点到中午1点开会,但是晚上的会议不早于7点钟开。

喊声:明天再定。

有人喊:还有一个关于代表会议的问题。

主席:这是个小问题。明天结束全会,上午的会议10点钟开始,有反对的吗?没有。

关于发言时限。有人建议发言时间限定为10分钟。

喊声:15分钟。

斯克雷普尼克:给雅罗斯拉夫斯基15分钟。

喊声:多给雅罗斯拉夫斯基点时间。

主席:当然可以多给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一些时间。谁同意将发言时间限定为10分钟?没几个人。谁同意15分钟?

喊声:人更少了。

主席:应该统计一下。谁同意15分钟?谁同意10分钟?

喊声:没几个人,人太少了。

主席:请中央委员表决吧。

有人喊[洛米纳泽]:候补中央委员也可以就这个问题参加表决。

主席:谁同意15分钟,寥寥无几。那就给每位发言者10分钟时间,有人建议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除外。

您需要多少时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雅罗斯拉夫斯基:20—25分钟。

主席:给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20分钟。有反对的吗?没有。现在请日丹诺夫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我是发言时限的受害者。

有人喊[柯秀尔]:我也是发言时限的受害者。一会儿我也要发言,不过我同意10分钟。

日丹诺夫:政治局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提出的决议,将一项极其困难而复杂的任务——保证在近2年内接纳的党员中80%为一线工人——摆在了各级党组织面前。这项任务能完成吗?我相信,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生产会议、苏维埃积极分子、合作社机构、共青团中所拥有的后备力量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增长。这些后备力量使我们有可能全面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務。

当我们今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组织中提出关于积极吸收工人的问题时(而今年我们共接纳了约4000名一线工人,不只是以搞运动的方式,而且还以积极的、个别的、日常的吸收工作方式),许多党组织都担心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力量,担心我们没有这样的积极分子。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是有这样的后备力量和积极分子的,而且我们还能保证接纳的党员中一线工人达到90%。而对于像列宁格勒、乌克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这样的组织来说,一线工人的百分比显然应当更高。

毫无疑问,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些组织来说,必须进一步减少、进一步压缩非无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入党。然而正像莫洛托夫同志正确提出的那样,加紧吸收一线工人的任务与战胜国家和工会机关中官僚主义腐化分子的任务密不可分,与加强自我批评的任务、与提高对广大工人群众的文化服务和日常服务的任务密不可分。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使我们的整个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适应这里所提出的巨大任务。

通过研究我们的工作经验,再加上直接参与下诺夫哥罗德这个组织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这里提到的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工作中的偏差、弊端和脓疮与我们的吸收工作紧密相关。当一些企业对腐化分子、对纠正工作中的疏忽

采取断然措施时,这些措施本身就能促使一线工人大量涌入党内。在清除了某些机关中的不合格分子之后,我们收到大量工人的入党申请书。所以说现在全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自我批评,同各级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在党的机关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我们应当作出努力,让群众实际感受到他们的自我批评的成果,感受到他们的自我批评不是徒劳无益的。这样才能保证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干部,才能保证提高群众在我们整个工作中的积极性。

现在谈谈农村问题。我完全赞同莫洛托夫同志的看法,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成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对其进行根本的改变。同志们,现在在农村组织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雇农无法为自己找到入党介绍人。雇农在我们党的成分中占据着无足轻重的位置。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状况,贫农小组寥寥无几,贫农和雇农的组织工作开展得异常薄弱。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很对,这种状况的成因就在于党组织成分本身。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这种成分,我们难以胜任改造时期的任务,难以胜任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所以说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根本改变农村党组织的社会成分的任务,以及清除我们支部中的非工人、非生产者的问题,即对党的队伍进行大检查,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需要对这里提出的决议中有关农村党组织成分的那一部分作一点决议中没有的补充。我认为,我们应当吸收优秀的先进的集体农庄庄员入党,我们应当采取依靠集体农庄庄员,而非个体农民的方针,因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规模已使我们现在有可能从中获得干部。我们应当使集体农庄成为我党在农村的示范点。

同志们,在这里我没有机会就第一个报告发表意见,但我认为,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极为薄弱。应当把我们掌握的人力物力用来加强和扩大这项工作。

卡冈诺维奇同志已经照顾过我好几次了,但我要求再给我3分钟时间谈谈右倾问题……

喊声:给他,给他时间!

日丹诺夫: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期,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充分动员起来,还不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我们在阶级教育问题上做得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在阶级政策问题上和在我们的宣传中,在鼓动中,在我们的整个工作中,我们都存在许多无原则和纪律松懈的现象。要向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工人说明,阶级斗争不只是在国外的某个地方有,那里正在进行阶级搏斗,总罢工此起彼伏,而且在我们国家里也有,要用工

厂、企业、农村的具体事例说明：你的阶级敌人就在这里，阶级斗争就在这里，这就是与集体农庄进行斗争的富农，阶级敌人就在这里。有时甚至还应当指出有阶级敌人的党支部，他们以富裕党员为代表进行反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宣传。就应当这样指出阶级敌人。从这一观点出发，我完完全全地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中关于必须最坚决地强调反右倾危险斗争的那一部分，因为右倾危险正在农村中，正在苏维埃、工会和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中增长。右倾危险增长是因为国内的社会主义正在向顽抗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发起进攻。必须使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成为我党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

关于这一点李可夫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们有同右倾危险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这就是控制数字。我想，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种具体的计划。李可夫同志在总结发言中还说，地方党组织动员自己的力量开展行动，却发现似乎没有斗争的对象。完全不对，我认为，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我们党内，都有非常多的反右倾危险斗争的对象。所以说我们应当把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不仅建立在实现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基础上，还要建立在动员全党全力进行反对右倾危险的不妥协斗争的基础上。

主席：现在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们，问题提得非常及时。迄今为止它多半仍然是作为关于这个或那个运动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这些运动常常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这里我应当指出的是，中央委员会有时也认为提前为吸收党员做好准备意义不大，这是应当做自我批评的。我想提醒莫洛托夫同志，在去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吸收党员的前几个月我曾致信中央，说应当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提出吸收更多的人入党的问题。这封信甚至没有被讨论过。而后来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人们仍然自发地开展了这样的运动³⁵¹，而如果我们及时做了准备的话，规模会更大，搞得也会好得多。

是什么妨碍了将工人们更经常地补充进我们的队伍？这里人们已经指出了许多这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我们对非党工人群众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所以我想，我们莫斯科落后于列宁格勒，莫斯科是9%，而列宁格勒是19%的这个事实，不只是因为列宁格勒的大型企业中有更团结、更有力、更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当然，这确实有一定的意义。我想，我们处于9比19的这种落后状态，还因为我们在非党群众中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而在列宁格勒这项工作就做得比较好。或许还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俱乐部，更多的场所，能够把工人召集到一起，而我们甚至连各区的积极分子都不能很好地召集到一块。但主要还是因为莫斯科在非党工

人中的工作开展得比列宁格勒差得多。同时莫斯科组织要特别认识到,它仍然是和列宁格勒组织同样重要的组织。

乌克兰的情况也一样。应当说,那里的工作极为落后,当然在那里除了许多共同的原因外,非党群众中的工作过于薄弱也是一个原因。

关于女工中的工作。显然应当考虑这个问题的不只是女工部门,而是应当重新考虑女工中的整个工作体系,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女工占工厂工人1/3的情况下我们总共只有14%、还不满15%的女工入党,同样应当格外加以关注的是,除此之外为什么雇农在我们党内只占1%。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是一种对工作漠不关心的态度。鉴于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党和工会应当特别强调这项工作。

我还会谈到妇女问题,因为我将要举一些东部在对待妇女态度问题上的事例。

再有就是存在着异己分子。从乌拉尔来的一位同志向我讲述了下面这个情况:在季尔利亚斯克厂(别洛列茨克托拉斯)一年之内几乎没有收到一份工人入党申请书。而当这位同志开始询问是怎么回事时,人们对他说:“现在在党内的那些人,1918年曾开枪打我们,是他们把我们赶到了井下,我们怎么能够入党呢。”确实如此,在没开除他们,而且开除他们仍然遭到负责人的某种抵制之前,工人们都没有入党,而在开除他们之后有大约100名工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果我们将那些过去是反革命,但在1917年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混进党内的人清除出我们队伍的话,我们就能把很不错的工人阶级分子吸收进党内。

还有,我们与歪曲我们党的路线的人,与仍然留在党内的异己分子斗争得不够。有时人们以各种借口对他们百般庇护:不是说他是一位民族共和国人,所以对待他要更加温和,就是说这个人不久前刚入党,在党内还不适应,得让他再适应适应;而当将此人开除出党成为纠正问题的唯一办法时,或至少应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时,各地往往只是指责或是提出警告。这就是最软弱的态度。如果人们在全会上指责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与各种异己分子斗争的问题上有时过于温和的话,那么我是准备接受这种指责的,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实际上人们指责我们在党内不是过于温和,而是过于严厉,所以当我们就我们的决定征求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时,我几乎不记得中央委员会有认为需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但我记得有这样一些时候,中央委员会考虑到某人的地位、作用和履历,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决定改得温和些。经常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你们了解一下各地被开除出党的人,你们就会发现,被开除的毕竟大部分是普通工作人

员。当领导人员犯有同样的(我强调是同样的)罪行时,人们就会找出各种理由,以便能够从轻处罚。因此,工人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同领导同志的罪行和过失进行斗争。为了言之有据,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它将向你们说明许多问题。早在6月份的时候,中央监察委员会得到了来自阿塞拜疆的关于阿塞拜疆财政人民委员部上层人物完全腐化的消息——这一消息刊登在巴库的《瞭望塔报》³⁵²上。这个消息谈到了阿塞拜疆财政人民委员部上层人物的腐化情况:那里发生了令人发指的丑事。多名财政人民委员部女职员在部务委员会委员阿季格扎洛夫的办公室里被强暴;阿季格扎洛夫的办公室成了每一个被录用的女职员度过自己“试用期”的地方。不屈从于阿季格扎洛夫的女职员会因各种借口被解雇。除阿季格扎洛夫外,原支部书记、财政监督管理局局长达达舍夫,税务管理局局长萨德霍夫和行政管理局局长加萨诺夫也在这间办公室里干过这样的事。这伙人全都强暴过的一位女共青团员——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女职员,在染上性病后被解雇。

当时《真理报》编辑部根据工人通讯员科洛科洛夫的报道曾建议检察官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案件展开调查。专门委员会查明:从1926年12月到1928年3月,税务检查员和代理人共查封欠交税款人财产6 649件,价值977 000卢布。其中变成现金的财产只有57 000卢布。查封财产的剩余部分超过90万卢布,被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头头们送给了投机分子,从而损害了国家预算。

外高加索财政人民委员部对阿塞拜疆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调查材料表明,周转税的减免数目可观,仅第二税务所波斯商品贸易一项就超过2 800 000卢布。所得税往往不成比例地降低。巴库著名承包商列季诺夫家族所得税从55 000卢布降到21 700卢布。这种情况非常多。

第二税务所管理层是由反革命分子组成的。这个所的领导人是一个叫肯格尔林斯基(纳希切万汗)的人,他曾被作为社会危险分子驱逐出境。肯格尔林斯基与投机商和有钱人交往甚密,所以他减免了他们的税。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他是专门负责提供妇女的人。解除他的工作的尝试没有成功。

诚实而有用的工作人员被赶走,积极分子和正直的党员不断遭到迫害。“突厥投机商比其他民族的共产党员与我们更亲近”的口号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内占主导地位。这一口号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许多过去蹲过沙皇监狱并服过苦役的党员被迫离开财政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丑事被支部委员会揭露出来。参与的有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党团、人民委员泰穆尔·阿利耶夫、卡德莫夫、艾瓦佐夫及其他坚持作出“警告”决定的人。尽管有关财政人民委员

部案件的全部材料认定,人民委员阿利耶夫违背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决定(压制,包庇),泰穆尔·阿利耶夫仍被派到区党委会负责制定关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案件的实际建议。

《瞭望塔报》要求立即解除财政人民委员部机关上层领导人的职务并送交法庭处理。

当那里的一切(我认为远非一切)丑事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揭露出来后,“当查明诚实而有用的工作人员被从那里赶走,积极分子和正直的党员不断遭到迫害,许多过去蹲过沙皇监狱并服过苦役的党员被迫离开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些丑事被支部委员会完全揭露出来”,在这之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我马上就会讲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讲了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我不准备都读,我只读其中的一个决定。1927年入党的阿季格扎洛夫被开除出党。有一个人不久前才入党,是个异己分子,他被开除出党。不错,他从前入过党。加萨诺夫被开除出党。萨德霍夫被解除了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工作。达达舍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对泰穆尔·阿利耶夫这位财政人民委员是如何处理的呢?是这样的——“由于(您听听!)泰穆尔·阿利耶夫明知财政人民委员部支部的工作情况不正常(莫洛托夫同志,您听听,说得多么温和呀!)以及这个支部存在不正常现象而没有采取足够坚决的消除这些现象的措施,因此对泰穆尔·阿利耶夫同志提出警告。”在这之后你们准备做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什么时候和这种应当彻底铲除的缺点、毛病进行这种所谓的“斗争”呢?当存在这种情况的时候,部分工人当然会对党不赞成,但你们在像巴库这样的大中心城市里,如果能毫不留情地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的话,就能将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关于这一切所有工人群众是知道的,非党工人群众是知道的,但他们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党内会更坚决地同这些现象作斗争,所以他们就想了:既然党容忍这种现象而且对这种现象只是提出“警告”或“责备”的话,那我们是不加入这样的党的。

关于清理。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有人大概都会赞同进行这样的清理,这不是因为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这是一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错误的痛苦的事情。1921年当我们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党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我记得,甚至减少了2/3,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应当对这次清理进行细致的考虑,在地方上进行全面的讨论,进行最周密的准备,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许多清理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对黑海组织³⁵³和索契组织³⁵⁴进行了清理。从北高加索来的同志们,你们说说

看,现在那里不是仍然有许多异己分子留在党内吗?不是在开除了那些揭露黑海组织和索契地区中的丑事的人之后又不得不恢复他们的党籍吗?

我们搞过多次局部审查,这些审查应当打击的是不合格的党员。我举一个实例:不久前在新罗西斯克搞了一次党员试动员,相当大部分人没有出席这次党员试动员。1/3党员没有出席。之后就不出席原因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因某些正当原因未出席者占20%,其余4/5的人没有出席都没有正当原因。你们在遇到这种行为时进行过什么处罚,以使他们为此受到严厉警告吗?我相信,没有这样做。如果你们这样行事,如果你们不能经常地、日复一日地保持每一个党员应达到的党的道德、党的纪律、党的要求、党的义务的水平的话,那么任何清理都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就补充人员说两句。莫洛托夫同志说的对,我们有工龄比较短的新的补充人员。但是,莫洛托夫同志,应当考虑到如下情况:如果我们确实认为共青团组织是一个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后备力量的组织,如果共青团组织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这所学校现在就应该开展更加巨大的工作,而没有这样巨大的工作我们将来就无法保证拥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后备力量——这是共青团的后备力量,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接纳工龄短的人和青年人,因为不可能有年老的共青团员,也不可能有什么23岁的老头,而23岁年纪的人工龄是不可能长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感到担心。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把那些由于某些并非羞辱人的原因至今未能入党的老工人吸收进党组织,我们无论如何要吸收他们入党,因为这些工人往往具有极大的影响,他们参加共产党的工作有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但也不能将这种意义估计过高,因为毕竟应当考虑到,我们的共青团员往往是推行合理化措施的开路先锋。遗憾的是,并非都是如此,共青团员中也有个别分子;共青团中央和整个共青团组织、《共青团真理报》应当在这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以“提高共青团员的声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基本群众将会是比较年轻的工人,对此不必感到担心。

农村。不应该忘记,有一个时期,无论是各报刊,还是各个地方,无论是共青团内,还是党内,都曾提出大力发展模范个体农民经济。我们甚至在《共青团真理报》和其他报刊上提出在自己的经营中争当采用新的工作方式等的模范共青团员——经营者的竞赛。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彻底改变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日丹诺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我们应当向我们的全体农村党员指出,我们把他们参加我们的农业集体化工作当作衡量他们的党性的尺度,我们将根据他们对待集体农庄的态度来对他们作出评价;即使是发表过关于集体农庄的最

出色的演说,但如果在这个地方可以组建集体农庄,他们却没有组建,或者是集体农庄,他们却没有参加,那他们的讲话就一文不值,我们不需要他们。

有人喊:我们是要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再重复一遍,这应当作为一个尺度;如果可以组建集体农庄,而他,农村共产党员,却没有组建,或是有集体农庄,而他却没有参加,那就应该按照党的指示强迫他参加,而如果他不参加是因为妈妈和爸爸不想参加,而他又打算和有钱的爸爸分家或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那就可以将他请出党的队伍。不久前,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些委员收到一份文件,卡卢加省一个农村支部的声明,这份声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村在搞热月政变”。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此非常关注,并派人对这一声明进行了调查。

斯大林:卡卢加搞热月政变?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卡卢加省的一个村搞热月政变。我派了人去调查,结果——确实是“热月政变”:整个支部全都是异己分子,必须解散这样的支部;必须更仔细地摸清情况,这样的支部大概还不少,它们形成了对我党完全敌视的态度。

关于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能对我们的队伍进行彻底的清理,如果我们能将完全腐化的人和异己分子清除出我们的队伍,我们就能把在这段时间中成长起来的相当多的来自教师、农艺师、工程师的党的忠诚的积极分子吸收进我们的队伍。休假的时候有一位教师对我说,他七年来一直都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按照县组织的委托,他甚至在县代表会议上作过多次报告。但他不是党员。支部已经批准他入党,县里也已经批准,可是州委员会没有批准,理由是,你们想得到吗,调整党的社会成分。如果这样理解“调整”,如果因为调整党的成分而不愿意吸收一个对事业完全忠诚、七年来一直在完成党的工作的人入党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任务根本不了解。

最后一个问题——同各种倾向的斗争。莫斯科组织开展斗争时,我不在莫斯科。前不久《真理报》刊登了我的题为《十月革命与我们党》的文章³⁵⁵。这篇文章是受编辑部的委托,根据乌里扬诺娃同志的请求写的,她为此给我拍了电报。当时我与外界完全隔绝,任何文件也得不到,什么也没有,连报纸都不能按时收到。文章是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以中央委员会的一句口号为题写成的。文章登晚了,迟了一些,这不是我的错。有一些莫斯科人指责我说,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问他们:文章中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这是一篇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可你为什么要在全会前写这篇文章呢?你为什

么只写这一篇呢?当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一位布尔什维克不能写彻底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的时候,——事情就糟透了。

有人喊:文章里有什么不妥的吗?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只是当人们指责我的时候,我才感到文章出了什么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今天举了一个排斥犹太人的例子,它使白俄罗斯舆论深感不安。但《共青团真理报》在刊登这则消息的同时还报道了一连串发生在一个工人聚居区——顿巴斯的排斥犹太人的事例。难道莫斯科就没有这种排斥犹太人的事情吗?我们的报刊,我们的会议对这种不应有的情绪给予过真正的反击吗?反击过吗?我认为,没有。我们是否教育过我们的党员,让他们在电车里,在大街上与那些宣扬反犹太主义观点、反苏观点的人进行殊死斗争吗?没有,我们没有这样教育过我们的党员。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行动起来,要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各地为捍卫我们党的路线,捍卫我们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进行斗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会出现为右倾而窃笑的事,也不会出现某个布尔什维克因为捍卫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因为不妥协、不充当调和派分子角色而受到指责之事。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没有同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讲过他们为了东部妇女的解放,为了妇女露出面部而进行斗争的情况。我们预定12月初召开东部妇女会议。就此捷连斯基同志告诉我说,有22名乌兹别克妇女,即22名女积极分子由于领头建立苏维埃政权,争取解放而在乌兹别克斯坦被杀害。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及其他地方由于许多党员不允许自己的妻子露出面部,不允许她们参加会议,从而使妇女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样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没有?

阿尔秋希娜:这样的党员在莫斯科也有的是。

雅罗斯拉夫斯基:所以应当向他们宣布,任何一个反对妇女解放的党员都将被开除出党。同志们,还可以举出不少事例,说明我们同我们党内的反党、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丑陋现象斗争不够,斗争不够有力。这样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右倾分子。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全部打击矛头更经常地集中到与右倾的斗争上,但这种右倾指的是我们目前在国内确实看到的大量现象,它们正将自己的情绪传染给某些党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完成通过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加强我们党的任务,否则的话,即使再努力,相当大部分先进工人还是会徘徊在我们党的门外。

主席:现在请柯秀尔同志发言。

C. 柯秀尔:显而易见,目前改造任务和局势要求我们党在社会成分和与群众联系方面比过去有相当大的提高。因此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十分尖锐而正确地提出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两年内从研究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这些过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我们还将更轻松地继续工作下去。

当然,对于莫洛托夫同志给予我们乌克兰党的发展的评价,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过我想就个别百分比作一点说明。现有的最新资料表明,我们的党员不是9%或10%,而是11%多一点,联共中央的最新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年之内乌克兰增长了2%,而其他组织增长了1%多一点。

当然这绝不是说乌克兰的情况令人满意,相反,这方面的情况很糟,许多企业中、许多工业部门中党员人数非常少。我们有许多大型企业,但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大企业中的党员人数一般都比小企业少。这与不善于在大企业中开展工作有关。在我们最近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吸收的党员和预备党员中,十月革命后进入企业而且过去从未在资本主义工厂工作过的工人占2/3。此外,根据我们的一些统计资料,我们的企业中有约一半的工人过去没在资本主义工厂工作过。所以在安排群众工作时困难极大,尤其是在聚集了大量这类工人的大企业中。这一点务必要考虑到。

毫无疑问,吸收党员的后备力量是有的,在这方面莫洛托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必须充分开展我们的群众工作,必须在党内形成一种真正能使工人阶级中所有最积极、最先进的分子接近我们的局面。

同志们,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农村。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对我们的农村组织给予了十分尖锐的评价。他指出,我们的农村干部目前在现有的成分下是无法完成改造任务的。尽管承认这一点十分痛苦,但显然这毕竟是事实。假如我们现在在乌克兰因收购粮食而不得不同富农进行斗争,并且我们无法把组织发动起来,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那么在那些整个经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地方,这一工作会更加困难。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实现这一转变,尤其是在乌克兰。

我想就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在这里提到的有关民族成分,特别是我们乌克兰组织的民族成分问题简单说几句。大家知道,在我们乌克兰,当然,和在所有民族共和国一样,不过尤其是我们这儿,不得不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复杂的

民族条件下解决结合、文化水平提高等所有问题,而如果没有乌克兰干部,没有懂乌克兰语的干部,我们是无法解决提高文化水平、与农村结合这个问题的。4年前,我们的组织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1924年乌克兰人只占33%,而俄罗斯人占45%。现在,到1928年7月1日止,乌克兰人占52%,而俄罗斯人只占28%。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工人中招聘乌克兰干部。我们已经有了不仅懂得而且会说乌克兰语的工人干部。因此就这方面来说,各民族共和国还存在许多特殊的困难,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

关于清理说两句。清理之所以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情,不是因为在这方面我们会犯许多错误,而是因为这会极大地搞乱组织,并可能严重破坏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的花费可能是巨大的,但我认为,这些花费无疑是会得到补偿的。因此无论这有多么艰难,但毫无疑问,应该赞成清理。

同志们,请允许我就阶级斗争问题再简单说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我有“托洛茨基倾向”,为了不超过10分钟,我只能是匆匆而过。当然,我不会坚持我表述中的每一句话——关于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但我所说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我想说,而且已经说过,新经济政策下的社会主义进攻必将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当然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可能有另外的结果。假使敌视我们的阶级分子不断反抗,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的话,那么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社会主义。这是根本用不着说的起码常识,然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欺骗”我,甚至像通常所说的捉弄我。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近期,而他却将近期偷换成整个过渡时期,直至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他提出问题的方法是:他把阶级反抗的增长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说什么如果你说反抗增长的话,那只有在资本主义分子的经济基础扩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正在前进,正在扩大社会主义的基础。这里又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弄错了,依我看,他应当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面资本主义基础由于我们铲除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资本主义根源而变弱,另一方面,反抗也必定会变弱。照我看,恰恰相反,我们的打击越狠,资本主义遗留的残余就越会团结起来。因而阶级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当然是在一定时期内,然后就会减弱。我想,我们在七月全会上将这一点写进我们的决议是有道理的。决议写道:“中央全会指出,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反而会使反抗得到加强,同时使苏维埃政权及其群众基础也更加巩固,这并不排除在局势紧张时某些居民阶层出现暂时的动摇。”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这就是阶级斗

争问题。

后来他举了另一个例子,关于中农的例子,并援引了纲领中的话。他读的东西是对的,但是应该知道,我们将在与富农影响的不断斗争中改变这个中农。问题就在于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在我们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条件下,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在一定阶段内,我不知道是5年、7年还是3年,反抗必定会加强,阶级斗争也会更加激烈,我们绝不能使党放松注意力,不能使党放松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性。相反应该在这方面将党武装起来,应该说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阶级斗争必将变得更加激烈。我们不赞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对此我们不感兴趣,但也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所以说党准备得越充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得就越快。

主席:现在请米利恰科夫同志发言。

米利恰科夫:共青团有7万个支部,200万共青团员,80万工人和雇农。这是有关全苏共青团成分的一组基本数字。对此我再补充一个数字,以说明党的共青团后备力量的特点:在共青团的30万超龄团员中足足有1/3是工人。不断长大的年轻人不可能永远待在共青团里!转入党内工作、在工人阶级共同的组织中工作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年轻人的面前。关于共青团员转入党内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经常地、深入地、系统地进行研究的问题。正像莫洛托夫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共青团的问题就是党的新干部问题。应当怎样培养这些干部呢?应当在共青团内培养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干事和发展的工作者和革命者。党对这项任务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共青团应当从年轻人中培养共青团先进分子,他们能够随时向一切丑陋行为发起坚决的反击,他们不能当尾巴,他们应当勇敢无畏地开展布尔什维主义的自我批评,他们应当与纪律涣散、自私自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坚决斗争。共青团员应当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榜样,生产中的模范工人,农业中的开拓型建设者,应当按照社会主义方式改造生产和农业。就是这样。我不打算谈那些根本不足道的成就,这种成就我们这里有,问题不在这里。众所周知,我们正努力克服各种缺点,努力在共青团内点燃无产阶级自我批评之火,努力和毫不留情地揭露各种毛病和丑陋现象,首先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总的说来,我们的《共青团真理报》正确地反映了共青团的志向以及所做的工作。我们不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们有许多缺点和毛病。这就是这些缺点,当然不是全部。一年之内有30万人退团说明了共青团队伍的人员流动性。我们日益加强的工作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基层无产阶级青年的需要。我们依靠青

年工人和雇农壮大队伍的工作做得很不好。例如,我们(为纪念国际青年节)曾宣布招收青年工人和雇农入团。可是7万个支部在2个月之内统共只招收了6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支部招收了3/4个人!这说明我们的群众工作是多么笨拙、呆板和拖拉,说明我们不善于吸引青年加入组织,吸引他们参与集体的工作。在共青团的“上层人物”中——我们也不掩饰这一点——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作中的缺点正说明了这一点),存在官僚主义、阿谀奉承、欺下逢上和文牍主义的恶习。“我在工厂的时候,感觉特别好,总想多干活。可一回到委员会就倒霉了:提纲和结论,结论和提纲。我识字不多,表达的时候有时出错,——伙伴们都笑我。这种力求通报风格的做法打消了工作的兴致。真希望重新从委员会回到工厂去,可是不放我走。”(摘自一位工人积极分子的来信)必须坚决地同因循守旧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同志们,我不打算一一列举(先前我在提纲中所指出的)所有说明共青团工作缺点的例子,对这些缺点,我认为,许多地方党组织并不总是十分清楚,而且也不是总能及时地“睁大眼睛仔细瞧”。为了更进一步巩固共青团,将要进行非常重要的工作。而这项工作仅靠我们——共青团积极分子——是完不成的。我们要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核心,同时为了严格的自我清理而对共青团中的所有非无产阶级部分进行审查。在这种时候,就像在团组织的所有工作中一样,特别需要有经验的敏锐的党的领导。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首先是工会的帮助。

关于共青团和工会我想简单说几句。

有人喊:几句不够。

米利恰科夫:同志们,我们绝不认为共青团批评无产阶级共同组织的工作是一件被禁止的事。因此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尽量“狠批工会”³⁵⁶(笑声)并提出一些重要问题讨论。在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方面,在为青年工人需求服务方面,我们的工作,共青团组织的活动,与工会工作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在工会工作中,我们的官僚主义与笨拙在许多方面是显而易见的。难道对此可以避而不谈吗?这妨碍在生产和生活中为工人群众提供正确的、更加全面的服务。我们尖锐地提出了工会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我们通过我们情绪激昂的和显然是锋芒毕露的批评想说的话也就是现在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报告的决议所说的话:“在实践中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和切实开展工会民主方面还需要取得决定性的改进。”我们竭力赞成这一点。对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工会组织提出:请对所有的批评,尤其是来自青年的批评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请

更多地关怀他们的需要和需求。坚决将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从工会工作中赶出去！

现在谈谈党的领导。我再说一遍,我们自己,共青团积极分子不能胜任工作。党组织是信任共青团积极分子的。我们在做工作。但同时对党委会以形式主义的态度看待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时而听取汇报这种情况的不满情绪折磨着地方上的许多共青团领导干部。然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说:“了解共青团组织,了解它的日常工作,必要的同志式的关心和分寸是正确的党的领导的条件。”因此我们认为,既然关于党的无产阶级后备力量的问题已经广泛提出,就应当认真地对待共青团和它的工作。我们认为,许多党组织常常搞不清楚,青年、个别青年小组和支部追求什么,议论什么,关心什么,我们的年轻人在什么事情、什么问题上伤脑筋。必须对团组织的日常工作进行系统的、高水平的、深思熟虑的领导。最后谈谈共青团运动中的右倾危险。由于干部的社会成分比较复杂和缺少毅力,共青团和青年容易受到小资产阶级的较大影响。阶级敌人的猖獗活动和厚颜无耻导致某些青年阶层的动摇。异己分子不仅逼近共青团,而且共青团中已经混杂有相当多的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敌人已在共青团的许多支部,在共青团员中进行活动。下面是几个例子:

1. 在斯摩棱斯克省的拉格涅金支部,旧警察的儿子被列为雇农。而他的家中有2匹马、1头母牛和5只羊。

2. 博尔达什(布里亚特的祖加纳伊支部)有39头役畜,14头奶牛,其他牲畜323头;税——202卢布。

3. 巴扎罗夫(祖加纳伊支部)——31头役畜,8头母牛,其他牲畜426头,纳税285卢布。

4. 阿伊谢列季夫钦支部的一些团员是拥有约10名雇工的工业企业的农民的子女。

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除此之外,共青团内出现了一种四处蔓延的“伪造社会成分”现象,中农自称贫农,而富农则改头换面成了中农。我们对300个农村支部进行了调查,按社会财产构成对农民共青团员进行了分类。结果贫农占28%,中农——52%,富裕农民——16%,富农——4%!调查中发现,一些支部常将中农划为贫农,而富农则常常被当作中农。这样一来,这些支部就认为他们中的贫农占65%,而实际上贫农占28%!显然,在共青团内,尤其是在农村,小资产阶级动摇和歪曲团组织阶级路线的行为有着深厚的基础。出现了许多危险现象,如“事务主义”、尾巴主义,一些支部丧失了政治面目,一些

团组织脱离了共产主义战斗组织的轨道,积极和忘我地帮助党(尤其是在农村的困难工作中)的,许多支部变成了纯粹的“文化团体”。沙文主义和忽视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现象有所增长。在困难面前退缩、惊慌、向右摇摆。我们曾宣布在青年中与各种机会主义、各种动摇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我们在全苏共青团中央十月全会上决定(现在共青团组织也是完全支持我们的决定的):“继续与堕入反革命泥潭的托洛茨基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现在要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揭露和根除成为我们道路上巨大障碍的右倾以及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上来。”³⁵⁷

当时全会上有人表示,这是“惯用的套话”。我查过字典后得知,“惯用的套话”指的是什么。原来,惯用的意思是举行仪式的、祭神的、流传下来的。同志们,应当说,对捍卫列宁主义路线纯洁性的斗争的这种“讽刺”令人难以理解。共青团将和党一起恪守这一“惯用的”布尔什维主义套话,并高举与各种倾向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旗帜开展自己的工作,把青年培养成坚忍不拔、遵守纪律、忠诚于党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鼓掌)

喊声:对!

主席:现在请阿尔秋希娜同志发言。

阿尔秋希娜:莫洛托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向我们提出了研究工人阶级成分的任务,为的是将工厂中最坚韧、最具阶级和政治觉悟、经过十月革命考验并忠于十月革命的人吸收到党内来。

其次,莫洛托夫同志非常明确地提出,女工中也有可吸收入党的后备力量。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尤其适用于纺织女工。她们中有在工厂里经过锤炼、经历过十月革命战火的女无产者老干部。然而在吸收党员,尤其是吸收纺织女工入党方面做得很差,步伐缓慢,相当不够——在纺织厂里,每百名女工中有4名女党员——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也有每百名女工中女党员数量为3人的地区。比如,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每百名女工中只有女党员3名,在莫斯科——每百名纺织女工中有5名女党员,只有在列宁格勒,这一百分比上升到10。在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冶金、食品、印刷等部门——女党员的百分比相当高,达到了20%。考虑到这一点,应当承认,吸收女工入党主要应当抓紧吸收纺织女工入党问题。必须主要在纺织女工中开展吸收女工入党的工作。遗憾的是,从纺织地区来的同志们为什么不在这里发言,为什么不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他们将在吸收女工入党方面采取的措施。

在我看来,有四个原因妨碍吸收女工入党。这些原因是:女工的生活、不识

字、党组织在吸收女工人党方面工作薄弱、对女工的态度有时过于苛刻。

女工的生活。近两年内,女工的人数增加了32%,而托儿所却只增加了4%。1923年,每千名女工有18个托儿所名额,而现在每千名女工只有13个名额。1921年上幼儿园的儿童有245 000名,现在是85 000名。10年前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³⁵⁸决议中提到并四处宣扬的洗衣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洗衣店,我们的纺织女工原先在莫罗佐夫斯克的浴池里怎么洗衣服,现在还怎么洗。食堂少,饭菜还贵。其次我们根本就没有儿童福利机关,因而无法让女工党员腾出时间来从事社会工作和学习。就是有托儿所和其他儿童福利机关,也只是在生产劳动时间里开放,必须要为女工提供学习和担负党的工作的机会。根本没有这样的机关。

纺织女工中的文盲比其他女工群体中多得多,在妇女中达到30%。纺织工人中文盲总计占13%,而冶金工人只有3%。在这方面工会的文化工作没有跟上,尤其是纺织工人工会明显做得不够。文化工作采取的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制定的包括所有工人的一般形式。然而为使女工能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必须要有专门的措施、专门的方法。

我们为在俱乐部里建立儿童游艺室作过多次努力。但至今只有17%的俱乐部里有这样的儿童游艺室。看看我们的全体大会吧,尤其是纺织女工大会,你们就会发现,会场上每一个纺织女工都带着两三个孩子,而且她所关注的往往是她的孩子到哪儿去了,而不是主席台,她也不注意听会上都讲了些什么。

即使是在我们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文盲的百分比仍然很高——达到了28%。

第三个原因——各级党组织在吸收女工人党方面工作薄弱。在这一年中,中央委员会几乎一直都在讨论吸收党员的问题。我们检查了一些工厂的支部工作,发现吸收女工人党的工作进展非常有限。这项工作完全由支部组织者承担,而组织者本身政治上就不够成熟。支部不愿意做这件事。代表会议的主持工作同样很薄弱。实际上女工代表对党支部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有一位多次主持过红霍尔姆厂代表会议的女工告诉我说,支部书记声称:“我们从不审查代表会议的工作计划,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事。”支部不派具体问题的报告人,理由是“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办法”。

支部对女党员的工作量漠不关心。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都完全机械地承担同样的工作,根本不考虑女工还得承担大量额外的家务劳动。

支部在提拔女共产党员做党的领导工作方面也很差。斯捷茨基同志说得对,在那些女党员任支部书记的地方,吸收女工人党的工作搞得就好一些。毫无

疑问,如果继续实行提拔女党员的方针,如果女党员不只是担任县党委书记,而且还担任省党委书记或是更高一级党委书记的话,这项工作将会得到加强。提拔女党员做党的领导工作无疑将会在吸收女工入党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其次,没有考虑女共产党员退党的原因。我们总是“退了”就“退了”。而在采取诸如党内调查这样一些特别措施时则查明,有的女党员几个月没缴党费,有的女党员不参加会议,还有的女党员已经几个月不把自己当成党员了。而在日常工作中这种事情是谁也不会注意的。

最后,必须谈谈一些党员对女工的恶劣态度,这种态度对非党女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我就不谈各种性别问题了,这个问题人们在此已经讲了许多。我想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一个目前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有许多人给我们写信递条子,其中有写给我的,也有写给斯大林同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这些信提出了非常明确的问题:为什么要剥夺丈夫有工作的女工党员的劳动权利,为什么要把她们裁掉。例如在一家纺织厂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阿尔秋希娜,我在厂里干了20年,我从不靠丈夫生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把我裁掉。既然我会被裁掉,我干吗还要入党。”

克里米亚组织的女工们也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党现在广泛地提出了提拔女工的问题,但在我们的党组织中这项工作似乎遇到了一些障碍。整个克里米亚组织都认为,如果一位女工有丈夫,而且丈夫也有工作,那么这个女工就不应该工作,因为还有大量的失业者。不久前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也提出要解除丈夫有工作的已婚女党员的工作。试问:如果这样提问题,那么女工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更有价值的女工呢?”她请求党中央在《真理报》上就该问题作出正确的指示。

普斯科夫一位1917年入党的女工也来信说,14年来她一直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现在却因为同样的理由——丈夫有工作而被裁掉了。她在给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信中写道:“在普斯科夫,近来多次提到解除所有丈夫领取薪水的女党员工作的问题。我在红军中干过3年,现在却只能做家务,因为解除了我的工作。”

实际上,一年半以前连莫斯科组织中也有人提出解除女党员工作的问题。为了制止这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斗争。

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吸收女工入党的问题,那就应该彻底地消除所有这些偏差。

再有,党员有时对自己妻子的恶劣态度对吸收女工入党也产生了极端不良

的影响。女工们在来信中也谈到这一点：“我们的丈夫妨碍我们入党。他们不想让我们入党，不允许我们参加社会工作。”而本人还是党员。另一封来信写道：“丈夫自认为是坚定的党员，支部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可在家里，他喝酒、打孩子、摔锅砸碗。就冲这态度还谈什么入党。我们害怕他们用这种态度来对付我们。”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非常明确而正确地提出了进一步吸收女工入党的问题。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再加上一条，即必须进一步广泛开展生活服务工作和文化工作并作出工会必须在女工中更广泛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和生活服务的指示，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是可行的。

主席：明天上午10点开会。首先是科洛季洛夫同志发言，然后是波泽恩同志。现在散会。

敬
告
同
志

第十五次会议

11月24日上午

主席(柯秀尔):同志们,现在开会。请科洛季洛夫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波泽恩同志。

科洛季洛夫: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对党在近一段时期的工作作了全面的指示。我认为,党在最近一段时期的活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吸收尽可能多的一线工人入党。首先,这对于巩固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应当说,现在的工人群众已经不是五六年前的工人群众了。大量的新工人补充进来,大量的农村群众补充进来,为了能同这些农村群众一起并且在他们的支持下继续在我们的建设中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完全有必要在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熔炉中对他们进行改造和锤炼。我深信,就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作出的决议向党提出的任务——争取让党内生产工人的比重达到50%,是可以完成的。目前有可供吸收的骨干。在十分落后的工业部门和十分落后的地区,比如纺织行业和以纺织业为主的地区,也有这样的骨干。

应当说,我们在纺织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吸收新的工人骨干加入党组织的必要性。因为,经济建设方面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复杂任务要求我们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加强我们的组织。一般来说,纺织企业的党员非常少。如果说莫斯科纺织企业党员的比例大约为9%的话,就像有人在这里说的那样,那么拿我们的纺织企业来说,党员在生产工人中的比例仅为6.6%。显然,不能把这仅仅归咎于党组织安排工作不得当。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可以说相当客观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在于,纺织企业的工人整体上文化水平极其落后。因此,我们只能把非常基本的文化目标即起码的、十分简单的文化工作目标作为自己的任务:办学校,首先是为识字不多的人办学校,扫除文盲和半文盲现象。这就是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因为,任何一个创举、任何一项措施,如果它甚至还未被大部分工人领会和理解的话,尤其是现在,那就不可能行得通。可惜,几乎30%的文

盲和更多的半文盲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措施和我们的口号难以被工人群众理解。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列举了马尔夏克事件³⁵⁹来说明群众工作安排上的弱点。依我看,这一事件对于群众工作的弱点来说,或者对于说明群众工作的弱点来说,还不十分典型。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更鲜明的例子。

莫洛托夫:说得对。

科洛季洛夫:例如,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消除企业里的罢工这种现象。我们区(相对较小的一个区,有16万—17万纺织工人)今年大约发生了15次罢工。的确,其中的大部分是小规模罢工。但是有一次罢工的规模相当大:近22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而且是在已经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工厂里发生的。

有人喊:多少人?

科洛季洛夫:在一个有2200名工人的工厂。应当说,这种现象突出地说明,我们的各级组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同群众的联系不紧密。

莫洛托夫:说得对。

科洛季洛夫:此外,这些罢工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尽管部分罢工纯粹是出于闹事,但是罢工往往真实地反映了工人的阶级利益,而这种利益由于我们各级组织态度冷漠、缺乏同情心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满足。在我看来,这方面的主要危险首先在于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群众。另外,官僚主义也使工人产生了异常消极的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在纺织企业里十分严重。我不认为参加会议等活动的数字能说明问题,可它们往往能说明这种消极情绪。在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罢工这种现象,而有时我们的或接近我们的工人积极分子对许多问题,对我们现在应当向工人提出的我们政策的基本任务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这里特别突出的第二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淘汰。在党员登记时我们曾确认,我们失去了5%—6%的已经入党的工人。这也属于同一类现象。

有必要指出,我们的纺织企业中有大量的女工。16.5万工人中有9.8万名女工,但是女工中党员特别少,总共只占4.4%。女工党员队伍的确正在发展,逐年发展,人数在增长,但是发展得太慢。妇女是无产阶级队伍中文化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人,而其次是日常生活条件,女工的日常生活十分不适应、十分不符合党和无产阶级社会组织对吸收女工参加社会工作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同意阿尔秋希娜同志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改变和扭转我们妇女生活和工作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方面做的工作太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资金不太充足,而且一些普通的、最起码的需求在困扰着我们。

我们必须关心的不是修建托儿所、洗衣房,等等,而是建设住房,因为没有住房。住房需求相当大,集体宿舍里所谓的斗室,很小的屋子,往往要挤8—10个人,而且是几个家庭的人。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党务工作者问题。我不是说我们应当关心所有党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我们尤其应该、而且理所当然应该关心党务工作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当说,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³⁶⁰这样的机构是党为各级党组织培养党务工作者的非常好的机构,但遗憾的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和其他共产主义大学毕业的同志太少了,在我们的很多企业里甚至找不到一名经过这些机构培养的党务工作者。大多数从事党的工作的人都是从生产一线提拔上来的工人,他们当然完成不好一些大企业现在必然要面临的复杂的、困难的任务。

我认为应当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必须在企业内部造就党务工作者骨干的问题。因此,完全有必要派有经验的党务工作者到企业、到生产一线去工作。

下面简单谈谈右的倾向。应当说,现在食品和粮食情况、整个供应情况很困难,对我们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由于这些困难,工人中的一部分落后分子——有熟练工,也有非熟练工——暴露出来,他们毫不掩饰地把工人拉回工厂主一边。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举了波多利斯克厂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这里也能找到。应当说,这使得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陷入严重困境并使党组织内部产生右倾思想。

工作变得困难也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实际上有三四年时间一直在大力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没有办法进行技术改造,因为用于改进技术的钱很少。纺织业当然没有必要同重工业比高低,可是应当指出的是,大力增加劳动强度和改进技术必须遵循某种比例,因为仅仅大力增加劳动强度还不够;建议改为看三四台织机或三四条生产线对工人群众来说是根本没有道理的,并且破坏工人的情绪。这种状况应当考虑到,而且我认为应当纠正。

主席:现在请波泽恩同志发言。下一个发言的是什维尔尼克同志。

波泽恩:我想谈谈我们对非党人员的态度,谈谈我们这里还远远没有消除的对非党人员的某种轻视态度,谈谈我们地方上还远远没有消除的那种认为最优秀的非党人员已被我们吸收、工人阶级的所有精英都已入党的看法。这种奇怪的傲慢态度在我们地方上、在我们一些基层组织中仍然存在。可是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上层领导机构中也存在对非党人员的这种轻视态度。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加了解非党积极分子,但是,了解和教育非党人员的工作仍然进行得十分不力、十分不够。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十分惊奇的事。就在

前不久,叶努基泽同志给我讲过,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哈萨克斯坦在八年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曾推荐一名非党人员进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名非党人员直到现在,也就是八年后才知道他已当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是他现在来找叶努基泽同志索要以前的薪水。

有人喊:顿巴斯有一个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两年不知道自己已当选!

波泽恩:但是你们会说,这种事只有七八年以前才会发生,或许这已成为尘封往事。但就是现在,所有清楚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团会议怎样进行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怎样推荐非党人员的,都知道地方组织推荐非党人员很困难。总是有人试图用党员取代非党人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就在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桩让人非常不愉快的事:推荐的不知是伊万诺夫,还是叶戈罗夫,而且也不清楚他是来自乌拉尔还是车里雅宾斯克。有三四个叫伊万诺夫或叶戈罗夫的人,而且这些人都配不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一崇高的称号。因此,最终也没弄明白,这个肥缺应当归谁。

莫洛托夫:是件糊涂事。

波泽恩:对,是件糊涂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推荐非党人员方面,在对他们评价方面,还十分草率。

莫洛托夫:至少是这样的。

波泽恩:至少是这样的。

[莫洛托夫:甚至草率得不得了。]

波泽恩:更不用说其他所有事情了,光这事就足够了。我们至今还在看资历推荐人——这是事实,我们推荐人不是看工作如何,而是看是否资深望重。而且我要说,不仅在乌拉尔是这样,不仅在哈萨克斯坦是这样,而且在列宁格勒也是这样,——应当通过自我批评指出这一点。

莫洛托夫:对,对,自我批评开始了!

波泽恩:下面我谈谈对非党人员的普遍态度,我想说的是,我们地方上对此考虑得不够认真。我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对工人的舆论施加影响的机构。我只能谈谈工人,因为最近同农村断了联系。除了我们对工人的舆论施加影响的机构外,还有其他的制造这种舆论的机构,这就是每个工厂都有的工厂俱乐部和吸烟室。可是我们对那里,对在这些吸烟室里的事情是否很关心呢?革命前,这些吸烟室往往是我们进行鼓动和宣传的地方。

波德沃伊斯基:现在那里正在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

波泽恩:或许并不总是如此,我不能说是经常反对我们,可是我担心在许多

情况下这些吸烟室会起到反对我们的作用,也担心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党员在这些吸烟室里会感到窒息。在此我应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指出,这样的现象不仅在列宁格勒有,也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有。瞧,科洛季洛夫同志点头表示同意。他们对于把非党工人武装起来同这些吸烟室里的敌视我们的舆论作斗争关心得够不够呢?远远不够。我明确地讲,我们尚未控制这些吸烟室,我们还不能支配非党人员的舆论。

有人喊:那午餐时间呢?

波泽恩:两个都需要。不过在吸烟室里非党人员能畅所欲言,而在午餐时间他们并非总能如此。遗憾的是,我只能十分简明扼要地说说这一切情况,可是我必须指出,我们对非党工人施加影响的方法还远远不够。什么可以抵制吸烟室里的敌视我们的言论呢?当然,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对熟知“吸烟室”里每天议论的所有问题的党员进行培训来抵制这些言论。可是我们是否为此把党员们充分武装起来了呢?当然没有。就拿我们的报纸来说吧。许多报纸的工人专栏办得相当好。可是这些报纸能不能充分武装工人、帮助工人搞清楚我们的困难呢?我们为非党人员办报纸了吗?如果我说,我们的报纸不适合非党人员看,我们的报纸现在不能使我们的非党工人满意,而且往往也不能使普通党员满意,普通党员会被我们日常报纸上的文章——晦涩的、冗长的、内容含糊不清的文章搞糊涂,这些文章不符合普通党员的切身利益,那么,我的话并没有说错。工人报纸问题是我们尚未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我还要谈谈全体大会问题,这些大会往往不能让工人们满意,党员工人把全体大会当作负担和尽义务,常常溜走。从所有这些原因可以明白,吸烟室里形成的工人舆论往往是反对我们的,它左右和影响着一部分党员和共青团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高度赞扬了共青团员。我也是共青团最好的朋友,我喜欢和共青团员们聊天,我尊重共青团。但我认为表扬共青团要看他们的具体成绩。

莫洛托夫:说得对。

波泽恩:需要指出的是,共青团在抵制“吸烟室”的斗争中有时表现得极其软弱。我应当说,共青团在许多具体情况下,甚至在列宁格勒的具体情况下,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我再说一遍,我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有一个工厂执行了一项关于反对欺骗行为、反对劳动手册中的虚报做法的强硬决定:在劳动手册中虚报者要被开除。结果,在最先被揭发出来的在劳动手册中虚报的人里,有1名党员和7名共青团员。这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不能隐瞒这个事实。共青团并非总是很稳定——这可以理解,年轻人一般都不大稳定,可是,我们让

共青团参加我们的建设进而巩固共青团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越来越重要,这样做就不够了。

最后,尽管时间已经用完了,我还是要照例在发言结束时谈谈倾向问题。我要谈的不是右的倾向,而是刚刚出现的书呆子倾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倾向呢?为什么菲利普·戈洛谢金和其他一些同志自己都没想到会突然成了书呆子呢?我认为这并非偶然。

有人喊:远离中央。

波泽恩:可能也有这个原因。我认为这是因为地方上强烈要求我们党的方针要绝对准确、绝对明确。

喊声:说得对!

波泽恩:我们到这里来一定要看看这两点做得怎样,绝不能偏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喊声:说得对!

波泽恩:莫洛托夫同志在提纲中详细阐述了我们整个建设工作中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在地方上显然表现为党的领导困难、我们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种确实确实的团结一致,我们就完成不了我们面临的那些艰巨的建设任务。有些同志认为,上面的人别出心裁,提出同右倾斗争的口号,而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把这股劲往哪里使,我觉得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的。

主席:时间到。

波泽恩:再给我一分钟时间,我马上结束。我们地方上的组织已经相当成熟,我觉得某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注意到,上面的人不能通过提出某个口号就使所有的组织、使全党发生转变。同右倾斗争的口号在地方上之所以得到十分积极的响应,是因为它完全符合地方当前工作和地方建设的需要,这个口号提得十分合适,它切中地方工作的要害,它深入我们所有的积极分子的内心,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想法。我再说一遍,这个口号完全符合地方上的需要,完全符合我们工作的整个方针的需要。地方上十分敏感,他们非常殷切地企盼着本次全会的结果,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那里受到极大关注,全会决议决定着全党近期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应该力求十分和绝对明确地确定我们的方针,因为整个工作、我们的整个建设都需要这种准确性和明确性。否则我们就不能回到地方去了。

主席:下面请约瑟夫·柯秀尔同志发言。

И. 柯秀尔:我同意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阐述的观点。但我认为他的内容详尽的长篇报告有一个缺漏:他很少突出强调党在我们经济工作方面的任务。

从前面几个报告中大家了解到,我国经济今年在数量增长方面、在我们工作质量改善方面,特别是在降低成本方面,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们在经济领域仍像现在这样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个我们煤炭经济战线的例子。确定的煤炭计划现在已经完不成了,这有可能阻碍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作,因为消费者的燃料储备越来越少。尽管我们作了一切努力,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着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原因是:由于改为按新历法过法定节日,采煤工人实际上既按旧历法,又按新历法过节。如果今年也是这样的话,那这无疑会……

莫洛托夫:会是这样。

И. 柯秀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像我们前不久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估算的那样,我们不多不少将要丢掉2000万普特煤,而这不仅会使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的工作难以进行,也会使我们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作难以进行。

尽管顿巴斯平均每10名工人中就有1名或1.5名共产党员,我记不清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发生了由于重复过节而丢掉2000万普特煤的事情。同志们,这岂不是说明我们党在经济方面、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的工作太软弱无力了吗?对这种两难窘境——要么赞成按旧历法过节,要么丢掉2000万普特煤,只能如此解释。

莫洛托夫:应该有办法避免这种两难窘境。

柯秀尔:如果我们更好地工作的话,就会成功地摆脱这种两难窘境。

莫洛托夫:这话说得对。

И. 柯秀尔:下面看看第二个例子。我们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选用现有的一些平炉,动员全部党的力量、社会力量和管理力量,让所有这些人只是监督工人好好地用这些炉子炼钢。结果表明,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干下去,全力以赴,不更新任何设备,那么不仅是一座平炉,而且整个工厂的成本都会降低2%—3%。如果我们很好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话,我们又怎么不能动员工人的舆论,给他们讲明认真工作、好好工作对他们本身的意义,从而经常获得我们通过动员一次获得的那些成果呢?要知道,有了节约,就可以通过奖励等方式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

同志们,上述例子极为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经济领域的群众工作的弱点。

许多经济管理者、许多党员反映,我们工人的纪律大大松懈。例如,尽管在沙赫特事件³⁶¹之后用于改善顿巴斯工人日常生活的钱给得多了,破坏分子也除掉了,可是由于纪律松懈,顿巴斯的情况出现恶化。茹柯夫同志前不久讲了这样一件事:列宁格勒曾经断电,当时需要尽快把蒸馏器里的产品卸下来,否则产品就毁了。工程师向工人请求说:“同志们,停电了,我们用手来卸蒸馏器里的产品吧!”工人们不干。工程师去找工会代表,可工会代表却解释道,这种活不是工人干的。由于工人们坚决不干,工程师和工长便一起合力打开了蒸馏器,把它卸空,这才挽救了里面的产品。

因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其他许多关于劳动纪律松懈的情况,然而,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除了我们党在工人中工作不力还能是什么呢?工厂里接连出现经常不听从指挥这样的事情。有时甚至发生工人打管理者耳光的事,可是当要把打人者开除时,也不总是开除,法庭则以“注意到无产阶级出身等”为由,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正确地开展经济工作,而且是按照党对我们的要求努力开展经济工作呢?无疑不能。

当然,我们应当十分关注工人的日常生活、工人的需求、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的正常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并非一切都做得很好,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部门和工会部门必须对此加以重视,另外还要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我们今后仍像目前这样对待纪律问题和秩序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取得进展。

同志们,现在来看看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状况。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状况在四月全会之后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呢?同志们,是恶化了。在自我批评方面,在其他方面,四月全会的决定正在得到执行——无论执行得好坏,可能还有点歪曲,但毕竟正在执行。可是在要培养优秀的经济管理者,而不是糟糕的委员方面,在要为此创造相应的条件方面,四月全会的决定没有得到执行。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负担过重、身心疲惫的状况比四月全会之前还严重,所以他们也就更少关注经济工作——这一点谁都可以向你们证实。

至于我们的专家,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的信心没有以前足了。同志们,这方面的过错完完全全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直到现在我们都不能让技术人员参加我们的社团组织、参与生产会议的工作,都不能为他们建立与工人阶级、我们所有的组织之间的联系,即不能使他们感觉到:没有我们他们就无法工作,我们支持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让他们受气,他们可以施展自己的全部创造力,什么都不用担心。同志们,这种氛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能营造出来,因为我们忽略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把这当成我们日常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可

能某个专区党委书记、区党委书记或者是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在四月全会之后也考虑过这方面的事,下达过一些指示,但后来就去做粮食收购工作了,跑来跑去,然后又热衷搞自我批评,等等,却把下达的指示忘了,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会想起来。(主席示意时间已到)

请给我延长一点时间。

莫洛托夫:那就延长吧。

И.柯秀尔:我还想谈谈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倾向和有这些倾向的人。

[莫洛托夫:这个很重要。]

И.柯秀尔:已经谈到的关于反对右倾的斗争的观点当然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我们在进行这一斗争的同时也应当组织反对拒不完成我们计划的倾向的斗争,而且不仅要同这些倾向斗争,还要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是我们的可怕的敌人。地方组织通常对此采取这样的态度:咳!没有完成交给的计划,我们找找其中的原因,顶多数落上几句就行了。

斯克雷普尼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什么态度?

И.柯秀尔:斯克雷普尼克同志,等您成了经济管理人员再来听我的报告吧,到那时您再看看我们对此是什么态度,是怎么进行指责的。

在组织同拒不完成计划的倾向的斗争时,还要组织对这些倾向的研究。如果计划,通常就是党和国家的任务,未被完成的话,那就应当在各级相关组织中,包括在基层组织中,研究这一问题。要研究为什么计划没有完成,谁该为完成计划做些什么。如果对既按新历法又按旧历法过圣诞节这样的事情进行认真研究的话,就会采取措施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后在其他许多系统中也要为完成计划而斗争,但这一斗争是否有效,完全要看所要解决的问题能否真正成为全党关注的焦点,能否真正得到很好的研究,就像我们研究左倾和右倾那样。(主席铃响)我马上结束。

我认为我们在粮食收购战线上所做的工作清楚地表明,在党竭尽全力去做某一方面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取得很大成果。既然斯坦尼斯拉夫不让我说了,那就让我在结束发言时表示一个愿望,愿我们以粮食收购战线为榜样,齐心协力去做我们党在工业领域的工作。

主席:下面请米尔佐扬同志发言。

米尔佐扬:首先,我应当作两点说明。第一点说明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所谓的阿塞拜疆财政人民委员部事件的发言有关。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的这些事简直骇人听闻。

有人喊：你们不知道这事吗？

米尔佐扬：同志们，我们知道。这一事件曾在巴库的报刊上大量报道过。这一事件在巴库受到的重视远远超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想象。有两个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它们仔细研究了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提出的所有指控。对这一事件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要说的只有一点，报刊上说的许多事情通过调查都是无稽之谈，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所讲的恰恰也是这些无稽之谈。他讲了强奸女共青团员、信件检查处等事情。经过两次调查，这一切都成了无稽之谈。调查表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了解调查的结果，他的话使全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好像那里真的发生过十分恶劣的行为，好像巴库的组织纵容这种恶劣行为。

有人喊：那结果是怎么回事？

米尔佐扬：结果是，那里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因民族问题出现纠纷，还有一些欠税现象，等等。因此处治了许多工作人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指责我们，说我们隐瞒了这一事件，说我们没有处治财政人民委员泰穆尔·阿利耶夫。不该为此指责我们。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非常清楚，这事不能怨我们。我们曾把一批有种种恶劣行为的工作人员开除出党，可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是您恢复了他们的党籍，而且您还因此把我们大骂一顿。现在却变成我们有错了。

雅罗斯拉夫斯基：你们开除他们是因为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不正确，而我和列宁的观点一样，不该这么做，但你们现在也没有把他们教好。

米尔佐扬：我们开除他们不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不正确，也因为许多日常生活问题。

有人喊：是让你们帮他们改正错误。

米尔佐扬：我们已经使他们改正了一部分错误，而这并不是一项很轻松的任务。调查表明，财政人民委员本人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过错，所以没有把他开除出党。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如果我们同这些恶劣行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的话，我们就会使更多的工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但是，谁说我们没有同恶劣行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呢？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既没有看到这一事件的材料，也不了解我们消除种种缺点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说明。第二点说明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发言有关。莫洛托夫同志在报告中说，全巴库大约有1/3的党员脱离组织，而且莫洛托夫同志这么说依据的是巴库党委五月全会的材料。同志们，巴库组织的流动性很大，这没错。但莫洛托夫同志的这番话听起来可能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

1/3的党员退出了组织,因为组织对这些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好,培养党员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好。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请看巴库党委五月全会的决议对此是怎么说的: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

(a)由于党员登记,发生了相应的变动,加上当时又注销了实际上早已退党的人的党籍,使得变动加大;

(b)在确定社会成分的工作中发生了变动,由于这项工作一部分党员从工人和农民成分变为职员成分;

(c)组织内流动性很大,退党者的数量大大超过入党者(超出500人);

(d)组织的内部调动、‘提拔、派出学习,等等’。”

可见,脱离组织的现象是由上述一系列情况造成的。这绝不能用退党来解释。这样的事情,也就是退党,在我们的组织里恰恰发生得最少;在我们这里,退党的只是极个别人,半年内至多有几十人。我们正在收集这些事实,研究这些事实。在我们的决议中关于退党问题甚至只字未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就是退党,很少发生。我们的主要麻烦是组织的流动性很大,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并不取决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巴库党委五月全会上作报告时详细说过。

还有一点说明,关于组织的社会成分的说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在讲述组织的重大工作时没有说这一点。在巴库的组织中,加上周围的农村地区(不仅是城市),工人成分占80.5%,一线工人占66%以上。

奥尔忠尼启则:那巴库组织本身呢?

米尔佐扬:这也包括巴库组织,再加上周围三个农村地区。

奥尔忠尼启则:那不算这些地区呢?

米尔佐扬:我们没有作不算这些地区的统计。要是不算这些地区的话,工人成分将占到90%—95%。我认为莫洛托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由于必须加强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由于必须在1930年年底使组织内的一线工人占到50%左右,所以主要问题就是部署安排工作,包括安排工会、共青团和社会志愿组织这类大规模工人组织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在企业、车间、矿场的这些组织中广泛开展日常群众工作的话,那么依我看,我们甚至连吸收几十名、几百名工人入党的任务也完成不了。工会和社会组织的工作有非常多的不足。抓这件事的应当不光是地方组织。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完全必要的。应当力争使工会系统、各行业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发生巨大转变,力争使领导我们地方组织工作的那些组织的群众工作发生巨大转变。

在连轴转的生产部门内开展群众工作特别困难。这里有许多特殊的情况,使得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有些困难。但在这方面要克服一切困难,要做到把每一组工人都照顾到,要让每个班次、每个岗位的工人都参加我们的日常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交流经验对群众工作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想,没有一个组织可以说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最好,不需要其他组织的经验,等等。所以,我们必须组织经验交流,应当使某个组织中出现的工会、党和其他方面的群众工作的最佳形式或新形式能够推广到其他组织中。这种经验交流应当由我们党的报刊来组织,我觉得也包括《真理报》在内。请允许我在这里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指出,这项工作恰恰是《真理报》做得最差。

有人喊[莫洛托夫]:这是《真理报》的自我批评吗?

米尔佐扬:是的,是《真理报》工作的自我批评。(笑声)这项工作《真理报》做得不是很好。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经验没有在《真理报》上如实反映出来。一些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的工人组织在安排党、工会和其他系统的群众工作方面常常取得一些成绩,但我们在《真理报》上看不到这种经验。仅凭我们组织的经验我就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此真要生气了,因为《真理报》上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写,而且也因为,正如萨韦利耶夫同志所说,没有地方登。

有人喊:说得对。

齐夫里诺维奇:没有人写。

米尔佐扬:有些人说,这是因为我们不写。这只能说对了一部分。可是,比如说,反右倾运动也没有好好报道。对像巴库组织这样一些组织的工作的报道也很差,比如说,比对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组织的报道还差。

瓦雷基斯:现在没有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现在叫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

米尔佐扬:或许是克拉斯诺-科克沙伊斯克组织。应当使《真理报》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即在组织经验交流、报道地方大型组织的群众工作经验方面有所进步。

最后,我想谈谈我们的组织的思想工作。我认为,必须要让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入了党的新干部知道,我们党是在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和改头换面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就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左的词句等等的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强大起来的。因此,十分有必要出版一些供年轻党员阅读的通俗小册子和通俗读物。其次,必须给地方党组织输送合适的干部、人力、工作人员,等等。

我想谈的最后一点是对清党的看法,谈完这一点我就结束发言。我认为,对我们党的农民成分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清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于全面清理工人组织的必要性,我表示怀疑。我觉得,对所有工厂中的所有基层组织进行全面清理是不合适的。最好只对农民和国家机关以及大专院校中的组织进行清理。我想,在工人基层组织里进行全面清理还为时尚早。在工人区只需加强日常工作,把侥幸钻进党内的人驱逐出党。

主席:下面请什维尔尼克同志发言。

什维尔尼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展开,调整党的发展问题现在变得特别重要。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党的这项工作——调整党的发展应当被提到应有的高度。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项工作,例如在乌拉尔,尽管近一段时间引起了应有的关注,但仍然未被提到必要的高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仍然有许多基层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未加以必要的重视。我们乌拉尔的情况怎么样呢?党组织在最近的四年半发展得怎么样呢?截至1924年1月,我们有29 500名党员,而截至1928年10月1日,我们已经有82 483名党员,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党组织中增加了52 983名党员,或者说增长了179%。这是个巨大的增长。但是这一巨大的增长远远没有耗尽我们现有的潜力。工人在我们的组织中占多大的比重呢?截至1927年1月1日,工人的比重为53.7%,而截至10月14日,工人在我们的党组织中占59%。我们看到,我们在增加工人在党内的比重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对于乌拉尔组织这样一个工人组织来说,这个比例显然远远不够。我们在乌拉尔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党内工人的比例达到足以弥补非工业地区党组织内较低的工人比例的程度。因此,在完成增加党内的工人比例的任务方面,我们乌拉尔组织这个工人组织的责任也大大加重了。

我们有哪些后备力量可用来补充党的队伍呢?我们有近70名^①工会积极分子,3.2万名苏维埃积极分子——乡村和城市苏维埃成员以及分部成员,3.3万名女代表,7 000名合作社积极分子,10.2万名共青团员。这说明,在乌拉尔有47万名工人,其中近30万人是工业工人,我们有取之不尽的源泉来补充我们党的队伍。因此,只要正确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们显然一定能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莫洛托夫同志昨天说,在乌拉尔的五金工人中,党员平均占到9.4%。但拿个别企业来说,例如雷西瓦的企业,党员则占20.4%,在丘索沃伊占16.3%,在

^① 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莫托维利哈占 13.5%。但这样的企业在我们这里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开展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想强调一下乌拉尔工人的特殊条件。许多工业地区——列宁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工作条件与乌拉尔的工作条件大为不同。我们的工人大多还有自己的田庄、房屋和土地。甚至我们有一些企业，这样的企业其实不多，那里的工人把他在企业中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农活的副业。总之，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企业，即工人有自己的田庄的企业，那里的党组织当然很难把这样的工人和我们党联系在一起。

下面我要谈谈我们的又一个特点——工人的流动性。就拿纳杰日金斯基厂这样的大工厂来说，那里算上矿场有大约 1.7 万名工人。那里一年内几乎更换近 75% 的工人。我们曾尝试搞清楚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居住条件极其糟糕。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指出过顿涅茨煤田的这一情况，³⁶² 而我认为我们乌拉尔的情况也不怎么好，甚至更糟。这对乌拉尔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只有我们真正改善了居住条件，才能有效地防止工人流动。

接下来，完全应该注意到时常困扰我们的下面这个不足。我指的是缺少公共和文化教育活动场所的问题。许多工厂里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把工人召集起来的场所。例如雷西瓦厂，在那里有约 1.5 万名工人，但那里的俱乐部即使塞得满满的，也很难容纳下 500 人。所以，我们没有场所来展开让工人参与完成党面临的的工作。这阻碍着我们的工作。我们采取了某些措施，并且现在在俱乐部建设方面已经投入一些资金。但这还不能在近期内解决极为突出的场所问题，而且，要是没有中央的物质帮助，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后一点，基层党组织对调整党的发展问题、对吸收工人入党问题重视不够。同志们，这一切当然绝对不能说明我们不能加强这项工作，我们应该而且一定会加强这项工作。

我再简短地谈谈退党和开除出党的情况。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所转变。拿 1927 年上半年的情况来说，自愿退党和自动退党的约有 1 761 人，而 1928 年上半年减少到 440 人。我们已看到同自动退党和自愿退党现象的斗争取得的显著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满足于这些成绩。如果我们看看被开除出党、自愿退党或自动退党的总人数就会发现，1927 年上半年有 2 355 人，而 1928 年上半年减至 1 288 人。在这方面大家已经看到有了很大的转变。

群众工作问题。我认为群众工作问题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近期对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志愿协会工作的检查表明，我们的群众工作并不总是与完成企

业面临的实际任务相结合,这项工作还没有使足够多的工人参与完成这些任务。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的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一同决定对一个矿场——巴卡尔斯克矿场进行合理化改革。那里有2 300名工人。应当指出,进行这项合理化工作的原因是,矿工只把25%的工作时间直接用于采矿面的工作,而其余工作时间都用于做技术要求不高的工作,这当然大大影响了矿场的生产效率。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什么情况呢?遇到了部分工人,尤其是拥有2—5匹马的矿工的强烈抵制。我们那里没有顿巴斯的许多矿场的那种机械化。我们的机械化不过是用马来运送矿石。有马的矿工反对实行合理化的劲头最大,因为合理化改变了让矿工用自己的马把矿石运出采矿面这种工作安排。于是我们对工人的社会成分进行了清理和重新审查,把真正的富农分子赶出了矿场,为进行合理化工作扫除了一切障碍。莫洛托夫同志说得对,我们很少重视对企业中工人的社会成分的研究。这个小小的例子说明,这个企业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尽如人意,因此,一小部分“工人中的富农”,也许可以这么说,有时可以带动其他工人。

谈谈同各种倾向的斗争。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分子将会想方设法对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党的某些成员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全力与背离我们党的总路线的种种倾向作斗争。提纲中说得对,要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既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也反对右倾危险。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反对右倾危险对我们尤为重要,我们应当更加有力地打击这一倾向,并设法阐明这一倾向的实质,因为工人还未充分意识到右倾的整个危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展开既反对这些右的倾向,也反对对右倾的调和态度的坚决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清党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同志提得很及时,之所以及时是因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许多基层党组织的一些歪曲做法。所以,我认为,应当关注的不仅是检查和清理我们农村组织的问题,还有检查党的工人组织的问题。

主席:我将提前两分钟提醒同志们时间快到了。下面请伊克拉莫夫同志发言。

伊克拉莫夫:莫洛托夫同志为我们整个党组织、为全联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在报告中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但我认为,对于我们联盟的某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多民族地区以及我们的农村组织来说,除了莫洛托夫同志提出的那些问题之

外,还要补充一个问题,这就是培训党员问题。不仅要让党员接受学校教育,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通过同各种倾向作斗争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在我们的农民组织中,特别是在各民族共和国的农民组织中,这些倾向非常多。其实,我们乌兹别克斯坦的组织恰恰属于工人成分特别少的那种组织。加入这个组织的都是十分年轻的工人,大部分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工人。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共和国里,老工人骨干,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的骨干,力量极其薄弱。我们现在才发展工业,工业部门现在才吸收工人入党。莫洛托夫同志昨天指出了我们联盟机关工作人员的肮脏行为和我们的社会团体中的官僚主义,应当说,我们这里的肮脏行为和官僚主义要比联盟中部地区多。

莫洛托夫:相当多!

伊克拉莫夫:在我们那里,有时简直就是在支持社会上的异己分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这些加盟共和国作了许多让步。我认为,该开始要求这些加盟共和国执行党的方针和开展党的工作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么做。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力量这么做,我们已经足够强大。就拿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在四五年前进行民族地区划分时,工人占总人数的35%—36%(指社会成分,而不是一线工人),现在占46.6%。就雇农来看,我们这里的情况甚至比全联盟的情况好得多。全联盟的雇农占1.8%,而我们乌兹别克斯坦的雇农占4.4%。所以,现在应当更加坚决地提出问题,因此现在就应当吸收工人入党,特别是吸收雇农入党,应当着重提出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工人很年轻,而我们的雇农年龄较大,较为老到。

有人喊[莫洛托夫]:说得对!

伊克拉莫夫:技术文化发达地区的雇农比其他地区的雇农开明一些。有3俄亩、2俄亩、甚至1.5俄亩棉田而没有雇农是不行的。我们的雇农工作开展得相当广泛。在外高加索地区和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大致也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应当把吸收雇农入党问题作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绝对不是贬低产业工人的作用,但我们的产业工人很年轻,不久前才进入产业部门。所以,除了吸收他们之外,应当着重提出吸收雇农入党问题。

同志们在这里说我们的社会团体是党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导体。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要指出,这些社会团体工作做得非常差,甚至工会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差,工会应当是培养工人的学校,我们应当从中吸收优秀人物,但这些组织中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亚于我们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这里的官僚态度就是冠冕堂皇地对待工人。在举行工会十周年庆典时我遇到过这种现象:一个工会三周

内共开了9次大会,另一个工会开了11次,所有这些会议都是为各个工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等十周年庆典召开的,在每次会上报告人都要作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工人当然对此很反感。会上提出的不是与工人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是工人的需求和日常生活问题,而是一些已经让人厌烦的问题,所以工人们不听,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漠不关心。工会应当抛弃自己的形式主义态度、十周年庆典和非作不可的一个半小时报告,要更加贴近工人自身的需求并真心对待非党人员。可是那种恶劣现象比比皆是。

关于提拔问题。提拔是我们应该用来组织工作、把非党积极分子组织在党的周围并从中吸收优秀人物的一种方法。但我们在这方面往往自己给提拔的主张泼污水。例如,来这里开会之前我去过一个专区,那里向我提出了必须逮捕一名乌兹别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问题。原来,在提拔他的时候,谁也没考察过他,后来才弄清楚,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前是个非常有名的库尔巴什,也就是土匪头子。所以,如果不提拔雇农和贫农,却提拔富农,而且提拔同苏维埃政权斗争了5年之久的猖狂的反苏维埃分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雇农和贫农当然会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这是对我们的路线的歪曲,应当坚决反对这种歪曲。

我想就清党问题说上几句。依我看,现在就要着手做这项清理工作,特别要在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和苏维埃基层组织里严肃进行这项工作。在我们的苏维埃基层组织中出现了一些溜须拍马分子,就交纳党费来看,就参加大会和选举来看,提不出对他们的任何指责,抓不住他们的任何把柄。如果我们只是从形式上进行清理,我们就很难清除掉这些分子。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清理苏维埃基层组织这样的以职员为主的组织时,应当提出以其他形式进行审查和清理。我觉得,这一点有必要加以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倾向的问题。我还记得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各民族共和国,包括在外高加索,已经战胜了右的倾向,所以右的倾向似乎不再会具有什么危险了。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在各民族共和国,产生各种倾向的土壤还十分广阔,右倾分子以及满口左的词句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和这里的倾向分子不一样。同志们在这里指出了弗鲁姆金。我们知道,弗鲁姆金是个右派分子,他大胆地拿出了反党文件。此外,李可夫同志还指出一个沙图诺夫斯基。我们这里的右派是不太一样的。在我们的各民族共和国,不管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还是在外高加索,右倾分子都是公开站出来,他们还没有被战胜。但是中央委员会没有同他们进行这种十分坚决的、经常性的、有组

织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提出一个坚定的、明确的方针。例如,我们这里的萨德沃卡索夫就发表了反党文章。那又怎么样,只有托博耶夫同志一人写文章反对他,仅此而已。这当然不够。要在全联盟范围内对各民族共和国的人进行教育。这是必须要做的。

还有,我们党内的民族主义是不是一种倾向呢?当然是。在我们各民族共和国的党组织里,民族主义者数不胜数。他们直接反对苏联的利益,使自己的共和国同整个苏联对立,公开反对向富农以及地主进攻,反对妇女解放,反对自己的妻子和姐妹抛头露面。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充分展开同这些分子的斗争。我认为现在应当开始同这些分子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民族主义是右的倾向渗透到各民族共和国党组织内的主要渠道。

下面说说右的倾向。我在这里只简短地说几句。莫洛托夫同志的提纲要比前几个提纲讲得更清楚、更正确,所以,我对在这里发过言的那些“书呆子”的观点表示赞同,我相信,他们绝对是正确的。

在我们同右倾的斗争中有一个被模糊了的问题——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右派是现阶段最大的危险的话,那么现在调和分子也不是小的危险。

喊声:说得对。

伊克拉莫夫:这些分子现在干什么呢?他们不提任何原则性问题,他们在所有政治问题上似乎都同党一致,可是他们却进行着某种有组织的、肆无忌惮的反党斗争。这一点谁都不能否认。波隆斯基同志引用了不久前的文件,难道这些文件不能说明什么是实际斗争中的调和态度吗?谁在进行这项工作?进行这项工作的是调和分子,不是右派。难道我们不知道德国可恶的埃韦特集团³⁶³事件吗?这也不是右派分子,这也是德国的调和分子,他们似乎也赞同德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但是当要为党的这条路线斗争时,他们却在破坏党的路线,尤其是台尔曼同志。德国的调和分子比右派分子活跃得多,在阐明党的方针方面,他们客观上起了极坏的作用,在我看来,我们的调和分子比德国的调和分子毫不逊色,他们在困难时刻也会起同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注意同这些调和分子进行斗争,否则,这些调和分子会坏我们的事。工人不会支持他们的,但是那些有所堕落、沾染了一些市侩习气、宁愿为了某种家庭利益而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分子将会一直反对同各种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调和分子可能会联合这些市侩分子给我们捣乱。为了不让他们捣乱,现在就要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打击。

我们所有的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地方的与会者,有很大的难处。同志们都会说出这种难处。我们如何去安排,怎么说?如何着手,如何通报?我同许多同志谈过话,既有各级组织的领导,也有生产一线的同志,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难处。党正在同右的倾向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但决议的第一条把这一斗争说得含糊不清,没有说应当向哪里开火。这一点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以免我们在党员群众那里挨揍。(鼓掌)

主席(C.柯秀尔):所有发言的同志都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莫洛托夫同志作总结发言大约需要40分钟。我想,只能再让一两个工会工作者发言了。我建议给每人整整10分钟,然后结束讨论。

喊声:应当让斯滕发言。

有人喊:应当让产业工人发言。

主席:谁赞成在结束讨论前由工会工作者发言?谁赞成结束讨论?谁反对?我们就要结束发言了。

现在让一个还是两个工会工作者发言?

有人喊:应当让产业工人发言。

喊声:让斯滕发言,让斯滕发言。

主席:现在应该决定由哪位工会工作者发言:是菲加特纳同志,还是魏恩贝尔格同志?谁同意由菲加特纳同志发言?

同志们,我同意。谁同意由菲加特纳同志发言?谁同意由魏恩贝尔格同志发言?谁都不举手。我提议给两人每人7分钟。

下面请魏恩贝尔格同志发言。

魏恩贝尔格: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无疑看到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在增加。我认为应当把这个问题同继续吸收工人加入我们党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信任是由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已经取得的巨大发展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确实相信,党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且也在领导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程,所以,党完全值得工人阶级信任。党值得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它的队伍。

但与此同时,我们无疑还看到另一方面的许多现象:工人中的某些人害怕我们面临的、给工人的头脑造成一定混乱的那些困难。这些困难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供应方面的困难,这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非常大;其次,加入我们工业部门的那些新工人也对工人阶级产生一定影响。如果我们看看工会成员的数量就会发现,近几年工会成员的数量从400万—500万人增加到1000万—1100万人。这表明有大量的新工人投入到我们的生产中来。这一构成同以往的构成有很大

的不同。所以,部分工人的情绪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大量的农村群众进入了生产领域。这必然给工人阶级的构成带来不良影响。

这些新成分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自然也在工会中显现出来。我们在这方面观察到这样一些现象:在对一部分工人产生影响的那种发展和提高过程的困难的影响下,在新工人的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工会里无疑出现了某种动摇和怀疑。某些同志指出,工会里怎么可能有右的倾向或右派情绪;我们工会工作者完全赞成工业化,因为我们是产业工会。但是同志们没有考虑到工会受到的新工人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在供应方面的困难、我们的工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面的困难影响下,在这些困难的影响下,某些工人当然会相应地对工会、对某些工会工作者产生影响。所以,工会对这个问题应当有特别明确的态度,特别认真的态度,并以特别的方式同这种情绪作斗争。

沙茨金:特别是《劳动报》。

魏恩贝尔格:在此应当指出,工会要比现在更为广泛地动员群众去同困难作斗争,去克服这些困难。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充分动员群众同现有的那些困难作斗争。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有困难,将来也会有困难。这方面有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某些地方惧怕困难。有这样的情绪。

我认为我们工会无论如何应当消除这些情绪,因为恰恰在这里隐藏着危险。在此应当提一下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必须同右倾危险和调和态度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只有在工会给群众讲清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困难和任务,从而使广大党员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这么做,因为,由于有大量的新工人存在,我们党在工厂很难开展工作。

说说工会积极分子的情况。我们有大量的工会积极分子,但是培养工会积极分子的工作做得还不好。工会积极分子应当是党吸收新党员的后备队,但是新工会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非常差。我们对这些工会积极分子进行工会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教育,但是他们对政治问题几乎没有接触过。对波泽恩同志在这里讲的那些笑话,不是笑话,而是事实,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挑选和提拔工会积极分子到领导岗位这一工作连一些上级组织也做得非常糟糕。我知道一件事,与波泽恩同志讲的那件事差不多,有两个同姓的人来参加工会中央委员会全会,是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去的,可他们却是非党工人。

莫洛托夫:哪个中央委员会?

魏恩贝尔格:矿工工会中央委员会。来了两个同姓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地

方上搞清楚哪一个当选者之前,还得给他们发言权,因为不知道他们谁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我知道,在中央委员会,我在那里工作过,也是这样挑选主席团成员的。非党人员被挑选出来后,一两年都不履行任何职权,也不发表意见。我们在工会选举时挑选工作人员的工作做得十分糟糕,结果是,工会积极分子没有任何素养。不是挑选可能养成良好素养的人,而是挑选不求进取的人。

有人喊: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进行得怎样?

魏恩贝尔格:要是有时间我就说。莫洛托夫同志说,要率领工人去进行改造。我应当说,遗憾的是,我们工会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如果拿生产会议的情况来说,事实上我们全苏联仅有近10%的人参加生产会议。这是非常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吸收大量的群众参加生产会议的话,我们能否真正谈得上改造我们的经济、让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同困难作斗争呢?难道我们在尚未吸收30%—40%的工人参加生产会议的情况下,就能谈得上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加强劳动纪律进行群众性的工作和斗争吗?况且,吸收工人参加生产会议的工作无疑做得十分糟糕。应当说,由于我国经济和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由于工人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人对工会工作的要求也大大提高。我们能否说工会工作的节奏、我们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项工作的节奏在我们的组织中也是如此加快了昵?我认为,很遗憾,我们暂时还不能这么说,而且工会在这方面还有工作死角。有一位同志说得对,在工会工作中,在加快工作节奏、改进生产会议的工作方面,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有人喊:说得对,应当积极一点。

魏恩贝尔格:只有认真对待工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再培养问题,才能使工会积极分子真正影响所有群众。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此外,工会还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这听起来很光荣。因此,应当使工会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学校,使它能够输送党所需要的后备力量,使它能够对工会积极分子和广大工会成员进行政治教育,从而壮大我们党的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战胜现有困难,顺利前进。

应当坦率地说,如果工会不积极地、很好地帮助党去同困难作斗争,去争取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党仅仅依靠党员群众将很难、而且也不能战胜我们面临的那些巨大困难。

主席:下面请菲加特纳同志发言。

菲加特纳:莫洛托夫同志昨天说,可惜没有关于工人阶级社会成分的数据。我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为何这么说。据我所知,许多工会,比如五金工会、纺织

工会以及其他许多工会,都有非常重要、非常详细的关于近几年来工人阶级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资料。昨天列普谢同志引用了一份内容非常重要而又详细的关于五金工人近几年的变化的资料。这样的资料纺织工会和其他许多工会都有。

莫洛托夫:没有这些资料。

菲加特纳:我不清楚为什么莫洛托夫同志没看到这份资料,我们知道有这份资料。

有人喊:没有这种资料。

菲加特纳:肯定有这份资料。这种内容翔实的资料是存在的,包括莫洛托夫同志让国家机关多多关注的那个大工会的资料。

我想谈谈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国家机关人员成分混杂的那部分。我认为,对莫洛托夫同志的发言可以补充成千上万个表明我们的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贸易机关人员成分非常混杂的新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历次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说的够多了。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做到对国家机关进行公开检查,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在秘密进行,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还是个秘密。我们作了一年的努力,仍没能使对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检查不再秘密进行,而是公开地、在广泛的无产阶级社会力量的参与下进行。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对国家机关的检查是怎么进行的呢?成立一个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政管理部和党组织的代表,有时是工农检查院的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他们看看名单——谁该解职,谁不该解职——然后宣布:“伊万诺夫,你被解职了”。国家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都想知道为什么把他解职、伊万诺夫做了什么使他无法在国家机关工作下去的事。但这一直是个秘密。我们还知道这样的事:大约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前,谢尔戈同志打电话给我讲了纺织品贸易公司的一件事,说有一个基层工会机关不允许清理纺织品贸易公司里的异己分子。我被牵扯进这件事情,决定要想方设法帮助纺织品贸易公司。结果,从那里清除的不是这些异己分子,而是三名共产党员。有人对我讲工会妨碍清理工作,我却决定应当给予帮助,结果被清除的是共产党员,而非党人员却留下来了。我们知道很多这样的事实。例如,我们前不久收到一份来自乌拉尔的申诉书。州财政部门原来的一名工作人员写道:我在高尔察克时期曾被强制拉去当兵,后来逃离了高尔察克军队,我当过伊尔库茨克共产主义团的团长,红军的旅长、师长和参谋长。我在红军一直工作到国内战争结束。我是按红军高级指挥员待遇复员

的,现在却把我当作“白卫军官”解除了工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社会组织没有参与对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的检查,而且这种清理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提出让社会组织参与的问题,就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西伯利亚、乌拉尔、远东、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等地区的国家机关人员成分非常混杂。

我再说一遍,只要我们还没有吸收工人组织参与这项检查工作,我们就仍然不会公开地说:伊万诺夫,我们解除了你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因为,你要么是反革命,要么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悔改、不遵守我们的原则和我们苏联的法律、为所欲为的官僚,——为了以此给国家机关其他工作人员一定的教训,我们在未获得清理工作的成果之前暂时还不能这么说。对我们国家机关进行检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无论如何要吸收广大群众参与这项检查工作。就拿伊帕季耶夫或格鲁姆-格尔日迈洛院士来说,人们不止一次怀疑他在自己的研究所里进行反革命活动、黑帮活动。我们一提到他,就有人对我们说,这是一位大学者,我们用任何人也取代不了他。如果我们非容忍他不可的话,那为什么就不能触及其他人,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其他人呢?我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尝试都没有取得一点成果。对我们的机关的检查还有另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把一些人清除出国家机关,他们明天又在另一个城市有了工作。这一大群人从西伯利亚、乌拉尔以及其他州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全都悄悄地有了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永远杜绝这种情况,要让被我们清除的那些不适合在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贸易机关工作的人,敌视我们的人,不能再钻入这个国家机关。否则,整个这项清理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它只会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领导感到厌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取得这项清理工作的成果。

另外,再谈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在检查时遇到的是某一级别不高的机关,那么要把这里的人清除出国家机关就很容易,但是,如果遇到的是中级或高级机关,那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取得成果,因为有人会说被清除者是不可取代的,因为有人会去找谢尔戈³⁶⁴、找中央,会东奔西跑。

[奥尔忠尼启则:这么说,我们在妨碍你。]

菲加特纳:我可以举一大堆例子。看看下面这个例子,这是工农检察院关于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份资料。情况是这样的,前不久工农检察院在对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检查时从一些资料中发现,过去的贵族、商人和官员占工作人员总数的28.5%,占领导人员的40%,在某些局里这一比例超过了领导人员的一半(国家税务局为61.4%,国家财政监督局为61.0%)。

从绝对数字来看,这28.5%就是301人,其中251人担任领导职务,只有50

人做技术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年龄在66—72岁之间。(笑声)这是你们的资料。大家想一想,如果财政人民委员部要执行我们的阶级路线的话,那么他们就得靠这些人来执行,而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十月革命时至少已经有56—57岁,而且在这个国家机关中担任高级职务。因此,我们看到的种种歪曲和偏差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谢尔戈尽了一切努力,但他至今未能使这种状况得到改变。

[奥尔忠尼启则:你无能为力,工会应当有办法。]

菲加特纳:但这不只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经济管理机构都有这个问题。

下面我谈谈莫洛托夫同志提到的一个问题——挑选人的问题。挑选人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应当同培训称职干部的问题一同来解决。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培训的内容都有用,就是对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没有用。我们的党组织、经济管理机构、工会组织对为国家机关培训人员的问题都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所以,既然提出挑选人的问题,就要同时提出培训他们的问题。我们从什么人中挑选保证能执行我们的阶级路线的人呢?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提拔。但你们是否知道被挑选出来的人并不想在国家机关工作呢?就拿伊万诺夫来说,他是个优秀的五金工人,或许还是个优秀的矿工,把他安排到了国家机关,却没有对他进行必要的培训,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机关里该干什么。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他得不到帮助,他当五金工人挣180—200卢布的工资,而现在国家机关只给他110—120卢布。昨天他的孩子作为工人子弟被一流的学校接收,而今天他是职员,学校就不接收他的孩子。提拔他的基层组织同他中断了联系,他脱离了工人,又未融入职员当中,于是他痛骂所有的人。要考虑创造一切条件使被提拔到国家机关的人受到相应的培训,让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给他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比他在工厂里的条件还要好。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沙茨金:有必要谈谈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菲加特纳:没让我谈这个。

主席:下面请莫洛托夫同志作总结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大家在讨论我的报告时提了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这里有一点说得完全正确:我的报告对党的成分分析得很不透彻。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说得对,我的报告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民族成分进行分析。我只对工人阶级的成分和党的成分作了总的分析。不过问题在于,报告中所谈的一切完全是针对那些非常大的民族地区和民族共和国的。

斯克雷普尼克：说得对！

莫洛托夫：很显然，报告中所谈的，比如说，完全是针对乌克兰的。

斯克雷普尼克：只不过那里的问题会更复杂一些。

莫洛托夫：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必要专门谈外高加索问题。

有人喊：说得对！

莫洛托夫：此外，我只对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的意见提出异议。他支持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最近两年只应提出使外高加索地区所有组织中的产业工人比例达到47%的任务。这是不对的，下面就说说原因。

目前全党的产业工人比例为42%，而在外高加索地区已接近45%。为什么给全党提出的任务是在两年内使产业工人的比例至少达到50%，而外高加索地区提出的任务却只是达到47%呢？单是这一对比就可表明，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应当修改自己的决定。据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说，在外高加索地区，除了巴库、梯弗利斯和其他一些工人区之外，还有近10万名雇工。可见，那里是靠产业工人发展党组织的储备库。我希望外高加索的同志们，包括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同意这一观点并修改他们作出的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再说两句。我已经说过，任务是50%，这完全不是最高要求。相反，应当认为这项任务是我们在最近两年起码要完成的。在某些组织中，我们工人的比例应当比现在高得多，组织中的产业工人应当大大超过50%。至于其他一些组织，例如北部和东部各民族地区和民族共和国的组织，情况就不同了。在此特别要指出加强从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中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工作的必要性。应当想方设法使提高主要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的工人比重的工作得到重视。同时应当承认，从根本上改善和清理党组织的指示也完全适用于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

有人喊：说得对！

莫洛托夫：现在谈下一个问题。

戈洛谢金：怎么看待清理工作——是一场运动，还是一项长期工作呢？

莫洛托夫：对这个问题还得再着重谈谈。我认为，在作出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的决定后，中央组织局要就执行全会决议下达一些切实可行的指示。³⁶⁵

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在这里作报告时指出了许多问题，他说得完全正确。还有一点他说得也完全正确：应当为同官僚主义等作风的斗争进行得不坚决、不充分这一点负责的不仅是监察委员会，中央和省委也都应当负责。不反对起码应

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此各承担一半责任的看法。如果我们以后在这方面能有很大的起色的话,那就宁可同意这个看法。

至于清党问题,从大多数发言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全面清党的主张已得到支持。不用说,这对党是个十分重大、十分困难的问题。有两位同志——瓦雷基斯和米尔佐扬主张有限度地进行清党,认为这项工作只对农村组织和职员有必要。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决定进行全面清党,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观点。应当更加理直气壮地提出清党问题。我希望党代表会议赞成全面清党³⁶⁶。

接下来我谈三个问题:同官僚主义斗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右倾问题。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同官僚主义斗争的问题。

当我着手就讨论的问题起草决议草案时,我才明白,吸收工人入党的决议也应当是同官僚主义斗争的决议。为了号召广大新骨干入党,有必要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入党。所以,必须把广泛吸收工人入党的任务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进而同吸引广大工人群众投身这一工作的任务结合在一起。加强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应当同吸引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而在现阶段,这必然意味着要加强国家机关系统、工会系统乃至党组织系统内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如果同官僚主义的斗争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的话,就不能使工人和工作人员以更大的干劲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改造时期,群众参与完成主要任务这条道路上的官僚主义障碍对工作的阻力特别大。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振兴和改造我们的工业,然后逐渐振兴和改造农业,就得想方设法加强同我们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实际斗争。否则,我们就丝毫也不能把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积极性用于社会主义建设。И.柯秀尔同志说得完全对,不设法整肃工厂的劳动纪律,不尽力降低工业品的成本,不增强我们所有产业工人的责任心,就不可能完成振兴工业的任务和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在我国的条件下,这需要群众非常积极地、自觉地投身建设。我们没有其他途径去完成改造的任务,因而也没有其他途径去完成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赶上、然后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与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工作密切相关。我们在这方面的步伐还非常缓慢。不能因此就不赞同共青团的组织所谓文教运动的创举³⁶⁷。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那种无产阶级社会活动的一个范例。少一点锣鼓声,多一点提高工人和工作人员、雇农和贫农的文化水平的实际工作——这就是现阶段文教运动的任务。党、工会和苏维埃应当全力支持共青团的这一创举。我们的这种无产阶级社会活动太少了,而这种活动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当广泛开展。其

实,无论从任务来看,还是从工作方法来看,这都是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一种有效方法,而我们已经具备了发展这种民主的重要前提条件。应当通过文教运动的成功取得同官僚主义的实际斗争的胜利。

我们的组织都渴望成为最先进的组织,成为先锋队中的先锋队。那些非常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列宁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顿巴斯、巴库、乌拉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组织无疑都有资格要求得到这一位置。不过,这种要求现在需要加以充实,也就是要用善于实际开展同官僚主义的斗争的例证来充实。要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先进组织取得了显著成绩的话,那就太好了。

奥尔忠尼启则:也就是还不够。

莫洛托夫:这里有人说“也就是还不够”,对此无可反驳。要是这些组织的代表自己能反驳这种说法并指出并非如此的话,那就太好了。

请大家注意下面这些数据。我选择了关于几个特大城市的居民中共党员所占比例的数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年龄在25—40岁之间的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现在已经占到10%。正如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在一些特大城市的最积极的那部分居民中,共产党员已经占相当大的比重。难道这些数据表明不了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对我们同官僚主义的斗争成果甚微负有重大责任吗?难道我们要等到大城市中的共产党员占到110%的时候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成果吗?(笑声)

我们党是个拥有近150万名党员的组织。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还不够。党必须吸收更多的工人群众以及农村劳动者参与苏维埃的全部工作和整个建设。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完成经济改造的根本任务。这就非常需要坚决加强反对我们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实际成果,不仅对苏联的无产阶级,而且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的关于同官僚主义斗争的决议和言论已经够多了。现在就看实际措施和实际成果了。最近几年,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大加强了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实际斗争。但是这方面的成果还根本不能使我们满意。应当进一步采取实际措施。

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两个实际问题。

既然同官僚主义的斗争要求大力加强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采取让党和工会机关的某些领导去工厂或企业基层组织工作半年或一年

的措施呢?如果我们的一两个组织在这方面做出好的榜样,又有什么不好呢?这项工作必须同加强提拔产业工人到各个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工作结合起来。

我对这个问题还有一点看法。

有些同志甚至对清理机关的基层组织抱有疑虑。也许可以不进行这种清理,至少可以不采取通常的清理办法。当然也可以尝试用其他方法来取代这种清理。例如,可以只对我们各级组织的领导进行检查,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半年或一年内提交几份产业工人的报告,上面要写明领导者是否密切联系工人群众。看来,对我们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来说,即使是要求提交产业工人的两三份报告这样的检查方法也是十分强硬的措施。

有人喊:两份太少了,要20份。

莫洛托夫:我只想用自己的例子强调一下,必须采取实际措施加强我们机关的领导同真正的工人群众的联系。

下面我谈谈第二个问题——当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讨论中这个问题很受关注。我也得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阶级斗争尖锐化指的是哪些阶级呢?显然指的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尖锐化。这场斗争的尖锐化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的中间阶层即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所以,现在谈国内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就要既关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的尖锐化,也要关注这场斗争在小资产阶级居民中的影响,因为那里的这种尖锐化在某些情况下会加剧政治上的动摇。

现在谈阶级斗争尖锐化对不对呢?不难证明,这取决于当前的形势。

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我国的资本主义成分一直不断增加。尽管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增长,但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条件下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增加。我们党常常强调这一点。现在只需引用党在近几年的一些最重要的决议就足够了。因此,我首先引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那里面讲道:“……农村阶级分化,在最近的将来就要表现为……新的农民资产阶级在一定时间内将进一步扩大与加强……”这句话引自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就李可夫同志关于合作社的报告作出的决议³⁶⁸。1925年底,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作出的决议指出,有这样一些现象:“农村富农的加强,城市新资产阶级的增长,我国各阶级和各集团的积极性的提高”³⁶⁹。再看看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就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作出的决议。那里面讲道:“……在富农分子增长和部分贫农无产阶级化的同时……”³⁷⁰等等。最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就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指示作出的决议指出：“……虽然城乡资产阶级(富农、耐普曼)有所增加,但工人阶级的比重增长了……”³⁷¹这就是从最近的全党决议中摘引的简短几句话,这些话都指出我国的资本主义成分在不断增长。无论如何不能怀疑党的这些话的正确性。此外,我们还有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富农的进攻的决议。同时,毫无疑问,我们对富农的进攻确实加强了。

下面请大家作个比较。近几年,我国的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长,而且现在仍在增长。与此同时,党不但没有放松,而且在不断加强对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党继续坚定地实行进一步限制剥削成分、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如果阶级斗争没有尖锐化,怎么会采取这一切做法呢?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否认目前的这种尖锐化是必然的呢?这种尖锐化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而且正如我所说,它不可能不加剧某些小资产阶级居民政治上的动摇。我们加强对富农和私商的进攻是以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大力推进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党应当继续实行这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方针(我们在具体实行这一方针时难免会犯许多错误,尤其是会触犯中农的利益)。

下面来看看实际状况。我国出现了阶级斗争的一定程度的尖锐化,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所举出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反苏维埃行动的种种例子就是这种尖锐化的一种表现。可以从各行各业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产生了白卫分子思想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试图从各个方面——苏维埃、合作社、文学、戏剧等方面进攻我们。一些教徒和教士近来的活动也反映了一种要加强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企图。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很多白卫分子猖狂活动的事实,这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

我再列举关于农村的一些事实。我的报告非常不客气地评价了我们农村组织的状况。我认为,必须着重注意农村组织工作的阴暗面。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不能使农村组织的状况得到根本好转。但也要理解农村共产党员十分困难的工作条件。我们对这些组织的帮助仍然不够,而且微乎其微。而农村党和苏维埃的忠实工作者常常处于极为困难的条件之中。中部黑土地区的同志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近三个月以来,仅在中央黑土地区,我们的农村工作者就有近30人被杀害。这个月又有大约10人牺牲。难道这不是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鲜明例子吗?难道其他地区没有这样的事情吗?难道在这种恐怖活动中看不出富农的嚣张气焰吗?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正向前发展,我们正逐渐接近资本主义的根子,我们正在开展集体化和国营农场建设的事业,我们正在排挤富农,这些当然会遭到富农的猛烈抵抗。要么就应当说,高举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旗帜向

农村进军还为时尚早,还需要等待;要么就应当在面临艰巨的、长期的改造农业的任务的情况下认真着手完成提出的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尤其是在初期,会遇到富农的猛烈抵抗。上述关于富农恐怖活动的事实表明,我们对富农的打击还不狠,我们必须在全面巩固同中农的联盟的同时,对攻击我们工作人员的富农及其代理人给予毫不留情的回击。我们应当以比现在猛烈十倍的火力回敬富农的恐怖活动。

有人喊:有人宽恕他们。

莫洛托夫:还应当谈谈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长期性问题。有人说,我们应当考虑到,阶级矛盾将会越来越多地产生出来;还有人说,阶级斗争尖锐化将会持续下去,直至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为止,——这些话当然都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依我看,这里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赞同这种蠢话。

但是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的反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持。困难就在于,在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日益激烈的同时,外部势力也在极力压制苏联。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强国接二连三地对我们的贸易和经济施加压力这一事实。尽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在增加,但是资本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正想尽一切办法巩固我国资产阶级(耐普曼、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阵地,而且是我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盟友。外国资产阶级和境外的白卫分子现在想方设法加强对我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很多事实证明,白卫分子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有人对我讲,最近在乌克兰的一些小河上,在大第聂伯河上……

柯秀尔:在德涅斯特河上。

莫洛托夫:在德涅斯特河上,漂浮着大量塞进了白卫分子传单的瓶子。白卫分子所干的这样的事以及类似的事现在越来越多。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柯秀尔:实际上多得多。

莫洛托夫:这只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斗争的诸多表现之一。

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化过程的长短不仅取决于客观原因,而且也取决于我们的斗争能力,取决于工人阶级能否顽强地、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回击资本主义成分。我们越是迅速地、坚决地消除我们自己人中因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困难时期而产生的动摇情绪,我们就会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过程变得越短。例如,齐心协力地、坚定不移地回击党内右的倾向是保证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继续沿着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最后谈谈右倾问题。首先要谈谈同右倾的斗争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最近我们对同右倾的斗争谈论得很多。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都提得很正确,但是也有错误。例如,有人说,既要消除党内的右倾危险,也要消除国内的右倾危险。同志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斯滕:怎么不对呢?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在助长党内右的倾向。

莫洛托夫:不难看出这种不正确的说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读一下《消息报》的一篇社论中的一段话。社论的题目为《党的总路线与苏维埃选举》(10月23日)。其中写道:“党在目前消除右倾危险的斗争中所捍卫的路线也是苏维埃国家的路线。即将开始的苏维埃选举也必须在消除右倾危险的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着重标记是社论中用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弗鲁姆金同志是党内右倾的一名突出代表。难道我们在苏维埃选举中要同弗鲁姆金这样的同志斗争吗?当然不应当这样提问题。

斯滕:战胜弗鲁姆金很容易,但战胜国内的右倾危险就比较困难了。

莫洛托夫:我当天就和《消息报》编辑部的同志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也承认自己错了。这个错误他们自己很快也纠正过来了。

实际上,右的倾向是党内问题。右的倾向是党员队伍中的一种思想上的动摇。可见,这不可能成为苏维埃选举中的斗争对象。全党在选举中将同以往一样保持一致。我们在选举中将进行消除国内存在的反革命危险的斗争。在苏维埃选举中将以反对富农、耐普曼和破坏分子之流的斗争为主。当然也要反对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

斯滕:党内和党外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有时是分辨不出来的。

莫洛托夫:请不要乱说,斯滕同志,您得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乱说是十分有害的。我们不当把作为先锋队的党和整个工人阶级、乃至和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混为一谈。国内确实存在反革命危险,我国有阶级敌人——耐普曼、富农、教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破坏分子,等等。我们在苏维埃选举时也应当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同时要消除农村劳动群众中的、有时工人中也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情绪。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种动摇情绪不仅会在农村的中农和贫农中表现出来,而且有时甚至会在工人中表现出来。右的倾向是党内问题,尽管它同国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消除党内右倾危险的斗争问题是一方面,消除国内反革命危险和国内小资产阶级动摇情绪的斗争问题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认清二者之间的差别。

反右倾斗争中的另一个偏差是,有些地方甚至把某个工人对个别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表示某种不满说成是“倾向”和“胡闹”。也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难怪中央关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六月呼吁书³⁷²都指出了这一事实。指出反右倾斗争中的种种偏差是必要的,这样就能使现在被摆在首位的消除党内右倾危险的斗争不再遭遇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反对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的斗争尤为困难,因为这个斗争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

托洛茨基派的骨干已经被我们开除出党。但党内还留有某些托洛茨基分子,对于这些人(特别是出自无产阶级的人),党还有说服他们、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因为还有希望做到这一点。今年,托洛茨基分子已转向建立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非法团体,让它们去瓦解工人。同托洛茨基的非法组织——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组织进行斗争的方法很明确。但是,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渗入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思想斗争,因此必须同对党内托洛茨基主义情绪的复活采取的任何调和态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前不久,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加强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的指示。³⁷³这些指示,特别是本次全会的指示,应当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主要任务还是反对右的倾向、反对对右倾的庸俗的、无原则的宽容态度(调和态度)。我们大家都记得党内托洛茨基主义是如何滋长的,它最终是如何走上孟什维克轨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以起初批评党的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为起点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问题为起点的,因此也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为起点的。这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制度,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情况只能如此,因为我们党同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密切相连。托洛茨基主义只是逐渐成为一种派别的,而成为派别后,它又变成了一种党内不容存在的倾向。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不让右的倾向得到加强并从而形成派别。我们应当更加彻底地揭露右倾的政治危害和反列宁主义的实质,不容许对右倾危险采取任何调和态度。

同志们在讨论中已经说了莫斯科组织的情况。我就没有必要再详细说这个问题了。在莫斯科组织中,如果说的是它的领导核心,那就没有右倾分子。中央指出的只是莫斯科委员会和各区中出现的对右倾的某些调和态度。留京同志在莫斯科委员会十月全会上也指出,在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人中间也已经开始出现有某种与中央离心离德倾向的分子。³⁷⁴这些倾向的蔓延对党是十分危险的。党不能不把努力消除莫斯科组织中的这些调和态度和离心离德倾向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可以这么认为,中央全会和党员群众对右倾和调和主义的一致

态度将大大有助于克服现有的动摇情绪。

揭露党内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右倾的实质现在是我们的一项十分重大的责任。右倾思想变得越清晰,我们消除右倾危险和对它的调和态度就越快。当广大党员明白右倾的基本思想就是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思想时,右倾的拥护者就会所剩无几。总之,在弗鲁姆金同志看来,只有当我们得到富农即农村上层资产者的帮助时,我们才能走出困境。弗鲁姆金同志口头上承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对富农的进攻的决定是正确的,实际上却在向农村富农阶层寻求对我们建设的支持。

再说说对弗鲁姆金同志的第二封信的一点看法。弗鲁姆金同志在这封信中想把中央的政策同中央正在进行的实际工作分割开来。弗鲁姆金同志说:“实践家弗鲁姆金不会放弃中央政治局的实际路线。”这是弗鲁姆金同志的信中最虚伪的一处。弗鲁姆金同志指责中央的路线具有两面性。按弗鲁姆金的话说,中央的一条路线是为了走过场,为了装门面;另一条路线是为了实际工作,为了做事。大家看到没有,他弗鲁姆金同中央的实际路线没有分歧,他好像也不主张注重装门面。弗鲁姆金同志现在根本不能证实自己所说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央的这种指责是虚伪的。弗鲁姆金同志虽然声称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保持一致,但同时却又一次次地发出呼吁,说什么“我们也不应当阻碍富农农户的生产”,这的确反映出典型的机会主义两面性,言行不一,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有很大差别。

我们在整个目前时期都应更多地考虑使实践与提出的任务、与党的指示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常常出现重大缺点。我们有足够多的正确指示,我们有列宁的英明政策。但是我们应当在完成提出的任务方面进一步加强连续性,我们应当学会像列宁那样切合实际地实行我们的方针。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实际工作并没有体现出党的方针。我们的实际工作往往歪曲党的列宁政策。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要为糟糕的实际工作确定政治方针(这是机会主义的想法),而是要在更加正确地实行党的政策的基础上改进实际工作。在我们党的工作、工会工作、苏维埃工作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排除种种机会主义动摇情绪的影响,力争使我们机关的实际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党的列宁路线。(鼓掌)

主席(李可夫):同志们,为了起草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的决定案,建议成立由下列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И. 柯秀尔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梅德韦杰夫同志、鲍曼同志、斯捷茨基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科洛季洛夫

同志、奥拉赫拉什维利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米尔佐扬同志、科马罗夫同志、哈塔耶维奇同志、波隆斯基同志、利西岑同志、斯米尔诺夫(托马斯)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莫斯科委员会)、瓦雷基斯同志、舍博尔达耶夫同志、伊克拉莫夫同志、阿尔秋希娜同志、伊万诺夫同志、美尔尼昌斯基同志、埃赫同志、布勃诺夫同志。

喊声：再加上多加多夫、波斯特舍夫。

主席：多加多夫、波斯特舍夫。

有人喊：日丹诺夫。

主席：多加多夫、波斯特舍夫、列普谢和日丹诺夫。

喊声：我们的委员会总是很庞大，太庞大了！

主席：29个人。

喊声：够了。

主席：够了吗？也就是说你们同意这份名单。

喊声：以这个决议为基础进行表决吧！

主席：谁赞成把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作为全会决定的基础？谁弃权？谁反对？一致通过。

有人建议让克里尼茨基和莫斯克温两位同志参加关于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的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已经有29个人入选该委员会，这样一来就是31个人。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

委员会在1点钟即休息后马上开始工作。

有人喊：对不起，现在是1点20分。

主席：散会后，负责起草第一项决议案的委员会马上开始工作。其他两个委员会——关于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报告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的决议案起草委员会5点开始工作。没有反对意见吧？

有人喊：那全会会议呢？

主席：全会会议7点开始，以便通过所有决议，听取所有说明，然后结束全会的工作。

柯秀尔：还要确定代表会议的时间。

主席：对，还要讨论代表会议问题。我觉得，想在10—11点之前回去的那些同志估计错了，因为我们未必能在10点之前结束全会的工作。总之，应当尽量在今天结束全会的工作。

柯秀尔：今天必须结束。

扎东斯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同志们,请留下讨论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议程。这是谢尔戈同志委托我通知的。

主席:全会会议结束,下午7点再开会。

第十六次会议

11月24日晚间

主席(李可夫):请施米特同志宣读委员会通过的修改意见。

施米特:委员会通过了4处修改意见。第一处是在开头写有“全会认为必须”的地方,在第一段末尾加上:“同时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使之适应企业新的工作条件。”这在第4页上。

此后是在第5—6页的第5条后面加上:“责令劳动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贯彻立法机关关于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在已改行和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中不上夜班的决定。同时责成地方党委会为贯彻本决定在女工中开展广泛的解释活动。”

在有关培养劳动力的一节末尾加上新的一段:“中央认为工厂艺徒学校在培养劳动力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责令职业教育总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工作更符合工业对掌握更完善的工作方式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最后一条应改为(第6页):“中央全会认为,除经济意义以外,七小时工作制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党组织、工会组织、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首要和基本任务是安排好工作,把工人因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多出来的业余时间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文化经济成果和加强工人对国家管理的参与,而这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全面解放的事业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上是委员会通过的修改意见。

主席:有没有人想就委员会通过的修改意见发言?没有。对委员会的修改意见进行表决。谁赞成?谁反对?通过。对整个决议进行表决。谁赞成整个决议?谁反对?通过。

请安德烈耶夫同志发言。

安德烈耶夫:我只读委员会通过的比较重要的修改意见。在第2页上说明

农业严重状况的原因中又补充了一条原因：“……农业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其次删去了决议第4页第5条有关培养农业干部的各项措施,关于大学生和补足定额等,委员会删去了这些内容。

再次,在集体农庄一条中作为集体农庄建设的不足又加上了富农分子成立假集体农庄一项。

最后,委员会把有关统一农业税的第13条整个删去,原因是该条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关于控制数字的第一项决议中。以上就是全部修改意见。

主席:有没有人想发言?没有。对委员会的修改意见进行表决。谁赞成?谁反对?没有。对整个决议进行表决。谁赞成?谁反对?没有。决议通过。

关于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请先听取修改意见。

李可夫:在第4页上“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是我国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一句中的“我国”后面插入“包括农业”一语。

在第4页上“上述任务的完成由于国际局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技术成就、军事威胁等变得刻不容缓”一句后面插入“鉴于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中央全会指出只有在加快工业和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速度并最大限度地动员党和工农群众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删去下一段开头的“在继续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句。下一处是修辞改动:删去“在此基础上”一语。

第4条。把“农民经济问题”改成“农业问题”。

在第5页上有一些不大的数字改动,一些数字更精确了。

在畜牧业问题上有一处重要改动。在关于畜牧业的一段末尾写道:“尤其必须指出由于牛奶业的严重分散而引起的奶制品业商品率的急剧下降”。此处加上句号,下面另起一句:“所有这些都提出加强农民经济的生产合作化以及利用国营农场发展大型畜牧业的任务。”

在下一段(关于经济作物)末尾插入一句:“由此提出进一步加强经济作物发展的任务”。

第5页末尾“对于整个农业来说”一句后改成:“而农业发展的极度落后,尤其是谷物业的落后,会威胁到……”以下保留决议草案中的原话。

在第6页上有几处数字改动。此外,在第一段末尾插入:“因此中央全会认为有关农业、尤其是其谷物部分在我国正处于衰退过程的论断(弗鲁姆金同志)没有任何根据。”

在下一段“播种面积的增长”一语前插入“谷物作物”一词。

删去第5条最后一句：“但粮食供应状况仍十分紧张”，换上：“中央责成各地方组织不但不应放松，反而要加强对粮食收购的注意力，以改善国内的粮食供应状况并尽量保障春季帮助贫农和困弱中农所必需的种子储备的积累。”

第6页最后一句改为：“中央全会指出，七月全会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提高粮食价格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为目前粮食收购运动的顺利展开，也为加快振兴农村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处插入：“全会告诫各级党组织，只有全党，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粮食收购工作格外关心，只有围绕粮食收购在广大农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只有组织贫农、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积极协助粮食收购并以此打击富农上层鼓动延期交粮的企图，粮食收购才能继续得到顺利发展。”

在第5段末尾插入：“中央全会特别强调必须保持并尽量发展遭受严寒和大旱的乌克兰和北高加索草原地带的谷物业，责成人民委员会在1928—1929年度的作业计划中制定必要措施。”（发表时后一句改成：“责成政治局在1928—1929年度的计划中制定必要措施。”）

第8页，在“这一危险（即工业和农业发展悬殊的危险）会对工人阶级与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造成威胁”一句后插入：“我们遇到的困难与城市，尤其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有关，与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增强的富农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反抗加强有关。党在农村胜利的必要条件是在一切工作中严格遵守明确的阶级路线。依靠贫农、与中农结成牢固的联盟和继续加强对富农的进攻是党的政策始终不渝的基础。尤其必须保障贯彻党和政府规定的帮助农村贫农的措施。”

在第6条末尾插入：“无产阶级只有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和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和改造作用，才能施加对农业的这一革命性影响。在这方面，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发展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

删去第7条中“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运动中取得了重大成绩”一句。

以下改为：“中央全会强调指出，党和苏维埃机关在刺激个体农民经济增长上远未采取一切可以保障多数农民经济有重大提高的措施。中央全会同时指出，尽管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上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这方面的成就还明显不够，在加紧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和改善老的国营农场的同时，必须使集体农庄

的数量和质量有进一步增长。中央全会赞同控制数字规定的加紧扶持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

把第9条末尾的“而后”一词改为“并最终”，整个句子改成：“由此提出缓解并最终克服商品奇缺的方针。”

第10页末尾改成：“所有这些在加倍注意保持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周密考虑发行和贷款计划以及大力发展出口的条件下是经济正常发展和缓解商品奇缺的条件。”

在第12条第4行的“要”字之后插入“在保持其现有原则的条件下”。

第11页，第12段，把分号前的“坚决禁止滥用有关个别税的法律”等这一句改为：“(1)坚决禁止滥用有关个别税的法律，做到在确切运用法律的基础上使其只及于富农农户中最富的那一部分，尤其是收入在普遍征税下征收不足的那些人，并且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3%。”

第12页，大约在中间，在谈关于在1928—1929年度缓解比例失调并在最近几年内将其彻底消灭的地方插入：“同时要在金属的使用上厉行节约，主要通过建设中以其他材料(瓦、石墨等)代替金属来实现。”

稍稍往下在“但农产品原料的不足成为轻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一句后插入：“从这一角度来看，发展人造丝、毛、皮等新产业具有特殊意义。”

在第13页上有几处不大的数字改动。

在第14页第1段末尾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之后插入：“这项任务只有在各经济组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完成。中央全会在此特别强调上述所有组织在生产合理化和与企业中旷工、散漫和不守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方面必须更积极地工作。”

往下有一处数字改动。第15页。在这一页开头的“等实现”之后插入：“但是，在完成1928—1929年度的经济计划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紧张不应在任何程度上削弱党、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对继续开展国防准备工作的注意力。”这在“等实现”之后自成一节。

在下一段中对教育经费数字进行了修改。在决议草案中给出投资数字。教育人民委员部建议给出总教育经费的增加数字。我们决定保留表示投资的数字，同时加进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数字。对表示卫生人民委员部经费的数字也作相应修改。

第16页，在这一页开头的“右的(公开机会主义的)倾向暴露出来，它表现在试图降低速度和阻碍……”之后加上“降低速度和阻碍大工业的进一步建

设”。

在谈到“由此提出在两条战线作战的任务”的第二段之后插入：“不言而喻，要克服这两种倾向就必须与对它们的无原则性庸俗退让(调和主义)进行长期斗争。”以下是：“全会指出，目前联共(布)内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公开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危险，这既是由于现在的社会经济形势，也是由于党在和托洛茨基思想的斗争中已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右倾和调和主义遭到全党布尔什维克式的一致反击，党决心捍卫党的列宁路线。中央全会完全赞同中央告莫斯科组织的十月宣言。”

下一条中有关调和主义的一句话移到此处，故而把它从原处删掉。

最后一处修改是在第16页上，在开头为“中央全会坚决反对这两种倾向，特别强调当前必须展开与右倾危险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后一段插入“主要”一词。

以上是对关于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文本所作的修改。

委员会委员们(米高扬同志)把一些实际性建议，如有关税收优惠或在某些情况下全部免去有大量荒地的地区比去年新增播种面积的税收，提交委员会讨论。委员会决定把这些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而不写进决议中。

喊声：“对！”

主席(托姆斯基)：还有没有补充意见？没有。对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表决：按委员会通过的修改意见通过决议。表决开始。谁赞成按委员会通过的修改意见通过决议？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主席(李可夫)：请卡冈诺维奇同志就召开代表会议的问题发言。

(卡冈诺维奇同志想在主席团座位上发言。)

喊声：到台上来！(笑声)

卡冈诺维奇：你们让我到台上来，我就讲上两个半钟头。(笑声)不过你们大家都要给我发奖金，因为我将是全苏联近几年来发言时间最短的报告人。

洛莫夫：会期定在2月份。

卡冈诺维奇：当然可以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代表会议在2月份召开，而把日程提交给政治局，或者可以把整个问题提交给政治局。有人提议把包括日期和日程在内的整个问题提交政治局决定。看来，我们只能把代表会议定于不早于2月份召开。

主席：有没有人想就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内容发言？

柯秀尔:把报告评为“不合格”。(笑声)

主席:有人提议把包括代表会议日期和日程在内的问题提交政治局决定。

喊声:对。

主席:有反对的吗?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起草委员会决定由伊克拉莫夫同志汇报委员会的决议。请伊克拉莫夫同志发言。

伊克拉莫夫:请允许我不读文字上的改动,而只读原则性改动。在第22页第3行中“劳动农民”前后各加上“苏联各族”和“首先发动被压迫民族和落后民族积极参与苏联全面建设”。

第二处改动在第25页上,约倒数第11行,在“实际领导基层机关”处加上“从领导岗位转入生产第一线即基层机关长期工作,加紧从生产第一线提拔工人新干部担任机关领导工作”。

喊声:对。

伊克拉莫夫:第三处改动:第27页,倒数第2行,删去“贫雇农”,在此处加上:“尤其是集体农庄运动积极分子中的”。

往下也在这一页上,约倒数第15行,在“无产阶级分子”后加上“尤其是大企业工龄长的男女工人”。

再往下也在第27页上,倒数第6行,在末尾是“等人”的一段后加上如下内容:“无产阶级成分在农村组织组成中的比例依然很低,集体农庄庄员干部则少之又少。同时,在农村支部的组成中,在某些情况下富裕农民,有时是与富农沆瀣一气者、腐化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所占比例很大。这使得坚决改善、彻底清理和大大更新这些组织的任务变得刻不容缓。在无产阶级干部还不多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地区加紧吸收雇农和农业工人,尤其是当地民族的雇农和农业工人入党,并相应改善这些组织的社会成分,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往下是对结论部分的实际建议。在第28页加上一条。委员会新加了一个第3条,原第3条现改为第4条。第3条是:“要在广泛吸收农业工人和雇农、以及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的飞速进展。同时必须根本改善、清理和更新农村组织的成分。”

往下是在第7条后新加上一个第9条:“大胆向前推进选拔新的党员工人干部到国家各部门工作,保障继续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文化活动。”

以上是全部原则性的改动。

柯秀尔:但委员会的工作时间比谁都长。

主席:有没有人想发言?

提请通过整个决议及其改动。谁赞成?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这里还有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的两份声明。请允许不宣读这两份声明,而把它们附在速记报告之后。

喊声:宣读,宣读。

主席:乌格拉诺夫,请你宣读自己的声明并顺便宣读库利科夫的声明。

(乌格拉诺夫同志宣读自己的声明和库利科夫同志的声明;见中央十一月全会速记记录附件1)]

请允许我宣布会议结束和全会闭幕。

附 件

1

1928年11月16—24日联共(布) 中央全会会议记录

出席人：

联共中央委员：

阿库洛夫、А. А. 安德烈耶夫、安季波夫、阿尔秋希娜、巴达耶夫、鲍曼、布勃诺夫、加马尔尼克、戈洛谢金、多加多夫、茹柯夫、捷连斯基、卡巴科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Э. И. 克维林、基尔基日、基洛夫、科洛季洛夫、科马罗夫、И. В. 柯秀尔、С. В. 柯秀尔、科托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Н. К. 克鲁普斯卡娅、库比亚克、库利科夫、古比雪夫、列普谢、洛莫夫、柳比莫夫、梅德韦杰夫、明仁斯基、米高扬、米哈伊洛夫、莫洛托夫、莫斯科温、奥拉赫拉什维利、Г. И. 彼得罗夫斯基、波斯特舍夫、皮亚特尼茨基、И. 鲁缅采夫、鲁希莫维奇、李可夫、斯克雷普尼克、А. П. 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斯捷茨基、苏利莫夫、瑟尔佐夫、托洛孔采夫、托姆斯基、乌加洛夫、乌格拉诺夫、丘巴尔、丘多夫、С. 施瓦茨³⁷⁵、什维尔尼克、В. 施米特。

中央候补委员：

阿列克谢耶夫、安采洛维奇、布留哈诺夫、瓦雷基斯、格伊、格里亚金斯

基、日丹诺夫、В. И. 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卡达茨基、卡雷金娜、卡明斯基、А. С. 基谢廖夫、克利缅科、Т. 康德拉季耶夫、克里尼茨基、列昂诺夫、洛佐夫斯基、洛卡茨科夫、洛米纳泽、美尔尼昌斯基、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米尔佐扬、穆萨别科夫、尼古拉耶娃、诺索夫、奥什温采夫、В. И. 波隆斯基、鲁勉采夫、К. 伦金、留京、谢苗诺夫、谢列布罗夫斯基、索博列夫、斯特罗加诺夫、苏霍姆林、温什里希特、乌雷瓦耶夫、哈塔耶维奇、齐洪、恰普林、丘维林、埃利亚瓦、埃赫。

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Ш. 阿米尔汉扬、В. Г. 安东诺夫、安东诺夫、阿法纳西耶夫、С. И. 巴尔马舍娃、Я. Я. 鲍尔、巴赫金娜、И. Е. 波格丹诺夫、波格丹诺夫、Б. А. 博里扬、А. С. 布林、布谢、瓦西里耶夫、Г. Д. 魏恩贝尔格、С. О. 维克斯宁、维什尼亚科娃、沃兹热夫、Г. 加列耶夫、М. И. 加列耶娃、加卢什金、А. Г. 格拉西莫夫、А. З. 戈尔茨曼、Н. К. 冈恰罗夫、М. Д. 戈尔恰耶夫、И. И. 戈尔什科夫、格列恰内、格里戈里耶娃、В. Я. 格罗斯曼、В. П. 格鲁泽利、А. М. 格里亚泽夫、格里亚泽夫、А. И. 古列维奇、С. И. 古谢夫、Г. А. 杰索夫、季里克、久热夫、Н. Н. 叶夫列伊诺夫、Я. Г. 叶戈罗夫、叶利扎罗夫、А. С. 叶努基泽、Г. М. 日丹诺夫、扎维茨基、扎格列别利内、Г. А. 扎伊采夫、Г. Н. 扎伊采夫、З. Г. 赞格维利、В. П. 扎东斯基、Р. С. 捷姆利亚奇卡、Н. И. 伊林、М. М. 卡冈诺维奇、В. С. 卡拉什尼科夫、М. И. 卡拉什尼科夫、М. И. 卡尔马诺维奇、卡尔宁、А. 卡里莫夫、卡雷-库利耶夫、卡尔波夫、克利诺夫、П. Н. 克柳耶夫、克尼加、В. Н. 科贝林、科瓦廖夫、И. Ф. 科热夫尼科夫、科兹洛夫、М. Н. 科科维欣、科洛博夫、С. И. 科米萨罗夫、康德拉季耶夫、科诺年科、科帕尼、科皮耶夫、А. А. 柯罗斯捷廖夫、Г. А. 柯罗斯捷廖夫、И. И. 科罗特科夫、科萨列夫、Н. В. 克雷连柯、库兹明、库兹明娜、Д. К. 库尔佩巴耶夫、Н. О. 库奇缅科、Г. П. 拉多申、В. Ф. 拉林、А. И. 拉里切夫、П. Н. 列别杰夫、列维京、А. 列扎瓦、Н. В. 利西岑、И. А. 雷切夫、Ф. Ф. 利亚克苏特金、马吉尔、马祖罗夫、马约罗夫、Н. В. 马尔采夫、曼扎拉、К. Ф. 马尔丁诺维奇、Т. И. 梅德韦杰夫、米利恰科夫、В. П. 米柳亭、А. Х. 米特罗法诺夫、Г. 莫罗兹、莫罗佐夫、М. К. 穆拉诺夫、穆采涅克、А. М. 纳扎列强、С. И. 纳扎罗夫、纳西罗夫·哈伊杜拉、И. 尼基京、А. Ф. 尼科诺罗夫、С. А. 诺沃肖洛

夫、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奥斯特罗夫斯基、Н. М. 奥西莫夫、И. П. 帕夫卢诺夫斯基、М. Д. 帕斯图霍夫、Я. X. 彼得斯、彼得罗夫、И. Г. 佩列卡托夫、普列沙科夫、Н. И. 波德沃伊斯基、Б. П. 波泽恩、波科、波林、В. А. 拉杜斯-津科维奇、拉斯托普钦、С. Ф. 雷坚斯、赖因瓦尔德、О. Л. 里夫金、А. Н. 罗森戈尔茨、Д. П. 罗济特、Е. Ф. 罗兹米罗维奇、罗曼诺夫、П. Ф. 萨哈罗娃、谢尔加宁、М. С. 谢尔古舍夫、西罗托夫、С. Н. 斯米多维奇、斯莫罗金、А. А. 索尔茨、В. П. 斯塔兰尼科夫、Я. М. 斯捷波瓦内、Г. М. 斯特列利措夫、斯图季托夫、Я. Э. 斯滕、捷列霍夫、М. А. 特里利谢尔、特鲁舍奇金、特先科、М. И. 乌里扬诺娃、Н. Я. 法捷耶夫、Ю. П. 菲加特纳、А. Я. 费克特尔、С. И. 菲列尔、哈斯曼、Н. Г. 茨韦特科夫、Ф. А. 齐利科、Л. А. 沙茨金、В. Л. 什韦采尔、В. П. 舍博尔达耶夫、什基里奇、М. Ф. 什基里亚托夫、施洛克、А. В. 绍特曼、施特劳赫、П. С. 舒什科夫、М. И. 尤尔岑、А. 雅科夫列夫、Я. А. 雅科夫列夫、Н. М. 扬松、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

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波格丹诺夫、贝金、弗拉基米尔斯基、列巴、利亚多夫、里亚宁、里亚博夫、斯捷潘诺夫、尤列维奇。

总共出席：

中央委员 60 名，候补中央委员 44 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70 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9 名，共计 283 名同志。

听取：

决定：

1928 年 11 月 16 日决定

1. 梅德韦杰夫同志关于在 (a) 通过关于在全会日程中补充进全苏中央全会日程中补充进 党代表会议日期和日程问题的全苏党代表会议问题的 提案。

(梅德韦杰夫同志)

1928年11月20日决定

2. 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
(李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
- (a) 基本通过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

(b) 成立由以下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决议进行最后修改: 李可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斯大林、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B. 米柳亭、库比亚克、瑟尔佐夫、丘巴尔、C. 柯秀尔、米尔佐扬、卡明斯基、柳比莫夫、茹柯夫、卡巴科夫、布勃诺夫、舍博尔达耶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鲁希莫维奇、科洛季洛夫、苏霍姆林、乌格拉诺夫、戈洛谢金、什维尔尼克、波隆斯基、卡冈诺维奇、雅科夫列夫、苏利莫夫、捷连斯基、鲍曼、哈塔耶维奇、弗拉基米罗夫斯基、温什里希特。
委员会由李可夫同志召集。

1928年11月21日决定

3. 关于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
(施米特同志)
- (a) 基本通过政治局提出的关于总结和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的决议草案。

(b) 成立由以下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决议进行最后修改: 施米特、美尔尼昌斯基、加利耶娃(中央监察委员会)、日丹诺夫(中央监察委员会)、阿尔秋希娜、阿库洛夫、克拉瓦利、科萨列夫、苏霍姆林、马祖罗夫(中央监

察委员会)、里亚博夫、彼得罗夫斯基。

委员会由施米特同志召集。

1928年11月22日决定

4. 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振兴农业的措施的报告。

(安德烈耶夫、波格丹诺夫同志)

(a)基本通过就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振兴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作出的决定草案。

(b)成立由以下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全会决定进行最后修改:安德烈耶夫、加里宁、扎东斯基、A. П. 斯米尔诺夫、C. 柯秀尔、埃赫、波格丹诺夫、米高扬、基洛夫、乌格拉诺夫、克维林、布留哈诺夫、库比亚克、戈洛谢金、什维尔尼克、雅科夫列夫、鲍曼、卡雷金娜。

委员会由安德烈耶夫同志召集。

1928年11月24日决定

上午会议

5. 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

(a)基本通过政治局就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报告提出的决议草案。

(b)成立由以下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决议进行最后修改:莫洛托夫、И. 柯秀尔、卡冈诺维奇、梅德韦杰夫、鲍曼、斯捷茨基、什基里亚托夫、科洛季洛夫、奥拉赫拉什维利、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尔佐扬、科马罗夫、哈塔耶维奇、波隆斯基、利西岑、A. П. 斯米尔诺夫、米哈伊洛夫、瓦雷基斯、舍博尔达耶夫、伊克拉莫夫、阿尔秋希

娜、伊万诺夫、米利恰科夫、埃赫、布勃诺夫、多加多夫、波斯特舍夫、列普谢、日丹诺夫、克里尼茨基、莫斯科温。

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召集。

晚间会议

6. 中央全会就施米特同志关于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的报告作出的决议草案。
(全会委员会报告)
通过经全会委员会修改和补充的关于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
7. 中央全会就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振兴农业的措施问题的报告作出的决议草案。
(全会委员会报告)
通过经全会委员会修改的关于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
8. 中央全会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
(全会委员会报告)
通过经全会委员会修改和补充的关于1928—1929年度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
9. 关于全苏党代表会议日期和日程问题。
(卡冈诺维奇同志)
将关于全苏党代表会议日期和日程的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决定。
10. 中央全会就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全会委员会报告)
通过经全会委员会修改和补充的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的决议草案。
(一致通过)

2

关于 1928—1929 年度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

1928 年 11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
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1. 过去一个经济年度的总结数字表明,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大工业的产值增长 22.5% (去年增长 18.2%,控制数字计划增长 15.8%)。公有固定资产的比重增至 52.4% (去年为 51.4%),投入公有部门的资金占 54.6%,而上一个经济年度为 46.7%。无产阶级人数相应增加,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有所提高,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创造了物质基础。农业生产社会化方面取得的最初重大进展促进了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分别从 87 万公顷和 126 万公顷增至 170 万公顷和 130 万公顷,总产值(按十卢布纸币计算)也相应分别从 1.03 亿卢布和 1.95 亿卢布提高到 1.89 亿卢布和 2.06 亿卢布。同时,根据上次中央全会决定着手组建苏联新式大型谷物农场。

2. 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增加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实现农民合作化、发展集体农业生产形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是党的主要任务和总路线。发展黑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是我国、包括农业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同时也要求必须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合理化,推广科学的应用,更充分地利用西欧和美国的经验和知识。党要在广泛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提高群众物质福利和坚持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在提高技术干部工作质量和大力促进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一切经营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国家工业化方针。

上述任务的完成由于国际局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技术成就、军事威胁等变得刻不容缓。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在经济—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指出只有加快工业和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速度并最大限度地动员党和工农群众才能在经济意义上完成上述任务。

3. 社会主义在过去一个经济年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无论如何要靠党和工人阶级力量战胜的巨大困难和危机现象。这些危险归根结底是由于整个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门的极端落后和发展速度缓慢。此外,正如中央七月全会已经指出的那样,“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门的水平极低……隐藏着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农村相脱离的危险,即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的危险。”谷物问题,黑色金属和建筑材料的极端匮乏,商品普遍奇缺和储备问题,主要由于缺少粮食而导致的出口严重落后进而连带进口落后以及最终的稳定货币问题,是经济战线上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最主要方面。

4. 农业问题是上述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谷物业明显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全部谷物作物的总收获量在1926—1927年度、1927—1928年度和1928—1929年度分别为47.47亿、44.64亿和45.35亿普特,但1928—1929年度粮食谷物作物(黑麦和小麦)的总收获量却因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秋播作物受灾而比上年减少了2亿普特。集中粮食收购的变化情况同样显示出下降:1926—1927年度为6.62亿普特(其中出口1.52亿普特),1927—1928年度为6.27亿普特(粮食出口几乎完全停止)。

谷物业的上述过程是在下列条件下发展的:1928年的谷物粮食播种面积仅为战前水平的90.1%,谷物总产量约为战前的80%,商品部分为战前的56%(全苏联),苏联总人口年均增长2.3%,其中城市人口年均增长4%,人均消费标准增加,尤其是在农村。

农业另一大部门——畜牧业的增长速度减慢;农民的全部牲畜换算成牛与上年的百分比呈以下变化:1926—1927年度为106.5%,1927—1928年度为104.9%,1928—1929年度为102.3%,其中在一些畜牧商品地区(乌拉尔、维亚特卡、东北地区)农民牲畜增长出现了停顿。尤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牛奶业的严重分散导致奶制品业商品率的急剧下降。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农民经济的生产合作化以及利用国营农场发展大型畜牧业。

经济作物领域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明显增加:经济作物总产值从1925—1926年度的8.74亿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1926—1927年度的7.56

亿卢布增至 1927—1928 年度的 9.01 亿卢布。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现在比战前水平多出 58.5%。尽管有了这一增长,经济作物在整个农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远远不够,而就工业需求而言仍十分紧缺,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作物的发展任务。

然而应该指出,谷物业是整个农业的最重要部分。因此谷物业的指标是整个农业的决定性指标,而农业发展的极度落后,尤其是谷物业的落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构成了威胁。

同时,农业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造因素。秋耕播种面积比例增加,从 1926 年的 29.1% 增加到 1927 年的 32.1%。多区轮作面积增加,从 1925 年的 366.4 万公顷增加到 1927 年的 942.9 万公顷。贫农农户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农户的播种面积以及经济比重都有明显增加。公有成分也开始在农业商品产量中起显著作用。农业的役畜和农机保障提高。每 100 公顷的役畜头数 1926—1927 年度和 1928—1929 年度分别为 25.6 头和 27.4 头。每 100 公顷的农机产值 1926—1927 年度和 1928—1929 年度分别为 9 卢布 90 个戈比和 11 卢布 94 戈比。农机制造业产值从 1926—1927 年度的 0.93 亿卢布增至 1928—1929 年度的 1.90 亿卢布(按战前价格计算),相当于战前农机制造业产值的 280% 以上。

因此中央全会认为(弗鲁姆金同志)关于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分在我国正在下滑的论断没有任何根据。

但是,尽管出现了上述积极过程,农业发展中的不良趋势仍十分严重,以至于我们对 1928—1929 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粮食供应计划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削减。收获量减少的原因是在上两年谷物作物播种面积增长放慢的情况下,1928—1929 年度有 500 万公顷的秋播作物受灾,不过,其中 300 多万公顷在国家的及时和大力帮助下重新播种。加之秋播作物受灾的乌克兰南部地区和北高加索 7 月份又逢旱灾。

5. 第一季度粮食收购的可喜进程使我们认为,预定的全年集中收购计划将全面完成。中央责成各地方组织不但不应放松,而且还要加强对粮食收购的注意力,以改善国内的粮食供应状况并尽量保障春季帮助贫农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所必需的种子储备的积累。中央全会指出国内的粮食平衡状况十分紧张,号召全党高度关注粮食收购进程,坚定不移地争取建立粮食消费领域的节约机制,消除一切浪费粮食资源的现象,同时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迅速地将粮食收购从使用非常手段转入正常手段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原则性政治意义。

中央全会指出,七月全会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提高粮食价格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不仅为目前粮食收购运动的顺利展开也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全会告诫各级党组织,粮食收购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只有在全党、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对这一事业格外关注的情况下,只有在围绕粮食收购在广大农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组织贫农、苏维埃和合作社积极分子积极协助粮食收购并以此打击富农上层鼓动延期交粮的企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国内粮食和原料平衡的紧张状况使1929年实现播种面积扩大7%和单位面积产量提高3%成为经济计划的最重要突击任务之一。

中央全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这项指示的特殊重要性并最大限度地积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指示的完成。

在这些措施中,除大力加强农机供应、大幅度提高对各类农业措施的财政拨款和加快1928—1929年度应完成的土地规划工作以外,今年计划耗资约3亿卢布的预购合同这一与农村经济结合并对其施加影响的新方式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中央全会特别强调必须保持并尽量发展冻灾和旱灾严重的草原地带(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谷物业,责成政治局在1928—1929年度的计划中制定必要措施。

6.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也就是工业化粮食和原料基础的发展。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客观上就不可能有工业的长期发展。

工业超额实现计划预期,农业没有实现计划预期,谷物业的差距尤其明显。纺织业的停顿(由于粮食出口停止而不能进口亚麻、棉花),其他一些部门的明显涣散现象(由于排队、粮食供应不足等),对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出口预期的被打乱——所有这些负面景象都反映出工业化由于农业落后而遇到的具体困难。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工业发展和农业基础发展之间继续分化的危险。农业发展的极度落后既有其长期落后、分散和技术水平极低的原因,也有一些主要是市场行情方面的因素。七月全会的决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阻碍农业快速发展的市场行情因素(提高粮食价格、取消非常措施、加强农村商品供应、帮助农民播种等)。

同时,在1928—1929年度通过广泛实行个体农民经济的合作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逐步把分散的农民经济联合成高技术基础之上的大型联合经济、加强老国营农场和发展新国营农场等措施,在消除农业落后的根本结构性原因上取得了初步进展。

必须加倍注意工业发展和农业基础发展之间分化加剧的危险,因为从阶级关系观点来看,这一危险会对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结合构成威胁。

我们遇到的困难与城市尤其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尖锐有关,与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壮大的富农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反抗加强有关。党在农村胜利的必要条件是在一切工作中严格遵守鲜明的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密切联系中农和继续加紧进攻富农是党的政策不变的基础。尤其必须保障贯彻党和政府规定的帮助农村贫农的措施。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对中农和贫农态度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摆在党的面前。工人阶级对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经济关系的社会化改造施加革命性影响的能力现在有了极大提高。

无产阶级只有在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和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工业的主导和改造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施加对农业的这一革命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关键。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重工业的发展正是国家工业化的出发点。

7. 在坚决实行国家工业化方针、保障政府决议规定的本年度投资增长的同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拉动整个农业尤其是谷物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在加大对农村剥削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限制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建立国营农场,鼓励和大力扶持农业集体形式(集体农庄、公社、劳动组合等),大力加强对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刺激。

中央全会强调指出,党和苏维埃机关在刺激个体农民经济增长上远未采取一切可以保障多数农民经济有重大提高的措施。

中央全会同时指出,尽管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上取得了初步成绩,但这方面的成就还明显不够。在加紧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和改善老的国营农场的同时,必须使集体农庄的数量和质量有进一步增长。中央全会对控制数字规定的加紧扶持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予以肯定。

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对农业提出的要求只有在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量、扩大和加快城乡商品流通、恢复和增加农业出口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

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促进个体中农和贫农经济的提高、提供其生产力发展的广阔空间上应通过与农村的生产结合(加强重工业、农机制造业、化学工业等)对农民经济施加愈来愈大的影响,改变农村的技术基础,通过农民的生产合作化促进经济的扩大,组织国营农场对个体经济施加愈来愈大的农业文化影响,启动预购合同等新的作用杠杆。

8. 在赋予农业和畜牧业技术门类以巨大意义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相应技术手段只有在受到农民自身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和条件下才能带来实际效果。因此大力刺激广大农民的经营兴趣是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之一。目前与此相关的有如下问题:(1)农村的商品供应问题;(2)稳定货币体系;(3)农业税问题;(4)革命法制和改善对农民经济的影响形式问题。

9. 从国家工业化的正确政策观点来看,必须逐年改善农村的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供应状况。只有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可以投放到农村市场的商品,才能保障相应的粮食和原料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额投资而引起的(有巨大的人员和生产需求且未向市场投放商品的正在建设中的工厂、住宅)、无法满足飞速增长的购买力(尽管工业产值逐年增加)的成品相对生产不足不能也不应超过一定界限,因为破坏工业化事业的威胁也可能来自这一方面。由此产生了缓解并最终克服商品奇缺的方针。

10. 根据这一指示,明年的任务是:

(a)必须充分保障A部类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学等)的已有发展速度,同时必须尽量集中资金,把钱花在较小范围内,以加快建设和缩短新厂和改建厂的投产期限。其中,必须加紧完成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罗斯托夫农机制造厂等的建设。

(6)在轻工业及其与重工业的相互关系上——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指出:

“根据国家工业化政策,必须首先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以使重工业、轻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的增长,即从这些方面提出的生产需求基本上靠苏联国内的工业生产来保障。

在承认把重心转向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正确的同时,应当考虑到国家资金过多投入若干年后才能在市场上见效益的大型建设工程的危险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轻工业(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加快周转速度可以使我们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将其资金用于重工业建设。”

(b)对非工业投资的数额必须加以仔细审查,以减少相应的预算拨款。

(r)本经济年度必须在最大限度改善质量指标(降低成本、建设成效、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n)保障协助手工业、手艺活等的发展,防止对它们进行任何行政压制。

所有这些再加上格外注意保持十卢布纸币的购买力、周密考虑发行和贷款计划以及大力发展出口,是经济正常发展和缓解商品奇缺的条件。

11. 革命法制问题直接关系到加强经济刺激因素和改善对农民经济的影响形式问题。不实行革命法制、不进行整顿和不严格执行居民事先知道的标准,就不可能有对经济管理的信心、经济核算和个体计划,也就不可能有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增长。革命法制问题的提出绝非偶然,革命法制是经济的必然产物。从这个观点来看,深思熟虑、长期稳定、并能保障个体生产者有一定经济核算能力的经济指令也具有同样意义。

12. 农业税问题也与之相关。往年的经验表明,对影响农民经济的这一重要杠杆要在保持其现有原则的条件下进行改进,以使它丝毫不助长经济的分化,从而也不会引起农村生产力的明显下降趋势。为此必须在农业税按所得累进征税的性质下对其进行基于以下原则的改善:(1)坚决禁止扩大使用有关个别税的法律,以使在准确的法律基础上只对富农农户中最富的那一部分,尤其是对在普遍征税情况下收入征收不足的那些人使用该法律,并且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3%;(2)不仅要统计农户的收入总额,还要统计人口数量;(3)税收标准必须稳定,对税收征缴中的过火行为加以严惩;(4)改善征缴农业税的技术手段,使之更适合于各个地区的特点。

全会赞同政府在明显减轻中农的统一农业税方面采取的措施。

13. 然而,全会在从上述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转向工业的特殊任务并指出工业活动在数量指标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总产值和商品产值增加)和在质量指标方面取得的某些成绩(劳动生产率增长首次超过工资增长,成本降低,可使用投资增加,资金周转加快,建立新产业等)的同时,特别强调工业活动在质量成绩上的明显不足。

工业到目前为止所降低的成本和对它的巨额投资不相符合。生产的技术改造及其合理化迄今仍落后于工业的数量增长。顺便提一句,我们的工厂在使用进口设备上的迟缓和不合理反映出我们掌握世界最新技术成就的速度缓慢。节约机制尚未在我们的企业中得到比较坚决的实行,因而没有产生它能够并应该产生的效果。1927—1928年度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领域继续取得重大成绩。1927—1928年度的内燃机和农机产量分别为战前产量的403%和201%。但生铁生产极为落后并危及到整个国家经济:1927—1928年度的生铁产量仅为战前的79%,平炉钢和轧材分别为战前的93.5%和91%。通过加紧发展冶金业在已经到来的1928—1929年度缓解这一比例失调并在今后几年内将其彻底消除是经济计划的最重要任务。同时要在金属的使用上厉行节约,主要通过在建设中以其他材料(瓦、石墨等)代替金属来实现。

轻工业的巨大成就是班次增加、产量逐年大幅增加、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和生产合理化等。但农产品原料的不足成为轻工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从这一观点来看,发展人造丝、毛、革等新产业具有特殊意义。

建材紧缺在1927—1928年度也未得到任何明显缓解。因此,大力发展建材生产、改善整个建筑业并降低其造价是1928—1929年度经济计划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今年应保证建筑工程造价降低15%。我们在1928—1929年度的经济计划中完全保留了近几年来工业化高速度。

1928—1929年度的工业投资将达到16.5亿卢布,而去年为13.3亿卢布。注册工业总产值在1928—1929年度将达到161.80亿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而1927—1928年度和1926—1927年度分别为138.33亿卢布和113.79亿卢布。其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划下的国有工业产值同期从87.213亿卢布增至131.039亿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

铁路网运营里程从1925—1926年度的7.46万公里增加到1927—1928年度的7.72万公里,并将在1928—1929年度增至7.77万公里。运量从1925—1926年度的940亿吨公里增至1926—1927年度的1052亿吨公里和1927—1928年度的1121亿吨公里。

除上述机器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以外,应特别指出我国的电气化速度。发电量在1913年为19.45亿千瓦时,1927—1928年度达到51.40亿千瓦时,并将在1928—1929年度增至66.00亿千瓦时。从下列数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们在我国工业化事业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1925—1926年度农业总产值为173.70亿卢布,工业总产值为124.48亿卢布。1928—1929年度农业总产值将达到186.24亿卢布,而整个工业总产值将达到190.40亿卢布。工业生产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幅度增长是非常明显且无可争议的,不过,正是工业比重的这一增长和这一工业化速度要求更迅速地扩大工业的粮食和原料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农业比我们现有的增长水平更迅速地增长。

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必然带来工人阶级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1927—1928年度产业工人人数增长了5.7%;雇佣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同年度在产业工人工资增加大约11%的情况下增长了11.2%。1928—1929年度工资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尤其是重工业工人前进。

中央全会指出,从1924年之后首次使成本明显降低(5%)这个意义上说1927—1928年度是一个转折年,1928—1929年度无论如何要继续使成本有更大幅度的降低。1928—1929年度把成本降低7%不仅是完成投资计划、而且是完

成本年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预定水平,全力争取提高劳动纪律和整个生产过程的总体合理化。这项任务只有在各经济组织、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完成。

中央全会在此特别强调上述所有组织在生产合理化和与企业中旷工、散漫和不守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方面必须更积极地工作。

为完成对我国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从这一观点来看,无论是培养既在政治上与工人阶级有血肉联系、同时又能使用先进技术思想成就的新专家和经济工作干部,还是爱护忠诚为苏维埃政权服务、在苏维埃机关和企业尽心工作的老专家都非常重要。党认为必须与一切敌视党外专家的陈旧观念展开坚决的斗争。

14. 1927—1928 年度的形势对出口最为不利。1927—1928 年度的对外贸易平衡为逆差。国内市场近几年来来的状况不允许靠农业增加出口,从而导致必须增加其他出口项目,尤其是工业出口项目。

15. 控制数字规定的 1928—1929 年度经济计划是可以完成的,但十分紧张。财政计划也因此十分紧张。

国家预算总额为 76.948 亿卢布,这就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增加 10% 的条件下预算几乎增加 20%。为完成财政计划必须遵守严格的预算和计划纪律,极大加快和改善我们的合理化工作,厉行节约机制。

中央全会特别再次强动员居民货币储蓄的重大意义。中央全会指出国债尤其是在工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指出必须进一步推广国债,尤其是在潜力很大的农村。

其次中央全会指出,动员农村人口资金专门用于农业工业化目的不仅可以并应该通过国债实现,还可以并应该通过集中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股金以及通过储蓄所等实现。

但是,在完成 1928—1929 年度的经济计划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紧张状况不应在任何程度上削弱党、国家和经济机关对继续开展国防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完成整个经济计划的前提条件一方面是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是坚决彻底地改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者的组成。中央全会指出,尽管 1928—1929 年度预算紧张,对社会文化部门的财政拨款却有很大进展。1928—1929 年度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教育的拨款总计为 3.35 亿卢布,上一年度为 2.70 亿卢布;教育基建投资按计划应为 1.84 亿卢布,上一年度为 0.96 亿卢布。据不完全资料,用于全苏保健需要上的开支同期从 5.13 亿卢布增至

6. 10亿卢布。根据七月全会决议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将有尤为重大的进展。尽管这些数额还不够多,但仍可以保障我国的文化建设有相当大的发展。

16. 中央号召全体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问题上来。只有审慎对待一切经济计划和经济领导任务,对经济政策问题进行客观研究和思考并使经济政策更具科学性,才能避免错误和失算,而这些错误和失算会使在一个被帝国主义敌人包围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遇到的客观困难变得极其复杂和棘手。要使各级党、苏维埃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有质的提高,要使计划领导水平有质的提高,党要及时客观通报有关经济状况的信息,也要在党内对经济问题进行严肃讨论。一方面由于改造时期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国家工业化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困难,实际效果在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的工业化事业给工人阶级和农民造成的紧张,资本主义成分的对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阶段的动摇,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对某些苏维埃机关和党组织的压力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机器的增加以及由此而来的广大国家建设战线上的各种官僚主义表现,使得党内滋生出各种各样的倾向。右的倾向(公开机会主义的)暴露无遗,其表现是试图降低速度和阻碍大工业的进一步建设,轻视或否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阶级斗争、尤其是与富农的斗争估计不足并加以掩饰,对群众的需要漠不关心,对与官僚主义斗争和军事危险估计不足等。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反中农的、超工业化的倾向(托洛茨基主义)逐渐抬头,这种倾向将其半孟什维克的右倾实质掩盖在左倾词句下,实际导致同公开右倾一样的致命后果。

由此提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任务——既反对公开机会主义的右倾,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托洛茨基的“左倾”,即本质上也是右的、但掩盖在左倾词句下的偏离列宁路线的倾向。

不言而喻,要克服这两种倾向就必须与对它们的庸俗而无原则性的姑息(调和主义)不断进行斗争。

全会指出,目前联共内的主要危险是公开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这既是由于目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也是由于党在和托洛茨基理论的斗争中已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

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右倾和调和主义遭到全党布尔什维克式的一致反击,党表明自己决心捍卫党的列宁路线。

中央全会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的十月宣言。

要胜利克服这两种倾向就必须广泛开展自我批评,最大限度地吸引群众参

与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认真和不断地发展党内民主,对经济建设问题展开广泛的群众性讨论。同时,为保障最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由讨论,必须首先“保障党内批评自由,从而排除独立思想和各种批评意见被当成‘倾向’、‘捣乱’等预先加以屏弃的做法”。(中央宣言)

中央全会与这两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强调当前必须主要展开与右倾危险的思想斗争,但不应丝毫削弱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面斗争,同时要求全党把注意力放在必须从根本上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吵闹式的讨论,讨论的前提条件是对整个形势作出布尔什维克式的冷静分析,既不能掩盖困难和官僚主义地美化事实,也不能惊慌失措地夸大危险,既有别于弃党的发展总路线、原则性目标和任务于不顾的不讲原则的尾巴主义实践主义,也有别于忘记当前特殊任务并因此而破坏列宁策略主要原则——原则路线与考虑当前特定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乌托邦式所谓“原则性”。

列宁主义的党过去总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展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最大限度地活跃群众性组织的活动,把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和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战胜遇到的困难。现在,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遇到的新的复杂任务,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到战胜经济困难和动员工人阶级的一切创造力上,无论如何要保持住我们已取得的工业化和社会化速度并完成预定经济计划。

3

关于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七小时工作制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
施米特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保障生产企业的工人在最近几年内从八小时工作制改为七小时工作制且不减少工资的公告,是朝实现联共(布)关于在普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实行不超过六小时工作制且不减少工资的计划迈出的决定性步伐,也是工人阶级在本阶级专政的国家中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最重要成就。

在最近几年内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不仅对于保护工人阶级劳动和提高其文化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原则性意义,而且是一个需要引起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党、工会和经济机关格外注意的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

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再次说明了苏维埃经济的本质区别及其合理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合理化旨在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提高其文化水平,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将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直接改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化方式则是建立在以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使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延长工作日、降低工资等)的基础上的。

尽管中央1928年5月20日关于一些纺织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的决议指出了一系列不足之处,但纺织工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经验证明,在消除这些不足之处后七小时工作制将保障扩大生产、吸收新的工人干部并因此而降低失业,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资和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有更快提高。

为消除一些纺织企业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中暴露的不足之处,其中主要有
(a)关于七小时工作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的解释工作做得很不够,且一般

未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与制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实际条件；

(6)企业本身缺乏组织技术准备；

(b)缺少能够胜任紧张工作的熟练劳动力和缺乏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r)新招收的工人生产纪律性不强；

(д)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建立正常的劳动条件(照明、通风、安全设施等)方面缺乏准备；

(e)日常生活条件恶化(住房不足,宿舍拥挤,在新增工人班次的条件下各种设施跟不上服务;托儿所、医院、电车、合作商店等)；

(ж)党、工会和苏维埃的各级组织为工人群众的服务下降。

全会认为必须：

(1)责成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并且首先是工会各自在企业中安排广泛的工作,以使工人知晓在企业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方面进行的全部准备工作并使这一工作在工人最积极的参与和支持下进行,同时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使之适合于企业新的工作条件。

(2)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使实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前进行的准备工作能够为工业财务计划规定的不间断生产和根本改善生产提供保障(保障原料、安装新增设备、降低成本、提供技术人员和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力)。

(3)要求管辖范围内有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企业的经济机关采取一切措施保障七小时工作制企业的基建设工程资金及时到位。

(4)中央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公用事业银行在分配住房建设贷款时尽量全额满足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尤其是新增班次的企业的工人住房建设需要。

(5)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优化已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首先是新增班次的企业的劳动环境,保障这些措施的实行有相应的工业财务计划拨款。

(6)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贯彻立法机关关于妊娠和哺乳期妇女在已改行和正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中不上夜班的决定。同时要求地方党委会为贯彻本决定在女工中开展广泛的解释活动。

(7)责成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加强已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工人生活和文化需要的服务性措施(托儿所、

医院、学校),保障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必要的拨款。

劳动力的培养问题由于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七小时工作制的顺利实行要求引进更高的技术、新的生产手段和更强的劳动组织,而这要求工人有更文明的劳动态度、更大的劳动强度和更强的生产纪律,坚决杜绝非生产性劳动支出。有鉴于此,中央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职业教育总局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分别安排艺徒的生产教育和工人再培训的工作,以使他们在中央劳动研究所的科学成就、科学劳动规程和新的生产技术基础上掌握新的合理化劳动技能。

中央认为工厂艺徒学校在培养劳动力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命令职业教育总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使工厂艺徒学校的工作更适合于工业对掌握更完善的工作方式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责成各教育人民委员部除基础教育学校网之外,要加强工业企业附属七年制中学网络的发展,以提高工人的普遍教育和文化水平。

中央全会赞同政治局通过的工业和运输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速度(1928—1929年度约20%和1929—1930年度不低于20%),这一速度将会保障整个工业和运输业在最近5年内改行七小时工作制。

全会基本赞同人民委员会根据筹备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批准的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名单,同时指出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重工业企业不够多,建议政府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审核拟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名单,既考虑必须加上在劳动保护方面难度更大的工厂,也要考虑该企业及其产品在整个生产体系尤其是在重工业和金属加工领域的经济价值。

全会建议政府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从能否在这些工厂中增加班次和同时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建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结合工业发展的五年总计划、个别部门的改造和基本建设制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五年前景计划。

中央全会认为七小时工作制除经济意义外也是提高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最重要前提条件,认为党组织、工会组织、经济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首要和基本任务是开展工作把工人因改行七小时工作制而余下来的时间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文化经济成果和加强工人对国家管理的参与,而这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全面解放的斗争事业中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4

联共(布)中央全会就联共(布)北高加索 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即 完成振兴农业任务的报告的决定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一致通过

中央全会听取了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认为边疆区委员会的工作是令人满意的并基本上赞同它所作的振兴农业的决定。

1. 对北高加索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所作的检查表明,最近几年农业得到恢复,我们的阶级阵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前者表现为播种面积和牲畜头数与1913年的比率分别从1922年的51%和44%增长为1927年的88%和72%,后者表现为:(a)农村的大规模合作化;(б)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в)贫农在经济和组织上得到巩固并加强了与中农的联盟。但在农业总体提高的背景下,随着我们的阶级阵地的巩固和农村社会主义成分的增加,资本主义成分也活跃和壮大起来,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深入农村,这一点尤其鲜明地反映在由于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开展各项运动(粮食收购、农业税、播种工作、选举等)而变得尖锐的阶级斗争上。

全会建议边疆区委员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村的阶级阵地并进一步限制资本主义富农成分,坚持不懈地扩大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把我们的支柱——贫农组织在党、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同时千方百计地巩固与中农阶层的联盟。

2. 中央全会同时指出,尽管最近几年由于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而在农业恢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成绩比起北高加索边疆区在国内总体经济平衡中本应起到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北高加索实际播种面积总数低于

苏联平均水平且仅为战前的88%，种植业总收获量仅为战前的57.2%，这一事实尤其是谷物作物的商品率低下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北高加索的农业状况异常严峻。

在农业恢复过程中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

(a)北高加索国内战争结束较晚，农业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遭受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大；

(б)主要由于把大量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外地居民而导致农户减少；

(в)革命前粗放一掠夺式的种植业经营方式当时就已决定了产量下降的趋势；

(г)农户的农具和畜力得不到保障；

(д)最近两年的气象条件不利。

3. 北高加索由于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以及靠近铁路和水路交通而具有特殊意义，这为利用该地区从粮食自给和扩大出口两方面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提供了广阔机会。

全会根据北高加索的这一特殊意义责成人民委员会制定一系列措施保障在近一两年内使北高加索的农业状况在以下方面出现决定性转折：(a)提高产量；(б)从农民经济和公有经济成分(国营农场、集体农庄)两方面加紧扩大播种面积；(в)提高农业尤其是其谷物部门的商品率；(г)保障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化速度进一步加快。

鉴于拖拉机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工业化以及巩固和扩大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特殊意义，决定两年内向边疆区运送不少于1万台拖拉机。在此期间应保障边疆区对条播机和选种机的需求，这些机器主要用于保障集体农庄、成立国营农场服务基地和组建合作社租赁点。同时保障个体贫农和中农农户购买农机享有优惠条件。

为此应加快边疆区的土地规划，要在5年内基本完成此项工作。

4. 落实这些措施除要改善整体工作外，还必须扩大我们的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机关在组织农业方面的组织作用和经济作用。这些组织的直接责任是及时筹划播种运动和收割运动，加强自身对这一事情的组织参与，协助贫农和中农群众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产量。我们从事农村工作的组织应当认真参与和支持农业事业的发展，以保障翻耕休闲地、选种、及时播种、除草等一系列必要的农艺措施的落实，这些措施在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广泛加以关注并吸引居民本身投资的情况下对农业产量和商品率提高的直接结果具有重大意义。

党和苏维埃在北高加索参与今年播种运动的例子表明,这一参与对团结贫农、加强与中农的联系并对其施加影响以及使基干农民群众远离资本主义成分的实际斗争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为使我们面向农村的组织在工作实践和作用上发生这一转变,必须提高这些组织领导干部的农业知识水平。因此全会肯定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为乡、区领导干部开设农艺培训班的初步尝试并要求推广这一经验,使全体乡、区和专区工作人员都能接受这方面的基础培训。

5. 鉴于为农业配备有文化的农艺干部具有特殊意义,认为必须制定一系列措施扩大乡村学校的农艺教育。

为加强作为农业组织者的农艺师的作用,责成人民委员会制定一系列这方面的措施和改善农艺师物质状况的措施。

6. 认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农艺条件是正确的。但有关苏维埃和合作社机关在实际落实这一重要措施以前必须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并保障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7. 农村合作社的工作由于加快振兴农业速度的任务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北高加索农村市场上个体农户受到合作社严重排挤的事实以及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激增表明合作社取得了不容置疑的巨大成绩。但单纯数量上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特别注意农村合作社机关的工作质量,使合作社真正更多地把农民经济的所有主要成分纳入合作社流通体系,并与合作化农民经济的一切生产过程发生联系。从这一点来看,农业合作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主要不足仍是过度的商业倾向而未更多地向农业生产的直接组织者转化。

认为农村合作社在生产合作化方面的最重要实际任务是:(a)扩大预购合同制度,从短期合同向长期合同过渡;(b)将合作化居民的资金吸引到合作社流通体系中来;(c)针对农民经济的单个门类(专业化)开展更广泛的生产服务;(d)保障真正广泛的合作社活动等等。

8. 改善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系统的农村工作并提高其对农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同时必须围绕苏维埃、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组织加强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广泛活动。必须使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大播种面积和土地规划等各项措施都能得到农村劳动群众的广泛支持,并通过各种组织形式使贫农和中农群众直接参与落实振兴农业措施。从这一点来看,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组织村苏维埃农业生产会议的尝试值得肯定,要求边疆区委员会仔细研究这一经验并将结果上报中央。

9. 中央全会指出北高加索集体农庄建设的发展(占总土地使用面积的7.2%)是对分散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指出集体农庄经济已经取得了实际经济胜利,即与个体农民经济相比单位面积产量和收入更高,责成边疆区党组织从必须为集体农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并及时为集体农庄建设提供组织服务和经济服务出发,为消除一系列仍有碍于集体农庄运动顺利发展的严重不足而顽强工作。这些不足是:集体农庄仍有很大的分散性,人员具有流动性,日常生活方面未理顺,公有化生产资料和资金的增长还不够,存在“野蛮的”集体农庄,富农分子企图建立假集体农庄等。

务必使集体农庄不但不脱离周围的广大农民经济,而且要与它们建立联系,即以更文明的土地耕作、完善的经济管理和对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一切生产性(机器、种子)农业种植帮助对其施加影响和作用。这对于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走向社会化大农业的事业将具有重大意义。

10. 责成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除集体农庄外同时加强对国营农场工作的注意力,国营农场是农业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最重要因素,根据七月全会决议国营农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在实践中使国营农场不仅起到谷物工厂的作用,而且成为周围农民经济的工业化农业典范和文明经济管理的课堂;通过把国营农场的机器和种子在签订合同条件下交给农户使用,通过在国营农场组织农业学校和农业培训班吸引贫农—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在国营农场和农民之间建立一定的生产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营农场将会起到对分散的农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作用。

11. 我们加强对农业的影响即巩固和扩大农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地位,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阶层的坚决反抗,从而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北高加索在播种运动中实施一系列措施的经验,以及预购合同制、农业税、集体农庄建设和合作化的实行,表明力图在农村中保住其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富农分子活动的加强。阶级斗争的这一尖锐化以及农村富农阶层力保其地位的企图既表现在直接的反革命言论、杀害农村通讯员等、煽动哥萨克和外地居民的阶层对立、在民族地区利用宗教偏见和落后方面,也表现在企图对苏维埃、合作社,甚至党的个别基层机关施加作用和影响来保护其利益上。

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层的直接任务是更加重视与我们的阶级敌人的活动进行斗争,更扎实和更明确地实行党的农村工作路线。

12. 但是,除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顽强工作任务以及扩大和巩固农业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以外,农村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必须用来保障一系列的条件,以使贫农和中农能够得到发展并文明改善自己的农民经济而不必担心任何物质和法律限制。苏维埃法制足以为那些从劳动经济变为富农—剥削经济的农户作出必要的限制。

1927—1928 年度的税收工作和粮食收购以及其他运动的情况表明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过火行为,比如把个别中农农户划为富农农户,又比如对农村的富农资本主义成分压制不力且严重扭曲了我们的贫农和中农路线。

更坚决地提高农业、包括其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生产力,巩固与中农的联盟,这一任务要求坚决消除农村党和苏维埃组织在工作实践中的上述缺点,坚决保障执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确定的我党明确而灵活的阶级路线。

13. 尽管党在农村贫农阶层中的影响力增加,地方党组织在团结贫农贯彻党和苏维埃政权某些措施的工作中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是应该承认,对贫农的工作仍有很大不足。其中主要有:缺乏系统性的工作,工作呈间断性和突击性,苏维埃和合作社组织所属的贫农团体组织薄弱,贫农合作化工作不足,积极分子选拔不力等。必须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坚决消灭这些不足,确实使贫农成为党在农村一切措施的真正有组织的可靠支柱。

14. 雇农的组织工作也很不够。这既表现为雇农加入工会组织的人数不多,也表现为雇农的入党比例较低。而北高加索大量雇农的存在可以被党用来加强我们的农村苏维埃和合作社组织的工作。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加强在雇农中的工作,一方面要把他们组织在工会中,另一方面要靠坚持不懈地进行吸收雇农入党的系统性工作。

15. 鉴于加强党的农村工作的既定任务和北高加索边疆区的特殊条件——主要是富裕富农分子人员较多,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尖锐的农村阶级关系和边疆区无产阶级干部的数量同时相对较少,从而使选拔得力和稳定的干部从事党和苏维埃基层地区工作的任务困难重重,责成中央组织局采取一切措施,主要靠从无产阶级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等)抽调人员,来充实北高加索边疆区的干部队伍。

同时责成边疆区委员会加紧在边疆区内培养无产阶级干部来充实指导农村工作的各级组织。

5

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

1928年1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全会根据
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

党的发展问题的政治前提

从恢复时期向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过渡,在高技术基础上,在工业化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重工业的作用得到特别加强)的情况下,在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真正广泛开展的条件向整个经济改造的过渡,向我国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以往一样,我们的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工人阶级文化落后和小农业生产在国内占优势的条件下充满困难。不仅如此,世界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越来越坚决地企图从外部施加压力,欲置苏联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直接经济封锁之下并策划对苏联的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作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领导者的作用尤显困难和重要。

面对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困难,苏维埃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初硕果。这些成绩是在扩大使用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只有靠与广大农民群众结成日益稳固联盟的工人阶级的大无畏英雄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才能取得。苏维埃制度确保把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和苏联各族劳动农民吸引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首先发动被压迫民族和落后民族积极参与苏联的建设。党作为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真正领导者始终走在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奠基的苏维埃的前列。

在目前对国内经济进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应当大力提高苏维埃

的作用。为此应多方转变和根本改善城乡苏维埃的工作,首先必须坚决实际推动与国家机关官僚主义的斗争向前发展。目前苏维埃机关中还有许多对苏维埃制度余恨未消的旧官僚分子和从前统治阶级的残余。官僚主义的歪曲,对劳动者的需要漠不关心,极端守旧和形同犯罪的拖延常常使国家机关的工作受到损害。个别国家—合作社机关的明显腐化和与居民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的勾结,使得必须对这些机关进行彻底清理。同时应当注意到,国家机关通过其旧官僚分子也给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留下印记。党在开展严厉自我批评的口号下号召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与我们各个机关中的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勇敢和不断地开展无产阶级自我批评与选拔几万、几十万工人到国家机关工作和实际吸引千百万劳动者参与整个苏维埃的工作密切相关,而这同时要求大力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国家机关只有在广泛吸收大量工人阶级新干部行使国家职能的情况下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坚决摆脱官僚主义成分。目前这正是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真正领导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像在所有工作中一样,党在这项工作中依靠的是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首先是工会的支持。工会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工作成绩斐然,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连接党和工人群众的主要传动带。因此它要为实现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时期的最困难任务负更大的责任,这一时期一方面要求有更多的各行业顶级专家参加工作,另一方面要求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比上一时期更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的群众性组织(工会等)对男女工人的需要和需求常常缺少必要的关心,在许多情况下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因此在动员工人阶级力量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根本任务和克服由此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方面远未充分发挥其巨大潜能。工会在近几年工厂新任工人干部方面的工作最为落后,尤其在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季节性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方面,他们中许多人未经工会的无产阶级教育就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真正建设者行列。与脱离工人的官僚主义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既反对高高在上对工人日常生活利益不闻不问,也反对随声附和较落后工人的情绪,总之在群众性工作中反对为数尚多的一切官僚主义表现——是目前情况下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在实践中贯彻自我批评的口号和真正开展工会民主还未取得决定性进展。

广大党外积极分子在群众性无产阶级组织尤其是在工会中的存在是无产阶级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各领域新生积极力量和新任领导者的最主要的充沛源泉。

党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一无产阶级党外积极分子,千方百计地促进其队伍继续扩大和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从中吸收新人补充自己的组织,就是在为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工业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以便真正活跃群众性组织和开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从而最终直接而全面地巩固党与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

改造时期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包括轻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而这不仅要求在高技术基础上对工业进行彻底改造,而且要求在高技术和集体化基础上大力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和对我农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人阶级要与农民群众结成稳固的联盟,充分估计到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包括落后农村在内的整条战线上铲除滋生在小商品经济土壤上的资本主义根子。这要求加紧用社会主义成分排挤资本主义成分,从而不能不带来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层(富农、耐普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在帝国主义不断从外部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建设反抗的加剧,在一定时期引起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同盟者的某些动摇。同时,这些动摇也反映在工人阶级欠稳定成分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上和党内个别分子的机会主义动摇上。目前党内除恢复托洛茨基理论(以“左的”词句为掩饰的孟什维克理论)的企图外,导致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进攻下交出党的阵地的公开机会主义的右倾危险也大大加剧。因此党当前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既反对偏离布尔什维克总路线的两种倾向,也反对任何对这两种与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倾向进行调和的做法。党在打击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此目前在继续大力反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情况下与右倾的斗争具有特殊意义,党内与右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给予应有打击和沿着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前进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要实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继续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大胆和循序渐进地开展党内民主,通过吸收最先进、最积极和最忠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干部来大力加强党的组织。

我们党始终站在共产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行列,现在要特别注意检查自己的工作,坚决消灭党的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和腐化现象。党只有对自身采取这种态度,只有对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行深刻和严厉的检查,才能巩固和纯净自己的队伍,才能更有能力带领作为社会主义积极建设者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村劳动者,否则将无法实现国内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此必须在党内民主、坚决正确实行选举制并进而根据组织的真实意愿撤换党的机关(常委会、委员会)任何书记和领导者职务的基础上,与党的工作中的官僚作风和官僚主义压制表现进行真正坚决的斗争。为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加强党的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如参加工人大会,向工人和农民汇报工作(党的工作、苏维埃工作、工会工作、合作社工作、经济工作),到地方实际领导基层机关,从领导岗位转入生产第一线和基层机关长期工作,加紧从生产第一线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走上各机关领导岗位等。为此必须打击诸如“生活腐化”、散漫、酗酒、对“上级”阿谀奉承、遮丑和机关个别分子与居民中的富农—资本主义阶层相勾结等类现象和党内弊端。这些都要求在党组织内部坚决大胆推行自我批评口号。党组织应当成为这方面的表率。因此对开展自我批评这一下层群众创造性批评的任何惧怕都会被党视为官僚主义的一种最明显表现而加以迎头痛击。

调整党的成分的任务

应当结合当前时期的任务并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关党的成分、调整党的发展和吸收男女工人入党的问题。

党在最近几年,尤其是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吸收党员之后有了飞速发展。数十万先进的无产者进入党内,现在已占党员领导干部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新的党工人干部在党与反对派进行特别尖锐的斗争时期已经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其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积极建设者行列的最重要补充。

党在目前的发展也主要靠无产阶级成分。同时职员尤其是农民的入党人数也增加了。正常选拔以及一部分工人由此而不断从生产第一线转入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和入学深造也在党的成分中体现出来。这一结果使得在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极大优势(61%)的条件下,直接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工人在党内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42%)。

与此同时,党在工人阶级中有巨大的发展后备力量。这些后备力量指的是工会、生产会议、苏维埃、合作社、共青团、女工代表会议、志愿者协会、俱乐部等机构中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党外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干部。产业工人、尤其是熟练工人中个别阶层的入党人数远远不够。尤其必须在吸收女工人党的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在目前条件下决不能容忍的极端落后状况。加紧吸收经过工业企业共青团严肃教育的青年工人入党应

具有很大意义。吸收农业工人和雇农入党的工作极其落后,要立刻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在加紧吸收男女工人入党的同时必须严格遵守为职员等入党所规定的条件,还必须挑选真正忠于党的农民并且首先是农民中尤其是集体农庄运动积极分子中的雇农。

为适应加紧吸收工人入党的目标,并进而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基本任务,必须吸收工人阶级中能够带领工人群众实际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打击小资产阶级思想动摇并全力提高全体工人群众和农村劳动者对党的信任的真正先进分子入党。我们的任务是以最顽强和最坚决的方式吸收优秀的男女工人入党,他们在困难时期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坚定性,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们身体力行地促进生产率和劳动纪律的提高,与官僚主义进行激烈顽强的斗争,积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并以此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列宁主义行列。党不能不注意到,无产阶级成分本身在战争和革命时期补充进许多新的阶层,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阶层以及少量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社会阶层人士。因此党完全有理由把一切具有革命觉悟并忠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分子,尤其是大企业中工龄长的男女工人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我们的实际任务是在1930年底以前使生产一线工人在党内的比例不低于50%。

广泛吸收工人入党必须与严格审查党的现有成分以及最坚决地清除党内社会异己分子、混入分子、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分子和腐化分子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思想措施阻止比较落后,但却忠于革命的工人退党。另一方面要加紧采取比往年更强硬的措施清除党组织内利用执政党的党员身份谋取功名利禄分子和与富农相勾结的资产阶级—市侩蜕化分子等。

无产阶级分子在农村组织中的比例依然很低,集体农庄庄员干部则少之又少。同时在这些组织中的富裕农民,有时是接近富农分子、腐化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在某些情况下所占比例很大。这就使得坚决改善、彻底清理和极大更新这些组织的任务变得刻不容缓。在无产阶级干部还不多的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加紧吸收雇农和农业工人,尤其是当地民族的雇农和农业工人入党,并相应改善这些组织的社会成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条件之一。

不论加紧吸收工人入党,还是坚决清除党内思想和社会异己分子,都必须吸引最广泛的党外工人群众参与。党外工人的参与,在农村是党外农民,尤其是雇农和贫农的参与,应是真正群众性的。党外劳动群众的帮助是共产党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最重要支持,对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实际结论

1. 必须在 1930 年年底以前使一线工人在党员成分中的比例不低于 50%，为此要保证近两年内一线工人，尤其是工龄长的工人，在入党人员中的比例（从总体上讲）不低于 80%，要在工人群众中开展相应的实际组织和思想培养工作。

2. 在近两年内最大限度地限制非工人成分入党，为此每位职员必须至少有几名一线工人（在农村是雇农和农业工人）做自己的入党介绍人。

3. 在吸收农业工人和雇农以及贫农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入党的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的迅速进展。同时必须彻底和迅速改善、清理和更新农村组织的成分。

4. 吸收党员和调整党组织的发展绝不应机械进行（如由上级规定日程任务等），也不应搞成群众性运动，而要与加强整个党组织和群众性组织的工作联系起来。

5. 审查并清除党内异己分子、腐化分子、沾染官僚主义习气分子和其他分子，这项工作要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大力领导下更坚决和更经常地进行。

6. 吸收新党员和清理组织要在党外工人和劳动农民最广泛最积极的参与下进行（召开党的公开会议、预先公布新党员和被开除者名单等）。

7. 简化男女工人的入党和转正程序，最大限度地削减入党上的层层关口。县党委会和区党委会应在两周之内审议有关问题。

8. 坚决加强思想政治措施，制止较落后的男女工人及贫雇农退党。

9. 大胆向前推进选拔新党员工人干部到国家各部门工作，保障这些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继续提高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文化活动。

10. 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党的机关应经常检查地方组织的有关工作，对地方实践予以必要修正并将整个结果向党组织通报和在报刊上公布。

11. 吸收广大先进工人新干部入党必须与在苏维埃、工会和党的系统中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开展无产阶级民主紧密联系起来，并进而与根据本决定和中央关于自我批评的六月宣言而在各机关大力加强与官僚主义的实际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6

给全会主席的声明

致全会主席

声 明

我请求宣读如下声明。

李可夫同志在昨天的全会总结发言中点了我的名字,提到我和中央路线的若干分歧。李可夫同志当时还公正地指出我没有在全会上发言。我认为有必要就此进行说明,我在讨论政治局关于控制数字的决议时没有发言不是因为和它有分歧,而相反是因为完全拥护它并认为它完全正确地发展了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我在个别经济问题上和中央政策产生的分歧已成为过去并已消除。有时把我归为弗鲁姆金同志的同盟者纯属误解。我很看重弗鲁姆金同志,但却认为他试图提出背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认为他在粮食政策问题上的方针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必须在诸如实际执行农业社会主义原则(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决定性问题上坚持明确的方向。最大限度地加快农业发展的任务在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现阶段越重要就越难以实现,在贯彻我们的农村阶级路线上出现的混乱就越危险,改变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倾向就越错误。

Г. 索柯里尼柯夫
1928年11月21日

一

声 明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话末尾,在谈到莫斯科党组织的状况时说:

“至于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还能对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作何补充。他公然宣称:‘如果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我 1921 年怎样跟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吵架,则那时的“争斗”要更厉害一些。当时我们是胜利者,因为我们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打了败仗,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会有好处的。’由此可见,乌格拉诺夫同志现在还像当年跟季诺维也夫打架时一样。他近来到底是在和谁打架呢?看来是在和中央政策对着干。还和谁斗呢?这场斗争究竟因何而起呢?显然是因为对右倾持调和态度。”

斯大林同志把我总结发言中的这段话说明成是我自己承认似乎是在和中央政策对着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我是怎么提到 1921 年列宁格勒党内斗争的呢?斯大林同志从我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总结发言中引用的那段话前面是如下一段话:

“而现在,同志们,要考虑一下今后应如何开展工作。自我批评从批评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开始。确实,如果我们这样开始进行自我批评,那么,同志们,除了出丑,我们从自我批评中不会得到任何别的东西。第一张饼做成面团不是什么坏事,只要能有所收获。不必为此感到难过。我们看到的不是莫斯科党组织曾经有过的那些情景和党内‘争斗’。”

我想用从我的总结发言中引用的这两段话说明什么呢?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我想以此说明我是赞成自我批评的,尽管它是从批评我和我的同志们开始,并且,尽管在这次针对我的自我批评过程中出现了不正确之处,我也不会灰心失望或怀恨在心,我还想以此强调,布尔什维克不应该是心胸狭窄和不讲原则的人,而我认为有必要时,会和极强的对手开战。由此可见,我并不想和中央、和中央的批评对着干。

由此可见,在我的总结发言中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央政策”对着干的意思,因为我和莫斯科党组织的干部领导集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中执行中

央政策。最后我要为在总结发言中表达的意思不完全清楚而使斯大林同志有理由对它进行错误解释而表示遗憾。

请把本声明附在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之后。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H. 乌格拉诺夫

1928年11月24日

三

致联共(布)中央全会主席李可夫同志

声 明

请把本声明附在全会速记记录之后。

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在全会上就控制数字报告发言时对我进行了诽谤。他声称,似乎我在斯大林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必须加强轻工业发展的理论。舍博尔达耶夫同志的这种说法首先是建立在不客观和对我的发言的不正确陈述基础上的(何况舍博尔达耶夫同志并未出席积极分子会议),其次,舍博尔达耶夫同志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是大力加强重工业,并由此指出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的一系列事实。这被歪曲成相反的意思,舍博尔达耶夫同志这样做是不正确不诚实的。一个星期以前我在萨拉托夫区委会上所作的并刊登在《下伏尔加真理报》上的类似发言中也根本没有舍博尔达耶夫同志所说的内容。

E. 库利科夫

1928年11月24日

四

致中央全会主席李可夫同志

声 明

请把我的如下声明附在全会速记记录之后：库利科夫同志否认他在斯大林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时把重点放在加强纺织工业和棉花进口问题上的事实。我认为必须声明，他发言的这部分内容正含有这一性质并引起库奇明同志（郊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叶尔马克同志（第一区区委书记）专门就这一问题发言，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提出批评。

联共（布）斯大林格勒郊区委员会书记 普图哈

1928年11月24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6—397（第1—3分册），718—721和723号案卷。原件。）

补充材料

1

A. И. 米高扬致 И. В. 斯大林

71

亲爱的索索：

事情进展非常缓慢。困难来自两个危险战线：外汇外贸战线和粮食收购战线。

如果你已看过我就外汇状况问题给政治局的便函，就没必要在这里重复了。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组织信贷施压的核心是德国。德国人不仅通过美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反对我们的活动，怂恿他们对我们进行信贷封锁，而且近来也对本国公司施加压力。日前我收到各企业家协会给各公司的通告副本，提醒与我们做生意时要小心，公然暗示我们没有支付能力。德国人试图利用形势迫使我们屈服。报刊上就联合所有德国公司以自己的垄断反对我们的对外贸易垄断而议论纷纷。这更是一种威胁，因为正如他们公开指出的那样，德国公司即使在技术问题上想与俄国经济机关建立直接联系，如他们所说可能性实际上也很小。非常困难，但必须忍耐和等待。这就要求必须缩减进口计划，不得不有所割舍。在明年我们的发展速度将受到进口的更大限制。遗憾的是，在实践中为取代粮食而增加出口做得很少，而在目前时期这是唯一可行之路。我希望能通过政治局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

不知你是否看过我关于外汇改革的便函。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我们打算在9月30日讨论这个问题。和哈里曼平静分手，总的来说不算太坏。我从谢尔戈那里要来了阿廖沙·斯瓦尼泽，让他负责锰业。他明天就要去国外组织销售。我们认为这次运走和卖掉的锰会比哈里曼做这件事时多得多。

在第二个即粮食收购这个最重要的战线上情况非常紧张。随信寄去我就粮食和种子状况问题给政治局的便函。情况非常困难。情况比全会期间还要困难,这是因为:(1)秋播作物春季受灾的乌克兰南部春播作物受灾或大幅度减产,北高加索大幅度减产;(2)收割和脱粒时遇到阴雨天气,除谷物成熟期和从开镰早的南部地区向东部运送粮食普遍拖后外,收割和脱粒期也晚了10—12天,造成粮食质量下降。天气转晴已有一周。令人高兴的是,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尚无任何减产情况。这些地区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减产,但不会太大。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里,尽管乌克兰和中部地区歉收,但由于这些地方总收获量依然比去年高出3亿多普特。

供应从8月下半月起出现严重困难,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并在不早于9月底前有所缓解。一定要坚持住。

我和地方机关就粮食收购问题开过一次会。现在看来还不能确定最终年度计划。决定把这件事放到9月底去做,到那时收成情况会更明朗。初步计划定为6.35亿普特谷物,而不是我在6月底提出的7亿普特。减得最多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商业人民委员部中央统计局定的计划是1.05亿普特,而去年的实际收购量是2.65亿普特,就是说少了1.60亿普特。我预定的是1.25亿普特——这是最大值(后来表明,乌克兰政治局采纳了这一计划——1.23亿普特)。这还是比去年少了1.40亿普特,必须设法弥补。北高加索提出的计划比去年的收购量减少0.1亿普特,我们提出稍多一些——0.85亿普特。大家都说这太多、太紧张了。

你关于五日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曾指望迅速提高粮食收购——没有实现。五日周及不良数据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危害。我们将在粮食收购加强后予以公布。这要以伏尔加河流域进入收购期为准,预计是在8月下旬和9月初。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紧邻歉收区的地带、库班毗连克里米亚的地区和捷列克等地,粮食收购受到出价比我们高得多的粮贩和个体户的极大破坏。我们正采取一些措施来打击这种现象。为此我把丘赫里塔派往克里米亚。购买未收割庄稼的预购合同遭到破坏主要是在克里米亚,部分是在乌克兰。如果把乌克兰采取的措施用于克里米亚不能明显见效,我将按第131条(随信附上该条全文)提出有关种子预购合同的刑事责任问题。

一句话,未来两三周具有决定性意义。

托姆斯基提出名义工资除要涨的外一律再加6%—7%的问题。依我看,这是他的一着棋,因为他知道今年的困难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就在去年和前年情

况好时,他曾反对我们提高工资。选举了一个由鲁祖塔克任主席的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

工作进展总的来说还可以。莫洛托夫累得够呛。可怜的人工作负担太重。他是好样的。鲁祖塔克病了。尽管还在工作,但气色很不好。人手少。情况又非常困难。布哈林我们见不着。他老是在开会。

送谢尔戈去治病的事很快就办妥了。他饱受疾病折磨,担惊受怕。情况也真危险。但我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他们能把他治好。最糟糕的是,我们这儿的医生先说他有结核杆菌,后来又说没有,再后来莫斯科的医生又说有。一句话,全乱套了。看看德国人怎么说。

尽管工作很困难,但我觉得自己挺有精神。身体还行。

你身体怎么样?如果治不了,就写信来。

A. 米高扬

1928年8月23日于莫斯科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65号案卷,第48—49张。手稿。)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2

关于 1928—1929 年度国防开支预算情况的说明

10月22日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审议了国防开支预算(控制数字)。在这次会前,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局的预算会议讨论了各部门提出的国防拨款控制数字(此外,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预算控制数字和军事工业的补贴数额:第一项总额为8.90亿卢布,第二项总额为1.00亿卢布)。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局、财政人民委员部和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在上面提到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上(10月22日)提出的数字如下:

部门	1927—1928 年度拨款	1928—1929 年度预定拨款(单位:千卢布)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防局	财政人民 委员部	陆海军人民 委员部
陆海军人民委员部	742 400	880 000	862 400	890 000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	49 386	55 000	55 400	57 000
工农红军军事卫生部	21 338	26 000	23 700	26 000
护送部队	7 710	9 000	9 100	9 000
军事工业	51 000	100 000	80 000	110 000
民用工业	91 502	120 200	100 000	120 200
教育人民委员部	90 000	104 000	80 000	104 000
商业人民委员部	478	13 000	7 500	14 800
邮电人民委员部	3 750	3 400	3 480	3 400
总计:	1 057 564	1 310 600	1 221 580	1 334 400

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预算和战略铁路建设开支方面出现的分歧最大。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预算方面,人们(包括 А. И. 李可夫在内)主要对海军舰队建设、库房和营房建设开支提出了质疑。而且,对第一个问题(造船)的疑问不仅针对给这一需要拨款的数额问题,还针对现有整个造船规划是否合理和与国情相符的问题(“不更新战列舰而去建造潜水艇和小型轻便船只不更好吗?”)。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就预算第 39 项(造船)请准的数字是 0.43 亿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数字是 0.37 亿卢布。

就库房建设一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说:“一方面是到处叫嚷动员储备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却是如果今年不新建库房,数万车厢的炮兵物资就要露天存放。”总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认为,库房是够用的,需要的只是把里面的“破烂儿”腾出来(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在新建和维修军用建筑一项上的分歧是 0.12 亿卢布,也就是分别为 0.56 亿和 0.44 亿卢布)。

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办公会议的多数成员看来也认为有可能大幅度削减。没有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办公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认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局的数字为应当进一步削减的极限数字,责成由克维林、温什里希特、帕夫卢诺夫斯基和托洛孔采夫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削减。

有关军事造船规划的问题经专门审议后移交由李可夫、温什里希特和奥尔忠尼启则组成的另一委员会。

第一个委员会召开过两次会议,但未能消除分歧,尤其是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预算上的分歧。委员会以多数通过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不包括造船开支(第 39、40 项)的预算总额为 8.14361 亿卢布。于是,根据克维林同志委员会的建议,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全部预算将在 8.62 亿和 8.69 亿卢布之间,取决于拨给造船的数额的多少。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坚持 8.89 亿卢布的数额。

预定拨给军事工业 1.10—1.12 亿卢布,教育人民委员部 0.8 亿卢布,其他部门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局提出的数额大致相同。

第二个委员会召开过一次会议,但未作出任何决定,只是对个别问题作了更细致的澄清。

考虑到上述情况,办公会议秘书处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定于 11 月 5 日召开办公会议,有关国防拨款的问题应在这次会上得到彻底解决。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秘书向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报告这件事时,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到星期一即 11 月 5 日却没有召开办公会议,而是为彻底平衡全苏预算召集了平衡

委员会会议。但这个委员会也没能解决分歧,于是设立了一个由皮达可夫同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接手国防预算的进一步协商。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副秘书长 利兹金

1928年11月6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4号全宗,2号目录,101号案卷,第81—83张。原件。)

3

B. H. 利图诺夫斯基给 K. E. 伏罗希洛夫的信的节录

1928年11月10日

尊敬的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

我跟您讲过预算的事情。最新情况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没有停手不干。对温什里希特同志随便怎么评价都可以，他作为工作者有一大堆缺点，但他在预算问题上能力过人。他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有多大。我们大家都设法帮助他，有时帮把手，有时出主意。可安德列·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的表现我就看不懂了。我们知道当然也看见过，安德列·谢尔盖耶维奇瞧不起温什里希特同志，不买他的账。在中央决议草案问题上就是这样，草案的最终文本事先未经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里希特审阅就通过了，甚至还违反了他的一些指示。比如，向政治局提出关于乌拉尔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问题，而温什里希特是从政治局议程上知道这件事的。如此等等。但要知道预算问题不仅是也绝不是温什里希特的问题，而是整个人民委员部的问题。而布勃诺夫同志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如果预算失败，他会把这看成是温什里希特的个人失败而幸灾乐祸。而当我们通知他时，他就朝我们泼冷水：你们不会有结果的，你们写的不对，找的人也不对，我已经说过了，别人也告诉了我等等。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安德列·谢尔盖耶维奇和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的关系不能说是正常的。总之，您不在的时候，通常都是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一个统一和团结的领导。而这非常非常糟糕。

回到预算上来。在平衡预算之后，也就是在责成皮达可夫同志确定军事预算数额（11月5日）之后，我们建议温什里希特同志给政治局写一份言辞激烈的

抗议书。这份东西是11月8日写好的。大家一起对文字作了加工,末尾声明,这种把已经确定的数字不负责任地减少几千万的做法将会造成红军战斗力下降的后果。同时建议温什里希特同志:(a)给您发一份电报,或许,您会认为有必要过问此事并找一找斯大林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b)11月9日亲自去找斯大林同志并向他说明真实情况。最后一点尤其必要,因为李可夫同志对我们的预算态度简直不像话(按温什里希特同志的说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平衡预算全压在国防预算上。李可夫同志在会上激烈攻击我们:“都说你们欺骗大家,给自己涨工资”,——等等,等等。

昨天白天斯大林同志接见了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非常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汇报,表示同意他的论据,并给李可夫同志打了电话,要求把我们的预算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会议前的副职会议上。斯大林同志说:“把这个问题放到星期一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不大可能,议程被一些异常紧急的问题排得满满的,其中主要是在星期二开幕的中央全会的问题。”

在副职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把给我们的拨款最后定为8.407亿卢布,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最初数字上砍掉了0.5亿卢布。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至少,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想把问题再提到星期一的政治局会议上去,或者就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报告发言。但除此之外,今天财政—计划委员会将召集会议,以决定对哪些项目进行削减。基本的设想是——陆军和空军建设计划应基本不动,在细枝末节上也不应改变。

B. 利图诺夫斯基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74号全宗,2号目录,101号案卷,第84—85张。手稿。)

4

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 1928—1929 年度控制数字问题报告的决议草案

1928年11月

1*. 过去一个经济年度的总结数字表明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大工业的产值增加 22.5% (去年增加 18.2%, 计划控制数字增加 15.8%)。公有化固定基金的比重增至 52.4% (去年为 51.4%), 基建投资达到 54.6%, 而上一个经济年度为 46.7%。无产阶级人数相应增加, 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所提高, 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建立了物质基础。农业生产社会化领域取得的根本性进展极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分别从 87 万公顷和 126 万公顷增至 170 万公顷和 130 万公顷, 它们的总产值(按十卢布纸币计算)也相应分别从 1.03 亿卢布和 1.95 亿卢布提高到 1.89 亿卢布和 2.06 亿卢布。同时, 必须指出为组建苏联新式大型[和特大型]谷物农场而进行基建投资的事实。

2. [然而, 在社会主义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 继续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无论如何必须消灭的巨大困难。] 旨在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增加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实现农民合作化、发展集体农业生产形式等的路线是党的主要根本任务和总路线。发展黑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 大力实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 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 是我国继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国际局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技术成就、军事威胁等都要求必须不断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合理化, 推广科学应用, 最充分地利用西欧和美国的[理

* 从第 1 条到第 9 条包括“根据本指示”一语是 Н. И. 布哈林的笔迹。——俄文编者注

论和实际]经验。党要在广泛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提高群众物质福利和普遍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在提高技术干部工作质量和把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整个经济实践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国家工业化方针。

3. 然而,在社会主义在过去一个经济年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继续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无论如何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和深刻危机现象。只有在城乡紧密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工业的主导作用,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的影响。此外,正如中央七月全会已经指出的那样,“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门的水平极低……隐藏着社会主义城市和小农经济农村相脱离的危险,也就是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的危险”。从这一角度对过去一年的总结揭示出反映苏联国民经济增长危机的巨大危险。这些危险归根结底是由于整个农业,尤其是其谷物部门极端落后和发展速度缓慢。粮食问题、黑色金属极端匮乏、商品奇缺和储备问题,出口以及进口的不正常状况,最后,稳定货币问题和遏制通货膨胀势头,这些是经济战线上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最主要方面。

4. 作为国家整个工业发展基础的农民经济问题是上述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问题。谷物业明显没有完成计划;谷物作物的播种面积在1928年下降了2.5%强;全部谷物作物的总收获量在1926—1927年度、1927—1928年度和1928—1929年度分别为47.47亿、44.64亿和45.35亿普特;1928—1929年度粮食谷物作物(黑麦和小麦)的总收获量比上年减少了2亿普特;所谓“农村余额”,即可以投放到城市的多余部分近三年内在所有谷物作物方面都明显降低(1926—1927年度为5.914亿普特;1927—1928年度为4.938亿普特;1928—1929年度为4.691亿普特)。集中粮食收购的变化情况符合“农村余额”的这一变化,也表现出绝对降低:1926—1927年度为6.50亿普特,1927—1928年度为6.23亿普特,1928—1929年度为6.13亿普特,鉴于集中粮食收购机关只是靠拼命排挤所有其他收购者才把粮食收购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必须作出粮食收购总数下降得还要快的结论。谷物业的上述过程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1928年的谷物粮食播种面积为战前水平的90.1%,总产值为战前的77.1%,而商品部分充其量为战前的56%,而人口却年均增长2.3%。农业另一大部门——畜牧业的增长速度极其缓慢,近于停顿;农民的全部牲畜折合成牛与上年相比百分数呈以下变化:1926—1927年度为106.4%,1927—1928年度为104.9%,1928—1929年度为102.3%,其中在一些商品畜牧业地区(乌拉尔、西北地区)出现农

民牲畜增长的全面停顿。经济作物领域出现不容置疑而且十分明显的增加:经济作物总产值从1925—1926年度的8.74亿卢布(按1926—1927年度价格计算)增至1927—1928年度的9.01亿卢布和1928—1929年度的9.51亿卢布。这一增长的积极改造意义非常之大。然而必须注意到,经济作物产值只占整个农业产值的6%多一点(9.51亿卢布,而除捕鱼业、狩猎业和林业以外整个农业产值为160多亿卢布),占整个种植业产值的8%多一点(9.51亿卢布对105亿卢布)。由此可见,谷物业指标是整个农业的决定性指标,因此谷物业的危机也是整个农业的危机。

5.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也就是工业化的粮食和原料基础的发展。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在客观上就不可能有工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农业发展的极其缓慢和谷物业危机必然会对国家工业化事业造成巨大威胁。纺织业中的停工现象(由于粮食停止出口而无法进口亚麻、棉花),其他一些部门的明显涣散现象(由于排队、粮食供应不足等),从对整个工业化事业的意义来看的出口计划的被打乱——所有这些危机现象有可能发展成整个经济战线上的巨大困难。工业超额实现计划预期,农业没有实现计划预期,谷物业的差距尤其明显,粮食谷物产量有绝对减少的趋势。这一差距的加剧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由于对外政治条件而变得异常尖锐。无产阶级对中农态度的问题重新提到首位。

6. 一方面要摒弃一切削减我国工业建设的建议,坚决实行国家工业化方针,不降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拉动整个农业,尤其是谷物业和粮食生产向前,在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集体经济形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尤其重要的是放开对个体农民、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刺激因素。工业和城市的飞速发展对农业提出的要求只有靠发展农业、提高农业产量、加快城乡商品流通、恢复和提高农业出口才能满足(如果不追求一时的成绩),而不能只是和主要靠减少农村积累。

7. 在赋予农艺学和畜牧学各门类以巨大意义的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相应技术措施只有在农民自身经济利益驱动下加以使用的情况和条件下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因此刺激广大农民的经营兴趣是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之一。这关系到以下问题:(1)商品运送问题;(2)货币体系问题;(3)价格问题;(4)农业税问题;(5)革命法制和整顿影响农民形式的问题。

8. 可见,从国家工业化的正确政策观点来看,必须实行克服商品奇缺的方针。只有生产出更多的可以投放到农村市场的商品,才能保障相应的粮食和原料供给。在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巨大基建投资而引起的(有巨大的人员和生产需

求的在建工厂等)的成品相对生产不足不能也不应超过一定界限,因为正如经验现在已证明的那样,破坏工业化事业的威胁可能来自另一面。由此产生了缓解商品奇缺的方针。

9. 根据本指示:

(a)* 必须充分保持 A 部类工业的发展速度,尽量重组资金,把钱花在较小范围内(少量工厂),以加快建设并使新厂的投产时间提前。其中,必须加紧完成斯大林格勒农机制造厂等的建设。要特别关注黑色冶金工业;

(б) 必须消除使 B 部类工业从业人员感到自己受排斥的敌视 B 部类工业的气氛;

(в) 对非工业性、尤其是市政建设和军事部门的基建投资数额必须进行仔细审查(从战争角度来看粮食的意义更大!),以减少相应的预算拨款;

(г) 必须提高质量指标(尤其是在新建项目方面);

(д) 必须停止对手工业、手工艺等的行政排挤。

10. 若实际取消降低价格和缓解商品奇缺的政策必然会使货币体系遭到破坏。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基础的农业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原因是缺少农业生产力增长即实际积累所必需的货币积累。

必须承认滑向通货膨胀观点和对货币体系、发行等问题采取轻视态度是极其危险的。旨在加强我国出口的货币改革方案(取消官定人为平价)只有在具备一切坚实的储备基础,尤其是黄金和外汇储备基础的条件才能实行。没有这些条件“改革”只能导致卢布购买力的下降和整个经济的涣散。在以下条件下,(1)A 部类新建项目的加快“成长”;(2)B 部类的良好业绩;(3)由于削减非工业性基建投资而腾出的一部分商品;(4)手工业的一定的复苏,——将使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相互关系朝着有利于货币体系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方向变化。

11. 革命法制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刺激因素问题。不实行革命法制、不进行整顿和不严格实行居民事先知道的标准,就不可能有信心、经济核算和个体计划,也就不可能有个体经济生产力的增长。而没有个体经济的增长将给需要增加积累的(新技术等)农业集体形式的增长造成极大困难。革命法制问题**绝

* 从第9(a)条到第11条“必须增加积累的(新技术等)……”一语是打字机打的。——俄文编者注

** 从这里往下到第12条是 Н. И. 布哈林的笔迹。——俄文编者注

不是一时的偶然之需,革命法制是经济的必然产物。从这个观点来看,保障个体生产者有一定经济核算能力的经济指令的深思熟虑和长期稳定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没有经济核算会给生产过程造成极大困难。尤其必须仔细研究富农问题,按地区分析富农的特征,严格依法进行相应稳定的实际工作。

12. 农业税问题也与这些刺激农民经济的问题有关。往年的经验表明,对农民经济的这一重要作用杠杆要进行改进,以使它绝对不会导致农户的分散,从而不会引起农村生产力明显下降的趋势。为此必须在农业税按所得累进征收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基于以下原则的改进:(1)放弃所谓的“个别”税,经验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遵守革命法制等;(2)不仅要统计农户的收入总额,还要统计家庭人数;(3)明显普遍减少税额;(4)尽可能严格地、按地区进行剥削农户和劳动农户的划分;(5)必须稳定税收标准;(6)改善征收农业税的技术手段。

13. 由此提出*(除上述五点外)以下建议,必须:

(e)开始落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有关储备问题的指示,着手实行缓解商品奇缺的政策;

(ж)减少预期的纸币发行数字;

(з)特别注意发展谷物业和谷物业集体形式;

(и)消除破坏革命法制的现象,保障正确执行苏维埃法律的指令;

(к)采取一切措施确定各地区的富农经济标准,执行相应的区别政策;

(л)实行农业税改革;

(м)分散商业人民委员部机关的管理权,保障各地区拥有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н)赞同政治局提出的措施;

(o)把从国外购买粮食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的应对市场行情措施加以讨论(最后一点**).

14. 在上述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范围内转向工业的特殊任务时必须指出,***1927—1928年度在发展工业生产上取得的重大成绩却未带来相应的质量改善。工业到目前为止所降低的成本和对工业的巨额基建投资不相符合。生产技术改造和生产合理化迄今仍落后于工业的数量增长。顺便提一句,我们的工

* 从这里到最后是打字机打的,第13条的序号是H. И. 布哈林写上去的。——俄文编者注

** “最后一点”是H. И. 布哈林写上去的。——俄文编者注

*** 第14条开头的文字是H. И. 布哈林写上去的。——俄文编者注

厂在使用进口设备上的迟缓和不合理反映出我们掌握世界最新技术成就的速度缓慢。节约机制尚未在我们的企业中得到足够的坚持,没有发挥它能够而且应该发挥的效果。1927—1928 年度在冶金业和机器制造领域取得了进一步的重大成绩。1927—1928 年度的内燃机和农机产量分别为战前产量的 403% 和 201%。但生铁生产上的落后却极其严重并危及到整个国家经济:1927—1928 年度的生铁产量仅为战前的 79%,平炉钢和轧材分别为战前的 93.5% 和 9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329 号全宗,2 号目录,9 号案卷,第 34—42 张。原件。)

5

И. В. 斯大林对 А. И. 李可夫 1928—1929 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意见

阿列克谢：

我把对提纲的意见寄去。

1. 我认为,应把提纲分为几章,再写一个类似于提纲引言的东西,主题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改造时期的任务作一个简单概括(其中包括关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问题)。

2. 应当指出,我们不仅保持了现有的工业发展速度,而且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基建投资计划比 1927—1928 年度多 3 亿卢布。

3. 在谈工业问题时要用一段专门论述关于改造时期发展技术、合理化和降低成本的意义的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新老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作用、爱护忠于我们建设事业的党外专家、与这方面的过火行为作斗争等附带问题。

4. 还应有一段专门谈谈旷工、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会议问题以及工会在这些方面的作用问题。

5. 不妨专门谈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发展那些为农业生产的生产性需要服务的工业部门的任务。

6. 一定要有一段专门谈谈七小时工作制及其进步意义的问题。

7. 一定要谈谈电气化问题,而运输业问题(包括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要谈得比提纲中略多一些。

8. 应说明尽管我们的工业品逐年增长,但在我国经济中还有商品奇缺的现象,以及必须采取哪些措施缓解商品奇缺的问题。

9. 在谈农业(尤其是它的谷物部分)发展速度滞后的问题时应指出,1927—1928 年度谷物播种面积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使农业发展速度有重大提高的最

重要手段是在广泛开展合作化、引进新技术和肥料、发展和改善集体农庄、发展新老国营农场的基础上改造农业和提高个体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

10. 应当提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提到必须巩固这一结合并(顺便)提到必须改正分摊和征收农业税上的错误和过火行为。

11. 应谈谈关于债券(工业化债券等)、债券发行和必须要在农村中推广的问题。

12. 不妨谈谈区划问题,指出它是完全正确的,等等。

13. 还应提到劳动人民的文化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措施问题。

14. 必须在提纲中谈到我们的敌对阶级、阶级斗争、我们的困难,这些困难的性质(成长中的困难)、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党内的动摇,谈到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公开机会主义倾向(右倾),也反对偏离列宁路线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在当前必须特别强调与右倾的斗争,同时丝毫不能削弱与“左倾”的斗争,指出绝不允许对这两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等。

15. 应有一条专门谈谈计划、我们计划中的不足和错误以及改善计划工作等问题。

16. 应更尖锐地提出储备问题,指出必须执行党关于储备问题的决定。

其余一些零散意见我们周六或周日再谈。

И. 斯大林

1928年11月7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98号案卷,第5—6张。手稿。)

6

И. В. 斯大林对 А. И. 李可夫 1928—1929 年度控制数字提纲的补充修改意见

致李可夫、布哈林、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古比雪夫同志

我同意古比雪夫同志(关于工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关于农业)、米高扬同志(关于商业)在各自的发言中谈到和答应提出的修改意见。既然他们将提出这些修改意见,那么我在这封便函中只谈谈自己的补充修改意见。

1. 在谈农业问题时应强调如下思想,即“农业仍处于极低的水平,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参看中央七月全会决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农业的谷物部门。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是后退或停滞,而是农业、包括它的谷物部分在内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顺便参看中央告莫斯科党组织成员的十月宣言)。与之相应,要对提纲的第4条进行改动,指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小麦和黑麦总产量减少(播种面积也相应“减少”)是由于气候条件(春寒、夏旱),而如果不是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现在的播种面积就会比去年增加(而不是减少),1928—1929年度谷物作物的总产量就会增加不止0.72亿普特,而是至少3亿普特。

2. 在指出农业发展速度大大落后的原因时,必须根据中央七月全会决议指出,哪些是根本原因(在农业分散和落后条件下对其进行新技术改造的困难)和哪些是市场原因(市场关系等)。同时应指出,根本提高农业发展速度的最可靠手段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广泛开展个体农户的合作化,逐步把分散的农户联

合成建立在最高技术基础上的大型联合经济,加强老国营农场并发展新国营农场,还应指出能够立即见效的市场方法和手段(提高粮食价格,取消非常措施,加强农村商品供应,帮助农民播种,改正农业税实行上的缺点等)。

3. 在谈商品奇缺、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时必须指出以下因素:(a)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工业产品每年都有显著增长,但仍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b)改造时期工业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把力量集中到生产资料的生产上来(重工业),而且投资周期长,这必然导致对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快于这类产品的生产增长。根据这一点应对第10页上关于“克服商品奇缺”的表述进行修改,把“而后”一词改为“最终”或“将来”。

4. 删去“刺激广大农民群众的经营兴趣是我们目前的一项基本任务”一句(第9页),以及“发挥对贫农和中农农户的经营刺激因素”一句(第8页),理由是,第一,此类表述会被理解成弗鲁姆金同志关于农民经济“没有前途”的著名思想的另一形式,第二,苏维埃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提高自身经济,并且贫农和中农经济确有提高,谈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富农农户提出一定保留条件,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其剥削趋势的政策。

5. 删去关于取消个别税的一条,代之以必须严格执行关于只对富农中最高的一部分人(不超过3%)征收个别税的法律这样一条。

6. 单设一条谈苏联的文化建设(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等)和国家增加这方面的开支问题。

7. 指出我们的困难是成长中的困难。

8. 在第19页上“资本主义成分的反抗”一语后加上“和阶级斗争在城市和农村的尖锐化”。

9. 在同一页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一语后加上“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一些党组织的压力”。

10. 在同一页上“超工业化倾向”一语后加上带括号的“托洛茨基主义”。

11. 在同一页上“右倾暴露出来”一句“右倾”之后加上带括号的“公开的机会主义”。

12. 在同一页上“半孟什维克的右倾实质”一语后加上“实际导致右倾在我们党内取胜后必然导致的致命后果”。

13. 在第20页上另起一段:“由此提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任务——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偏离列宁路线的‘左倾’。”

14. 在同一页上将“杜绝乱扣倾向帽子的做法”等改成“杜绝将自由想法和

各种批评意见当做‘倾向’、‘捣乱’(引自中央六月宣言)事先予以摒弃的做法,但这绝不意味着认可偏离列宁路线的倾向”。

15. 在同一页上将“与这两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强调必须与一切形式的右倾危险作斗争”一句改为“中央全会与这两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特别强调当前必须展开与右倾危险的斗争,但这不应丝毫削弱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同时把注意力”,等等。

И. 斯大林

1928年11月13日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1号目录,798号案卷,第35—38张。复印件。)

注 释

- 1 指与日历年同样长的一个经济年度。在苏联从1921年9月到1930年9月经济年度按从10月1日到9月30日计算。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0年9月20日的决议规定经济年度按从1月1日到12月31日计算。
- 2 在全会的材料里没有经过作者修改的А. И. 李可夫的发言的速记记录。速记报告中包括重写的主要在文字上修改了的报告正文(见未校对过的速记记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8号案卷,第1—75张)。
- 3 在政治局1928年9月27日的会议上批准А. И. 李可夫,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В. В. 古比雪夫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作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6号案卷,第4张)。
- 4 1928年9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问题,并且通过了《关于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1号案卷,第6张)。
- 5 所谓的1923年“销售危机”指的是工业品的过高价格和农产品的低价格之间的差价。
- 6 指的是1925年粮食收购计划中的计算错误。这些计划实际是过高的。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到:“我们被修改掉了2亿普特”,结果工业投资从11亿卢布降到了7—8亿卢布,“整个速度不得不放慢”(见:《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剥夺富农(文件和材料)》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第17页)。
- 7 捷里别斯工厂——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公司最初的名字。
- 8 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两卷本),莫斯科1961—1962年版,第1171页。
- 9 见本书第2卷。
- 10 作者那里为:“速度应该保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7号案卷,第24张)。
- 1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363—364页。
- 12 政治局1928年7月19日研究了“关于1928—1929收购年度的粮食价格政策”的问题。在决定中提到:

“(1)以商业人民委员部的建议作为基础。委托米高扬、克维林和斯米尔诺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对草案的按区制定的价格进行个别修改,以对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可能稍微降低价格、对乌克兰可能进一步不大地提高价格作为出发点。关于饲料,认为降低饲料作物具有—时意义的那些地区的饲料价格是有可能的。委托委员会今天就结束工作,以便明天公布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

号目录,696号案卷,第4张)。

第二天,1928年7月20日,在《真理报》上登载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收购新收割的粮食的决议》。决议中指出,1928年冬季至春季采取的反对投机商和富农的非常措施是由保障向国家居民供应粮食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情形的改变、预期的好收成,使得可以放弃非常措施。规定立即终止强制没收农民的粮食,终止任何种类的对于集市和农村内部流转的禁止措施。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在乌克兰小麦平均18戈比1普特,在北高加索——20戈比,在西伯利亚——10戈比。同时,鉴于对饲料的巨大需求,提高了燕麦和其他饲料作物的价格。决议还提到了对农民的工业品供应问题,以及打击手工酿酒的问题。

- 13 1928年11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必须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加强粮食收购的指示。为制定指示草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有米高扬、莫洛托夫、丘巴尔、C.柯秀尔、库比亚克、什维尔尼克、安德烈耶夫、埃赫、瓦雷基斯、戈洛谢金、卡明斯基、柳比莫夫同志”(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3号案卷,第2张)。
- 14 谷物加工费——被扣除的那部分谷物,作为磨好的粮食的费用交给磨坊。
- 15 见本书第2卷。
- 16 政治局1928年4月3日关于统一农业税问题的决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0号案卷,第1—2张)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4月21日通过的关于1928—1929年度的统一农业税的条例中得到了体现。条例规定了个体农户,特别是在当地由于自身的收入额和收入的非劳动性质而从总的农民群众中分离出来的个体农户的税款的新的计算办法,不是根据一般的标准征收,而是根据大大提高的个体标准征收。由此得名——个别税。被征收个别税的农户的数量不应该超过农户总数的3%(《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34辑,第212页)。
- 17 “苏美贸易股份公司”(1924年在纽约成立的股份公司,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商品进出口的经纪商)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于1928年10月9日在纽约签署了关于给“苏美贸易股份公司”提供长期贷款用以在美国购买总额2600万美元的机电设备的合同。合同规定“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前两年的购买额不低于500万美元和不高于1000万美元。所购买商品的价值25%应该在装货前支付,其余金额的票据应该自发货之日起5年内偿清。如2年之内采购义务的履行情况令人满意,规定“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在接下来的4年内每年可继续购买不低于400万美元的商品。同时,美国克拉克公司总裁麦涅尔宣布,在“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履行这个合同之后,该公司将认为,其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属于它的价值175万美元的财产的赔偿要求已得到解决(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1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744—745页)。
- 18 指的是1928年成立的俄国债权人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后废除的俄国证券国外持有人的联合组织。参加者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丹麦的俄

国有价证券持有人协会。该组织不仅代表沙皇俄国的国债和地方公债的持有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各种银行企业和工业企业的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委员会的参加者不得单独与苏联政府签订协定,也不得参加与俄国债务有关的任何协定,如果协定的好处不能同样地提供给该委员会的所有参加者的话。

- 19 显然,德国银行家加入俄国债权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德国和苏维埃俄国 1922 年 4 月 16 日在拉巴帕签订的条约的第 2 条。该条的内容如下:“德国放弃因俄罗斯联邦在此之前对德意志国家和土地上的德国公民采取的法律和措施的事实而向俄罗斯联邦提出的赔偿要求,以及放弃一般说来由于俄罗斯联邦或者它的机构对德国公民或者德国公民的私人权利采取的措施而提出的赔偿要求,条件是俄罗斯联邦政府不得满足其他第三国家的类似要求”(《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 5 卷,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223—224 页)。
- 20 国债作为动员国家内部储备的手段,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的融资来源。如果说 1925—1926 年度国债抵补了 15.3% 的国民经济开支,那么下一年度则为 23.2%,而在 1927—1928 年度达到了 34.9% (见《苏联的工业化:1926—1928 年 文件和材料》,莫斯科 1969 年版,第 494 页)。
- 21 指的是当时领导反酗酒协会的 IO. 拉林。
- 22 1928 年 8 月 25 日政治局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 1928 年 8 月 19 日关于把军事部门的预算降低到 8.9 亿卢布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1 号案卷,第 3 张)。后来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会议、人民委员会副职会议重新对预算进行了审议。结果 11 月 12 日政治局准许人民委员会把苏联预算草案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讨论,该预算草案将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预算的开支部分削减 5000 万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162 号目录,6 号案卷,第 144 张;另见补充材料 2 和补充材料 3)。11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关于 1928—1929 年度国家统一预算的决定批准了 8.4 亿卢布这一数字(见《苏联领导人通信集(1928—1941 年)》,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61—62 页)。
- 23 见 A. 列昂季耶夫《动员群众为社会主义合理化而斗争——关于粮食供应》,载 1928 年 11 月 4 日《真理报》。
- 24 1928 年 11 月 5 日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李可夫、古比雪夫、斯大林、布哈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组成的委员会,为即将召开的全会起草关于国民经济控制数字问题的决议。11 月 9 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米高扬加入了该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12 号案卷,第 4、5 张)。委员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最终达成了妥协。11 月 15 日政治局同意了该委员会所通过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13 号案卷,第 1 张)。
- 25 指的是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最初称谢米列琴斯基铁路)。
- 26 Я. М. 沙图诺夫斯基给 Л. Д. 托洛茨基的信写于 1928 年 8 月 6 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329 号全宗,2 号目录,25 号案卷,第 122—124 张)。沙图诺夫斯基指责托

- 洛茨基“把党推向没有任何可能性、没有任何合理性的工业化”，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就是明证。沙图诺夫斯基要求必须降低工业的建设速度；呼吁托洛茨基改变立场、回到党内来。
- 27 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向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的决议中讲道：“鉴于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从策略上的分歧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鉴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客观上已成为反苏维埃斗争的因素，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4 页)。另见注 33。
- 28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202—204 页)。
- 29 1928 年 11 月 1 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托洛茨基分子在活动》的简讯中，揭露了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文具纸张厂生产车间联共(布)支部的反党活动，指出该支部“感染了托洛茨基主义”。在 41 名支部成员中，监察委员会追究了 39 名成员的责任；支部的 5 名活跃分子被开除出党，其余人员“因真心悔过”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 30 在十月革命 11 周年纪念日，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国内一些城市发表了演说，随后进行了逮捕。由于大批逮捕托洛茨基分子，在基辅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大楼前发生了示威活动。
- 31 Г. 格林科《在伟大任务的旗帜下(关于 1928—1929 年度的控制数字)》，载于 1928 年 10 月 30、31 日和 11 月 1 日的《真理报》。
- 32 《计划经济》月刊——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刊物，1924 年起在莫斯科出版(1924 年 3 月前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简报》)。
- 3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 1927 年 12 月 2—19 日召开，会上听取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工作报告，以及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报告。代表大会认为党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制定了有关起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将反对派首领开除出党。
- 3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三分册第 380—381 页。
- 35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使用了“和平的喘息”这一术语(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150、153 页)。
- 36 Л. Б. 加米涅夫的文章《以新的方式、以务实的态度(论工业改造)》刊登在 1928 年 11 月 16 日的《真理报》上。
- 37 在速记记录中作者修改为：“0.88”(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 号目录，379 号案卷，第 15 张)。
- 38 兼并突厥斯坦西部为兼并整个突厥斯坦打下基础，1867 年在突厥斯坦西部土地上建立了突厥斯坦总督管辖区。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兼并完成。
- 39 根据 1878 年柏林会议的决定巴统划归俄国。

- 40 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花拉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24年9—10月中亚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民族国家划界时被取消,它们的领土并入重新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属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起初属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30年起直属俄罗斯联邦)。1925年5月13—20日召开的苏联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接受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
- 41 1928年9月2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克维林的报告审议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问题。所通过的决定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最近5年发展农业的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46号全宗,1号目录,42号案卷,第2—3张)。
- 42 引证不准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3页。
- 43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远景计划,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1920年10月29日第八次全俄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计划(见《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1917—1967》第1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195、196页)。人民委员会经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电气化的法令于1921年12月28日颁布(同上,第290—292页)。电气化计划预定10—15年完成,规定建设30座地区发电站(20座火力发电站和10座水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
- 44 魏茨的资料是正确的。
- 45 作者作了修改,原为:“5.5%”(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57张)。
- 46 《苏联工业的合理化》,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
- 4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页。
- 48 作者作了修改,原为:“600万公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64张)。
- 49 1928年11月29日政治局审议了作为议事日程中“关于苏联预算”一项的组成部分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问题。决定中写道:“给木材出口补充拨款1000万卢布。其余数额在农业和军事部门之间分配……”(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7号案卷,第2张)。
- 50 敖德萨专区别列佐夫区的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和250个农户在1927年秋初签订了一份为了“完全的公共拖拉机耕作”而把耕地连成一片的合同。国营农场为此成立了一个由10台拖拉机组成的拖拉机队。在1928年春季的播种运动中国营农场组织了由68台拖拉机组成的14个拖拉机队为农户服务。在1928年11月该拖拉机队被改组成国内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效仿谢甫琴柯国营农场的拖拉机队,1928年春播时,国内有73个谷物

农场组建了拖拉机队,总计有700台拖拉机。同时在合作社系统中也成立了拖拉机队。1928年俄罗斯联邦共有14个拖拉机队,由346台拖拉机组成,耕作面积达57500公顷(《苏联农民史》第2卷,莫斯科1986年版,第49—50页)。

51 A. M. 马尔克维奇的《跨村机器拖拉机站》一书由Г. М.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撰写序言,并且附有敖德萨专区别列佐夫区巴莱丘克村农民同乌克兰国营农场联合企业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合同,1928年由“计划经济”出版社出版。

52 Г. В. 肯贝尔——美国的农业企业主,1929年出版的《俄国——市场还是威胁》一书的作者。1929年1月28日肯贝尔会晤了斯大林。他们谈话的记录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58号全宗,1号目录,2884号案卷。

5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7页。

54 见注4。

55 政治局1928年11月1日就“谷类饲料平衡和供应计划”问题所作的决定专门规定:“责成由古比雪夫、斯大林、米高扬、雅科夫列夫、鲍曼、多加多夫、皮达可夫、欣丘克、索柯里尼柯夫、托洛孔采夫、帕夫卢诺夫斯基、布留哈诺夫、库比亚克和格林科组成的委员会研究投放农民市场的商品的增产问题和向农村重新分配商品的可能性问题。还责成该委员会预先研究在提供贷款的条件下(该年度没有外汇债务)增加进口这类商品的原料以及成品的进口问题。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古比雪夫同志。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两星期”(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1号案卷,第3张)。

56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住宅政策》的决定于1928年1月4日通过,该决定制定了一系列缓解住宅危机的措施:加快新住宅的建设速度;在住宅业内部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包括收取房租;更多地吸收私人资本参与住宅建设;整顿住宅建设,降低住宅建设的费用(见《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1919—1967》第1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696—703页)。

1928年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就A. И. 李可夫《关于新住宅法》的报告通过决定:“不反对重新通过的住宅政策和房租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68号案卷,第6张)。

57 1928年11月15日政治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与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的建设有关的问题,委员会主席是托洛孔采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3号案卷,第3张)。

58 在政治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情况发生了变化。1928年11月18日罗斯托夫工厂建设问题委员会(见注57)受委托研究符合农业领域新任务的拖拉机型号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4号案卷,第6张)。12月6日政治局就“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问题作出决定:“批准委员会的决定:

“(1)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快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速度的一系列决定,确定

“国际歌”牌拖拉机的型号为15/30马力,而不是原先规定的10/20马力,这种型号的拖拉机对于农业公有化经济成分的作业来说最适用,经济上也最合算。鉴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在最近十年对拖拉机有着相当大的需求,要求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制造厂在两班倒和七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完成生产40 000台拖拉机和相关配件的计划”(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15号案卷,第3张)。

- 59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16亿千瓦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120张)。
- 60 指的是M. C. 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
- 61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7 100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166张)。
- 62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400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167张)。
- 63 预购合同——在合作组织或国营组织为一方和农民为另一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规定向生产者预订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农产品,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交货。签订预购合同的组织保证按照预先规定的价格收购产品并向农民预付贷款、种子和生产工具,以及对农民提供农艺帮助。既可以和集体农庄也可以和个体农户签订预购合同。苏联自1922年起采用预购合同,但是作为主要的收购形式加以实行是在1928—1929年度。
- 64 И. С. 温什里希特给斯大林转政治局的信中对其发言稿的出现作了解释,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全会上的发言没有作速记记录。我不得不凭记忆恢复自己的发言稿,我有意将发言中涉及机密和动员的地方全部删去。但是我这样的发言稿有多处遭到李可夫同志的反驳。今寄上根据李可夫同志的意见再次修改过的发言稿,请把它收入简报。同时也寄上我的发言的原稿,请把它附在全会的绝密材料之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174张)。李可夫对温什里希特恢复的发言稿第一稿所提的意见不多,不具有原则性质(同上,第184—192张)。
- 65 政治局关于1927年国防计划问题的决定是基础性的,但由于决定是保密的,李可夫反对在全会的速记报告中提到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79号案卷,第174、184张)。1927年3月17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陆海军人民委员K. E. 伏罗希洛夫《关于国防计划》的报告。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伏罗希洛夫就报告提出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4号案卷,第80张),政治局1927年5月5日的决定说:“今年3月17日任命的委员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国防计划的决议已得到政治局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33号案卷,第10张)。
- 66 见注22。
- 67 法国政府拒绝在法国—苏联委员会中继续进行调节经济问题的谈判,提议通过外交程序

进行谈判。法国方面要求预先解决债务和被收归国有的财产的问题,不愿讨论苏联1927年8月提出的关于缔结互不侵犯和中立公约的建议,不愿进行缔结贸易条约的谈判(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1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7、8页)。

68 见注18。

69 指的是1928年9月4日在德国成立的俄国事务经济委员会。加入该委员会的有德国工业帝国联盟,以及银行和各种贸易联合组织的代表。

1928年9月27日政治局通过决定:“认为在德国成立俄国事务委员会是企图有组织地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向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以及柏林商务代表处提出粉碎这一企图的任务。为此,没有抵制德国的俄国事务委员会,无视已成为两国敌对障碍的该委员会的活动,阻止其干涉商业活动和干涉商务代表处和德国公司之间的争议问题的任何企图”(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6号案卷,第2、3张)。

70 1926年3月26日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双方保证“互相承认和保护双方的领土完整不受任何外来侵犯”,一旦爆发战争“立即相互给予帮助和支援”。作为条约的附件,波兰和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部的代表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规定在发生战争时两国相互给予军事支援(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9卷,莫斯科1964年版,第718、719页)。

71 德米特罗·列维茨基是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主席。该组织1925年7月成立。1928年5月31日列维茨基在波兰议会外交事务议会委员会发表演说,宣称乌克兰的土地应该脱离俄罗斯,成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政治局1928年6月7日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责成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B. Я. 丘巴尔就列维茨基的声明发表讲话(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101张)。

72 1927年5月30日芬兰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海关管理的决定,单方面确定了芬兰湾的海关监管区域,从而破坏了1920年10月14日的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定应与苏联协商解决。苏方提出抗议并提议召开会议以便缔结协定。会议于1928年9月4—27日举行,但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1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333、726页)。

73 从1928年10月起在瑞典掌权的是由海军少将C. A. 林德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74 1928年11月在拉脱维亚成立了由Г. 采尔米内什领导的新政府,采尔米内什兼任外交部长。

75 根据政治局1927年8月11日的决定,Ф. Н. 苏达科夫被任命为驻里加的武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46号案卷,第10张)。一年后,1928年9月27日,政治局在讨论“拉脱维亚问题”之后作出决定:“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一道研究驻拉脱维亚武官的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6号案卷,第3张)。与此同时,政治局责成编制关于拉脱维

- 亚的新闻公报。新闻公报于次日(9月28日)刊登在《真理报》上,标题为《拉脱维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挑衅》,其中特别讲到在里加出现了传言:左派(共产党人)准备采取武装行动占领里加,并且指望红军的插手和援助。
- 76 施耐德—克勒佐公司(Schneider-Creusot)——法国最大的康采恩之一。该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了法国的大型军工企业、相当大部分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造船和电子企业和公司以及国内许多大型金融信贷机构。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业企业、银行也在其控制之下。
- 77 斯科达工厂(比尔森“斯科达”工厂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Vormalis Skodawerkt in Pilsen)——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军工冶金康采恩。“斯科达”工厂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科达工厂是欧洲东南部最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企业,下属冶金厂并生产炮、机枪、坦克、飞机、卡车、各种机器;在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拥有企业。“斯科达”工厂在1938年前为法国施耐德—克勒佐康采恩所控制。
- 78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于1925年4月27—29日举行,会上研究了下述问题:关于合作社和统一农业税,关于冶金工业的状况,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加强革命法制,关于俄共(布)的国际任务。
- 79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182—183页。
- 80 同上书,第84页。
- 8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57页。
- 82 全俄农业劳动组织联合会是根据联共(布)中央1926年12月30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总结》的决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和人民委员会1927年3月16日《关于集体经济的决定》成立的。全俄农业劳动组织联合会的任务是领导集体农庄及其联合企业的建设,在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中代表集体农庄运动的利益,协助正确地组织集体农庄的经济和制定集体农庄内部规章,通过农业合作联合企业和国家机关组织集体农庄产品的销售和向集体农庄供应生产资料。
- 83 见本书第1卷。
- 84 佩特留拉叛乱——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在乌克兰出现的民族运动,因其首领之一——C. B. 佩特留拉而得名。
- 85 指的是1920—1922年存在于俄共(布)内部的“工人反对派”集团,其领导人之一是A. Г. 施略普尼柯夫。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认定该集团为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
- 8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0—91页。
- 87 见本书序言。
- 88 联共(布)中央的呼吁书《告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于1928年10月18日由政治局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9号案卷,第3,9—

15张);次日即10月19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89 指的是1928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169页。

90 见注14。

91 苏联人民委员会1928年11月2日作出决定,撤销1928年9月14日的决定,将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的谷物加工费支配权转给各加盟共和国商业人民委员部。粮食的使用是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指示办理的,而且当时可用于地方供应(主要是供应贫苦农民)的粮食只是所收粮食的一部分。

92 贡赋是一种吸引农业居民的资金的形式,其目的是为农村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筹资。1924年8月29日通过了《贡赋法》,其基础是平均原则(《苏联法令汇编》,1924年第6期,第69页)。为了利用贡赋作为在经济上对富裕农民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1927年8月2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贡赋的新决定,其基础是考虑到某些农户的经济能力的阶级原则(《苏联法令汇编》,1927年第51期,第509页)。1928年实行贡赋的条件曾几经改变。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1928年10月4日通过的《关于1928—1929年度贡赋实施办法》的决定未予公布。该决定规定,贡赋必须是真正自愿的,不得采取任何行政压制措施。贡赋不应搞成专门运动,也并非一定要毫无例外地扩大到农村各地。地方执委会的责任是,不让用于满足农村居民社会文化需要和经济需要的预算拨款因实行贡赋而减少。决定分析了贡赋数额的分摊问题,确定分摊数额与统一农业税的数额成一定比例。贡赋的总额不应超过统一农业税的25%(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P-1235号全宗,140号目录,1033号案卷,第1—4张),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1928年1月7日的决定确定的这一比例为35%。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过火行为(另见注94、236)。

93 见注16。

94 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决定实行统一农业税,取代单一的实物税、劳力畜力税、按户征收的货币税、一次性恢复农业所得税和各种地方税。征收统一税要考虑到农户的耕地和草场、人口、成年役畜和牛的数量以及亩产量。1923—1924年度开始的对农业税的种种修改使得农业税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所得税性质,也保证了当年极为紧迫的生产任务的完成。1926—1927年度,根据1926年4月23日条例,首次对非农业工资收入征收统一农业税,首次普遍对特殊农业部门的收入进行单独核算,并改用卢布计算征税收入。1926年的条例规定了以卢布计算的一俄亩土地和一头牲畜的收益标准,并确定了相应的地区差别。累进税率不断加大;按农户的人口收入或按农户的总收入计税(前几年累进税率是按人口的土地保证量确定的)。只有乌克兰例外,作为尝试,那里实行了复合税制。1926年,国内很多地方还把按大田作物征税改为按播种面积的收入征税。1927年4月2日的条例对统一农业税制度只作

了少量改动,而1927年10月21日的决定把因经济力量薄弱而免缴农业税的农户由25%增加到了35%(见《文献见证》,莫斯科1989年版,第496页)。

- 95 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为:“经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8张)。
- 96 经济会议是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最高经济机构,负责审批工业、农业、商业发展计划,并监督该计划的实施。经济会议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只有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才能采纳或取消该决定。经济会议主席由相应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人民委员会从经济领域国家管理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供给人民委员部等)的领导人中任命经济会议成员。1921—1923年间曾设立省和州经济会议。
- 97 见注88。
- 98 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459页,以及本书第2卷。
- 99 见注88。
- 100 显然是指1928年《真理报》的一些文章:《两条战线》(9月15日)、《同右倾作斗争的共产国际》(9月18日)、《论地方党组织的任务》(9月22日)。
- 10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92—205页。
- 102 指H. H. 曼德尔施塔姆——原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长。他于1928年8月1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之后,被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解除职务,并遭到严厉批评。这篇文章中说“要教育广大党员不要害怕偏离布尔什维克基本路线的各种不同思想,不要害怕倾向这个词”,这一论点引起斯大林集团的不满。8月29日,在斯大林集团的压力下,莫斯科委员会常委会作出决定,称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上,乌格拉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详细地谈到了有关情况(见《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10—11页)。
- 103 全苏国营采金业股份公司组建于1927年。
- 104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3 800万”(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31张)。
- 105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57 000公斤”(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33张)。
- 106 截止到1928年9月1日,苏联有68个租让给外国的企业。1927—1928年度开始时,外国对苏联工业的投资占全苏投资总额的0.57%,其工人数量及总产值占1%(见《苏联的工业化:1926—1928—文献和资料》,莫斯科1969年版,第495页)。
- 107 “勒拿·戈尔德费尔德斯”(“Lena Goldfields limited”)是一家股份公司,为开发勒拿河流域的金矿于1908年在英国成立,1925年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开采乌拉尔、西伯利亚及

- 阿尔泰地区的矿山的租让合同。1934年该合同被废除。
- 108 引证不准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85页。
- 109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59页。
- 110 引证不准确。同上,第259、261页。
- 111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的”(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43张)。
- 112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211页。
- 113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
- 1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6—87页。
- 1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249页。
- 11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1926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审议了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 11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宣布了国家工业化方针,通过了新党章和关于把俄共(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决定。
- 118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8页。
- 119 引证不准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07页。
- 120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97—298页。
- 12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21页。
- 122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28个矿井”(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58张)。
- 123 经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为:“2%”(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63张)。
- 124 在经过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中有H. H. 安采洛维奇的两份不同的发言稿;作者对速记记录作了大量文字上的修改,改动后的发言稿重新打印,后来对该稿重新进行了润色(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1号案卷,第68—82、83—97张)。
- 125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说:“批准1926年12月30日中央委员会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总结的决定,并责成各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和合作社机关的党的工作人员加强对集体农庄建设事业的帮助,巩固国营农场,把它们真正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大型生产单位,并加强它们对农民经济的帮助(在国营农场组织农业租赁站、拖拉机队等等)。”(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 126 见本书第2卷。
- 127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2400万卢布”(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

号目录,381号案卷,第92张)。

- 128 指1925年4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采用辅助雇佣劳动条件的暂行条例》。该条例适用于“雇佣劳动为副业性劳动”的农户,它规定雇农与雇主之间必须签订合同,并确定了雇佣条件。根据1925年5月20日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暂行条例》也适用于在租赁土地上的雇佣劳动力。
- 129 全苏农业和林业工人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1月27日—12月8日举行。
- 130 1928年5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斯摩棱斯克党组织的状况》的决议,并于5月18日将其发表在《真理报》上。决议指责斯摩棱斯克党组织领导人蜕化变质、同富农结成政治同盟、搞官僚主义、破坏苏维埃法律。1928年5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认为必须在今年6月底之前召开省代表会议,以便改选省党委会和省监察委员会,而且要事先进行乡、区、县党委会的改选工作”。鉴于“斯摩棱斯克脓疮”是一连串类似事件中的一环,组织局决定就斯摩棱斯克事件、索契事件、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斯大林斯克事件、里亚日斯克事件的教训问题起草一份告各级党组织书,并指定由柯秀尔、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奥尔忠尼启则、Я.雅科夫列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22号案卷,第1,2—12张)。由该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告各级党组织书及修改意见于6月2日经征求政治局成员意见后获得通过。1928年6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就开展自我批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见注191)。

1928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Я. А.雅科夫列夫的报告,他曾根据组织局的决定,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前往斯摩棱斯克党组织了解举行省党代表会议一事。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如下决议:

“(a)批准新的省党委会及雅科夫列夫同志采取的措施:(1)逮捕犯有刑事罪的党员并送交法庭审判;(2)筹备提前改选党、共青团、工会的整个组织系统;(3)清理苏维埃机关;(4)尽快将地主强制迁走;(5)推荐一线工人参与工农检察院工作和进入苏维埃机关。

(6)认为必须重新审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斯摩棱斯克党组织一批领导人的处理决定,要将他们开除出党。

(b)责成组织局审议关于对整个斯摩棱斯克党组织进行审查是否合理的问题。”(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9号案卷,第3张)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省和县党组织就有1000多名领导人被解除职务,其中多数职务由莫斯科派来的干部所接任。斯摩棱斯克、索契、阿尔乔莫夫斯克等地的事件一方面反映了制度官僚化的现实问题和大量滥用权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控制着党的机关的斯大林集团进一步加紧开展反“右倾”运动,加强对中层干部的压制。

- 131 尽管乌拉尔矿产资源丰富多样,居民多具有行业技能且地理位置有利(位于我国工业

- 中心和东部的交接处),但实际上它自己的矿物燃料并不能保证其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这里煤的储藏量估计不到库兹涅茨克煤田储藏量的1/150,而且质量也差。由于消费者——乌拉尔工业与燃料产地——库兹巴斯之间距离遥远、交通不便,于是便产生了所谓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问题。
- 132 指斯大林1928年1月18日—2月4日的西伯利亚之行。
- 133 指1928年12月10—24日举行的苏联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 134 见本书第1卷。
- 135 作者作了修改,原为:“2—3年”(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381号案卷,第121张)。
- 136 见注16、236。
- 137 即农业合作社蛋品家禽中央联社。1928年从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分出。农业合作社蛋品家禽中央联社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家禽产品销售,促进家禽行业合作社以及野禽收购合作社的兴起,组建工业企业、实验示范农场和实验示范站,并向居民供应组织养禽业、储存和销售家禽产品所必需的育种材料、饲料及工具。
- 138 见本书第1卷。
- 139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自1928年9月7日起为农村贫苦农民提供经济帮助的措施》的决定规定了向农村贫苦农民提供现金贷款和供应生产资料的办法(见《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59期,第530页)。
- 140 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1928年秋播运动中谷类作物的预购合同》的决定规定,要签订500万公顷的品级纯净谷物和一般谷物的预购合同(见《苏联法令汇编》1928年第46期,第412页)。
- 141 1928年11月12日,政治局批准苏联人民委员会将关于修改原先作出的给高等技术院校拨款的决定的建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讨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62号目录,6号案卷,第144张)。
- 142 作者作了修改,原为“7%”(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11张)。
- 143 1928年11月15日《真理报》。另见注204。
- 144 作家С. И. 马拉什金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当时已出版的他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下弦月,或是不同寻常的爱情》,《病人》,《两次战争与两次和平》(第1部,1927年),《叶夫兰皮·扎瓦利申笔下的人民委员和我们的时代》(1928年)。
- 145 在全会上分发了М. И. 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写于1928年11月5日,是写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了农业状况和同农民的关系。第一封信是写给政治局的,信上标明的日期为1928年6月15日(参看《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290—294,443—458页)。
- 146 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全俄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农业合作社联

社,成立于1926年。根据章程,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成立的目的是将参加该社系统的合作社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该社的任务包括:协助合理、文明地安排农民的田间劳动作业;协助组织谷类和油料作物生产、加工及销售方面的协作社、劳动组合和协会;参与建设大型粮仓、粮库、磨房,等等;组织销售产品,向居民供应机器、设备和种用材料,等等;从事粮食领域的农业技术改良工作。该社建有实验室和实验站,用来研究谷类和油料作物种子及其产品加工。

- 14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97—198页。
- 14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5—7页。
- 149 见注46。
- 150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近56%”(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46张)。
- 151 中央农业银行是根据1924年2月1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的。根据1927年1月7日通过的《农业信贷制度条例》,该银行负责制定全联盟的农业信贷计划,按规定程序上报这些计划,领导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银行的工作并使这项工作同苏联总的金融和信贷政策相一致,还要协调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银行的计划。1927年初,中央农业银行理事会作出了关于今后为农民提供的贷款只发放给贫农和中农农户的决定。
- 152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2%”(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49张)。
- 153 见:В. Я. 丘巴尔《论文化革命的一个问题》,载10月20日《真理报》。
- 154 见注145。
- 155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444页。
- 156 同上,第453页。
- 157 见В. М. 莫洛托夫1928年6月25日给М. И. 弗鲁姆金的答复,同上,第297—301页。
- 15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110页。
- 159 在全会材料中没有А. С. 布勃诺夫的经其本人修改过的发言速记记录。速记报告收入的是报告重印稿,措辞上有很大的改动。(速记记录原稿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4号案卷)
- 160 见注22。
- 161 显然是指193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J. F. 富勒的《战争改革》一书。
- 162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1923年8月25日的法令对建立地方民兵制的办法作了规定,1925年义务兵役法中也有相关内容。民兵组建工作从1924年起开始进行。保留基干军队,但其只接收25%—30%的应征者。近75%的步兵师、一小部分骑兵师和一些其他部队都按地方民兵制组建。在地方民兵部队中,非固定人员的现役期为5年,其中包括在部队部署地进行的为期8—12个月(取决于军种)的短期集训。1935—

- 1939年期间,苏联的武装力量改行基干制。
- 163 指红军中所谓的“集体违纪事件”(拒绝工作、拒绝吃饭等)。据军事部门统计,1927—1928年的冬天发生了326起“集体违纪事件”,1928年夏天发生210起。当时军队中农民占多数,由于农村进行的紧急粮食收购,军队的状况更加恶化(参见A.罗曼诺, H.塔尔霍娃《红军与苏联农村的集体化(1928—1933年)》,那不勒斯1966年版,第66、74、122页)。
- 164 “关于给陆军人民委员部拨款”问题是联共(布)中央1925年一月全会的一个议题。在这次全会上被批准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M. B. 伏龙芝提出一个请求:在控制数字规定数额之外再拨给陆军人民委员部550万卢布。经全会决定,该请求得到满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165号案卷,第27张背面,第55张背面)。
- 165 《工商报》——日报,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机关报,1922年至1941年以不同的名称出版。
- 166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60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97张)。
- 167 可能是读错了:在经作者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中,“12%—16%”被改为“6%—12%”(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98张)。
- 168 作者做了修改,原为“98%”(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99张)。
- 169 中央联社——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1928年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主要任务是开展合作社商业活动,从集体农庄收购、采购农产品和农业原料。
- 170 作者作了修改,原为“1.1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3号案卷,第115张)。
- 171 全苏面包及其他农产品贸易公司为股份制公司,其主要任务是:促进谷类、豆类作物和饲料的原料基地的发展;接收、储存、加工和分配这些原料;管理苏联的整个商品粮磨制工作,并完成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交给的调节上述作物的非商品粮磨制品市场的工作。
- 172 全会文件中没有斯大林讲话的速记记录(未经修改的和作者修改过的都没有)。该讲话稿被收入全会速记报告,后又收入《斯大林全集》并做了一些不大的删节(《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76—109页)。
- 17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24页。
- 17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156页。
- 17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8页。
- 17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9页。
- 177 参看本书第2卷。

- 178 同上。
- 179 参看注 16、236。
- 180 弗鲁姆金的原话是“中农群众”(《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293 页)。
- 181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卷,俄文版,第 305 页。
- 182 参看本书第 2 卷。
- 183 同上。
- 184 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有过一场争论,其间反对派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给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在争论中有大约 6 000 人投票支持反对派的纲领,支持中央领导人的“总路线”的有 725 000 人。斯大林不止一次用这些数字来证明反对派是软弱的这一论点。但是,当今的一些研究者指出,“党内‘下层’中反对派的潜在支持者数量比正式登记的支持者多”,关于联共(布)党员退党情况的资料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仅在 1926 年就有 8 万人退党(《政治历史: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2 卷本)第 2 卷,莫斯科版 1996 年,第 259 页)。
- 18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9 卷,第 45—46 页。
- 186 鉴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领导人的公开言论,联共(布)中央于 1927 年 11 月 11 日发出《致联共(布)所有党组织》的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卷,俄文版,第 252—253 页)。党中央认为反对派、首先是其领导人的行为已使其不能继续留在党内,并将这一问题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审议。
- 1927 年 11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反对派联盟领导人的反苏维埃行为的问题(参看:《他们为什么脱离了列宁的党的队伍》,载于 1927 年 11 月 15 日《真理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该联盟的骨干分子被清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反对派的分裂活动的问题被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审议。(另见注 21)
- 187 列宁的著作名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第 1—95 页)。
- 188 同上书,第 73 页。
- 189 见注 86。
- 190 1924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同年 5 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都对关于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争论作了总结。1924 年(文中错写为 1925 年)6 月 17 日至 7 月 8 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将该决议作为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
- 191 联共(布)中央《就开展自我批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于 1928 年 6 月 3 日公布。该呼吁书中说,同瓦解国家机关的活动作斗争是改造时期的迫切任务,实行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以及开展“不顾情面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口号是“当前的

- 中心口号”(《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卷,俄文版,第338—342页)。
- 192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124页。
- 193 参看注102。
- 194 农业合作社联社——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社,在农业合作社协会代表大会(1924年8月20—24日在莫斯科举行)上成立。根据章程,农业合作社联社的目标是联合各农业合作社共同组织合作化的工作,推行改进农业技术的措施,加工和销售农产品,组织农业贷款以及推行其他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1927年农业合作社联社更名为全俄农民经济生产资料供应合作社联社。
- 195 参看注50。
- 196 看来此处有误,实际上指的是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
- 197 见注145。
- 198 见本书第2卷。
- 199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两卷集),莫斯科1961—1962年版,第1260—1261页。
- 200 见本书第2卷。
- 201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两卷集),莫斯科1961—1962年版,第1191页。
- 202 见注145。
- 203 速记记录中有作者作的更正:“表现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5号案卷,第36张)。
- 204 1928年11月15日,《真理报》发表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就报上的报道和联共(布)“劳动宫”支部委员会关于《劳动报》对反对右倾危险和调和主义避而不谈的决定所作的决议。事情的起因是,有几篇文章《劳动报》拒绝刊载。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决定指出,一篇拒绝刊载说是因为夸大了工会工作的不足,另一篇则“纯粹是由于业务上的原因,不是政治原因”。西尔伯曼为共青团建立10周年写的文章有改动,即取消了“在形式和实质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这一段(在B. B. 洛米纳泽下面的发言中援引了这段话)。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的决定对《劳动报》的立场表示支持,指出该报过去和现在始终与各种偏离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路线的行为,包括“右倾危险”和“调和主义”进行斗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委员会认为对《劳动报》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 205 《社会主义通报》——Ю. 马尔托夫1932年在柏林创办的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杂志。后在巴黎(1933—1940年)和纽约(1940—1963年)出版。
- 206 见《右派反对派》,载于《社会主义通报》1928年10月28日,第2页。

207 见本书第1卷。

208 《1928年的农民行动》(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总结材料整理)。

月份	大规模行动	恐怖事件	发传单
一月	10次	21起	70份
二月	10次	48起	90份
三月	11次	23起	72份
四月	36次	31起	66份
五月	185次	51起	64份
六月	225次	43起	74份
七月	93次	77起	61份
八月	31次	76起	46份
九月	25次	103起	31份
十月	25次	135起	58份
十一月	33次	216起	105份
十二月	25次	203起	108份
全年总计	709次	1 027起	845份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63页)

209 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托拉斯)成立于1918年,直到1930年为止,该公司联合了索尔莫沃工厂、科洛姆纳工厂、布良斯克工厂、特维尔工厂、梅季希工厂、托米林工厂、制动器工厂、奥卡河流域山区的六个工厂、雷宾斯克工厂和莫斯科工具厂。

210 见注88。

211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445页。

212 同上书,第456页。

213 同上书,第457页。

214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规定:“通过减少、隐瞒或不向市场投放商品的手段任意提高商品价格——剥夺一年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不没收财产。如确认是商人暗中勾结——剥夺三年自由并没收财产”(《俄罗斯联邦刑法》,莫斯科1929年版,第64—65页)。1928年1月,斯大林提议对“粮食持有者”,其中包括拒绝按照不利于农民的“固定价格”即过低的价格向收购单位出售粮食的农民生产者使用该条款。

215 路标转换派——20世纪2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侨居国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出版的机关刊物是《路标转换》杂志(1921—1922年,巴黎)。路标转换派的基本思想是,坚信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俄国民族政权”,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民族的现象”,只有拥有巨大国际影响的布尔什维克才能恢复俄国的强国地位(见M.阿古尔斯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巴黎1980年版)。

2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41页。

- 217 见注 204。
- 218 见注 102。
- 219 M. H. 利亚多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九月全会上就向中农让步的必要性问题作了简短的发言。1928年9月28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工人莫斯科报》上对他的发言进行了批评,认为他的发言发展了“让步论”。利亚多夫以一封“致编辑部的信”答复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文章,这封信刊登在10月2日的《工人莫斯科报》上。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结论,并援引了莫洛托夫的文章《七月全会的结论》,这篇文章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是向中农的实际让步。于是,10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莫洛托夫《承认错误比错上加错好》一文,莫洛托夫在文章中谴责了利亚多夫的观点,反对“不断让步论”并指出,说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指的只能是在个别方面向农民群众作出让步,因为这样做会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把这件事完全归结为让步,这就意味着陷入了危险的、机会主义性质的片面性”。
- 220 作者改为:“富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5号案卷,第5张)。
- 221 速记记录中作者改为:“1/3(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5号案卷,第125张)。”
- 222 古比雪夫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时指出:“李可夫同志说,所有五年计划的缺点是,它们考虑的是个别地区的发展,他说得完全正确。无论如何都要消除这个缺点……我个人认为,现在可以明确地指出一点:在制定我国的五年计划和确立各地区间的相互关系时,投入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资金应向东部适当转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有一切理由希望这个五年计划推动这些地区尤其是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发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953—954页)。
- 223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卷,第431页。
- 224 见注 181。
- 225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44页。
- 226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莫斯科1959年版,第406—407页。
- 227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31页。
- 228 书名不准确。名为《1905年》的Л. Д. 托洛茨基文章和讲话集叙述了他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的活动,1922年出版。
- 229 Л. Д. 托洛茨基《论俄国革命史》,莫斯科1990年版,第148页。
- 230 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24页。
- 231 指在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和约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布列斯特和约)。另

见注 245。

- 232 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部分水兵于 1921 年 2 月 28 日—3 月 18 日举行了武装起义。
- 233 1924 年 8 月,西格鲁吉亚、古里亚和明格列里亚爆发了农民起义。起因是教堂被关闭,党和苏维埃机构为所欲为。报刊上说起义是孟什维克策划和挑唆的。起义遭到军事镇压。
- 234 在就工业化道路问题争论时,以 П. Г. 沙宁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向农业投资,作为在国外购买设备的外汇来源。
- 235 1925 年 B. C. 博古舍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称富农是“稻草人”。指责多数政治局委员有“富农倾向”的反对派对这篇文章大加利用。
- 236 1928 年 8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农业税问题,莫洛托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决定:“成立由卡冈诺维奇同志、库比亚克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被弗鲁姆金同志所取代)和列别德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在下届政治局成立前制定一系列正确实施农业税的党的文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2 号案卷,第 2 张)。在 9 月 6 日召开的会议上政治局决定:“(1)将委员会为地方制定的有关征收农业税的指示草案作为基础;(2)责成卡冈诺维奇同志、弗鲁姆金同志和鲁祖塔克同志在此前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进行修改,并在 3 天内将该草案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公布,但不在报刊上发表;(3)责成中央书记处以中央的名义就党的路线即最严格地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征收农业税的指示下达一项简要补充指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3 号目录,703 号案卷,第 1—2 张)。1928 年 9 月 1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中的缺点的决定(《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 1 卷,第 390—392 页)。
- 237 1928 年 10 月 18 日政治局通过的联共(布)中央《告联共(布)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指出:“以莫斯科委员会为首的莫斯科组织不论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还是现在,始终完全站在党的路线上,与各种歪曲全党路线的现象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党的工作者手册》,第 1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0 年版,第 309—310 页)
- 238 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九月联席会议结束后,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委书记 M. A. 佩尼科夫在区委会议上提出,要把布哈林《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佩尼科夫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会议上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后来他承认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见《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记录(1928 年 10 月 18—19 日)》,莫斯科 1928 年版,第 43—46 页)。
- 239 见注 236。
- 240 见注 29。
- 241 见注 26。

- 242 见本书第2卷。
- 243 1928年10月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主要工业地区的供应》的社论。
- 244 B. И. 列宁关于辞职的下述声明有文献为证。1903年11月1日,列宁就党的机关报增补孟什维克编辑部成员一事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递交声明,要求辞去党的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职务,他同时还指出,他决不拒绝用自己的工作给新的党中央机关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60页)
- 245 《党的工作者手册》,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310页。
- 24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9号案卷,第3、16张。
- 247 见注93。
- 248 在速记记录中作者改为:“其他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5号案卷,第243张)。
- 249 1927年10月13日,政治局批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起草的宣言草案,并提出修改意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5号案卷,第1—2、15—16、24—40张)。1927年10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会议通过了题为《告苏联全体工人、劳动农民和红军战士书。告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书》的宣言。宣言提出,在近年内让产业工人由八小时工作制改为七小时工作制,工资不减。宣言要求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在一年之内开始逐步落实这一决定。1927年10月16日的《真理报》刊登了这一宣言。
- 250 指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有关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的部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421—423页)。
- 251 指1928年4月23日由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15号案卷,第2、21—25张)、1928年5月17日经政治局批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7号案卷,第5、13—17张)的决定——《对部分纺织企业改行七小时工作制情况的初步总结》。该决定载于1928年5月20日《真理报》。
- 252 劳动集体与企业管理机构重新签订合同的运动是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指示开展起来的,这个指示强调,必须“引导工人群众去关注实现生产合理化、降低附加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签订集体合同运动的出发点应当是“完成将工业品的数量增加20%并将成本降低7%的计划任务”(1928年11月4日《真理报》)。
- 253 在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中为“6%”(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7号案卷,第31张)。
- 254 苏联人民委员会1928年1月17日通过的《关于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准备工作》的决定指出:“为落实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10月15日宣言第一章的内容,苏联人民委

委员会决定,由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27 年 11 月 1 日的决定组建的政府委员会负责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准备工作。”责成该政府委员会在 1928 年 7 月 1 日前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提交拟在 1928—1929 年度改行七小时工作制的企业的计划。在这一计划未获批准前,个别企业可作为特例改行七小时工作制,但必须得到政府委员会批准(1928 年 1 月 20 日《真理报》)。另见本卷注 249。

- 255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1928 年)作出的《沙赫特事件与克服经济建设缺点的实际任务》的决议中关于改善顿巴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部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42—443 页)。
- 256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8 月 24 日的会议批准了关于成立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决定草案,该草案由特别协调委员会以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起草,并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中央劳动研究所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下属机构。该研究所的任务是,探索、研究组织劳动和生产的先进形式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工业,培养生产骨干,对机械设备和工具进行技术改造,以及统一协调各共和国的所有其他劳动研究机构的活动(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19 号全宗,3 号目录,244 号案卷,第 9、264—278 张)。中央劳动研究所的劳动力培训办法是根据生产作业的分工制定的,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熟练工人。
- 257 1928 年,共青团对中央劳动研究所制定的劳动力培训方针提出反对意见,一些经济活动家和工会活动家却表示支持。中央劳动研究所主张进行单纯的职业培训。共青团的领导人则主张按照工厂学徒学校的大纲,把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培训结合起来。《共青团真理报》曾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央劳动研究所制定的工人培训方法。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 258 指人民委员会 191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通过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法令中写道:“禁止安排未满 16 岁的工人从事夜间劳动。不得雇用未满 14 岁的孩子做工,未满 18 岁的工人一昼夜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法令汇编》第 1 号第 10 条)
- 259 参看注 251。
- 260 参看注 254。
- 261 指分发给全会参加者的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北高加索农业状况和农村工作的材料》。
- 262 可能是指在北高加索边疆区举行的增产大会:第一次边疆区大会(1928 年 8 月 25 日),顿河区大会和库班州大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 号全宗,21 号目录,3367 号案卷,第 54 张和 3368 号案卷,第 56 张)。
- 263 参看注 63。
- 264 第一批工业化债券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发行,数额为 2 亿卢布。债券认购工作从

- 1927年10月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由此开始每年都普遍发行大量公债,用于为工业化建设集资。1928年7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发放第二批苏联国民经济工业化国内债券》的决定,债券数额为5亿卢布,期限为10年(1928年7月26日《真理报》)。自1928年9月开始发售(1928年9月1日《真理报》)。
- 265 村苏维埃所属生产会议在1928年底—1929年初开始成立。农村生产会议负责讨论土地规划、轮作制、集体化和生产合作化等问题,以及对雇农、贫农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提供帮助的问题。生产会议中有许多经选举产生的、全权处理农艺事务的代表,他们负责监督农艺措施的实行情况。
- 266 参看本书第2卷。
- 267 这里指的是巴克桑专区基兹布伦村居民在卡巴尔达的暴动。这次暴动的起因是,居民得知6月份要在计划之外再上交4000普特粮食。最贫苦阶层的愤怒情绪受到了挑唆人们公开对抗当局的一帮富裕农民和过去的封建大公的鼓动。在暴动过程中,巴克桑专区执行委员会被破坏,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警察被殴打,军事部门遭到进攻,武器被抢走。1928年6月14—15日进行了清剿暴动者的行动,结果有160名“最积极的暴动参加者和恶意挑唆者”被逮捕。暴动者们曾试图占领巴克桑要塞,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当地分局的工作人员隐蔽在里面,在枪战中有8人被打死,20人受伤(《苏维埃农村的悲剧……》第1卷,第790页)。
- 268 全会资料中有经过修改和未经修改的Я. А. 雅科夫列夫的发言全文。对比这两个文本可以看出,作者做了很大改动。
- 269 指的是1928年11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各自治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第二次会议。
- 270 速记记录中的数字有误,应为5.009亿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7号案卷,第2分册,第37张)。
- 271 见注151。
- 272 在修改过的速记记录中为“从1914年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7号案卷,第50张)。
- 273 1918年(另一说法是1919年)建立了肥料科学研究所,其研究范围是无机肥料的生产和使用。
- 274 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28年4月28日《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化学化的措施》的决定,成立了苏联国民经济化学化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合理使用和扩大国内的原料基地,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卫生保健和其他领域推广现代化学成果;组织农用肥料工业;建立钾工业等。计划吸收工厂、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所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建议对现有化学教育组织进行改组(《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1919—1967年)》第1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720—724页)。

- 275 全苏“牧羊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6年,负责组织养羊地区的国营农场和种畜场。
- 276 在1929年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决议中说,把农业生产的领导集中于一个全苏联的中央机关,已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4卷第102页)。1929年12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
- 277 在经过作者修改的速记记录中是“4.48616亿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89号案卷,第129张)。
- 278 乌克兰化——19世纪20年代在乌克兰推行的鼓励在国家机关中建立和实行用乌克兰语处理公文的政策。例如,1928年5月24日政治局批准了下述决定:
- (1)承认乌克兰政府关于苏联国家和经济机关职员必须学习乌克兰语以及苏联机关必须使用乌克兰语同所有乌克兰机关、单位和乌克兰居民进行往来通信的决定是正确的。
- (2)鉴于最近在挑选掌握乌克兰语的高水平领导干部方面遇到困难,政治局认为必须延长在苏联机关内部公文处理中推行乌克兰语的期限,并建议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在已颁布的乌克兰化法令的基础上颁布相应指令。
- (3)认为把必须学习乌克兰语的法律解释为不允许没有掌握乌克兰语的人任职是不正确的。
- (4)认为有关红军的现有规定应全部保留(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88号案卷,第3张)。
- 279 乌克兰共产党是在1920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乌共纲领。纲领的一般理论部分同俄共(布)纲领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民族问题上有很大分歧。1924年乌克兰共产党试图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研究这一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1924年12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拒绝接纳乌克兰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成员,理由是“每个国家都应该只有一个共产党”,并确认“在乌克兰,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党是乌共(布)”。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散作为单独一个党的乌克兰共产党,责成乌共中央委员同志们贯彻这一决定,保证被解散的乌克兰共产党党员能够加入乌共(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495号全宗,2号目录,33a号案卷,第201张)。
- 28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5页。
- 281 见注265。
- 282 见本书第2卷。
- 283 见注16。
- 284 见注92。
- 285 根据联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0月10日《关于党在农村贫农中的工作》的决定和劳

动国防委员会 1925 年 10 月 23 日《关于从中央农业银行资金中拨出专项基金为贫农提供优惠贷款》的决定,建立了贫农贷款基金。苏联人民委员会于 1926 年 3 月 17 日批准了全苏贫农贷款基金条例(《苏联法令汇编》1926 年第 27 期第 171 页)。该基金由中央农业银行设立,其用途是为已参加合作社的农村贫农和单个贫农户提供优惠贷款,基金由专门预算拨款、中央农业银行的利润提成以及其他来源构成。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 1926 年 10 月 29 日《关于为农村贫农提供贷款的基金》的决定,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所有农业银行也都设立了贷款基金(《苏联法令汇编》1926 年第 72 期第 568 页)。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 年 7 月联席全会《关于 1927—1928 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的决议,规定从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中增加贫农救助基金。1927 年 9 月 30 日颁布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合作社股金增加情况下的贫农合作化》的指示。贫农合作化基金应当靠基层合作社及其联社的利润提成、地方预算拨款和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的资金来补充(《1927 年党的工作者手册》第 6 卷第 1 册,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版,第 413、659 页)。

286 参看本书第 2 卷。

2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78 页。

288 见注 276。

289 《1928—1929 年度统一农业税条例》第 27 条规定:“为了使统一农业税的税收与农业的实际收益率相符,除了为个体农户规定他们的按标准计算的农业收入(即作物栽培、草地经营、牲畜饲养等专门行业的收入)外,还要根据他们的各种来源的课税收入总额规定附加收入的百分比。

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或受其委托的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为每个省和专区规定:

(1)单个农户的包括附加收入在内的课税总(各种来源的)收入的不同数额,但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低于 400 卢布,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三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低于 350 卢布,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得低于 300 卢布。

(2)根据农户课税收入总额计算的附加收入额,但不得低于农户的按标准计算的农业收入的 5%,也不得高于 25%。

注: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有权为课税总收入平均每口人不超过 50 卢布的农户,以及因没有自己的畜力和农具而需要租借畜力和农具的农户,规定本条以外的附加收入额”(《苏联法令汇编》1928 年第 24 期,第 212 页)。

290 《1928—1929 年度统一农业税》第 28 条规定:“对于收入大大高于当地广大农户,而且其收入属于非劳动所得的个体农户,乡和区的征税委员会不按照标准,而按照所掌握的总的情况,根据这些个体农户的实际收入计算其各种来源的课税收入总额(《苏联法令汇编》1928 年第 24 期,第 212 页)。

- 291 关于向北高加索运送拖拉机的问题曾多次提交政治局研究,但迟迟未解决。1928年2月9日决定将该问题交粮食收购工作委员会研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70号案卷,第1张;671号案卷,第2张;672号案卷,第4张)。
- 292 指 A. П. 斯米尔诺夫。
- 293 莫洛托夫作过初步修改的报告的速记记录没有找到。保存下来的只有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和两份用打字机打印的报告。留在 B. M. 莫洛托夫个人卷宗中的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39号案卷)经过莫洛托夫本人的再次修改并作过文字修改。另一份报告保存在全会材料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1号案卷),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将作者的修改加了进去。某些页被翻印。没有作文字修改。比较报告的三个文本可以看出,报告在修辞方面经过相当的加工整理,但其思想内容没有改变。
- 29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00页。
- 295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党的建设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在最近一年内使一线工人在党内占一半以上”。(《苏共……决议汇编》,第3卷,第212页)
- 296 指1927年10月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336号案卷,第3,151—168张)、1927年10月13日政治局经修改后批准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5号案卷,第3,17—20张)《关于根据调查结果调整党的发展》的决定。决定对1925年—1927年7月吸收党员的情况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要在两年内使一线工人的比重达到全体党员人数一半的任务。
- 297 1924年1月29、31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吸收一线工人入党》的决定以及《告工人和女工书》。全会决定只吸收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入党。这一运动原定开展3个月,后又延长。“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实际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结束。这期间共有350 000人提出入党申请,241 600名工人入党(《苏联共产党历史》第4卷第1册,莫斯科1970年版,第316—318页)。1928年1月22日《真理报》刊登的Э. 斯米滕的文章指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期间共吸收203 000人入党,其中190 000人为工业工人和铁路工人。
- 298 1924年9月23日颁布了《生产部门生产会议条例》(《党务工作者手册》,第5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572—573页)。条例指出,生产会议是工会群众生产工作的基本形式之一。生产会议的职能包括:监督生产计划的完成,防止窝工及不合格产品的出现,开展并加强社会主义竞赛,收集和讨论工人关于改善生产组织、加强劳动保护的建 议等。
- 299 女工和女农民代表会议是1919—1933年党开展妇女群众工作的一种基本形式。代表会议由企业女工和农村女农民选出的任期一年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在党组织的指导

下进行,党组织负责挑选在妇女中直接开展工作和主持代表会议的妇女基层干部。

- 300 指各级党组织根据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年11月4日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339号案卷,第12—13张)、并由政治局批准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59号案卷,第3张)《关于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广泛吸收工人和女工入党》的决定而开展的运动。运动命名为“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吸收党员”。1928年1月19日政治局决定:“建议各级党组织于今年2月1日前结束‘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吸收党员’,转入吸收一线工人入党的正常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669号案卷,第7张)这期间共有153590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08070人入党,其中92.8%为一线工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609页)。
- 301 这是编委会修改的数字。B. M. 莫洛托夫写的数字是40—45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1号案卷,第31张)。
- 302 在未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中列举的数字为3494个党员农户(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号目录,391号案卷,第31张)。
- 303 “伊布赖伊莫夫事件”——韦利·伊布赖伊莫夫(易卜拉欣莫夫)——1918年加入联共(布),1917年后在克里米亚担任选任的职位,1924年起任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院候补委员。1927年3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向伊布赖伊莫夫提出警告,谴责其“不正确执行联共(布)专区委员会的指示,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犹太移民问题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及以醉态出现在公共场所”,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三人小组谴责他免除对众所周知的罪犯的处罚。6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就伊布赖伊莫夫被控保护富农分子一案进行了审理。1928年1月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了伊布赖伊莫夫案件委员会。1月2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决定将伊布赖伊莫夫开除出党,之后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相关机构逮捕。1928年3月,B. P. 明仁斯基就伊布赖伊莫夫事件追查终结向政治局作了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589号全宗,2号目录,5250号案卷)。
- 对伊布赖伊莫夫的审讯记录被分送给苏联领导人(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P-5446号全宗,55号目录,1744号案卷,第1—6张)。1928年4月,俄联邦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辛菲罗波尔审理了伊布赖伊莫夫被控杀害证人一案,该证人曾威胁说要揭发伊布赖伊莫夫与前白卫军及匪徒的关系。法庭判处伊布赖伊莫夫死刑。
- 304 《贫苦农民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取代了《农村贫农报》、《农村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1931年2月1日《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
- 305 见本书第2卷。
- 306 见注298。
- 307 生产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机构。根据规定,生产委员会负责筹备和召开生产会议,

将生产会议的决定提交行政部门,监督生产会议决定的执行,收集生产性建议,参与技术会议,协助推荐工人从事行政—经济工作(《党务工作者手册》,第5分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573页)。

308 指1928年11月21日《真理报》刊登的E. F. 斯米滕的文章《论党的发展问题》。

309 见注214。

310 指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见注133)。

311 有关巴尔沙伊事件的报道刊登在1928年11月16、18、20、21和22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剪报保存在B. M. 莫洛托夫卷宗中(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82号全宗,2号目录,40号案卷,第68、69张)。

312 在1927年11月9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凯达克区党代会上没有允许X. F. 拉柯夫斯基作有关乌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副报告。

313 见注130。

314 指所谓的“阿尔乔莫夫斯克事件”。1928年2月2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听取了联共(布)阿尔乔莫夫斯克区委会代表拉维奇的报告以及联共(布)中央责任视察员梅什金的副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00号案卷,第1、8—114张)。3月5日中央组织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区委会与工人群众联系不够……区委会与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中的不良现象(法庭调查机构、民警局的腐化等)斗争不力,领导层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与错误”。区委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组织局重申了乌共(布)中央1928年2月11日关于解除阿尔乔莫夫斯克区委书记米希延科职务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02号案卷,第1、14—21张)。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刊登在1928年3月7日的《真理报》上。

315 1928年1月11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会议决定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洛卡茨科夫调查索契组织的情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613号全宗,1号目录,83号案卷,第68张)。1928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洛卡茨科夫“关于索契地区调查结果”的报告。北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新罗西斯克区委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通过调查揭露出各种违反法纪、利用职权谋私利、经营不善、“生活腐化”等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了联共(布)北高加索监察委员会和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开除一些地区领导人党籍的决定并建议:“鉴于索契组织领导核心的软弱以及许多人的违法行为和反共产主义行为对党和政府威信破坏……认为有必要派坚强果断的党员来主持日常领导工作”。洛卡茨科夫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提出的结论及建议被采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19号案卷,第21—27张)。

316 1929年4月23—29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进行全面清党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全面清党(第一次是在1921年,见注329)。1929—1930年对联共(布)党员及预备党员进行了清理和审查,10%的党员被开除(《联共(布)第十

- 六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莫斯科1962年版,第821页)。
- 317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第230页。
- 318 1923年10月一批党的著名活动家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谴责政治局多数人的政策,要求召开有党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对局势的看法”与“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看法”不同的人参加的中央委员会议。递交《46人声明》是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46人声明》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6期,第189—193页)。
- 319 引证不准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9—50页。
- 320 见注145。
- 321 1919年8月根据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倡议开展了吸收党员周活动,在此期间有数千名工人加入了俄共(布)。在莫斯科也开展了吸收党员周活动。俄共(布)中央支持这一倡议,并于9月30日向所有组织发出号召,要求加强吸收新党员,将吸收党员周活动推向全国,而且只接受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暂时不吸收其余人员入党。在吸收党员周期间有20多万人加入俄共(布),近7万人参加了红军。
- 322 见注297。
- 323 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批群众被吸收入党。1925年1—2月有75 000名工人和女工入党(《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1627页)。
- 324 见注300。
- 325 联共(布)中央全会于1928年4月和7月提出了根本改善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干部的任务。详见本书第1、2卷。
- 326 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科学院(1925年改称苏联科学院)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加剧。当时决定于1928年秋选举新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为此联共(布)中央提出了一份党员科学家名单(其中包括布哈林)。为了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当局加紧向院士们施加压力。1928年8月从莫斯科向列宁格勒(科学院当时所在地)派出了选举专门委员会。然而在1929年1月表决时,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表示不接受某些共产党员候选人的候选人资格。后再次进行表决。冲突的结果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伪造了“科学院事件”。(见佩尔切诺克《“伟大转折”中的科学院》丛书,第1卷,莫斯科1990年版,第163—238页)
- 327 见注315。
- 328 见注130。
- 329 1921年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进行了清党。代表大会在《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中强调必须“将党的政策杠杆转向吸收工人入党和清除党内非共产主义分子方面”(《苏共……决议汇编》第2卷,第327—328页)。1921年6月2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查、重新审理和清党问题》的决定(1921年6月30日《真理报》),决定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党员进行审查”。审查日期定为8月1日至10月1日。自7月1日起,除工人及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以外,暂时停止吸收

所有人入党。为组织清理成立了中央审查党员委员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清理工作进行了总结。经过清理在俄联邦范围内(不包括突厥斯坦、阿斯特拉罕省和布良斯克省)被开除出俄共(布)的有136 386人(《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第821—822页)。

- 330 指联共(布)中央《就开展自我批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详见注191)。
- 331 A. H. 李可夫1922—1930年任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 33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9页。
- 333 引证不准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30—231页。
- 334 见注102。
- 335 指的是B. M. 莫洛托夫对H. A. 乌格拉诺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五次联席全会上作的《关于莫斯科组织近期任务》的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关于这些修改意见乌格拉诺夫在1928年10月18日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上作《关于莫斯科组织的状况》的报告时谈到过。修改意见共有9条。(《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10—11页)
- 336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五次联席全会—1928年9月11—12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85页。
- 337 在1928年9月29日《真理报》刊登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积极分子会议就区委书记留京关于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九月联席全会总结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根本没提对所谓“调和主义”的态度。10月8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讨论了关于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组织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斯大林指责留京没有同“调和主义”进行斗争,没有坚持中央的路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66号案卷,第80张)。10月15日党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一些成员向莫斯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指责留京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第二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联席会议讨论了莫斯科组织的状况,通过了解除留京在莫斯科组织中的工作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9号案卷,第17—18张)。
- 338 见《党务工作者手册》第7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310页。
- 339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44页。
- 340 见《党务工作者手册》,第7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310页。
- 341 德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于1928年9月解除了台尔曼的党的领导职务,理由是台尔曼隐瞒其亲信之一盗用党内资金的事实。这一决定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取消,被斯大林看作是布哈林的国外同盟者转入了反攻。1928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最终确定了根除德国共产党内“右倾”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行导致了以布兰德勒和塔

- 尔海默为首的另一个共产党在德国的产生。
- 342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全会—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43页。
- 343 1926年1月所谓的“新反对派”(Л. Д. 托洛茨基、Г. Е. 季诺维也夫、Л. Б. 加米涅夫及其拥护者)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А. А. 安德烈耶夫、К. Е. 伏罗希洛夫、М. И. 加里宁、С. М. 基洛夫、В. М. 莫洛托夫、Г. И. 彼得罗夫斯基、М. П. 托姆斯基、В. В. 施米特等一批中央委员来到反对派势力特别强大的列宁格勒。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列宁格勒党的机关领导成员进行了清理。基洛夫取代季诺维也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省委书记。
- 344 《党务工作者手册》，第7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309—310页。
- 345 1921年一批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因反对加快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结为联邦的进程而被指责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详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第76—84页；《没有举行的庆典》，А. П. 涅纳罗科夫等编，莫斯科1992年版)。
- 346 “木沙瓦特”(“平等”)——1911—1920年间的阿塞拜疆政党。在土耳其以及后来的英国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从1918年9月至1920年4月在阿塞拜疆执政。
- 347 达什纳克党人——1890年在梯弗利斯成立的亚美尼亚革命联盟达什纳克楚纯党的成员。达什纳克党人的主要纲领和政治目标是使亚美尼亚人摆脱土耳其的压迫，建立独立的国家。纲领的土地部分规定将土地交给农业村社。从1918年5月—1920年达什纳克楚纯党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执政党。
- 34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4页。
- 349 同上书，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64页。
- 350 《工人俱乐部》杂志——“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月刊，1924—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1928年在出版了第11—12期合刊后与《俱乐部》杂志合并，1929年改名为《革命俱乐部》。
- 351 指的是“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吸收党员”的运动。见注300。
- 352 《瞭望塔报》——阿塞拜疆共产党(布)巴库委员会机关报，1928年3月起作为群众性工人报纸出版。
- 353 1928年5月15日开始对联共(布)黑海区组织进行审查(《真理报》1928年6月9日)。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于1928年10月29日就《关于黑海组织审查结果》的报告通过决议，决议指出，通过审查揭露出“腐化”分子，揭露出经营不善、侵吞公物、党组织特别是苏维埃机关混入“异己分子”、完全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现象。
- 1928年11月27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会议通过决定：
- “(1)认为对黑海组织的审查是充分的……
- (2)同意联共(布)北高加索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黑海区委员会领导的评价。”

原黑海区委员会领导人一案交由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审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21号目录,3368号案卷,第107—109张;613号全宗,1号目录,86号案卷,第73张)。

354 见注315。

355 E. M. 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十月革命与我们的党》刊登在1928年11月16日《真理报》上。

356 《共青团真理报》与《劳动报》之间的争论是在全苏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展开的。《共青团真理报》(1928年11月6、11、14、29日和12月9日)刊登文章和简讯,对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机关报《劳动报》在筹备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方面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进行了批评;强调指出了工会工作中的其他缺点,例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维护劳动群众切身利益和需求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劳动报》(1928年11月10、13、21日)指责《共青团真理报》蓄意破坏工会领导的威信,损害工会的声誉。

《真理报》于1928年12月12日发表了题为《不能容忍工会工作中不问政治的倾向》的文章,维护《共青团真理报》的立场。

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一方面,工会在青年中的工作薄弱,另一方面,在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方面个别共青团组织将自己与工会对立起来,代表大会号召共青团与工会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357 见全苏共青团中央1928年十月全会决议《团组织领导的任务与自我批评》(《党务工作者手册》第7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第500页)。

358 第一届全俄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

359 看来是指巴尔沙伊事件。参看注311。

360 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第一所培养党和苏维埃干部的高级党校。

361 见本书第1卷。

362 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审议了关于顿巴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443页)

363 埃韦特集团——指德国共产党最高权力集团中反对将“右派”机械地开除出党、赞成开展党内争论的“调和主义”派别。1928年12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对“调和派”进行了谴责,随后,布哈林的战友阿图尔·埃韦特被解除了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被派往拉丁美洲任共产国际代表。

364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在1926—1930年间曾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365 1929年1月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执行中央十一月全会(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的决议的具体措施和就此改进党在企业中的工作》的决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113号目录,691号案卷,第8—15张)。

366 参看注316。

- 367 1928年5月8—16日举行的全苏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在全联盟开展扫除文盲的“文教运动”。当时成立了“扫盲突击队”、扫盲学校,等等。
- 36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 369 同上书,第79—80页。
- 370 同上书,第202页。
- 371 同上书,第377页。
- 372 指联共(布)中央《就开展自我批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详见注191)。
- 373 指联共(布)中央1928年9月26日的通告信。通告信中写道:“鉴于各级党组织对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关注逐渐减弱,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卷土重来,中央决定:
1. 建议各级党组织加强同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采用的方法包括:经常向某些同志,尤其是工人单独讲明有关问题;在会上对一切反党言论给予坚决回击,但要把这种争论确实限制在最低限度,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为此,各级党委应当及时掌握这方面的情况,考虑到这些情况,等等。
 2. 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或《真理报》上驳斥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文件。
 3. 在个别情况下,允许将反党积极分子从大企业调往较小的企业或机关。不得把这样的人调入红军队伍。
 4. 对于地下反党和反苏维埃集团,尤其是在工人中进行分裂活动的集团,必须采取坚决的革命镇压措施。”(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17号全宗,3号目录,706号案卷,第11张)
- 374 《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第六次联席会议—1928年10月18—19日》,莫斯科1928年版,第114页。
- 375 指И.И.施瓦茨。

人物简介*

阿尔秋希娜, А. В. (Артюхина А. В., 1889—1969)——1910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工农妇女工作部部长,兼任《女工》杂志编辑。

阿库洛夫, И. А. (Акулов И. А., 1888—1937)——1907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 年起任全乌克兰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 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和主席团成员。

阿利耶夫, Т. М. (Алиев Т. М., 1896—1937)——1920 年入党。1924—1929 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

阿斯特罗夫, В. Н. (Астров В. Н., 1898—1995)——1917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编委,1929—1931 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的高等院校任教。

埃赫, Р. И. (Эйхе Р. И., 1890—1940)——1905 年入党。1925—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 年任西伯利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7 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和新西伯利亚市委第一书记。

埃斯蒙特, Н. Б. (Эйсмонт Н. Б., 1891—1935)——1907 年入党。1926 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商业人民委员和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

埃韦特, 阿图尔(Эверт Артур, 1890—1959)——1919 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 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1930 年任国会议员,1928—1935 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安采洛维奇, Н. М. (Анцелович Н. М., 1888—1952)——1905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3—1930 年任农业和林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

* 简介主要引自己发表的年谱材料。出席 1928—1929 年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大多数人均死于恐怖年代。——俄文编者注

- 安德烈耶夫, А. А. (Андреев А. А., 1895—1971)——1914年入党。1922—196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2—1928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
- 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 Г. К.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Серго) Г. К.,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34年起再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 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奥拉赫拉什维利, М. Д.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 М. Д., 1881—1937)——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奥萨德奇, П. С. (Осадчий П. С., 1866—1943)——电工技术专家, 教授。1921年起任国家计委副主席, 1922年起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 主持教学工作。
- 奥新斯基, Н. (奥博连斯基, В. В.) (Осинский Н. (Оболенский В. В.), 1887—1938)——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 1928—1929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会主席, 1929—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全苏汽车拖拉机工业联合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
- 鲍曼, К. Я. (Бауман К. Я., 1892—1937)——1907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1932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部部长, 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28年11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二书记, 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 彼得罗夫斯基, Г. И.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1878—1958)——1897年入党。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2年起还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 别连基, М. Н. (Беленький М. Н., 1890—1938)——1920年入党。1926—1928年任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理事会副主席和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主席团成员, 1928—1930年任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理事会主席。

- 波德沃伊斯基, Н. И. (Подвойский Н. И., 1880—1948)——1901年入党。1924—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在中央社会保险局工作。
- 波格丹诺夫, П. А. (Богданов П. А., 1882—1938)——1905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9年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 波隆斯基, В. И. (Полонский В. И., 1893—1937)——1912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委书记, 1928年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 波斯特舍夫, П. П. (Постышев П. П., 1887—1939)——1904年入党。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专区委员会书记和市委书记, 同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 波泽恩, Б. П. (Позерн Б. П., 1882—1939)——1902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任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校长, 1929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和部长。
- 博古舍夫斯基, В. С. (Богушевский В. С., 1895—1939)——1917年入党。1925—1933年先后在《商业消息报》和《工商报》工作。
- 布勃诺夫, А. С. (Бубнов А. С., 1884—1938)——190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1934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红星报》主编。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布哈林, Н. И. (Бухарин Н. И., 1888—1938)——1906年入党。191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任政治局委员。1918—1929年任《真理报》责任编辑, 1924—1929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1929年起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部门负责人, 1919—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 布兰德勒, 亨利希 (Брандлер Генрих, 1881—1967)——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1929年为联共(布)党员,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民国际的工作人员。1928年组建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 1929年被开除出联共(布)。
- 布留哈诺夫, Н. П. (Брюханов Н. П., 1878—1938)——1902年入党。1927—

- 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
- 布申斯基, В. П. (Бушинский В. П., 1885—1960)——土壤学家。1922—1938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土壤学教研室教授。
- 采尔明什, 古戈(Целминыш Гуго, 1877—?)——1928—1931年任拉脱维亚总理和外交部长。
- 达林(莱温), Д. Ю. (Далин (Левин) Д. Ю., 1889—1962)——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起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21年起侨居国外,任《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编委。
- 德波林(越飞), А. М. (Деборин(Иоффе) А. М., 1881—1963)——1928年入党。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26—1930年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
-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М. И.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 И., 1865—1919)——俄国学者,经济学家。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后为立宪民主党党员。1917年底—1918年初任乌克兰中央拉达的部长,以后没有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曾任基辅大学教授。
- 多加多夫, А. И. (Догодов А. И.,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书记。
- 菲加特纳, Ю. П. (Фигатнер Ю. П., 1889—1937)——1903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苏维埃商业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费斯曼, А. Е. (Ферсман А. Е., 1883—1945)——地球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 弗拉基米尔斯斯基, М. Ф.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М. Ф., 1874—1951)——1895年入党。1927年起任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主席。
- 弗鲁姆金, М. И. (Фрумкин М. И., 1878—1938)——1898年入党。1922—1929年任苏联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以及副财政人民委员,1929—1930年任全苏鱼品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
- 伏龙芝(米哈伊洛夫), М. В. (Фрунзе (Михайлов) М. В., 1885—1925)——1904年入党。1924—192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

- 员会主席和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
- 伏罗希洛夫, 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1881—1969)——1903 年入党。1926—1960 年任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1934 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 福特, 亨利(Форд Генри, 1863—1947)——美国企业家。美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
- 高尔察克, А. В. (Колчак А. В., 1873—1920)——俄国军事长官, 海军上将, 极地研究者, 水文学家。国内战争时期是白卫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根据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被处决。
- 戈尔杰耶夫, Г. С. (Гордеев Г. С., 1896—1972)——1916 年入党。1925 年起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
- 戈洛谢金, Ф. И. (Голощекин Ф. И., 1876—1941)——1903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3 年任联共(布)哈萨克边疆区委书记。
- 格里亚斯基, Ф. П. (Грядинский Ф. П., 1893—1938)——1912 年入党。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28 年为贸易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州特派员, 1928—1929 年任中部黑土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 格林科, Г. Ф. (Гринько Г. Ф., 1890—1938)——1919 年入党。1926—1929 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
- 格鲁姆-格尔日迈洛, В. Е.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В. Е., 1864—1928)——冶金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7)。
- 古比雪夫, В. В. (Куйбышев В. В., 1888—1935)——1904 年入党。1927—1935 年任政治局委员。1926—1930 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古谢夫, С. И. (德拉布金, Я. Д.) (Гусев С. И. (Драбкин Я. Д.), 1874—1933)——1896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1929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哈里曼, У. Я. (Гарриман У. Я., 1891—1986)——美国政治和国务活动家, 商人。1920 年获得奇阿图拉锰矿的租让合同。
- 哈塔耶维奇, М. М. (Хатаевич М. М., 1893—1937)——1913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5—1928 年任联共(布)鞑靼州委书记, 1928—1930 年任联共(布)中伏尔加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 基尔基日, К. О. (Киркиж К. О., 1888—1932)——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先后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苏联商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基洛夫, С. М. (Киров С. М., 1886—1934)——1904年入党。1923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 季诺维也夫(拉多梅斯尔斯基), Г. Е. (Зиновьев (Радомысльский) Г. Е.,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2—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10月、1921—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19—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起任喀山大学校长。
- 加里宁, М. И. (Калинин М. И., 1875—1946)——1898年入党。191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政治局委员。1919—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于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加利耶娃, М. И. (Гальева М. И., 1884—?)——1918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是莫斯科州奥列霍沃-祖耶沃第一纺织厂的纺织工。
- 加马尔尼克, Я. Б. (Гамарник Я. Б., 1894—1937)——1916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
-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 Л. Б. (Каменев (Розенфельд) Л. Б., 1883—1936)——1901年入党。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29—1932年任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
- 加斯捷夫, А. К. (Гастев А. К., 1882—1941)——1931年入党。1920年起^①任中央劳动研究所所长。
- 捷连斯基, И. А. (Зеленский И. А., 1890—1938)——1906年入党。192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10月起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书记。
- 卡巴科夫, И. Д. (Кабаков И. Д., 1891—1937)——1914年入党。1925—1937

① 本书第5卷为1921年起。——译者注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联共(布)图拉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监察委员会主席,1929年起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

卡尔马诺维奇, М. И. (Калманович М. И., 1888—1937)——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国营谷物农场联合公司理事会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卡芬雅克, 路易·欧仁(Кавеньяк Луи Эжен, 1802—1857)——法国国务活动家, 将军。他领导镇压了巴黎1848年的六月起义。

卡冈诺维奇, 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1893—1991)——1911年入党。1924—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1946年任中央组织部委员。1925年4月至1928年7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192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卡冈诺维奇, М. М. (Каганович М. М., 1888—1941)——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卡雷金娜, А. С. (Калыгина А. С., 1895—1937)——1915年入党。1925年起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工农妇女工作部副部长。

卡明斯基, Г. Н. (Каминский Г. Н., 1895—1938)——1913年入党。1925—1938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8年9月起任农业合作社协会联合会主席和谷类和油料作物合作社联社主席。

康德拉季耶夫, Т. К. (Кондратьев Т. К., 1892—?)——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任沃洛达尔斯基区委员会书记, 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州执行委员会委员。

柯秀尔, С. В. (Косиор С. В., 1889—1939)——1907年入党。1927—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1928年7月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柯秀尔, И. В. (Косиор И. В., 1893—1937)——190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科尔涅夫, В. С. (Корнев В. С., 1889—1939)——1917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委员和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科洛季洛夫, Н. Н. (Колотиллов Н. Н., 1885—1937)——1903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省委书记。
- 科马罗夫, Н. П. (索比诺夫, Ф. Е.) (Комаров Н. П. (Собцов Ф. Е.)), (1886—1937)——1909年入党。192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和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 科萨列夫, А. В. (Косарев А. В., 1903—1939)——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全苏共青团中央书记, 1929年3月起任全苏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 科托夫, В. А. (Котов В. А., 1895—1937)——191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7—1930年任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 1929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人。
- 科兹洛夫, С. К. (Козлов С. К., 1886—?)——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Г. М.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Г. М., 1872—1959)——1893年入党。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主席, 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 克拉瓦利, И. А. (Краваль И. А., 1897—1938)——1919年入党。1928—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克雷连柯, Н. В. (Крыленко Н. В., 1885—1938)——1904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司法人民委员, 检察长高级助理, 1929—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
- 克里尼茨基, А. И. (Кривицкий А. И., 1894—1937)——1915年入党。1924—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1929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
- 克利缅科, И. Е. (Клименко И. Е., 1891—1937)——1912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7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 1929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 各中心机器拖拉机站联合管理部主席。
- 克鲁敏, Г. И. (Круммин Г. И., 1894—1943)——1909年入党。1919—1928年任《经济生活报》编辑, 1928年起任《真理报》编委。
- 克鲁普斯卡娅, Н. К. (Крупская Н. К., 1869—1938)——1898年入党。1927年

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0年起领导俄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1929年起任俄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克维林,Э. И. (Квиринг Э. И., 1888—1937)——1912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并兼任(1927年2月—1928年1月)国家第聂伯国家建设工程局局长。

库比亚克,Н. А. (Кубяк Н. А., 1881—1937)——1898年入党。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中央组织部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库利科夫,Е. Ф. (Куликов Е. Ф., 1891—1943.)——1910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委责任书记,1929—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理事会理事。

库奇明,И. Ф. (Кучмин И. Ф., 1891—1941)——1912年入党。1927年起任伊尔库茨克专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7月起任斯大林格勒专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库兹涅佐夫,С. М. (Кузнецов С. М., 1891—1938)——1915年入党。1926年起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

拉德琴柯,И. И. (Радченко И. И., 1874—1942)——1898年入党。1927—1930年任泥炭工业研究所所长,1923—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副主席。

拉杜斯-津科维奇,В. А. (Радус-Зенькович В. А., 1878—1967)——1898年入党。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

拉柯夫斯基,Х. Г. (Раковский Х. Г., 1873—1941)——1917年入党。1919—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联共(布)。1923—1927年任驻英国、法国全权代表,1923年起担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28—1934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和巴尔瑙尔。

拉林,Ю. (卢里叶,М. З.) (Ларин Ю. (Лурье М. З.), 1882—1932)——1917年入党。经济学家,记者。1928年起任莫斯科反酗酒协会主席,后兼任全苏禁酒协会理事会主席。

李可夫,А. И. (Рыков А. И., 1881—1938)——1899年入党。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

- 员会主席(1929年前),1926—1930年兼任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 里亚博夫,А. Н. (Рябов А. Н., 1888—1939)——1906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布良斯克省委书记,1928年12月起任联共(布)莫斯科市莫斯科南岸区区委书记。
- 利斯昆,Е. Ф. (Лискун Е. Ф., 1873—1958)——1923年起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教授。
- 利图诺夫斯基,В. Н. (Литуновский В. Н., ? —1937)——1928年3月起任陆军人民委员部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 利西岑,Н. В. (Лисицын Н. В., 1894—1939)——1910年入党。1923—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俄联邦工农检察院副人民委员。
- 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М. Н. (Лядов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 Н., 1872—1947)——1893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委员,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 利亚克苏特金,Ф. Ф. (Ляксуткин Ф. Ф., 1896—?)——1913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巡视员。
- 列昂诺夫,Ф. Г. (Леонов Ф. Г., 1892—1938)——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8年任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三书记。
- 列别德,Д. З. (Лебедь Д. З., 1893—1937)——1909年入党。1926—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30年^①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列普谢,И. И. (Лепсе И. И., 1889—1929)——1904年入党。192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候补委员。1925年起任冶金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成员。
- 列维茨基,А. П. (Левицкий А. П., 1873—1942)——1926—1930年任肥料科学研究所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所长。
- 列扎瓦,А. М. (Лежава А. М., 1870—1937)——1904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① 原文如此,本书其他各卷均为1927—1930年。——译者注

- 林德曼,索洛蒙·阿尔维德·阿哈捷斯(Линдман Соломон Арвид Ахатес, 1862—1936)——瑞典国务、军事和政治活动家。1912—1936年为保守党领袖。1928—1930年任瑞典首相。
- 留京,М. Н. (Рютин М. Н., 1890—1937)——1914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1928—1930年任《红星报》副主编。
- 柳比莫夫,И. Е. (Любимов И. Е., 1882—1937)——1902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消费合作社联社中央理事会主席。
- 卢那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1875—1933)——1895年入党。1917—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 鲁希莫维奇,М. Л. (Рухимович М. Л., 1889—1938)——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鲁祖塔克,Я. Э. (Рудзутак Я. Э., 1887—1938)——1905年入党。1926—1932年任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1926—1937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洛博夫,С. С. (Лобов С. С., 1888—1937)——1913年入党。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电机工业总局局长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洛卡茨科夫,М. П. (Локацков М. П., 1883—1928)——1905年入党。1927—1928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计划外任务检查院副院长。
- 洛米纳泽,В. В. (Ломинадзе В. В., 1897—1935)——1917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1925—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洛莫夫(奥波科夫),Г. И. (Ломов (Оппоков) Г. И., 1888—1938)——1903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国营顿涅茨克煤炭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1929年起任全苏国营石油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洛佐夫斯基, А. (德里佐, 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А. (Дридзо С. А.)), 1878—1952)——1901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3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 马尔克维奇, А. М. (Маркевич А. М., 1893—1938)——1921年入党。1923—1928年任乌克兰国营农场托拉斯管理委员会委员, 敖德萨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场长, 他在该农场组建了苏联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 1929—1932年是全苏机器拖拉机站中心的领导人之一。
- 马尔托夫, Л. (策杰尔包姆, Ю. О.) (Мартов Л. (Цедербаум Ю. О.)), 1873—1923)——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1920年起侨居国外, 在柏林出版了《社会主义通讯》杂志。
- 马科韦茨基, А. Е. (Маковецкий А. Е., 1880—?)——工艺工程师, 学者。1928年在乌拉尔工学院任教。
- 马拉什金, С. И. (Малашкин С. И., 1888—1988)——苏联作家。
- 马祖罗夫, С. С. (Мазуров С. С., 1892—?)——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沙赫特市第一国营矿场锅炉工。
- 曼德尔施塔姆, Н. Н.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Н. Н., 1879—1929)——1902年入党。1926—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
- 梅德韦杰夫, А. В. (Медведев А. В., 1884—1937)——1904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29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 梅德韦杰夫, Т. И. (Медведев Т. И., 1885—?)——1919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9年任第一模范印刷厂车间技师。
- 美尔尼昌斯基, Г. Н. (Мельничанский Г. Н., 1886—1937)——1902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纺织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29—1931年任全苏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梅日劳克, В. И. (Межлаук В. И., 1893—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1年任金属工业总局局长, 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梅什金, Ю. С. (Мышкин Ю. С., 1895—1946)——1912年入党。1926—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责任督导员, 1928—1929年任联共(布)鄂木斯克专区委员会责任书记, 1929—1930年任联共(布)勒热夫专区委员会责任书记。

- 米尔佐扬, Л. И. (Мирзоян Л. И., 1897—1939)——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9年起先后任联共(布)彼尔姆专区区委书记,乌拉尔州委第二书记。
- 米高扬, А. И. (Микоян А. И., 1895—1978)——1915年入党。1923—197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商业人民委员。
- 米哈伊洛夫, В. М. (Михайлов В. М., 1894—1937)——1915年入党。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中央组织部候补委员。1922—1929年^①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联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委书记,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年起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工程副主任。
- 米哈伊洛夫-伊万诺夫, М. С. (Михайлов-Иванов М. С., 1894—1931)——1913年入党。192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列宁格勒机器制造托拉斯总经理。
- 米赫年科, Д. А. (Михненко Д. А., 1888—1937)——1918年入党。1923—1928年任联共(布)阿尔乔莫夫斯克专区委员会书记,1928年3月起任扎波罗热市木材联合企业经理。
- 米利恰科夫, А. И. (Мильчаков А. И., 1903—1973)——1919年入党。1925—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28—1929年在全苏共青团中央工作。
- 米柳亭, В. П. (Милютин В. П., 1884—1937)——1910年入党。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
-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 В. М. (Молотов (Скрябин) В. М., 1890—1986)——1906年入党。1926—195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1—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29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 穆拉洛夫, А. И. (Муралов А. И., 1886—1937)——1905年入党。1923—1928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1卷为1925—1929年。——译者注

- 员,1929—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
- 诺伊曼,海因茨(Нейман Гейнц, 1902—1937)——1919年起加入德国共产党。1927—1929年先后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24—1928年为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 尼古拉耶娃, К. И. (Николаева К. И., 1893—1944)——1909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
- 诺索夫, И. П. (Носов И. П., 1888—1937)——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委书记。
- 帕夫卢诺夫斯基, И. П. (Павлуновский И. П., 1888—1940)——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 潘科夫, С. В. (Панков С. В., 1897—?)——1922年入党。曾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科洛姆纳县委委员,1928年任联共(布)科洛姆纳厂支部书记。
- 佩尼科夫, М. А. (Пеньков М. А., 1887—1963)——1907年入党。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罗戈日-西蒙诺夫区委员会书记,1928—1931年先后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督导员,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萨利斯克专区委员会列宁区委书记、沙赫特区委书记。
- 皮达可夫, Ю. Л. (Пятаков Ю. Л., 1890—1937)——1910年入党。1927年任驻法国商务代表,1928年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29年起任国家银行行长。
- 皮尔苏茨基, 约瑟夫(Пилсудский Юзеф, 1867—1935)——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26—1928年、1930年任波兰总理。
- 皮亚特尼茨基, О. А. (Пятницкий О. А., 1882—1938)——1898年入党。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普里亚尼什尼科夫, Д. Н. (Прянишников Д. Н., 1865—1948)——农业化学家,生物化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895—1948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农业化学教研室主任。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Е. 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Е. А., 1886—1937)——1903年入党。1924—1927年任苏联中央租让委员会副主席,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因“开办秘密印刷厂”,根据1927年10月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

- 主席团的决定被开除出党。后在苏联国家计委系统工作。
- 普列汉诺夫(瓦连廷诺夫),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Валентинов) Г. В., 1856—191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1903年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
- 普罗科佩, 亚尔马尔 (Прокопе (Прокопэ) Ялмар, 1889—1954)——1924—1931年任芬兰外交部长。
- 普图哈, В. В. (Птуха В. В., 1894—1938)——1917年入党。1927—1935年先后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员会书记,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斯大林格勒专区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
- 齐夫里诺维奇, В. Е. (Цифринович В. Е., 1897—1938)——1917年入党。1928—192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组织调配处副处长,联共(布)莫斯科巴乌曼区委员会责任书记,1929年10月起任全苏钾矿托拉斯总经理。
- 丘巴尔, В. Я. (Чубарь В. Я., 1891—1939)——1907年入党。1926—1935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
- 丘赫里塔, Г. В. (Чухрита Г. В., 1895—1937)——1918年入党。1926—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副供给人民委员。
- 日丹诺夫, Г. М. (Жданов Г. М., 1876—1944)——1917年入党。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是彼尔姆州雷西瓦钢铁厂工人。
- 茹柯夫, И. П. (Жуков И. П., 1889—1937)——1909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列宁格勒电力托拉斯总经理,1928—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莫斯科国营电工器材托拉斯总经理。
- 萨韦利耶夫, М. А. (Савельев М. А., 1884—1939)——1903年入党。1928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先后任《真理报》编委、编辑。
- 瑟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 И., 1893—1937)——1913年入党。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边疆区委书记,1929—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 沙茨金, Л. А. (Шацкин Л. А., 1902—1937)——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8年任全苏共青团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共产国际书记。

沙宁(沙皮罗), Л. Г. (Шанин (Шапиро) Л. Г., 1887—1957)——1917年入党。

1925—1929年在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

沙图诺夫斯基, Я. М. (Шатуновский Я. М., 1876—1932)——1918年入党。

1921年起为国家计委工业处成员,劳动国防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委员。

舍博尔达耶夫, Б. П. (Шеболдаев Б. П., 1895—1937)——1914年入党。

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联共(布)下伏尔加边疆区委书记。

什基里亚托夫, М. Ф. (Шкирятов М. Ф., 1883—1954)——1906年入党。

1922—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施米特, В. В. (Шмидт В.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

联共(布)中央委员。1918—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施瓦茨, И. И. (Шварц И. И., 1879—1951)——1899年入党。1924—1934年任

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0年任苏联煤炭工业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什维尔尼克, Н. М. (Шверник Н. М., 1888—1970)——1905年入党。1925—

197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州委书记,1929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司徒卢威, П. Б. (Струве П. Б., 1870—1944)——俄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

哲学家。1921年离开俄国,侨居国外。

斯大林, И. В. (Сталин И. В., 1879—1953)——1898年入党。1917年10月任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19年起一直担任这一职务。1922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斯捷茨基, А. И. (Стецкий А. И., 1896—1938)——1915年入党。1927年起任

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宣传鼓动部和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Скрышник Н. А., 1872—1933)——1897年入党。1927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

斯列普科夫, А. Н. (Слепков А. Н., 1899—1937)——1919年入党。1926—

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真理报》编辑之一和《布

- 尔什维克》杂志编委。
- 斯米尔诺夫, А. П. (Смирнов А. П., 1878—1938)——1896年入党。1922—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1930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 农业人民委员, 兼任红色农民国际总书记, 192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 斯米滕, Е. Г. (Смиттен Е. Г., 1883—1942)——1904年入党。1921—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统计处处长。
- 斯塔兰尼科夫, В. П. (Старанников В. П., 1893—?)——1911年入党。1927—1929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海军检察院副院长。
- 斯滕, Я. Э. (Стэн Я. Э., 1899—1938)——1914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和出版部副部长, 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 斯图杰诺夫, Н. М. (Студенов Н. М., 1871—?)——农业专家。从事棉花栽培、肥料问题的研究。
- 斯托雷平,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П. А., 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1906年起任内务大臣, 大臣会议主席。
- 斯瓦尼泽, А. С. (Сванидзе А. С., 1886—1941)——1904年入党。1928年5月—1930年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矿产出口”股份公司和“全苏国际旅行社”股份公司总经理, 驻德国副商务代表。
- 苏霍姆林, К. В. (Сухомлин К. В., 1886—1938)——1905年入党。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0年任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苏利莫夫, Д. Е. (Сулимов Д. Е., 1890—1937)——1905年入党。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7—1930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第一副交通人民委员。
- 索柯里尼柯夫(勃里连特),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Бриллиант) Г. Я., 1888—1939)——1905年入党。1922—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 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总经理, 1929—1932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 塔尔海默, 奥古斯特(Тальгеймер Август, 1884—1948)——1918—1923年为德

-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4—1928年为联共(布)党员。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构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28年12月14日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创始人之一。
- 台尔曼,恩斯特(Тельман Эрнст, 1886—1944)——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特先科(Тыщенко)——1927—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Л. Д. (Троцкий (Бронштейн) Л. Д., 1879—1940)——1917年入党。1917—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10月、1919—1926年任政治局委员。1925—1927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左派反对派的领袖和思想家。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
- 托洛孔采夫,А. Ф. (Толоконцев А. Ф., 1889—1937)——1914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通用机器制造联合公司总经理,军事工业总局局长,1929—1931年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委员。
- 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М. П. (Томский (Ефремов) М. П., 1880—1936)——1904年入党。1922—193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2—1929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起任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 瓦雷基斯,И. М. (Варейкис И. М., 1894—1938)——1913年入党。1924—1930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部黑土地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 威廉斯,В. Р. (Вильямс В. Р., 1863—1939)——土壤学家。1894—1939年任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土壤学教研室主任。
- 魏茨,В. И. (Вейц В. И., 1905—1961)——苏联动力工程学家。1925年起在各个高等院校任教。
- 魏恩贝尔格,Г. Д. (Вейнберг Г. Д., 1891—1946)——1906年入党。1925—193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食品工人工会主席。1929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
- 温什里希特,И. С. (Уншлихт И. С., 1879—1938)——1900年入党。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

乌格拉诺夫, Н. А. (Угланов Н. А., 1886—1937)——1907 年入党。1923—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6—1929 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4—1929 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1929 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并于 1924—1928 年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 1928—1930 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

乌汉诺夫, К. В. (Уханов К. В., 1891—1939)——1907 年入党。1923—1937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 年起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1929 年起任莫斯科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乌加洛夫, Ф. Я. (Угаров Ф. Я., 1885—1932)——1905 年入党。1927—1930 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 年任列宁格勒州工会联合会主席。

乌里扬诺娃, М. И. (Ульянова М. И., 1878—1937)——1898 年入党。1925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7—1929 年任《真理报》编委和责任秘书。

谢列布罗夫斯基, А. П.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А. П., 1884—1938)——1903 年入党。1925 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 年起任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金管理总局局长,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谢苗诺夫, Б. А. (Семенов Б. А., 1890—1940)——1907 年入党。1927—1934 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

欣楚克, Л. М. (Хинчук Л. М., 1868—1939)——1920 年入党。1927 年 7 月起任苏联副商业人民委员。

雅科夫列夫(爱泼斯坦), Я. А. (Яковлев (Эпштейн) Я. А., 1896—1938)——1913 年入党。1924—1930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9 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1929—1934 年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雅罗斯拉夫斯基, В. М. (古别尔曼, М. И.)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В. М. (Губельман М. И.), 1878—1943)——1898 年入党。1923—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和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 С., 1877—1937)——1898 年入党。1924—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2—1935 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书记。

伊克拉莫夫, А. И. (Икрамов А. И., 1898—1938)——1918 年入党。1925—

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5年3月起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9—1937年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和塔什干市委第一书记。

伊帕季耶夫, В. Н. (Ипатьев В. Н., 1867—1952)——有机化学家,科学院院士。1918—1927年在苏联科学院、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由他创建的高压化学科学研究所工作。1927年被派往国外出差,没有回国。

伊万诺夫, В. И. (Иванов В. И., 1893—1938)——1915年入党。1925—1934年任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易卜拉欣莫夫(伊布赖伊莫夫), 韦利(Ибрагимов (Ибраимов) Вели, 1888—1928)——1918年入党。20年代任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扎东斯基, В. П. (Затонский В. П., 1888—1938)——1917年入党。1927—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7—193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